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5月(上)
总第197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全国助残日

2026.5.17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
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2026 年 5 月 上
总第 197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5 月 15 日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SHE HUI YU GONG YI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哞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林平光 /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马强 / 马贵荣 / 万沣毅 / 王红 / 王保峰 / 王德立 / 王守红 / 王国权 / 王坚松 / 王政 / 王哲
王德兵 / 白浩扬 / 布朋印 / 冯军伟 / 田瑞建 / 卢莎 / 邓富友 / 布宏雷 / 石恒平 / 田野 / 闫新勇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长鹏 / 刘漩 / 孙明 / 朱红艳 / 任璐 / 辛福 / 吴春华 / 吴雪燕 / 何书一
何宗尉 / 李卫华 / 李永华 / 李梓英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斌 / 李军 / 肖玲 / 苏芬芬 / 陈炎松 / 陈勇 / 陈承
谷学亮 / 杨航 / 杨会民 / 杨同喜 / 杨雨 / 杨高磊 / 杨扬 / 杨威 / 邵佳 / 张兴亮 / 张鼎 / 张燕蕊 / 张冬
张汉英 / 张金霞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范娱艳 / 侯军旺 / 侯俊勇 / 赵燕成 / 赵建苹 / 赵容榴 / 胡刚
徐志昌 / 高蕾 / 高云辉 / 郭保生 / 郭晓利 / 耿庆山 / 柴宏 / 秦一杰 / 黄玉海 / 黄洪松 / 曹耀文
鲁兵库 / 裴凯峰 / 联凡 / 惠熙玲 / 蒋红超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裴旭峰 / 臧忠燕 / 廖俊军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 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 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 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社会救助立法定纲

2026 年 4 月 30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以下简称社会救助法），定于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这部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民生兜底保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石。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等基本生活保障和人格尊严。从 1995 年启动立法研究，到 2014 年施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再到今年国家立法落地，这部法律凝聚了三十余年的实践智慧。它系统吸纳了成熟的救助机制，针对低收入群体面临的新风险科学扩围，确立了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推动救助理念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社会救助法精准覆盖了长期处于政策“夹心层”的群体。通过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法定范围，社会救助法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这一调整不仅提升了社会救助效益，更确保了救助资源向最需要的人群倾斜，真正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有效减少了救助盲区与资源错配。

此外，社会救助法专设“社会力量参与”章节，构建了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有效衔接的机制。法律清晰界定了协同路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主要解决复杂的社会及心理问题；慈善事业旨在调动社会化救助资源；志愿服务则在更广范围提供灵活帮扶。通过规定“依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及表彰奖励措施，社会救助法既以政策激励规范行为，又以价值倡导营造“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社会道德环境，推动社会救助事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通过完善社会救助统计制度，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以法律推动救助管理部门优化流程，提高便民化水平。利用信息手段实现精准识别和常态化帮扶，不仅能提升管理服务能力，更通过强化监督保障，确保救助资源都用在刀刃上。

社会救助法的颁布，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一份关于尊严与希望的社会契约。它既要兜住急难愁盼的底线，也要托起发展向上的可能。当政府的主导力、社会的协同力与法治的保障力同频共振，我们终将织就一张有温度、有韧性、可感知的民生安全网，让每一份困境中的期待，都能被看见、被回应。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目次 CONTENTS

2026 年 5 月 上
总第 197 期

专题报道

创新助残扶困模式的实践与启示——以古雄街道“喘息服务”为例 …… 汪华桂 徐 康 佘杰山

心理茶馆

心理介入：六年邻里纠纷的破局关键——一宗社区调解案例的启示 …… 韦志中 周治琼 / 01

公益慈善

街道社工实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的策略研究 …… 马春红 / 03
“社工 + 志愿”模式下的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路径构建 …… 朱艳萍 / 06
新业态劳动者未成年子女关怀的校地协同模式研究——基于“博爱青春”高校志愿项目的实践探索 …… 李 妍 / 09
教育强国背景下研究生资助育人功能提升路径探究 …… 安 泰 / 12
全民阅读双驱闭环模式的构建及推广研究——基于公益性与商业化的协同视角
…… 崔铭轩 丛雨欣 姜幸延 王思淇 段天彤 / 15
公益导向下的工人文化宫运营模式优化策略研究 …… 游丹雯 / 18
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发展的实践模式建构 …… 刘 新 / 21
推动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基于宁波市政策框架与国企履责的双维视角 …… 胡彩萍 / 24
精准资助导向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创业困境及帮扶路径研究 …… 石宇佳 / 27
公益微偿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基于河北省保定市两试点社区的案例研究 …… 吴金融 / 30
中国公益文化融入日语通识教学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究 …… 赵蓉翔 / 33
“1+3+X”模式下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育人策略探讨 …… 陈大千 / 36
福利院“类社区”化发展实践探索——基于 F 区福利院精神康复服务的研究 …… 王 晗 刘 芳* 邢 莉 / 39

一老一小

激活“银发人力资本”：供需矛盾破解与支持体系构建 …… 张 玮 王 昆 / 42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失智老人“需求式照护”困境的质性研究 …… 陶 婧 孙 蕊 马君澜 周茗沁 孙 劼* / 46
结构性张力与制度性调适：养老服务供给何以突破结构性失衡困境？——以 B 市 H 区为例 …… 穆 钰 / 49
家庭教育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的影响研究 …… 赵 爽 于鑫荷 / 52
从“悬浮”到“落地”：社区协同推动困境儿童政策执行的实践路径——基于临沂“沂蒙护童”项目的探索
…… 李艳丽 高 珏 高 媛 胡晓娜 / 55
南宁市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研究 …… 潘子恒 / 58
江苏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研究 …… 张肖敏 黄润龙 孙志明 贺 勤 梁 爽 / 61
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研究 …… 李妍妍 / 64
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 …… 徐娟娟 / 67
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台州公办托育资源优化与协同机制研究 …… 潘妤妤 / 70
代际互助视角下“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对家庭关系改善的协同效应探究 …… 曾雪莲 庄伊泮 赵建业* / 73
高龄失独老人养老生活与社会工作介入——以 S 区 S 社区为例 …… 郝冠颖 / 76
老幼共融服务模式的社区实践、现实挑战与优化策略 …… 张清清 / 79

老年人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及支撑体系研究 …… 雒香云 施 健*/ 82
社会化健康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中的作用研究 …… 李盈盈 / 85
老年人能力评估团队建设模式探讨——以医养结合机构为例 …… 李桂云 涂健铭 朱艳玲 / 88

百家争鸣

父母生涯相关行为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适应力的影响：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 吕邹沁 龙金林 曾晓东 / 91
青年社交寻求“情绪价值”的成因分析、风险审视及引导路径 …… 曹逸航 / 95
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现状调查分析 …… 张 睿 / 98
学科建设引领下的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 崔 钺 熊建超 韩会杰 孙奕凡 / 101
流动的武术与锚定的地方：体育影像中“地方感”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秩序 …… 亓 鹏 / 104
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融合下的非遗文娱创新模式研究 …… 梁 凯 韩 西 / 107
职业教育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途径探究 …… 张军师 / 110
浅析贵阳市青年群体婚育观的影响因素 …… 王浩霖 欧 娅 何 苑 / 113
基于 MBAT 理论的正念引导在书法练习中的应用探究 …… 倪安琪 秦 竹 黄万琳*/ 116
以托管托育服务赋能企业长期稳定发展——陕煤集团工会托管托育服务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 陈芳君 / 119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新大纲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及“双能力”培育对策 …… 陈兰兰 / 122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伊金霍洛旗的双岗实践观察 …… 钟宝玉 / 125
三孩孕产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扎根分析 …… 沈园园 水黎明 / 128

教学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概念与框架 …… 孟 瑶 / 131
艺术课程翻转课堂的过程性考核体系构建与实践 …… 应佳辰 / 136
体验式教学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 袁涤繁 / 139
高校立德树人理念的内涵与实施路径研究 …… 秦二娟 / 142
对初中学生开展德育工作的创新路径研究 …… 陶玉林 / 145
正念教养视角下小学生行为发展的促进机制研究 …… 谢怡晴 黄栩琳 曹 贝 林晓彤 洪紫静*/ 148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培养探讨 …… 李新国 / 151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析 …… 徐 露 / 154
全人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路径——以南京医科大学“卫蓝”实践项目为例
…… 刘 丽 王 超*/ 157
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探析 …… 李 娜 吴 莎 吴 琼 / 160
优化现场教学推进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 郭子玉 / 163
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建设路径探析——基于提高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视角 …… 吴 丹 高 阳 / 166
文化自信视域下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研究 …… 李 菊 / 169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研究 …… 李帅文 / 172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研究 …… 毕雪蒙 王建立 / 175

思政论坛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分析 …… 符敏霞 / 178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 唐阳阳 / 181
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研究 …… 施慧娟 / 184
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政治逻辑 …… 胡艳萍 / 187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实践进路 …… 徐嘉仪 曾　环 / 190
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 …… 任瑞娟 / 193
课程思政视域下“社区社会工作”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 …… 梁　洁 牛凯宁 / 196
思政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及实践策略探索 …… 娄朝慧 / 199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 周成良 / 202
多维度视域下“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研究改革路径探析 …… 米尔扎提·马尔夏 / 205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 陈希胜 孙玲凤* 马　宇 / 208
“大思政”格局下地方高校红色基因传承“师生共育”模式研究——以九江学院为例 …… 郭　清 / 211
我国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研究现状与前沿演进——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 邓博文 / 214
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以云南为例 …… 杨继伟 / 218
“预测”与“敏捷”双轨融合的项目管理课程思政体系重构与实践探索 …… 马礼萍 方　放 / 221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在思政育人中的角色定位与能力提升 …… 郑　妍 / 224
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 马博威 / 227
基于“校—开—社”联动的开放教育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 鲁颖嘉 / 230

学海探骊

产业升级背景下高校学生岗位适配能力的培养路径 …… 韩宏达 / 233
焦点解决技术在高校困难学生谈心谈话中的应用策略 …… 董冠平 陈晓蕾 / 236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的路径研究 …… 潘柳虹 / 239
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力与幸福感研究 …… 雷一祎 杨　韩* / 242
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 石英鑫 / 245
“一站式”学生社区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析 …… 史亚萍 / 248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的道德规范及其践行 …… 李正一 / 251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的隐性冲突与心理适应机制研究 …… 赵婕煜 / 254
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与探索 …… 王　肖 / 257
积极心理赋能全生命周期——校社协同构建社区心理服务新生态的实践与探索 …… 程佳宁 詹清清 / 260
“朋辈养心”——基于朋辈支持的高校边缘社交群体心理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 彭志凯 邹灵玥* / 263
“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对高职学生心理韧性提升影响实证研究 …… 谭文东 杨　黎 丁　丽 赵文斌 / 266
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研究与实践 …… 姚　梅 / 270
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观塑造研究 …… 夏　灿 / 273
经济理性视角下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 许敬晗 / 27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双循环”培育机制研究 …… 潘　毅 李向燕 / 279
大学生生育观现实情况调研和对策研究 …… 徐子涵 向文歆 张国栋 徐益彩* / 282

艺术长廊

书印相谐 积健为雄——知名书法篆刻家杜延平侧记 …… 彭一超
朴拙有趣 执念求真——沈世铎水墨人物画作品观后 …… 葛玉君

创新助残扶困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以古雄街道“喘息服务”为例

汪华桂 徐 康 佘杰山

一、调研背景与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和残疾人的需求多样化，长期照护压力已经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有失能老人、残疾人的家庭，家庭成员往往需要全天候照护，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正是这类家庭的真实写照。在这种背景下，“喘息服务”应运而生，成为一种创新的社会服务模式。“喘息服务”（Respite Care）是指通过专业或半专业的服务人员，为需要长期照护家庭提供临时性替代照护服务，让家庭成员能够获得短暂的休息时间，从而减轻照护压力，提高照护质量。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自 2018 年起探索实践的“喘息服务”模式，已成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社区助残扶困的典范。本研究通过全面调研古雄街道“喘息服务”的发展历程、运作模式和创新实践，旨在系统总结其成功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并为类似地区推广相关服务提供参考借鉴。

二、古雄街道“喘息服务”的发展历程与规模

古雄街道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南部，占地面积 11.29 平方公里，下辖大方、古雄、柿子树、新林、新湖 5 个社区，现有常住人口 6.7 万人。街道内残疾人口较多，持证残疾人达 552 名，其中重度失能残疾人的照护问题尤为突出。古雄街道的“喘息服务”发展经历了从试点到推广、从单一到多元的渐进过程。

初步探索阶段（2015—2017 年）。起初源于社区居民自发性的互助行为，如新林社区居民钟某香从 2015 年开始帮助因车祸瘫痪在床的邻居陶大姐，每天四次上门协助其洗澡、洗头、洗衣服、上厕所，打扫卫生，一年 365 天从未间断。这种邻里自发的互助行为成为后来“喘息服务”的雏形。

试点启动阶段（2018 年）。2018 年，街道残联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时，被柿子树社区的一户家庭深深触动：孩子患有智力障碍，吃喝拉撒全依靠父母，几乎 24 小时绑在身边，父母没法工作甚至不敢生病。孩子妈妈累到崩溃：“哪一天能放我们两小时假就好了。”这件事直接推动了“让失能者家人‘喘口气’”的“喘息服务”试点工作，该项服务首先在柿子树社区开展。

全省推广阶段（2019 年）。2019 年，古雄街道探索“喘息服务”的做法被省政府办公厅《每日要情》第 189 期刊发，“古雄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

升级拓展阶段（2021 年至今）。2021 年，古雄街道推出了“喘息服务 3.0”版本，通过购买第三方机构专业服务的方式，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助残服务。服务对象从残疾人扩展到独居、高龄老人及

困境儿童，服务内容也更加多元化、专业化（见表1）。

表1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时间	主要特征	服务规模
初步探索	2015—2017年	居民自发互助	个别案例
试点启动	2018年	街道组织试点	1个社区
全省推广	2019年	经验在全省推广	全街道5个社区
升级拓展	2021年至今	3.0版本专业化服务	33户家庭/年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已形成相当规模，仅2025年就为辖区内33户困难家庭提供2523次服务，总服务时长达4800余小时，每户月均服务时长约12小时。服务范围覆盖全街道5个社区，受益群体包括残疾人、独居高龄老人和困境儿童等多类弱势群体。

三、主要做法与创新模式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工作模式和创新做法。

（一）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近年来，街道党工委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古雄·YI家”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构建了“党建引领、社会参与、渠道多样”的立体化助残格局。

党组织引领。将“喘息服务”纳入街道工委书记项目“古雄·YI家”基层治理建设，深化六大行动之一的“益路相伴”行动；建成2个“残疾人之家”；招募党员志愿者，设立党员助残服务示范岗。

社会组织参与。吸纳16家专业社会组织、8支服务团队，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服务网络，如尚满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专业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专业服务。这些组织凭借其专业能力和资源，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供给。

企业资源整合。举办慈善公益路演募集善款精准帮扶困难家庭，已举办5场活动，共募集资金34.83万元，直接帮扶63户困难家庭。同时推进爱心企业与残疾困难群体“一对一”精准帮扶，已形成结对帮扶40对。

（二）精准服务定制模式

街道不断优化升级“喘息服务”项目，使内容更全面、体系更完善、服务更专业、供需更精准。

专业团队强支撑。推动“五社联动”，组建近百人的助残志愿服务队，其中专业护理员6人，形成“1名专业人员+N名志愿者”的结对模式，所有服务人员经培训考核上岗，确保服务专业度。

深入调研摸需求。走访260户重残、高龄老人、困境儿童等失能困难家庭，对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服务需求等进行立档分析和专业评估。

因人施策定方案。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和不同需求，“一人一策”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提供医疗康复、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专业服务等五大类18项服务。

（三）专业服务拓展与创新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3.0”版本的最大特点是专业服务的拓展与创新，超越了传统的家政服务模式（见表2）。

表2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内容体系

服务类型	具体内容	提供主体	受益群体
生活照料	修剪指甲、理发剃须，身体清洁，助浴、助餐，日间托管照料	志愿者、社工	重度残疾人、高龄老人
医疗健康	基础健康检测，医疗康复训练，保健理疗，胃饲管更换，生活能力锻炼	专业医护人员、康复师	慢性病患者、术后恢复者
家政服务	被子晾晒、家庭卫生，擦玻璃、家电清洗，物资药品代购	志愿者、社会组织	所有服务对象
精神慰藉	开展心理咨询、心理疏导，转介，开展节日活动	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独居老人、困境儿童
专业服务	家电维修，家具维修，网络、电脑维修	专业维修人员	所有服务对象

医疗健康服务。借助“健康一体机”等专业设备，为残疾人测量血压、血氧、血糖和尿酸，并提供饮食和生活指导。如助残护理员到服务对象吕某家中，为其进行健康检测，并告知其饮食、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康复训练服务。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康复训练和专业护理等服务，如康复师定期上门为植物人傅某进行康复评估和训练指导。

心理支持与精神慰藉。服务内容从单纯“物质救助”向“精神帮扶”转变，让残疾人身心健康“齐步走”。如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次“喘息服务”时，得知常年卧床的残疾人小朱无意间说了句“床单被套好久没换了”，没过几天，社工就上门为他送去并换上了新的床上四件套，以及大米、牛奶等。小朱感动地说：“我觉得自己是受重视的，我要好好面对生活。”

辅助性就业项目。街道积极探索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成立“手工坊”、打造“一亩花田2.0”助困

项目，带动 12 名残疾人、15 名周边困难群众实现就业。同时，通过拓展销售渠道、深化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努力为残疾人实现增能创收。近一年来，参与辅助就业残疾人增收近 5 万元。

四、成效评估与社会影响

“喘息服务”项目的持续实施，不仅造福了残疾人家庭，还将服务拓展到更宽领域，将受众群体扩大到更多家庭，将正能量传播到更广范围。

精准对接需求，减轻家庭负担。截至目前，街道已累计筹集资金 87.4 万元，为 152 户家庭提供超 16000 小时专业服务，涵盖康复训练、生活照护及心理疏导等多个方面，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家属的照护压力。自项目实施以来，服务满意度始终保持 100%。

树立正面典型，形成带动效应。“喘息服务”在推进过程中，曾受助的残疾人家庭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诠释担当。潘龙银家庭获“全国最美家庭”，实现了从被助到助人的暖心蜕变。如今，潘龙银在助残机构尽己所能，传递爱心和力量。古雄街道获评“全省助残先进集体”，街道残联专委斩获“江苏省最美社工”“全国职业指导模范”等荣誉，成为基层助残标杆。

强化宣传推广，提升品牌形象。2019 年区残联“喘息服务”项目在全省残联教育就业工作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喘息服务”的初步做法被省政府办公厅《每日要情》刊发，“喘息服务”被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内容。“古雄经验”不仅在本地推广，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治理模式。

五、面临的挑战与改进方向

尽管古雄街道“喘息服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资金可持续性问题

“喘息服务”的持续运行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目前古雄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慈善募捐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但长期来看仍面临资金可持续性的挑战。虽然街道通过慈善公益路演募集了部分资金，但对于长期大规模推广来说，这些资金仍然不足。

改进方向：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包括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捐赠、探索设立专项基金等。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精准识别服务对象和优化服务内容，确保资金用在最需要的群体和最有效的服务上。

（二）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虽然古雄街道已经引入了 16 个社会组织和近百人的志愿者服务队，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医疗护理、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需要专业资质的服务，目前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改进方向：加强对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可以与专业院校、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培训机制和资格认证体系。同时，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如退休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提升整体服务的专业性。

（三）服务覆盖面仍需扩大

2025 年，古雄街道“喘息服务”已服务 33 户有失能人员的困难家庭，但辖区内仍有一些有类似需求的家庭未能获得服务。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残疾人口增加，服务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如何扩大服务覆盖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进方向：建立科学的需求评估机制，精准识别最需要服务的家庭，优先满足最紧迫的需求。同时，探索分级服务模式，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提供不同服务，从而在有限资源下扩大服务覆盖面。同时可以发展“服务券”等形式，让家庭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

六、经验启示与推广建议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借鉴，以下是可以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建议。

（一）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古雄经验表明，政策支持是“喘息服务”成功推广的重要保障。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相关制度列入立法内容，为服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他地区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将“喘息服务”纳入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文件，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资金来源和责任主体，建立长效机制。

同时，可以将“喘息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保险支付部分“喘息服务”费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还可以将“喘息服务”与现有的居家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长护险”等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二）社区主导与多元协同

古雄街道的成功经验表明，社区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是“喘息服务”有效运行的关键。社区作为基

层组织，最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情况，能够精准识别服务对象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内容。

其他地区可以借鉴古雄街道的“党建 + 服务”模式，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整合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各方资源，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服务格局。特别要注重培育和发展本地社会组织，吸引本地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建立稳定的服务队伍。

（三）专业服务与精准对接

古雄街道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方案值得推广。其他地区在推行“喘息服务”时，也应该注重服务的精准化和个性化，避免“一刀切”的服务模式。可以通过建立需求评估机制，准确了解每个家庭的具体需求和偏好，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方案。

同时，要注重服务的专业性，特别是医疗护理、康复训练等专业服务。可以借鉴古雄街道与专业机构合作的经验，与本地医疗机构、康复中心、心理咨询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引入专业力量提供高质量服务。

（四）可持续发展模式

“喘息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多元化的模式。古雄街道通过辅助性就业项目，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实现增能创收，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他地区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将“喘息服务”与就业支持相结合，既提供照护服务，又帮助有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此外，还可以探索“时间银行”模式，鼓励志愿者参与服务，并将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将来需要时可以换取相应的服务。这种模式能够促进社区互助，缓解服务人力不足的问题。

七、结论与展望

古雄街道“喘息服务”的实践表明，这种创新性的服务模式能够有效减轻家庭照护负担，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精准服务定制和专业服务拓展，古雄街道构建了“党建引领、社会参与、渠道多样”的立体化助残格局，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未来，“喘息服务”的发展需要更加注重制度化、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将“喘息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社区应发挥主导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提供精准服务；社会组织应提升专业能力，提供高质量服务；家庭和社会应提高对“喘息服务”的认识和理解，形成支持“喘息服务”发展的良好氛围。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长期照护需求增加，“喘息服务”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古雄街道的经验表明，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和完善工作机制，“喘息服务”能够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希望更多地区能够借鉴古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发展适合本地的“喘息服务”模式，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喘息”的机会，让更多残疾人和老年人过上更有质量、更有尊严的生活。

（作者：汪华桂，江苏南京雨花台古雄街道残联副理事长；徐康，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023 级本科生；佘杰山，江苏南京雨花台古雄街道民生服务办主任）

心理介入：六年邻里纠纷的破局关键
——一宗社区调解案例的启示

韦志中 周治琼

一、案例背景

某小区上下楼邻居因噪声问题积怨六年，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去年，楼上阳台自动浇花设备漏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楼下住户要求楼上移除花盆，否则拒绝谈噪声；楼上住户怀疑楼下使用“震楼器”反击，要求对方先给“说法”。物业与社区多次调解无果，甚至联系楼上住户原单位出面做工作，引发其强烈反感，甚至使用极端言语（“要杀人”）。台风季临近，物业欲强制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花盆，邀请心理咨询师介入干预。

二、社区调解中的常见误区

本案例典型地揭示了社区基层治理在面对长期、高情绪浓度的邻里纠纷时容易陷入的若干误区。

（一）过度卷入与被“拿捏”

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在长期调解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被某一方的情感逻辑所牵引。在本案例中，楼下住户诉求明确（移除花盆）、表达方式相对“合理”，而楼上住户情绪激烈、言语极端、拒绝配合。工作人员在多次沟通受挫后，逐渐将楼上住户视为“问题源头”或“不讲理的一方”，甚至采取联系其原单位领导出面调解等手段。这种“站队式”介入，本质上是被一方的情绪或行为所“拿捏”，失去了中立调解者的位置。

（二）急于解决问题，而非处理关系

社区调解之所以难，是因为工作人员往往无法轻装上阵，而是肩负种种压力——绩效考核、居民投诉，安全顾虑等，因此，会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尽快解决问题。然而，很多社区调解面临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就像本案例中噪声、漏水、震楼器猜疑层层叠加，难关重重。长期积压的不信任、不安全感，以及对彼此的怨恨，才是问题的核心。看不透问题，就着急解决，只能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三）忽略情绪与心理因素

楼上住户在情绪激动时，叫嚣“要杀人”等极端言语，表面看起来极具攻击性，也很容易让工作人员把其当作“危险分子”对待。实际上，这种攻击性往往是无力状态下的防御，委屈、不安才是其情绪内核。工作人员如果误解其言语信号，采取回避、施压或强制手段，反而是进一步验其“所有人都针对我”的投射，让坦诚沟通更加遥不可及。

（四）忽视信任关系的桥梁作用

心理学工作方法中，非常重视信任关系的建立，甚至提出，没有信任关系，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在社区调解中，更是如此，没有信任关系作为前提，任何要求、建议，都会被对方视为威胁。即使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出发，这是在完成工作，或者是“为对方好”，都无济于事。

三、心理介入的必要性分析

（一）情绪需被涵容而非压制

稍加分析就能发现，楼上住户的情绪强度已经超出正常沟通的范畴，甚至有明显的不理性“被害妄想”特征。这时候，正常的说教、施压、劝告，都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因此，心理介入的首要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想办法稳住对方的情绪，不激化矛盾。

（二）攻击性言语往往是求助信号

同样是“我要杀人”这类极端表达，什么时候是真正有危险，什么时候是一种无力的“求助”，是社区工作人员需要特别留意区分的。从心理动力学角度看，极端的攻击性语言，其实是一种求助的变形，是无奈的自我保护。如在本案例中，楼上住户作为退休大学教师，原本身份体面，为人师表、受人尊敬，却因为邻里矛盾被原单位领导约谈，而自己长期被噪声困扰却申诉无门，满心委屈。当文明的方式（投诉、协商、沟通）均已失败时，退行到极端言语就可能是最后的手段。

（三）强制手段会关闭所有的门

从社区调解的角度，强制手段应该作为最后的、万不得已的选择。强制拆除等手段，表面看起来解除了隐患，实际上会关闭所有沟通的路径，彻底激化矛盾，刺激对方作出投诉、上访，甚至伤人等极端行为。将工作人员拉入“解决一个问题，引发一堆问题”的泥沼中。心理介入的核心价值之一，正是守住“不关闭沟通之门”的底线，哪怕进度慢一点，花的时间长一点。

四、心理介入的具体建议

（一）对心理介入工作者的建议

涵容攻击性言语，不触发防御。当对方扬言说“我要杀人”时，心理介入工作者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尽可能保持镇定，不惊慌、不说教、不否定。忽略对方言语中的极端性，回应攻击背后的委屈。可以回应：“你气成这样，一定是发生了很多让你觉得委屈的事。你愿意跟我说说吗？”将攻击性宣泄转化为叙事表达。

循序渐进地重构问题框架。当服务对象情绪逐步稳定、信任关系初步建立后，工作者可以尝试重新解读问题，逐步降低对方的防御。例如，将“花盆”作为一个特定的意象，解读为“那是一个你要坚守的堡垒”，而不是别人口中的“一个安全隐患”。同时，把决定权还给她，“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把花盆拿下来，一定是你自己愿意，你感受到被尊重，而不是任何人逼你，对吗？”如此，才能逐步松动她的对抗立场。

为双方创造间接沟通的渠道。在双方无法面对面时，工作者可以充当沟通桥梁的作用。注意，这非常考验工作者的翻译技巧，要尽量将攻击性语言翻译为需求语言。比如，把楼上的“我绝对不会拆花盆”翻译为“她觉得大家都站在楼下那边，她其实是在赌气，也是在保护自己”；把楼下的“必须拆”翻译为“他被之前水滴到墙壁发霉的情况搞怕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特别在意”。

（二）长期策略

不要期待一次性调解成功。本案例适合以“多次接触、缓慢推进”的方式处理。心理介入的周期可以是数周甚至数月。

关注楼上住户的社会支持系统。退休大学老师往往存在社会角色丧失、孤独感增强的问题。可以尝试引导其参与社区活动、老年小组等，降低其对纠纷的注意投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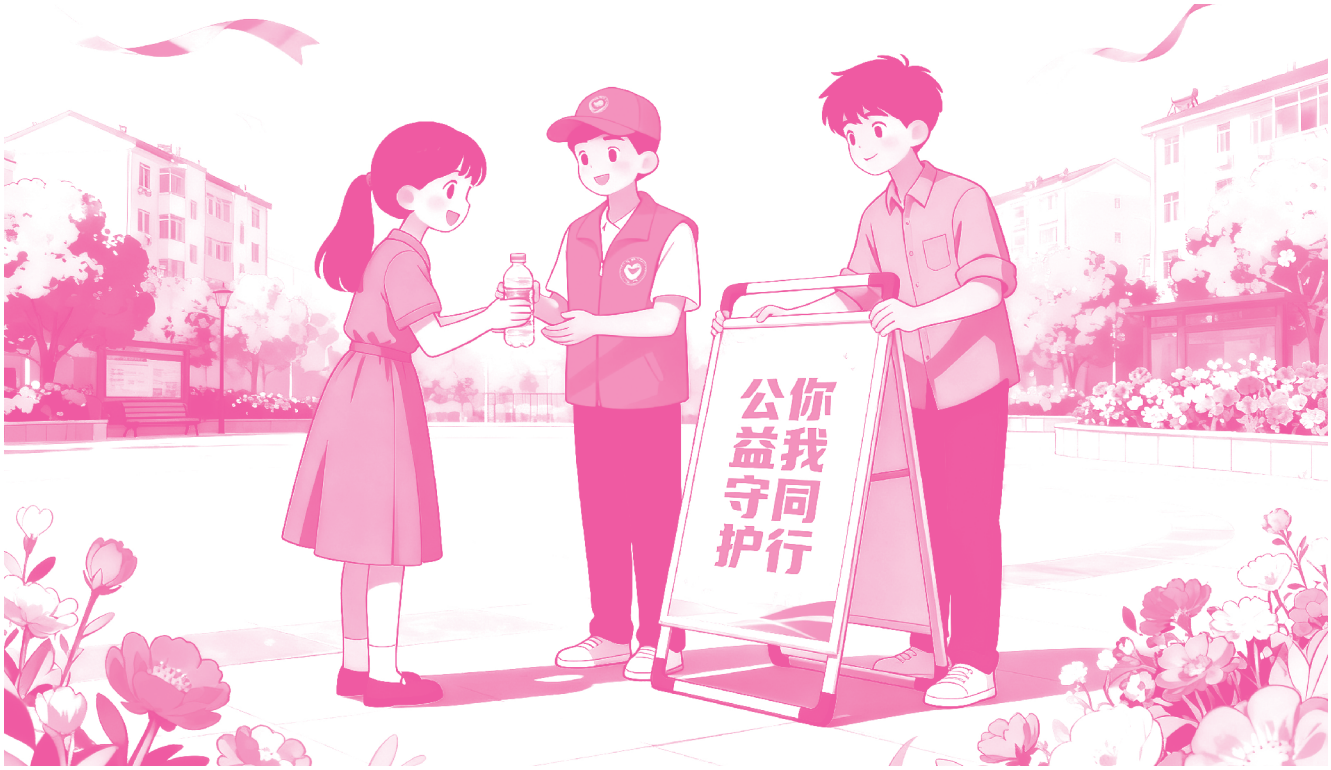
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心理支持培训。教会他们识别“攻击背后的委屈”“防御背后的恐惧”，以及最基本的不激化沟通技巧（如不评判、不站队、先听后说）。

五、结论

本案例深刻反映了当前社区调解实践中一个普遍而隐蔽的问题：工作人员急于解决问题，却忘了先处理情绪；急于看到结果，却忽视了关系本身才是结果的前提。在长期、高情绪浓度的邻里纠纷中，心理介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破局的前提”。

建议社区治理体系在类似案件中引入专业心理支持，并调整考核导向——从“短期内是否解决纠纷”转向“是否维持了沟通渠道、是否降低了极端冲突风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维稳”到“安心”的转变。

（作者单位：广州市南沙区粤港澳大湾区本会团体心理咨询研究院）



街道社工实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的策略研究

马春红

摘要：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肩负着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责任。随着社会不断转型以及民众生活需求变得日益多样，以往粗放式的救助模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契合弱势群体复杂多样的需求。在此形势下，推行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服务逐渐成为提升救助精准程度与实际效果的关键举措。本文结合现实状况，对街道社工在开展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时的策略和路径展开深入剖析，以期能为完善基层社会救助体系与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街道社工；精准识别

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正处在从基础生存保障向多元综合支持转变的深度进程中。面对服务对象需求层次持续提升、内部结构日益复杂的现状，救助工作迫切需要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援助方式，转而采用更为精细、动态且具有发展导向的服务模式。分层分类的救助方法按照个体与家庭的实际差异，依靠对救助对象进行科学划分并给予针对性支持，既能契合多样化民生需求，又能提升公共服务整体效能。在这一进程中，街道社工作作为政策落地以及服务递送的关键节点，其执行能力与策略选择直接影响社会救助的实施效果，探索街道社工在分层分类服务中的实施路径，对推动社会救助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的概述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是一种现代救助模式，其建立是基于需求评估以及精准识别。其核心在于依据救助对象的困难程度、需求类型以及发展阶段等多个维度，科学区分并实现动态响应。其中，“分层”主要按照需求的紧急程度与严重性来确立优先次序，将服务对象划分成危机干预、重点支持以及一般关注等不同层级；“分类”则关注需求的多样性特点，针对经济贫困、就业险阻、心理障碍、社会适应不良等不同类型问题，提供有差异的服务方案。该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涉及需求评估、等级划定、服务匹配、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在操作层面，应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状况、健康水平以及就业能力、社会支持网络等核心维度的评估体系，运用专业化评估工具进行定期测评，同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依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服务方案，以保证救助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1]。

二、街道社工实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升救助资源分配效率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借助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与动态管理机制，使街道社工能精确分辨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以及险阻等级，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传统救助模式普遍存在“一刀切”问题，易引发救助资源错配或者浪费情况，而分层分类方法依照需求的紧迫性、持续性以及复杂性实施差异化干预，使得有限的公共资源可优先为最急需的对象提供服务，同时防止出现重复救助以及低效投入的现象。街道社工在基层实践中凭借持续跟踪与反馈，可不断对服务方案作出调整，提高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益，达成从粗放式分配向精细化配置的转变，切实提高社会救助的整体效率。

（二）推动社会救助发展赋能转型

街道社工分层分类服务模式既关注救助对象当下所面临的即时险阻，也着重于其长期发展能力的提升。街道社工在服务期间融入赋能理念，借助分类给予技能培训、就业辅导以及社会融入支持等发展型服务，协助受助者渐渐摆脱依赖，达成自立。此过程促使社会救助从单一的物质援助转变为“物质 + 能力”的综合支持，从被动救济转变为主动预防，突破传统救助的限制，帮助受助对象达成根本性脱贫以及可持续发展，彰显社会救助制度在理念与实践方面的深刻转型。

（三）促进社会救助服务的系统化与专业化发展

街道社工依托分层分类框架，可搭建起系统连贯的服务流程，该流程涵盖需求评估、方案制定、资源对接以及效果评估等环节，提高服务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同时，分类服务使社工拥有多领域专业知识，如心理支持、就业指导、法律咨询等，推动社工向复合型、专业化人才方向发展。在此进程中，服务提供不

再是零散片段的应急举措，而是形成多层级、多类型、全程化的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质量以及制度成熟度。

（四）加强社会公平与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分层分类方法可识别不同弱势群体的多元需求，对因地域、年龄、健康、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差异性困境作出有效回应，弥补传统救助制度中的覆盖盲区。街道社工开展精准干预，保证每一类群体以及每一个个体都可得到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支持，降低因资源分配不公或者服务缺位引发的社会排斥，提升救助制度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从更深层次来讲，该方法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促使社会救助制度依据公平正义原则不断完善[2]。

三、街道社工实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的策略

（一）多维评估与动态分层，建立需求导向的精准识别机制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构建需求导向的精准识别机制成为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效能的基础工程。街道社工要打造一个系统且科学的评估体系，此体系应包含经济状况、健康水平、教育程度、就业能力、社会支持网络、特殊需求六个核心维度。每个维度都要设计具体的评估指标以及量化标准，如经济状况维度考查家庭人均收入、财产状况、债务情况等具体指标，健康水平维度要评估慢性病情况、残疾等级、医疗支出负担等指标。评估体系应采用量化评分和质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分配，形成科学合理的需求评估模型[3]。

在实际操作方面，街道社工需组建专业评估团队，配备经过系统培训的评估专员。评估过程覆盖多个环节，首先是基础信息收集阶段，借助入户走访、社区访谈等形式获取一手资料；其次是部门协查阶段，与民政、人社、卫健、教育、住建等部门构建数据交换机制，获取救助对象社保缴纳、医疗记录、教育状况等官方数据；最后是综合研判阶段，由评估团队依据收集到的信息展开综合分析，确定救助对象的需求等级。需重点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建设统一的民生大数据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形成完整的救助对象信息图谱。此外，为了保证评估质量可靠且稳定，还需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机制，可实行交叉复核制度，让不同评估人员对同一案例独立评估。与此同时，还应建立抽样检查机制，定期对已评估案例抽查复核；设立评估质量考评制度，将评估准确性纳入绩效考核。最后，还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对救助对象复评，依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分层等级，形成的分层结果应建立数字化档案，并开发专门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实时更新与共享，为精准救助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二）资源联动与分类响应，构建差异化救助服务供给网络

构建高效协同的救助服务体系时要建立分类响应与资源联动的运作机制。街道社工依据精准识别阶段形成的分层结果，针对不同类别救助对象的特定需求，设计有差异的服务响应方案。对于紧急干预层对象，要建立“24 小时响应”机制，制定标准化应急处理流程，包含立即启动临时安置程序、提供紧急医疗救助、发放基本生活物资等措施，保证危机能及时化解。并且要建立多部门联动应急机制，和 110、120、应急管理等机构建立绿色通道，保证第一时间提供专业援助。

在这一时期，对于重点支持对象而言，有必要制定个性化的中长期帮扶计划，该计划包括具体的目标设定、服务内容、时间节点以及预期成果。例如，针对就业困难人群，需提供职业能力评估、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岗位推荐以及就业后的跟踪服务等一系列全面的支持；针对重大疾病患者，要给予医疗救助、康复服务、心理支持以及家庭照料等综合性服务。每个服务项目都要明确制定服务标准和质量要求，并建立服务效果评估机制。在资源整合方面，街道社工应发挥枢纽作用，构建“1+5+N”资源联动模式，也就是以街道社工站为核心，联动 5 个主要政府部门，分别是民政、人社、卫健、教育、住建，整合 N 个社会资源，如企业、社会组织、基金会、志愿者等。具体可通过创建社区资源图谱，绘制资源分布地图，详细标注各资源的服务范围、专业特长、服务容量等信息，同时建立资源调度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召开资源协调会，邀请各方代表共同商讨资源调配方案。

（三）能力提升与社会融入，设计阶梯式发展型救助路径

随着社会救助理念由救济型朝着发展型转变，设计阶梯式的发展路径变成了推动受助对象实现自立自强的关键途径。街道社工需要依据救助对象不一样的能力以及需求特点，设计一个涵盖三个层次、九个阶段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其中基础保障层作为第一层次，解决生存需求，该层次涵盖应急生活援助、基本医疗保障、临时安置三个阶段；能力建设层是第二层次，侧重于发展需求，囊括技能培训、就业支持、心理重建三个阶段；社会融入层是第三层次，重点巩固发展成果，此层次覆盖社区参与、志愿服务、自主发展三个阶段[4]。

在实施救助工作的过程中，应为每一位救助对象创建个人发展档案，运用电子化管理系统记录他们完整的发展历程，这份档案的内容包含基本信息、评估记录、服务记录、进步状况以及评估结果五个部分。同时，运用标准化评估工具，每一个季度对救助对象的发展情况展开综合评估，评估的内容涉及经济状况改善程度、就业能力提升水平以及心理状态改善情况等指标。依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服务方案，实现动态化管理。针对特殊群体要制定专门的发展路径：对于

青年失业人员着重提供职业规划、技能培训、就业见习以及创业扶持等服务，构建培训、实习、就业一体化的支持体系；对于老年人侧重于健康管理、社会参与以及居家养老等服务，打造“健康—参与—保障”三位一体的支持模式；对于残疾人注重康复服务、技能培训、就业支持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服务，构建全链条的支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当建立完备的激励机制，将救助对象的参与度和进步程度与后续支持力度联系起来，设计量化评分系统。对于积极参与培训、主动寻求就业的对象给予更多支持；对于实现就业或者自主创业的对象提供后续跟踪服务，并且引入成果奖励制度，设立进步奖、就业奖、创业奖等奖项，对取得进步的对象给予适当奖励。

（四）数据驱动与智慧管理，搭建全流程动态监测平台

街道社工可借助常用的数字工具和简易系统，开展分层分类救助服务，实施数据支撑的动态智慧管理。具体可通过整合现有办公软件、数据系统和通用平台，实现以下七大功能的简便操作：需求评估用自动打分和分级提示完成；服务匹配根据对象情况快速筛选可行方案；资源调度通过共享表格和线上协调实现优化分配；服务过程借助日志和云文档做好全程记录；效果评估由多角度指标进行衡量与总结；决策支持依托基础数据分析提供建议；预警预报借助设置关键数值进行自动提醒。

在操作方面建议选用通用软件以及轻量级应用，确保易于扩展和维护。数据收集需要统一格式以及标准，如制定简易的《救助数据录入规范》以及《共享接口说明》，且要与人社、民政、卫健、教育等常见业务系统达成简单对接。借助常用办公软件的统计以及趋势分析功能，将多来源数据进行整合，构建需求预估以及效果评估的简易模型，辅助社工进行科学判断。重点强化预警功能，设定如连续三个月收入低于标准、医疗自付费用过高、失业超过半年等明确阈值，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系统可凭借短信、微信群或者办公 App 自动推送提醒信息，并且注明紧急程度以及处理建议，保证社工可在第一时间介入。同时推荐使用成熟的移动办公应用，配备专属社工 App，支持拍照、录音、定位等现场录入方式，大幅提升外出办公效率以及信息真实性。另外，还应定期借助通用数据分析工具，从服务投入、产出以及效果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总结优秀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持续优化救助服务的质量以及精准度。

（五）社区动员与协同共治，激活救助服务的内生动力

街道社工要系统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首先从培育社区互助文化入手，搭建常态化动员机制，借助定期举办社区邻里节以及公益集市等活动形式，营造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完善志愿者管理体系，构建志愿者注册、培训、服务记录以及激励制度，发挥志愿者在地化的优势，开展日常探访、需求发现等基础性服务，形成社区内部的第一道救助防线[5]。

基于此情形，街道社工有必要着重构建社区组织协同机制。具体而言，联合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个主体，搭建定期会商与协作的平台，一同对社区救助需求展开研判，协商拟定服务方案。在实践过程中，特别要重视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承接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专项服务，形成优势互补的服务合力。同时，建立资源贡献激励机制，对积极投身救助服务的社区单位给予表彰并给予政策支持，提高社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创新社区资源整合模式是提升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街道社工可推动建立社区慈善基金，规范资金募集与使用流程，建设“时间银行”互助平台，实现服务时间的存储和兑换；设立社区物资循环站，促使闲置资源实现有效流转。此机制不仅可以盘活社区内部资源，还可以培育居民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最终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为分层分类救助服务提供持久动力。

四、结语

综合来看，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服务模式的构建与推行，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产生深刻转变。此模式借助构建需求导向的识别机制、资源协同的供给网络、阶梯式的发展途径、智慧化的管理平台以及社区化的动员机制，构建起了系统性的服务策略体系。街道社工身为政策落地的关键实施者，其专业能力与服务策略对救助服务的实施效果有着直接影响。未来需完善制度设计，优化部门协同机制，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同时不断推进数字化赋能与社区能力建设，推动社会救助服务从基础生存保障向全面发展支持转型升级，为达成共同富裕目标奠定更为坚实的社会保障基础。

参考文献

[1] 牛鹏皓，曹艳春．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实施成效与策略优化研究——以上海市“桥计划”项目为例 [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32(01): 18−25.

[2] 木薇，汪雅琴．农村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党建赋能机制与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40(05): 49−60.

[3] 陈桂玲．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策略研究 [J]. 国际公关，2024(06): 89−91.

[4] 帅歌铅，熊春华，熊丹丹．深化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民政，2025(10): 30−31.

[5] 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精度的服务类社会救助 [J]. 中国民政，2025(09): 22−23.

（作者单位：三河市行宫东街道办事处）

“社工 + 志愿”模式下的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路径构建

朱艳萍

摘要：在数字技术赋能公益事业的背景下，青少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已成为网络公益参与的核心力量。“社工 + 志愿”模式凭借社工的专业性与志愿者的广泛性，为引导青少年规范、深度参与网络公益提供了有效支撑。本文结合实践案例，分析当前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的现状与困境，从需求对接、队伍培育、平台搭建、资源整合四个维度，构建“社工 + 志愿”模式下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的实践路径，并提出政策、制度、文化层面的保障机制，旨在激活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活力，推动青少年网络公益事业规范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工 + 志愿；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路径；协同治理

一、引言

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互联网公益已从线上筹款拓展为包含服务供给、文化传播等多元形态的新生态，形成了平民化公益格局[1]。作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深受网络环境影响，其凭借数字素养在公益捐赠、内容创作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我国14~35岁注册志愿者已超9000万人。然而，其参与也面临形式碎片化、专业引导缺失、认知偏差及潜在网络沉迷等挑战。“社工 + 志愿”模式通过社工的专业统筹与志愿者的广泛参与，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可行方案，实践中如“伙伴计划”、深圳坪山区“青苗计划”已证实该模式能有效引导青少年从“被动参与者”转向“主动共建者”。本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青少年社会参与理论体系，为协同治理理论提供新实证，且构建的路径与机制可为相关机构提供实操参考，助力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公益观，同时推动网络公益生态的优化升级。

二、理论基础与实践现状

（一）理论支撑

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工 + 志愿”模式提供了一个核心逻辑，认为社工机构、志愿组织、学校、社区和企业等多方主体通过资源共享、行动协同来共同创建青少年网络公益的生态系统。其中社工提供专业指导，志愿者提供人力支持，学校和社区搭建场景，企业提供资源保障。“@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行动计划”联合多方力量，就是政府指导、社会组织搭台、企业参与的协同模式。

社会学习理论为引导青少年参与提供依据。青少年在观察社工、志愿者的公益行为并受到激励之后，会形成公益认知和习惯。在该模式中，专业的示范以及个性化的引导可以激发他们参与公益的动机，促使网络行为从娱乐性转为公益性。

（二）实践成效

1. 多元服务场景初步形成

各地依托“社工 + 志愿”模式，创建出诸多青少年网络公益场景。滁州市琅琊区创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e站，组织社工、青少年、家长三支志愿服务队开展网络素养和公益实践，形成了家校社联动场景。同时“伙伴计划”对于新就业群体子女也采用了定制化的线上学习方案、云端辅导等方式来填补课后陪伴的空白，拓展了线上支持服务的场景。

2. 参与主体活力持续激发

社工的专业赋能和志愿者的示范带动，有效提高了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的积极性、主体性。如上海市杨浦区实施的“小小UP主”活动，让青少年在B站等平台上制作公益短视频，把他们从内容消费者变成创造者和传播者。深圳市坪山区老坑社区的“青苗计划”用系统培训、积分认证、搭建“小小管家”平台的方式，使社区青少年由服务对象转变为参与社区微治理的志愿者骨干。

3. 协同机制逐步完善

多地探索形成了以党建引领、社工统筹、志愿执行为特点的协同机制。青岛市崂山区委社会工作部整合高校、企业、文化单位等50多家共建单位，以“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模式开展暑期成长营等系列服务，形成了区域化资源整合和项目化运作的成熟机制，体现出协同治理理论在实践中所发生的深化，依靠明晰

的权责划分以及资源整合，从而大幅提高服务的专业程度以及服务的范围。

（三）现存困境

1. 参与深度不足

目前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大多为线上捐赠、转发宣传等浅层行为，深度参与项目设计、方案执行、效果评估的很少。部分活动缺少社工的专业设计，仅以打卡、集赞的形式吸引参与，难以培养青少年的公益思维和实操能力，同时针对青少年特点的网络公益项目供给不足，不能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青少年的需求，导致参与持续性不强。

2. 队伍协同不足

社工与志愿者的协同机制还存在着“物理结合”多于“化学反应”的问题。部分志愿者缺少网络公益的专业技能，对于线上活动的组织、青少年心理的引导等能力欠缺，社工的培训大多为线下，线上赋能体系不健全；青少年志愿者队伍培育滞后，缺少常态化的招募、培训、激励机制，无法形成稳定的青少年网络公益骨干力量。

3. 平台功能有限

目前网络公益平台主要以发布信息、活动报名等功能为主，没有针对青少年的专门服务模块以及风险控制手段。部分平台公益信息真假难辨、资金使用不透明等容易误导青少年；青少年网络保护机制不健全，部分青少年由于缺乏信息甄别能力，会陷入虚假公益陷阱，或者在网络公益参与中泄露个人信息。

4. 资源整合不足

社工机构、学校、企业、社区等主体之间缺少有效的资源联动，存在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的情况。部分学校对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的引导不到位，缺少与社工机构的常态合作，企业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不够，大多数企业只做线上捐赠，对于公益项目的策划、数字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参与度不高，社区作为基层阵地，线上公益服务阵地的建设滞后，难以形成持续的服务供给能力。

三、“社工 + 志愿”模式下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路径构建

（一）精准对接需求

1. 多元需求精准摸排

社工需牵头构建“线上 + 线下”融合的需求调研机制，通过多样化渠道建立青少年需求数据库，分类梳理学业、心理、文化等多类需求，并针对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对接，形成动态需求清单[2]。例如，昆明市在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开展的“青少年健康用网公益行动进社区”，即以“反诈套圈圈”等趣味互动，精准回应了青少年对网络安全教育的现实需求。

2. 分层分类项目设计

结合青少年年龄、兴趣、能力特点，设计阶梯式网络公益项目。针对低龄青少年，开展线上公益绘画、故事分享、环保知识打卡等趣味活动，培养公益意识；针对高龄青少年，搭建公益项目设计、线上筹款策划、公益内容创作等实践平台。上海市杨浦区“小小 UP 主”活动即为高龄青少年提供了基于短视频创作的、兼具趣味性与社会价值的深度实践项目。

3. 服务过程动态引导

社工与志愿者组成线上陪伴小组，全程对青少年的网络公益参与过程进行引导[3]。利用线上打卡监督、阶段性分享交流、个性化问题解答等方式帮助青少年克服参与困难，对于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青少年采用同伴激励 + 积分奖励的方式，由志愿者一对一结对陪伴，逐步培养其参与习惯，对表现优秀的青少年可以参照深圳老坑社区青苗计划的经验，邀请其担任项目小组长或者小管家，赋予其更多的组织责任，实现能力跃升。

（二）强化队伍建设

1. 社工专业能力提升

聚焦网络公益领域，提升社工的专业素养。开展社工网络公益项目设计、线上活动组织、青少年数字心理疏导、网络风险防控等专题培训，搭建线上交流平台，分享各地“社工 + 志愿”引导青少年网络公益的实践经验；鼓励社工考取数字公益相关资质，联动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理论研究，形成适配青少年特点的网络公益服务方法与标准。

2. 志愿者队伍分层培育

构建“骨干志愿者 + 青少年志愿者 + 家长志愿者”的多元志愿队伍。社工牵头培育网络公益骨干志愿者，重点提升其线上活动策划、青少年引导、公益资源链接能力。滁州市琅琊区“小蚂蚁”品牌同时培育社工队伍、青少年志愿队和家长志愿队的做法，为构建稳定多元的志愿服务梯队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通过“传帮带”机制，让骨干志愿者带动青少年志愿者参与项目执行，开展线上公益技能培训。

3. 协同机制优化升级

确定社工和志愿者的职责分工，形成以社工为统筹、志愿者为主体、青少年参与的协同工作模式[4]。社工做需求调研、项目设计、风险评估、效果复盘，志愿者做线上活动组织、青少年陪伴、信息传递等工作，青岛市崂山区的实践表明，由区级社会工作部门进行顶层设计与资源统筹，社工机构进行专业策划，志愿者团队落地执行，能极大提升协同效能。同时，建立常态化线上沟通机制，定期开展案例研讨，及时解决参与过程中的问题。

（三）搭建数字平台

1. 功能模块优化升级

依托现有公益平台或社交媒体，开发青少年网络公益专属通道或话题社区。打造“需求发布—项目报名—技能培训—成果展示—积分兑换”一站式服务功能，开发青少年公益项目库。上海市杨浦区巧妙利用

B 站这一青少年聚集的视频平台开展公益活动，实现了平台与用户特征的高效匹配。此外，应增设“公益知识科普”“信息甄别指南”等板块，提升青少年网络公益素养。

2. 风险防控体系构建

社工牵头建立网络公益风险防控机制，联合平台运营方、志愿者开展公益信息审核，对虚假公益、违规筹款等信息进行筛查，保障青少年参与安全。“@ 芽”公益计划通过向乡村学校捐赠网络安全手册、开展网络素养支教，从源头提升了青少年的风险辨别能力。同时，应开设线上公益维权通道，并通过案例讲解、情景模拟等形式，教会青少年保护个人隐私。

3. 数据化管理赋能

运用大数据技术对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数据进行分析，精准掌握参与频次、项目偏好、能力短板等信息，为需求对接、项目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建立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电子档案，记录参与历程与成长收获。深圳老坑社区“青苗计划”中的服务积分与星级认证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数据化管理和激励工具。

（四）整合多方资源

1. 强化党建引领与政策支撑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青少年网络公益纳入基层治理体系。青岛市崂山区以区委社会工作部为牵头单位，系统整合社会资源服务青少年，是党建引领下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应加大对社工机构开展青少年网络公益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把规范的网络公益参与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

2. 深化校社企协同联动

推进学校同社工机构开展常态化合作，把网络公益融入德育课程和社会实践。联动企业资源，调动互联网企业技术力量。“@ 芽”计划调动了多家互联网企业参与进来，捐赠数字设备、建体育场地，把企业技术、资金优势同公益需求结合起来。社区要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工服务站，创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公益服务阵地。

3. 培育公益文化氛围

社工和志愿者作为青少年网络公益文化宣传的组织者，用短视频创作、公益直播、线上主题展览等形式传播青少年的公益事迹[5]。昆明市社区公益行动用游戏化、体验式的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培养了青少年健康用网的公益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益元素，定期进行优秀案例评选，增强青少年的公益荣誉感。

四、保障机制

（一）政策保障

完善青少年网络公益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社工 + 志愿”模式的运作规范、各方权责，出台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激励政策，把公益参与时长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评优评先指标；加大对社工机构、志愿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给予场地、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支持，促进其开展青少年网络公益服务和研究。

（二）制度保障

建立青少年网络公益参与的常态化管理制度，即需求调研制度、项目审批制度、风险防控制度、效果评估制度等全流程制度；健全社工、志愿者培训认证制度。深圳老坑社区“青苗计划”的积分管理和星级认证，给社区层面激励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实行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制度，完善积分兑换机制，把积分同学业评价、社会荣誉等联系起来。

（三）文化保障

创建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共同参与的公益文化培育体系。学校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活动来培育青少年的公益意识；家长发挥榜样作用，滁州琅琊区积极吸纳家长成为志愿者，有利于在家庭层面营造公益氛围。社工机构、志愿组织用丰富的公益实践，使青少年在参与中加深对公益的认识，形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公益文化。

五、结论

“社工 + 志愿”模式为引导青少年从网络公益的浅层、被动参与转向深度、主动创造提供了关键路径。该模式通过构建精准的需求对接、专业的队伍协同、智能的平台支撑及多元的资源整合四大体系，有效摆脱了当前参与的困境。上海杨浦的创意实践与深圳坪山的社区培育等案例，从不同维度印证了此路径的可行性。未来，需依托政策、制度与文化三重保障，深化模式应用，并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持续优化运作效能，最终推动青少年网络公益事业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助力青少年在公益实践中成长为社会建设的传承者与引领者。

参考文献

[1] 韩露 . 青少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模式与效果探究 [J]. 中华志愿者 , 2025(11): 16−19.

[2] 陈爽 , 邹禧乾 . 青年网络志愿服务的媒介逻辑、实践特征及未来展望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 2024, 43(02): 8−20.

[3] 陈志林 , 杨华军 . 嵌入性视角下公益青年自组织参与留守儿童社工服务实践机制研究——以四叶草乡村留守儿童陪伴团为例 [J]. 社会福利 , 2024(12): 24−36.

[4] 马喜欢 . 社会工作提升青少年社区参与能力实务路径研究 [D]. 新乡 : 河南师范大学 , 2023.

[5] 翟颖 . 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服务能力提升的研究 [D]. 武汉 : 华中农业大学 , 2022.

（作者单位：广东省韶关市民政局）

新业态劳动者未成年子女关怀的校地协同模式研究
——基于“博爱青春”高校志愿项目的实践探索

李　妍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主播等新业态劳动者规模已突破8400万人，他们大多举家迁居城市，但因工作时空碎片化、社会支持不足，其未成年子女普遍面临“看护真空、教育真空、情感真空”的“三空”困境。本文以“博爱青春”高校志愿服务项目为实践载体，探索构建“政府—高校—企业—社区”四维联动的“护童模式”，系统回应“谁来陪、怎样陪、陪什么”三大核心问题。

项目采用“政—校—企—社”协同机制，整合2184份家庭问卷、327份儿童心理量表、14组“家长—社区—志愿者”深度访谈及96学时“五育”融合课程，形成“空间—课程—情感—跟踪”四位一体的综合干预体系。同时，项目创新“返乡辐射”机制，借助大学生志愿者将服务模式推广至更广区域，构建“标准化＋在地化”服务链，累计开展活动23场，服务本地新业态家庭子女600余人，初步形成“高校—家乡”双循环服务格局，验证了校地协同模式的可行性与扩散效应。

研究认为，高校志愿服务以其专业梯度、服务深度与情感温度，能够将“临时托管”升级为“长期陪伴”，将“单向帮扶”转化为“多方共赢”，将“项目终点”延伸为“制度起点”。本文进一步从制度嵌入、资金多元、数字伦理及学分互认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为全国新业态家庭子女关怀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持续的协同范式，助力“博爱”精神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关键词：新业态劳动者；未成年子女；校地协同；儿童友好；服务体系

一、研究背景

（一）时代背景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下，新业态劳动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这一庞大的群体已成为推动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固定框架，呈现出非固定工时、无固定劳动场所及无稳定雇佣关系的特点，这种灵活性为他们带来了就业机会，却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他们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模式相互交织，使得亲子陪伴时间被极度压缩[1]。与此同时，这一群体普遍学历水平不高，在家庭教育方面既缺乏科学的理念，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难以满足子女在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品德培养等多方面的需求。

在社区层面，虽然部分社区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尝试提供托管服务、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开设爱心寒暑托班，举行社区素质拓展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仍显不足，许多新业态劳动者对社区的福利政策知之甚少；社区专业教育人员配备欠缺，难以提供高质量、系统性的教育支持。究其根源，在于社区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与支持，对新业态劳动者子女的教育投入捉襟见肘，与家庭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服务阵地建设也有待完善。

在高校层面，综合性大学坐拥多学科梯队，拥有“志愿学分＋第二课堂＋科研平台”的万人级青年人才库，更拥有体育馆、图书馆、“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大量可共享的实践场地。新业态劳动者子女“看护—教育—情感”三维需求恰好集中在社区微场域，时间窗口又与高校寒暑假、课余高峰高度重叠。打通高校与地方治理的资源壁垒，把“学科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把“人才库存”升级为“治理流量”、把“场

地资产”激活为“关怀资本”，构建面向新业态家庭的长效陪伴机制，已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和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双向奔赴的新命题[2]。

（二）政策背景

放眼全球，儿童友好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86年发起“儿童友好城市倡议”，旨在促进城市生活品质提升，打造适宜儿童成长的环境。我国也积极响应，于2021年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试点建设100个儿童友好城市，从社区层面稳步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力求营造“儿童友好、人人友好”的城市氛围，为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新业态劳动者未成年子女作为城市新一代活力源泉，他们的成长关乎国家未来与社会发展。社区作为儿童生活成长的微观社会，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是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成长的关键力量。因此，从社区教育支持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探索如何整合各方资源、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为他们打造一个充满关爱与机遇的成长环境，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对新业态劳动者辛勤付出的慰藉，更是推动社会公平、促进代际流动、彰显城市温度的关键之举。

二、校地协同关怀路径探索

项目以高校红十字志愿服务团队为主体，联合地方政府团委、基层社区与美团、顺丰、滴滴等平台企业，共同构建“高校主导—社区协同—企业支持—政府保障”的四维协同机制，系统推进“空间共建、课程共育、情感共伴、资源共用、责任共担”的校地协同关怀路径，构建可操作、可复制、可扩散、可自我造血的协同范式。

（一）空间共建：打造“1+N”儿童友好阵地

项目结合高校多学科资源建设与受众导向布局原则的特点，以高校为主阵地，联动基层社区，构建“1个高校主阵地+N个社区微站点”的立体服务网络[3]。高校提供技术支撑、课程设计与人才保障，社区提供党群服务中心、未成年人保护站等基层场地空间资源，实现服务“触手可及”。

（二）课程共育：构建“5+3+1”融合成长体系

项目团队围绕青少年“德智体美劳”五育目标，充分调动高校、社区、企业三方资源，锚定新业态就业家庭未成年子女这一主体，开发“心菁育”系列课程，形成“理论+实践”“校内+社区”“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推动高校课程资源向社区延伸、向新业态家庭下沉。具体课程内容有德育模块的“感恩小课堂”、智育模块的“科普实验室”、体育模块的“亲子运动会”、美育模块的“非遗小匠人”、劳育模块的“小小烹饪家”等。所有课程均配备“高校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企业代表”三方协同的教学小组，确保课程内容的专业性、趣味性与落地性。

（三）情感共伴：建立“1+1+1+1”成长陪伴机制

项目构建“1名高校志愿者+1名社区工作者+1个家庭+1份档案”的“1+1+1+1”成长陪伴机制，实现“情感陪伴—心理疏导—家庭支持—跟踪记录”的全链条干预。高校志愿者负责日常陪伴、课业辅导、心理支持，建立“成长日志”，每周记录儿童情绪、行为、学习变化；社区工作者负责家庭联络、需求评估、资源对接，建立“家庭档案”，动态掌握家庭结构、经济情况、教育需求；企业代表则面向相关家庭组织“亲子开放日”“职业体验日”等活动，帮助儿童了解父母职业，增强亲子共情与情感联结。

此外，项目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开发“AI心呵护”小程序，嵌入情绪识别量表，家长可实时接收儿童情绪预警，高校心理专业志愿者同步介入，形成“线上预警+线下干预”的闭环支持。

（四）资源共用：搭建“政校企社”资源共享基地

项目整合四方资源，建立“资源共享清单”，实现“人、财、物、场、技”一体化配置。高校提供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教室、体育馆、图书馆、教学设备、文创材料、小程序开发与数据分析等技术资源；社区提供社区工作者、家长学校讲师、社区活动中心、家长学校、儿童读物、安全教具及家庭信息采集等支持；企业提供企业员工、骑手驿站、司机之家、企业纪念品及岗位体验平台；政府则提供团委、红十字会专职人员、市委新业态座谈室、宣传物料、政策手册、政策指导与评估工具。

通过建立“资源调度平台”，项目团队可实现资源的动态调配与高效使用，避免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

（五）返乡辐射：构建“高校—家乡”双循环复制机制

项目依托大学生志愿者的“返乡”优势，打造“高校—家乡”双循环机制，由项目团队整理形成“标准化服务包”，并以“电子资源包+线下培训”形式发放，支持返乡志愿者快速启动本地项目。最终实现“服务标准化、资源在地化、队伍常驻化”，将项目成功的经验复制推广至省内乃至全国更多地区。

三、项目成效

（一）服务对象层面：儿童成长“看得见”

项目运行两年来，直接服务新业态劳动者未成年子女2200人，间接受益5500人。暑期托管率从65%提升至92%，儿童情绪问题发生率下降38%，社交能力测评优良率提升45%，家长满意度达98.1%，形成“孩子愿意来、家长放心送、社区乐意推”的良性局面。

（二）高校育人层面：志愿服务“沉下去”

351名大学生志愿者累计服务8000余小时，6人获评市级优秀红十字志愿者，35人获评校级志愿服务标兵。项目3次获评市级高校优秀红十字项目，1次

获评省级高校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形成调研报告3份、课程包15套，实现“服务—研究—育人”三位一体循环。

（三）基层治理层面：社区资源“活起来”

基层社区依托项目经验，整合妇联、团委、民政、企业等资源，建立“社区负责人+高校志愿者+企业社工”三方协同队伍，实现“一个平台、多方参与、共建共享”。

（四）区域辐射层面：返乡复制“动起来”

2025年暑期，首批12个“返乡示范站”在多地同步启动，覆盖新业态家庭360户，开展课程86场，服务儿童1100人。各地形成“本地需求清单+高校资源清单+社区任务清单”三单对接机制，实现项目模式在地化运行。

四、政策建议

（一）制度嵌入：让“高校志愿+新业态家庭”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标配”

将“高校志愿+新业态家庭”融入地方基层治理，是破解“项目结束、服务断档”的重中之重。将志愿项目向更持久的服务体系转化，明确“高校”作为承接主体，与街道签订长周期、多维度、全过程的框架合作协议，让政策与需求相匹配，才能促成高校与家庭双线共育的良性循环。同时，政府也可以同步设立“新业态劳动者子女关爱专项经费”，并将其纳入同级财政绩效评价，确保“钱随事走、事随责走”。通过制度化嵌入，高校服务团队可从“项目访客”转变为“常驻伙伴”，真正实现“政府买单、高校出力、家庭受益”的可持续治理闭环。

（二）资金多元：打造“财政+企业+公益众筹”的混合融资“蓄水池”

单一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快速扩张的服务需求，亟须构建“财政+企业+公益众筹”三元协同的资金池。财政部门继续通过彩票公益金、就业创业补助等渠道安排引导资金；企业方面，激励其在司机之家、骑手驿站内共建“微托教室”[4]；公益众筹方面，依托线上公益平台发起专题募捐，对捐赠人实行电子票据、积分兑换、荣誉认证等激励，并形成“人人可公益、层层可追溯”的透明机制。通过多元融资，既减轻财政压力，又增强企业社会认同，同时为高校提供稳定的项目续命“血液”，实现“政府补一点、企业出一点、社会筹一点”的良性循环。

（三）数字伦理：为儿童情绪数据加装“最小够用”安全锁

AI情绪识别是提升预警精度的利器，但儿童数据敏感度高，必须建立“最小够用、社区脱敏、家长知情”三道防火墙。采集前，明确告知监护人数据范围、保存期限与退出机制；采集时，仅保留与情绪预警直接相关的微表情、语音参数，删除可识别个人身份的面部高清图像；存储环节，采用社区边缘服务器加密，预警结果以匿名化代码回传给高校与街道，严禁与商业数据库共享；使用环节，情绪异常报告仅推送给家长、班主任与指定社工。通过“最小够用”原则，既发挥数字技术预警优势，又防止“数据歧视”与“二次标签化”，让儿童在安全的数字环境中健康成长。

（四）学分互认：把志愿服务锻造为“第二课堂”刚需模块

强化高校志愿服务在大学生综合育人机制中的占比，是激励大学生“长流水、不断线”参与的核心杠杆。在高校层面，建议推广建立第二课堂学分与第一课堂学分转化机制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与第二课堂学分关联机制，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积极性。同时，不断强化社会认同，提升第二课堂育人成效，真正实现“服务有学分、成长有记录、升学有优势”[5]。通过学分互认，让志愿服务从“公益良心”升级为“学业刚需”，为项目持续输送稳定、专业、高水平的人才力量。

五、结语

本项目用高校志愿服务的专业温度，托举起新业态劳动者未成年子女的成长高度；用校地协同的制度创新，延展了高校育人与社会治理的双向奔赴，充分验证了校地协同在新业态子女关怀领域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其“标准化+在地化”“线上+线下”“服务+倡导”的三重路径，为破解灵活就业家庭支持缺位难题提供了可复制、可扩散、可持续的高效方案。未来研究将继续以高校青年为主力，以制度嵌入为保障，把“临时项目”做成“长效机制”，把“青春志愿”写进“城市治理”，研究可进一步追踪儿童长期发展指标，并比较不同城市制度环境下的模式差异，以丰富基层治理与青年志愿服务的交叉理论，让“博爱”二字在数字中国时代焕发新的青春光芒。

参考文献

[1] 王正青，谢嘉珣．数据技术赋能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逻辑理路、应用场域与实现路径[J]. 教育科学，2025, 41(01): 75−82.

[2] 疏淑进，瞿华兵．高校志愿服务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5, 25(03): 59−63.

[3] 梁佳卉．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微治理”的实践困境与机制创新[J]. 公关世界，2025(14): 106−108.

[4] 周国桥．“三全育人”视阈下高校第二课堂育人的创新探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0): 52−54.

[5] 郭隆．聚焦“七有”“五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J]. 北京观察，2025(02): 35−37.

（作者系南通大学助教）

教育强国背景下研究生资助育人功能提升路径探究

安　泰

摘要：随着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步伐不断加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生资助育人的内涵外延应实现由“单纯物质支持”到“全方位育人”的转变。但目前研究生资助育人中仍然存在资助力度不精准、资助育人意识不强以及资助资源渠道单一等问题，并且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指导实际工作开展。其内在矛盾是技术融合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矛盾、多方参与的合作治理矛盾、原有评价模式的习惯性矛盾以及投入产出之间的公平与效率矛盾。本文提出了优化识别配置体系，推进精准化资助；丰富资源供给渠道，推动多元化资助；促进资助与其他育人环节结合，形成常态化资助等内容。用系统的观念推进资助体系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赋能型”转型，形成“精准认定、多元支持、协同育人、智能评价”的新格局，发挥研究生资助体系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整体功能，从而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教育强国；研究生教育；资助育人；提升路径

面对世界范围内教育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我国正在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大的气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步伐。研究生教育作为支撑国家创新的重要力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发布以及各项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正由理念逐步走向现实层面的实践，并付诸国家行动中[1]。与此同时，“三位一体”的研究生资助工作体系的运行也使得研究生资助工作的职能从单纯的物质帮扶转变为集“奖励、指导、培养”功能于一身的立体化育人体系，其根本目标是减轻学生负担，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类资助平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综合培养。如何合理规划、充分发挥研究生资助体系在建设教育强国中的整体育人作用，使之契合新时代国家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提高育人效率，兼顾育人效益最大化以及研究生全面发展，成为关系我国人才培养根本大计、迫切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的新时代课题。

一、教育强国背景下研究生资助育人的现状

目前我国形成了由政府财政为主、高校配套为辅的研究生奖助体系，涵盖了学费减免、奖学金、助学金、“三助一辅”岗位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生教育起到基本保障作用[2]。但是站在育人实效性和系统持续性的角度观察，仍然存在着一些机制上的不协调之处。

（一）精准性缺失与育人过程“悬浮化”

在现阶段研究生教育环境下，资助体系的保障性和精准性成为发挥育人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研究生资助体系也由最初的普惠型设计逐步过渡至兼顾精准性的阶段。目前资助对象识别主要依靠静态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及学业成绩排序结果，并不能及时体现学生真实家庭经济水平、发展需求和发展能力。传统“大水漫灌”的资助方式虽基本保障最低限度的资助水平[3]，但忽视了研究生的差异性发展需求，使得资助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受到影响。

在当前高校研究生资助工作中还存在着资助育人结合不紧密的现象，一方面，研究生对于资助工作了解不够全面，在享受资助的过程中存在距离感；另一方面，站在资助资金供给方的角度来看待受助对象，资助工作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其本质特征，导致很多学生在接受资助之后，并没有体会到育人的作用以及对自身成长的价值。

（二）资源结构单一与协同机制“碎片化”

多元资助来源不足成为当前研究生资助体系建设中制约资助育人成效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研究生资助以国家政府出资为主，并辅之以各高校自身设立的奖助学金，缺少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导致研究生资助渠道较为单一。由于单一的资助方式

导致资助缺乏弹性，既不利于研究生的资助多元化，也不利于相关机构资源分配以及创新性的活动。

若能合理地引导和鼓励企业或者社会组织参与到研究生资助中，则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生资助来源，提高资助质量和效率[4]。企业的参与也可以给研究生带来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在经济上和专业发展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学校资助管理职能分散在学生处、财务处、研究生院等多个部门，顶层设计不统一，没有建立有效的工作联动和信息互通机制，致使工作推进中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育人合力不足。

（三）评价机制滞后与发展反馈“静态化”

当前，资助工作实施缺少评价反馈体系，育人实效缺乏科学依据难以量化。由于高校间资助政策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助育人的功效不足。有些学校对资助方式及力度都明显欠缺，不同层次学生获得资助机会存在不公平现象。这样的不平衡不仅给学生带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还会对他们的学习及心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当前资助育人成效评价偏重资助经费数量和受助学生人数等“投入型”指标，对资助促进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责任意识、身心健康以及长远事业发展等“产出型”育人功能质量成效缺乏科学系统跟踪评价。评价结果反馈运用不足，导致资助政策很难随着育人实效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迭代更新。

二、以系统思维重构资助育人功能的实施路径

（一）建设多元协同的资源供给与整合网络

在强化研究生资助育人功能中，首先应当立足于多元化资助体系建设，通过整合多方资源而形成完善的多元资助体系。一方面，高校应主动联合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开展合作，拓展多元化资助资金来源渠道，协作开发更加有利于研究生获取奖学金及助学金的方法和路径，通过形成合力更好地为研究生提供必要的奖助学金资金支持，进一步增强资助的精准性和有效性[5]；另一方面，发挥社会力量，引导企业及个人参与研究生资助工作，在拓展研究生资助渠道的同时，也能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

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6]，对研究生教育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为提升研究生资助育人的功能，高校应当明确导师的责任和权利，确保其在学术指导和育人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在制度上明确导师的职责和权力，构建完善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从而鼓励导师积极参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推动研究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增强导师的指导能力和育人意识，使其更好地掌握教育政策及研究生资助的相关知识，加强导师间的经验分享与合作，推动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不仅能够提升导师的素质，也促使他们更加关注研究生的成长，进而更有效地支持资助育人工作。

资源整合过程中要注意的是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高校可以试着搭建覆盖全国范围信息的研究生资助信息平台，整合有关资助项目的各类信息，及时向学生进行宣传，方便学生了解和申请。该平台也可以为资助方提供受助人的反馈，使得资助方能及时了解资助的效果从而进一步优化资助方式。总之，要提高学生参与度，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将研究生、资助方和高校共同纳入资助育人的全过程，让他们在互动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从而形成良好的资助生态，促进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智能精准的资助识别与配置系统

为提高研究生资助育人的功能，应让科技服务教育，实现资助育人与教育质量的有效融合。基于教育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学习经历情况、消费情况、科研情况等多个维度的信息，建立困难度和发展需求动态画像机制。增强奖助学金评定工作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将资助资格认定由“被动申报”转为“主动发现”，由“一次性判定”转为“全过程监测”，实现资源按需投放、及时干预[7]。保证每一项资助决定都有坚实的数据支撑，提升资助的合理度与实效性。根据研究生类型、学科门类、培养进程，制定差异性资助方式，加大对重要学术活动、创新实验项目以及国内外交流的专项资助力度。

（三）形成育人效果评估与反馈循环

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需结合不同学科、地区以及学生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保证奖助学金的分配能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家庭经济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政策变化，及时对奖助学金评价标准进行动态调整。高校也要及时应对学生资助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及随之变化的需求。建立基于学生发展的多元化指标体系，如学术成果、身心健康、就业状况、社会责任感等。对资助育人成效进行持续性跟踪评价，构建常态化的被资助学生、指导教师及就业单位反馈机制，以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指标，科学调整资助额度、项目与形式，健全“评价—反馈—改进”的循环机制。

三、资助育人功能提升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目前，研究生资助育人功能提升存在诸多障碍。一是现有研究生资助工作不够完善，在对资助对象进行甄别过程中不够精确，难以实现对真正需要帮助人群的有效帮扶；大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申请程序烦琐或者受信息限制没有获得相应的资助，这就造成了资助公平性、有效性的缺失，从而影响整体育人效果。二是研究生资助的多元化和灵活性不足，许多资助项目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研究生个性化的需求[8]。尽管体

系中规定了各种资助类型，但是由于各种资助条件过于苛刻或者能够申请的途径比较单一，有些学生因为没有来得及申请而不能得到帮助，从而影响其学习以及心理状态。三是对研究生资助监督和考核的力度不够，缺少数据追踪和效果评价。现行制度大多只在关注资助金额，缺乏对资助成效的跟踪评估。

（二）针对性应对策略

在资助育人工作中，高校应构建精准化、个性化和动态化的资助认定与实施体系。首先，精准的资助认定是实现有效育人的基础。高校需打破传统的、主要依据家庭经济状况证明的单一认定模式，根据学生的需求以及学习情况，建立一个多维度的综合认定机制。该机制应整合学生的家庭经济数据、学业表现、科研参与度、日常消费行为，并关注其阶段性发展需求与特殊困难情况。引入校园大数据平台，对一卡通消费、图书馆使用、实验室出入、课程成绩、奖助记录等信息进行匿名化采集与智能分析，构建动态更新的“学生发展需求画像”，利用大数据的相关信息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资助，做到资助项目与学生自身实际情况相符，确保真正需要的学生享受到资助，从根本上提升资助资源的配置效率与育人针对性。

其次，资助工作可结合一系列育人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及校友资源，引导研究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同时高校还应该将资助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构建育人导向型资助体系，鼓励研究生树立受助于学的良好风气，并让其意识到资助对于自身学习生活的必要性，形成良好的校风。

最后，建立长期反馈及动态评价机制，使资助工作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动态评价机制需基于大数据技术建设智能评价系统，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监控资助资金发放的流程与进度，更要对受助学生的学业发展轨迹、科研产出质量、心理健康状态、就业竞争力以及长期职业发展等进行追踪监测与多维度评估，确保资助育人工作始终与人才培养目标同向同行，精准响应新时代研究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四、结语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将研究生资助体系的建设目标与作用发挥由过去的“物质支撑”转向现在的“成长助推”，并形成相应的理念变革与模式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目前，我国研究生资助工作虽已有资助系统在进行，但在资助对象识别上不够精准，在资助资源分配方面缺乏灵活性，存在资助过程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相分离等问题。

今后，研究生资助工作应在精准性、信息化以及个性化方面进行努力。在精准性方面，应建立学生家庭情况与学习状况的双重认定指标体系；在信息化方面，应对资助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和大数据分析提供有力支撑；在多样化方面，要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丰富资助的形式和内涵。以制度设计为主线，以常态化探索为基础，在确保研究生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促进其价值观培育、科研素质锻炼及良好个性形成，为培养造就德才兼备、可堪当大任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育人支撑。

参考文献

[1] 李鹏，毕辰晖．建设教育强国视域下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三重逻辑论析——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依据 [J]. 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45(02): 60−66.

[2] 周甜甜，刘国帅．“三助一辅”背景下研究生职业能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4, 40(04): 124−128.

[3] 张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新时代研究生资助育人功能提升路径的探索与思考 [J]. 三角洲，2025(32): 219−222.

[4] 杨柳．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发展新机制研究 [J]. 大学，2024(19): 45−48.

[5] 李静瑞，王婧怡．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贫困生发展型资助育人实现路径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2025(12): 123−125.

[6] 杨德桥．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 科教文汇，2025(22): 2−7.

[7] 江宇辉，杨帆，高跃．数字化赋能研究生教育管理：价值、目标与路径 [J]. 北京教育（高教），2025(07): 30−32.

[8] 杨洋．我国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演进历程、实践现状及未来走向 [J]. 教育科学探索，2025, 43(05): 48−55.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助理研究员）

助学扶智 育人成才

全民阅读双驱闭环模式的构建及推广研究
——基于公益性与商业化的协同视角

崔铭轩 丛雨欣 姜幸延 王思淇 段天彤

摘要：全民阅读已连续 13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战略，但当前面临单一公益化推广的瓶颈与商业化探索的双重困境。本研究采用调研法、案例分析法等，提出以“公益性”与“商业化”为核心驱动力，构建二者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闭环模式。该模式以政府、企业、公益组织、高校“四位一体”作为支撑，在开展公益活动的同时，开发多元产品实现商业转化，并将部分收益反哺公益，实现良性循环与自我造血。本研究阐明了研究方法、核心观点，丰富了全民阅读多元治理的理论框架，并总结该模式对于实现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以期对书香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民阅读；公益性；商业化；双驱闭环；模式构建

一、研究背景

2020 年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社会文化氛围、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引领推进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2014 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 13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我国已经在全民阅读中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如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但仍面临多重发展瓶颈，很多措施投入成本巨大并要求可持续性，资金不足的局限导致我国全民阅读工作仍存在困难；全民阅读系列活动难以持续进行，且多为短期活动，缺乏标准化运营体系，资源分散，基层渗透力弱，远远达不到上述战略目标。而全民阅读完全公益化是极其理想的状况，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完全公益性是难以实现的。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公益商业化运营已成为公益组织运作的必然趋势，但我国公益组织商业化实践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民间阅读组织大多只偏重单一领域，即只盈利或只做公益。

因此，基于资金不足、阅读活动持续性弱等现状，通过将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融合，能够促进全民阅读形成稳定收入来源，同时还可以反哺公益，形成“公益资源→商业转化→反哺公益”的闭环模型，确保可持续运营，让阅读推广“活得更久、走得更远”，真正实现“全民”而非“一次性”阅读。

二、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结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结合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实践及政策三大方面展开。理论层面，学界普遍认可该模式对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价值：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1990）在公益组织管理研究中提出，引入商业运行逻辑的公益组织，不仅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更能通过市场化扩大服务覆盖面，从而为全民阅读公益事业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学者狭斯曼（1989）则进一步指出，非营利组织本质上具有慈善使命与运营属性的双重特征，属于慈善机构与商业组织的混合体，其可借鉴企业先进的管理技术与运营经验，开展合规的商业活动及投资经营，以此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缓解传统模式下的资金募集压力，解决资金不足的困境。不过，二者研究均停留在理论层面[1]。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能界定阅读服务的属性，分析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实践方面，国外主张公私合作，Stephen P. Osborne（2000）认为公私合作模式能整合政府资源与企业效率，如英国“阅读起跑线”（Bookstart）通过政府拨款与出版商赞助覆盖全国。政策制度方面，国外认为税收激励有利于促进全民阅读公益商业化，如 Bruno Frey（1997）指出税收减免能显著提升企业赞助文化项目的意愿。

目前国外虽然提出要将商业运用于公益组织，但存在对商业依赖的风险低估问题，常美化短期成功，忽视市场波动的影响。近年来欧美地区也尝试用社会企业模式来探索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的结合，如美国“Dolly Parton’s Imagination Library”通过慈善捐赠与地方财政合作，免费为儿童提供图书，探索公益项目的商业化造血能力。但也存在反例，如巴西“流动图书馆”在 2016 年经济危机中因企业撤资规模萎缩 60%。

（二）国内研究现状

当今我国已在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推广、资源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但还有资金不足等许多问题成为全民阅读发展的障碍。

目前我国全民阅读在社区实施中存在着资源短缺、服务形式单一、管理不善等问题，不能有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2]。与此同时，我国当前对全民阅读公益与商业相结合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我国对公益组织商业化的研究还不成熟，没有真正认识到公益组织商业化的本质与内涵。尽管也有一些研究提到将商业化应用于公益组织，但理论十分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3]。因此探讨公益组织商业化的运作问题有利于完善公益组织治理的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

我国部分学者对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如果不进行市场化与商业融合，是难以维持运转的，将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与商业化融合是关乎公益组织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与现实选择，但要注意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平衡，与商业结合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共利益[4]；但也有学者认为新的收入来源可能会使公益组织偏离它本来的社会使命，损害其公益形象，对此持怀疑态度[5]。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时代的大环境下，需要转变原有的公益观念，正确看待公益与商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公益与商业的双赢[6]。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对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结合的研究集中于单一模式的公益性服务或商业变现，对二者融合的机制、可持续性及社会效益评估的研究较少。

（三）研究述评

将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结合的研究在国外较早开展，目前国外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尝试了一些将公益与商业结合应用于全民阅读的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而我国起步较晚，对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融合的研究较少，理论体系不成熟，较少开展相关的实践尝试。由于国情差异，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经验，需要在借鉴国外研究基础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寻找更合适的方式将全民阅读公益性与商业化进行融合，以深入推进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民阅读的战略目标。

三、公益性与商业化双驱闭环模式的探索与构建

（一）行业规模与市场调研

本文通过调研发现，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 年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 81.8%，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 4.78 本和 3.33 本，阅读类文化消费市场规模突破 1200 亿元，数字阅读等细分领域年复合增长率超 15%，但城乡阅读资源差异显著，农村覆盖率不足城市覆盖率的 60%[7]。

然而，当前推广面临资源不均、资金依赖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资助，70% 的基层组织年运营资金低于 10 万元，缺乏自主造血能力，存在活动可持续性与互动性不足、商业化偏离公益属性等问题。在调研期间，我们收集了百余份调查问卷以了解公众的想法。其中 60% 的公众认为当今的阅读公益活动缺乏可持续性，50% 的公众认为活动互动性差，覆盖范围有限，城乡阅读资源差异较大，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数据。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全民阅读领域迫切需要一个将公益与商业巧妙融合的运营模式，来解决上述难题，推动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促进全民阅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目标

研究全民阅读双驱闭环模式以公益性保障普惠公平，以商业化提升运营效能，以形成“公益资源→商业转化→反哺公益”的良性循环为总体目标。具体包括：通过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与高校的协同，整合政策、资金、技术与人才资源，构建多层次、全覆盖阅读服务体系的资源整合；探索公益性与商业化融合的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运营模式，提升项目可持续性与适应性的模式创新；推动全民阅读从“短期活动”向“常态化生态”转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重提升的生态构建。

（三）实施体系探索

首先，实施多方协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公益机构运营、企业赋能、高校支持的“四位一体”多方协同机制，政府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公益机构负责将惠民政策服务落地，保证服务的公益性；企业增加资金投入、开发创意性 IP 以提升其效能；高校则提供专业人才与科研支持。参考国家新闻出版署《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及地方试点经验，制定公益性与商业化融合的标准化指南，明确各方权责与利益分配机制[8]。

其次，实施分阶段推进策略。试点破冰阶段选取城乡典型区域，对模式进行初步的尝试，并验证模式的可行性，其中城市侧重阅读与文创融合，乡村推行数字阅读等轻量化运营；模式成型阶段总结经验，系统梳理多次试点中遇到的难题与经验，形成涵盖运营流程、风险防控以及权责分配的标准化模式，并进行动态评估，逐步推广至全国。

最后，进入生态构建阶段。打造文化产业生态链，

实现资源循环与自我造血。该文化产业生态链考虑城乡差异，在城市地区依托多元场景，开发多样的阅读活动并进行主题文创与联名产品设计的商业化，以提升项目的自我造血能力；而乡村地区则以公益为主导，推进如数字阅读设备捐赠、志愿者巡回服务等的政企支持轻量化的服务，缩小城乡阅读资源差异，扩大全民阅读服务的覆盖面。

调研期间，我们与江苏省南京凤凰国际书城进行了首次试点合作，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线上开展“大学生荐书官计划”，制作共计 11 条荐书短视频以及 1 条活动纪录片，并在各大平台发布，推动书城相关书籍的销售；同时，在线下“世界读书日”期间，举办阅读马拉松活动，不仅推动了阅读文化传播，而且促进了现场诸多相关文创与书籍的销售。此次试点实践十分成功，兼顾文化传播与商业收益，充分验证了该融合模式的可行性。

（四）运营策略探索

对于运营策略的探索，我们聚焦开发分级阅读课程、IP 文创、数字会员等多元化商业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联合出版社推出阅读礼包并通过“线上 + 线下”双渠道销售，充分利用小程序、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等加大传播力度并实现销售全覆盖，将部分收益反哺公益，同时通过实体阅读空间增强用户体验。

建立涵盖用户满意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多元评价体系，根据市场反馈动态调整收益反哺比例及合作模式，确保商业化收益能够有效支持公益服务的持续开展。同时设立公益基金池，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将部分商业化收益纳入基金，用于应对市场波动或资金短缺等风险，强化公益属性监管，保障特殊群体与偏远地区的服务优先性，平衡项目公益性与商业化发展[9]。

四、结论与建议

（一）构建“公益引领、商业赋能”的双驱闭环模式

以公益为核心锚点，是保障全民阅读本质属性的根本前提。公益引领能够保障全民阅读的普惠性与公平性，覆盖特殊群体与偏远地区；以商业为效能引擎，是实现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通过精准运营、IP 开发、多元业态补充资金，实现自我造血，形成“公益资源输入—商业价值转化—公益反哺输出”的良性循环，破解当今全民阅读资金短缺、可持续性弱的难题。

（二）完善“多方协同、动态适配”的实施体系

建立政府、公益机构、企业、高校“四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整合政策支持、公共资源、市场能力与专业服务等资源；项目按试点破冰、模式成型、生态构建三阶段推进，确保模式逐步完善、稳步落地；对城乡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安排，城市场景侧重多元商业业态，乡村场景推行轻量化运营，以避免过度商业化，确保商业业态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优化“产品创新、渠道拓展”的运营策略

丰富商业产品种类是提升用户黏性与商业收益的核心手段。我们聚焦于开发阅读课程、主题文创、联名产品等多元商业产品，适配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注重产品迭代更新，结合社会热点与用户反馈，定期推出新品，保持产品的新鲜感与竞争力；搭建线上线下融合渠道是扩大项目影响力与市场覆盖面的重要途径。借助小程序、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电商平台等线上渠道扩大传播与销售，同时联动线下渠道，进一步优化实体空间布局，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建立多元评价反馈机制是实现项目动态优化的重要保障。积极收集社会各方的评价意见，实时对模式进行改进优化，并动态调整收益反哺比例与合作模式。

五、结语

当前全民阅读的核心矛盾在于公益属性与可持续性的失衡，完全公益模式受资金限制难以持续，单一商业模式又偏离全民阅读的公共价值目标。研究证实，只有通过公益与商业的深度融合，才能化解这一矛盾，为全民阅读提供稳定的发展动力。

本研究构建的“公益资源→商业转化→反哺公益”闭环模式，通过三大核心板块的设计，填补了公益与商业融合的理论空白，并通过实证验证了其可行性与适配性。该模式打破了单一模式的局限，以公益守底线、商业强造血，实现资源整合、效益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未来需持续深化多方协同，优化产品与渠道，完善评价体系，推动全民阅读从“一次性活动”向“常态化生态”转变，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闫艺馨 . 公益组织商业化运营模式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17(33): 124−126.

[2] 吴玲玲 .“互联网 +”环境下社区全民阅读现状及推广策略 [J]. 中国民族博览 , 2024(17): 72−74.

[3] 钟李斌 . 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的商业模式探索 [D]. 福州 : 福建师范大学 , 2014.

[4] 祝建兵 , 陈娟娟 . 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动因与风险规避 [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 2007(03): 88−91.

[5] 丁利敏 . 非营利组织营利行为研究 [J]. 商业文化 (下半月), 2011(02): 153.

[6] 张咏梅 , 徐思遥 . 从传统公益到新商业化公益的品牌发展研究 [J]. 现代营销 (下旬刊), 2016(15): 52−53.

[7]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数据发布 [R/OL]. (2023−04−24)[2025−12−10]. http://www.capirn.com.cn/col/col10000004/index.html.

（下转 18 页）

公益导向下的工人文化宫运营模式优化策略研究

游丹雯

摘要：伴随着新时代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升级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人文化宫作为服务职工的公益载体，其运营效能直接关乎职工权益与文化建设质量。基于此，文章围绕公益导向下的工人文化宫展开探讨，明确其在筑牢职工服务阵地、传承职工文化精神及凝聚职工精神力量方面的核心价值，剖析其运营中公益定位、服务供给、运营机制及资源整合方面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运营模式优化策略，包括坚守公益方向、优化服务供给、创新运用机制及促进资源整合，旨在为工人文化宫运营者及相关管理部门优化实践提供参考，进而助力职工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公益导向；工人文化宫；运营模式；优化策略

新时代背景下，职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层级化的升级态势，与之相适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处于持续优化与完善的进程之中。工人文化宫作为面向职工群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公益性载体，其运营效能的高低不仅直接关乎职工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质量，更对职工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成效产生关键性影响。从职能定位来看，坚守公益属性导向是工人文化宫践行自身使命的核心前提与根本遵循。在此基础上，立足职工群体的真实文化诉求与现实需求，依托自身公益定位扎实推进各项服务职能落地，已成为新时代推进职工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亟待重点探讨与解决的现实性议题[1]。

一、公益导向下工人文化宫的核心价值

（一）筑牢职工服务阵地

工人文化宫以公益属性为根基，聚焦职工群体的多元需求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从技能提升到权益保障，从身心健康到生活关怀，其服务覆盖职工职业发展与日常生活的关键领域。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差异化需求，文化宫整合优质资源，搭建起普惠性的学习交流平台，让职工无须额外负担即可获得专业指导与支持[2]。无论是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帮助其适应行业发展需求，还是为一线职工提供心理疏导、健康咨询等服务，缓解工作压力，都体现了工人文化宫作为职工服务主阵地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扎根职工、贴近实际的服务模式，让职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成为职工值得信赖的依靠，也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传承职工文化精神

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文化的关键载体，肩负着记录行业发展、延续职工精神的重要使命。它深度挖掘不同行业的文化特质以及职工群体的精神内核，对职工在生产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优良传统、奋斗故事与价值理念进行系统归纳与传播，通过举办行业文化展、职工文艺汇演、劳动故事分享等活动，使职工文化在交流展示中实现传承。从老一代职工所倡导的工匠精神到新时代劳动者所追求的创新理念，从传统行业的文化积聚到新兴领域的精神探索，文化宫搭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让职工在回望往昔、感知现今之际提升文化认同感。这种对职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

（上接 17 页）

[8] 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2-23)[2025-12-11]. https://www.12371.cn/2020/10/23/ARTI1603414474726955.shtml.

[9] 王利君，张冉，黄英. 社会组织商业化何以影响公众捐赠？——一项基于组织信任和信息公开视角的调查实验 [J]. 中国非营利评论，2024, 34(02): 151-172, 314.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为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色彩，更让良好的职工文化基因汇入时代发展的脉络，成为推动一代又一代劳动者拼搏的精神动力[3]。

（三）凝聚职工精神力量

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工人文化宫将公益文化服务当作纽带，成为增强职工思想共鸣、汇聚发展合力的关键平台。它通过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指引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各种主题的文化活动、集体文体项目，让职工在参与中增进交流、深化认知，形成团结协作的良好态势。面临行业变革与市场挑战，文化宫以文化引领帮助职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将个人追求与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精神层面的聚合，不仅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及战斗力，更让职工在共同价值追求中获得归属感与使命感，为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共同方向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4]。

二、公益导向下工人文化宫运营现状

（一）公益定位模糊不清

部分工人文化宫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公益属性弱化的倾向，其定位在市场化运营与公益服务之间摇摆不定。受经费压力、运营考核等因素影响，一些工人文化宫过度追求营收效益，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营利性项目中，导致公益服务的优先级被降低。同时，部分文化宫对自身公益使命的认知不够清晰，未能明确聚焦职工群体的核心需求，服务对象泛化，既面向社会大众又兼顾职工群体，使得有限的公益资源难以集中发力。这种定位上的模糊，不仅让职工群体难以感受到专属的公益服务，也让工人文化宫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设立初衷，公益价值的发挥受到明显制约[5]。

（二）服务供给不够精准

当前不少工人文化宫的服务供给与职工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难以满足新时代职工的多元诉求。服务内容上，仍以传统的文体活动、技能培训为主，缺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青年职工等群体的针对性设计，对职工关注的心理疏导、职业规划、数字技能提升等新兴需求回应不够及时。服务方式上，多以线下集中活动为主，线上服务渠道建设滞后，灵活性和便捷性不足，无法适配职工碎片化的时间安排。此外，服务供给缺乏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差异化考量，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导致部分职工参与意愿不高，公益服务的实际效果未能充分显现。

（三）运营机制僵化滞后

工人文化宫的运营管理仍受传统体制机制影响较深，灵活适配市场与职工需求变化的能力不足。在管理模式上，部分文化宫沿用行政化管理方式，决策流程烦琐，对职工需求的反馈不够灵敏，难以快速调整服务内容与运营策略。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人员结构老化、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缺乏兼具公益服务理念与市场化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导致服务创新与运营效率受到限制。此外，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难以充分调动，部分服务项目存在形式化、走过场的情况，难以真正契合职工实际需求，影响了公益服务的质量与口碑。

（四）资源整合效能偏低

工人文化宫在资源整合与利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未能形成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内部资源方面，部分文化宫的场地、设备等硬件资源缺乏系统规划，存在重复建设、闲置浪费的情况，而优质的师资、课程等软件资源又相对匮乏，难以支撑多元化的公益服务供给。外部资源方面，未能充分联动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资源获取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财政拨款，市场化筹集公益资源的能力不足。这种内外部资源整合不力的状况，导致工人文化宫的公益服务覆盖面有限，服务深度与广度难以拓展，难以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多元公益服务需求，也制约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益导向下工人文化宫运营模式优化策略

（一）坚守公益核心，明晰发展方向

公益属性是工人文化宫的本质特征，更是区别于其他文化机构的核心标识。只有坚守这一核心，才能在各类运营选择中保持方向不偏，真正发挥服务职工的职能。要从制度层面明确公益定位，将服务职工的公益宗旨纳入工人文化宫发展章程，结合区域职工群体的结构特征与需求差异制定专项公益服务方案，明确服务范畴、执行标准及考核维度，使公益导向贯穿运营管理全流程。针对过往部分文化宫存在的公益定位模糊、服务供给偏差等问题，应建立规范化公益服务清单制度，将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劳动权益咨询、文体活动组织等核心公益服务项目纳入清单范畴，明确其免费或低收费的服务属性，严禁以营利为导向压缩公益服务供给规模。服务对象的精准聚焦是公益价值落地的关键，需以职工群体为核心服务靶心，重点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产业工人等群体，建立动态化职工需求档案，保障服务资源向刚需群体倾斜配置。与此同时，需强化内部从业人员的公益理念培育，通过常态化专题培训、典型案例研讨等方式，引导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工人文化宫的公益使命内核，将服务职工的价值理念内化为日常工作准则。此外，应主动推进公益服务信息公开化，向社会公示公益服务内容、资金使用明细及服务成效评估结果，构建职工与社会协同监督机制，借助透明化运营塑造公益公信力形象，使职工切实感知工人文化宫的公益服务价值，进而增强对文化宫的情感认同与信任依赖。

（二）优化服务供给，满足多元需求

职工需求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决定了工人文化宫

的服务供给必须保持灵活调整的姿态，才能真正实现精准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建立常态化的职工需求调研机制，通过线上问卷、线下座谈、基层走访等多种方式，定期收集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需求信息，建立需求数据库并进行动态更新。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进行分类梳理和分层响应。在服务内容设计上，既要保留传统优势项目，如职工文艺汇演、体育赛事等；又要结合时代发展新增特色服务，比如为青年职工提供职业规划指导、简历优化培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交通安全培训、线上技能提升课程，为老年职工提供健康养生讲座、智能设备使用教学等。同时，打破单一的线下服务模式，加快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将部分培训课程、文化资源、活动报名等服务搬到线上，实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满足职工碎片化的时间需求。在服务方式上，推行“菜单式”服务，让职工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服务项目，针对部分行动不便或工作繁忙的职工，提供上门服务、预约服务等个性化服务。此外，建立服务效果反馈机制，在每次服务结束后及时收集职工评价，根据反馈意见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形成“需求调研—服务供给—效果反馈—优化提升”的闭环体系，确保服务供给始终与职工需求同频共振。

（三）创新运营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运营机制僵化是制约工人文化宫活力的关键因素，唯有进行机制创新，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催生内部的自身潜力。就管理模式而言，工人文化宫可以借鉴现代社会组织所积累的管理经验，打破传统行政化管理的束缚，构建扁平化的管理格局，减少决策相关层级，提升对职工需求的反馈效率。厘清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设立权责分明、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防止出现扯皮推脱、工作效率低下的现象。就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工人文化宫要构筑多元化的人才吸纳及培养体系：一方面经由公开招聘、定向引进等手段，招纳具有公益服务理念、专业服务水平的复合型人才，诸如职业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文化活动策划师等；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定期开展业务技能训练、公益理念教导与行业交流活动，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与服务水平。同时，建立科学的激励考核机制，将职工满意度、公益服务完成质量、服务创新成果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与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晋升发展挂钩，对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给予表彰奖励，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探索市场化运营的辅助模式，在坚持公益核心的前提下，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开展公益性文创产品开发、引入社会力量合作举办活动等方式拓展资金来源，但要严格区分公益服务与盈利项目的界限，确保盈利收入全部用于补充公益服务经费，为文化宫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保障。

（四）促进资源整合，构建协同生态

工人文化宫的公益服务开展离不开各类资源的支撑，仅靠自身力量难以满足职工的多元需求，因此必须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构建多方协同的服务生态。在内部资源整合方面，对文化宫现有的场地、设备、师资等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和统筹规划，建立内部资源共享平台，避免资源闲置和重复建设。例如，将闲置的活动场地用于开展职工培训，整合内部师资力量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外部资源整合方面，首先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动，积极对接工会、人社、文旅等部门，争取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资源倾斜，比如争取将职工技能培训项目纳入政府民生工程，获得专项经费支持。其次，深化与企业的合作，与辖区内的重点企业、行业协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邀请企业内的技术骨干、管理行家担任兼职讲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与经验分享活动，同时借助企业资源的优势举办职工文化活动，促进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事，引入公益基金会、志愿者服务队伍、专业文化机构等社会力量，弥补自身在专业服务、活动策划等方面的短板。最后，工人文化宫还应与心理服务机构合作开展职工心理方面的疏导工作，与志愿者团队共同开展公益活动。通过建立资源整合统筹机制，界定清楚各方的职责与权益，构建政府引导、文化宫牵头、企业助力、社会参与的协同运营模式，开创资源互补、优势叠加局面，不断拓展公益服务的覆盖边界和服务深度。

四、结语

公益是工人文化宫的本质底色，也是其连接职工、服务社会的核心纽带。在职工需求迭代与文化建设深化的双重背景下，破解定位模糊、供给不足等难题，优化适配的运营模式，是工人文化宫实现价值回归的关键。以公益为核心，通过精准供给、机制创新与资源聚合，工人文化宫既能激活自身发展活力，又能精准对接职工的精神文化诉求，真正成为凝聚职工力量的“文化阵地”。这既是对其公益使命的践行，更能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助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吴家杰 . 构建服务便捷的“公益 + 普惠”服务体系 [J]. 中国工会财会 , 2025(09): 8−9.

[2] 沈陈庚 .“两性两化”视角下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J]. 中国工会财会 , 2025(07): 29−31.

[3] 侯东方 . 强公益明标准抓提升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服务职工主阵地作用 [J]. 中国工会财会 , 2025(04): 6−7.

[4] 张明蕾 . 推动工人文化宫建设高质量发展 [J]. 工友 , 2024(10): 15.

[5] 许春枝 . 打造现代职工文化服务品牌让工人文化宫更好地回归公益 [J]. 国际公关 , 2023(08): 118−120.

（作者单位：三明市工人文化宫）

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发展的实践模式建构

刘　新

摘要：作为基层慈善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核心载体，社区基金的规范化、精准化运作亟须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系统性支撑。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社工团队深耕基层实践场域，以党建为引领，立足“五社联动”机制，探索形成“需求精准识别—资源多元整合—项目专业运作—监督全程透明”的社会工作服务范式，通过专业介入有效破解社区基金募集渠道狭窄、服务供需错配、运作流程不规范等现实困境。本文基于济南市市中区七东社区、魏家庄街道等典型实践案例，系统梳理社工在社区基金全流程运作中的具体服务方法、操作逻辑、适用场景及实践成效，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基金；慈善事业；基层治理；实践范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为基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明确提出推动社区慈善与社会工作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

社区基金作为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慈善实践载体，在弥补公共服务供给缺口、激活社区内生治理动力、促进社会资本整合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然而在实践推进过程中，社区基金普遍面临资金募集难度大、需求对接精准度不足、运作管理规范化程度低等共性困境，亟须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破解[1-3]。济南市市中区是社区基金建设的先行试点区域，该区民政局社工团队全程深度参与基金设立、运作与优化全过程，形成了贴合基层实际的服务方法、操作流程及创新模式，其积累的实践经验与量化成效为同类地区推进社区基金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的实践基础

作为济南市核心城区，市中区主要有两类典型社区场景：一类是以七东社区为代表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老化、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 30%、特殊群体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状况；另一类是以魏家庄街道为代表的商圈周边社区，商贸资源丰富但社区联动机制不健全，基金募集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两类场景均对社区基金的精准服务与可持续运作有着迫切需求，为社会工作专业介入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2023 年以来，在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的统筹推动下，该区率先成立首家社区慈善基金，构建起“党建引领、慈善组织管理、专业机构执行”的组织架构。社工团队在需求调研、资源链接、项目设计、过程管理等关键环节全程介入，依托 17 个街道社工站建立专项服务小组，配备持证社工 32 名，联动社区工作者 180 余人，为社区基金运作模式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市中区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的实践路径

（一）需求精准识别：锚定基金服务靶向

需求识别的精准性是社区基金高效运作的前提，社工团队创新构建“多维调研 + 议事转化”的需求识别体系，明确操作流程与适配场景，显著提升了需求对接的精准度。

一是多维调研法：通过科学界定调研范畴与对象（优先覆盖特殊群体及普通居民），综合运用入户走访、焦点小组访谈、线上线下问卷调研等多元工具，对调研信息进行分类编码、系统梳理，选取 10%~15% 对象开展二次访谈进行需求验证，确保需求识别的全面性与准确性。该方法适用于居民结构复杂、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的社区，尤其适配老旧小区、人口密集型社区，能够有效提升需求识别的精准度。实践中，七东社区通过该方法走访 300 余户居民，组织 5 场焦点小

组访谈，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梳理出基础设施改善、特殊群体关爱、环境优化等23项核心需求。

二是议事转化法：通过筛选高频紧急议题，组织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代表召开议事协商会议，系统梳理需求优先级，明确责任主体与推进时限，定期公示项目进度并邀请居民参与评议，将分散化的居民诉求转化为规范化的基金资助清单。该方法适用于居民参与意愿较强、需凝聚社区共识的社区，如新建社区、具有议事传统的老旧社区，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对基金服务的认可度与参与度。截至2024年底，全区通过该方法累计将89项分散诉求转化为规范化资助清单。

（二）资源多元整合：拓宽基金募集渠道

针对社区基金募集渠道狭窄的现实难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社工团队构建起“多元联动+模式创新”的资源整合体系，有效拓宽基金来源渠道，增强基金可持续运作能力[4]。

一是全域化动员法：通过“五社联动”线上沟通平台发布公益倡议，设计“1元微公益”“公益集市”等低门槛公益参与载体，联合楼栋长、网格员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对接周边商户资源，建立捐赠台账并实时记录捐赠情况，广泛凝聚社区内外公益力量。该方法适用于居民基数较大、周边商户资源丰富的社区，如商圈周边社区、大型居住社区。2023—2024年，全区通过该方法累计吸引86家企业、123家门店、近500名居民参与捐赠，募集资金8.3万元、物资价值约5万元。

二是社企合作法：通过系统调研企业类型与公益诉求，构建“公益+商业”的协同合作模式，明确企业捐赠细节与权益回报，签订合作协议并定期向企业反馈合作成效，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社区基金发展的良性互动。该方法适用于商圈密集、企业资源丰富的社区，如魏家庄街道、杆石桥街道等区域。截至2024年底，已成功推动宏济堂、平安银行等23家企业参与社区基金合作，开展志愿服务80余场，募集资金近4万元，达成公益与商业的双赢。

三是资源地图法：通过全面普查社区周边各类资源并建立信息档案，运用可视化工具绘制社区资源地图，按季度进行动态更新，根据基金项目实施需求筛选适配资源进行精准对接，构建稳定的资源供给网络。该方法适用于需长期整合资源、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社区，如七东社区、麟祥街社区等。

（三）项目专业运作：提升基金服务效能

以项目化运作为核心，构建“精准设计+专业实施+闭环评估”的全流程项目管理体系，提升社区基金服务的专业性与实效性。

一是精准设计：基于需求清单进行分类梳理，针对性设计基金项目，明确项目目标、服务对象、实施步骤及资金预算，提交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居民代表联合审核，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项目实施计划，确保项目与社区需求的高度匹配。该方法适用于各类社区基金项目，尤其适配于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特殊群体关爱等重点项目。2023—2024年，全区累计设计社区基金项目40余项，需求匹配度达85%。

二是专业实施：采用“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的协同协作模式，社工为志愿者提供不少于4小时的系统性岗前培训，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推进服务开展，建立服务日志记录制度与每周进度沟通机制，构建应急响应机制应对服务过程中的突发情况，保障服务质量与实施效率。该方法适用于需要多方协作、专业服务支撑的项目，如老年助餐、残疾人康复、社区环境改造等领域。

三是闭环评估：社工每周开展项目进度检查与资金使用合规性审查，按月形成过程评估报告；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项目结果评估，收集服务对象意见建议，基于评估结果优化项目实施方案并建立档案留存，形成“实施—评估—优化”的闭环管理机制。该方法适用于所有社区基金项目，尤其适配资金规模较大、服务周期较长的项目，能够有效提升项目质量与资金使用效率。

（四）规范透明运作：筑牢基金公信力根基

构建“制度构建+信息公开+多方监督”的规范化运作体系，保障社区基金运作的透明化、规范化，筑牢基金公信力基础。

制度体系构建。协助社区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与监管委员会，制定《社区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基金募集、使用、管理等全流程规范，开设基金专用账户与专属捐款码，开展制度学习培训，为基金运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截至2024年底，未发生一起资金违规使用事件，制度执行合规率达100%。

多元信息公开。明确基金收支情况、项目实施进度、评估结果等核心公开内容，通过“慈善中国”平台、社区公开栏、议事协商会议、线上沟通群等多渠道进行常态化公示，建立“每月公开收支、每季度公开进度、每年公开年报”的定期公开机制，设立专门咨询岗位回应居民疑问，提升居民对基金运作的知晓度与信任度。

全方位监督。明确基金管理委员会、社区居民、专业机构三类监督主体，制定“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居民监督”的规范化监督流程，保障居民代表随时查阅基金运作台账的权利，第三方机构每半年开展一次专项监督检查，社工牵头落实监督意见整改，确保基金运作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

三、市中区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的实践模式核心范式

基于四大实践路径，结合区域场景特征，创新形成三类可复制的实践范式，是整体实践模式的具象化呈现。

（一）“党建引领 + 社工统筹”的协同治理范式

依托社区党组织建立党建联盟，广泛吸纳机关党支部与企业党支部加入，社区党组织把握基金发展政治方向、整合党建资源与政策支持，社工统筹推进需求调研、资源对接与项目执行等具体实务工作，通过“红色议事厅”等平台组织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商户代表等多方主体参与基金决策，党员志愿者深度参与基金监督与调研工作，协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难题。该范式适用于各类社区基金，尤其适配党建基础较好的老旧社区、机关单位周边社区，能够提升基金决策的民主化水平与项目落地成功率。

（二）“空间合伙人 + 基金池”的资源转化范式

针对社区存在闲置空间、基金来源需持续补充的现实需求，通过全面排查社区闲置厂房、配套用房等空间资源并建立信息台账，发布招募公告筛选专业化社会组织入驻，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以低于市场价格20%~30% 的租金标准，提取入驻组织 20% 的运营收入注入社区基金池，社工协助建立基金池管理台账并定期公示使用情况，入驻社会组织按协议要求每年提供不少于 12 场免费社区服务，形成“空间盘活—资源注入—服务供给”的良性循环。该范式适用于新建社区、商业配套不完善的老旧社区，能够有效转化社区闲置资源，为基金补充稳定来源，同时丰富社区服务供给。例如，魏家庄街道麟祥街社区通过该模式累计注入基金池 12.6 万元，每年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约 8 万元。

（三）“五社联动 + 项目驱动”的服务供给范式

以社工作为枢纽型行动者，整合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社区企业等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协作网络，基于社区需求清单设计惠民项目作为驱动载体，从“五社”协作网络中精准调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匹配项目实施需求，社工统筹分工推进项目执行，每季度收集居民反馈意见并优化联动机制。该范式适用于需求多元、需整合多主体资源的社区，如大型居住社区、特殊群体集中社区，能够显著提升资源对接效率与居民满意度，推动社区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与精准化。2023—2024 年，全区通过该范式实施惠民项目 40 余项，惠及 1.2 万余人次。

四、实践成效

市中区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基金运作、社区服务与基层治理的协同提升：其一，基金运作规模与效能实现双提升，基金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资金使用效率与精准匹配度显著提高，有效支撑了社区公益项目的顺利实施；其二，社区服务质量与居民反馈持续优化，累计解决大量社区“急难愁盼”民生诉求，基础设施改善与特殊群体关爱成效突出，居民对基金服务的满意度与参与度显著提升，商户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慈善的积极性持续增强；其三，社区治理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培育了一批专业化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相关实践经验被纳入全省典型案例，获得主流媒体专题报道，居民对社区基金的信任度显著提升，未发生相关投诉事件。

五、结语

济南市市中区社工团队的实践探索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能够有效破解社区基金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募集难、需求对接难、运作不规范等各类现实困境。通过构建“需求精准识别—资源多元整合—项目专业运作—监督全程透明”的全流程服务方法体系，细化操作流程，匹配不同社区场景，创新形成“党建引领 + 社工统筹”“空间合伙人 + 基金池”“五社联动 + 项目驱动”三类特色范式，结合量化数据佐证实践成效，市中区实现了社区基金规模、服务效能与社区治理活力的同步提升，为全国社区基金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社会工作赋能社区基金发展，是基层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更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5]。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社工参与社区基金的激励机制；健全基金长效运作机制，优化资源整合与项目管理流程；深化多元主体参与程度，拓宽基金募集渠道与服务供给范围，让社区基金真正成为基层慈善的“蓄水池”、民生服务的“暖心钱”、社区治理的“黏合剂”，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方方 . 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基金建设的实务研究——以 Z 街道为例 [D].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 , 2024.

[2] 欧均桐 . 社区基金协同社工参与社区发展的案例研究 [D]. 广州 : 广州大学 , 2022.

[3] 王思斌 . 发挥社会工作服务在加强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J]. 中国社会工作 , 2025(10): 6.

[4] 刘媛 , 邢媛媛 . 筹建社区基金的策略、技术与文化支撑——基于湖北省随州市 3 个社区的实践经验分析 [J]. 中国社会工作 , 2025(07): 26−27.

[5] 徐选国 , 秦莲 .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J]. 学习与实践 , 2023(05): 90−101.

（作者系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社会工作师）

推动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基于宁波市政策框架与国企履责的双维视角

胡彩萍

摘要：志愿服务不仅直观反映着社会文明建设的成效，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柔性治理力量，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宁波市志愿服务政策体系及当地特色实践项目为研究对象，结合地方政策引导方向与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创新的核心理论内涵，以及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阻碍。本文构建起“战略引领—专业驱动—平台协同—数字赋能”的四维一体创新框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旨在为国有企业深度融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协同统一，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市域社会治理

一、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国企志愿服务新命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当前我国志愿服务正处于从零散碎片化向系统集成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是地方志愿服务创新的核心。浙江省已建立完善的地方志愿服务制度保障，宁波市在此基础上形成特色治理模式，宁波国企的各类志愿项目为社会治理融合提供了鲜活实践借鉴；而作为兼具公共性、引领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参与主体，国有企业虽长期投身志愿服务，但实践中仍存在服务内容偏体力型、未发挥专业优势、与外部协同不足呈“内部闭环”状态等问题，导致服务可持续性与专业效能受限，潜在价值难以彰显[1]。因此，宁波在推进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如何依托地方政策框架、结合自身履责逻辑实现志愿服务模式创新与效能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命题。

二、高质量创新之于国有企业履责的多重价值意蕴

对国有企业而言，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创新绝非额外的负担，而是一项兼具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重价值的战略举措，更是国企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2]。

（一）政治价值：强化治理协同的桥梁纽带功能

高质量志愿服务是国有企业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实践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同时着重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国有企业通过深度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将自身强大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能力。以宁波“暖暖的路廊”项目为例，当地国企充分发挥自身在道路养护、场地管理方面的专业特长，不仅承担了全市 156 个路廊的日常维护工作，还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对老旧路廊进行智能化改造，增设休息座椅、应急充电等便民设施，有效推动了“政府提供场地 + 社会组织运营 + 社会力量参与”这一创新模式的落地。

（二）社会价值：从资源输出到专业解决方案供给的升级

高质量志愿服务更注重引导国有企业发挥自身核心业务能力，为社会问题提供系统性、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志愿服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核心就在于推动专业力量与志愿力量的协同联动[3]。宁波市“暖暖的”系列项目从最初单一的“小屋帮扶”形式，逐步拓展为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品牌体系。在“暖暖的新家”项目中，宁波国企充分运用自身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组建由结构工程师、施工监理组成的志愿团队，深度参与困难家庭危房改造的方案设计和质量监管工作，针对老旧房屋抗震性能不足、排水系统老化等共性问

题，制定标准化改造方案。这种将企业核心能力转化为高附加值公共服务产品的模式，有效实现了社会效益的倍增，生动践行了“弱有众扶”、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三）文化价值：培育卓越组织文化的重要载体

体系化、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项目，是锤炼员工队伍、培育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员工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国情社情，提升团队协作、项目管理以及同理心等综合素养。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基因，能够营造向上向善、担当尽责的组织氛围，这与“清廉国企”建设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4]，也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精神支撑。

三、国有企业志愿服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

结合宁波市志愿服务政策框架提出的“常态化、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标准，当前国有企业志愿服务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亟待突破的瓶颈，在专业度、协同性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5]。

（一）战略定位模糊，顶层设计缺失

部分国有企业对志愿服务的战略价值认识不够深入，将其简单归为党群组织的软性工作，没有将其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这种定位上的偏差，直接导致志愿服务项目呈现出随机性、碎片化的发展特点：服务活动大多集中在“学雷锋日”、重阳节等特定节日，以临时性帮扶为主，缺乏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持续的资源投入；项目选择与企业主业关联度不高，未能形成“志愿 + 主业”的特色发展模式；资源配置稳定性不足，资金、人员等投入多少，很大程度上受领导重视程度影响，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服务能力。

（二）运行机制松散，专业能力不足

国有企业志愿服务大多依靠行政动员和临时组织的模式，缺乏规范的全流程运行机制。在志愿者管理方面，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评估体系；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通用礼仪方面，没有结合服务项目的专业需求开展针对性培训；现有激励措施难以调动其长期参与的积极性，内生动力不足。在服务实施方面，活动内容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大多集中在体力劳动和基础慰问上，未能与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深度融合，服务的专业壁垒和不可替代性较低，品牌影响力有限。

（三）协同网络不畅，资源整合乏力

国有企业志愿服务呈现出“内部闭环”的封闭发展状态，与地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他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和资源阻隔，没能有效融入区域志愿服务生态系统。在与政府部门协同方面，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难以精准对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社会服务需求；在与社会组织协同方面，没能充分借助专业社工机构的专业能力，导致服务项目设计缺乏科学性、服务实施缺乏专业性；在与其他企业协同方面，还没有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志愿服务联盟，难以整合多方资源形成服务合力，国企志愿服务的封闭性，是制约其效能提升的核心因素之一。

（四）数字赋能不足，智能化水平不高

国有企业对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应用，大多停留在信息发布和时长记录的基础层面，没能实现数字技术与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在需求洞察方面，没能深入挖掘平台数据开展社会需求热点分析，难以精准识别服务需求；在资源对接方面，没能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岗位、人员、物资等资源的智能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服务管理方面，没能通过数字平台对服务过程进行动态监测和成效科学评估，缺乏量化的服务质量评价指标，难以实现服务质量的持续优化。

四、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创新四维一体路径

为有效破解上述发展瓶颈，国有企业应积极借鉴宁波市志愿服务的先进实践经验，结合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逻辑，系统性地构建“战略引领—专业驱动—平台协同—数字赋能”的四维一体高质量志愿服务创新模式，推动志愿服务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根本性转型。

（一）战略引领：实现志愿服务与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

1. 顶层设计制度化

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中制定志愿服务专项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领域与保障措施，确保资源配置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结合宁波市志愿服务发展规划要求，立足企业主业优势，确定志愿服务重点参与领域，强化顶层设计的战略嵌入性，这也是确保志愿服务摆脱碎片化困境、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前提。

2. 管理模式项目化

引入完整的项目管理生命周期理论，对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实施规范化管理，涵盖立项、策划、执行、监测、评估、迭代等全流程工作。建立项目可行性评估机制，结合社会需求与企业能力筛选优质项目；引入社会投资回报（SROI）分析方法，对项目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估；建立项目迭代优化机制，根据服务反馈持续完善项目设计与实施流程，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与实效性。

（二）专业驱动：构建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优势输出模式

1. 项目实施专业化

围绕宁波市“专业社工 + 志愿者”“专业人才 + 志愿者”的发展模式要求，推动志愿服务项目的专业

化升级。针对不同服务领域，组建专业化志愿服务团队，吸纳企业内部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其中，实行“专业人才领衔 + 志愿者辅助”的服务模式。同时，与本地高等学校、社工机构等专业组织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借助外部专业力量提升项目设计与执行的专业性，定期开展项目复盘与优化工作。

2. 能力建设体系化

建立分级分类的志愿者培训认证体系，全面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服务能力。通用培训涵盖志愿伦理、沟通技巧、应急处理等基础内容；专业培训结合服务项目需求，邀请行业专家、专业社工开展针对性培训，培育内部志愿培训师与项目经理队伍，构建专业化的志愿服务人才支撑体系。

3. 服务标准规范化

结合行业发展特点与宁波志愿服务实践经验，制定企业内部志愿服务技术规范、安全标准与质量评估指南。对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项目制定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与操作规范，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标准与质量要求。建立服务质量评估机制，从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成效、社会影响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推动服务过程的标准化与品质化发展。

（三）平台协同：打造开放共生的志愿服务生态系统

1. 内部协同一体化

成立由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群、人力资源、业务部门等多部门参与的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实现品牌统一、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有效破解“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的发展困境。建立内部资源统筹机制，整合企业内部资源，为志愿服务项目提供全方位支持；搭建内部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发布志愿服务项目信息、志愿者需求信息与服务反馈信息，全面提升内部协同效率。

2. 外部联动常态化

主动融入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主导的志愿服务体系，与政府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精准对接宁波人社年度志愿服务活动重点工作任务，实现与地方政策的同频共振。深化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依托社区服务阵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升服务质量。

3. 产业链协同生态化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链长”引领作用，牵头组建行业性或区域性企业志愿服务联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制定联盟章程，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建立资源共享、成果共用的协同机制，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资源优势，形成专业化志愿服务合力。

（四）数字赋能：以智慧化手段提升志愿服务全流程效能

1. 服务流程线上化

全面对接官方数字平台，实现志愿服务全流程线上化管理，涵盖志愿者招募、培训、活动报名、服务计时、评价反馈、激励兑换等关键环节。开发企业内部志愿服务数字化管理模块，实现与官方平台数据互通共享，提升管理效率与透明度。利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服务流程，提升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体验感。

2. 决策支持数据化

深度挖掘志愿服务数据资源，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体系。通过分析平台数据信息，精准识别社会需求热点、志愿者行为模式与项目成效关联，为志愿服务项目的筛选、设计与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建立志愿服务成效评估模型，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品牌效益等多个维度进行量化评估，为资源配置与项目迭代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五、结论与展望

推动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创新，是新时代赋予国有企业的重要使命，也是国有企业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四维一体的创新模式，通过战略引领明确发展方向、专业驱动提升服务效能、平台协同整合各方资源、数字赋能优化管理流程，形成了国有企业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完整逻辑体系。这一模式既契合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治理效能融合的研究结论，又响应了我国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有助于引导国有企业突破传统公益思维的局限，将志愿服务系统性重塑为战略性管理职能、专业性价值输出、生态化合作网络和智慧化运营体系。持续深化志愿服务实践创新，充分释放志愿服务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要作用，书写出志愿服务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同频共振的精彩篇章。

参考文献

[1] 王名，李勇．我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 [J]. 社会发展研究，2024(02): 89−105.

[2] 陈丽，张明．国有企业志愿服务的多重价值与实现路径 [J]. 经济管理，2023(11): 178−192.

[3] 李静，吴涛．国企参与基层服务设施建设的志愿服务模式研究 [J]. 公共管理学报，2025(01): 76−88.

[4] 江汛清．专业力量与志愿力量协同治理：逻辑、模式与路径 [J]. 社会科学战线，2021(10): 212−219.

[5] 赵宇，黄琳．共享价值视角下国企志愿服务与主业创新融合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2024(04): 123−140.

（作者单位：宁兴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精准资助导向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创业困境及帮扶路径研究

石宇佳

摘要：精准资助作为当前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主要形式，不仅要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更承担着助力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的坚实责任，从而形成教育闭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文章结合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和创业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深度剖析了资本短板、信息壁垒、能力断层、风险规避等现实困境，研究发现，现有资助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漏洞。为此，文章提出强化资本补偿、畅通信息渠道、搭建实践平台、完善保障体系等策略，旨在推动精准资助和就业创业支持的协同增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有力帮扶。

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创业；精准资助；产教融合

一、引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高校毕业生中的特殊群体，其就业创业质量与教育公平、社会和谐稳定有密切关联。精准资助政策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重要保障政策，但现有政策多聚焦于保障性需求，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在就业创业层面所面临的发展性需求。对此，本文深入分析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创业中面临的现实梗阻，提出了优化精准资助政策和高校育人政策的可行路径，以供参考。

二、精准资助导向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创业的困境解析

（一）资本短板：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匮乏

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形态。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精准资助政策主要帮扶的是其经济资本的缺口，能够为学生的基本学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无法为其提供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1]。这两者的匮乏是制约学生就业创业的隐性壁垒。

在文化资本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匮乏不仅体现在知识技能积累层面，更体现在实践经验、职业认知等领域。很多学生缺乏良好的实践机会，加之现实经济困难，所从事的实习多与专业关联度不足；同时学生也缺乏系统性的职业规划指导，很多学生在求职时对岗位认知不够准确，只是盲目地投递简历，就业成功率较低。

在社会资本维度，很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关系网，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信息获取效率和资源动员能力。学生往往难以获取优质就业信息，也无法接触到创业导师、投资人等资源，就业创业竞争存在“先天不足”。

（二）信息壁垒：供需匹配中的数字鸿沟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当前就业市场已全面进入“数字化匹配”时代，对于学生群体来说，信息获取的时效性、精准性和全面性会对就业和创业的成功率产生直接影响。大部分企业都会在线上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毕业生也普遍依赖网络渠道来获取面试、就业的机会。这使得信息获取和筛选能力成为学生就业创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但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尽管当前各大高校普遍建立了就业信息网、微信公众号等发布平台，但学生面对生存和择业的选择容易迷失方向，在信息利用中仍面临“信息过载”和“信息不足”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高校就业平台每天都会发布大量的招聘信息，但信息分类多以行业为标准，缺乏个性化筛选功能，很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择业时会受制于地域、工作时间、工作性质，面对海量信息，他们无法快速有效地进行筛选信息，浪费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创业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现有平台对地方创业政策的解读多停留在宏观的政策、文件层面，与补贴申请流程、孵化基地入驻条件、税收减免细则等内容相关的实操指南、详细解读很少[2]。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很容易因为不了解政策、错过申报时间而导致创业项目错失初期扶持机会，甚至直接放弃创业想法。

（三）能力断层：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脱节

现有的资助政策主要用于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有机会完成学业，但未能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就业

创业能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构成与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脱节问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缺失体现在多个维度，包括职业素养、实操能力、创新思维等。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高校育人模式有一定的短板，当前各大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实践教学占比低，导致学生的团队协调能力、市场调研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创新应对能力较为匮乏，不利于就业和创业；第二，高校资助体系中的“勤工助学”岗位多为基础性服务工作，如图书馆整理、校园安保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的作用有限，难以实现实践育人和就业创业之间的有机结合。

（四）风险规避：创业意愿和风险承受力的失衡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其往往是家庭经济来源的潜在“支柱”，创业前期所需要的时间、资金投入对其而言意味着更高的机会风险。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创业启动资金多依赖个人奖助学金、勤工俭学积蓄等，如果创业项目失败，不仅会耗尽个人的经济储备，还有可能延误就业时机，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3]。考虑到家庭经济压力大、机会风险过高等现实问题，学生在就业创业中往往只能采取风险最小化的策略，难以全身心投入到高潜力但不确定性强的创业项目中。

当前，针对大学生创业的资助政策主要侧重于启动阶段，多为一次性补贴，未能形成覆盖全周期的风险缓冲机制，这不仅难以激励学生开展创业，还会加重学生的风险规避心理。

三、精准资助导向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创业的帮扶路径

（一）构建资本补偿机制，破解资源约束瓶颈

针对当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困境，高校在构建精准资助体系时，要重点完善资本补偿机制，实现从经济资助到资本增值的升级，有效破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

在文化资本补偿层面，高校要从实践经验积累和职业认知深化两大维度入手，形成完善的培育体系。一方面，高校可以设立实习补贴专项基金，根据实习地域和实习岗位的技术含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差异化的补贴标准，合理保障学生在实习期的交通、住宿、餐饮等开支。同时，高校要与头部企业、行业领军单位完善实习平台，探索“实习 + 毕业设计”“实习 + 就业 offer”的联动模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4]。另一方面，高校可完善职业规划指导，采用“双导师 + 模块化”的职业规划指导模式，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配备专业教师和企业 HR 导师，并开设“职业素养提升模块”“求职技能实训模块”“行业趋势研判模块”等课程，借助“一对一”个性化指导、AI 模拟面试系统训练、行业精英专题讲座等形式，帮助学生精准定位职业方向。

在社会资本补偿层面，高校要联合政府、企业等主体，形成多元化的资源对接平台，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突破关系网狭窄的困境。例如，高校可以联合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校友企业等主体，共同组建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联盟，建立企业资源池、导师资源库、项目信息站等板块，全面整合实习岗位、创业合作项目及导师、企业家等资源。联盟还可以定期举办“行业沙龙”“校友分享会”“创业项目对接会”等活动，为学生与行业精英搭建畅通的沟通渠道。

（二）依托数字技术工具，畅通信息供需渠道

高校要充分把握数字时代发展的趋势，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工具深度融入精准资助和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之中，构建完善的信息服务机制，破解供需匹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

首先，高校要依托大数据画像和动态算法构建智能匹配系统。高校可以利用本校的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精准资助数据库，全面整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专业背景、学习成绩、实习经历、职业资格、求职意向等数据信息，并借助大数据分析构建学生个人发展画像；同时，高校要对接企业的招聘平台，全面采集企业规模、行业属性、岗位技能要求、晋升路径等招聘信息，形成企业需求画像。在采集完供需两端的画像后，高校要运用协同过滤算法和深度学习模型，实现学生与岗位之间的动态匹配[5]。高校还要设置“反馈优化”模块，学生可对推送信息的匹配度进行评分，算法将会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实时调整匹配权重，实现模型的优化迭代。

其次，高校要联合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孵化基地等主体，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高校要全面整合创业资源，为有创业意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政策、资源、案例等维度的支持。在政策方面，平台要实时更新国家和地方关于创业补贴、税收减免、场地扶持等政策，并提供申请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流程的可视化解读，手把手帮助学生进行补助申请、手续办理；在资源方面，平台要整合孵化基地工位信息、金融机构创业贷款产品等各类资源，解决学生创业资源不足问题；在案例方面，平台要定期更新创业成功案例，提供关于项目背景、运营模式的详细解析。

最后，高校要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技能培训。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存在的数字化技能短板，高校可从基础技能、专业技能、创业技能三个维度开展分层培训。在基础技能方面，高校要开设“办公软件应用”“职场数字化工具使用”等课程，帮助学生掌握简历制作、常规办公、数据可视化等基础能力；在专业技能方面，高校要根据学科特点设置“Python 数据分析”“新媒体内容创作”“跨境电商运营”等课程，重点提升各专业学生对口的数字技能；在创业技能方面，高校则要聚焦“电商平台运营”“短视频流量变

现”“线上社群营销”等数字化创业技能，邀请行业专家、资深从业者进行授课[6]。

（三）推进产教融合实践，搭建能力提升平台

考虑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当前企业的用人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高校要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重点提升就业和创业的实践技能，真正达到“资助育人”的目的。

高校要联合产业园区、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就业创业实训基地，采用项目化的育人模式，有效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和创业的能力和素养。高校和企业之间要构建完善的合作模式，明确两方主体的核心责任。高校主要负责学生的理论基础培养和日常管理工作，企业则负责提供真实项目、技术指导和岗位对接。企业要将自身的真实项目、市场需求转化为教学案例，学生以小组为形式，参与项目分析、研讨、测试等工作，高校和企业共同派驻导师进行驻点指导[7]。实训结束后，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去企业实习、工作的机会。基地还可以设置专项奖学金，从资助资金中划拨部分专项资金，给表现突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定的奖励。

高校和企业还可以共同研发“模块化 + 个性化”的定制课程，实现对学生能力的靶向培养。高校要根据企业岗位能力需求的调研结果，与企业共同构建涵盖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创业能力的课程体系。在通用能力模块，学校可开设商务礼仪课、职场沟通课、团队协作课等，并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授课；在专业能力模块，学校要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设置专门课程，并由企业技术骨干结合行业前沿动态进行授课；在创业能力模块，学校要设计“商业计划书撰写”“创业融资与股权设计”等实践类课程，并邀请有成功创业经验的校友和投资人进行经验分享。

（四）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对创业抱持着风险规避的态度，这就要求高校要构建完善的保障机制，从资金托底、风险补偿、心理辅导等维度入手，有效激发学生创业创新活力。

首先，高校要从资金层面入手，设置创业基金，解决学生在创业阶段遇到的融资难、怕亏损问题。政府要牵头设立省级创业风险基金，高校则从精准资助专项资金中划拨配套资金，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创投机构共同注资，形成多元化的创业资金池。基金主要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创业项目，提供低门槛、阶梯式的金融支持。例如，针对种子期项目，基金可给予 5 万 ~10 万元的无抵押、免担保信用贷款；针对成长期项目，基金则提供 20 万 ~50 万元的股权投资，高校以“优先股”的形式入股，不参与日常经营且在项目盈利后优先退出[8]。同时，高校还要建立风险共担和贴息减免机制，如果项目创业失败，由政府、高校、企业分担贷款的本金损失，学生仅需偿还剩余部分即可。

其次，高校要联合保险公司开发创业综合保险，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构建风险防护网。保险公司要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创业的特点，推出财产损失险、责任意外险、经营中断险、政策履约险等险种。保险费用则采用“三方分担”的模式，由政府、高校和学生个人承担。

最后，高校还要为学生提供心理指导服务，帮助学生塑造理性、敢于拼搏的创业心态。高校可将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纳入高校精准资助工作体系之中，从预防、干预等多维度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高校一方面可开设“创业心理素养”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另一方面可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帮助学生疏导情绪，提升承压能力。

四、结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高校在提供精准资助帮扶时，要注意准确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突破传统资助政策的“保障性”局限，真正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对此，高校要积极联合政府、企业等各方主体，完善精准资助体系和就业创业体系，从资本、信息、能力、风险四个维度入手，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帮助和支持。未来，高校还要进一步探索精准资助体系的完善路径，更好地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伟 . 资助育人视角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J]. 经济研究导刊 , 2023(09): 137−139.

[2] 邓珂 .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管理工作模式探索 [J]. 就业与保障 , 2022(08): 136−138.

[3] 郭冉 . 基于学生特征画像的高校精准资助系统研究 [J]. 科技与创新 , 2025(16): 107−109, 113.

[4] 张文责 , 付明浩 . 资助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路径探析 [J]. 市场周刊 , 2024, 37(31): 164−167,190.

[5] 黄嘉琦 .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J]. 新西部 , 2024(06): 191−194.

[6] 顾寿永 . 精准资助视域下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J]. 科教文汇 , 2025(21): 11−16.

[7] 韩梦利 . 浙江省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结合“双创”教育模式研究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09): 118−121.

[8] 刘赢时 , 王安东 , 罗心阳 , 等 . 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与就业互促联动机制构建与教育实践研究 [J]. 公关世界 , 2025(19): 55−57.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公益微偿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
——基于河北省保定市两试点社区的案例研究

吴金融

摘要：面向“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更高要求，公益慈善力量作为重要协同机制，其效能发挥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下沉至基层，并精准深入治理结构。本文以河北省保定市 TY 社区“公益微偿”实践为主要分析案例，以 SY 社区“慈善资源地图”案例为辅助，采用“最相近体系—不同机制”研究方法（MSSD），构建“制度—定价—信息”三元分析框架，检验公益微偿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社区治理嵌入式服务提供了可推广的定价红线、税惠政策参考，在理论层面补充了关于第三次分配与社区治理微观机制的研究。

关键词：社区慈善；公益微偿；社区治理共同体；基层治理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标志着慈善在共同富裕议程中从补充层提升为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迅速响应国家部署，于 2023 年初施行《河北省慈善事业促进办法》，打造街道慈善综合体。保定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积极探索具有河北特色的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本文以保定市 TY 和 SY 两个社区的实践为例，对公益微偿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进行探讨。

截至 2024 年，保定市常住人口有 1143.72 万人，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2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为激发慈善事业活力，2025 年初，河北省民政厅发布《关于确定河北省慈善工作改革创新试点名单的通知》，其中，保定市 SY 社区与 TY 社区被确定列入首批基层慈善工作改革创新试点。

二、文献综述

过去十年，全球慈善研究经历了从重视资源到关注治理的范式转换。国外文献较早关注慈善的第三次分配功能（Salamon, 2012）[1]，并通过跨国比较验证了慈善对政府福利的补缺效应。“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社区慈善被赋予内部自我循环治理的新期待。我国已有研究提出“结构—机制—行动”三维框架，指出只有完成成本分担 + 交叉补贴的财务闭环，慈善才能持续（谢琼，谷玉莹，2024）[2]；社区激活内部资源，进一步将向内创造活力操作化为用微利带动事件的回流模型，为微偿定价提供了本土理论雏形（胡小军，2024）[3]。但上述研究仍停留在宏观层面，对同一城市内不同机制如何嵌入治理共同体依旧缺乏可追踪的比较证据。此外，人文地理学新近提出的事件的时空耦合概念（徐越倩，2024；刘水、范炜锋，2025）[4–5]虽揭示了事件在同一空间内循环的重要性，却尚未在慈善领域进行小样本检验。

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框架内作出三点补充。第一，机制比较而非机制描述。通过“最相似体系—不同机制”方法（MSSD）设计，将定价回流与信息外放并置为同一城市内的可对照路径。第二，数据方法而非数据增量。全程使用给定政府文件与可追踪的政府平台数据，确保机制与结论的普遍性，保证小样本研究的严谨要求。第三，绩效维度而非绩效数值。将身份转换率与流量互馈率等共同体指标纳入必要—充分条件组合，在文件边界内完成逻辑检验，为政府统一采集慈善治理绩效提供可追踪模板。

三、研究设计

（一）“制度—定价—信息”三元机制的 MSSD 比较

社区慈善被赋予第三次分配与基层治理双重功能，但其微观机制尚未形成统一分析框架。本文以保定市

TY社区与SY社区组成研究组对，两试点市域财政能力、老龄化程度、党建结构等背景变量高度相似，可视为恒定。本文专注于识别不同机制对慈善可持续与治理效能的因果路径。本文试图构建制度嵌入、定价规则、信息结构三元机制比较模型，采用“最相似体系—不同机制”（MSSD）比较研究方法，将制度嵌入解构为财政与党建的双通道、制定成本和微偿并行的资金回流定价机制、用资源地图联动互联网募捐的信息共享放大外源，从而在社区层面形成可观测、可比较、可复制的三元机制谱系，为后续政策模拟提供微观基础。

（二）制度路径

制度嵌入的核心是政府权威来源与问责方式。TY社区将市财政老旧小区更新配套资金18万元与街道党建经费捆绑使用，完成80平方米锅炉房改造并登记为公建民服产权，财政出资占比64%，使慈善项目被纳入公共预算绩效评价轨道，形成财政与党建双通道的制度嵌入。该路径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财政资金的公共属性为慈善定价提供了可信承诺，降低了居民对收费变盈利的疑虑；另一方面，党建经费的政治属性为商户联盟与志愿者动员提供了权威背书，减少了契约执行成本。

相比之下，SY社区仅利用46平方米闲置办公室，未使用财政经费，其合法性主要依赖于政府授权社会组织与商户契约，制度嵌入度低但灵活性高。两种嵌入路径在权威来源、问责方式与资源规模上形成对照，为后续定价与信息机制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土壤，也验证了制度匹配的必要性：高财政嵌入对应定价回流机制，低财政嵌入对应信息外补机制。

（三）定价机制

TY社区试点创新的一大亮点是价格信号中公益与微偿相互补充。该社区在运营章程中明文写入“成本+微偿”的条件，服务定价为市场价的58%~63%，覆盖变动成本并产生微利再回到餐厅运营中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了从定价到回流再用于投资的财务闭环：回流资金用于“福利馒头、一元早餐”等交叉补贴，形成从收入中补贴与投资的另一个循环。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在公益微偿的实施过程中受益者与服务者之间的身份转换，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形成良好社会伦理风气。定价机制将象征性收费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降低了收费变盈利、搭便车的道德风险，为“十五五”时期嵌入式服务成本分担提供了成本加成5%~8%的可推广的定价红线。

（四）信息机制

SY社区通过绘制“慈善资源地图”将20余家商户的义剪、义诊、赠药等服务条目可视化，并与“一键匹配”小程序对接，使65岁以上老人需求响应时间由48小时降至6小时，创建数字平台，使信息可视化，让搜寻成本下降为服务提速。同时，社区协助困难家庭通过“水滴筹”平台募集3.2万元，相当于该社区2024年前三季度慈善基金支出的28%，通过互联网筹集外源资金，内化放大社区慈善资金池。将社区之间地理位置上的局限性转化为数字信息的无限空间，采用网络参与、短视频等方式赋予居民故事传播者的身份，强化情感共鸣，增进居民的社区认同，为数字惠民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操作方法。

综上所述，本文在已有基层治理工作开展研究边界内，通过MSSD设计，构建了一个“制度—定价—信息”三元机制比较框架，既验证了制度嵌入决定机制选择的宏观命题，也补充了定价回流与信息外化两条微观路径，为后续社区慈善政策模拟与理论检验开展拓展与补充工作。

四、双轨运行的慈善治理路径

（一）事件的时空耦合

从“场所—事件”互构的耦合视角出发，TY社区“幸福能量站”就是一个被持续赋予治理功能的慈善综合体日常治理节点。社区将80平方米慈善会客厅通过乡村振兴区、冷饮补给区、医疗应急角、棋艺休闲区、时光书吧区、心灵驿站等多个功能板块的形式运用起来，实现了功能分区，使空间被切分为可计量、可预约、可以使成本回流的微观场域。如TY社区早晨会有志愿者准时到会客厅送来爱心早餐，将此事件锚定于会客厅内的助餐区，形成“空间—时间”的双重绑定，产生的微利再回流到餐厅运营中，与同一物理边界内的再投资行为紧密耦合，使事件在空间内完成资源闭环。由此，空间不再是被动的地点，而是通过事件的反复嵌入和语义的持续命名，转化为可以计算治理的微观单元，试点社区完成了场所即治理的质性转换。

相比之下，SY社区的社区下沉式活动广场，通过数字化平台开设的“慈善资源地图”将社区活动场域通过预约查看的方式进行提前规划，且通过地图事件拓展外放、将物理空间的局限性转化为数字空间的无限扩展性，在社区尺度内完成信息即治理的质性转换。

（二）身份、情感转换

在定价回流机制持续运行下，TY社区出现明显的身份转换现象：社区内参与上门做饭补贴已用的低龄老人累计147人，其中86人取得社区颁发的“助餐技能证”，并进入街道灵活就业人才库。该证书并非外部职业资格，而是社区内部承认的服务股权，可与幸福积分互通兑换商品折扣，形成用技能兑换积分，积分可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三级权益链。由此，受益者不再只是受助对象，而是拥有可交易权益的社区股东，其尊严感来源于可出售的技能，而非免费的施舍，享有的福利来源于能力取向的劳动所得。调查发现，社区内取得证书的志愿者注册率由28%升至64%，是一条可行的通过技能确权，在提升公共参与的同时帮助社区居民找到情感归属的递进路径，为“十五五”时期“银发经济”中的低龄老人再就业提供了可复制的社区方案。

相比之下，SY 社区并未构建类似的技能确权路径，而是培养居民为数字平台故事传播者：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低龄老人、有意愿的居民拍摄生活记录类短视频，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实现了情感认同的闭环，居民主体意识提高，以叙事代替治理，将物理空间的局限性转化为数字空间的无限可能。

（三）商居联盟

在数字化与积分兑换的叠加作用下，两个试点社区将“银发主播”视频流量转化为商户实际销售：现有数据记录显示，短视频播放量 1.37 万次，平台核销折扣券 2198 份，拉动参与商户营业额 6.2%。商户让利额（9.5 折）累计 1.21 万元，相当于当月社区慈善基金支出的 21%。由社区牵头、从流量出发、发放消费券、带动销售增长，形成让利回流，实现商家居民共赢的循环。慈善不再只是单向的政府或企业赠予，而是利用互联网搭建一个流量互馈的平台，商户通过曝光获得客流，社区通过让利获得资金，双方达成交易即慈善的共识，将商业与公益的二元对立转化为共享流量的共赢逻辑。走访调查发现，TY 社区居民参与商户的重复签约率达 94%，慈善即流量的微观机制有持续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复制成本也在各阶层居民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四）绩效边界

本文构建的必要充分条件组合为以完全不包含政府补贴的资金自给率为充分条件，以身份转换率为必要条件，调查发现：TY 社区资金自给率为 62%，身份转换率为 46%；SY 社区资金自给率为 38%，身份转换率为 42%。该结果验证了定价回流是达到高绩效的充分条件，而身份转换是跨越所有案例的必要条件，可形成条件到结果的逻辑自洽，在方向性上验证了慈善与治理的正相关性，为后续政府开展嵌入式服务工程提供了可追踪的绩效边界与数据采集模板。

五、相关建议

（一）国家与地方政府层面

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区基层治理必不可少的顶层设计指导环节，应加快完善社区慈善的政策立体化，完善立法，将公益微偿纳入基层治理与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可参照保定市 TY 社区成本加成 5%~8% 的服务定价红线，并配套相应的税收优惠与财政奖补政策，激发社区资金自收自支的运转能力。同时，推动建立统一的社区慈善绩效评估体系，可以参照本文的指标体系，将资金自给率、身份转换率等指标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与街道考核范围，实现从资源输送到机制赋能的治理转型。

（二）社区自治层面

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要主动承担主理人的角色，推动慈善空间的功能复合化与慈善事件时间上的有序安排。基层社区组织可以借鉴 TY 社区的“幸福能量站”模式，将闲置空间改造为多功能慈善综合体，并通过线上预约机制锚定具体时间，实现公益场所治理的时空耦合。同时，慈善社区可以建立技能与权益的积分兑换治理体系，推动本地低龄老人、志愿者等群体从受益者向服务者、社区股东转变，提高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与参与感，增强治理的内生动能。此外，社会组织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工具发挥其枢纽作用，开发轻量化、可复制的数字工具，降低信息匹配成本，促进社会治理与居民生活深度融合。

对于慈善机构而言，其目的应从项目资助转向生态共建，探索公益微创的微慈善基金路径，支持居民发起小微公益项目。同时，应加强与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协作，将全国性募捐资源精准下沉至社区，形成大平台与小社区的资源联动模式，使慈善资源响应更有效率，更加透明。

（三）企业层面

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借鉴保定市 SY 社区商居联盟的慈善形式，企业可以通过让利销售、流量反哺、技能培训等方式积极融入社区慈善生态，探索消费即捐赠、流量即慈善等新型公益模式，将企业社会责任资源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可持续资本，实现商业效益与公益价值的深度融合。

（四）居民与志愿者层面

居民应树立邻里互助、劳有所成的现代慈善观念，有意识关注社会慈善活动，积极参与社区发起的微偿服务与技能认证，通过服务获取积分、提升能力、增强归属感。低龄老人、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可主动转化为社区股东，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文化。

综上所述，公益微偿不仅是社区慈善的实现形式，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路径。它通过机制创新激活了社区内部资源的调用与资金的流通，打通了第三次分配在基层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持续的社区方案。未来，应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机制试点与政策模拟，推动社区慈善从案例经验走向制度体系，为中国式治理现代化提供基层样本。

参考文献

[1] Salamon L M. The State of Nonprofit America[M].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2] 谢琼，谷玉莹．结构—机制—行动：社区慈善及其内生动力的发展机理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46(02): 66−75.

[3] 胡小军．社区慈善的实践模式与发展支持体系构建 [J]. 社会工作与管理，2024, 24(06): 90−100.

[4] 徐越倩，许文颖．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街区慈善生态形成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慈善（下转 33 页）

中国公益文化融入日语通识教学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究

赵蓉翔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亟须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公益文化作为连接社会、个体与文明价值的重要纽带，其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已成为现实课题。本研究以“社会与公益”为切入点，探索中国公益文化融入日语教学的路径，旨在提升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采用案例比较法，通过分析不同教学情境下学生的文化表达与传播效果，评估教学干预的实际成效。研究表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借助日语讲述中国公益故事的能力，在增强其对公益文化理解与认同的同时，也为日语学习的跨文化输出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中国公益文化；日语通识教学；跨文化交际；国际传播能力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教育需推动从“工具性”向“人文性”与“专业性”融合转型，重构课程体系，创新实践教学与评价范式，培养具有扎实学识的外语人才。其中，日语作为外语教育中的重要学科，在以往传统教学中，偏重于让学生输入日本文化相关的知识，而在输出方面，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具有当代社会价值文化的输出上仍然存在缺失。学生虽然积累了足够的语言知识，但口头表达能力仍然不足，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亟须提高。

基于以上背景，如何将蕴含社会价值的中国公益文化有机融入日语教学，并以此切实提高日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中国公益文化的内涵与对外传播价值

（一）中国公益文化的内涵

中文“公益”一词在今天是常见用语，基本表示“公共的利益”，并常与“慈善”连用而呈现“公益慈善”的整体表达[1]。结合这一说法，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公益”的理解就是出于仁爱之心而从事帮助以及关爱他人的行动。中国的传统公益伦理与儒家的“仁爱说”以及“行善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周秋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宣扬性善为主的文化，中国人行善以“人性为善”为出发点，人之所以行善，是因为人本身就是善良的，这也是对自身行动价值的肯定[2]。在此基础上，中国公益文化吸收了西方的公益理念，逐渐从单个人的“善意行为”向现代社会有组织的“公益活动”模式转变。

文化是推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创造了文化，而文化的探索与传承，又进一步助力人的全面发展[3]。中国公益文化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在公益行动中用真诚的心灵传递爱与责任，既改变他人也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公益文化的对外传播价值

公益传播与其他营利性的商业活动不同，公益传播的重点在于“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伴随“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不仅商品贸易要走出国门，中国文化同样需要走向世界。公益文化作为中国文化

（上接32页）

基地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J]. 社会政策研究，2024(02): 81−92, 134−135.

[5] 刘水，范炜烽．公益动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重塑的慈善路径研究——以N市YFM慈善基金会为例 [J].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2025, 29(01): 112−133, 284−285.

（作者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传播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通过对外传播，公益文化可以跨越文化壁垒，以贴近生活的公益行为传递责任感与善意，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以人为本”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三、日语通识教学中中国公益文化的融入

（一）日语通识教育现状分析

在传统日语通识教学中，往往更加注重中日语言之间的转换练习，核心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五十音和一些基础的会话，除此之外，也会融入大量的动漫、历史、礼仪、文学文化等相关的话题。但是，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多以日本文化输入为主，如日本的传统技艺——相扑、日本的茶道文化、日本的春节习俗等。上课内容也侧重于让学生了解掌握日本相关内容，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输入较少，学生在这方面的锻炼也较少。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基础的语言功底，却很难用比较流畅且连贯的语言介绍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公益文化。因此，在培养日语通识人才时必须坚持“两维并重”，既要培养学生扎实的语言技能，也要切实提高其人文素养和逻辑思辨能力[4]。

（二）课程设计与实施

1. 教学对象与课程设置

本课程教学对象主要为大学日语通识课学习者，学生学习水平处于 N4 程度，具备基础的日语语法知识和词汇积累，能够阅读短篇文章并撰写较为简单的议论文。学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日语输出表达方面还比较薄弱。如何用日语表达中国本土化的话题是学习锻炼的重点。

课时设置上，每周 4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共计 4 周。教学场地为配备可移动桌椅的多媒体教室。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方式[5]。课程以“中国公益文化”为主题，采用内容与语言融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兼顾对学生语言能力的提升与文化传播素养的培养。课程最后以小组提交拍摄的公益短视频为基准进行评价。

2. 教学内容设计

课程主要围绕“中国公益文化”这一主题，选取 3 个具有代表性且在日本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案例，每周花费 4 个学时讲解一个案例，第四周课上检测课程完成后的学习成效。案例选择标准为：具有中国文化辨识度、有日文媒体报道或者可以日译的资料等。这些案例大多涵盖不同领域，能够引发学生关于跨文化的思考与讨论。

（1）案例 1：患难见真情——汶川地震中的志愿服务

课堂上选用《朝日新闻》中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以及 2023 年（汶川地震 15 周年纪念）等相关报道，重点围绕“志愿者”“灾难救援”等关键词，通过文本分析，引导学生理解中国的志愿者在灾难救援中的组织特点，除去一般情况下的政府主导，还包括各方各界的主动支援。同时，将中国此次的灾后支援与日本的“3・1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做对比，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志愿服务的特点。

（2）案例 2：环保促发展——蚂蚁森林中的环保服务

结合国内外对蚂蚁森林的介绍以及蚂蚁森林十周年的相关新闻，围绕“环保低碳”“绿色”等词汇，与日本的“YaHoo! グリーンチャレンジ”（日本雅虎公司发起的一项环保倡议）作对比，结合蚂蚁森林中通过践行绿色行为获取能量种树的活动，重点突出游戏化在公益动员中的作用，并学习用日语解释“碳中和”“碳积分”等新概念。

（3）案例 3：技艺传文化——日中非遗漆艺交流中的文化传承

结合上海 2025 世久非遗国际交流会的召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合作，中日两国漆艺传承人相互访问，会议全程公益免费的新闻报道，围绕“漆艺传承”“文化创新”等关键词，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传统工艺传承的急迫性，同时学习与漆艺相关的日语表达，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

3. 教学活动示例

案例展示部分重点依据“观察”“理解”“掌握”的阶段性原则，课上以学生为主体，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课堂设计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公益文化的内涵进行简化提炼，及时布置输出型训练，让学生学以致用。以汶川大地震中志愿活动的案例为例。

首先，课前给学生分组，课堂展示日本相关媒体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以及教师补充的一些日语辅助材料。随后，让每个小组阅读材料，组内成员相互合作，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整理中国志愿服务的特点。具体思考：中国志愿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日本的志愿活动有什么特点？与中国有什么不同？学生讨论时教师巡回指导，为有疑惑的小组答疑。小组用日语讨论结束之后，每组推选一位代表对小组讨论的内容进行 2 分钟左右的汇报。最后，教师结合各小组汇报的整体情况，从对比表达准确性与文化解释合理性两方面进行点评反馈。

课后，要求学生以“生活中遇到的公益”为题，拍摄 1~2 分钟的日语短视频，视频内容可以是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公益活动，如社区服务、旧衣物回收等，也可以以自己了解到的其他公益案例为摹本，拍摄相关视频。视频的具体评价标准包括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内容的完整性与感染力、是否具有创意等。教师提供相关日语字幕范例供学生参考。每周第二次课课前进行小组展示。这一任务的目的是让学生将理解的知识

内化为真实的跨文化输出。

4. 教学实验流程

为更加直观地了解学生课程前后的学习成效，课程开始前借助学习通设置课前测试，让每个学生尝试用日语介绍一则中国公益故事。预期部分学生可能会出现语言表达不顺畅、词汇量不足等情况。经过 4 周干预教学，课上课下不断地进行输出训练。在最后一周进行课后测试，同样还是课前测试的问题，让学生经过四周的系统训练之后再次尝试表达，从相同任务的内容深度、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以及文化解释方面着手评价学生的具体成长。通过这一对比，可以更加清晰直观地反映出公益文化融入日语通识教育对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与促进作用。

（三）教学效果分析

1. 案例比较分析

不同公益案例在教学内容、文化距离和语言挑战上存在不同的差异，导致学生对每一案例的理解深度和表达的主动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

在“汶川大地震志愿服务”这一案例中，各个小组的讨论度最高。学生能够普遍理解灾害发生时救援的紧迫性、严重性以及身赴救援第一线的志愿者的志愿精神。在课程教学中，学生可较为直观地辨析中日两国在救灾活动中“志愿服务”与“救援行动”的共同特征与差异之处，部分优秀学生甚至可以主动尝试着用日语表达中日两国不同的志愿者救助模式。

“蚂蚁森林”案例在激发学生自我表达方面成效最为显著。该案例贴近生活，学生能够非常自然地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验，用支付宝攒能量、种树等，且该案例相对于其他案例较为新鲜有趣。由于该案例涉及游戏化攒能量、绿色出行、碳排放等概念，部分词汇量积累不足的学生难以用日语表述这些概念，不得不在讨论时混杂中文。公益活动可小可大，小到日常生活中的随手善举。这表明贴近生活的创新型公益形式虽然受欢迎，但是仍需要人们去了解，并有配套充足的语料支撑。

“中日漆艺交流”这一案例的优势在于公益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学生普遍能够感受到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睦邻关系。但在涉及日语表达时，相关专业词汇较难，学生往往表达不到位，对中日之间漆艺传承的历史背景这一深层原因的解释较少。

2. 内容分析

结合学生课上讨论以及课后完成的视频，从中可以分析得出，对于这三个案例，学生应用的关键词也各不相同。首先是现代公益支援类，经过课上的学习讲解，学生比起课前测试，在课堂以及课后使用“「支援」「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参加する」”等日语词汇的学生明显增多，说明学生对志愿服务相关词汇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能较好地区分一些相近短语的差别。其次是环保公益服务类，借助贴近生活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学生的学习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习的效率。在短视频制作时，比起以前，部分学生已经开始主动意识到中国公益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为了更方便目的语国家受众的理解，还会下意识地加注解释。最后，在文化认同上，中日之间的历史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更深了，也深刻理解了中日之间公益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在发表时使用价值观念相关关键词的频率也更高了，这也说明通过教学有效干预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公益文化的认知结构。

四、结语

本研究探索了在日语通识课程中融入中国公益文化的教学路径。基于为期四周的教学实践及学生课程前后的表现对比，结果表明，以“社会与公益”为主题的中国公益故事的教学设计，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用日语讲述中国公益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语言层面上，学生通过课堂认识掌握了不同案例下的相关专有词汇；认知层面上，深化了对中国公益文化的特色与优势的理解；文化传播层面上，借助课后拍摄短视频与课堂发表，学生初步具备了将中国公益相关内容转化为日语并向日本受众阐释的意识。

研究尚存局限，学生能否将所学能力迁移至其他课程仍有待观察。但从长远来看，用日语讲述中国公益故事仅是起点，未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同样亟须日语人才承担起传播与表达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武洹宇 .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 : 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J]. 社会科学文摘 , 2018(12): 58−60.

[2] 周秋光 , 万佳敏 . 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演进、社会作用机制与当代发展挑战 [J]. 公益研究 , 2025(02): 20−32, 134−135.

[3] 马玉 . 抓文化建设促乡村振兴 [J]. 村委主任 , 2026(02): 58−60.

[4] 向卿 , 王莉薇 . 新文科背景下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黑龙江教育 (高教研究与评估), 2023(01): 1−5.

[5] 陈李鹏 . 智能媒体语境下公益短视频传播困境与策略 [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5, 27(01): 20−23.

（作者单位：郑州商学院）

“1+3+X”模式下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育人策略探讨

陈大千

摘要：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是高校落实育人使命的重要路径。“1+3+X”模式即以党建引领为“1”个核心、以学生党支部、学院学生会、志愿服务类社团为“3”方协同主体、以多样化志愿服务为“X”拓展内容，构建系统高效的育人体系。本文立足青年成长规律与志愿服务发展逻辑，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协同治理理论、实践育人理论为支撑，从党建引领核心定位、多元主体协同架构、多样化服务创新路径三个维度，探讨模式运行机理与实践策略。通过明确党建引领价值锚点与制度保障，优化多元主体分工与协同机制，拓展志愿服务场景与形式创新，实现青年志愿服务与育人目标深度融合，为高校提升青年思想政治素养与实践能力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1+3+X”模式；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育人策略

一、党建引领的核心定位与理论根基

（一）价值引领的理论内核

价值引领是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育人的核心，理论根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与理想信念教育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强调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使青年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党建引领下的青年志愿服务，正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融入服务实践，让青年在奉献中深化对价值追求的认知。理想信念教育理论则突出青年理想信念对成长成才的关键作用，党建引领通过明确志愿服务的价值取向，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志愿服务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实践课堂，确保育人工作不偏离正确方向。

（二）组织引领的实践依托

组织引领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组织行为学中的组织建设理论与领导力理论。组织建设理论强调健全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工作效能的基础，党建引领通过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志愿服务的育人优势。党组织作为志愿服务的领导核心，能够整合各类资源、统筹各项工作，为志愿服务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领导力理论则注重领导者的引领作用，党员干部在志愿服务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自身的示范引领激发青年的参与热情，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局面，使组织引领成为推动志愿服务持续开展的重要动力。

（三）思想引领的传导机制

思想引领的落实需要依托思想政治教育传导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传导理论强调，思想教育需要依靠合理的传导路径与有效的传导载体，才能实现思想内容的精准传递。在党建引领下的青年志愿服务中，以服务实践为传导载体，把党的创新理论、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具体服务场景，让青年在实践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熏陶。认知心理学理论着重指出个体认知的形成与实践体验密切相关。思想引领通过搭建实践平台，引导青年在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他人与社会的过程中深化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理解，实现思想认知的升华——这也使思想引领成为提升志愿服务育人实效的核心环节。

二、三方协同的实施框架与运作逻辑

（一）协同治理的理论支撑

三方协同的实施框架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核心支撑，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多元主体打破壁垒、协同合作，通过高效整合各类资源，达成治理效能的最优提升。在青年志愿服务育人工作场景中，学生党支部、学院学生会、志愿服务类社团作为关键参与主体，各自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清晰的功能定位。协同治理理论为三方主体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坚实理论锚点，既能有效破解单一主体运作的局限，又能在明确各方权责边界、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促成三方优势互补、同向发力。与此同时，该理论尤为重视多元主体间的动态互动与深度协作，主张通过信息互通、资源统筹、行动协同等路径，精准破解志愿服务中的各类复杂问题，这为三方协同框架的构建与长效运作筑牢了理论根基。

（二）三方主体的功能定位

学生党支部的核心功能在于价值引领与组织保障，凭借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优势，为志愿服务校准正确方向，以党员的先锋模范行为带动广大青年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学院学生会的功能侧重活动策划与动员组织，依托广泛的学生联系面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统筹志愿服务活动的整体策划、宣传动员及流程管理，为志愿服务的顺畅推进搭建坚实平台。志愿服务类社团的功能专注于专业执行和志愿者能力提升，发挥在志愿服务项目设计、志愿者培训、活动落地执行等环节的专业特长，保障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和实际成效。三方主体依据各自的功能定位，构建起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的协同工作格局。

（三）协同运作的实现路径

资源整合是三方协同的基础路径，通过着力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有效整合党支部的组织资源、学生会的宣传资源与社团的专业资源，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根本上避免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信息互通是协同运作的关键环节，需构建常态化沟通机制，确保三方在活动策划、执行、总结等全流程及时共享信息，快速响应需求、精准解决问题，切实提升志愿服务的响应效率与衔接质量。行动协同是协同运作的核心目标，通过清晰划分活动流程中的责任分工，形成“党支部引领方向、学生会统筹协调、社团落地执行”的高效闭环运作模式，推动三方力量深度融合形成合力，持续提升志愿服务的整体质量与育人实效。此外，为进一步强化三方协同黏性，可建立“月度协同例会 + 季度成效复盘”机制：每月围绕志愿服务项目推进情况开展沟通会商，及时解决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每季度结合服务成效进行总结复盘与优化调整，动态校准协同策略，确保三方协同始终保持高效运转状态[1]。

三、多元服务的创新路径与实践维度

（一）需求导向的理论依据

多元服务创新以需求层次理论和社会需求理论为支撑。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兼具多样性与层次性。青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时，既有参与体验、社交互动等基础需求，也有实践能力提升、个人价值实现等高层次需求。因此，多元服务形式的设计要充分观照这些多样化需求，才能有效激发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社会需求理论则着重强调，志愿服务要贴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聚焦社区服务、环境保护、助学帮扶等社会关注重点。通过这样的定位，志愿服务既能满足青年成长需求，又能回应社会发展诉求，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2]。

（二）服务形式的创新方向

线上线下融合是服务形式创新的重要路径。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线上志愿服务平台，可开展线上支教、公益宣传、远程帮扶等活动，这样一来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还能有效拓展志愿服务的覆盖面。与此同时，结合线下实践活动，组织青年深入社区、乡村、企业等一线场景开展面对面的志愿服务，更能增强青年的实践体验感。跨域合作服务是另一个创新维度。推动跨校区、跨地区志愿服务联动，整合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共同开展大型公益项目、联合支教、跨区域环保等活动，既能拓宽青年视野，也能提升其团队协作与跨区域沟通能力。个性化定制服务则需要聚焦不同服务对象的具体需求，设计差异化的志愿服务项目。例如，为特殊群体提供精准帮扶，为社区打造定制化的文化服务等，这些做法能显著提升志愿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实践育人的融合路径

将知识应用融入志愿服务，推动青年把专业所学与服务实践紧密结合，在志愿服务中检验学习成效、提升专业技能。例如，理工科学生可开展技术帮扶、科普宣传等服务，文科学生则可提供文化服务、政策解读等支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一过程中，可建立“专业导师 + 志愿服务”联动机制。依托专业教育中“导师引领”的育人思路，让专业教师担当志愿服务项目的指导顾问，结合学科前沿和社会需求，带领着学生设计具有专业特色的服务方案。例如，环境工程专业导师可带领学生进行区域环境调研和环保宣传，帮助学生将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等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服务能力；教育类专业导师可指导学生设计支教课程体系，确保支教内容既符合教学规律，又能满足受教群体的学习需求。这种联动机制不仅能提高志愿服务项目的专业水平，还能使青年在导师引导下更精准地把握知识应用的方向和方法，避免盲目服务，实现精准育人和有效服务的有机统一。同时，还要把品格锤炼融入志愿服务，借助服务中的困难挑战、人际交往，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以及沟通和抗压能力，让志愿服务成为锤炼意志品格的重要平台[3]。

四、育人策略的优化机制与保障体系

（一）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

激励机制的搭建始终以各类激励理论作为核心支撑，既涵盖强调物质与精神激励并重的双因素理论，也包含聚焦个人成长发展的成就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认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行为动机，因此机制设计既要为志愿者提供补贴、实践证明等必要保障，也要通过评优表彰、成果展示等方式强化精神激励，以此充分调动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成就激励理论则着重通过设定合理目标、创造成长契机，让青年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收获成就感与归属感，进而激发其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最终形成“参与—成长—激励—再参与”的良性循环[4]。

（二）评估机制的构建逻辑

评估机制的搭建始终以教育评估理论与成效反馈理论为逻辑支撑。教育评估理论的核心在于平衡过程与结果、定量与定性，评估内容既涵盖志愿服务参与人数、服务时长等基础量化指标，也包含服务质量、育人效果、社会反响等深层定性维度。成效反馈理论的关键在于评估结果的落地应用，通过构建常态化反馈渠道，及时收集服务对象、青年志愿者、组织主体等各方意见，全面掌握志愿服务的开展实况与育人实效。结合评估结果优化项目设计、调整协同模式，进而形成“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推动育人质量不断提升。

（三）保障体系的完善策略

资源保障是育人策略实施的基础，应整合学校、社会、企业等多方资源，为志愿服务提供场地支持、资金保障、物资供应等必要条件；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循环利用，为多元志愿服务的开展提供坚实支撑。制度保障是关键支撑，需制定完善的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志愿者培训制度、协同合作制度、安全保障制度等，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志愿服务有序开展。队伍保障是核心力量，应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系统化的培训体系，提升志愿者的服务技能、沟通能力、应急处理能力等；同时，注重骨干队伍培养，选拔优秀党员、学生骨干担任志愿服务带头人，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志愿服务队伍[5]。

五、实践应用的价值转化与现实意义

（一）个体成长的价值实现

“1+3+X”模式下的育人策略为青年学生成长铺就了全方位支持路径。以党建引领校准价值航向，靠三方协同搭起实践舞台，借多元服务拓宽成长通道。在志愿服务中，青年学生的实践、沟通、协作等综合素养得到明显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也在实践中不断锤炼，理想信念愈发坚定。个人价值在服务他人与社会中充分彰显，为未来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打下扎实根基。这一价值转化过程顺应了青年成长成才的内在规律，助力他们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二）校园生态的优化效应

该育人策略的实践应用有助于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生态。志愿服务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激励更多青年学生参与其中，形成“人人参与志愿服务、个个践行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同时，三方协同的运作模式促进了校园内部各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打破组织壁垒，增强校园组织的凝聚力与协作力。党建引领下的志愿服务育人工作，还能丰富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实践性、感染力，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协同育人、全员参与”的校园育人生态。

（三）社会服务的实践价值

“1+3+X”模式下的青年志愿服务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多元服务形式为社区、乡村、企业等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在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助学帮扶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实际问题。青年学生以志愿服务为纽带，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国情民情，将青春力量注入社会发展，为社会进步贡献智慧与汗水。同时，志愿服务活动搭建了高校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促进高校资源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实现高校育人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6]。

六、结语

“1+3+X”模式下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育人策略，以扎实的理论为支撑，构建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多元服务、机制保障、价值转化的完整体系。该策略立足高校育人实际，既突出党建引领的核心地位，又注重多方力量的协同发力，更强调青年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为提升高校青年志愿服务育人实效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呼继忠，王贺．党建引领强思想多措并举促成长——锦屏电厂以人为本，加强青年员工队伍建设 [J]. 国企，2024(18): 49−50.

[2] 李智，何伟贤．党建赋能学校青年党员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探寻 [J]. 河北教育（综合版），2024, 62(09): 52−53.

[3] 徐建军．开展党建共建让青年员工跟班学习 [J]. 中国石化，2024(08): 80.

[4] 庞翠，李晶．党建带团建机制下青年团员政治成长培养研究 [J]. 吉林教育，2024(20): 30−32.

[5] 邬泽．基层党建工作服务促进军工企业青年职工快速成长及科研能力提升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2024(18): 91−93.

[6] 汪海洋，李丹丹．党建引领青年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探析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 37(10): 136−13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时代新人铸魂工程”专项课题——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实践育人）“‘1+3+x’模式下党建引领青年志愿服务实践育人路径探究”。

（作者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福利院“类社区”化发展实践探索
——基于 F 区福利院精神康复服务的研究

王 晗 刘 芳* 邢 莉

摘要：针对传统精神康复福利院存在的院民社会性发展抑制、功能“去社会化”、协同机制断裂等困境，F 区福利院创新构建“类社区”模式。以物理、社会、文化、服务四维环境重构为核心，打造分级化空间治理、跨代际互助网络等特色实践，依托三重机制保障服务长效运行。经 6 个月干预，213 名院民中 80% 掌握生活自理技能，活动参与度从 28% 升至 46%，日均社区接触时长从 1 小时增至 4 小时，有效破解社会融合难题，为公办机构提供可复制范式。

关键词：精康融合；精神康复福利院；类社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一、问题缘起：传统精神康复福利院的发展困境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 660 万人，且人数仍在继续增长[1]。传统精康福利机构作为“精康融合”的重要环节，面临着院民社会性发展抑制、“去社会化”、服务协同断裂等“社区脱离”困境。基于此，F 区福利院提出“类社区”发展模式，通过物理、社会、文化、服务四维环境重构，探索机构内社会融合的新路径。

二、“社区脱离”具体表现与成因分析

（一）“社区脱离”具体表现

1. 院民社会性发展抑制

F 区福利院实行“围墙隔离 + 分区封闭”管理，院民活动区域受限，跨区需医护陪同，从空间层面抑制其社会性发展；同时服务重心偏向基础养护，无暇组织有针对性的社交活动，从社交层面加剧社会性发展抑制。

2. 院民功能“去社会化”

精神需求的持续缺失是更深层次的社区脱离，院民不仅缺乏必要的社交技能和实践经验以应对社区环境的复杂性，更可能因长期隔离而产生对社区环境的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恐惧感，导致功能“去社会化”。

3. 协同机制断裂

福利院协同机制存在结构性断裂，社区资源、志愿力量难以持续有效导入，致使院内服务“孤岛化”，缺乏主动参与社区生活的渠道，阻碍精神障碍院民的社会融合。

（二）“社区脱离”成因分析

1. 结构性管理缺失

精康护理的人力缺口导致难以实施精准管理，只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法，由此造成不同自理等级的院民混居，既剥夺了自理院民的活动空间，又迫使重症院民参与超出自身能力的活动，额外挤占有限的管理资源。

2. 制度化隔离

福利院组织化的生活流程与活动限制，切断了院民与社区的常态接触，形成制度性区隔，这不仅导致院民相关交往能力逐渐匮乏，更直接削弱了他们参与社会互动的信心与内在动机。

3. 交换—融合机制缺位

社区与福利院间缺乏制度化合作渠道与平台，导致自组织、企业等外部资源难以有效汇入院内，院民自身技能与社会价值也无输出途径，无法形成资源互补的良性循环。

三、研究理论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理论

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其将社会环境中的系统简单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2]，需从环境与个体动态关系破解问题。通过三层系统联动分析，最终具象化为物理、社会、文化、服务四维干预路径，为“类社区”模式构建奠定基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定量层面通过数据分析量化全体院民基本情况，定性层面以实地调研等文本材料补充完善，二者相互印证，最终系统总结归纳“类社区”化的实践路径。

四、“类社区”模式的核心建构：内涵与打造优势

（一）核心内涵

“类社区”是F区福利院响应“精康融合”要求、满足院民需求的关键策略，通过在机构内模拟真实社区生态，助力精障院民从机构隔离向社区融合平稳过渡。

（二）福利院“类社区”打造优势

1. 制度性优势

F区福利院作为公办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天然具备社会信任与民众认可度，为“类社区”模式提供背书。依托公办属性强化部门联动，通过系统性评估筛查、建立专属档案等，有效规避服务风险与康复标准不达标等问题。

2. 组织性优势

F区福利院儿童部、老年部、精神护理部三部合一的组织优势，有助于打造跨代际共处的“类社区”环境，既有助于营造良好社交氛围，又有利于模拟自然社交生态，为院民提供日常社交实践机会，重建社交能力。

3. 资源性优势

作为隶属民政系统的公办福利机构，F区福利院既能精准对接医疗救助、专项扶持等多元政策资源，实现精神障碍院民服务需求全覆盖；又能依托政策赋权优势，联动卫健、残联、街道等，快速统筹医疗、社工、志愿者等服务力量，为模式运行赋能。

五、“类社区”模式实践路径：四维环境重构

（一）设计逻辑

依托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从三个系统打造“类社区”模式：宏观层面以“差异化改造＋开放区打造”推动物理环境转型；中观层面构建跨代际互补的结构化社交生态；微观层面提供“养护＋康复＋社会功能恢复”一体化服务，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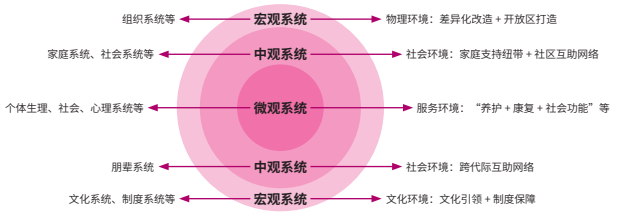


图1 福利院“类社区”模式图

（二）具体实践

1. 物理环境

差异化改造。F区福利院引入专业评估体系，结合院民行为特征与康复需求梳理差异化诉求，将物理空间划分为高、中低功能活动区。高功能区面向症状稳定、有社交意愿的院民，设置康复实训区并配备可移动隔断；中低功能区采用低刺激设计，平衡基础功能与低强度社交，破除同质化空间对康复的抑制。

开放区打造。为破解“孤岛化”与污名化问题，F区福利院打造开放区空间。一方面作为院社过渡带，设立联合活动厅、家庭探视区，常态化开展融合活动提升院民社区参与度；另一方面作为资源交换通道，推动机构专业资源下沉社区并引入外界优质资源，形成双向赋能循环。

2. 文化环境

文化引领。F区福利院秉持全人发展理念，构建双向互嵌的文化认同场域。对内组建“类家庭”单元、设立互助基金，强化院民归属感，同时赋予院民在医疗许可范围内的服务自主选择权，实现从“被动受助”到“能动参与”的根本转变。对外借助开放区展示墙、媒体专栏等培育社区助残爱残氛围。

制度保障。社会保障法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3]。依托法定职责，F区福利院将政策转化为责任明晰、流程标准的院内规程，并组建院民家属在内的多元主体议事会，保障知情权；同时通过班组协商、情境示范等柔性手段培育内生规范，推动行为规范从强制转向自觉。

3. 社会环境

跨代际互动网络。F区福利院充分发挥儿童、老年、精神护理部三部合一的组织优势，构建“资源互补＋结构化互动”网络。深度挖掘儿童的活力、老人的生活经验与精障院民的潜在能力等差异化禀赋，让三类群体各展所长、互助互补，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共生循环。

家庭支持纽带。以家庭为干预核心，分三阶段推进。一是开展结构化心理教育与技能培训；二是结合家庭功能、经济状况等评估，制订个性化康复计划；三是构建多元支持网络，提供政策导航、法律援助并策划社区融合活动，形成家庭、福利院、社区赋能循环。

社区支持网络。以“五级治理＋透明协同”机制构建社区、街道、福利院、公安、精防站联动网络，明确康复、就业等职责，推动模糊协作转化为契约化共治。

4. 服务环境

养护服务。福利院构建“医护＋护理员＋社工”多元协同团队，制定标准化服务流程，通过“每日交接—双周对接—月度总结”三级机制，实现院民养护闭环管理。在用药管理方面，定期邀请药剂师培训，实施个性化用药方案与动态依从性监测；生活自理训练则以班级制模拟生活场景，开展基础技能培训，有效缓解护理压力。

康复服务。F区福利院规范整合精神康复服务保障院民权益，构建“院内—家庭—社区”资源对接网络，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服务覆盖生理与心理维度，生理上设专业康复区，开展八段锦等健身活动；心理上聚焦情绪管理与心理韧性建设，缓解院民情绪压力。

社会功能恢复。福利院兼顾院民价值实现与社会参与，通过艺术疗愈培育特长、联动企业工疗搭建辅助性就业渠道，鼓励院民参与轻度服务与公益实践，助其重建社交能力，实现从“被动受助”到“价值输出”

的转变，巩固社区融入基础。

六、“类社区”运行机制

（一）制度性创制

“类社区”模式摒弃以往刚性统一的管理手段，以需求为导向构建柔性转化机制，通过日常交流等形式收集院民诉求，实现政策效能与个体需求的精准匹配。经过半年实践，院民日常活动参与度较之前提升46%，充分证明了柔性转化机制的服务效能。

（二）共生体培育

共生关系是指在相对确定的共生单元中，依照共生模式而形成的关系密切、利益共赢、生产共生净能量的社会网络[4]。

福利院依托三部合一架构，构建跨代际内生网络，激发老年、儿童与精障院民能力特长，形成互利互补的共生生态。针对家庭等外生网络建构中面临的认知不足等问题，引入专业家庭辅导、培育社区志愿者等，有效赋能外生支持系统。

（三）资源双向化

“类社区”模式构建社区与机构资源双向循环机制，促进资源的高效流动。社区资源机构化通过制度化、组织化途径有效吸纳、整合外部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可持续服务院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构资源社区化则打破院社隔阂，输出专业服务标准，组建精康融合服务队开展培训、推进入院政策进网格，提升基层服务可及性。

七、“类社区”实践成效

（一）院民个体能力显著提升

1. 日常活动参与度提高

跨代际互动与分级空间管理有效激发了院民的参与意愿，日常活动参与度提升了46%，支持性环境促进了其互动回应性与执行力的改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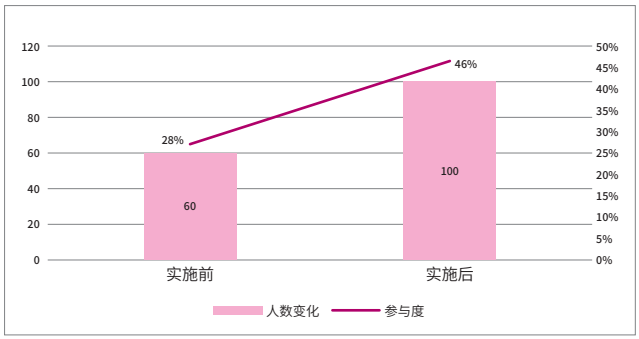


图2 院民日常活动参与度变化

2. 情绪管理与服药依从性改善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治疗期间结合心理社会干预可有效改善康复结局，并提高社会功能[5]。情绪调节问卷数据显示，部分院民认知重评维度提升2~5分，表达抑制维度降低2~8分，情绪调节能力有所提升，如图3所示。同时结合医护反馈，院民服药依从性维持在95%以上，显著减少因情绪波动引发的抵抗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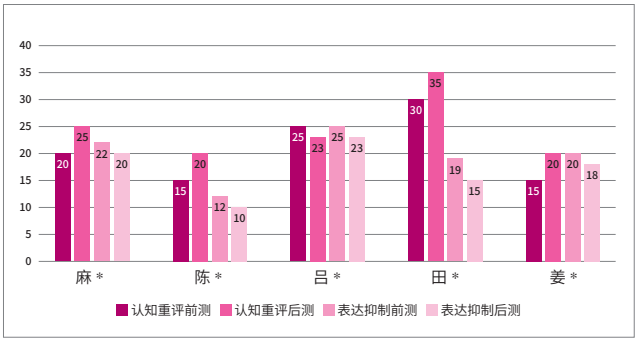


图3 部分院民情绪调节量表测试情况

3. 生活自理能力增强

通过分层干预与场景模拟，60%的半自理院民掌握了稳定的自理技能；约70%的不能自理院民能每周参与轻度活动；部分恢复较好的院民还能为同伴提供简单协助。

（二）机构服务效能持续优化

1. 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资源双向化机制高效盘活内外部资源，成功对接50人次志愿服务、1家企业技能培训及30场院社联合活动。同时将院内专业经验下沉至3个社区，开展8场宣传活动，周边居民对精障院民的接纳度较实施前提升40%。

2. 管理精细化与风险可控

差异化改造的空间治理模式和制度弹性转化机制，有效解决了“一刀切”管理导致的行为冲突和资源消耗问题，行为冲突事件报告数量较实施前下降约70%。

（三）社区融合取得突破

1.“机构社区”社交接触时长增加

开放区的打造及常态化开展的社区开放日、家庭探视、融合活动等，显著增加了院民的日均社区接触时长，由实施前的平均1小时/天提升至4小时/天。

2.“家庭社区”支持网络服务深化

结构化家庭支持计划覆盖80%有需求的家庭，通过家庭交流、心理支持、就业衔接及社区协同，让90%的院民获得社区随访服务，有效弥合“机构—社区”断层。

八、结语

F区福利院“类社区”模式，以四维环境重构与三重机制保障破解传统福利院“社区脱离”困境。其公办机构的政策衔接能力、代际资源整合及资源双向流动经验，可为基层精神康复福利机构提供可复制的范式。未来需强化院社资源长期稳定性，深化去污名化建设，转变社会固有偏见，推动融合迈向（下转42页）

激活“银发人力资本”：供需矛盾破解与支持体系构建

张 玮 王 昆

摘要：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当前老年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课程供需错配、教学方法单一及评估机制失效，导致老年人力资本优势难以有效释放。本文基于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四地 28 所老年教育机构的调研数据，深入剖析了上述矛盾的具体表现与成因。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需求分析、课程开发、教学方法和评估反馈四个维度的老年教育支持体系框架。该框架融合了 Goldstein 模型、胜任力模型、成人学习原理及 Kirkpatrick-Phillips 评估模型，旨在实现老年教育的需求导向、能力适配、绩效转化与价值量化。最后，文章提出通过深化政企协同、推进产教融合以及促进个人参与等实施保障机制，打通“需求—培训—就业”闭环，从而系统性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将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教育；结构性矛盾；产教融合

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有效开发与合理配置老年人力资源已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口中具有特殊开发价值的重要群体，其显著特征在于拥有较长工作年限、一定学历基础以及较强的再就业意愿和志愿服务能力，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该群体难以替代的人力资本优势，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战略性资源。然而，当前老年教育体系的定位仍停留在文化娱乐等福利性层面，课程设计以满足兴趣为核心，其服务对象多为经济条件较好、有一定空闲时间的老年人，忽视了有再就业需求的群体。老年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呈现出“有潜力无开发、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本文基于对该结构性矛盾的分析，探索构建四维一体的老年教育支持体系，旨在为各地系统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借鉴与参考，更好地释放老年人口潜力，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上接 41 页）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 单璐 . 国家卫健委 : 在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660 万 90% 以上得到照护 [EB/OL]. (2022-06-17)[2025-11-12].https://www.chinanews.com.cn/sh/shipin/cns-d/2022/06-17/news929440.shtml.

[2] 余豪如 , 张玲玲 , 孙妞妞 , 等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进展 [J]. 全科护理 , 2023, 21(36): 5064-5069.

[3] 陈四 , 徐莺 . 从欧洲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看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角色定位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 2020, 31(21): 249-251.

[4] 刘卫红 , 张弛 , 赵良伟 . 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共生网络 : 概念模型、进化逻辑与培育机制 [J]. 职业技术教育 , 2020, 41(16): 35-41.

[5] 陈雪莲 , 孙福刚 , 于传宁 , 等 .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J]. 中华保健医学杂志 , 2022, 24(03): 236-23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2026 年度我国当代心理健康问题多学科融合防治策略研究一般项目“积极社区干预模式推动精神健康社区康复站建设策略研究”（GXDXK2025B-03）。

（作者：王晗，鲁东大学盈科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刘芳，鲁东大学盈科法学院副教授、鲁东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硕士生导师；邢莉，烟台市儿童福利院科员）

一、老年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结构性矛盾

（一）课程供需错配，难以匹配劳动力市场需求

课程体系是老年教育的核心，但当前老年教育课程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严重的供需错配，具体表现为“三多三少”：休闲娱乐类课程多，职业技能类课程少；理论性课程多，实操性课程少；通用类课程多，岗位适配类课程少。这种错配的直接后果是老年教育无法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合格的老年人才，老年人参与培训后仍难以就业，最终形成培训意愿下降，导致企业不愿参与进而导致教育机构资金不足的恶性循环[1]。

基于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4 个城市 28 所老年教育机构的调研（包括政府办老年大学 15 所、民办老年教育机构 8 所、社区老年学校 5 所），课程供需错配的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老年教育课程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比（2024 年）

课程类型	老年教育供给比例	劳动力市场需求比例	供需差距	典型课程示例
休闲娱乐类	72.3%	18.5%	+53.8%	书法、绘画、声乐、舞蹈
基础素养类	12.1%	25.3%	−13.2%	数字应用、健康养生
职业技能类	15.6%	56.2%	−40.6%	老年护理、养老设备操作

由表 1 可见，供需差距最大的是职业技能类课程：劳动力市场需求占比 56.2%，但老年教育供给仅 15.6%，缺口达 40.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休闲娱乐类课程供给严重过剩：72.3% 的课程是书法、绘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而劳动力市场对这类兴趣技能的需求仅 18.5%。

造成供需错配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定位偏差，福利性导向压倒市场性导向；二是机制缺失，缺乏市场需求调研与联动；三是能力不足，缺乏职业技能课程开发能力[2]。

（二）教学方法单一，难以实现能力与绩效的转化

教学方法是连接课程内容与能力转化的桥梁。当前老年教育的教学方法仍停留在传统讲授式，缺乏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实践导向方法，导致学用脱节，老年人在培训中能够听懂，但回到岗位后不会用，能力无法转化为绩效。

调研显示，当前老年教育的教学方法呈现以下特征：以讲授式为主，81.2% 的课程采用教师讲、学员听的传统模式；以理论教学为主，67.9% 的课程无实操环节；以集体教学为主，92.3% 的课程采用大班集体教学，无个性化指导。

教学方法的单一性，直接导致老年教育的转化效率低下，具体危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参与率低，讲授式课程平均参与率仅 45.7%，中途退学率高达 30%；二是能力转化难，参与过老年护理培训的学员中仅 28.6% 能独立完成基础操作；三是持续应用难，缺乏跟进支持机制导致老年人学了不用、用了就忘[3]。

（三）评估机制失效，难以衡量人力资本增值

评估机制是检验老年教育效果的标尺，也是优化体系、吸引资源的依据。当前老年教育的评估机制存在“三重三轻”的严重缺陷：重参与度轻能力、重满意度轻绩效、重短期轻长期，无法衡量培训的实际效果与经济价值，导致政府、企业对老年教育的投入意愿不足。

调研显示，当前老年教育评估机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87.6% 的机构将报名人数、上课次数作为核心评估指标；仅 19.3% 的机构开展行为层或结果层评估；95.7% 的机构仅在培训结束时开展评估，无长期追踪机制。

评估机制的失效，直接导致老年教育的价值无法量化，进而影响资源投入。政府投入缺乏依据，资源配置效率极低；企业参与意愿低，仅 12.5% 的企业参与过老年教育合作。

二、四维构建老年教育支持体系框架

针对当前老年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构建需求分析、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评估反馈“四位一体”的老年教育支持体系，实现需求导向、能力适配、绩效转化、价值量化的核心目标[4]。

（一）需求分析体系：基于 Goldstein 模型的精准定位

需求分析是老年教育的起点，核心是通过 Goldstein 三层次模型，精准识别组织需要什么、岗位需要什么、老年人需要什么。

1. 组织层面

分析锚定区域产业需求，基于区域银发经济规划确定开发重点。一、二线城市侧重高端康养服务与智慧养老需求。这类城市银发经济发达，高端养老机构、智慧养老企业集中，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老年护理员、智慧养老设备运维师、老年健康管理师等。三、四线城市侧重社区养老服务与本地特色产业需求。这类城市的养老服务以社区为核心，同时拥有本地特色产业，需要社区养老顾问、老年旅游向导、农村养老服务志愿者等。农村地区侧重基础养老服务与农业技术传承需求。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多、养老资源少，需要大量农村养老服务志愿者；同时，农村老工匠、老农技员的技艺需要传承，因此老年教育需开发“农村养老基础护理”“农业技术传承”等课程。

2. 任务层面

分析基于 DACUM（Developing A Curriculum）方法，联合企业、行业协会专家拆解老年适配岗位的具体任务，确定每项任务所需的知识、技能与素养。DACUM 方法的操作流程如下。

（1）组建 DACUM 委员会：邀请 5 至 8 名企业一

线专家、2 名行业协会代表、1 名老年教育专家，组成委员会。

（2）岗位任务分解：委员会通过头脑风暴，列出岗位的所有核心任务。

（3）任务细化与能力分析：将每类任务拆解为具体步骤，并分析每个步骤所需的能力。

（4）形成“任务—能力”对照表：将任务与能力对应，形成岗位“任务—能力”要求对照表，作为课程开发的直接依据。

3. 人员层面

分析通过量表测评和面试评估，识别每个老年人的能力现状与岗位需求的差距，为个性化培训提供依据，实现因材施教。

量表测评可以采用《老年人能力评估量表》，主要从三个维度量化评估：①体力维度：评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配岗位，采用“能 / 不能 / 需辅助”三级评分；②认知维度：评估老年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学习能力，采用“数字记忆测试”“逻辑推理测试”等工具；③技能维度：评估老年人已具备的技能，采用技能清单勾选方式。

面试评估通过情景模拟，评估老年人的隐性能力。

评估后将测评结果与岗位能力要求对比，形成个人能力差距报告，明确每个老年人需要补充的知识、技能[5]。

（二）课程开发体系：基于胜任力模型的模块化设计

课程开发是老年教育的核心，需基于胜任力模型设计模块化、差异化的课程体系。

1. 核心模块设计

基于麦克利兰冰山模型，将课程体系分为三个核心模块，分别对应表层特征与深层特征的开发需求。

（1）基础素养模块补充老年人适配岗位所需的通用能力，聚焦表层特征中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包括三个子模块：数字应用、健康管理、法律常识。

（2）职业能力模块培养老年人适配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聚焦表层特征中的岗位技能，按岗位类型分为多个子模块：老年护理、智慧养老运维、社区志愿服务等。

（3）社会适应模块激活老年人的深层特征，如职业认同、自我概念、动机，帮助其适应岗位与社会，包括三个子模块：职业认知、代际沟通、心理调适。

三个模块的关系是基础素养模块为职业能力模块提供通用能力支撑，社会适应模块为职业能力的应用提供保障，三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能力体系。

2. 差异化课程设计

老年人的年龄、健康状况、能力差异极大，需基于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按年龄分层设计差异化课程，确保课程适配不同群体的需求。针对处于过渡期（60~65 岁）、刚退休、身体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再就业意愿的老年人，设计职业转型与技能更新课程；针对处于贡献期（66~75 岁），身体状况尚可，更倾向于轻体力、高价值的工作或志愿服务的老年人，设计经验传承与岗位胜任课程；针对处于维持期（76 岁以上），身体状况较弱，以居家养老、轻度参与为主的老年人，设计健康管理与社会参与课程，确保课程适配不同群体需求。

（三）教学方法体系：基于成人学习原理的创新应用

教学方法是老年教育的桥梁，需要基于老年人的学习特点创新实践导向的教学方法。

1. 混合式学习

结合“线上微课程 + 虚拟仿真”与“线下实操工作坊 + 实地实践”，适配老年人学习节奏，提升学习灵活性。线上微课程将课程拆解为 10~15 分钟的短视频，内容聚焦单一知识点或技能，微课程可通过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平台、微信公众号推送，老年人可随时随地学习，反复观看。虚拟仿真针对高风险、高成本的实操内容，开发虚拟仿真课程，让老年人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模拟操作，无须实际设备，降低成本与风险。针对核心技能，开展线下工作坊，每组 3~5 人，配备 1 名实操教师，确保每个老年人都有动手机会。同时与企业、社区合作，提供实地实践机会。

2. 行动学习

围绕真实岗位问题组织学习，实现“学习—实践—反思”的闭环，提升问题解决能力。行动学习包括问题识别、方案制定、行动实施、反思提升四个环节，行动学习的核心是在做中学，老年人通过解决真实问题，不仅掌握了相关知识，还提升了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这些能力可直接应用于后续工作。

3. 经验学习

基于科尔布周期理论，学习发生在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主动实践的循环过程中。老年人的优势是经验丰富，经验学习方法可激活其已有经验，实现旧经验与新技能的融合，提升学习转化效率。

（四）评估反馈体系：基于 Kirkpatrick-Phillips 模型的多层级设计

评估反馈是老年教育的闭环，需要建立以投资回报率（ROI）为核心的多层级评估体系。

基于 Kirkpatrick-Phillips 模型设计的五级评估指标体系，涵盖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结果层和投资回报层，明确每个层级的核心指标、评估工具与周期。

ROI 是衡量老年教育经济价值的核心指标，需要科学界定项目成本与项目收益，确保计算结果客观可信。项目成本包括课程开发费、师资费、场地设备费、学员补贴等直接成本和项目管理费、企业配合成本等间接成本。项目收益包括生产力提升收益、人力成本节约、服务增值收益等直接收益和品牌价值提升、社会价值等间接收益。基于量化的经济价值，可以建立

“反馈—优化”机制，并将评估结果应用于体系优化、资源配置与政策调整。

三、政企协同、产教融合的实施保障

构建老年教育支持体系，需要突破单一机构发力的局限，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教育机构实施、老年人参与的多方协同机制。

（一）深化政企协同，打通“需求—培训—就业闭环”

当前老年教育面临“有培训无就业”的困境，亟须通过政企协同打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1. 建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联盟

政府需提供核心政策支持，包括发放用工补贴、建立统一的老年岗位能力认证标准与服务评估体系，并整合资源构建银发人才数据库以实现人岗智能匹配。企业方应提前半年明确提交岗位需求，并深度参与过程，通过派驻专家、提供场地确保培训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对合格者保障不低于 70% 的录用率。教育机构则负责前端对接企业需求开发定制课程，并在后端提供至少 3 个月的持续岗位跟踪指导，形成“培训—就业—稳定”的完整支持闭环。

2. 完善订单式培训模式

构建“企业下单、机构定制、政府补贴、保障就业”的运行机制。具体流程包括：企业发布明确能力要求的岗位订单；教育机构联合企业开发完全匹配需求的课程体系；通过银发人才数据库精准招募学员；实施校企双导师培养；由企业主导考核并直接录用合格者。

（二）推进产教融合，创新教育服务供给

提升老年教育的专业性与市场认可度，需要深度整合产业与教育资源。

1. 共建银发经济产业学院

一是资源共享，校企互派师资、共用场地，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前沿同步；二是课程共研，基于岗位能力将课程拆解为微模块，并采用“1 天理论 +1 天实践”的模式强化技能应用；三是人才共育，通过“理论 + 实训 + 实习”的三段式培养与双导师考核，为合格学员颁发行业证书并推荐就业，同时提供 6 个月的入职跟踪服务以保障稳定就业。

2. 构建微认证体系

一是在设计上，将技能拆解为 4~8 学时的微模块，采用线上微课与线下短时实操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二是在评估上，建立以能力达成为核心的机制，学员通过“在线自评 + 专家实操考核”后可获得可验证的电子证书；三是在认可上，通过推动企业认可、建立积分兑换制度、衔接学分银行等方式，确保证书的行业价值与流通性。

（三）促进个人参与，激发老年群体内生动力

解决老年人“担心成本高、学了无用、无回报”的顾虑，需要设计有效的参与激励机制。

1. 创新老年学习账户制度

老年学习账户采用个人、企业、政府按 1∶2∶1 比例共担成本的机制，并对有就业意愿者、低收入老年人和志愿服务者实行差异化支持。账户资金严格限定于职业技能提升用途，通过政务 App 实现线上管理、资金结转，并对完成 2 个以上微认证的学员给予 500 元额外补贴，以此构建一个精准激励、专款专用的终身学习资金闭环。

2. 健全能力与薪酬挂钩机制

建立“认证—绩效—晋升”三重联动的激励机制：将能力认证与薪酬直接挂钩，按认证等级提供 200~800 元不等的月度补贴，并设立不低于 20% 的薪酬级差；将培训成效纳入绩效考核，对创新成果给予专项奖励；同时拓宽职业发展通道，设置技术至管理的晋升路径及老年导师岗位，实现经验传承与个人发展的双赢。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构建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导向的老年教育支持体系，可有效激活老年人力资本潜力，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中国发展报告 2020: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政策 [M]. 北京 : 中国发展出版社 , 2020: 10.

[2] 章义 , 严双艳 .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J]. 山西开放大学学报 , 2024, 29(02): 5−10.

[3] 党俊武 . 老龄蓝皮书 :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2018)[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8: 4.

[4] 民政部 .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EB/OL]. (2022−02−22)[2025−12−05]. 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5259/content.html.

[5] 佟景泉 , 曾光 , 黎新华 . 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老年教育赋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因、机理与路径 [J]. 教育与职业 , 2025(13): 89−9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天津职业大学科研创新实践培育项目“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视域下老年教育生态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作者：张玮，天津职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昆，天津职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失智老人“需求式照护”困境的质性研究

陶　婧 孙　蕊 马君澜 周茗沁 孙　劼*

摘要：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失智老人照护工作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本研究以芜湖市为例，通过对30名失智老人及其照护者开展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涵盖社会支持、护理与情感需求三个维度的“需求式照护”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当前照护体系存在政策覆盖范围有限、社区服务功能呈现异化、专业护理资源整体匮乏，以及心理支持机制缺失等多重困境。为此，建议从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整合优化社区服务资源、加强专业护理人才培养、深化人文关怀机制等方面系统推进，逐步构建起以失智老人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多层次照护体系。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失智老人；需求式照护；质性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我国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有所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发展医养结合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人照护体系。我国失智症总体患病率约为6.0%，年增幅达5.6%，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7%[1]。随着“63高峰人口”（即1963年出生人群）于2023年起进入60岁阶段，社会养老压力持续凸显，至2033年该人群步入70岁后，失智老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形成刚性照护需求[2]。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本研究聚焦芜湖市失智老人照护实践，系统调查其现状与需求，从失智老人、照护者及社区等多视角剖析照护支持结构的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而依据失智老人医疗需求与自理能力差异，构建分层照护体系，为其营造更优质的晚年生活环境。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一）失智症与失智老人

失智症是一类进展性神经功能退化疾病，临床表现以记忆力、言语功能、执行能力及视空间感知等多方面认知衰退及行为异常为主。常见类型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认知障碍等，通常分为早、中、晚三期，随着病情进展对照护需求显著增加[3]。失智老人指因认知功能障碍导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需他人持续协助的老年人群[4]。本研究聚焦60周岁以上、经临床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或血管性痴呆等亚型，且日常生活起居依赖他人照料的老年个体。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发布的《公共卫生领域应对痴呆症全球状况报告》中提出，失智症经济负担涵盖直接医疗支出、非医疗社会成本及非正式照护隐性成本[5]。国外发达国家相应的多元协作失智老人长期照护体系设计较为完善，例如研究提出失智症的全生命周期风险模型[6]，界定分类50多种失智老人居家护理服务内容[7]，并根据失智症患者的功能水平与照护需求差异，提供个体化照护方案[8]。

我国已将失智症纳入国家层面专项任务管理。《“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提出推动阿尔茨海默病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建立综合防控机制[9]。《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2023—2025年）的通知》提出，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及早期干预、进行专项培训辅导、建立阿尔茨海默病防治服务网络等行动内容[10]。相关学者研究显示，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中，将中、重度失智老人明确纳入保障范围的城市比例仅为33.3%[11]。失智老年群体其照护需求具有全天候持续照护、高度专业性和服务复杂性的特点[12]。

目前关于失智老人照护的研究尚不成熟，其研究多从政策设计、服务供给与保险机制等供给侧切入，缺乏针对失智老人及照护者真实体验与多元需求开展的研究，且多聚焦发达地区，对资源薄弱的三线城市关注不足。因此，本研究立足需求端，深入芜湖市实证调查，以识别照护瓶颈与供给缺口，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失智老人及其照护者的实际需求出发，采

用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研究方法展开探讨。该理论聚焦于抽象现象及其动态演变过程，核心在于揭示社会互动的生成机制。该方法强调自下而上构建理论，由原始数据自然涌现概念框架，可有效减少研究者主观偏差，提升理论饱和度和效度，其数据采集通常借助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及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完成[13]。

（二）研究设计

基于扎根理论，针对失智老人及其照护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研究通过一对一深度访谈获取资料，具体研究设计如下。

1. 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选取芜湖市部分社区、医院、养老机构中的失智老人及其家属、护理工作人员等照护者为研究对象，最终确定了 30 名访谈对象（P1~P30），每次访谈一位对象，访谈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访谈采用“叙事逻辑”鼓励受访者分享真实体验与感受，并在征得同意后录音以供后续分析。

2. 编码分析。研究将访谈录音资料转写为文字稿，经语义完整性校验后，采用质性分析工具 NVivo 执行程序化编码处理，遵循“开放式—主轴式—选择性”三级编码范式推进文本解析与理论迭代建构。

三、资料分析与实施

（一）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中的核心分析技术，指对访谈、观察记录等原始资料逐行分解、贴标签和概念化。本研究对访谈文本进行初始标注，通过持续比较聚类语义相近的编码单元，赋予临时概念标签，再经解构、对比与范畴化处理，最终提炼出初级子范畴。通过对 30 份访谈文本的分析，共提取出 35 个初始概念（A1~A35）和 14 个子范畴（B1~B14）。为保持客观，对具有多重含义的语句均进行了编码（见表 1）。

（二）二级编码（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扎根理论中继开放式编码后的核心分析阶段，旨在发现范畴间的逻辑关联，构建“概念—子范畴—主范畴”的多级关系模型。本研究根据逻辑梳理出 7 个主范畴（C1~C7），再根据主范畴归纳出社会支持、护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三个维度（见表 2）。

（三）三级编码（选择式编码）

在三级编码阶段，以二级编码提炼的主范畴为基础，从主范畴中提炼出核心范畴以及主范畴之间的关系。通过总结失智老人及其照护者的需求式照护的形成原因以及影响因素，构建了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失智老人及其照护者“需求式照护”的理论框架（见图 1）。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失智老人及照护者的深度访谈，构建了包含“社会支持—护理需求—情感需求”三个维度的“需求式照护”理论框架。该框架揭示，完善的照护体系需以社会支持为基础，涵盖政策、社区与家庭网络；以专业化的分层护理为核心，满足不同阶段的照护需求；并高度重视失智老人与照护者双方的情感福祉。

社会支持维度是照护体系的基础，包括正式支持、

表 1 开放式编码分析

子范畴	初始概念	代表性语句
B1 政府支持	A1 政策覆盖不足	P20：地区未完全推行长护险
	A2 机构监管	P19：希望国家管管那些黑心的机构
	A3 政策需要	P2：重视照护需求，提出一些更方便的政策
	A4 经济补助	P10：为照护家庭提供经济补助
B2 社区支持	A5 构建体系	P13：构建社区“一体化”居家养老体系
	A6 日间照料中心合理化	P1：都成了棋牌室
B3 技术支持	A7 公共设施不完善	P4：我的轮椅进不去
	A8 医疗器械	P8：如果有更方便的设备就好了
B4 机构支持	A9 照护设施	P28：希望防滑地板和扶手更多一些
	A10 机构拒收	P11：因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他们拒收
B5 平台支持	A11 渠道提供	P15：想和其他家庭交流一下经验
	A12 评价平台需求	P14：我们都没地方反馈意见
B6 家庭支持	A13 亲情感知	P2：我女儿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
	A14 陪伴支持	P12：我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的
B7 服务支持	A15 补助教程	P5：不知道怎么申请相关补助
	A16 开展关怀活动	P23：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支持我们
	A17 政策宣传	P14：很少询问专业人员相关政策
B8 社会关系支持	A18 邻居支持	P16：隔壁阿姨会帮忙关注照看一下
B9 患者自护	A19 康复锻炼	P6：我平时可以自己做做锻炼
B10 照护者	A20 护理程度	P21：不知道该帮他们做什么
	A21 护理科普	P18：老人常年卧床在家，我们家属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A22 专业化不足	P25：我们也没系统学过
	A23 人员数量	P30：我们的人员数量有限
B11 辅助护理	A24 康复锻炼指导	P7：希望有人教一教，这样我自己在家也知道怎么搞
	A25 适老辅具	P17：有用但不会用
	A26 上门诊疗服务	P11：如果有人愿意上门服务那会方便很多
B12 自身心理	A27 自我实现	P3：不希望自己尿失禁
	A28 尊重	P9：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A29 认同感	P4：我要是得了这个病就什么都做不了
	A30 心理疏导	P19：希望有专业的医生可以疏导一下老人的心理
B13 家属心理	A31 经济压力	P17：我们家实在没有钱可以支撑这么长期的治疗
	A32 痛苦无助	P13：她不认得我了
B14 护理人员心理	A33 社会认同	P27：瞧不起我们干这行的
	A34 工作待遇	P22：收入不高但是很累人
	A35 工作压力	P26：不满意我们就会被投诉

表 2 主轴编码分析

维度	主范畴	子范畴
社会支持	C1 正式支持	B1 政府支持
	C2 准正式支持	B2 社区支持
		B3 技术支持
		B4 机构支持
		B5 平台支持
	C3 非正式支持	B6 家庭支持
		B7 服务支持
		B8 社会关系支持
护理需求	C4 自主护理	B9 患者自护
	C5 外界护理	B10 照护者
		B11 辅助护理
情感需求	C6 自身情感	B12 自身心理
	C7 照护者情感	B13 家属心理
		B14 护理人员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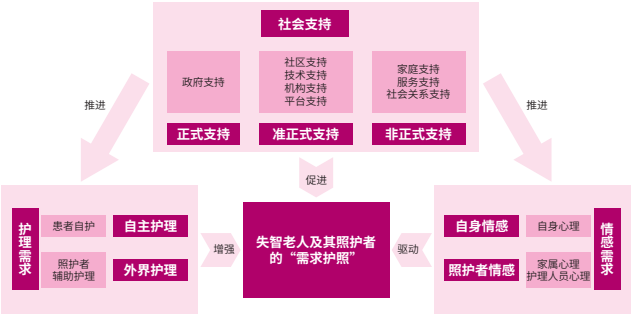


图 1 失智老人“需求式照护”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

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当前支持体系存在政策覆盖不足、社区功能异化、专业资源匮乏等问题，制约了照护资源的有效整合。若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和专项资金保障，相关患者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难以有效推进。护理需求维度聚焦失智老人对专业照护与自主护理的双重需求，涵盖患者自护能力、照护者专业水平及辅助护理服务。由于照护人员的实践多依赖个人经验，专业化不足，且教育宣传服务力度不够，老人也需要适老辅具和上门诊疗等专业服务的介入[14]，应依据失智程度提供分层护理，强化康复指导与辅具支持，提升照护的连续性与专业性。情感需求维度关注失智老人与照护者的心理状态，涵盖老人的尊严维护、自我认同、照护者的压力缓解。失智老人自身心理是其自身情感的体现，必要的心理干预已成为迫切需求。照护者的工作待遇、工作挑战和社会歧视也需要被高度重视，社会应系统融入心理关怀，构建人文照护环境。

为系统改善照护困境，应协同推进三方面工作：强化政府保障与社区资源整合，夯实社会支持体系；依据失智程度提供差异化服务，加强照护者培训与专业资源投入；同时，必须将心理关怀融入照护全过程，维护老人尊严并支持照护者身心健康，从而构建一个以需求导向、人文关怀与专业服务并重的综合型照护模式。

参考文献

[1] Jia L F, Du Y F, Chu L, et 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management of dementia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dults aged 60 years or older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0, 5(12): e661-e671.

[2] 杨燕绥，于淼，秦晨. 银色经济时代社会保障公共选择 [J].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24(03): 17-19.

[3]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指南写作组，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认知障碍疾病专业委员会 .2018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一）: 痴呆及其分类诊断标准 [J]. 中华医学杂志，2018, 98(13): 965-970.

[4] 张虹，沈军，贾倩颖，等. 主动健康视角下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给予式照护”困境的质性研究 [J]. 中华护理杂志，2023, 58(22): 2761-2768.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dementia[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6] Livingston G, Huntley J, Sommerlad A, et al.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 2020 report of the Lancet Commission[J]. The Lancet, 2020, 396(10248): 413-446.

[7] Bökberg C, Ahlström G, Leinokilpi H, et al. Care and service at home for persons with Dementia in Europe[J].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2015, 47(05): 407-416.

[8] Moon S,Choi M,Sohn M. Suicide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dementia: effects of Korea'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12): 6582.

[9] 关于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通知 [EB/OL]. (2022-02-07)[2025-10-3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01/content_5676342.htm.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 (2023—2025 年）的通知 [EB/OL]. (2023-05-26)[2025-10-3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6277.htm.

[11] 张心怡，赵海涛.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给付制度优化研究——基于 28 个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 [J]. 科学发展，2022(10): 96-103.

[12] 朱培嘉，张良文，方亚. 失智症老年人长期照护及其预防干预研究进展 [J]. 中国公共卫生，2024, 40(01): 98-102.

[13] 库卡茨. 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实践与软件使用指南 [M]. 朱志勇，范晓慧，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14] 丁志宏，王伟成. 我国高龄失智（下转 49 页）

结构性张力与制度性调适：养老服务供给何以突破结构性失衡困境？
——以 B 市 H 区为例

穆　钰

摘要：本文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以 B 市 H 区为例，剖析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的生成与维系机制。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行政条块关系及考核导向等制度性规则与老年群体传统观念、基层政府策略性适应等实践行为相互交织，共同再生产出供需错配、城乡不均、责任模糊等困境。结构性张力触发反思性调适，推动政策向补需求、促整合、重精准转型。突破这种失衡需要通过制度性调适来重构资源配置规则，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实现养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养老服务；社会实践理论；失衡困境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养老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强养老公共服务，内容上要多样，财力上要倾斜，全社会一起努力，把老年人安顿好、照顾好，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深入审视并破解养老服务供给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困境，成为理论与实践领域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

在养老服务政策研究领域，结构性失衡现象及其成因已得到多角度揭示。农村养老服务困境源于家庭、市场与政府三重能力弱化所导致的供需脱嵌（李静，2025）[1]。城乡间的养老资源配置呈现多重“双轨”特征，体现在社会救助水平、养老保险缴费与保障层次、关系型与商业型资源的可得性与质量上（刘晓梅等，2024）[2]。从历史制度视角看，公共政策本身在城乡之间、公办与民办机构之间、硬件建设与服务优化之间也存在长期性的结构偏差（李小兰，2015）[3]。为突破困境，系统性改革被视为必然方向，这包括通过完善顶层设计、调动社会资本、构建医养联合体来推动健康老龄化（孔杨等，2023）[4]，以及构建“物质基础 + 价值实现”双轮驱动的新模式，以实现老龄工作从思想观念到工作重点的全面转型（贾舒等，2024）[5]。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对失衡状态的描述、对政策文本的评议或对宏观改革方向的倡导，但对这种结构性困境何以能够不断被再生产的深层社会机制缺乏足够的理论透视。为此，以 B 市 H 区为典型案例，引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深入剖析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的生成与维系机制。

二、养老服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矛盾突出

一方面，养老机构布局配置不够合理。当前养老设施建设与资源闲置情况并存，因养老机构在运营阶段持续性支持不足，陷入“建得起、养不起”的困境。医疗机构和助餐资源不足是当前养老服务最突出的短板，布局和资源配置不够合理，不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上接 48 页）老人的照顾支持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兰州学刊 , 2022(01): 130−14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失智老人照护困境与支持策略研究——以芜湖市为例”（202410368059）；2022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需求溢出视角下‘医养结合’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2022AH051199）。

（作者：陶婧、孙蕊、马君澜、周茗沁，皖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本科生；通信作者孙劼，皖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

另一方面，老年群体需求与养老服务现状存在差距。基层群众对养老服务的刚需期待标准与现实服务水平的偏低形成反差，对养老服务不满意的群体集中反映服务项目及人员能力缺陷。与此同时，居家养老服务帮扶措施尚未破题。目前，我国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高龄老人依赖子女照护。受传统观念及家庭经济水平影响，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接受度非常有限，居家养老仍是主流模式。此外，政府和社会力量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方面的服务尚未落实到位。

（二）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够均衡，短板明显

城区内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驿站发展普遍好于农村地区，养老机构入住率高、生活环境好，驿站服务项目多、老年人聚集效应明显、助餐率高；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主体缺位、资源匮乏，老年人地位边缘化[6]。一方面，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相对薄弱，农村常住老年人口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有限，长期稳定收入没有保障，更无逐年增长的可预期，老年人对医养和助餐服务需求度高，但老年驿站只能提供巡视探访和助餐服务，无法提供其他服务。在医养服务方面，家门口的乡村医生人员短缺、年龄老化、服务能力不强，乡村医生职位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乡村医生招募困难。农村老年人收入难以负担医疗费用和日常生活开支，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较低，老年人对免费医疗的诉求较为强烈。另一方面，适老化改造需要加强，缺乏适合老年人活动的设施和活动载体，缺乏有组织的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居家养老设施不够便利，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活动区域、卫生间、洗浴间等处需加装扶手、配备拐杖和轮椅，以及设置坡道等适老化改造。

（三）普惠与精准服务不够清晰，发力不准

目前，H 区养老服务还处在发展阶段，在普惠与精准服务方面还不够清晰，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一是居家养老服务差异化、延伸性不够，入户服务、家政卫生等基础养老服务的覆盖率较低，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二是对低收入、失能老人扶助不够，对政策涉及对象之外的一般低收入、失能老人没有扶助政策，缺乏差异化、灵活性和具有针对性的安排。三是部分养老服务项目过于注重形式上的设立和任务指标的完成，如“签约家庭医生”“邻里互助员”的设置，忽视了实际服务效果及后续管理。四是医疗服务资源保障力度不足，符合基层功能定位及老年人急需且属于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疗、适宜技术没有全部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科范围，巡诊服务的频率和内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四）责任与能力不相匹配，反差较大

目前，政府、社会、家庭三者养老服务责任还未厘清，存在一定混淆，导致老年群体在养老服务方面对政府期待过高。一是养老工作运行机制有待完善，养老服务工作中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尚不清晰，导致目前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方式单一、服务碎片化。二是养老服务人员结构需要优化，当下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面临着社会地位低、收入待遇低、学历水平低和流动性大、劳动强度高、平均年龄高的困境。三是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存在欠缺，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目前缺乏专门针对此类家庭的养老支持政策。四是对养老服务的监管力量不足，目前养老服务监管大多采用“第三方监管，多部门联合监管，信息化监管”模式，但这种模式现场监管频率低，难以实现有效监督。

三、结构性张力与制度调适：养老服务失衡困境的生成机制

本文以 B 市 H 区为例，旨在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来穿透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的表象，深入分析其生成与维系的内在机理。B 市 H 区的现实困境清晰地揭示了结构二重性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制度结构的规制、日常实践的再生产以及二者张力驱动的调适过程。

（一）制度结构的资源配置机制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空间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持续影响着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导致养老服务设施、专业人力资源与财政支持在空间配置上天然向城市中心倾斜，而农村地区则长期面临投入不足的情况。与此同时，科层体系的部门分工与职能分割使得分属不同政策领域的“医”“养”“康”“护”等服务要素形成制度性壁垒，导致在基层实践中难以实现资源与流程的有效衔接，服务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以量化指标与硬件建设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影响基层行动者的行动次序，驱动其更关注养老床位数、设施覆盖率等可见成果，而忽视了服务的实际效能与长期可持续性。这些相互嵌套的制度结构共同构成一套刚性的规则与资源体系，从源头上预设了资源配置不均、服务整合困难与激励目标偏差的供给格局。

（二）实践主体的策略性适应机制

在既定制度结构所创设的机遇与约束下，各类行动者基于地方性知识进行策略性实践，这些实践在适应结构的同时亦无意中巩固了既有结构的合法性。老年群体受传统“居家安养”观念的深刻影响，普遍对社会化养老机构持谨慎态度。

家庭养老资源、个人资源对人们养老意愿产生影响[7]，这种养老模式将照护压力传导给家庭，这不仅强化了家庭责任，也对社会化服务的精准介入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农村地区，由于支付能力有限与市场预期薄弱，社会力量缺乏进入动力，基层政府受资源所限往往只能提供保基本、重覆盖的标准化服务，这反过来印证了农村养老服务“低水平均衡”的结构性认知。在城市地区，部分服务机构为应对考核压力，可能倾向于完成形式化的服务条目而非个性化需求，这导致服务供给与真实需求脱节。这些看似理性的局部适应

行为在系统层面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惯性力量，不断地生产出城乡失衡、供需错配与监管悬浮的结构性特征。

（三）“结构—实践”张力的触发调适机制

当由制度结构所形塑的标准化、同质化供给模式与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多元化、专业化、个性化养老需求之间产生矛盾时，结构性张力便全面凸显，供需错配、城乡不均、普惠与精准难以兼顾等现实问题正是这种深层张力的外在症候。张力标志着既有结构的规则与资源配置方式已难以有效组织实践，这迫使行动者启动反思性实践。老年群体的不满通过各类渠道形成规范性反馈，服务供给的失效案例成为问题信号，学界对既有模式进行批判性评估，这些反思性活动共同触发了制度化调适。财政补贴从“补供方”转向“补需方”、跨部门协同的“医康养联合体”出现、基于精准评估的服务标准体系优化等政策创新，本质上都是旨在通过修正规则与重组资源来干预、改造深层结构，以期引导出一种能够有效回应现实张力的新型实践模式。因此，当前的困境并非终点，而是结构与实践进入新一轮互动循环的转折点，调适的深度与广度将决定新体系的均衡状态。

四、提升养老服务工作水平的意见和建议

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养老服务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创新突破，切实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与生命尊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全生命周期保障。

（一）提高认识，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加速对经济发展、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体系及家庭结构产生全方位冲击。政府及相关部门需深入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全面掌握区域老龄化数据动态，立足本地实际精准施策，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老龄化应对路径，推动政策整合集成，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同时，应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全方位解读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营造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通过案例宣传、体验式服务等方式，增进公众对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模式的认知认同，消除传统观念壁垒，培育“社会化养老”新共识。要重点解决养老服务“有没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要未雨绸缪，重点关注养老服务质量监管、模式优化，解决养老服务“好不好”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居家养老事业发展。

（二）统筹谋划，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首先，应精准聚焦农村留守老年人保障，强化动态摸排与分类帮扶机制，确保农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应护尽护”、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应养尽养”、居家特困人员保障“应保尽保”、失能社会老人托养“需托尽托”、自理老人需求“有需必应”，筑牢农村养老服务底线。其次，要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加大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加快补齐农村养老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村敬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服务能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长效服务项目等方式，丰富农村老年人物质与精神文化供给，缩小城乡养老服务差距。最后，要统筹城乡养老机构布局，合理控制建设规模，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养老设施与教育、卫生、文化设施共建共享，打造“基础养老 + 多元服务”综合体。

（三）因地制宜，提升医养结合标准化精准化服务水平

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精准服务的原则，进一步统筹调整和加大对养老服务的资金投入。一是要完善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适度扩大兜底保障范围，优化财政补贴机制，从“补床位数量”向“补服务质量”转变，激励机构提升床位利用率与服务专业化水平。二是推进基本养老服务标准化、智慧化建设，从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流程、管理规范等维度，构建覆盖全链条的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出台配套管理办法，明确质量指标、服务规范与监督评价机制。三是加快推进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改造，聚焦老旧小区实施“一户一策”适老化改造，因地制宜建设社区老年食堂。通过政府奖补、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困难半失能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提升居住安全性与舒适度。四是深化医康养融合发展模式，健全老年人能力与健康评估制度，完善康复护理标准体系，推动医疗、康复、养老服务在资源、政策、服务流程上深度融合，满足多层次、专业化养老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静 . 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服务的结构失衡与体系构建 [J]. 社会科学辑刊 , 2025(03): 75−84.

[2] 刘晓梅 , 于佳琪 , 刘艳茹 . 城乡养老资源配置结构的差异分析与优化路径 [J]. 农村经济 , 2024(10): 89−99.

[3] 李小兰 . 我国养老服务公共政策结构的失衡与纠偏 [J]. 探索 , 2015(06): 104−109.

[4] 孔杨 , 张楠 , 徐海燕 . 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J]. 山东社会科学 , 2023(04): 135−144.

[5] 贾舒 , 关洛桐 . 人口老龄化视阈下养老资源错配与优化路径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J]. 理论与改革 , 2024(06): 161−172.

[6] 张欢 . 互助养老模式下的村社养老共同体构建路径——基于北京市 Z 镇的经验考察 [J]. 社会保障研究 , 2025(03): 44−54.

[7] 龙书芹 , 杨春华 . 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 中国民众的养老意愿及其代际差异 [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01): 104−112, 152.

（作者系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家庭教育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的影响研究

赵　爽 于鑫荷

摘要：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规模庞大，留守儿童的欺凌现象备受关注，家庭教育环境对欺凌行为的影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欺凌现象中欺凌者的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缺乏父母陪伴与正确引导的留守儿童当处于消极教养环境中时，易产生不良情绪和行为问题，进而增加欺凌行为发生的概率；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也可能使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缺失，引发欺凌行为。此外，家庭教育中过度强调竞争、忽视合作与同理心培养的价值取向，会导致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中更具攻击性，难以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显著提高其实施欺凌行为的可能性。秉持这种价值取向的家庭，孩子往往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在相处中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觉得自身利益受损或地位受到威胁，就容易采取欺凌手段来维护所谓的“优势”。通过深入探讨家庭教育环境与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环境、减少欺凌行为发生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助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家庭教育环境；留守儿童；欺凌者

一、引言

根据 2023 年权威统计数据（全国妇联课题组，2023），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规模为 6102.55 万人，占农村儿童人口的比例为 37.7%[1]。这些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缺位，家庭教育环境面临诸多问题[2]。家庭教育在儿童的行为塑造、价值观形成等方面至关重要，然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往往存在缺陷，如情感关怀不足、教育方式不当、监督缺失等。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欺凌的高发群体，其欺凌行为不仅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也会使欺凌者自身的成长发展偏离正轨，给社会和谐稳定埋下隐患。关注家庭教育环境这一关键因素，能够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方向，帮助改善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状况，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助力留守儿童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对促进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现有研究虽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业成绩等方面有较多探讨，但在家庭教育环境与欺凌行为关系的研究上仍存在不足，对其背后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挖掘不够深入，这为深入探究二者关系提出了迫切需求。

二、家庭教育环境与欺凌行为的关系

（一）良好家庭教育环境对欺凌行为的抑制作用

1. 和谐的家庭氛围能降低欺凌可能性

良好的家庭氛围能给予孩子充分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关怀。父母与孩子之间保持密切的沟通，孩子能够自由地与父母分享学校生活和内心想法。当孩子遇到困难或挫折时，父母能及时给予安慰和鼓励，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应对态度。例如，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而感到沮丧时，父母可以耐心倾听孩子的诉说，引导他们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孩子因情绪问题而产生欺凌他人或被欺凌的倾向。这种情感支持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安全，减少因内心孤独或缺乏关爱而产生的通过欺凌他人来寻求关注的可能性。此外，和谐、信任的家庭氛围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自尊、自信的心理需求，这对在生活中有挫败感、自卑感的农村留守儿童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冯达飞等认为，良好的家庭氛围能满足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降低因“情感饥渴”或心理失衡引发的欺凌倾向，如通过“角色互换”活动使祖辈与孙辈互相理解，减少冲突，从而降低以欺凌宣泄情绪的可能性[3]。

2. 稳定的家庭结构能预防欺凌发生

健全的家庭是满足孩子安全需求的基本保障。留守儿童若能得到父母足够的庇护和抚慰，他们的情绪控制和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增强，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情绪会大幅减少，并且不会轻易采取消极方式解读外界刺激，降低因错误获取安全感而实施欺凌行为的可能性。父母的陪伴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孩子欺凌发生的概率，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问题，应尽量

避免孩子与父母分离。父母的实际陪伴与情感陪伴能够弥合留守儿童的心灵创伤，为孩子提供安全的保护，使孩子不易被卷入校园欺凌与被欺凌的事件中。赵文萍和尧新瑜明确指出，如果父母在身边，留守儿童能从家庭中获得归属感和爱，不会因孤独寂寞而产生焦虑型依恋模式，这样在青春期，他们就不会盲目寻求同伴依恋，减少因同性小团体盲从心理或异性依恋中的嫉妒、占有欲而引发的欺凌行为[4]。

3. 有效的家庭监督与规则能约束欺凌

明确且合理的家庭规则也很重要，农村留守儿童应该从小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孩子在家庭规则的约束下，明白行为的边界，将这种规则意识延伸到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在家庭中按时作息、尊重长辈等规则的遵守，会让孩子在其他社会环境中也更易于遵循规则，不会随意去欺凌他人。Chen X 等认为，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积极参与、给予孩子适当的支持和监督，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情的环境中，可以防止孩子欺凌他人。因此，家长应关注孩子的日常行为和学习情况，对孩子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监督和矫正。如言语不文明、与同学发生小冲突等，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当行为，家长应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教导孩子正确的行为方式。同时鼓励孩子的积极行为，强化他们的良好习惯。通过这种持续的监督和引导，孩子能够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降低参与欺凌行为的风险[5]。

（二）不良家庭教育环境对欺凌行为的助长作用

1. 家庭经济压力催生欺凌倾向

一些身处经济困境的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物质条件匮乏，加之青春期心智尚未成熟、判断力不足，在面对自己渴望得到却又无法满足的财物时，可能会冲动行事。因此，经济条件也会增加孩子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而且家庭经济条件不仅影响孩子的物质生活，更会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孩子参与欺凌行为的风险。高永超和王亮亮揭示了不良家庭教育环境与欺凌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欺凌行为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涉及欺凌行为的概率更大。在部分家庭经济窘迫的情况下，由于主要劳动力外出，孩子虽有入学机会，但家庭关注重心在温饱，忽视孩子品德和行为引导，且父母多为低收入者，家庭数字化和智能化环境缺失，使得孩子在获取知识和信息方面受限，与其他孩子产生差距，容易导致自卑心理的产生[6]。

2. 家庭关怀缺失诱发认知偏差和消极情绪

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教育以及关怀缺失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社会人格等。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忽视对留守儿童的陪伴，缺席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学习，很大程度上会给留守儿童带来感情上的痛苦并同时伴随一些负面行为。亲情缺失也会引发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这些心理问题可能导致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障碍，当内心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部分孩子可能会通过欺凌他人来发泄，以此寻求关注或释放压力。张山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长期处于父母关爱的缺失状态，长此以往，心理归属感弱化并出现性格缺陷。这些负面情绪和性格特点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应对方式和情绪调节能力，容易产生冲动行为，可能会通过欺凌他人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压抑情绪，以获取一种虚假的“力量感”和“关注感”[7]。此外，部分留守儿童常常因为缺失家庭的关怀，心理上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性格孤僻、对父母充满怨恨、存在被遗弃感，以及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等。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为了得到父母的注意和关心，一旦遇到有着相似经历且经常欺凌他人的同伴就很容易加入其中、抱团取暖，逐渐发展成为学校中的“小霸王”。

3. 亲子沟通障碍加剧欺凌问题

亲子矛盾突出，会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发展。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少，缺乏亲子情感交流和感情培养，会导致孩子对父母产生埋怨情绪。加之父母不理解孩子内心需求，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和情绪管理方面缺乏引导，难以理解他人感受，共情能力缺失，这些都增加了欺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亲子沟通与儿童行为问题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亲子沟通频率低，无法及时感知孩子的情绪变化和身体行为异样，亲子间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孩子感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支持，亲子沟通不足进而影响行为发展。亲子沟通状况不佳，如沟通频率低、质量差，无法满足留守儿童生活需求，这使得他们容易出现问题，促进不良行为发生，可能促使部分孩子成为欺凌者。简言之，缺乏家庭关爱、沟通和教育的儿童最容易参与欺凌或被欺凌，因为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中，亲子陪伴少、父母情感支持缺失等问题，可能会导致孩子缺乏自信心和存在感。

4. 错误的价值观引导增加欺凌行为

在家庭生活中，长辈的言行对孩子影响深远。若长辈传递不良价值观，可能误导农村留守儿童形成不良价值观，若长辈常灌输“弱肉强食”“欺软怕硬”等观念，会扭曲孩子的平等意识。隔代家庭教育也可能使孩子树立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无法引导孩子正确看待社会现象和自身行为，导致孩子对欺凌行为的性质认识不清，不觉得欺凌他人是错误行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手段。祖辈对留守儿童过分宠溺或教育失当，只注重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忽视品德和行为规范的培养，会导致孩子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徐金菊指出，留守儿童的看护人多为祖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思想观念较传统、眼界相对狭窄，难以让孩子跟上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变革步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辈为其拓宽知识视野，容易沉迷于自己的小圈子，导致价值观念出现偏差。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会使他们在

与他人交往时，容易忽视他人感受，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实施欺凌行为[8]。

5. 不当家庭教育方式推动欺凌发生

家长不良的教养方式是留守儿童欺凌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果家长多采用粗暴惩罚的教养方式，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易出现欺凌行为。而且教育方式不当，将导致孩子行为失范。有些家长过于专制或忽视孩子，使孩子缺乏关爱与正确引导，这些都可能促使孩子成为欺凌者。同时，这种教育方式也让孩子学会用强制手段解决问题，增加欺凌行为发生的概率。放任型教养方式则是缺乏正确的行为引导，容易使孩子变得散漫、任性固执，社会适应性差。儿童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无需受到约束，从而在与他人交往中，更容易出现攻击性行为，通过欺凌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他们没有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廖朝芬和伊萍在研究中提出“否定式”教育方式，指出谦虚是传统美德，但农村普遍存在“过度谦虚”的“否定式”评价交流。留守儿童父母也常用这种方式，如否定孩子成绩、传递消极情绪。孩子因无法理解，感受不到认可鼓励，逐渐自我放弃，在这种负面导向下，欺凌意识随之形成[9]。

6. 家庭监督缺位纵容欺凌行为

父母单方或双方长期不在家，会导致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监管不足。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的约束，一方面在行为上缺乏规范，另一方面在遭遇欺凌事件时也得不到及时管控，容易将“欺凌者”作为模仿对象，使得欺凌问题更易发生。长时间的亲子分离使儿童缺乏家庭关怀与有效监督，导致其安全感缺失、性格出现问题，使其容易通过欺凌他人来寻求关注或发泄情绪。于佳琪研究指出，父母在子女童年时期的缺位，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可能会使其习惯性地对外界保持警惕和疏离，由此可能会产生行为障碍，出现越轨行为，甚至上升为欺凌行为。此外，家庭监督不足时，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更易沉迷网络接触媒体暴力，而过度接触媒体暴力会影响留守儿童攻击性认知，导致攻击性思想、行为及暴力成瘾，使其更易成为欺凌者[10]。因此，缺乏家庭监督，青少年受媒体暴力影响更大，从而增加欺凌行为。

三、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其欺凌行为备受关注，家庭教育环境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当前研究对家庭教育环境与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的关系有一定成果，但仍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首先，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家庭教育环境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如何共同影响欺凌行为，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模型；其次，通过长期跟踪留守儿童成长过程，探究家庭教育环境变化对欺凌行为的动态影响；最后，通过聚焦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的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上方法可为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欺凌行为、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1] 全国妇联课题组 .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R]. 北京 :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 ,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 2023.

[2] 赵雪颖 . 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 南京 : 南京理工大学 , 2023.

[3] 冯达飞 , 张香兰 , 曹文 , 等 . 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发生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对欺凌卷入者及中小学教师的访谈 [J].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 , 2020, 35(01): 29−34.

[4] 赵文萍 , 尧新瑜 . 留守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特征、心因与预防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2018(36): 73−76.

[5] Chen X, Lu J, Ran H, et al. Resilience mediates parenting style associated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BMC Public Health, 2022, 22(01): 2246.

[6] 高永超 , 王亮亮 . 家庭教育信息化助力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研究 [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 2020(04): 17−18.

[7] 张山 . 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现象及应对策略 [J]. 江苏教育 , 2022(88): 30−31, 3.

[8] 徐金菊 . 家庭教育缺失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与对策 [J]. 试题与研究 , 2019(11): 88.

[9] 廖朝芬 , 伊萍 . 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发生原因与防范对策探讨 [J]. 贵州教育 , 2024(05): 15−18.

[10] 于佳琪 . 家庭教育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在校表现的影响研究——基于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J]. 长春大学学报 , 2023, 33(07): 8−1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结构—过程—能动视角下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者保持’研究”（LJ112410151034）；2024 年大连海事大学教改项目“以职业能力要求为导向的社会工作‘学做外推式融合’实习体系研究”（BJG−C2024060）。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从“悬浮”到“落地”：社区协同推动困境儿童政策执行的实践路径
——基于临沂“沂蒙护童”项目的探索

李艳丽 高 珏 高 媛 胡晓娜

摘要：当前，困境儿童保障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悬浮”现象，即制度设计日趋完善，服务供给却难以有效回应儿童差异化需求。本文以山东省临沂市“沂蒙护童”项目为例，探究社区协同机制如何推动政策从“悬浮”走向“落地”。研究发现，通过项目流程再造实现精准识别、角色重塑明晰权责边界、专业嵌入提升服务适配性、资源整合强化可持续保障，可系统性破解部门协同失灵、社区承接能力不足与服务供给碎片化三大执行梗阻，探索出可复制的社区协同实践路径，为提升儿童福利政策基层执行效能提供经验参考。

关键词：困境儿童；政策执行；社区协同；政策悬浮；基层治理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速从物质兜底向精神关爱与发展支持转型。202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不断完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医疗康复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人身安全保护体系、法定监护责任体系，有效提升福利保障水平”[1]。然而，制度的完善并未自动转化为基层服务效能，政策在执行末端呈现出一定的“悬浮”状态，即政策日趋完备，但服务供给难以精准触达儿童真实需求。

既有研究从多维视角揭示了“政策悬浮”的生成机制。协同治理层面，悬浮源于制度化协作机制缺位：个案会商虽已构建“识别—协商—帮扶—反馈”流程，却因专业人才短缺与激励不足而难以持续运转[2]；社工组织在链接志愿者与困境儿童时，亦因资源稀缺、激励错位与公信力薄弱陷入结构性“连接失效”，加剧服务断层[3]。服务链条层面，悬浮表现为全过程闭环缺失——当前救助体系尚未贯通“预防—发现—干预—评估”各环节，前端风险预警与后端效果评估尤为薄弱，导致政策响应滞后[4]。支持网络层面，家庭、学校与社区功能普遍弱化，微观支持系统塌陷使政策即便“抵达”社区也难以“嵌入”生活[5]。特别是心理健康维度，系统性关爱服务供给不足，进一步凸显政策与需求之间的“悬浮”鸿沟[6]。尽管江苏扬州、山东济宁等地通过建立筛查机制、设置心理咨询室等方式开展了心理健康服务的局部探索，但此类实践多聚焦单一领域，尚未有效整合协同机制、服务链条与支持网络。

综上所述，摆脱困境儿童政策“悬浮”困境，关键在于以社区为枢纽，构建资源整合、专业嵌入、多元协同与动态评估的全链条机制。本文以山东省临沂市“沂蒙护童”项目为例，探究其如何通过制度化的社区协同实践，推动政策从“悬浮”走向“落地”，为构建高质量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二、困境儿童保障政策执行中的“悬浮”困境

（一）协同失灵：部门权责模糊与信息壁垒并存

困境儿童保障涉及民政、教育、卫健、司法、妇联等多个部门，但基层执行中缺乏制度化的跨部门协作机制。一方面，实践中出现多头管理或责任推诿现象，跨部门的需求对接、资源共享与服务衔接机制缺失。另一方面，各部门信息系统独立运行，困境儿童的家庭、健康、教育等关键数据分散存储，难以实现“一人一档”跨部门整合，造成重复摸排与信息遗漏，削弱政策执行效能。

（二）承接乏力：社区专业能力与人力资源双重短缺

作为政策执行的终端载体，社区普遍面临人力配置不足与专业素养欠缺的双重约束。儿童主任多由居委会成员兼任，年龄结构偏大、学历层次偏低，且缺

乏儿童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训练。其服务内容多局限于物资发放与节日慰问，难以开展心理疏导、家庭赋能、行为矫正等高阶干预，导致政策虽“抵达”社区，却无法转化为有效服务供给。

（三）供给错位：服务碎片化与需求异质性脱节

困境儿童需求高度异质，但当前服务供给却普遍存在碎片化与同质化问题。一方面，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服务缺乏系统性规划，多以“零散开展”的形式存在，未能构建起“需求—资源—服务”的有效闭环，导致部分真实需求被忽视，部分服务却重复供给。另一方面，服务内容高度同质化，过度聚焦于物质帮扶等“硬性”支持，而对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社会融入等“软性”需求则关注不足，且缺乏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难以实现服务与需求的精准匹配。

上述问题共同构成困境儿童保障政策在基层的“悬浮”状态：制度设计与服务实践存在脱节现象、资源投入与需求回应错位、多元主体协同乏力，致使政策难以嵌入儿童日常生活。近年来，部分地方尝试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困局，其中，以社区为枢纽重构协同网络成为关键路径。山东省临沂市“沂蒙护童”项目正是这一思路的系统性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协同安排，整合分散的治理要素，构建有机联动的服务体系，推动政策从“悬浮”走向“落地”。

三、“沂蒙护童”项目的社区协同治理实践探索

（一）流程再造：构建“识别—分级—匹配”闭环

项目严格遵循“协同摸排—科学评估—分类分级分流—动态回访”四步工作流程。社工入驻镇街后，联合儿童主任、社区志愿者召开碰头会，制定针对性摸排清单；由儿童主任牵头入户走访，社工同步运用访谈提纲、需求调查问卷及青少年综合自评量表等专业工具，深度识别儿童真实需求与家庭潜在困境，并建立“一人一档”电子台账。在此基础上，项目创新推行四级干预机制：红色等级（危机干预）针对面临急性安全风险的儿童，立即启动紧急帮扶；黄色等级（中度风险）面向存在持续生活、心理或教育困扰的儿童，提供常态化专业支持；蓝色等级（重点关注）聚焦有潜在发展短板的儿童，实施预防性关爱；绿色等级（常规服务）为基本需求稳定的儿童匹配普惠性成长陪伴。通过分级实现需求分层，进而精准匹配对应服务资源，推动困境儿童服务从粗放覆盖向精准响应转变。

（二）角色重塑：以制度化清单明晰多元主体责任

项目依托“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工—志愿者”四级服务队伍，明确分工：儿童主任负责政策宣传、基础信息摸排与家庭动态跟踪，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专业社工运用个案管理、团体辅导等方法，开展心理疏导、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务；志愿者在社工指导下参与数据核对、课业辅导、节日陪伴、申报材料整理等活动；儿童督导员则承担基层协调枢纽职能，统筹推进学校、社区与社工之间的对接，如费县探沂镇建立“学校专项对接2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制，显著提升响应效率。为进一步强化协同效能，罗庄区册山街道创新推行“六同”协作机制，即“家园同建、政策同学、摸排同访、随访同入、信息同享、问题同解”，通过流程共担与责任共履，有效打破角色壁垒，实现服务链条的无缝衔接。

（三）专业嵌入：实施“外部引入 + 内部增能”双轨策略

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临沂市山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专业机构驻点镇街。社工运用生态系统与协同治理理论，开展个案管理、心理沙龙、成长互助小组等服务，累计举办主题活动23场，覆盖367人次；同时构建“理论培训 + 帮带督导”双轨赋能体系：在册山街道，组织儿童主任与志愿者开展政策解读、入户沟通等专题培训超24小时，并通过联合入户探访72次，以“帮带式督导”帮助基层人员掌握家庭情况采集、需求识别等八项核心技能。在费县探沂镇，社工与学校建立“双负责人”制度——社工主责活动执行，学校负责场地与秩序协调，保障专业服务高效落地。

（四）资源整合：构建多元可持续的保障架构

项目注重资源整合与载体创新。在罗庄区册山街道，组建“课业辅导志愿者库”，联动社区卫生院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设立“爱心资源角”提供文具、图书等常态化支持；依托“汇善行”平台建立《志愿服务跟踪日志》50余份，形成“全程跟踪—多方回访—成长评估—持续赋能”四级跟踪体系。在费县探沂镇，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社区小主人”“兴趣课堂”等活动，将服务有机嵌入校园与社区场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适配。

四、实践成效与现实挑战

（一）实践成效

项目实施一年来，政策执行效能显著提升：全市重点困境儿童信息建档完整率由78%提高至99.6%，高风险儿童（红色等级）月度干预覆盖率从52%跃升至96%，服务响应时效与家长满意度同步改善。更重要的是，服务模式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从单一救助向综合支持的结构性转型。

（二）现实挑战

其一，城乡专业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地区社工覆盖密度显著低于城区；其二，社会参与多依赖行政动员，缺乏长效激励与制度化参与渠道；其三，数字化平台尚未实现智能预警与动态优化，仍停留在信息汇总阶段。

尽管“沂蒙护童”项目在推动政策“落地”上成效显著，其可持续性与可推广性仍受制约。专业覆盖不均、社会参与不足、数字赋能有限等问题，暴露出

社区协同机制在制度韧性、资源动员与技术支撑上的短板。因此，亟须在既有经验基础上，构建权责明晰、能力匹配、资源可持续的制度化协同生态，以提升政策的执行效能。

五、优化路径：迈向制度化的协同治理生态

（一）健全制度框架，强化协同刚性约束

建议省级层面出台《困境儿童社区协同服务工作指引》，明确民政、教育、卫健、妇联等部门在识别、转介、干预与评估等环节的职责边界，建立常态化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推动数据共享与服务转介标准化。重点补齐全过程服务链中“前端预防”与“后端评估”的制度短板，将风险预警、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和服务成效追踪纳入统一规范，推动工作机制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型。

（二）加强人才建设，提升基层专业支撑能力

设立专职儿童社工岗位，纳入社区工作者职业序列并配套薪酬保障；构建“县—乡—村”三级培训体系，重点提升儿童主任在需求访谈、风险识别与资源链接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推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与基层社区建立实习与督导合作机制，通过“校地共建”促进专业人才下沉，有效缓解个案会商因专业力量不足而难以为继的困境。

（三）完善激励机制，推动社会参与制度化

对持续参与困境儿童服务的企业，给予社会责任认证或税收优惠；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星级评定与荣誉表彰制度，提升志愿者归属感与参与持续性；通过政府小额资助、项目委托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其公信力与资源整合能力，系统性地弥合多元主体协同中的激励不足与信任缺口。

（四）深化数字赋能，构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在现有儿童信息平台基础上，嵌入动态风险预警模型与智能服务匹配算法，推动功能从“静态数据集成”向“动态智能研判”升级。可借鉴扬州市“心理健康测评系统”经验，对儿童情绪行为开展常态化筛查，并自动触发分级干预；同时对接济宁市“上下一体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实现线上评估与线下干预无缝衔接，全面提升心理关爱服务的精准性与可及性。

六、结语

“沂蒙护童”项目的实践表明，政策“落地”的本质在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困境儿童政策的“悬浮”与“落地”之隔，本质是政策文本与儿童真实需求的断层，而社区协同正是弥合这一断层的核心纽带。社区作为最贴近服务对象的生活场域，具备成为政策执行枢纽的结构性潜能。临沂通过流程标准化、角色制度化、能力专业化与资源系统化，有效推动困境儿童保障政策从“悬浮”走向“落地”，不仅破解了部门协同失灵、服务碎片化与专业缺位等执行梗阻，还在微观层面重构了“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的支持网络。当社区从政策执行的“被动承接者”转变为“主动整合者”，以“儿童为本”为锚点，联动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与家庭构建多元协同网络时，政策便能真正嵌入基层治理场景，实现从“纸上条款”到“身边服务”的转化。

该项目的探索价值，在于提炼出可复制的社区协同路径：以精准摸排打破“信息悬浮”，用资源整合破解“服务悬浮”，靠机制创新消除“责任悬浮”。这不仅让临沂的困境儿童获得了更具温度的支持，更印证了社区在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需求的感知者，也是资源的调配者，更是各方力量的黏合剂。这一探索既契合国家关于构建“全过程服务链”的战略导向，也为社会工作深度参与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未来，应推动此类创新由项目化运作转向制度化常态：一方面将成熟机制纳入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固化协同流程与权责清单；另一方面强化财政保障与人才支撑，夯实服务可持续基础。当然，从“落地”到“扎根”仍需持续发力，未来的社区协同还需在数字化赋能精准服务、专业化提升协同效能、制度化保障长效运行等方面深化探索。唯此，方能切实兑现困境儿童保障的政策承诺，推动儿童福利从形式覆盖迈向实质保障。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 [EB/OL]. (2025-05-09)[2025-11-27].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5/content_7023136.htm.

[2] 王振兴，李云新．个案会商促进困境儿童精准帮扶的实践机制及运行逻辑——基于 H 县的案例分析 [J]. 湖北社会科学，2025(08): 128-136.

[3] 崔琳，袁立红．结构洞视角下困境儿童志愿服务困境及应对策略 [J]. 中国集体经济，2025(31):189-192.

[4] 吴雯琪．困境儿童救助全过程服务链机制的形塑路径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J]. 西部学刊，2025(18): 75-78.

[5] 李文祥，刘一锋．困境儿童的微观社会支持及其社会工作介入路径选择 [J]. 行政与法，2025(03): 65-77.

[6] 万国威．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的政策突破 [J]. 中国社会工作，2025(21): 1.

（作者：李艳丽，临沂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高珏，临沂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高媛，临沂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胡晓娜，临沂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员）

南宁市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研究

潘子恒

摘要：文章在文献综述总结有关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之上，制定出五个维度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分别是物质生活维度、身心健康维度、负性情绪维度、人际关系维度以及流畅体验维度。通过调查问卷，对南宁市三家养老机构的养老护理人员进行随机调查访问，从而了解南宁市养老护理员总体主观幸福感状况。运用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南宁市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总体上较高的结论，其幸福感水平在人口学因素如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及收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南宁市；养老护理员；幸福感

当今世界各国老龄化问题是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养老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根据广西新闻网公布数据，广西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 1000 万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占总人口比例的 20% 以上。截至 2024 年末，广西 60 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 981 万人，占常住人口 19.57%，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700 万人，占常住人口 13.96%。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作为朝阳产业之一，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和自身幸福感。作为养老战线最基本的群体，影响养老护理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较为多元，除工作任务繁重、工资待遇偏低、社会认同度不高等现实困境外，职业发展路径的模糊性也是制约其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养老护理员的幸福感与之挂钩，养老服务行业的走向也将决定人才的选择。本文旨在探讨南宁市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

一、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与重要性

（一）主观幸福感的整体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感受

对于养老护理员来说，个人主观幸福感是对其工作空间和职业走向的满意程度，与个人生活和社会支持息息相关。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来衡量：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状态和社会支持程度[1]。工作满意度涉及工资获得、工作空间、职业走向等方面；生活满意度包括家庭、休闲和自身成长等方面；心理健康状态是指自身情绪的稳定性和应对压力的能力；社会支持程度指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支持和帮助的程度。

（二）主观幸福感对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存在影响

养老护理员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能够影响主观幸福感，提高老年人的服务质量。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高的人更容易产生工作情怀，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有助于减少职业倦怠和降低离职率。职业压力和负面情绪伴随着工作，容易导致养老护理员产生职业倦怠，从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服务水准。主观幸福感高的人可以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困难，工作中不出差错，保持其稳定性。主观幸福感能有效促进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幸福感高的人容易设定并达成个人目标，在从业领域中取得不小成绩。提高养老护理员的主观幸福感不仅有利于提升个人的从业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而且在改善养老服务行业的服务与质量、推动养老行业的健康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养老护理员职业幸福感现状分析

（一）工作现状与职业发展

南宁市公立机构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强度大、压力大。养老护理员不仅需要照顾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如穿衣、吃饭、洗漱、如厕、洗澡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使身心疲惫，难以获得充分的休息和放松。南宁市区人手不足的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负担更重，拖班情况时有发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过多的非岗位工作严重影响了其他工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余生活质量。南宁市养老机构中尽管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有较高的社会价值，但薪资待遇却较低，无法支撑其在省会城市的开支，月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无法有效改善其家庭经济状况、子女的学费、家里老年人的赡养、家庭出现困难等问题。

职业发展前景有限，南宁市养老机构大多数招的是年长员工，拥有高等学历者缺乏，在职称晋升方面的通道狭窄，现有的模式无法满足其职业发展需求，学历层次受限使得大部分养老护理员只追求薪资，在自我学历提升方面无过多要求。大多数养老护理员只能在养老机构基层岗位上长期工作，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使得他们在职业道路上感到迷茫和无助，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

（二）职业健康与家庭角色

社会认可度较低，职业认同感不强。传统与现今的社会观念中，养老护理员往往被视为“伺候人”的工作，多数人心中对其缺乏尊重与认可。养老护理员不得不在外人面前指出与从事养老专业无关系[2]。社会偏见影响其职业自豪感，导致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面对老年人及其家属时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心理压力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质量。养老护理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长期服务于低龄及高龄老年群体所带来的持续性工作压力与心理负担，易导致其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缺乏有效的心理支持与干预机制，则使其在面对心理困扰时陷入无助与孤立的境地。养老护理员的心理培训需求与其个人生活质量、工作表现及服务质量密切相关。他们在家庭与职业角色之间常面临冲突，需要同时承担照顾孩子、赡养老年人等家庭责任。这种双重角色压力使其难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时常伴随焦虑与挫败感。女性养老护理员，家庭角色的负担更为沉重，她们的职业幸福感较低。男性养老护理员在一定程度上感觉这份工作不体面，甚至会有低人一等的想法。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在社会工作及生活中没有地位。

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一）教育背景与心理特征

高学历和专业技能通常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工作中的挑战，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能力与高学历是分不开的，接受过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养老护理员在养老机构的应对能力高于一般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员。经过系统培训的养老护理员在处理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时更加得心应手，减少了因操作不当导致的老年焦虑和挫败感。技能和知识的提升有助于护理员在职业发展上获得更多机会，提高其职业成就感。在个性特征和心理素质方面，乐观、积极、向上的个性特征有助于从容应对工作压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提高应对工作的能力。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抗压能力的护理员在面对老年人的突发状况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减少老年人不必要的损伤与心理负担。具有消极、敏感等个性特征，则可能导致其在工作中更容易感到疲惫和沮丧，降低职业幸福感。

（二）工作设施与管理制度

工作环境和设施条件影响工作效率和舒适度。良好的工作环境包括干净整洁的居住空间、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便捷的交通条件等，不仅能够减轻护理员的体力负担，还能提升其工作满意度。配备现代化医疗设备的养老机构可以降低护理员在操作上的难度，提高工作效率[3]。优质的工作环境能增强职业认同感，提高工作认同感，从而使其对工作更加满意，进而提升对老年人的服务质量。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严重不足导致养老机构难以维持。养老服务领域尤其是公办养老机构，在用地、融资、用人、政府补贴等方面缺乏统一、公正、公平的政策和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国家规定的养老机构优惠政策落实不够，管理制度的影响也极大影响着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养老服务业队伍建设与管理制度亟待加强，人才培养制度严重滞后，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不高、流动性大、社会偏见等原因，急需解决“谁来服务”的问题。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任重道远。合理的管理制度能够为护理员提供明确的工作指导和支持，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压力。科学的排班制度可以确保护理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护理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开展绩效评估和奖励制度可以激励养老护理员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获得更高的职业成就感。

（三）社会支持与政策环境

社会支持中有不少源于家庭、朋友和社会。从业者在面对工作压力时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所需的帮助。家庭成员的理解和支持不断减轻其家庭负担，使其更加投入工作。朋友的互助与来自朋友的情感支持也是其获得社会认可支持的来源。社会的认可度使其从业自豪感提升，不再受到歧视，对工作的认同感大增。政府和社会通过媒体、视频号对养老护理员的介绍和宣传转变公众的看法，增强其职业吸引力。政策环境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民政部门通过设立养老等专项培训基金，支持养老护理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规划培训，使其操作能力得到提升。职业晋升方面可以为其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树立职业规划的信心[4]。在现有职业资格基础上建立多层次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为护理员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晋升机会，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四、提升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自我效能感调适心态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能增强职业幸福感。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的信心。通过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强自信心；定期进行自我反思和职业规划，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参加养老机构或行业协会组织的专业培训，

用新的护理技术和方法，提升自己在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学习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培养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通过阅读“医护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相关书籍，参加心理健康讲座、养老护理应急培训等方式，了解如何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5]。通过心理调适机制，定期进行心理咨询和放松训练，缓解工作压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养老机构定期聘请心理专家设立心理咨询服务，为养老护理员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和指导。

（二）优化工作环境完善管理制度

优化工作环境，在软件和硬件方面为养老护理员提供舒适、安全的工作条件。定期进行养老器械设施维护与更新，确保所有设备都能正常运行，开展养老器械使用与保养培训等以减少操作上的难度。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贴心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护理员的生活质量，减少因工作环境不佳导致的不满情绪。科学合理的制度可以有效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其工作满意度。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排班制度，确保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灵活的工作安排。根据老年人需求进行轮班制、弹性工作制等方式，科学合理安排时间以减少其连续工作时间，避免长时间的疲劳累积，提升工作效果。健全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激发养老护理员的工作积极性。设立评选方案，老年人对养老护理员进行投票参评，对表现突出的养老护理员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增强其职业成就感，使主观幸福感得到满足。政府出台更多支持养老服务行业的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薪资待遇。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方面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减少其后顾之忧。推动从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增强其职业规划的信心，使其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社会各界应关注养老护理员的家庭与职业平衡问题，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育儿假、家庭护理假等可以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养老机构在养老护理员家庭生活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服务，如子女托管、困难家庭帮扶、子女考入高校帮扶等，以减轻护理员的后顾之忧。

（三）提供职业发展与社会支持

养老机构为养老护理员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支持。设立多层次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晋升路径。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部合作，提供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使其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建立导师传帮带、老带新制度，让经验丰富的养老护理员指导新入职的护理员进行为期3个月乃至半年的指导帮助，让其更快适应工作环境，提升养老护理职业素养。养老机构与养老护理员不是独立的整体，它与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各界应加大对养老护理员的支持力度，提高其社会认可度。政策上应为养老护理员提供更好的职业保障和发展机会。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养老护理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社会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表彰活动，提高养老护理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吸引力。应广泛关注养老护理员群体的需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各级媒体还应不定期推出专题报道，宣传优秀护理员在应对老龄化社会中的先进事迹，树立行业楷模，增强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自豪感，让其主观幸福感得到提升。

五、结语

养老服务业是关系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完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南宁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养老护理员的主观幸福感分为三个层面：个人、组织和社会。通过对南宁市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主观幸福感与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首先，个人层面的自我效能感和健康向上心态的引导是基础，专业训练和辅导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养老护理员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心理支持可让其正确认识到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其次，组织层面的工作空间的优化和管理制度健全是主要的因素，科学合理的排班制度和劳务激励机制不仅可有效减轻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压力，薪资方面的提高也是其工获得主观幸福感的途径。最后，社会认可度以尊重层面为根本，社会层面的支持和政策环境优化是保障，在政策福利方面予以充分保障，社会认可度和职业发展机会提升，从根本上获得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韩梦汐，宋梅，王琰. 居家养老护理员核心能力研究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 [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24, 37(10): 1240−1245.

[2] 叶艳，杨海明，赵宇涵，等. 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护理员照护能力调查分析——以东北、华东、西北地区为例 [J]. 卫生职业教育，2023, 41(22): 120−126.

[3] 蒋忠燕，肖剑，陆伟丽，等. 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员照护负担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J]. 全科护理，2023, 21(18): 2454−2457.

[4] 周倩，黄婧琳，李惠菊. 养老护理员对老年人态度的现状及干预研究进展 [J]. 职业与健康，2023, 39(11): 1554−1558.

[5] 卢玥名. 社会工作介入养老护理员职业认同感研究 [D]. 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23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智慧健康养老模式下南宁市养老护理员主观幸福感研究”（2023KY1299）。

（作者单位：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研究

张肖敏 黄润龙 孙志明 贺 勤 梁 爽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呈现的共性特征，亦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将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是我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历年江苏统计年鉴，分析了江苏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根据实际人口死亡率、七普 1 岁组死亡概率、七普 5 岁组生存率三种方法预测，到 2030 年，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 2360 万 ~2420 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为 26%~29%；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 1200 万 ~1750 万人，占江苏常住人口比例为 19%~21%。

关键词：江苏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老龄化水平

一、江苏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截至 2024 年末，江苏全省常住人口 8526 万人，与上年末持平。男性人口 4321 万人，女性人口 4205 万人；0~14 岁人口 1110 万人，15~64 岁人口 5822 万人，65 岁及以上人口 1594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8.7%，老年人口总数仅次于山东，居全国第二位。全年人口出生率 5.0‰，人口死亡率 7.5‰，人口自然增长率 –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75.5%，比上年末提高 0.5 个百分点 [1]。

2020 年 11 月，江苏省 60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 1850.5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21.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41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6 位。其中江苏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为 1372.65 万人，占 16.20%（比 10 年前增加 515 万人），比全国高 0.69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5 位。江苏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 年老年赡养比为 23.61%。若与第六次普查相比，2020 年江苏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 5.85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 5.32 个百分点，老年赡养比上升 9.31 个百分点。首先，由人口年龄金字塔可见（见图 1），江苏出生人口高峰有两个，分别出现在 1965—1970 年（50~54 岁）、1985—1990 年（30~34 岁）；出生人口低谷分别出现在 1955—1960 年（60~64 岁）、1975—1985 年（35~44 岁）和 1995—2005 年（15~24 岁）。这些出生人口高峰和低谷深刻地影响了江苏人口发展。其次，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医疗保健意识增强，江苏老年人口死亡率十分低。再次，江苏出生人口始终低迷，人口金字塔 0~4 岁人口向内收缩明显。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全省 0~4 岁新生人口分别为 299 万人、381 万人、382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 4.1%、4.8%、4.6%（达到稳定人口，江苏 0~4 岁人口比例需持续为 6% 及以上）。因此，江苏人口持续处于一个少子化老龄化的阶段，增加出生人口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年龄结构调整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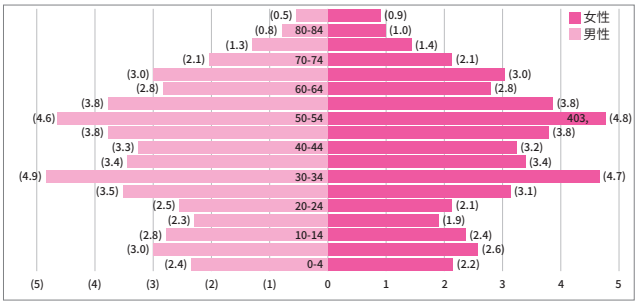


图 1 2020 年江苏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
（单位：人数，万人；占总人口比例：%）

二、江苏人口老龄化水平

2020 年江苏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人口老龄化程度）为 16.2%，为全国第五位，仅次于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 21.8%，为全国第六位，仅次于东北三省、上海、重庆。江苏五普至七普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为 1.35%、2.13%、3.25%。2020 年江苏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比例（3.25%）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仅次于上海 5.6%，为全国第二位。

（一）江苏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经济社会差异已经越来越小，尤其在城乡户口可以自由迁移的情况下。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由于城镇生活成本高，工作机会多，大部分年轻人从农村流出，农村只剩下老年人和儿童。当年轻人在城镇找到工作，将孩子带离农村，老家仅剩下老年人。老年人由于生活成本、生活习惯等不愿迁移到城镇，于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

同时，有些年轻人的户口没有迁出农村，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

七普中 10% 抽样的长表数据分析表明，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中，乡村占 38.8%，高于城市的 37.4% 和城镇的 23.7%。首先，乡村老年人的失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人数比例、失能（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人员比例（10.0%、2.1%），高于城镇（7.6%、1.9%），同时远高于城市（4.9%、1.9%）。其次，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中，城市老年人具有离退休金 / 养老金的比例（70.5%）远高于城镇（35.6%）和乡村（18.3%）；而依靠自己劳动收入、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8.7%、14.0%），低于城镇（21.3%、31.8%），更低于城市（33.0%、36.3%）。再次，江苏失康、失能老年人中，对家庭经济依赖程度更高，对养老金 / 离退休金依赖程度低，尤其是乡村。这说明，江苏省养老工作重点是农村，尤其是农村的低收入失康、失能、失智人群 [2]。

（二）各龄老年居住状态

七普对于老年人口居住情况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将老年人独居分为有保姆和无保姆两类；并将“与配偶同住”分为与配偶子女同住、与子女同住、与配偶同住等三类，增加养老机构居住一栏。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加，老年人与配偶子女同住比例、老年人与配偶居住比例等逐渐减小；而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大幅上升；到养老机构集体居住的比例同时上升；而老年人独居比例在 85~89 岁为最大，达到 24%；其中有保姆的老年人独居占比小（>2%）。2020 年 60~79 岁以上江苏老年人最多的居住形式是与配偶同住（占 45% 以上），其次是与配偶和子女同住（20% 以上），再次是老年人和子女同住（10%~18%），老年人独居也占相当比例（7%~18%）。80 岁以上老年人与子女一起生活比例加大，独居比例在 20% 左右，到养老机构比例为 3%~7%。

（三）江苏孤寡空巢老年人城乡分布及其变动

老年人的居住状态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两个独居的老年人口，以及一个老伴去世后，对老年人口的家庭生活影响十分大。2000 年（五普）开始统计老年人的居住状态。在七普中，进一步登记了老年人口与子女同住、与配偶同住、与子女及其配偶同住、独居有保姆、独居无保姆和养老机构居住等六种情况。孤寡老年人户具体是指单身老年人户，子女外出或就业离家（包括无子女），老年人单身在家生活居住，包括七普中独居有保姆和独居无保姆两类。

2010—2020 年江苏城市孤寡老年人户、空巢老年人户增长极快，年均增长 8.3%、8.7%；乡村孤寡老年人户、空巢老年人户增长相对缓慢（5.2%、5.5%）。因此，2020 年乡村孤寡老年人户、空巢老年人户比例虽仍然居高，但分别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6.8 个百分点；而城市孤寡、空巢老年人户比例则分别上升了 4.3 个百分点、4.8 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政府对老年人的关心，乡村老年户增长缓慢的情况仍将继续。

（四）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受教育程度影响着人们的职业、社会保险和退休后的收入、社会医疗保险等。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多于老年人、年轻老年人多于年长老年人。七普中增加了未上过学和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同时增加了博士研究生的学历教育。

1.2020 年各年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

2020 年江苏 50~59 岁人口大多（49% 以上）具有初中文化程度；65 岁以上老年人大多（47% 以上）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且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随着年龄增大而快速增长；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以小学、未上过学的比例最高，初中文化程度者比例不到 1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 10% 左右。此外，2020 年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很低，仅为 1%~2%；专科学历的老年人仅占 2%~3%。随着年龄下降而老年人受教育年数上升迅速，初中毕业者成为主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大幅增加。

2.1990—2020 年江苏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变化

假设未上过学和学前教育，受过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老年人，学校受教育年数分别为 0、6、9、12、14、16、19 年。2020 年江苏 60~64 岁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8.29 年，70~74 岁及 80~84 岁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迅速下降为 6.79 年及 5.69 年。1945—1955 年出生人群（2020 年 65~75 岁）受特殊年代影响较大；大学本科和专科学历人口最多，出现在 50~54 岁的年轻老年人。

（五）江苏老年人口的就业构成

老年就业也称超龄就业，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标志。2020 年江苏省 60 岁及以上就业人口 400.3 万人，比 10 年前增加 9.3 万人；2020 年老年就业人口占江苏省总就业人口（4893 万人）的 8.18%（占适龄 16~59 岁就业人数的 8.91%）。随着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改善和经济发展，近年来老年就业人数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3]。

我国乡村人口是自然就业的，2020 年江苏乡村就业老年人（占乡村老年人的）比例最高（34%），其次为城镇老年人（26%），城市老年人就业人口比例最低（9%）；但是乡村老年人就业率随时间下降快，从 2010 年的 43% 下降到 2020 年的 34%；城市老年人就业率下降缓慢，仅从 2010 年的 9.7% 下降到 2020 年的 9.1%。

三、江苏人口老龄化发展预测

人口老龄化与各年龄段人口发展息息相关。人口老龄化不仅与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有关，与 15 岁以下青少年数量和比例有关（少子化），同时也与

50~59 岁待老年人口（潜在老年人）数量和比例有关，以及与 15~49 岁人口数量和比例有关。2020 年江苏年龄组人数最多的出现在 50~54 岁人口组（796 万人，占总人口的 9.4%），及 55~59 岁人口组（647 万人，占总人口的 7.6%）。换言之，2030 年将有 1443 万人进入老年人口序列，而 2020 年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仅为 1851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8%。显然，未来 10 年老年人口数及比例将出现大幅度增加。

（一）江苏老年人口预测原理和假设

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主要困难是总人口数量及出生人口数量预测。江苏省流入人口变化大，出生人口急剧下降。从江苏老年人口增长趋势来看，考虑到 1982—2020 年及 2010—2020 年平均增长速度，2025—2030 年江苏 60 岁以上人口可能以年均 3.3%~4.0% 的速度增长。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以平均每年 3.8%~5.0% 的速度增长。江苏人口死亡率低，但迁入人口多，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口比重。考虑到迁入江苏的迁移人口以中青年为主，对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影响相对较小。注意到四普到五普、五普到六普、六普到七普江苏总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8.59‰、7.44‰、7.48‰，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未来 5~9 年仍有一定的外省人口迁入，假定 2020—2025 年、2025—2030 年、2030—2035 年江苏人口年均（自然 + 迁移）增长率分别为 0.15%、0.00%、–0.05%，则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江苏省年末人口分别为 8540.8 万人、8540.8 万人、8519.5 万人，江苏人口在 2025 年前后达到最多（8541 万人），2030 年后则会缓慢地下降 [4]。

（二）实际人口死亡率预测江苏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方法 1

人口死亡率相对比较准确，从死亡率角度估计老年人口数量。若考虑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一批人，2000 年为五旬老年人，2010 年为六旬老年人，2020 年为七旬老年人。假如江苏老年人口没有迁入和迁出（实际老年人迁移比例小），而仅受人口死亡率影响，则 2000 年江苏五旬、六旬、七旬老年人 10 年后尚存率分别为 0.92、0.78、0.49；类似，2010 年江苏五旬、六旬、七旬老年人，到 2020 年的 10 年尚存率分别为 0.95、0.44、0.59；若将这两个尚存率进行平均，获得江苏五旬、六旬、七旬老年人平均 10 年后尚存率分别为 0.9363、0.6074、0.5423。由 2020 年江苏实际老年人数量可以推算出，2030 年江苏六旬、七旬、八旬老年人分别为 1350.5 万人、600.6 万人和 163.9 万人。进而可推算出，到 2030 年江苏 60 岁以上、65 岁以上、75 岁以上老年人分别为 2360 万人、1198 万人和 611 万人；60~64 岁 1162 万人，65~74 岁 587 万人，70~79 岁 436.7 万人。

（三）用七普 1 岁组死亡概率预测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方法 2

传统人口学的推算方法，将老年人看作封闭且无流动和迁移的群体。首先计算了 1 岁一组的江苏男女人口生存率，计算 1 岁组的男（女）生存概率，每过一年消失一部分老年人……然后推算各年度各龄男（女）人口的数量，对 2020—2035 年人口数量进行汇总。分析表明，2021—2035 年间江苏 60 岁以上、65 岁以上及 8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态势稳定。60 岁以上老年人、65 岁以上老年人增长速度非常快，而 80 岁以上老年人在未来 15 年间增加 1.2 倍以上。本方法和方法 1 有一些差异，本方法中 70~79 岁、80~89 岁老年人的预测人口明显偏多，60~69 岁老年人的预测人口偏少。

（四）用七普 5 岁组生存率预测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方法 3

国外人口学界较多的是用 5 岁组平均生存概率进行人口数量推算，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计算方法。具体考虑老年人是封闭、无流动和迁移的。计算 2020 年江苏 5 岁组男女人口死亡率、平均尚存率、平均生存人数；按照每过 5 年消失一部分老年人，由此计算未来各年龄组老年人口数量。分析表明，2030 年江苏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8%；2035 年前后超过 21%，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5]。

四、结语

考虑到 1962 年至 1975 年是我国人口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他们在 2022—2035 年间陆续开始步入（60 岁）老年期。可以预计，2022 年后江苏 60 岁以上人口将出现爆发式增长；而 2027 年后 65 岁以上人口随之出现快速增长。由此预测，到 2025 年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 2100 万 ~2250 万人，占比达到 24%~26%；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为 1450 万 ~1610 万人，占江苏常住人口比例为 17.0%~19.5%。到 2030 年，江苏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为 2360 万 ~2420 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为 26%~29%；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为 1200 万 ~1750 万人，占江苏常住人口比例为 19%~21%。

参考文献

[1]2024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J].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 2025(05): 30−44.

[2]“十四五”规划《纲要》解读文章之 34|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EB/OL]. (2021−12−25)[2025−12−31].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zgh/202112/t20211225_1309722_ext.html.

[3] 张良礼 . 应对人口老龄化 :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及规划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

[4] 姜向群 .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历史与变革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5.

[5] 张运刚 .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M].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5.

（下转 64 页）

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研究

李妍妍

摘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民族地区因文化多元性突出、地域特色鲜明，养老服务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探索契合本土需求的养老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作为一种创新型养老形态，兼具社区居家养老的便利性与机构养老的专业性，高度契合少数民族老年人就地养老、就近照护的现实需求。本文以南宁市为研究案例，深入剖析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主要发展模式，涵盖公建民营与民办民营两种典型类型，分析其实践成效、运行特征及发展空间。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结合民族地区在政策落实、资源支撑、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从政策保障、经济扶持与文化融合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旨在为民族地区养老服务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养老机构；养老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是新时代中国需要妥善应对的重大挑战。进入 21 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逐年提高。此外，壮族和满族等部分少数民族的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1]。面对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和不断加快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社区嵌入式养老”是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一种有效形式，养老机构嵌入社区则是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只有实质性的嵌入才能实现社区养老机构的长效发展[2]。然而现有的研究未能深入探讨政府、社区、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等多方如何高效合作，共同推动养老服务发展，也没有结合民族地区民族性、区域性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针对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深入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分析养老机构嵌入社区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民族地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嵌入性”理论及其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中的作用机理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他认为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与制度结构之中的，并非孤立存在[3]。此后，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强调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信任、规范等因素对经济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提出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4]。前者关注网络整体的结构特性。关系嵌入则关注个体间的双边关系特征，如信任、信息共享等。这两种观点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嵌入性理论的内涵和应用范围。

在中国，嵌入性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社会学领域，“嵌入” 概念的理解与应用呈现出多元视角与丰富内涵。王思斌在研究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时，着重关注了其结构性层面，指出“嵌入”并非简单的包含关系，而是强调一种结构特性，在一定

（上接 63 页）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放课题“江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JSHD2022008）。

（作者：张肖敏，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研究员；黄润龙，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志明，徐州医科大学研究员；贺勤，东南大学国际老龄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梁爽，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意义上可等同于“介入”，这一观点揭示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服务领域中所处的位置与关系结构，体现了其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结构的影响[5]。蒋小杰和王燕玲在探讨县域社会治理时，聚焦于“嵌入”的情境性与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了微观层面个体行动与互动的重要性[6]。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深刻阐释了“嵌入”的结构性意义，更充分肯定了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约束下，利用社会资源实现活动目标的关系运作与策略运用能力，从而全面体现了“嵌入”概念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方法论意义。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以社区为依托，将各种养老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而这正契合了嵌入性理论中“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内涵。从嵌入性理论出发，在资源整合方面，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使外部医养资源有效嵌入社区，社区作为内外部资源连接的平台，机构借助与政府、社会组织及个体的互动合作，将专业资源导入社区。在主体合作搭建服务供给网络方面，推动了各主体形成互动合作关系。这些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通过策略性的资源利用产生嵌入性，形成了一个稳固且高效的服务输送网络。在关系构建层面，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有助于实现正式照顾与非正式照顾体系的衔接以及社区信任资本的培育。从理论溯源到在中国的本土化演进，其丰富内涵不断得以彰显并且应用于养老服务实践之中。

三、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与实践特征——以南宁市为例

民族地区近年来老龄化速度显著加快，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南宁是多民族聚居地，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壮族等少数民族老年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依赖感较强，他们更倾向于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接受养老服务。为此，南宁市的养老服务类型日益增多，涵盖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以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等多种形式。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下面以南宁市为例，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主要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一）公建民营式

在公建民营的模式中，资金与设施大多由政府负责提供，后续则以招标的形式，将运营工作委托给社会组织或企业，让他们凭借自身在管理、服务上的优势，具体落实站点运营的相关事项。2021 年，南宁市西乡塘区鲁班社区城市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合并改造升级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并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入上海天与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工作，从而实现社会化运营。政府为天与公司在初期场地设备引进方面提供了各类优惠政策，以使其能够尽快投入运营并实现良好发展。不仅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条件有所改善，软件服务也得到强化。天与养老将传统养老机构进行升级换代，打造“区域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 网格化、信息化”体系，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基础作用，形成了“嵌入式养老机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综合体”“特殊照护机构”形式的机构养老体系。

从实践运行来看，公建民营模式依托政府政策支持与专业运营机构的服务能力，实现了服务覆盖范围的稳步扩展与服务规范性的持续增强。伴随服务场景的不断拓展，基层执行过程更加注重政策的细化传导与因地制宜，推动政策红利实现精准落地；监管方式也同步优化，针对地域广阔、站点分散的客观特征，逐步完善常态化与精细化的监管机制，从而促进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支撑。与此同时，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政策在基层的细化解读与精准执行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不同区域之间的政策落实节奏尚存差异；监管体系在覆盖广度与响应效率方面亦有待进一步完善，资源联动与部门协同的紧密程度仍需持续加强。

（二）民办民营式

民办民营式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主要依靠民间资本投入建设和运营。在南宁市，老来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早期创立阶段察觉到社区养老的巨大需求。在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一些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积极筹备，利用民间资本开启建设之路。他们选择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社区，构建服务体系，招聘培训专业人员，引进设施，完善生活照料与医疗保健服务，同时注重社区宣传、建立信任，吸引了首批老人入住。在发展过程中，老来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后续着力提升服务质量，与周边医院合作建立绿色就医通道，优化内部管理、丰富文娱活动，形成特色养老模式，在南宁当地养老行业崭露头角，目前该中心持续稳健发展。

该模式充分依托市场活力，能够较好适配社区实际需求，表现出运营机制的灵活性与服务特色的鲜明性。伴随区域经济持续向好，居民消费能力稳步增强，为民办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多元投入格局逐步形成，进一步夯实了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多样，机构在运营过程中注重尊重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与生活习惯，积极融入民族文化元素，组织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从而增强服务的亲和力与老年群体的归属感，推动养老服务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助力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在现实发展进程中，机构运营的稳定性与资金保障能力仍需持续巩固，专业服务的标准化与精细化水平亦有待进一步提高，民族文化元素与日常服务的融合方式尚可进一步创新。上述问题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属于阶段性特征，为后续强化经济扶持、提升专业能力、深化文化融合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改进空间。

四、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优化路径

基于南宁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与发展特征，立足民族地区政策落地、资源支撑与文化融合的现实基础，结合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从政策保障、经济扶持、文化融合三方面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政策保障与监管优化措施

民族地区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需要坚实的政策保障与严格且适宜的监管机制。当地政府应依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针对性政策。在监管方面，秉持审慎规制理念，细化前期准入、中期绩效、后期退出规则，健全社会监督反馈体系，提高社区老人及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度，强化评估结果运用与效能[7]。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民政部门人员、社区代表以及民族文化专家，不仅监督服务质量，还关注文化服务的供给是否符合民族特色。建立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制度，对服务人员资质、服务设施安全等进行严格审查，确保符合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生活和文化需求。同时，设立投诉热线和意见箱，鼓励老人及家属反馈问题，以便及时改进，让政策保障与监管措施成为养老服务机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切实提升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二）经济扶持与可持续发展举措

经济扶持是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持续运营的关键。一方面，政府可以在资金、土地、设施和人才等多方面为在社区开展服务的养老运营主体提供补贴和政策优惠[8]，尤其对那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养老服务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拓展社会融资渠道，鼓励当地企业、慈善组织和个人捐赠，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机构自身也要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特色养老服务产品，增加收入来源。同时，优化机构内部财务管理，合理控制成本，通过精细化运营实现收支平衡，为民族地区老年人提供长期稳定且优质的养老服务，推动机构在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

（三）文化融合与观念引导策略

在民族地区，文化融合与观念引导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重要环节。机构应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将民族传统元素融入养老服务环境建设，如装饰民族特色图案、设置民族文化展示区等，营造熟悉亲切的文化氛围。在服务内容上，结合民族文化开展各类活动，如民族歌舞教学、民族故事讲述等，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增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发展受限于传统文化观念，需要迅速改变目标人群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认识，提高其知名度与美誉度[9]。可以通过社区宣传、家庭走访等方式，向老人及其家属宣传现代养老观念，强调社区嵌入式养老的优势，改变传统养老观念中对机构养老的偏见。

五、总结

本研究聚焦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深入剖析其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以南宁市为例，阐述了公建民营式和民办民营式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发展模式的成效。但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如政策执行与监管受阻、经济发展受限导致资金紧张、文化差异带来融入难题等。为此，本研究提出了政策保障与监管、经济扶持、文化融合与观念引导等方面的优化路径，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推动民族地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建武，薛继亮．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研究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 36(01): 119−131.

[2] 封铁英，齐心竹．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行为逻辑——基于中国式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案例的考察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53(01): 162−173.

[3]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M]. 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M]. 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 [J]. 社会科学战线，2011(02): 206−222.

[6] 蒋小杰，王燕玲．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分析与模式构建 [J]. 行政论坛，2019, 26(02): 110−116.

[7] 马嘉蕾，高传胜．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逻辑与实践隐忧——基于“动因—资源”分析框架的案例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41(01): 110−118.

[8] 朱浩．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社会化运作机制及其实践逻辑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37(05): 98−106.

[9] 李炎炎，刘泓萱，钱柄睿．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优化路径研究——基于西安市嵌入式养老服务实践的思考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3, 40(12): 885−89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民族地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研究”（gxmzu-chxs2024136）。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

徐娟娟

摘要：基于天津市老龄化的进程，社区居家养老已成为众多老年人普遍接受的养老方式。但是，天津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仍存在服务内容单一、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的现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如完善养老服务监管的标准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培养的标准化建设以及完善特需养老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希望推动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由标准化向精准化的飞跃。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养老服务；标准化

截至 2023 年末，天津市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20.66 万人，占总人口的 27.26%；天津市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34.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9%[1]。根据国家统计局及联合国通行标准：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于 2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于 14%，即标志着该社会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天津市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因此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依靠专业化的服务，为经济和生活自理困难的居家老年人，提供以生活照料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2]。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与其他养老模式相比，所需费用较低，服务方式灵活，可以自由选择，而且老人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社区，就能得到充满亲情的养老护理服务，老人更容易接受。但是，天津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仍然存在着服务质量难以监管的问题。基于此，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便显得尤为重要[3]。

一、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现状

（一）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标准体系的建设

天津市根据《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4421.1~5—2023）的要求构建体系，运用系统的方法，将零散的各类标准运用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包括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支撑保障标准三个项目。其中，通用基础标准包括标准化导则、术语与缩略语、符号与标志、评估、质量管理；服务提供标准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护理、安宁护理和休闲娱乐；支撑保障标准包括建筑、设施设备与用品，管理、环境安全与卫生、服务提供者（见图 1）[4]。天津市通过构建多层次、多维度、覆盖全面、结构合理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积极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引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向标准化、精细化、优质化方向发展。

（二）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标准化建设

2013 年 7 月 18 日，天津市开始实施天津市地方标准《居家养老 社区服务规范》（DB12/T 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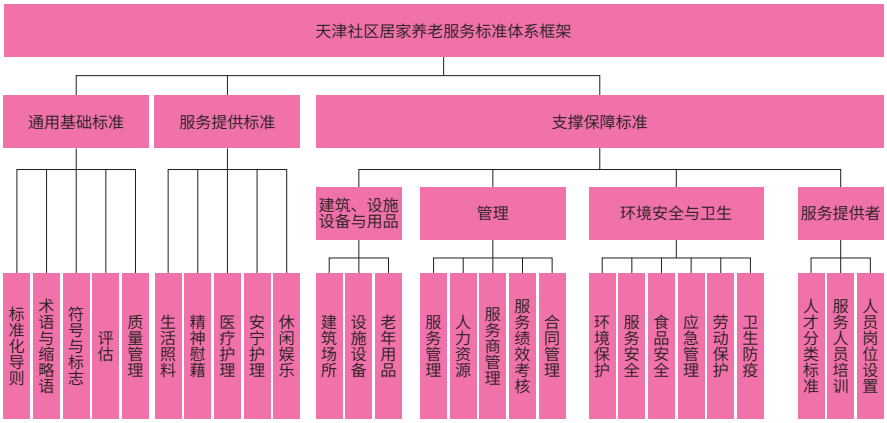


图 1 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框架

2013）和《居家养老 入户服务规范》（DB12/T 489—2013）。这两个规范涵盖了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及要求（见表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督与质量改进等内容，对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2019 年 8 月 15 日，天津市开始实施《综合养老社区服务规范》（DB12/T 890—2019），将服务内容细化为生活服务、营养膳食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与健康管理服务、交通服务、安全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咨询化服务、智能化服务、安宁服务。这个文件的出台使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更加丰富，项目更加具体。

2020 年 11 月 1 日，天津市开始实施《居家养老送餐服务规范》（DB12/T 979—2020），对于送餐的机构要求、人员要求、用品要求（送餐用车、送餐箱、餐具）、服务要求（送餐准备、装箱、运输、送达）、厨余垃圾处理以及应急与安全问题处理等都进行了标准化规定。让老年人更加放心地享受送餐服务，解决了很多老年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的后顾之忧。

表 1 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及要求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要求
生活照料	饮食服务	符合相关食品卫生规定； 饭菜无焦煳，符合老年人饮食需求； 助餐服务应符合老年护理相关规定，餐后卫生清理及时。
	起居服务	协助老年人生活起居方法得当，无不适现象； 生活起居物品整理合理，有序； 提供身体护理服务，应遵守相关技能要求。
	清洁服务	协助老年人完成身体清洁，方法得当，无不适； 定期清洗、翻晒、更换床单和衣物，无脏污； 定时打扫室内卫生，做到清洁、干净，无异味。
	助行服务	助行服务应符合约定时间和约定区域； 助行服务应做到安全出行；健康防护； 使用助行器具应事前检查、规范操作。
助医保健服务	预防保健服务	根据老年人需要协助医疗人员制定预防方案； 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发放老年病预防保健资料； 及时将老年人健康状况向社区卫生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服务对象及监护人定期反馈。
	医疗协助服务	协助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健康档案； 协助医疗护理要遵照医嘱，做到准时、专业、细致、温馨； 陪同老年人就诊须注意安全和健康防护。
	康复护理服务	督促老年人遵照医嘱，正确、安全地使用康复保健仪器； 提供保健性康复协助训练要做到科学、适度、健康。
精神关爱服务	心理疏导	应事先了解个案约谈资料，并做到准时入户； 掌握老年人心理特点和基本沟通技巧； 能够观察老年人的情绪变化，应以舒缓心情、排遣孤独为原则； 约谈过程中应当与老年人保持良性互动； 通过心理干预手段调整老年人心理状态； 尊重并保护老年人隐私。
代办服务	代办事项	代办事项应符合服务范畴和相关制度规定； 代办事项回复结果要及时、准确、完整。
	应急服务	应急服务应属于服务协议签订范围，救助及时，方法得当。

资料来源：天津市民政局官网。

（三）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及服务人员标准化建设

2020 年 11 月 1 日，天津市开始实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规范》（DB12/T 981—2020），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要求、提供服务各类机构资质、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建筑环境要求、面积床位数都进行了标准化规定[5]。同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规范》对人员配置和人员资质也进行了标准化要求，明确各社区嵌入式养老单元应按照实际入住老年人数量配备养老护理员，并对不同类型老年群体应配置的养老护理员比例作出具体规定（见表 2）。人员资质要求管理者应在任职前经过岗前培训，并接受继续教育；具有两年以上的从业管理经验。养老护理员应持有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照卫健部门的相关要求可配备具有资质的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厨师等岗位应持有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

表 2 养老护理员分时段配置比例表

时间段	自理老人	介助老人	介护老人
7:00–19:00	1:20	1:10	1:8
19:00–7:00	1:30	1:18	1:10

注：表中为最低配置比
资料来源：天津市民政局官网。

天津市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居家养老 护理人员培训规范》（DB12/T 980—2020），对社区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培训方式、培训等级、培训师资要求、培训场地与设施设备、培训学时、培训内容都进行了规定。这个文件的出台对于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及其服务质量的提高都具有深远影响。

二、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管标准化建设

尽管天津市政府出台了很多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标准化措施，如《居家养老社区服务规范》《居家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规范》《居家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规范》《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规范》《居家养老送餐服务规范》等，但由于缺乏长期的动态的服务监管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化措施很难落到实处。为了让这些政策措施能够切实地保障老年人的切身利益，各政府部门应当统一起来，共同建立多方参与、动态调整的监督管理机制，及时收取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意见，每年更新服务清单，建立“需求反馈——标准修订”的机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及内容、拓展监管方式和规范监管流程，要求各部门依据统一的监管标准开展监管工作，并主动将监管结果向全社会公开，实现

监管工作公开化、透明化。疏通老年人及其家属的投诉举报渠道，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及时监管整改效果。构建科学的智慧养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引入智能设备监控服务过程和质量[6]。

（二）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培养的标准化建设

天津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护理员大多采用的是培训方式，依托天津职业大学等高校资源，开展护理员培训，2025 年首批 120 名学员入学。截至 2023 年，天津市 65 岁以上人口共 234.04 万人，假设所有老人均能自理，按照养老护理员与自理老人 1∶20 的比例配置，大概需要养老护理员 11.7 万人。可见，养老护理的供给需求是不平衡的。同时，真正毕业于养老护理专业，接受过本科教育的养老护理员更是凤毛麟角。天津市只有天津中医药大学开设老年护理学本科专业方向，并拥有教育部认证的老年护理教学团队。而其他高校开设的社会工作、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等专业都更侧重于养老机构的运营与管理。政府应加强养老服务人才教育培养，鼓励天津市各个高等院校培养养老服务人才，支持开设养老护理、老年疾病康复等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完善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对接行业发展需求，支持相关高校建强建优养老护理等学科专业。提高养老护理员的薪酬待遇，鼓励用人单位将职业技能等级与岗位使用衔接，完善体现岗位价值、技能水平和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鼓励相关用人单位为优秀的护理人员发放资金；鼓励养老护理人员提高技能等级，实现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加大社会宣传，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

（三）完善特需养老服务的标准化建设

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中没有针对失能失智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等特需老年人制定专门的服务内容。特别是医养结合养老服务质量低、效果差，难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效果。专业的医疗资源进入社区和家庭是非常困难的，以致特需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7]。服务内容应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尤其注重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空巢老人等特需老年人的精准化服务。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制定医养结合服务标准和规范，鼓励医疗机构提供上门看病、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并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高报销比例，减轻特需老年人的家庭负担。尤其加强对特需老年服务的监管，保证服务质量、服务效果落到实处。

三、加快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由标准化向精准化的飞跃

目前，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主要涵盖全市统一的基础标准，而分区域的特色标准体系还未建立。根据不同区域老年人的不同养老需求，提出针对性的标准化建设[8]。如针对市内六区老年人的文化需求，着重推进智慧养老服务的标准化建设；针对环城四区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切实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尤其是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互认；针对远郊五区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促进助农村互助养老的标准化建设。

四、结语

通过对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也存在着进步的空间，希望通过完善养老服务监管标准化建设和养老护理员资质标准化建设、特需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提高天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整体水平，实现从“标准化”向“精准化”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天津统计年鉴 202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

[2] 古奇奇．“时间银行”助推民族地区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探析——以南宁市为例 [J]. 百色学院学报，2025, 38(03): 82−92.

[3] 李俊凯，席榕鸿，杜永红，等．基于标准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J]. 中国标准化，2024(22): 139−144.

[4] 刘锦枌，朱昌灵，李晓茵，等．养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南海区养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的实践探索 [J]. 中国标准化，2021(04): 40−42.

[5] 俞舒敏，邢以群．基于全人全程视角的国内外先进地区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比较分析 [J]. 中国标准化，2023(19): 50−57.

[6] 高秀文，唐咏．失能老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5, 42(06): 612−618.

[7] 曾勇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泉州市为例 [J]. 南方论刊，2023(10): 52−54.

[8] 金牛，刘梦琦．供需视角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评价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J]. 老龄科学研究，2023, 11(11): 26−3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服务贸易标准化科研课题研究项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问题研究”（FMBZH−2414）。

（作者系天津天狮学院副教授）

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台州公办托育资源优化与协同机制研究

潘妤妤

摘要：托幼一体化是为 0~6 岁儿童提供的系统性保教支持，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关键路径。在托幼一体化背景下，聚焦台州公办托育资源，通过调研当地多所省一级公办园的资源结构，系统剖析其在空间配置、课程衔接、师资结构等方面面临的现实瓶颈，设计“空间—课程—人才”三位一体的优化路径，构建“卫健＋教育”双轨管理与“政企社”多元协同的机制，以保障路径实施，形成可复制的普惠托育服务区域示范体系。

关键词：托幼一体化；公办托育；资源优化；协同机制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生育政策的相应调整以及家庭养育需求升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已成为国家重要民生工程。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2022 年少儿比重水平分别为 17.9%、17.5% 和 16.9%，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该比重处于 15%~18% 区间，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严重少子化阶段 [1]。在此背景下，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保障婴幼儿照护服务质量，对应对社会生育挑战、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具有重要作用。托幼一体化作为整合 0~6 岁婴幼儿照护与教育资源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已从政策倡导逐步走向地方具体实践。台州市作为全国民营经济发祥地，凭借优良创新环境和优质就业岗位，对青年人口虹吸效应显著。托育难题既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痛点，也是影响他们留城决策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公办托育资源与家庭对优质托育服务的快速增长需求相比，存在明显短板。

一、托幼一体化的内涵与台州实践模式

（一）理论内涵：从“分段治理”到“系统供给”

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学派最早开展托幼一体化研究，至 20 世纪 80 年代，发达国家倾向将托儿所和幼儿园整合，呈现托幼一体化发展态势 [2]。托幼一体化绝非 0 ~ 3 岁婴幼儿与 3~6 岁儿童的简单空间合并，其核心是遵循婴幼儿连续发展的生理与心理规律，对照护与教育服务进行体系化整合。托幼一体化是指在尊重儿童差异性的前提下，实现学龄前儿童保育与教育工作的相互渗透 [3]。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上卫生健康部门主导“育”、教育部门主导“教”的分段治理格局，推动两者在管理主体、政策标准、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质量监管等方面的贯通衔接，最终实现“保教融合、管理协同、资源互通”的系统性供给。

（二）台州市的主要实践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 [4]。台州市政府先后出台《台州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台州市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行动幼有善育专项实施方案（2023—2027 年）》等多项政策，其中后者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5]。截至 2025 年 6 月，台州市共有 255 家公办托幼机构，其中 90% 以上是公办托幼一体机构，台州市区（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成功入选幼托一体改革省级试点。

实地调研中发现，台州市公办托育资源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供给：一是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即公办幼儿园利用现有场地与师资开设托班，主要招收 2.5~3 岁的幼儿，是目前扩大普惠托位的主要方式。二是公办托育机构试点，即新建或改建专门面向 0~3 岁婴幼儿的公办托育机构，作为区域资源中心，承担示范指导功能。

二、现实困境：台州公办托育资源优化面临的多重挑战

通过对台州市样本幼儿园的现场观察以及与园所管理人员的访谈，发现当前公办园开展托育服务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瓶颈。

（一）物理空间局限与功能适配不足

在幼儿园公办园向下延伸办托时，物理空间和功能适配的不足非常明显。幼儿园公办园园舍本身最初严格依据 3~6 岁幼儿身心发展指标设计，转向接收 2.5~3 岁幼儿时，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与使用不便。例如，

卫生间盥洗台尺寸、马桶尺寸不符合低龄幼儿使用需求。室内活动区域的墙面、地面、柜子等防护标准未针对跌撞风险进行升级。更为普遍的是，调研涉及的公办园所均缺少专项哺育护理空间，尿布更换台等专项区域的缺失，不仅影响照护质量，也难以满足年轻家庭的实际需求。

（二）保教课程断层与评估标准缺失

婴幼儿时期是智力迅速发展的关键阶段，现有幼儿园课程体系围绕 3~6 岁儿童的发展目标设计，没有向下延伸形成系统化的 0~3 岁婴幼儿课程体系框架，保育与教育内容呈现断裂现象。调研发现，托班阶段的保教活动存在两种极端：一是简单强调知识启蒙，二是过度偏重生活照料。此外，在游戏材料投放上，其与婴幼儿年龄的匹配度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婴幼儿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评估标准方面，保育与教育未能实现理念与实践的有机融合，目前尚未形成相应的统一标准。

（三）师资结构单一与专业能力短板

托育师资质量直接决定托育服务水平。未来出生人口变化和入托率提升是影响托育师资需求增量的两大主要因素[6]。台州市托育重启服务时间较短，当前托育师资缺口较大。调查发现，多数公办园托育师资由学前教育专业人员临时培训转岗，部分人员甚至还没有经过系统培训，而学前教育与托育的人才培养的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目前，当地仅一所高职院校开设早期教育专业，用于培养托育专业人才，还没有本科层次相关专业布局。

三、路径设计：从资源瓶颈到系统重构

针对公办园托育服务面临的上述三方面瓶颈，提出从空间、课程以及人才三条相互支撑的优化路径，具体如下。

（一）空间复用与模块化改造

城市、乡村、城乡接合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家长对托育环境的要求也有所区别。在园所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空间复用与模块化改造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原有托育园舍空间不足时，可以灵活采用分时利用模式，将部分专项活动室在特定时段改造为托班活动区；通过轻型隔断、可变家具，实现托班活动区的灵活围合与弹性扩展。在适幼化改造与安全标准升级方面，制定相应的改造标准，对地面防滑、墙角软包等进行标准化改造。此外，还可以增设尿布台、配餐间、观察隔离室，满足低龄婴幼儿特殊照护需求。

（二）保教课程梯度衔接

1. 区域特色指导大纲

区域的发展具有典型性。为推动托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依据教育部《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教基〔2022〕1 号），结合台州地方实际，构建可为保教实践提供操作指引的过程质量评价体系[7]，系统推进 0~6 岁托幼一体化发展，立足本地实际，规划本土化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为托育机构提供明确指引。

2. 课程资源包

课程资源包是整合区域特色资源、创新托育模式的关键。重点开发 0~6 岁托幼一体化游戏活动方案，按照主题分类，每个主题下设 0~1 岁、1~2 岁、2~3 岁及幼儿园小班衔接等不同年龄段的游戏活动方案，确保各年龄段活动既符合相应发展水平，又能在相似主题背景下实现能力与认知的螺旋上升。

3. 游戏材料

游戏活动在婴幼儿成长中起着特殊的教育作用，是婴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核心途径，能够让婴幼儿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促进全面成长。游戏材料是婴幼儿进行游戏的工具，其选取需以安全为前提，重点增加生活用品和本地文化元素，增强课程的生活性与本土性。托幼从业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证婴幼儿每天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各种游戏，让他们在游戏中成长发展。

4. 成长档案

成长档案是婴幼儿成长过程的客观记录，也是对婴幼儿有效的动态评估方式。建立“观察—记录—支持”的个性化成长档案，为每位婴幼儿建立电子化成长档案，通过教师日常观察记录、关键事件描述、发展检核表等，追踪其发展轨迹，重点记录里程碑式关键指标，强调个性化照护；同时，为家庭提供个性化育儿建议，实现家园共育深度衔接。

（三）人才培育与激励

当前托育服务人才队伍总量严重不足，为应对未来需求，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1. 职前培养增加输出量

加强托育相关学科建设。职业院校保育人才培养需紧密对接托育机构岗位需求与行业规范，尤其应结合地方托育服务特色（如城乡托育资源配置差异、区域性保育文化特点）优化课程体系[8]。当前托育从业人员主要为学前教育专业背景或经过育婴短期培训的人员，需立足台州和合文化特色，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托育课程品牌，提高托育人才培养质量。推行“双证融通”培养模式，推动地方职业院校开设“托幼一体化”专业方向，学生在校期间同时修读学前教育与早期照护课程，学生毕业时可获取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与保育师职业资格证。保育师资格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职业能力和岗位要求[9]。同时，对现有幼儿园教师开展托育转岗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0~3 岁婴幼儿发展特点、回应性照护、安全应急处理等。

2. 职后培训拓宽来源渠道

目前托育从业人员资质要求尚未明确，托育服务队伍的学历背景来源比较复杂，职后培训对提升现有

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和操作技能水平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可以引导现有富余幼教师资向托育行业转型，既能降低转型难度，也能有效扩大从业人员来源。

3. 提高待遇提升幸福感

托育机构应在绩效工资体系中设立托育岗位津贴、特殊照护补助等，保障托育服务人才的劳动权益；建立区别于学前教育的托育从业人员职称晋级制度；加强社会舆论宣传，营造尊重、认可托育从业人员的良好氛围。

四、双轨协同与多元共治：构建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资源优化路径的落地，需要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本研究提出“双轨管理 + 多元协同”的机制框架。

（一）“卫健 + 教育”双轨管理机制：厘清权责、流程协同

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落地，成立由教育、卫健双部门牵头的托幼一体化工作专班，强化跨部门统筹，共同审议规划、政策与重大事项；专班下设立联合办公室，负责具体日常协调与督导工作。推行“一次备案、双线监管”服务模式，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向卫健部门一次备案，备案信息同步共享至教育部门。其中，卫健部门主要负责卫生保健、疾病防控、食品安全等监督管理工作；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保育教育、师资配置、课程与保教质量等方面的专业指导工作。此外，两部门共同组织托育机构年度质量评估，共建托育服务质量标准与评估体系，联合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定期督导与评估反馈。

（二）“政企社”多元协同机制：扩容网络、提升可及性

1. 政府主导民办公助

在现有的人口情况下，部分民办幼儿园（尤其是小型薄弱园）出现关停现象，对存续的民办普惠托育点，由政府主导，按实际收托人数与评估等级给予梯度化运营补贴。

2. 激励企业补充

目前，台州市属国企台州市社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市级层面推动托育服务，以总园为核心，通过品牌效应在多个社区开设分园，形成连锁运营模式。政府应持续完善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办托育机构，积极探索在产业园区设立福利性托育点。

3. 培育“社区支持型”家庭托育

即在社区（小区）的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提供家门口的托育服务。[10] 在社区层面，支持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在专业指导下利用自有住宅开设“小微托育点”，由社区负责日常监督，托育机构提供业务指导，构建分布式托育服务网络。

五、结语

推进托幼一体化，系统性优化公办托育资源，是积极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的具体改革实践。通过“空间复用改造”“保教课程梯度衔接”“人才双轨培育”三重优化路径，构建“双轨管理—多元协同”保障机制，可让 0~6 岁婴幼儿获得优质普惠的照护与教育，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有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玉兰 .“岗课赛证”融通视阈下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 2025.

[2] 潘妤妤 . 科教融汇背景下高职学前托幼一体化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4(11): 61−64.

[3] 胡昕雨 , 张东月 , 王元 .OECD 国家“托幼一体化”相关举措及其启示 [J]. 教育观察 , 2020(09): 15−17, 2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 [EB/OL]. (2024−11−08)[2026−01−10].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411/t20241108_1161363.html?zbb=true.

[5] 台州市人民政府 . 台州市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行动专班办公室关于印发台州市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行动幼有善育专项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 的通知 [EB/OL]. (2023−12−11)[2026−01−10]. https://www.zjtz.gov.cn/art/2023/12/11/art_1229768406_59084638.html.

[6] 周亮 . 我国 0~3 岁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的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建议——基于湖南省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分析 [J]. 学前教育研究 , 2023(12): 51−62.

[7] 梁慧娟 . 过程导向 :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政策的国际趋势与本土实践 [J]. 学前教育研究 , 2023(02): 21−30.

[8] 谢珏苑 , 黎子丹 . 数字化资源对学生保育能力培养的促进作用研究——以广西商贸技师学院为例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5(23): 177−180.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 . 保育师 (中级)[M]. 北京 :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2021: 3.

[1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 党建读物出版社 , 2024: 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台州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台州公办托育资源优化与协同机制研究”（KT20250162）。

（作者单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代际互助视角下“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对家庭关系改善的协同效应探究

曾雪莲 庄伊渊 赵建业 *

摘要：本文从代际互助的角度出发，对“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对于家庭关系改善的协同效应进行系统探究，为构建和谐家庭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途径。运用文献梳理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主要对本模式促进代际沟通、增强家庭凝聚力、减少代际冲突、提高成员主观幸福感等作用进行观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老少共学、长幼互学”可以明显提高代际成员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程度，改变传统单向的知识传授方式，达成知识与情感的双向流动，使家庭关系整体改善。该种教育模式在改善家庭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为挖掘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行途径，也为家庭关系的持续改善开拓新方向。研究也提出模式优化想法，助力其在改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代际互助；老少共学；长幼互学；家庭关系；协同效应

一、引言

家庭结构及不同代际间的关系在当代社会发生明显变化，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同时，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代际沟通互动遇到诸多难题。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365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和342万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代际互助逐渐成为家庭支持的重要形式，引起部分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代际互助指的是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合作，依靠资源共享、经验传递、情感交流等方式来使家庭内部更加和谐稳定。此时，“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便应运而生，其成为激活家庭内部代际互动、化解代际隔阂的有效途径，对于家庭关系改善的协同效应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二、代际互助视角下“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的实践意义

（一）契合老龄化社会下家庭建设的现实需求

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家庭结构中老年人和儿童的相处场景越来越多，代际互动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家庭和谐。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下，代际间存在知识传递单向化的现象，沟通场景也往往是零碎的，缺少代际间互动的载体，容易造成代际的隔阂和误解。“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以共同学习为纽带，建立老年人和儿童常态化互动的平台，既回应老龄化社会家庭代际相处的现实需要，又为家庭关系改善提供可行的实践途径，使代际互助由理念变为具体行动，解决代际沟通问题。

（二）挖掘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的核心价值

家庭是教育的第一课堂，老年人有丰富的阅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生活智慧，儿童有活跃的思维、丰富的现代知识和新技能，两者都是家庭蕴藏的宝贵教育资源。这种教育模式打破传统教育中单向的知识传授束缚，达成老年人同儿童优势互补的局面，让老年人的经验、智慧与儿童的新鲜眼光相互撞击、互相滋养。共学活动使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得以传承，儿童也得到学校教育以外的特殊知识补充，家庭内部的教育活力由此被充分激发出来，从而使家庭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家庭关系改善注入教育动力。

（三）助力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协同构建

家庭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能促使代际沟通，化解代际矛盾，从而改善家庭环境，增进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进而推进和谐家庭建设[1]。这一模式所提倡的代际互助思想可以使家庭成员树立相互尊重、理解、合作的家庭价值观，使家庭成员产生正确的代际相处观念，减

少家庭矛盾的发生概率。当更多家庭采用该模式来改善关系时，就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进而使全社会形成重视代际互助、崇尚家庭和谐的良好风气，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家庭基础。

三、代际互助视角下“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的实践路径与成效

（一）多元研究方法支撑下的模式实践

为对本教育模式的实践效果有全面的认识，研究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开研究。利用文献综述法，对代际互助、“老少共学、长幼互学”、家庭关系改善等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共检索出30篇文献，其中包括学术期刊论文、政策文件、实践案例材料、理论研究专著等不同形式的文献，为研究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问卷调查法针对60岁以上老人、0到18岁儿童等多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设计调查问卷，进行一手数据的收集，内容包含参与“老少共学、长幼互学”的具体情况、家庭关系变化和代际互动的频率和质量，问卷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设计思想，全方位体现研究对象的行为表现、态度倾向和实际体验，为多方面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深度访谈法，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围绕家庭关系的变化、代际互助实践的细节、教育模式的实施效果等主要问题开展访谈，对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展开深入交流，得到更加丰富且具体的定性研究数据，以弥补问卷调查的缺陷。另外选择单亲家庭、核心家庭、隔代家庭三种典型的样本进行个案研究，主要关注模式落地途径和代际互动效果，为模式的推广提供支持。研究开始时，对各个环节的质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文献整理依据权威性和时效性这两个标准，主要选取近年来核心期刊上的文献以及最新的政策文件；问卷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不同城市、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家庭作为调查对象，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深度访谈选择20组不同的结构家庭，访谈时长不少于30分钟，详细记录与受访者的谈话；个案分析跟踪观察三个月，记录共学过程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使研究结果更加科学、可信。

（二）教育模式的多元实践形式与参与成效

“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的实践形式多种多样，适应各个年龄段家庭成员的不同需求，有效地调动家庭成员的积极性[2]。从数据可以看出，每周参加活动一次以上的家庭占75%，其中老年人每周参加活动一次以上的占82%，儿童为78%；参与主动性上，老年人表示高或者较高主动性的占80%，儿童为70%，整体75%的家庭成员能够主动参与。老年人主要的活动类型是传统文化学习、手工制作，分别占总人数的35%、30%；儿童主要的活动类型是科学探索、户外活动，分别占总人数的40%、25%；共同阅读属于通用活动类型，占总人数的20%。采用Likert量表对家庭成员对该教育模式的总体满意度进行评分，得到的平均数为4.2分，老年人的满意度为4.3分，儿童为4.1分；代际互助价值认同的总体均值为4.25分，老年人均值为4.5分，明显高于儿童的4.0分；活动形式适宜性总体均值为4.25分，代际没有显著差异，充分说明该模式的实践得到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认可。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参与偏好有细微差别，老年人更偏爱静态的、重视传承的共学活动，除了传统文化的学习、手工制作之外，部分老年人还会主动发起家风故事的分享、传统礼仪的教学等。儿童更喜欢动态的、注重体验的共学方式，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常常会主动提出问题、动手操作，户外活动也能吸引老年人的积极参与。另外，共学活动的开展场景也十分丰富，有家庭内部的书桌共读、手工制作，也有社区组织的集体共学、公益实践，进一步扩大代际互动的场景，提高了模式的可操作性与普及性，使更多的家庭可以方便地参与其中。

（三）典型家庭案例中的模式实践成效

不同的家庭结构案例实践，又再一次证明该教育模式对家庭关系改善的作用。单亲家庭以祖辈陪伴式共学为基本搭建教育环境，每天傍晚祖孙在书桌前一起读书、手工课上祖辈教孙辈剪纸拼图、周末祖孙一起在社区做志愿服务[3]。沉浸式互动使儿童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语言表达和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祖辈的阅读兴趣也被唤起，祖孙之间心理距离逐渐缩小。核心家庭形成祖辈加父母的协同共学体系，祖辈担当传统文化的传授者，开设家庭国学小课堂，讲授经典、指导书法；父母是现代教育的实践者，带领孩子做科学实验、户外观察、家庭露营。多样化共学场景不仅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还能增强孩子的文化认同感、培育科学探究精神，更能提高家庭的凝聚力。隔代家庭以技艺传承作为共同学习的纽带，祖辈通过睡前阅读经典故事的方式教授孙辈为人处世的道理，在空闲时间里教授孙辈编织、剪纸等传统技艺，并且组织公益活动义卖。互动使孙辈变得更加开朗自信、学业成绩提高，祖辈在传习技艺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晚年的价值感，有效地消解了代际隔阂。三个典型案例的家庭结构不同，共学的重点也不同，但都达到代际情感升温、家庭关系改善的目的。通过跟踪观察发现，参加共学活动之后，单亲家庭的祖孙矛盾相较于参加活动前减少60%以上，孩子性格更加开朗，核心家庭成员间的互动频率提高40%，家庭氛围更加和谐，隔代家庭之间的代际隔阂减少，祖辈和孙辈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这说明该模式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中都有较好的适应性及效果。

四、代际互助视角下教育模式改善家庭关系的协同效应与优化方向

（一）促进代际沟通提质增效

代际沟通属于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少

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通过创建常态化的共学平台，较好地推进代际沟通的次数增多和质量改善[4]。数据显示，在参加此模式之后，家庭代际沟通频率每周增加 28.6%，由原来的 2.1 次提高到现在的 2.7 次；沟通质量评分也由原来的 3.5 分提高到现在的 4.2 分，提高 20%。老年人把人生经验与知识传授给孙辈，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孙辈用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可以有效打破传统的代际沟通障碍，缩小代际间的距离。另外，85% 的被调查者认为，代际互助是情感交流的纽带，开放式问卷中也有多数家庭成员表示代际产生矛盾、误解的现象有所减少，互相之间更加懂得理解、支持，体现出该模式对增进代际沟通的作用。

（二）强化家庭凝聚力与幸福感

家庭凝聚力是衡量家庭关系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本教育模式以引导家庭成员一起参加学习活动为途径，提高家庭的凝聚力，也提高成员的主观幸福感。从数据可知，参与此模式之后，家庭凝聚力评分由原来的 3.8 分提高到现在的 4.6 分，提升 21.1%；代际冲突的频率也大大降低，平均每月的冲突次数从原来的 2.5 次减少到现在的 1.2 次，下降 52%。共同学习的活动使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家庭气氛更加和谐，每个成员都可以在共学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从而产生归属感。同时，90% 的受访者认为代际互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75% 的受访者认为儿童通过代际互助可以得到独特的知识补充，这样就形成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良性循环，也使家庭关系得到改善。

（三）教育模式的现存局限与优化方向

虽然“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对于改善家庭关系有明显的协同作用，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对农村、偏远地区的代际互助模式关注较少，样本覆盖面不够广，对模式实施后长期的家庭关系变化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跟踪[5]。针对这些局限，后续应从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一是扩大样本覆盖面，在不同地区的农村、边远地区家庭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地区家庭特点的不同，对共学的形式、内容进行调整以提高共学的适用性。二是建立长期跟踪评价体系，对模式推行之后家庭关系发生的变化展开持续追踪，及时总结经验并找出问题，进而不断改进模式的细节。丰富共学内容和形式，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员年龄层次，设计个性化、多样化共学活动并增加活动次数，进而提高家庭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使该模式更好地发挥改善家庭关系的作用。

五、结束语

代际互助视角下的“老少共学、长幼互学”教育模式，以共同学习为纽带，打破传统代际单向知识传递的束缚，达成知识和感情的双向流动，在增进代际交流、加强家庭凝聚力、缓和代际矛盾、提升家庭成员幸福程度等层面产生明显的协同效果，为家庭关系改善提供可操作的实践途径，也为发掘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创建和谐家庭提供关键依据。符合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代际互助、和谐共处的家庭价值观，对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虽然目前的研究还存在样本覆盖不足、长期评价缺乏等问题，但是经过不断地优化完善，该模式可以被更多家庭所使用，从而促进家庭关系的改善，使代际互助的理念渗透到每个家庭中，实现各代人共同进步、和谐共处。未来，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理论体系，根据不同的家庭结构特点，寻找更具有针对性的模式落地途径，使“老少共学、长幼互学”真正成为改善家庭关系、培育代际情感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汤玲珑，戴晨枭．社区服务设施代际融合模式研究 [J]. 建筑与文化，2024(11): 135−137.

[2] 孟君，李诚婧．长幼相辅：中国小城镇家庭的代际文化互动——基于小城镇家庭群体观影行为的考察分析 [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 77(04): 37−50.

[3] 曹迪，吴阿娟．“一老一小”跨代共融为老服务模式探究——以“一老一小”成长 ING 项目为例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40(02): 32−35.

[4] 杨静慧．代际分化与整合：道德传承的亲子路径 [J]. 教育科学研究，2021(08): 61−65,71.

[5] 吴思孝．重构家庭关系：项目活动中的代际互动 [J]. 家庭教育，2025(05): 34−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厦门市高职高水平专业建设项目“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厦教发〔2022〕60 号）；2023 年厦门市第三批职业院校产业学院建设项目“健康产业学院”（〔2023〕65 号）；2024 年厦门市第三批职业院校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项目“健康服务专业群”（厦教办〔2024〕73 号）；2024 年福建省终身教育提质培优项目、福建省终身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产教融合模式下老年教育的创新发展研究”（ZS24038）；2025 年福建省老年大学协会老年教育优秀论文二等奖研究成果（闽老学协〔2025〕9 号）。

（作者：曾雪莲，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助教；庄伊洢，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赵建业，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高龄失独老人养老生活与社会工作介入
——以S区S社区为例

郝冠颖

摘要：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在老旧小区居住的老年独居人群逐渐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其面临严峻的养老压力。本文以老龄化程度较高、小区环境较差的山东省S区S社区为例，采用质性调查法对老年人群的生活服务类需求、情感支持类需求以及归属感需求进行分析探讨。此外，本文关注该社区探索实践的“四助”（受助、互助、自助、善助）本地化服务模式，探讨其如何通过激发社区原动力、构建社区支持网络、整合社会资源来满足高龄失独老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关键词：高龄失独老人；养老生活；社会工作介入；“四助”服务模式

一、引言

基于政府大力发展“以人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重视发挥社会工作对基层治理的专业力量这一背景，面对当下高龄失独老人迫切的养老需求，文章以政府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化建设为依据，以具有代表意义的S区S老旧社区作为个案开展调研分析。调研结果显示，S社区在落实国家有关要求的过程中，总结形成“四助”工作经验，专业社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推动和支撑作用，将上级政策文件精神转化为可落地、温暖贴心的具体服务举措，为破解“双老”社区失独老人生活困境开展了有益探索。

二、案例背景：S社区高龄失独老人的现实境遇与需求分析

（一）社区生态素描

本文所讨论的S区S社区是中国城市中的典型社区，是处于城市基层的老年社会缩影。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影响着该区域中老年独居者的生存状态，在此将其分为自然环境、居民构成、设施条件和服务平台三部分展开分析。

自然环境：具有“双老”属性。社区住房多建于20世纪60~80年代，是城市中典型的老旧社区。在物理空间上存在与老龄化发展极不匹配的特点：楼梯没有电梯，楼道较窄、光线昏暗，公共活动场所缺少无障碍设计等，对于年迈体弱的老年群体而言，这些因素成为他们外出活动的第一大难题。此外，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狭小且单调，无法容纳更多的老年人文体及交往活动，减少了老人社会交往的空间。

这种“建筑老化”与“人口老化”并存的“双老”格局，是理解本案例所有服务实践与挑战的基本背景。

居民构成：常住人口偏少，老弱病残群体集中。最突出的特征是老龄化程度较高，这也是S社区的典型特点。相关数据显示，S社区内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0%，远高于全市乃至全区的平均水平。而庞大的老年人口中，又存在着诸多弱势族群，如高龄独居、空巢、失独等，均是失去核心家庭支撑的对象。由此造成社区老年人口数量大、养老需求多样化，养老压力突出，常规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难以满足他们的一些隐性需求。

设施条件和服务平台：资源禀赋与服务基础存在张力。一方面，作为传统老旧社区，其正式服务资源相对匮乏，市场化养老服务因老人支付能力有限而渗透率低。但另一方面，社区又蕴藏着宝贵的“软性”资产：相对稳定的居住历史培育了较为熟识的邻里关系，非正式资源丰富，部分低龄、健康的老年居民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志愿服务，构成了潜在的“老老相助”社会资本。此外，街道与社区基层党组织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因此，社区生态的主要矛盾是：如何用有限的正式性资源撬动可能的非正式性的社区性资源来解决严重的老龄化危机？这便是专业社工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二）高龄失独老人的生活图景与核心困境

居住在“双老”社区S内的高龄失独老人，其日常生活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老年生活”，而是始终处于面临各类现实挑战、应对生存风险的状态。其面临的危机是一个复杂、多元素叠加且个人化程度极强的问题集合，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在日常生活及安全保障层面，他们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生理机能自然退化，而且老旧小区适老化设施多数缺失，使得做饭、购物、清洁打扫、上下楼等日常活动面临风险与不便。不少老年人患上慢性病，

独居状态下用药依从性难以保证，突发疾病或者摔倒时无法迅速获得救助。这种“身体脆弱”与“环境风险”相互作用，构成了最基础、最紧要的生存挑战。他们的需求已超出简单的家政服务范畴，而是一个将安全预警、应急响应以及便捷生活支持整合在一起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

他们在精神情感上经历了长期深刻的创伤和社会性孤独，“失独”不是一件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终生失去的过程，在一些重要节日或者看到别人儿孙满堂的时候都有可能产生悲伤的再体验。而在老旧小区这种比较封闭、熟悉的环境中，这种痛苦有时候会因为缺少可以交流的对象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孤独。他们的社会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家庭主要成员的不在身边迅速减少，平时缺乏沟通，很容易产生抑郁、虚无情绪状态（王大华等，2024）[1]。因此，他们的需求不仅是一般性的文体活动，更是专业的哀伤辅导、安全的同辈支持空间以及长期、稳定的情感陪伴。

在社会交往及认同方面，“被剥夺”“被遗弃”的负面体验会导致其自我价值感丧失。首先，作为“父母”的核心家庭角色永远失去，加上退休后社会角色的收缩，让很多老年人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社会中的“多余者”，如果社区日常活动没有专门的设计，他们会自觉地“不合群”，从而主动远离这些活动；其次，他们由“社会人”转向“自然人”的逃避心理加剧了身心机能衰退的过程；最后，其内在诉求实质上是重构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点，在自助和助人当中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获取尊严与意义感（陈文华，2021）[2]。

三、本土实务模式解析：S社区“四助”服务体系的构建与运作

（一）模式核心理念与框架

从目前关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的实务探索中，可以看到社会工作在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社会支持网络重建诸方面的专业优势，以及其常用的个案管理、哀伤辅导、互助小组等方法（饶晶晶，2019）[3]。更难得的是，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系统提炼具体服务模式，如面向农村失独家庭的综合赋能框架（宋伊宁，2025）[4]，但今后仍需就服务模式加以整合并厘清其本土适用的条件。

近年来，关于社区为本的介入趋势的研究已有十分明确、有逻辑性的进展，即把“社区”看作主要的支持平台，由此展开构建互助网络、整合社区资源、打造综合服务生态诸种尝试（陈希慧，2020）[5]，故而介入策略从“外部输入”转向“社区共建”。但毋庸讳言，就如何在资源有限的老旧小区中将国家政策、专业力量、社区资本三者有机融合并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学界仍需要更扎实、更系统的实证研究。

S社区针对高龄失独老人实施的“四助”服务体系，并非四项服务的简单罗列，而是基于社区实际状况、有着明确价值主张的系统性干预构架，其核心理念可归纳为：以“社区”为基本依托点，依托专业力量的系统性赋能，促使服务对象实现从“被动接受救助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价值奉献者”，最终建成一个守望互助、具备韧性的社区支持体系。

由于本模式框架从“受助、互助、自助、善助”四个方面出发，又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闭环逻辑，因此很自然地可以用其来分析：

“受助”是基础与起点：以入户服务、文化关怀诸种方式主动、有计划地建立老人个人档案，由志愿者定时访视，首先保证老人基本的生存、安全等需求得到满足，也由此自然、妥帖地建立起信任关系。

“互助”是纽带与催化剂：以此激活社区所拥有的“老老相助”社会资本，即以就医陪伴、一对一倾听陪伴为切口，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结对帮扶方式重建老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由此培育社区利他氛围。

“自助”是目标与升华：从激发老人自身潜能的角度来组织楼院编织小组、小区烘焙小组的活动，通过兴趣培养、技能学习、参与公共事务等方式帮助老人重获对生活的控制感，由此自然、充分地实现内在的增能。

“善助”是支撑与拓展：充分发挥外部资源的链接器作用，将政府、医院、慈善组织等正式资源专业化、有层次地导入社区食堂、失独家庭医生两个环节，由此切实保证服务的可持续性与专业化水平。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彼此促进，形成了良性闭环：“受助”滋养“互助”，“互助”的经历有利于增强“自助”的勇气，“自助”的力量又有利于“互助”，而“善助”本身便是整个链条最可靠、最充沛的动力源。因此，该模型很好地整合了优势视角及生态系统观的精髓，把工作焦点从个体自身的不足转移到帮助其建立可持续获得助力的社会系统上。

（二）“四助”模式的具体实践与内在机制

“四助”的具体实施从四个方面入手，是一个层层推进的整体。“受助”是起点，“文化入户”和精准建档后，由社区工作者对高龄失独老人进行基本生活帮扶及简单的情感疏导，建立最基础的服务信任关系；然后进入核心部分“互助”。社区主动匹配年轻的健康老人与年长的失独老人组成“银龄互助”对子并引入“时间银行”等奖励机制，让邻里互助日常化、制度化，形成稳定的准正式支持网络，解决照护人力不足的问题；再进一步，通过建立兴趣班、鼓励老人成为“银发导师”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等方式来促进“自助”，目的是唤醒老人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意识，使其由被动的服务对象变成价值产出者，实现自我赋能；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善助”，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它通过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会公益机构、养老机构、老年大学、心理辅导中心等外部专业力量

进行有机整合，为整个服务体系提供专业性和可持续性支撑。

该模式的内在机制体现为一个从外部支持到内生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它以精准的“受助”为起点建立信任基础，以组织化的“互助”为核心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再以“自助”促进老人的个体赋能与价值重建，而专业化的“善助”资源则为前三个环节提供持续养分。同时，四者之间存在交叉叠加放大效应：助人促进被助的效果；被助的经验支持并扩大互助群体；互助带来的外部资源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助人的服务项目及效果。这种循环模式充分彰显出优势视角理念与生态系统观在实务中的结合运用，以个案为起点，并不是为了个案而开展服务，而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形成可持续的支持网络，让案主由“接受者”变为“参与者”甚至成为“奉献者”。

四、专业赋能与整合：社会工作的角色、介入策略与功能实现

在S社区“四助”模式中，社工不是主角，而是关键的专业力量之一，是重要的资源提供方以及协调人，其作用是把各项服务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持续运转起来。具体而言，社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工发挥着多种专业功能，把握服务方向与专业性。他们是“问题识别与方案设计者”，以专业的视角对社区高龄失独老人面临的多层次困难进行客观分析，并主导建构出“四助”的系统解决方案；他们是“资源开发与关系建立者”，积极联络与沟通社区卫生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即“五社联动”），把外来的“善助”资源准确、有序引入社区；他们还是“能力建设与过程催化者”，通过培训提升“银龄互助”志愿者的服务技巧，在兴趣小组中运用团体动力技巧激发老人参与，从而有效推动“互助”与“自助”环节的深化。

社会工作是具体的实务方法，其核心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方法上。在微观层面上，对于创伤较深的老人，社工采用哀伤辅导、生命回顾等个案管理技巧进行个别情感疏导。在中观层面上，社工采取社区组织和发展的方法来培育“银龄互助”的志愿者团体，实现从非制度化的邻里互助到制度化的社区互助。宏观层面上，社工是“政策影响者”，结合实务经验提出完善失独老人群体福利的本土化建议。

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人的改变”和“系统的改变”。对于老人个体而言，实现其从“被动受助”向“主动自助”的转变，即实现个体增能。对于社区系统来说，社会工作通过制定规则、连接资源、培育资本，催化了包括政府、市场、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在内的本土化养老支持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不仅体现在直接服务输出上，更体现在其运用专业理念与方法上，将国家养老政策、社区潜在资本与失独老人的真实需求创造性地连接起来，使“四助”模式成为一个有生命力、可生长且具有韧性的社区解决方法。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S区S社区为例，总结出老城区老年失独群体遭遇的安全风险危机、心理孤独危机、社会认同危机所形成的嵌套式困境，并提出单向度的救助性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四助”的实践路径是S社区对多重危机困境的有效回应。此模式以在社区中赋权为目标，实现精准“受助”、组织化“互助”、激发“自助”和专业“善助”的良性循环，形成了支持生态网络。其主要意义是突破以往服务叠加模式，通过社工作为需求评估师、体系设计师、资源整合师等身份，用专业手法连接政策、资源及社区潜能，从帮扶转化为支持生态，有效地回应了老人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需求，而专业社工是这个模式能够有效运转的核心要素。

基于以上结论，在实践中可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基于精细化需求分析基础，避免泛化服务对象；二是建立正规化的助人关系网络并推动熟人帮扶到正规帮扶转型；三是利用好社会工作者资源，将社会工作者引入项目设计及义工招募流程中。在宏观层面则需从三个维度予以完善：一是增加财政投入，专项经费用于购买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以及孵化社区社会组织，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将“五社联动”的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细化各部门职责及工作步骤，保证社会力量介入有路可循；三是，“鼓励并补贴相关‘创伤知情’课程”，培养一线工作者尤其是关爱失独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工作人员在面对此类对象时的主动意识和处理能力，推动居家和社区精准养老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大华，李金凤，杨欣悦．失独老人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状况调查报告 [M]// 高成运，李晶．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2] 陈文华．从消权到增权：老年失独妇女养老问题因应新思路 [J]. 社会工作与管理，2021, 21(02): 41−48.

[3] 饶晶晶．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失独老人社区照顾研究 [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9.

[4] 宋伊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失独家庭生活重建 [J]. 村委主任，2025(03): 66−68.

[5] 陈希慧．失独老人长期照护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D]. 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20.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延安路街道办事处松江路社区）

老幼共融服务模式的社区实践、现实挑战与优化策略

张清清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加深与少子化加剧的双重背景下，社区作为老幼服务的核心场域，老幼共融服务模式成为破解老幼照护难题、促进代际和谐的重要路径。本文将系统梳理社区老幼共融服务实践类型，主要涵盖活动驱动型、空间共享型、服务互助型。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社区实践探索中面临的服务供给供需错配、主体协同机制不畅等现实挑战，并从精准对接需求、强化主体协同、强化认知引导等多维度出发，提出了优化老幼共融服务模式的可行方案。研究拟加快推动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高质量发展，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老幼共融；服务模式；社区实践；现实挑战；优化策略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转型进入关键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 60 岁及以上、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高达 18.70%、13.50%，可见老龄化趋势持续加深。然而，2023 年出生率持续走低，一度降至 6.39‰，少子化趋势愈发明显 [1]。在双重因素叠加下，老年照护与幼儿托管等民生需求极为迫切。社区是连接政府与居民的核心载体，在长期老幼服务“分治”模式下，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且难以满足代际交流的实际需求，在此背景下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2]。因此，下述将全面梳理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实践类型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该模式顺利实践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一、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的实践类型梳理

（一）活动驱动型模式

目前来看，社区已成为老幼共融服务的核心场域。结合社区资源禀赋及老幼群体实际需求，现已形成多元实践形态。其中活动驱动型模式以主题互动活动为核心载体，属于社区老幼共融初级形态。深入探究其核心逻辑，通过场景化活动搭建代际沟通桥梁，切实拉近老幼的心理距离。在具体实践中，社区主要结合传统节日、幼儿成长需求设计活动，例如组织开展“老少共话习俗”茶话会、“银发课堂”兴趣班等。在此类活动中，促使老年人传授生活经验、传统文化等，幼儿则主要传递活力与陪伴 [3]。该模式优势显著，其落地门槛低、覆盖面广，活动中可快速营造共融氛围。然而活动大多阶段性开展，缺乏长效规划，难以形成持续代际互动效应。

（二）空间共享型模式

对于空间共享型模式，主要以社区公共空间整合为核心，拟通过打破老幼服务空间壁垒，为常态化共融提供物理支撑。在实践中主要通过两种路径传递服务，一种为“共建共享”，新建或改造社区服务设施时，需同步规划老年康养区、幼儿托管区及共享阅读、手工等功能区；另一种为“错时共享”，灵活地整合现有养老驿站、社区幼儿园等资源，在非高峰时段开放共享。这一模式下可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推动老幼共融由阶段性逐渐转变为常态化，但因受老旧社区场地限制，且老幼活动需求差异显著，在空间共享中面临较大的安全管理与秩序维护压力。

（三）服务互助型模式

服务互助型模式以老幼需求互补为核心，属于共融服务高级形态，旨在实现老幼双向赋能与深度联结。实践中由社区主导搭建互助平台，引导有经验的老年人组成“银发托管队”，负责提供幼儿临时照料、成长指导等服务。同时组织幼儿开展“爱心陪伴”活动，为老年人表演节目、协助简单家务等。部分社区还尝试引入“时间银行”机制，通过存储老年人服务时长兑换未来养老服务。该模式可精准对接供需，强化代际情感联结，然而对于社区组织协调、人员筛选培训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难以广泛推广 [4]。

二、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实践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但受资源禀赋、治理能力等多重因素制约，仍面临多维度现实挑战，严重制约服务模式可持续发展。

（一）服务供给层面，供需错配与质量不足并存

从服务供给层面看，作为保障老幼共融服务落地见效的核心载体，服务供给适配性直接决定整体服务

价值。目前服务供给突出问题集中表现为供需错配、质量不足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社区老幼共融服务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其服务内容同质化严重，主要集中于节日娱乐、浅层互动等通用型活动，针对高龄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留守儿童情感陪伴等个性化需求回应不足[5]。另一方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该领域专业人才。现有社区服务提供者主要为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这一群体缺乏幼儿教育、养老护理等专业资质；再加上培训与评价机制缺失，通常仅简单告知安全注意事项，未系统性开展技能培训工作，忽视服务实效与群体满意度。

（二）主体协同层面，多元主体联动机制不畅

在老幼共融服务高效推进中，需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各方力量有序联动形成服务合力。然而，当前多元主体间的联动存在梗阻，协同效应难以形成。具体表现为主体定位失衡，政府主导性过强，主要资金来源仍是财政投入，反观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力量，因缺乏政策激励参与积极性普遍不高，专业优势发挥严重不足。与此同时，社区统筹能力不足，因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专业素养欠缺，无法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利益关系，致使服务推进效率相对低下。在家庭层面，部分家庭对共融服务的认知不足，过于担忧老幼安全而不愿参与；社区自身缺乏有效动员机制，导致“社区—家庭”协同推进格局无法形成。

（三）保障机制层面，制度支撑与风险防控不完善

在保障机制层面，其短板集中体现在制度支撑、风险防控不完善。一方面，制度支撑缺失，国家层面尚缺乏针对性政策，地方政策以原则性规定居多，仍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扶持措施等明确规定，因而社区开展服务时频频面临政策依据不足、资源获取困难等困境。另一方面，资金保障单一，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投入且规模有限，无法全面满足设施建设、专业人员薪酬等需求。

（四）社会认知层面，代际偏见与认知偏差阻碍实践推进

在社会认知层面，作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顺利落地的重要社会基础，良好认知氛围可以为社区实践推进提供广泛支持。但由于社会认知存在偏差，一度成为阻碍实践开展的核心障碍。首先是理念认知不足，部分居民认为老幼生活习惯、需求差异大，难以有效开展共融服务，对实践持怀疑态度，不愿支持和参与[6]。其次是代际偏见根深蒂固，部分年轻人认为老年人思想保守、行动迟缓，无法胜任幼儿照料教育；部分老年人则认为幼儿活泼难管，不愿与之接触，这一偏见直接阻碍代际信任与有效沟通，致使服务推进过程中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

三、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的优化策略

在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实践中，需精准对标核心痛点，从需求对接、主体协同、保障机制等关键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兼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改进体系，推动服务模式实现从初步探索转型至高质量发展。

（一）精准对接需求，构建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体系

目前供需错配已成为制约社区老幼共融服务实效的核心症结，实践中需精准对接老幼群体需求，重构服务供给体系。具体以老幼群体需求为核心导向，构建全周期需求调研与动态响应机制。社区可联合专业机构开展调研，通过入户访谈、分层问卷、焦点小组等多元化方式，系统地摸排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差异化需求，诸如低龄健康、高龄失能、独居空巢老人群体，以及学龄前、学龄后幼儿群体的差异化需求[7]。调研中重点关注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留守儿童情感陪伴等特殊需求，并以此为依据建立动态更新的需求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分层分类服务内容体系。其中基础层聚焦普惠性服务供给，主要提供错时托管、节日互动、健康监测等基础保障服务；提升层侧重个性化服务设计，全面打造老幼结对成长指导、老年特长分享课、幼儿兴趣启蒙班等特色服务；专业层可强化专业化服务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社工机构、康养机构等，主要负责提供心理疏导、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

（二）强化主体协同，构建多元联动的服务治理格局

当前主体壁垒导致多元主体联动不畅，是导致共融服务效能不足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进一步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明确各方定位并搭建联动平台，助力形成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治理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亟须转变现有角色定位，从主导供给转向政策赋能，加快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将老幼共融服务纳入社区治理考核指标。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予以参与老幼共融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税收减免、场地支持等激励措施。政府还需统筹规划资源，切实推动养老、教育、卫健等部门资源向社区下沉，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

在社区层面，着重强化核心统筹能力，可尝试成立专门的老幼共融服务工作组，小组内配备专业社工，主要职责为统筹需求对接、资源整合、活动组织等多项工作。搭建线上加线下联动平台，基于该平台定期召开多方联席会议，及时沟通解决老幼共融服务推进中面临的各类问题。

对于市场与社会力量，需要激活参与活力，引导企业通过公益捐赠、项目合作等方式深度参与服务设施建设与运营过程。鼓励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承接个性化、专业化服务项目。在家庭层面应强化协同意识，社区可依托家长学校、宣传手册等载体普及共融服务知识，搭建家庭参与平台鼓励家长参与服务策划与监督，逐步形成社区牵头、家庭共建的协

同格局[8]。

（三）完善保障机制，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为进一步优化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需从保障机制切入，从制度、资金、风险维度构建全方位支撑体系。

在制度保障方面，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建议由国家层面出台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指导意见，明确服务标准、主体责任、扶持政策等核心内容；地方层面应当结合服务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重点细化场地规划、资源整合、人才培养等操作规范，为社区服务实践提供明确的政策依据。

从资金保障来看，亟须构建多元筹措、精准使用资金体系。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主要鼓励社会捐赠、公益众筹，并引导企业投入一定比例的公益资金。同时可尝试建立资金专项管理机制，明确资金使用具体范围，诸如设施改造、人员薪酬、活动开展、培训认证等多个领域。在资金调配中公开资金使用明细，确保专款专用。

从风险防控层面看，应建立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基于该体系制定服务场地安全标准，配备必要安全设施、急救设备等。针对服务人员需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明确服务过程中安全责任划分；针对老幼群体特点制定应急处置预案，主要涉及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纠纷冲突等各类场景，与周边医院建立绿色通道，有效降低安全风险压力[9]。

（四）强化认知引导，营造老幼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

对于认知偏差与代际偏见，需通过多维宣传与互动体验强化认知引导，筑牢社会认同基础。

首先，开展立体化宣传普及工作，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多元渠道，系统地解读老幼共融服务内涵价值。通过分享优秀实践案例，助力破除老年人带孩子的片面认知，重点强调其在代际和谐、社区凝聚、老年人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深层意义[10]。社区通过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精准宣传。针对老年人群体，宣传中着重强调参与服务的健康价值、情感价值等，向家长传递服务安全保障与教育意义。

其次，搭建常态化代际互动平台，除传统节日活动外，可打造祖孙共读、代际才艺展、社区公益日等固定互动品牌，促使老幼群体在高频次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消除偏见；活动中可尝试邀请参与家庭分享体验感受，通过现身说法增强宣传说服力。除此之外，在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实践中，需培育社区共融文化，尝试将代际互助、和谐共生理念深度融入社区公约，助力打造共融文化墙、主题长廊等文化载体，最终形成人人支持共融、人人参与共融的良好社区氛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社区老幼共融服务模式已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叠加挑战的重要路径。尽管实践中仍面临供需错配、协同不畅等挑战，但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强化主体协同等优化策略可有效破解相关难题。未来，随着老幼共融服务模式持续完善和推广，将进一步促进代际和谐，夯实社区服务根基，为构建和谐社区治理新格局提供全面支撑。

参考文献

[1] 周游 . 代际互惠驱动下社区嵌入式老幼共育一体化服务的现实困境及实施路径 [J]. 中国成人教育 , 2025(21): 17−25.

[2] 焦玲玲 . 数字化赋能“老幼共融、双龄共养”社区建设研究 [J]. 才智 , 2025(30): 185−188.

[3] 于颖 , 王祥凤 . 数智时代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的创新模式探析——基于老幼共融视角 [J]. 成人教育 , 2025, 45(10): 24−32.

[4] 魏琰 , 孙聪 , 汪松 . 基于代际共融的社区老幼公共服务空间设计研究 [J]. 包装与设计 , 2025(04): 120−121.

[5] 谭晓婷 , 张艺昕 , 王洛忠 . 从嵌入到共生 : 社会力量持续赋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研究——以 YY 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实践为例 [J]. 理论探讨 , 2025(04): 99−106.

[6] 李敏 . 服务学习 :“社区工作”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 2024, 36(06): 106−110.

[7] 山显光 . 社区服务学习 :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模式探索 [J]. 国际公关 , 2024(01): 164−166.

[8] 林诚彦 , 卓彩琴 .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选择与实践整合——基于社区能力建设理论的社区服务行动研究 [J]. 社会工作与管理 , 2022, 22(06): 77−91.

[9] 贴近社区服务着力实践育人“两向四化”助力高校、社区牵手成功 [J]. 中国共青团 , 2022(19): 52−53.

[10] 朱先平 , 崔月琴 . 多元共治背景下社区服务市场化的路径思考——基于 C 市养老服务 PPP 项目的社区实践 [J]. 福祉研究 , 2021(01): 1−11.

（作者单位：山东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阳光社区）

老年人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及支撑体系研究

雒香云 施 健*

摘要：为促进养教结合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完善的养教结合体系，而完善的养教结合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养教结合支撑体系。本研究在详细梳理这两部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和养教结合支撑体系。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在老年人和养教服务提供者之间搭建了服务桥梁，包括养教结合服务定位、养教结合服务与供给主体的关系；养教结合支撑体系包括政策制定、组织管理、专业人才管理以及智能化四个方面的支撑要素，保障养教结合体系有序运作。

关键词：养教结合；供给模式；支撑体系

一、引言

在社会持续演进与科技日新月异的双重推动下，民众的生活品质实现了显著跃升，老年群体的平均寿命亦随之稳步延长。这一背景下，当代老年人愈发重视自身的生命质量，他们内心深处涌动着对知识的不懈追求，渴望通过持续学习来丰富晚年生活，进而拓展生命的宽度并深化其内涵。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已日渐成熟，而面对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如何将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有效结合起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养教结合应运而生。老年人养教结合体系是将老年养老服务和教育服务融合起来提供给老年人的体系，成功的养教体系不仅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所需、健康护理、精神慰藉，更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教育需求，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才能保障老年人的需求得到全方位的满足。养教体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有效的养教结合供给模式的构建以及保障其有序运转的支撑体系。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支撑其运转的两大体系的研究，为养教结合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相关研究综述

本研究分别从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和支撑体系两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现状进行分析。

在针对老年群体的养教服务供给领域，国内众多学者指出，我国当前的养教服务体系尚存在诸多短板。据张红兵等人的研究，我国在养老服务与教育服务的供给上均显不足，且现有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层次仍有待提升[1]44。而王守霞通过深入调研山东地区社区养教结合的实践情况后发现，资金短缺以及管理机制的不完善，是当前阻碍养教结合模式深入发展的主要瓶颈[2]。刘晨曦则分析了成都市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现状，指出需要从目标制定、管理机制、服务资源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3]。国外学者针对老年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例如，部分学者着重指出，在推动养教融合的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应当发挥核心主导作用，通过系统地统筹规划与资源调配，有效促进养教结合服务的全面落地与持续优化（Weaveretd，2009）[4]。同时，也有学者探究养教服务的多元供给（Minichiello，2005）[5]。

在养教结合支撑体系方面，学界普遍达成共识认为其具有复杂性。养教结合支撑体系的政策制定方面存在政策不稳定、可持续性差等问题（李盛聪，2024）[6]。为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应该加强顶层设计（胡啸兵等，2021）[7]。 养教结合的组织管理主要涉及养老机构与教育机构的资源整合、服务协同以及管理机制的建立。学者们普遍认为，养教结合不仅要求在教育内容上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更需要在管理机制上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例如，张红兵指出，养教结合老年教育模式应涵盖教育理念的融合、管理机制的协同以及服务内容的整合等多个方面（张红兵，2020）[1]47。养教结合模式下，需要既有教育专业知识又有养老护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但这类人才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智能化手段的引入为养教结合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有效联结各方资源提高服务供给效率（于鹏等，2024）[8]。

三、老年人养教结合体系的构建

老年人养教结合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设计好其两个核心部分：养教结合供给模式和养教结合支撑体系。在养教结合供给模式中教育组织和养老服务组织作为养教结合的输入方，为体系提供各种服务，而整个体系为老年人输出养教结合服务。在养教结合支撑体系

中输入与输出行为都发生在养教结合服务平台上，养教结合服务平台的有序运转离不开各种支撑元素的有效支撑，支撑元素包括养教结合相关政策、组织管理、专业人才管理、智能化（见图 1）。

四、老年人养教结合供给模式

老年人养教结合供给模式的设计主要确定两大关键问题：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定位、养教服务各参与方的关系。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定位主要解决应该提供什么服务、服务应该达到何种标准的问题。养教服务各参与方的关系问题主要解决各参与方在养教结合供给模式中承担何种角色，以及他们之间通过何种方式联结的问题。

（一）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定位

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的定位，核心在于明确应提供何种层级的养教服务——究竟是聚焦于保障老年人的基础生活与教育需求，还是致力于满足其更高层次的养老与教育追求，并在此基础上，量身定制出契合养教结合服务定位的具体内容。在实践操作中，实现这一精准定位可通过以下路径展开。（1）需求调研与内容方案制定。首先，通过深入社区开展老年人需求调研，精准捕捉老年群体的实际服务需求；其次，组织老年教育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结合调研结果，共同制定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的具体内容框架与实施方案。（2）课程设计与服务创新。依据既定的养教结合服务内容方案，精心设计一系列贴合老年人学习特点的多样化课程及养老服务计划。课程设计需注重系统性，既涵盖满足老年人基本休闲娱乐需求的课程，也包含旨在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的提升性课程，如通过系统训练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活技能等，确保课程内容既丰富又具深度。（3）课程的试点与改进。将开发的系列课程在一些典型社区进行试点，发现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课程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与改进。（4）科技赋能服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相关课程赋能，比如利用线上教育平台惠及更多老年人，利用智能设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便捷度与社会参与度。

（二）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与供给主体的关系

本研究按“照服务监管方—服务提供方—服务使用方”的思路将养教结合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四部分，分别是政府、老年教育组织、老年服务中心、老年人。

1. 政府

政府作为服务监管方，不直接参与养教结合的运作，承担着引导各方利益团体达成合作，实现保障老年人获得所需养老服务和教育服务的目标，在具体实施中合理协调各方关系并有效分配相关资源的责任。

2. 老年教育组织

老年教育组织作为教育服务的重要提供者，肩负着为老年群体量身打造适宜教育服务的使命。如何精准对接老年人的教育需求，并开发出助力其全面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该组织必须深思的关键议题。在构建老年人养教结合的综合性体系中，老年教育组织与养老服务中心的协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双方如何有效发挥各自专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整合，是确保整个养教结合体系得以持续、稳健运行的核心所在。

3. 养老服务中心

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养老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肩负着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便捷化养老服务的重要职责。得益于其设施场地通常紧邻老年人居住区域这一独特优势，养老服务中心能够为养教结合模式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硬件设施支撑与空间保障。养老服务中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自身资源的有效利用，积极寻求教育组织的合作，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既能实现自己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也能通过更加丰富、层次分明的养老服务、教育服务获得老年人的青睐。

4. 老年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我国老年人受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他们不再局限于过去生活得好、玩得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更渴望精神生活的不断提升，社会参与度的不断提高，自我价值的不断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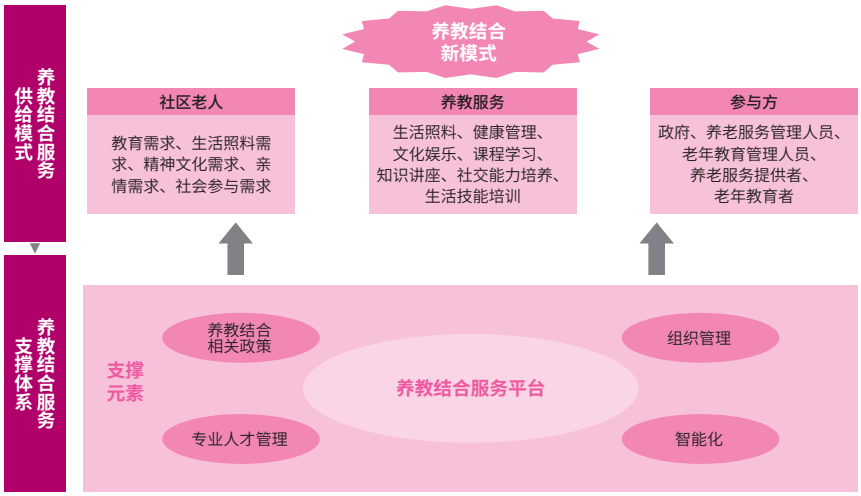


图 1 养教结合服务体系框架

五、老年人养教结合支撑体系

养教结合供给模式确定了整个养教结合体系的基本“骨架”，但是这些骨架如何连接起来并运转起来是养教结合支撑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具体来说，老年人养教结合支撑体系包括养教结合相关政策制定、养教结合组织管理、养教结合专业人才管理、养教结合智能化。

（一）养教结合相关政策制定

养教结合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首先在政府层面，应该出台促进养教结合的法规制度，促进养教结合的开展，并进一步规范养教结合的规范化进程，与此同时要出台相关的激励保障措施，保障养教结合体系的有效运转，最后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监督养教结合合法合规地开展。其次是养老服务中心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保障养教结合的场地、人员、资金能够按时到位，有效利用。老年教育组织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障自己的课程能够高质量地融入养教结合体系中。

（二）养教结合组织管理

“养教结合”涉及养老、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牵涉众多机构与职能部门，因此必须构建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机制，以保障整个服务体系朝着既定目标协同运行，实现资源整合与服务优化。建立这一机制的首要任务是选择适配的组织架构模式。常见的组织架构包括职能式和项目式两种。职能式架构强调专业化分工，可设立生活保障服务部、医疗照护部和老年教育部等职能部门，分别负责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健康管理和教育活动，实现职责清晰、管理有序。而项目式架构则以特定服务目标为导向，例如设立“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专项计划”“老年人身体机能康复项目”等，通过跨部门协作，集中资源解决特定问题，提升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在确定组织架构的基础上，还需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体系，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权限，制定规范的工作流程，并配套相应的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以增强组织运行的规范性与执行力。此外，资金管理是“养教结合”组织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是保障服务长期运行的基础。资金来源应多元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支持，包括财政拨款、土地划拨、税收减免等政策性投入；二是社会公益资金，如企业捐赠、个人捐助及慈善基金支持；三是服务性收入，即通过提供差异化、有偿的养老托育服务所获得的合理回报。

（三）养教结合专业人才管理

养教结合模式下的人才管理，需针对管理人员、医护人员、教育人员及服务人员等不同岗位类型，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管理策略。具体而言：针对管理人员，核心挑战在于协调养教结合体系中多方参与主体。鉴于不同人员分属不同机构，需构建一套权限明晰、协同高效的管理机制，确保管理人员具备充分权限，能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医护人员管理方面，重点在于严格资质审核。特别是针对特殊老年病患的照护岗位，必须确保医护人员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与丰富的医护经验，实现专岗专人、人岗相适，以保障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教育人员管理则侧重于课程开发与教学实施。需精心设计符合老年人学习特点的课程体系，并加强教学过程的监督与管理，确保优质教育资源能够精准、有效地传达给老年学习者。服务人员管理主要聚焦于操作流程标准化与服务态度规范化。通过制定详细的服务规范与操作流程，加强服务过程中的监督与指导，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与老年群体的满意度。

（四）养教结合智能化

智能化技术的蓬勃发展，已深度渗透并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养教结合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则成为新时代背景下该领域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与挑战。借助智能化技术构建多元化服务平台，是实现养老服务、医疗服务与教育服务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通过网站平台、移动应用等线上渠道，老年人能够便捷地预订所需服务，无论是日常照料、健康管理还是继续教育，均可一键触达，极大提升了服务获取的便利性与效率。智能设备的普及应用正深刻重塑着老年服务的模式，显著提升了服务的精细化与人性化水平。

六、结语

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老年人受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如何运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其价值，满足新时代老年人的需求，就成为养老领域面临的考验。养教结合模式应运而生。养教结合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激活并充分利用现有养老资源的内在优势，还能有针对性地弥补老年教育领域资源的相对不足，通过跨领域、跨部门的资源整合与力量汇聚，切实保障老年人受教育权利的充分实现。从系统论视角看，养教结合构成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该系统既涵盖了养老服务、医疗健康服务、老年教育服务等核心功能模块，又涉及政府、养老服务机构、老年教育组织、老年群体等多个利益相关方。这些功能模块与参与主体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共同构建起一个有机统一的老年人养教结合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红兵 . 养教结合社区老年教育模式研究 [J]. 成人教育 , 2020, 40(12): 44−51.

[2] 王守霞 . 山东省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问题及对策研究 [J]. 山东开放大学学报 , 2024(02): 37−39.

[3] 刘晨曦 .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问题与路径研究 [D]. 成都 : 四川师范大学 , 2022.

[4] Weaver G D, Kuo Y F, Raji M A, et al. Pain and disability in older Mexican−American adults[J]. J Am Geriatr Soc, 2009, 57(06): 992−999.

[5] Terrence H, Victor Mi. The contribution of music to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people: an Australian qualitative study[J].Ageing and Society, 2005, 25(02): 261−278.

[6] 李盛聪 .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 : 意涵、问题与策略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1(02): 136−144, 206.

[7] 胡啸兵 , 胡宏力 , 赵军镜 . 数字时代我国社区教育模式的系统重构 [J]. 广东开放大学(下转 85 页)

社会化健康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中的作用研究

李盈盈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的背景下，老年慢病管理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共健康负担的重要问题。社会化健康管理作为一种整合医疗、社区与社会资源的健康治理模式，为老年社区护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本文基于社会健康治理与慢病管理理论，系统分析社会化健康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中的作用机理与现实价值，重点探讨其在健康风险识别、行为干预、护理协同及社会支持构建等方面的功能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社会化健康管理深度融入社区慢病管理护理体系的实施策略。研究认为，以社会化健康管理为导向的社区护理模式有助于提升老年慢病管理防治的整体效能，对构建可持续的老年健康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社会化健康管理；慢病管理；老年人；社区护理

一、引言

以骨量减少、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的全身性代谢性骨病，属于慢病管理的范畴之一，在老年人群中具有高发性和隐匿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慢病管理其相关骨折所引发的功能障碍、失能风险和医疗负担问题日益凸显。现有防治实践多以医疗机构诊疗为核心，强调药物治疗和定期检测，但在长期随访、行为干预与日常护理支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社区层面，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仍有待增强。在此背景下，将社会化健康管理引入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医疗模式的结构性短板，也为慢性病防治从“被动治疗”向“主动管理”转变提供了现实支撑。因此，从社会治理与社区护理融合的角度系统探讨社会化健康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防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社会化健康管理与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化健康管理的理论渊源与内涵界定

社会化健康管理是基于传统健康管理理论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健康治理理念，它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健康促进理论以及社会支持理论[1]。健康促进理论着重指出，健康并非仅仅依靠医疗干预，而是会受到行为方式、社会环境以及制度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倡导借助改善生活方式和社会条件来达成疾病风险的源头控制。社会支持理论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说明个体的健康行为和健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系统所给予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社会化健康管理突破了以医疗机构为唯一主体的健康干预模式，把健康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系统里进行审视和应对。

在老年慢病管理防治方面，社会化健康管理把骨密度下降、跌倒风险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当作可干预的社会性健康问题，而不是仅仅当作医学指标异常来进行被动处理[2]。该理念凭借引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区组织、家庭以及社会力量等多个主体协同参与，让健康管理从“疾病发生后的治疗”转变为“风险发生前的干预”，并且将管理重心提前到社区和家庭层面。这种以社会协同为特点的健康管理模式，为老年慢病管理的长期防控提供了更具可持续性的理论支持。

（上接 84 页）学报 , 2021, 30(06): 1−6.

[8] 于鹏 , 刘俊梓 .“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学习型家庭建设现状及发展策略 [J]. 嘉应文学 , 2024(05): 131−13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养教结合模式研究”（JSS−B−2022011）。

（作者：雒香云，江苏开放大学讲师；通信作者施健，江苏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

（二）社区护理视角下老年慢病管理的管理特征与需求

从社区护理角度来看老年慢病管理，它有着较强的慢性病管理特性，其发生发展进程缓慢且隐匿。受生理老化、营养状况、运动水平以及社会支持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仅仅依靠阶段性医疗诊疗，一般很难及时察觉风险变化，在生活方式干预以及长期随访方面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完整流程。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健康风险监测、行为干预以及护理延续方面有着天然的有利条件，是开展慢病管理长期管理的关键依托[3]。

社会化健康管理借助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护理人员、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照护资源，在社区层面构建起连续且动态的护理支持系统。一方面，社区护理人员依靠社会化管理机制，可在日常服务中持续进行健康评估、风险提示以及行为指导。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利于把护理措施延伸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提高干预措施的可执行程度和稳定性。从理论方面来讲，这种模式切实强化了社区护理服务的整体性与协同性，让慢病管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专业服务，而是融入社会支持网络中，为老年慢病管理的长期护理提供了制度化的根基。

表 1 所示为社会化健康管理与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的理论对应关系。

表 1 社会化健康管理与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的理论对应关系

理论维度	核心观点	对社区护理的启示
健康促进理论	健康受行为与环境共同影响	强化社区层面的运动、营养与跌倒预防干预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关系影响健康行为与结果	构建“家庭—社区”协同的护理支持网络
社会化健康管理	多主体协同、资源整合	推动社区护理由服务供给向系统管理转变
慢性病管理理念	重视长期随访与连续干预	建立社区慢病管理护理闭环机制

三、社会化健康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中的作用机制

（一）健康风险前移与社区精准识别机制的形成

在社会化健康管理理念的引导之下，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的首要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健康风险的提前控制以及精准识别能力的明显提高上。与以前那种以疾病确诊为起点的被动护理模式不同，社会化健康管理着重于在社区层面上对老年人的骨健康风险展开持续监测以及动态评估，把慢病管理防治的关口提前到风险形成的阶段。凭借创建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系统地整合基础健康信息、生活方式特点以及跌倒史等数据，社区护理人员可更早地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人群，避免因为疾病发现滞后而产生的干预被动性[4]。在这样的机制之下，社区护理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已经明确诊断的慢病管理患者，而是扩大到骨量下降趋势明显、运动能力减弱或者营养状况不好的老年群体。如此一来，社区护理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角色从“事后照护”转变为“过程管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提高了护理干预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二）行为干预嵌入与多主体协同支持机制的运行

社会化健康管理于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中的另一关键作用机制，具体呈现在健康行为干预的情境化融入以及多主体协同支持网络的有效运转方面。慢病管理的发生和进展与运动不足、膳食结构失衡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紧密关联，单次、短期的健康宣教一般很难促成稳定的行为改变，社会化健康管理借助健康教育、功能锻炼以及防跌倒干预持续融入社区生活，让护理干预从阶段性活动转变为日常化实践，提升老年人维持健康行为的可能性[5]。在社区层面，护理人员承担专业指导职能，还经由协调社区组织、社会志愿力量以及家庭成员等途径。一同构建支持性护理环境，家庭成员的日常陪伴与监督，有益于提高老年人干预依从性。社区组织借助集体活动和互助机制，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与持续动力，社会化支持网络的形成，在心理层面减轻了老年人因疾病产生的焦虑与消极情绪。从运行机制来讲，这种多主体协同的护理模式有效弥补了单一护理服务在时间和资源上的欠缺，使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从个体化照护提升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综合性健康管理过程。

四、社会化健康管理视角下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的实践价值

（一）推动社区护理服务由碎片供给向系统治理转型

在传统的社区护理工作当中，针对老年慢病管理的相关服务大多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如项目较为分散、干预的时间比较短、随访工作也不连续等，护理行为大多只是被动地做出响应，很难构建起稳定且有效的长期管理机制。社会化健康管理借助制度化的方式，对医疗资源、社区资源以及社会支持力量进行整合，为社区护理服务打造了一个系统化的运行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社区护理不再仅仅局限于单次评估或者阶段性干预，而是围绕老年人健康风险的变化情况，展开持续的跟踪以及动态管理，以此达成评估、干预与随访之间的有机衔接。在老年慢病管理护理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系统治理模式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在社区层面全面了解老年人的骨健康状况以及其变化趋势，并且依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的护理干预。社会化健康管理依靠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功能定位，促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护理人员以及社会组织形成稳定的协作关系，提高护理服务的专业性以及可持续性。从实践所取得的效果来看，这种模式增强了社区

护理服务的连续性和针对性，让慢病管理防治从零散的服务转变为整体协同，提升了社区护理体系的整体运行效能。

（二）降低医疗与社会成本并促进健康公平实现

社会化健康管理在社区层面针对老年慢病管理展开前移干预以及持续管理，切实降低了疾病进展以及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借助尽早识别高风险人群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与护理干预，老年人因骨折等并发症导致的住院需求以及长期医疗依赖大幅减少，在客观上减轻了医疗机构的服务压力。在宏观层面，这种以社区为依托的健康管理模式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降低高成本治疗环节的发生频次，呈现出成本控制效应。社会化健康管理注重老年人在健康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依靠构建社区活动、互助机制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以及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在慢病管理社区护理实践中，这种参与式管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老年人在医疗资源可及性方面的差距，让健康干预更公平地覆盖社区人群。

五、社会化健康管理融入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机制

（一）以社区为核心构建社会化健康管理运行机制

促使社会化健康管理切实有效地融入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工作之中，其关键要点在于清晰地明确社区在慢性病管理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枢纽位置。社区不仅是老年人日常开展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同时还是医疗服务朝着基层方向延伸以及社会资源得以整合的关键平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当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依托，全面统筹慢病管理风险评估、健康教育、护理干预以及随访管理等各项功能，构建起覆盖“筛查—干预—评估—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借助于把慢病管理管理纳入社区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当中，可以切实有效地防止出现服务碎片化以及重复投入等问题。

在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社会化健康管理着重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护理人员在其中承担着专业执行以及协调的角色，主要负责健康评估、护理指导以及服务衔接等工作，医疗机构负责提供技术支持以及诊疗保障，社会组织与志愿力量依靠组织相关活动以及给予情感支持来增强干预效果，家庭成员则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持续照护以及监督的作用。凭借明确各个主体的职责边界并且建立起协同机制，社区护理服务从单一供给模式转变为多方协作模式，从制度层面提升老年慢病管理管理的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

（二）完善制度保障与能力支撑提升实施成效

社会化健康管理要在社区层面有效运行，制度保障和能力建设需同步推进。一方面，政策上要把老年慢病管理防治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社区健康治理框架，明确社区护理在慢性病管理中的职责定位，借助绩效考核和经费支持机制，引导基层单位持续投入相关服务。另一方面，要强化基层护理人员在慢病管理风险识别、健康教育以及社会资源协调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服务能力，以契合社会化健康管理对护理角色提出的新要求。而在保障机制建设进程中，信息化手段有关键支撑作用，构建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健康数据的动态记录与共享，能帮助护理人员及时掌握慢病管理风险变化并实施精准干预，信息化平台还可为社区、医疗机构和家庭之间的协同提供技术支撑，提升社会化健康管理运行效率。从长远看，制度保障与能力支撑不断完善，会为社会化健康管理在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中的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六、结语

社会化健康管理，为老年慢病管理社区护理提供了一种兼具社会治理与专业护理特征的新模式。通过风险前移、行为干预和多主体协同，该模式有效拓展了社区护理的功能边界，提升了老年慢病管理防治的整体效能。通过在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中进一步深化社会化健康管理与社区护理的融合，为应对老龄化背景下的慢性病防治挑战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赵岩，马影蕊，刘姿瑶. 社区老年慢性病护理视域下数字化健康管理的应用进展 [J]. 全科护理，2025(24): 4677-4682.

[2] 杨玲，于溯，徐立涛. 基于“全—专结合”新模式社区管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肌少—慢病管理症患者的全科案例分析 [J/OL]. 中国全科医学，1-12[2025-12-31].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222.R.20251215.0908.016.

[3] 王欢，李佳，赵艳华，等. 认知护理干预在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J]. 医药前沿，2025, 15(32): 106-109.

[4] 康颖，刘婷，周进宇，等. 社区成年人慢病管理与认知功能损害的因果关联研究 [J]. 现代预防医学，2025, 52(21): 3841-3846, 3871.

[5] 朱婷. 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评估对社会养老服务规划的影响研究 [J]. 社会与公益，2025(07): 101-104.

（作者系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

老年人能力评估团队建设模式探讨
——以医养结合机构为例

李桂云 涂健铭 朱艳玲

摘要：基于团队角色理论、协同效应理论以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采用文献调研和现场调研的方法探索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能力评估团队的组建原则、角色分工及协作方式；提出跨学科团队构建应以“医疗—护理—康复—社工”的复合型学科团队建设为关键点，构建动态评估机制和信息共享体系，以制度化形式完成专业力量的整合。这些研究可以为提高评估准确性、推动养老服务资源整合等方面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上的启示。

关键词：老年人能力评估；医养结合；团队建设；跨学科协作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一是政策驱动。《“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进医养结合机构标准化建设，建立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统筹现有的老年人能力、健康、残疾、照护等相关评估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统一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推动评估结果在全国范围内互认、各部门按需使用，作为接受养老服务等的依据。通过制定可满足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需要的国家标准，提供统一、规范和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推动培育一批综合评估机构，加强能力建设和规范管理。显然，老年人能力评估是综合评估和服务分级的基础。

二是需求导向。2023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 4000 万失能半失能的老人，然而，医养机构评估团队存在多学科协作不足、专业资质不全等问题[1]。

（二）研究目的

通过构建较为完善的与医养场景相适应的评估团队建设模式，以解决谁来评估、如何评估、评估后的联动三大核心关键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核心概念界定

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人能力评估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2]，其评估指标包括四个层面，即社会参与、运动能力、感知觉和精神状态，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和 26 个二级指标，根据评估结果，可将老年人能力划分为 5 个等级。

医养结合：医养结合首先要做到整合资源，让医疗和养老无缝衔接。医疗功能嵌入，院中建有医疗机构（如医务室、护理站、康复中心等）或与附近的医院形成合作，为老人提供全天候的医疗服务保障；提供养老生活照护，除了日常生活照料之外还包括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康复理疗等专业的服务。建立急诊与转诊通道，通过建立急救绿色通道，以确保突发疾病能够及时转诊到上一级医院进行救治；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要达到无缝对接，则需要评估团队具有多重知识结构。

（二）相关理论支撑

英国学者梅雷迪思·贝尔宾（Meredith Belbin）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Belbin Team Roles Theory）[3]，其目的是找出影响团队绩效的关键因素，以便更好地发挥团队的整体功能，促进团队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合作。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指出一个成功的团队并不是靠成员们各自的能力简单相加，而是取决于 9 个不同的角色是否齐全。总之，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的意义在于通过角色发挥团队力量，并不局限于管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包容他人、各取所需）。

协同效应理论[4]是管理学、经济学及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是指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后所发挥的整体效能大于单个部分各自发挥作用所产生的总和，即“1+1>2”。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医养结合起步于 2005 年，在 2013 年以后开始快速发展。在国家层面上，从《“十二五”规划纲要》到《“十四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目标。截至 2024 年 5 月，我国具有资质的医养结合机构达到 7800 余家，床位数超过 200 万张，主要分

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订协议接受委托提供养老服务和医疗机构开展面向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服务，以及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形式。

2.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 PACE 计划：以社区为单位面向 55 岁以上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医疗、养老、照护综合服务；团队由全科医师、护士、药师、社会工作者等多个学科的人员组成；注重个性化的健康评价和长期照护计划。日本介护保险：在法律中明确界定服务对象、国家与地方政府责任，实行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的筹资机制（个人支付 10%，剩余部分公费占一半，保险费占另一半）；建立严格的评价制度，根据老年人身体功能状态确定护理级别并给予不同的服务。英国综合照护计划：政策导向、政府买单、依托社区，构建了多方参与（政府、非营利性部门、私人部门）的多元化服务网络，采用社区照顾的方式把养老问题放在社区里，如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托老所等。荷兰养老护理模式：市场化程度高、专业化水平强；养老社区内配有完善的医疗保健设施设备；养老服务有明显差别性，对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都给予不同的照顾。

国外在老年人能力评估队伍构建方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学科参与，评估队伍一般由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等组成，并进行定期健康状态评估以及多学科会诊，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的照护计划；二是法律支持及规范化发展，许多发达国家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护老年人的相关权益，例如德国《护理法》、日本《老人福祉法》等；三是制定统一的服务项目及评价方法；四是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日本、韩国等国家有独立的长期护理保险，规定了护理服务的内容以及支付比例，对评估团队具有一定的经济支撑作用；五是适应社区嵌入式及居家养老模式，英国、美国等国家以社区为基础进行资源整合，把医养资源向家中辐射，在这种模式下，评估团队应具备社区服务能力。而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期照护制度建设、照护质量评估以及经济效果方面，如长期照护内涵及付费模式探索、医养融合照护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商业化发展及长效机制探讨。日本法律规定介护评定应由多个领域人员进行评定，2022 年度设施介护评定结果显示团队协作度达 92% 以上，提高匹配准确度 [5-6]。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国内外在医养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医养结合机构中老年人能力评估方面的研究还尚有不足。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当前老年人能力评估存在评估师职业发展培训不全面、不深入的问题，存在服务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存在认证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由此，今后的研究工作应集中在加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培训、完善相关制度、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流程等方面，以推进评估师职业化建设的进程 [7]。

三、医养结合机构评估团队建设现状分析

专业化与标准化水平提高。评估队伍逐渐多元化。评估团队突破了单一的发展方式，不断完善规范标准，如《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评估工作也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进行。

技术应用已见成效。一些区域开始尝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赋能，搭建智能监管平台，同时还在人工智能辅助评测方面进行了尝试，实现感性与理性评价的结合。

结果的闭环运用增加。如今的评估目的更加侧重于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结果的评级。建立一人一档的评价制度和照护方案，增强外部政策保障，同时加强机构内部质量监控，初步形成评估、完善、再评估的评价体系。

还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跨学科融合协作方面有待增强，医疗和养老评估标准融合方面明显不足，少数团队缺乏合作意识。团队工作人员多为护理人员，临床医生和康复师等专业人员极少参与 [8]。此外，中西部地区在进行评估时仍主要采用纸质表格进行，仅有 38% 的团队使用人工智能评估工具 [9]。

四、评估团队建设模式构建

一是多学科协作原则。打破单一专业局限，构建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团队。团队成员组成应该由管理人员、医疗人员、社会工作者、注册护士以及康复治疗师等人员组成。其中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团队日常的管理工作以及运营维护工作等。由医护人员评估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进行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社会工作者主要完成对老年人社会认知能力、参与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测评等方面的工作。康复治疗师主要负责对老年人运动能力的评估以及康复训练等方面的工作。注册护士则主要完成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ADL）的分析工作等。

二是标准化与灵活性结合原则。参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制定涵盖社会交往、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行为表现以及基本身体功能的标准化老年人能力评估表。依据评估表完成每月至每季度的定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干预措施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出现老年人突发急性疾病的情况，则进行及时的评估。

三是能力与资质并重原则。核心是持证上岗与实战能力双考核。准入资质：对于医生，要考核其是否持有执业医师证和老年医学、全科培训证明。对于护理人员，要考核其是否具备三级以上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于社会工作者，考核其是否考取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证书。对于护士，考核其是否持有注册护士执业证书和民政部“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认证证明。对于康复治疗师，则需要考核其是否持有康复治疗师资格证。能力提升：不断开发标准化的专业化培训课程，同时加

强构建健全的专业化培训体系。

四是伦理与人文关怀原则。老年人也享受个人权益与人格尊严受尊重的权利，而伦理与人文关怀原则的构建是维护老年人基本权益的保障，更是实现老年人需求与服务提供相适配的重要前提。在对老年人进行评估工作之前，应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性，采用老年人通俗易懂的方式，如使用方言、大字号字体，使老年人充分知晓评估目的，保证其自主配合，同时协助老年人填写信息，并自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五是资源利用及可维持发展原则。团队的长期良性发展，需要多方合作努力，应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支持，予以每例患者部分补贴。由企业和民间机构做好辅助工作，提供产品以及技术支持，完成志愿者的培训工作等。

六是质量监控及反馈完善原则。质量监控及反馈完善应严格遵守管理流程，应有质量控制、反馈整改、联评制度和问题案例倒查四个层面构成。依靠联评制度，以评估师初评和评估组长复评的方式，确保两者的评估结果误差小于3%。问题案例定期公布，以供警示和自查。

五、对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支持，开展医养复合技能认证

1. 政策制定与细化

政府应该逐渐完善关于老年人能力评估团队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政策法规重点应涵盖团队人员资质要求、评估流程的规范以及团队组建标准等核心内容。

2. 认证体系构建

应由多个部门、医院等共同参与制定医疗和养老复合技能认定的标准，同时，为了满足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实际需求，应定期并及时对认定标准进行优化。

3. 政策宣传与推广

在政府网站和社交媒体向社会公众、养老机构、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从业人员等推介有关内容，加大对政策法规及医养复合技能认证的宣传力度。

（二）加强老年健康管理专科人才培养，建立医养人员综合数据库

1. 专科人才培养

建议高校或者高职等院校增设有关促进老年人健康等方面的专业课程，增加“老年人康复治疗”“健康管理”“老年医学和护理”等课程的比例，并建设实习基地，加强实践性教学，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的专业技能。针对在职人员，开展继续教育，以及老年人健康管理定期培训工作，聘请行业内权威的专家学者普及新理念，传授新方法。

2. 医养人员综合数据库建设

医疗人员综合数据库建设需要多方合作，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人社、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进行配合。该数据可实现人员资源的合理配置，为老年人能力评估团队的建设以及培训计划的制订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记录和分析医养人员的专业、能力、分布等情况。

（三）开发智能评估辅助系统，实现全国老年人能力评估数据共享

1. 智能评估辅助系统开发

开发能够辅助医生、评价师等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人员的智能评估辅助系统。系统应该确保界面清晰，操作简单易懂。同时对评估工作人员进行系统操作等方面的培训，并给予长期的技术支持，帮助评估人员熟练操作该系统，及时解决技术问题。

2. 全国老年人能力评估数据共享

制订评估数据共享全国性的规范标准，构建评估数据共享平台，由各机构通过规定数据格式、设置访问权限以及传输方式等，将数据及时上传至共享平台，以进行集中管理。

（四）完善激励与问责机制

1. 激励机制完善

建立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机制。在物质激励方面，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中，评估结果真实准确和表现优异的团队或者个人，予以奖金、奖品等奖励。在精神激励方面，予以公开表彰、颁发荣誉证书等奖励，以增强他们的工作成就感。同时，设置职业发展激励机制，给优秀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晋升空间和发展机遇。

2. 问责机制建立

问责机制的建立对于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首先，要保证问责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其次，问责条款规定要明确责任主体和范围，问责条款内容要详细，做到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有据可查。最后，负责问责监管的部门需加强问责机制的宣传工作，加大教育力度，确保评估人员清晰地了解问责条款内容，督促他们严肃对待评估工作，自觉规范工作流程和遵守工作纪律，从而提高评估工作的质量。

六、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在未来医养结合机构评估队伍将会呈现出“技术穿透、服务前置、生态融合”的三大趋势，并以智能工具实现减负、标准统一体现公正、全程服务带来效益为目标导向来促进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积极老龄化”将会成为新的共识，老年人的能力评估将不再是一种“衰弱信号”，而是“健康管家始点”。

参考文献

[1] 徐颢. 医养结合面临三大瓶颈 [J]. 中国社会保障, 2016(04): 80−81.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2.

（下转91页）

父母生涯相关行为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适应力的影响：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吕邹沁 龙金林 曾晓东

摘要：传统的学校职业生涯教育重视必要知识与经验的提供，帮助青少年顺利从学校过渡到职场。随着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迁，“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变得愈加复杂。尽管职业生涯教育已逐步融入中学与高校课程，却依旧缺乏家校社协作观及适用于中国学生的生涯发展评估标准，因此生涯教育课程的实效性受到限制。相较本科生，部分高职生往往对未来的职业路径更为迷茫，自卑且缺乏信心，如何落实党和政府提出的“使命担当”，亟须创新职业生涯教育认知。本研究通过对 221 名进入实习阶段的高职生开展问卷调研，探讨父母生涯相关行为、主动性人格对高职生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父母生涯支持行为可正向预测高职大学生的职业适应力，人格主动性同样也可以正向预测职业适应力，且主动性人格在父母生涯支持行为和职业适应力之间起到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和他人支持在父母缺位行为对主动性人格的影响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研究建议，学校应通过课程或其他方式提高学生的主动性人格，从而提高其职业适应力，帮助高职生应对新时代新就业形势的挑战，满足就业市场和企业的多元化需求。

关键词：父母生涯行为；职业适应力；主动性人格；社会支持

一、前言

（一）就业背景

青年人失业率高已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 年趋势》报告中强调，就业率已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最新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 年 9 月更新版）》中也关注到严峻的现实情况，由于总劳动收入份额停滞不前，大量青年仍未就业、接受相应教育或培训，就业市场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1]。

国内高校毕业生 2023 年规模达到 1158 万人，2024 年 1179 万人，2025 年 1222 万人，2026 年预计 1270 万人。当前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青年群体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尽管职业院校一直推进产教融合，但这一矛盾依然存在，“慢就业”“乱就业”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高职毕业生在求职时，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充分的专业实践经验，或对就业市场

（上接 90 页）

[3] Belbin R M.Management Teams: Why They Succeed or Fail[M]. Oxford: Heinemann, 1981.

[4] Ansoff H I. Corporate strategy: An analytic approach to business policy for growth and expansion[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29.

[5] 吕园园 . 日本介护保险筹资机制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启示 [J]. 中国保险 , 2020(12): 59-64.

[6] 田香兰 . 日本“地区综合照护体系”：发展历程、内容特征及运行模式 [J]. 日本学刊 , 2025(06): 70-94.

[7] 廖思媚 , 王爱平 , 刘金霞 , 等 . 中国 9 省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从业现状调查 [J]. 护理学杂志 , 2025, 40(07): 90-94,103.

[8] 李庆 .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N]. 公益时报 , 2024-10-15(02).

[9] 杨华露 , 刘春艳 , 王盼 , 等 . 中国认知功能社区筛查及管理指南 (2025 版)[J].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 2025, 44(11): 1472-1490.

（作者单位：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中心医务室）

的实际需求了解不足、期望偏高。《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竞争力白皮书（2023）》显示，约有 1/3 的高职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表示不满，六成多毕业生就业岗位与期待不相符；初次就业后跳槽频繁、毁约不断，较高的福利待遇、可持续发展等难以实现，大多数毕业生未做好生涯规划或未学会寻求合适匹配度高的工作。

职业院校中超过 70%的学生来自相对贫困家庭[2]，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学生就业质量更高，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相对较差[3]，边缘弱势的学生常常阶层平行流动，家庭社会资本受限的青年人职业障碍更多。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社会攀比心理等偏见根深蒂固，影响着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在大众心里，职校文凭地位远低于本科文凭。职业教育体系主要是吸纳社会“弱势群体”，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传统认知，从而形成了职业院校被歧视的刻板印象，近年来“分流器言论”也影响了职业教育声望[4]。长此以往，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亦陷入低位者的困境，自卑、不自信，从而进一步阻碍其职业生涯发展。“高职”身份标签使其社会认可度偏低，个体在感知外界歧视和偏见后，其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进而对其职场就业技能提升和心理素质培养产生不利影响。总而言之，当下的教育机制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着高职生对未来职业的认识判断和选择。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不断深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新时代就业工作的新要求。

（二）生涯建构理论与相关影响因素

全球化正在重塑人的生活模式，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尤为显著。21 世纪，职业适应力被认为是成功职业发展的必要资源，个体积极应对职业和工作领域的挑战，能促进和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职业适应力在最新的理论中也叫生涯适应力，作为生涯建构理论（CCT）的一部分，Savickas 将生涯适应力定义为“一种心理社会结构，指个人应对当前和即将到来的生涯发展任务、生涯转变和个人创伤的准备就绪和资源”[5]。职业适应力包含四个维度：生涯关注需要展望未来和规划未来，而生涯控制意味着塑造未来的个人责任心；生涯好奇心是个体对可能的自我和各种角色的探索，而生涯自信是相信个人可以选择并实现他们的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变化，流行的生涯概念更加关注多变和无边界的职业选择与适应，强调了积极的生涯管理的个人责任，并暗示了成功所必需的适应性[6]。在迅速变化的全球背景下，个人获得适应生涯发展要求和就业要求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为了在这个阶段顺利完成生涯发展任务，青少年必须具备一种核心能力，即生涯适应能力。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飞速发展，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学校教育是青年设定职业目标、探索职业道路的关键时期。研究表明，支持学生进行职业探索有助于其作出职业决策，减少困惑，提升就业能力。因此，鼓励学生向家庭寻求职业发展支持，并利用这些支持资源探索职业选择与自我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背景下的研究显示，父母支持子女自主决策的青少年在职业决策中更具自主性与胜任感，更愿意探索多样职业路径。青少年需要感受到父母的支持与信任，以自主作出决策。相反，父母的控制行为可能挫伤其自主需求。父母支持有助于推动子女积极的职业发展，而干预与缺位则可能阻碍其发展，增加职业道路的不确定性[7]，近几年关注父母生涯行为对青少年职业生涯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

现代职业研究强调，要在职场中取得成功，个体须具备主动性与自我导向能力。主动性人格的概念在人格类型论之后被单独提出，其反映个体主动改变或影响环境的倾向。国内外研究表明，具有高度主动性人格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制定职业规划，明确实现职业目标的步骤。主动性人格被视为个人特质与环境因素影响职业态度、行为与能力发展的关键边界条件[8]。也就是说，主动性人格提升职业规划意识，甚至工作健康感知。高主动性的人更愿意主动解决问题、把握机会，推动职业发展。因此，主动性人格可能直接影响高职毕业生的职业适应力，并在父母生涯行为与职业适应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多项研究揭示，感知社会支持与职业适应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获得稳定工作，并提升工作满意度[9]。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在社会支持的作用下，支持、干预、缺位三类父母生涯行为如何通过主动性人格影响高职生的职业适应力。

二、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取样，为了减少常见的方法偏差，两次测量间隔一年，秉持自愿参与原则，对即将投入实习的毕业生进行问卷施测，最终收取有效被试 221 人，其中女生占 96.0%。

（二）研究工具

生涯适应力问卷，该量表由 24 个题目构成，包括四个维度。主动性人格量表，问卷共有 11 个项目。父母生涯相关行为量表，分支持、干涉和缺位三个维度，共 15 题。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等维度，包括 12 个自评项目。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及PROCESS 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生涯适应力，在分析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社会家庭经济地位的 SES 指标由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标准化后计算所得。

三、调研结果

（一）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研究发现，生涯适应力及其四个维度均与父母支持行为、主动性人格显著相关。具体而言，生涯适应力的四个维度中，关注（r=–0.823）、控制（r=–0.756）、好奇（r=0.934）、自信（r=0.966），均与父母生涯支持行为显著相关（P<0.01）。同时，父母干涉行为与生涯关注（r=–0.208）、好奇（r=0.469）和自信（r=0.517）显著相关（P<0.01），但与社会支持（r=–0.270）显著负相关。父母缺位行为与生涯适应力无显著相关性，但与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r=0.115）。此外，社会与生涯适应力的四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说明了父母行为、主动性人格及社会支持对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的复杂影响机制。

（二）中介效应检验

父母生涯支持行为可直接预测生涯适应力（β=0.716，P<0.05）和主动性人格（β=0.280，P<0.01）。干涉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性人格（β=0.151，P<0.05），人格主动性可以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β=0.235，P<0.001），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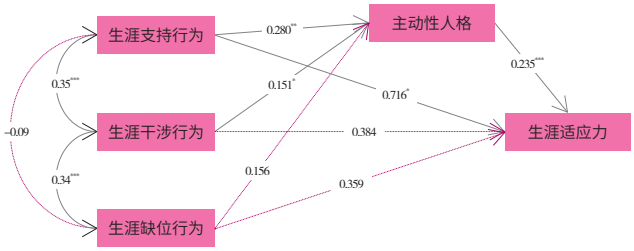


图 1 父母生涯相关行为、主动性人格与生涯适应力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主动性人格在父母生涯支持行为和生涯适应力之间起到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916，占总效应（1.635）的 56.02%。

（三）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检验

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在父母缺位行为对主动性人格的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β=0.282，P<0.05），他人支持在父母缺位对主动性人格的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β=0.282，P<0.05）。当家庭支持水平较低时和中等时，父母缺位行为显著影响主动性人格（β=0.669，P<0.01；β=0.421，P<0.01）；同样，当家庭支持水平较低时，父母缺位行为显著直接预测生涯适应力（β=1.123，P<0.05）；在家庭支持水平较低和中等时，父母缺位行为通过主动性人格的中介作用预测生涯适应力（β=0.550，P<0.01；β=0.346，P<0.01）。当他人支持水平较低时和中等时，父母缺位行为显著影响主动性人格（β=0.717，P<0.01；β=0.449，P<0.01）；同样，当他人支持水平较低时，父母缺位行为显著直接预测生涯适应力（β=1.092，P<0.05）；在他人支持水平中等时，父母缺位行为通过主动性人格的中介作用预测生涯适应力（β=0.425，P<0.05）。

四、结果讨论

父母作为子女生涯发展的重要影响者，通过提供信息、经济与情感支持，帮助子女缓解职业决策中的挫折与情绪困扰，提升其适应能力。能够倾听并尊重子女职业意愿的父母，在促进其探索职业兴趣、价值观与角色匹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0]。然而，部分父母固守传统就业观念或对现代职场缺乏了解，可能对子女职业发展产生干预，削弱支持效果。父母缺位行为则反映家庭支持资源不足，对子女生涯适应力的培养形成障碍。支持子女自主决策的父母能够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增强子女的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11]，进而培养更高的主动性人格。父母干预行为虽可能引发冲突，但也可能激发青少年的自主意识与独立思考，促进其自主决策能力的提升。

主动性人格对职业适应力具有显著影响。从生涯建构理论的个人能动视角看，主动关注意味着个体能够通过行动改善环境，而非被动适应。积极主动的个体通常具备行动导向与主观能动性，能够积极应对职业变化，调整情绪并探索改进机会，从而创造更适合职业需求的环境。通过积极开发适应性资源，主动性人格促进职业发展并提升职业适应力。

家庭支持与他人支持在父母缺位行为与主动性人格、职业适应力的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当家庭支持水平较低或中等时，父母缺位行为对主动性人格与职业适应力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家庭支持不足的情况下，青少年更依赖自身能力解决问题，这有助于增强其自主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进而提升主动性人格与职业适应力。若家庭提供较好的日常支持但缺乏职业行为支持，可能反映父母在教育理念与引导能力上的不足[12]，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在他人支持水平较低或中等时，父母缺位行为显著影响主动性人格；在他人支持水平较低时，父母缺位行为可直接预测职业适应力。较少的外部支持促使青少年依靠自身努力应对挑战，从而提升独立能力与自我效能感，增强目标设定与实现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父母支持不仅直接提升高职生的职业适应力，还通过增强主动性人格间接提高适应能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上将父母生涯相关行为、主动性人格、社会支持纳入高职毕业生生涯适应力的模型建构中，同时在实践上启发职业院校教师要了解学生父母生涯行为的不同情况，为父母生涯缺位行为的高职生提供更多的他人支持和社会支持，如实际的工作岗位信息、职业技能辅导、工作肯定反馈等。就业相关辅导人员

可以通过多渠道拓展高职生的社会支持资源，同时通过提高学生主动性人格，从而提高其生涯适应力，助力高职毕业生有效应对新时代就业挑战，满足社会多元化用人需求。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帮助高职生应对就业和职业发展中的潜在挑战，为生涯适应力模型的构建以及毕业生培养与就业教育指导提供科学参考。然而，本研究样本量有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将进一步深入探讨相关机制，设计并引入生涯发展教育模块，结合本研究结果优化就业实习辅导，提升高职生的主动性人格与职业适应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Duffy R D, Blustein D L, Diemer M A,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16, 63(02): 127-148.

[2] 周杰 . 弱势家庭子女教育预演社会阶层再生产及其干预机制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 2023.

[3] 谢倩芸 . 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 2023(05): 14-24, 94.

[4] 王奕俊 , 陈群芳 , 邱伟杰 . 实习何以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 ?——基于 2022 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J]. 教育经济评论 , 2025, 10(04): 61-88.

[5] Savickas M L.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Career construction: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vocational behavior[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02: 149-205.

[6] Hou Z J, Leung S A, Li X, et al.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China Form: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validation[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2, 80(03): 686-691.

[7] Wang Y H, Hu C, Hurst C S, et al.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career plateaus:The roles of mentoring other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4, 85(03): 319-328.

[8] 商佳音 , 甘怡群 . 主动性人格对学校毕业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 [J]. 北京学校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45(03): 548-554.

[9] 叶俊杰 . 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 [J]. 心理科学 , 2005(06): 190-193.

[10] 赵芳芳 , 赵辉 , 李平 , 等 . 父母生涯相关行为和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专业满意度的关系 : 生涯适应力和生涯规划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科学 , 2022, 45(01): 68-74.

[11] 李艾潼 .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未来工作自我的关系 [D]. 曲阜 : 曲阜师范大学 ,2024.

[12] 静鑫凡 , 王乃弋 . 父母行为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与可就业能力的影响 [J]. 人力资源 , 2023(16): 131-13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湖南省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从‘心’赋能：激发高职生‘主动型人格’的校本化干预与实践研究”（LZJY25ZZC05）。

（作者单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社交寻求“情绪价值”的成因分析、风险审视及引导路径

曹逸航

摘要：在社会加速化、个体化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的背景下，“情绪价值”逐渐成为青年社交互动中的核心取向。这一趋势主要源于加速社会中时间暴政对青年社交样态的裹挟、原子化生存境遇所引发的群体孤独体验，以及社会思潮对青年社交价值观的浸润。然而，以情绪价值为导向的青年社交行为也潜藏多重风险，表现为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社交情感疏离，以及情绪戒断反应下的主体性意志削弱。对此，本文从重构自我认知、重塑主体性意志及强化社会支持三个维度提出引导路径，旨在引导青年形成理性、健康的社交模式，实现积极的社会融入与心理成长。

关键词：青年；社交；情绪价值

在当前社会加速化与个体化交织发展的背景下，“情绪价值”已逐渐从商业概念演变为青年群体日常社交中的“精神刚需”，成为青年社交互动中的核心取向。深入剖析青年社交寻求“情绪价值”的生成原因、潜在风险及引导路径，有助于理解当代青年在社会加速变革和原子化生存境遇下，其社会心态从物质导向转向体验至上的内在逻辑，也对解决现代性困境下出现的社交工具化、情感浅表化及主体性消解等异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青年社交寻求“情绪价值”的成因分析

（一）加速社会中的时间暴政裹挟

德国学者罗萨在反思现代社会时指出，现代技术催生了“时间异化”，推动社会步入以“技术、社会变革和生活节奏加速”为特征的“加速社会”[1]。在此背景下，时间不再仅仅是“人的积极存在”，已异化为支配与规训人的神秘力量，成为隐藏的社会“暴政”[2]。“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盛行，人们似乎只有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体验次数，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身份的确立[3]。

这种时间暴政正深刻重塑着青年的社交样态。在高速运转的社会节奏裹挟下，青年群体常常需要切换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应对骤变的生活步调和叠加的工作压力，日常生活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4]的特点。在效率优先的文化逻辑支配下，青年在现实社交中也开始追求“时间价值最大化”，将情绪价值作为衡量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尺，将交往对象能否快速提供情绪反馈作为判断关系亲疏的依据。受时间焦虑驱动，青年建立深厚友谊和稳定关系的意愿持续减弱，转而寄希望于进行单向、即时的情绪索取，以快速填补内心的空虚。

（二）原子化个体的群体孤独呼唤

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与个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人逐渐作为社会关系体系的基本单元和社会行动的实体单位参与社会生活。这意味着个体在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必须独自面对一个未知且具有威胁性的外部世界，随之产生强烈的孤独与无助感。此外，社会结构变迁进一步推动着人际关系疏离，使现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倾向。人自由且孤独，既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更是普遍的生存境遇。

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群体极易陷入现实人际关系的缺失状态，产生孤独心理；而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存在，他们需要依赖社交达成情感联结、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为了摆脱现实中的孤独，越来越多的青年转向网络空间寻求情感共鸣与心理支持，加之网络的隐匿性，他们得以在虚拟空间尽情释放天性。然而，这种依赖也导致部分青年过度沉溺网络世界，反而脱离现实生活，陷入“越狂欢越孤独”的循环悖论。一旦回归现实，由于难以获得类似的价值认同，巨大的心理落差会进一步加剧其孤独体验。正是原子化个体的群体孤独呼唤，促使青年渴望与他人乃至周遭世界建立社会联结，以缓解现实中难以排遣的孤独。

（三）社会思潮下的价值基础浸润

在社会演进的进程中，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逐步兴起，推动个体更加关注自我感受、即时满足与情感体验，引发了价值观排序与取向的深刻转变。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指出，成长于经济繁荣期的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取向上更

倾向于追求自由、话语权等后物质主义目标[5]。在此文化语境中，青年群体愈发重视情绪管理与优化，将情感体验视作衡量人际关系乃至生活质量的关键标尺，这无疑为“情绪价值”获得广泛关注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这些思潮也曾步入误区，催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强调理性计算的功利主义。这些观念持续形塑着青年的社交认知，导致部分青年形成功利化的交往样态——他们偏好能带来即时利益的浅层互动，表现出自私自利倾向，甚至将他人提供的情绪反馈贴上“价值”标签、赋予“价值”大小，即在他们看来，能提供慰藉、愉悦等积极情绪的人，被认定为具备高“情绪价值”，而常引发不适、难堪等负面情绪的人，则被归为具备低“情绪价值”。

二、青年社交寻求“情绪价值”的风险审视

（一）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社交情感疏离

情绪价值的供需互动本是个体感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但社会分层与结构化运作却将青年交往行为置于工具理性的框架之下，脱离了个体感性的本然底色。青年往往将交往中的时间成本、经济投入和情感消耗纳入可量化的评估体系，构建起以效率为核心的交往模式，具体表现为交往投入的效率导向、关系维系的程序化与交往期待的标准化，最终使社交偏离情感联结的本质，走向功利化[6]。

自2023年起在青年中新兴的“搭子”社交，便是由工具理性主导的典型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社交样态，“搭子”关系基于特定场景的需求匹配而形成，通过共同目标达成精准联结，如承担生活陪伴功能的“饭搭子”、承载成长协同功能的“学习搭子”等。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绪满足的即时性，青年通过与适配的“同类”建立联结，依托相似体验实现情感的同频共振，获得快速的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二是人际边界的分寸性，遵循“始于共同兴趣，止于合作终结”的原则，通过限定交往的时空场域控制与他人的互动范围与频率；三是标签类聚的圈层化，青年以特定的身份标签完成圈层匹配，并凭借圈层独特的文化符号，达成趣缘群体的聚合。在这一模式下，社交的价值内核似乎被简化为“免等立取”的情绪满足，呈现出显著的工具化特征。

然而，以“搭子”社交为代表的效率优先型交往模式，潜藏着情感疏离风险。从关系属性来看，青年将彼此定位为“特定场景的临时搭档”或“阶段性插曲”，其互动本质是“即时情绪价值”的插曲式交换，既无须长期情感投入，也无须承担深度责任。这种定位会导致：其一，交往的“去具身化”。数字技术下的线上社交会替代“身体在场”的具身体验，深度交流会被那些频繁却肤浅的回应所取代，交往的“在场性”由此消解。其二，关系的高脆弱性。“搭子”关系基于碎片化的事件性需求生成，一旦情境变化，“搭子”组合便会快速重组或解绑，呈现流动易变的特征。其三，情感实践能力的退化。长期依赖即时情绪满足，将削弱青年在现实中主动发起深度社交的意愿和能力，导致孤独感、不安全感和社交回避的延续，使其很难构建稳定的情感支持系统。

（二）情绪戒断反应下的主体性意志削弱

依据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提出的“本真性”伦理，个体需在与他人的对话性交往中，通过自我反思与外界回应的互动，确立“自我规定性”[7]。在此视角下，青年通过社交获取或提供情绪价值，既是向外界敞开自我、传递情感的过程，也是借助他人的情绪反馈反观自身情感需求、明晰“我是谁”的主体性建构实践。作为个体彰显自我意识与理性自觉的意志力量，主体性本应支撑人掌握自身的存在状态。然而，当青年对情绪价值的追求异化为“无休止的外界索取”时，这一实践似乎面临着主体性被反噬的风险。具体而言，若青年将情绪稳定的根基完全寄托于外界提供的“情绪价值避风港”，实则是将情绪掌控权交予他人，可能会形成非理性依赖，导致主体独立性逐步消解。一旦外部依托不再稳固，青年极易陷入“情绪戒断反应”，出现情绪低迷与深度空虚，且因长期依赖外部调节而丧失自主调节情绪的能力，陷入被动等待的焦虑困境。

心理学者米库林瑟和沙弗的“依恋依赖理论”指出，心理依赖系统的过度激活会放大个体对他人情绪反馈的敏感性，削弱其情感自主权。青年若过度沉浸于情绪价值的即时满足，易形成“以他人情绪为转移”的认知，即视他人的积极情绪反馈为自我价值的证明，消极回应则引发自我怀疑。这实质上是让渡情绪主导权，导致主体性在情感领域不断退让。当“情绪价值至上”成为潜在信条，个体极易产生“情绪优先于理性”的非理性认知，甚至对情绪中隐含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失去辨别力，陷入“情感被规训而不自知”的境地。从情绪价值供需双方的实践来看，主体性削弱呈现出差异却同向的特征。对索取者而言，过度向外索取情绪价值会瓦解其情绪自控能力，使其在“等待被满足”的被动状态中，将情绪主导权让渡于外界变量；对提供者而言，若被“持续满足他人情绪需求”的期待所绑架，其交往行为容易异化为“情绪服务”的工具化实践，自身情绪表达被限定在迎合他人的框架内，最终沦为他人情绪的“服务者”。正如“情绪巨婴”现象所揭示的，当情绪价值从辅助工具演变为生存依赖，青年不再是自身情绪的主人，反而成为被情绪与他人支配的客体，其主体性意志在这种长期依赖中持续消解。

三、青年社交寻求“情绪价值”的引导路径

（一）重构自我认知，培育积极社交的基本素养

从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看，社交是多元观点

碰撞、情感符号传递的过程，也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对青年个体而言，健康的社交需要超越“单一自我视角”，在观照自身情感诉求的同时，主动构建“复数的情感共同体”，培育积极社交素养。一是破除情绪价值的快餐化认知。青年应打破“情绪价值就是即时情绪反馈”的认知惯性，厘清“即时情绪满足”与“长期情感价值”的本质差异，认识到真正具有心理支撑意义的情感价值源于长期互动中的双向价值共鸣、困难支持与成长赋能，是经过时间沉淀的“心理正餐”，而非即时满足的情绪快餐。二是重塑情感联结的双向性认知。青年应从“情感投入—回馈”的双向视角来审视人际关系，摒弃“单向索取情绪价值”“工具化社交”的认知偏差，重视情感付出的意义，理解情感联结的稳定性源于双向付出、需求回应与价值共鸣，而青年认同此对等性也是积极社交的前提。三是培养积极社交的基本素养。青年应在交往中注重培育共情能力，学会倾听他人需求、理解并尊重他人立场，以真诚、善良的底色，在双向互动中实现自洽自由的人际联结。

（二）重塑主体性意志，把控“情绪价值”的正向导向

心理学者詹姆斯·格罗斯的“情绪调节理论”指出，个体可以通过认知重评、行为调节等方法来管理情绪。面对青年社交中可能存在的主体性消解风险，应引导青年以“主体性重塑”为核心，既要通过自我情绪掌控重建内在主体性，减少对外部情绪供给的依赖，也要借助深度交往实现外在主体性实践，推动情绪价值从“工具化交换”回归“双向成长赋能”的本质。具体而言，一是向内提升情绪自控能力。青年应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与调节技巧，例如通过情绪日记增强自身情绪觉察，借助运动、正念冥想等调节方式疏导负面情绪，逐步重建对情绪的主导力。二是向外修炼情绪交往能力。向内掌控情绪并非自我封闭，而是将主体性延伸至社交实践，从“情绪服务者或索取者”转变为“正向情绪价值的创造者”。一方面，青年要在交往中兼顾自我需求表达与他人情感回应，学会换位思考，做到既不压抑自我感受，也不忽视他人情绪；另一方面，主动传递正向反馈，如肯定同伴的努力、对他人困惑提供建议等，让社交从浅层情绪交换升级为共同成长，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协同发展。

（三）强化社会支持，回应健康社交的现实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8] 在这一精神指引下，需积极构建系统化、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营造有利于青年心理健康与社交发展的良好环境。首先，党和政府应强化政策服务的针对性，在制定教育、就业、住房等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充分关注青年的情感需求与现实压力，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拓宽职业发展通道，从物质基础上缓解其焦虑情绪，为其建立健康的社交模式提供坚实支撑。其次，社会各界应协同发力，形成支持合力。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组织应加强对不同青年群体的调查研究，精准把握其思想动态与情感诉求，提供专业化、分众化的心理服务与社交指导。学校要发挥主阵地作用，将思想价值引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文化艺术、社会实践等素质拓展活动，帮助青年在现实参与和集体协作中获得有意义的情感满足与身份认同。家庭作为情感支持的基本单元，应着力营造平等、温暖、包容的氛围，尊重子女的个性表达与社交选择，增强其情感韧性与自我价值感。朋辈群体之间也应倡导互助共进的交往文化，通过情感共鸣与榜样带动，为青年提供可持续的心理支持。

参考文献

[1]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大纲 [M]. 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3.

[2]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9.

[3] 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M]. 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1.

[4] 廉思．思行者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52.

[5] 李艳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实观照与理论旨趣 [J]. 人民论坛，2020(04): 132−135.

[6] 岳彩．青年交往的“加速”症候与“减速”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2025(03): 99−105.

[7] 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 [M]. 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32.

[8]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7.

（作者系南通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助教）

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现状调查分析

张　睿

摘要：应急救护培训是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减少突发事件人员伤亡的重要措施。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研等方法，了解宁夏部分城市及农村社区居民对应急救护知识的认知、参与意愿及培训需求，包括个人情况、对培训的态度、期望的培训内容和方式、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更好地开展社区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提供实践参考。通过多维度分析，旨在全面呈现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的现状特征，识别城乡之间及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在培训参与率、认知深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为优化培训内容、拓展培训覆盖范围、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提供实证支撑，进而推动宁夏社区应急救护培训体系的规范化与常态化建设。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提出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社区年度工作考核指标，构建“政府主导、社区落实、居民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培训工作从“阶段性活动”转向“日常性服务”，真正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救互救能力。

关键词：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现状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实现全民健康是健康中国战略的行动目标，全民拥有急救技能是健康中国行动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高全民应急救护技能普及率”，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是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减少突发事件伤亡的重要措施。提高公众的急救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可降低突发事件的伤亡率。研究表明，我国公众的急救知识及技能虽有所提升，但不同人群的掌握水平仍存在一定差异。宁夏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区居民的急救知识普及率较低，亟须开展系统性研究以探索改进路径。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为充分了解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对宁夏部分城市及农村社区居民的应急救护知识认知、参与意愿及培训需求，包括个人情况、对培训的态度、期望的培训内容和方式、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以帮助工作人员更好地开展社区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研究结果可为地方政府、红十字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部门制定应急救护培训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对提升宁夏居民应急救护能力、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团队成员于2024年10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宁夏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和中卫市 5 个地级市的 23 个社区（城市社区 18 个，农村社区 5 个），发放问卷 764 份，回收有效问卷 759 份（有效率 99.3%）。调查对象年龄为 18~70 岁，涵盖不同职业、教育水平和收入群体。

（二）研究内容

问卷主要包括以下维度：

1. 基本信息；
2. 对应急救护知识的了解情况；
3. 知识掌握程度；
4. 培训需求与障碍。

（三）数据分析方法应用

在研究中，为全面评估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的现状，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描述性统计用于计算培训参与率、急救知识掌握率及技能操作合格率等核心指标，以量化当前培训覆盖水平与效果。为进一步探究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间的差异，运用卡方检验对城乡分布、年龄分层及职业类别进行比较分析，揭示结构性不均衡问题[1]。在此基础上，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识别影响居民参与培训的关键因素，模型表达式如下：

$$\log\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cdots + \beta_n X_n$$

其中，P 为个体参与培训的概率；β_n 为对应系数；X_n 表示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协变量。该方法已被证实适用于分析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路径。同时，借鉴既往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将培训证书获取意愿、培训成本感知及技能提升预期纳入分析框架。此外，结合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对定量结果进行补充解释，增强推论深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急诊医学领域，类似统计方法亦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医疗质量与培训成效的关系，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学支持[2]。本研究所有数据分析过程均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确保结果的科学性与可解释性。

（四）采用 SPSS 26.0 进行统计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宁夏地区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的现状，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整体培训参与率偏低，反映出应急救护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见表 1）。

表 1 中的数据揭示了当前培训体系在覆盖广度、内容深度与教学方式适应性方面的多重短板，亟须构建分层分类、情境融合的新型培训范式，以提升区域应急响应能力。

表 1 指标类别

指标类别	总体均值	城市社区	农村社区	年龄	
				18~40 岁	≥ 60 岁
培训参与率 (%)	43.6	31.2	12.4	35.1	5.3
CPR 掌握率 (%)	18.9	25.6	9.8	22.3	6.1
止血包扎掌握率 (%)	34.5	42.3	22.1	38.7	18.9
培训需求意愿 (%)	91.0	89.5	93.2	94.1	85.7
偏好实操培训 (%)	72.3	70.1	75.6	76.8	65.4

表 2 培训资源分配情况

分析维度	分类	参与率 / 掌握率	备注
城乡差异	城市社区	31.2%	城市显著高于农村（P<0.05）
	农村社区	12.4%	
年龄差异	18~40 岁	35.1%	18~40 岁人群参与率明显高于中老年群体
	中老年群体	–	
职业差异	企事业单位职工	45.3%	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学生参与积极性高于农民和自由职业者
	学生	28.7%	
	农民	8.2%	
	自由职业者	15.6%	
心肺复苏（CPR）正确描述率	受训者	52.7%	总体正确描述率 18.9%，受训者显著高于未受训者
	未受训者	6.4%	
止血包扎技能掌握率	城市	42.3%	城乡差异显著
	农村	22.1%	
总体止血包扎技能掌握率	–	34.5%	–
总体培训参与率	–	43.6%	–
其他发现	居民更倾向于以线下集中培训方式参加应急救护培训		

2. 卡方检验

为深入探究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的参与差异与知识掌握水平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间的分布情况，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法对城乡、年龄、职业等分类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此外，高学历者急救知识使用正确率更高，职业分组中社区服务人员表现更优，说明教育背景与职业属性会对应急素养产生影响。在群众对何种培训方式接受度更高的调查中，线下培训占 46.0%，线上线下结合占 34.0%，线上视频培训仅占 14.0%，其他方式占 6.0%。

表 2 中的差异揭示出当前培训资源分配不均、重点人群覆盖不足等问题，亟须通过分层干预策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培训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3.Logistic 回归分析

为深入探究宁夏社区居民参与应急救护培训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多维度变量进行分析，识别出显著影响培训参与行为的关键因子。性别、月收入、培训费用、是否获得培训证书、证书等级及其与工资的关联性等，均在模型中表现出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获得证书”对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其优势比最高，表明认证机制在激励居民参与中的核心作用[3]。社区居民更倾向于在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应急救护培训（占比为 87.0%），其次是学校（占比为 75.0%），这两项明显高于公园、医院、商场等场所。为弥补定量分析局限，研究还对 10 名社区工作人员和 5 名应急救护培训师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培训资源分配不均与宣传渠道缺失是制约普及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基于此，建议构建以能力认证为导向，针对不同的职业、年龄等因素采用线上微信公众号推广、线下工作坊结合实操演练的分层培训体系，提升整体应急响应效能。

三、讨论

（一）现存问题

1. 培训覆盖率低

宁夏应急救护培训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培训机会匮乏。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与人口因素：农村地区村落分散、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等，培训往返一次需要很长时间，而覆盖的学员数量却有限，导致培训效率低下。

（2）培训师资力量弱：专业的应急救护培训师是稀缺资源，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中的红十字会、急救中心、大医院或专业培训机构工作，愿意且能够长期深入农村基层的师资非常少。

（3）组织动员难度大：在城市，可以通过单位、社区进行高效的组织动员。在农村，基层组织力量相对薄弱，将分散的村民在特定时间召集到特定地点进行培训，难度很大，组织成本高。

2. 培训内容单一

现有培训多侧重理论讲解，缺乏实操训练，导致技能掌握不牢固。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训时间有限：实操训练远比理论讲解耗时，在一个固定的培训周期内，组织几十名学员轮流进行高质量的操作练习，需要数倍于理论授课的时间[4]。

（2）培训模式陈旧：为追求培训人数和效率，很多培训采用大班教学。一名讲师面对数十甚至上百名学员，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纠错，实操环节往往流于形式，变成“看老师演示”。

（3）考核机制缺陷：考核多在静态、理想化的环境下进行，缺乏模拟真实急救现场混乱、紧张的氛围，导致学员的临场决策能力、沟通协作能力无法得到锻炼和检验。考核标准过于注重流程是否“走完”，而非动作是否正确“达标”。

3. 宣传力度不足

部分居民对急救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与认知层面：“与我无关”的侥幸心理是最普遍的原因，大部分居民认为心跳呼吸骤停等紧急情况不会发生在自己及家人身上，这种乐观偏见使得人们缺乏学习急救技能的内在驱动力。“害怕学不会”是老年人最担心的问题，可能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缺乏信心，担心步骤太复杂，学了也会忘，从而产生畏难情绪。

（2）经济与教育层面：参加培训需要花费时间和交通成本，对于低收入群体尤为突出，他们可能因忙于生计而无暇参与“非紧急”的培训。此外，对急救知识的学习和理解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健康素养，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对于相对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操作流程，接受度较低[5]。

（3）信息与渠道层面：年轻人更能接受基于自媒体的知识传播方式，而老年人主要依赖电视、广播、社区公告等传统媒介，对于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型宣传方式接触少或不信任。

（二）对策建议

1. 政策支持

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社区公共服务，政府提供专项补贴；将应急救护培训的普及率、合格人员数量、设备配置等指标，纳入乡村振兴评价体系，从顶层设计上施加压力与动力。

2. 资源优化

搭建“互联网+”远程教学平台，通过线上教学团队在网格群内推送急救知识，扩大受众面；联合红十字会、医院等机构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在人口流动大的集市设立“赶集日”培训宣传点；赋能关键人群，建立“不走”的救护队伍，建立“第一响应人”队伍[6]。

3. 创新培训模式

有研究表明，在急救培训中融入急救知识的理论教学及现实仿真患者的评估和急救技能的训练，可以明显提高被培训人员对操作技能的掌握程度。可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大力推广急救知识，打破时空限制，线上学习理论、线下实操演练，采用“情景沉浸式”工作坊，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实操练习，巩固理论知识。

（4）重点人群覆盖

针对老年人、儿童家长、高危行业从业者开展定向培训。可鼓励低龄健康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对成互助小组，在熟悉场所开展“情景化”培训，模拟在厨房、卫生间、卧室等家中场景发生意外的处理方法，共同学习和练习；聚焦“儿童专属风险”，教会家长“儿童/婴儿海姆立克急救法”、婴幼儿心肺复苏及烧烫伤、溺水、高热惊厥等常见意外伤害的处理方法；通过开设亲子课堂，指导家长在游戏互动中向儿童传授基本的安全知识（如不碰插座、不吃陌生东西等）；对于高危从业者，可结合企业本身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培训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触电、中毒、烧烫伤、高质量心肺复苏和AED使用的急救内容，将急救技能转化为职业安全的一部分，提升现场施救能力，降低事故伤亡率。

四、结语

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培训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城乡差距明显，居民急救技能掌握率较低。未来应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等方式提升培训覆盖率和实效性，构建“政府主导、社区协同、公众参与”的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助力健康宁夏建设。

参考文献

[1] 张翔，张榴红，耿德勤，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知觉压力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焦虑、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 [J]. 徐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2, 42(08): 613-617.

[2] 谢琪，黄钊慰，陈惠达，等. 医学院校大学生急救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研究 [J]. 中国卫生统计，2022, 39(06): 897-901.

[3] 钟庆，黄远霞，李毅琳，等. 武汉市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 [J].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9, 30(01): 137-140.

[4] 马芳，方娴.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老年人群安全与急救和基本医疗健康素养调查 [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9, 42(03): 410-414.

[5] 包满珍，吴丹，任娟，等. 合肥市社区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安徽医专学报，2021, 20(05): 149-151,154.

[6] 程呈，王银，俞亚君. 银川市社区居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与技能现状调查 [J]. 社区医学杂志，2022, 20(03): 164-168.

（下转101页）

学科建设引领下的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崔　钺 熊建超 韩会杰 孙奕凡

摘要：学科建设引领下的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可有效提升机械专业的产业适应性，为机械学科建设及多角度发展夯实基础。通过综合施策形成学科与专业优势互补联合体，构建基于OBE-CDIO融合的“五阶段三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将互动贯穿于学生培养全过程；以能力为导向多维升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评价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优化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同频共进关系，解决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需求、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校企合作不深入等问题，推动唐山学院机械学科与专业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新工科

唐山市属工科院校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为区域内钢铁行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所需的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机械学科建设引领机械专业发展，而机械专业发展又为机械学科建设提供载体与基础，二者互相促进、协同共进。学科建设中的相关成果可转化融入专业建设中的教学实践，形成办学特色；专业建设中的人才培养质量则为学科建设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因此，需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学科建设引领专业建设，以专业建设支撑学科建设，实现科研教学良性互动，以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带动机械学科与机械专业整体水平提高[1]。唐山学院已进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期，建设期内机械学科为学校重点建设学科，每年获百万元学科建设经费支持，学科建设引领下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亟待进一步提升。

随着新工科建设的深入推进，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路径的研究日益丰富，许多方案已进入实践阶段。国外研究多从工程教育视角出发，基于工业发展需求，强调机械专业培养应具备多元价值取向、系统化的知识基础以及完整的实践体系。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自2017年起推动本科教学从主题型向探究型转变，采用项目式教学为主的多样化教学法；美国工程院发起的“2020工程师”计划，着力培养适应新形势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2]。

2019年以来，教育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推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国内本科院校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特色，依据新工科理念，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体系以优化培养路径[3]。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推出“哈工大新工科Ⅱ型方案”；天津大学实施“天津大学新工科建设方案2.0”；东北石油大学从审核评估视角，在人才培养过程及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措施[4]；山东交通学院以党建引领构建“举校体制”，探索学科建设引领下的专业发展路径[5]；梧州学院对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科研进行“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6]；塔里木大学探索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学科专业互动的可行性，建立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的协同机制；兰州理工大学结合甘肃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状况，构建新形势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一体两翼”升级与改造路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提出本研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思路，优化具有航天特色的机械工程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九江学院依托现代产业学院，探索校企联动协同育人培养模式，提升教学保障水平。

目前，唐山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结合度有待提高。受科研绩效激励影响，部分教科研团队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科研成果产出，对教学的关注持续弱化，未能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制约了人才培

（上接100页）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宁夏社区居民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和应用现状的调查研究及分析”（NYG2024350）。

（作者单位：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养质量的提升。因此，亟须建立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同频共进的机制，化解科研与教学脱节的矛盾，以推动唐山学院机械学科与机械专业的协同发展。

一、机械学科建设与机械专业建设相互促进机制分析

通过建立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协调发展关系，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产业学院及实习基地等资源方面，形成学科与专业优势互补的联合体，在学科建设引领下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并为学科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学科建设中的学科学术梯队、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室及技术创新中心，可以为专业建设中的课程双师队伍、教学实验内容及教科研实验室优化更新提供支撑。学科的方向建设及科研项目的实施是专业建设中课程开发、教材建设的基础。例如，机电工程学院现有的河北省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及过程仿真重点实验室、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印刷机械现代产业学院，可为学生的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当前，机械专业的目标是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而学科建设的目标是推进机械领域的科学研究。立足于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交叉点，以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为核心，从双师队伍建设、课程内容开发、实践教学体系、产业学院建设与配套质量保障体系等多维度入手，推动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同步发展。

以学科建设明确机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路径，确保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更契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适应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需求，提升整体教学质量和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拓宽机械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满足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将机械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引入教学，促进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应用，打破学校与产业之间的壁垒，使机械专业教学紧跟行业发展，从而推动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二、学科建设引领下的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机械专业作为传统工科专业，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技术的挑战，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亟须升级改进。本研究在机械学科建设的引领下，秉持新工科理念，构建 OBE-CDIO 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以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和工程教育（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理念提升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建立“五阶段三联合”的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持续改进运行机制，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促进学科专业协同发展。

在学科建设引领下形成机械学科与机械专业的优势互补联合体，一方面有效提升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产业适应性，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应对当前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急需，打造符合国家教育战略的新型工科专业；另一方面在建设过程中整合学科优势，加强交叉融合，推进产学研合作，优化校内外教学与科研资源，提升机械专业核心竞争力，为机械学科建设及发展夯实基础。

“五阶段三联合”的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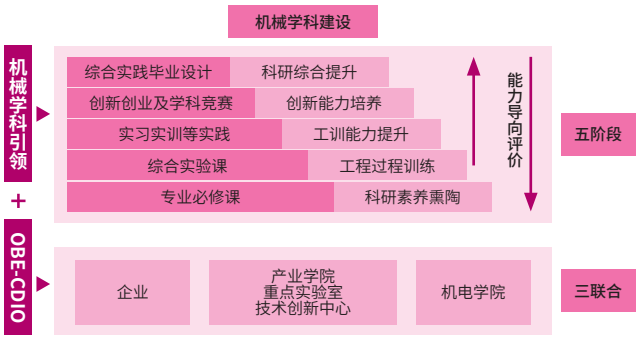


图 1 “五阶段三联合”的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机械类人才培养模式以机械学科建设和 OBE-CDIO 理念为引领，面向社会需求，以立德树人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以培养实践能力强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由企业、二级院系、产业学院或技术创新中心三方构成的“三联合”主体，协同构建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验 / 实践教学体系， 打造“科研素养熏陶—工程过程训练—工训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培养—科研综合提升”五阶式科研与实践教育体系，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唐山区域装备制造业对应用型机械专业人才的需求。

以学科建设为引领，可将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深度融入学生培养教育全过程，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将科研项目及工程案例引入课堂。从大一起推行导师制，从专业基础课教学开始对学生进行科研素养的熏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实习实训类课程中引入导师在研工程课题，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以问题为导向启发学生构建工程思维。项目驱动下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对机械相关知识进行融会贯通与综合应用。依托机电工程学院河北省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及过程仿真重点实验室及两个校级产业学院，在五个阶段的培养过程中，将项目融入专业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环节，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多元化评价体系，通过科研成果、CDIO 项目作业及学科竞赛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工程项目及学科竞赛并给予学分置换，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通过优化课程体系与改革教学方法，促使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全面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

能力，为机械学科发展提供可靠支撑，实现机械学科与机械专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运行机制及其建设成效

立足于机械专业学科建设，依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 PDCA（Plan—Do—Check—Act）循环理论，坚持目标性、系统性、全员性、全程性四大基本原则，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实施全过程质量监控。

在学科建设引领下按照“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模式，构建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运行机制（见图 2），持续改进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和主要教学环节，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螺旋式”上升。在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以教学环节的合理性评价支撑课程目标，以课程目标的合理性评价支撑毕业要求，以毕业要求的合理性评价支撑最终的培养目标，以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和社会评价反馈，调整教学环节与课程体系，层层提升、持续改进培养方案，以保障机械专业人才出口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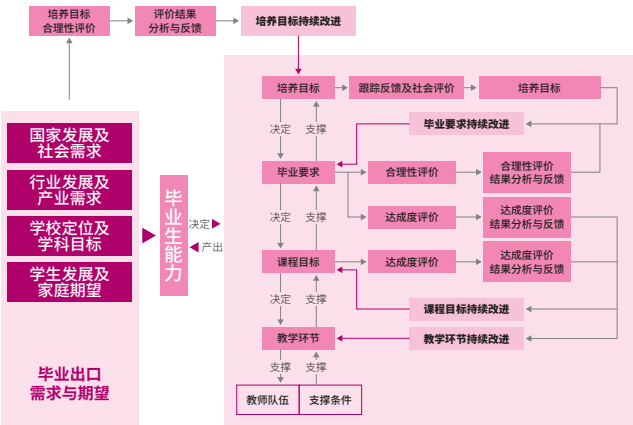


图 2 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运行机制

在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升级过程中，凝练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及过程仿真、先进钢铁材料制备与凝固过程仿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电控系统开发三个学科研究方向，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持续提升。2024 年 6 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顺利通过河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验收。学科团队年度引进高水平博士教师 6 人，获批纵向及横向项目 34 项。学生参与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6 篇，授权专利 12 项。2024 年，机电工程学院组织了两届以解决企业实际工程问题为目标的校级机械创新设计类学科竞赛，参与学科竞赛的学生队伍达上百支，获得省级以上奖项 58 项（其中国家级 16 项）。2025 届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考研成功 28 人，深造率达 33%。新增产学研合作企业 10 家。这些成果切实体现了学科建设引领下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四、结语

通过紧扣机械学科与机械专业协同发展的共生点，在深入剖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建立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协调发展关系，形成学科与专业优势互补的强大合力。以学科建设引领协同互动，基于 OBE-CDIO 融合的“五阶段三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科与专业互动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多维度升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同频共进关系，有效促进了学生学以致用，提升了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学科发展夯实基础。

在机械学科建设过程中，通过机械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进一步凝练了学科方向，提升了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专业建设成果斐然，顺利通过一流专业验收；学生在学术研究、学科竞赛等方面表现出色，展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学生考研深造率大幅提高，体现了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产学研合作日益深化，新增多家合作企业，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和就业机会。这些成效的取得，充分证明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融产学研于一体，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能提升机械专业的产业适应性，满足区域产业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还能整合学科优势，提升机械学科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下一步，将继续以学科建设为引领，持续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 2026 年机械硕士学位点申报筑牢基础，推动唐山学院机械学科与专业建设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王枫，邵强，马庆龙，等．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机械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J]. 高教学刊，2024, 10(23): 159-162.

[2] 袁野．新工科背景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问题与策略研究 [D]. 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22.

[3] 钟磊．综合性高校新工科建设的现实审视和实践策略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01): 91-95.

[4] 梁天．审核评估视角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研究 [D]. 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22.

[5] 李洪华，谭旭翔，吴娜．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现实问题、行动逻辑与优化机制 [J]. 航海教育研究，2024, 41(04): 10-18.

[6] 张文祥，郭铁梁，李志军．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科研一体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02): 52-5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学科建设引领下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25GJJG561）。

（作者：崔钺、熊建超、孙奕凡，唐山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韩会杰，唐山冶金锯片有限公司）

流动的武术与锚定的地方：体育影像中“地方感”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秩序

亓　鹏

摘要：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流动空间”时代，跨文化传播正经历由宏观叙事向微观日常互动的范式转移。本文以体育公益影像《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为研究对象，引入媒介地理学与新流动性范式，探究高度在地化的日常空间（北京胡同）与传统身体实践（中国武术）如何通过媒介建构兼具民族性与世界主义的“地方感”。当“胡同”抵抗了现代都市的无地方性，构筑了承载中国式伦理与信任的“锚定”场域；而“武术”则承载了异文化主体的身体流动与感知移置，促成传统技艺的脱域与再结域。两者的辩证交汇生成了“第三空间”。从媒介生产的角度出发，本文探讨了体育影像作为“空间介入”的一种方式，将可能为数字时代建立以“相互理解及共存”为基础的世界传播秩序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媒介地理学；流动性范式；地方感；跨文化传播；体育影像

一、引言：体育影像的“空间转向”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与媒介社会的双重背景下，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极大地消解了地理区位与空间距离对人类社会互动的制约，社会生活日益依托各类网络节点展开。然而，正如段义孚（Yi-Fu Tuan）[1]在探讨“地方感”时与多伦·马西（Doreen Massey）[2]等学者所论证的，地域并不因迁徙而消亡，地方始终是社会关系与情感精神的栖息地，并在社会文化互动中持续激发。以往的体育跨文化传播中，对国别的视觉表征多集中于赛场、授奖仪式等结构化意义上的“非常态空间”。该常态景观虽能展现一国的竞技水准，但在不同文化的语境中，由于异质文化受众没有共同的生存经验作为理解的基础，易陷入多元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之中（荆远，2026[3]；吴宣廷等，2025[4]）。

在近年来文化研究“空间转向”和“具身转向”的影响下，体育影像也越来越强调将观看目光从结构性的大规模场所转移到微观空间和身体活动之上。媒介影像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再现，更是锚定集体记忆、唤起地方依恋并重塑社会关系的话语实践网络（张斌，2021）[5]。体育公益影像《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可视为讨论此空间表征变迁的典型文本。该片作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持项目“一类作品”，跳出了传统竞技体育的常规场域，将叙事置入北京胡同这一具象的日常生活空间内，通过展现外国孩童与中国师傅清晨修习武术的交互过程，呈现了跨文化主体的微观相遇。

在当今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空间高流动性以及人造景观趋向“无地方性”的时代特征下（徐雅宁，刘思远，2024）[6]，高度在地化的日常生活空间（胡同）和传统身体实践（武术）是如何借助影像的媒介机制，生产出既扎根于本土文化，又能够产生跨文化认同的“地方感”呢？

二、作为媒介景观与记忆节点的“胡同”

“空间”并非一个静态、客观的物质性存在，而是由制度以及日常生活活动所建构的一系列意义网络。体育空间是一种不断被占有、使用和移置的生产资料，其形态与开放程度因人们的历史性理解与体育实践而异。本文将以体育空间的媒介化生产与地方感建构为切入点，分析体育公益影像《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是如何将物理空间上的胡同转换成一种跨文化交流意义上的场所。

（一）抵抗“无地方性”的空间纹理

城市发展的高速度造成空间同质化的产生，失去了地方性的存在而趋向于“无地方性”（许婷芳，2024）[7]。《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刻意规避大都市的同质景观，将叙事锚定于清晨的胡同。通过对青砖灰瓦、老树院落的特写与框选，影像建构出极具历史厚度的“空间纹理”。

强调对富有显著特征的地方文化与地方性的挖掘，是进行文化品牌的构建并得以跨域传播的基石（刘云舟等，2023）[8]。胡同作为物化场所在媒介网中的视觉表征，也是在对抗着现代城市的“无地方性”虚幻而确定的一个不可复制的、有“原真性”的中国本土文

化的坐标。借助于这一鲜明而独特的地域书写，这部影片最终突破了一隅之地的局限，为它走向“超地方性的”世界跨国传播提供了视觉地志学的基础。

（二）非正式体育空间的伦理建构

运动空间影响并建构着身体实践的社会学意义。胡同是中国式的“社区嵌入式”空间（王子玥等，2026）[9]，天生具备“熟人社会”“礼治秩序”的特质，是信任、人情以及地缘结构的空间呈现。影片拒绝现代匿名化的宏大竞技场所，在充满生活气息的胡同院子中展开武术教学，本质上就是把异质性的文化主体带入了以中国传统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信任圈，在这种非正式的嵌入式运动场域中，“师徒关系”水到渠成地产生，“谦和、包容”的武德准则不再是一种悬置的话语，而是一招一式的身体实践，成为这种场域“礼治”状态下的自然表现。

（三）影像生产中的体育空间表征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0]将空间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性空间。作为不断被生产与重塑的社会资料，体育实践能将普通的取用空间转化为具有特定精神涵养的文化场域（赵盛楠，2025）[11]。胡同经历了“空间的表征”的深度重组。师徒二人的武术操演作为能动的“空间实践”，提炼了日常生活表象，赋予该场所全新的体育伦理内涵，使其从物理居所质变为理想化的武术场域。同时，基于现代体育空间的“触媒”逻辑（叶郁等，2019）[12]，这样一种空间重组高度依赖于媒介的介入，在此，摄像机就成了“微观体育基础设施”和“空间触媒”。

三、武术的身体展演与跨文化“位移”

如果说胡同构成了静止的“锚定”，那么武术与外国小男孩则代表着“流动”。约翰·厄里（John Urry）与米米·谢勒（Mimi Sheller）提出的“新流动性范式”[13]指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应从静态的结构转向人员、物品、信息与影像的流动。在体育地理学中，流动性本身就是构成地方意义的重要力量。

（一）身体作为流动的媒介：跨文化交互的具身实践

体育地理学相关研究表明，运动实践的“流动性”绝非对既有物理空间的简单位移，其本身即一种参与“构成地方”的积极生成力量（Hall & Lin, 2024[14]）。在影像文本中，外籍孩童的身体兼具物理在场与跨国流动的双重隐喻。这种来自异域异文化的他者，其来到胡同学武的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间的身体旅行——由奇观化外国风景的观看，转化为参与中国社会生活之在地的“身体在场”的过程。他们通过身体技巧的学习、身体姿势的训练以及身体力感的体验，对中国的微观空间进行了物理测量和意义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不仅是一个容纳体育活动的空间，而且成为一个积极的跨文化交流界域，实现对西方式主体经验和东方式空间秩序的缝合与联结。

（二）接近性与共同在场：跨文化防御的身体消解

武术的跨文化传播是指消解文化区隔，在真实日常情境和“他人在场”下进行的文化商谈、再造及共享的过程（刘冠启，花家涛，2025）[15]。胡同作为微观的日常生活公共领域，其内部的武术教学学习过程跨越了无形的跨文化传播界限。在习武的微观互动中，师傅为了给外籍男孩纠正出拳的角度与扎马步的姿态，必须进行近距离的动作指导与肢体介入。这种体育教学中特有的空间共享，此时已彻底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训练”，演变为一种极高信任度的空间让渡与“身体转义”。

（三）记忆重写与情感融通：体育地方作为生成的空间生态

地方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理坐标，更是世代经验沉积与传统伦理绵延的文化容器（费孝通，1998）[16]。在传统的视觉表征中，胡同往往被固化为一种封闭的、基于传统地缘与血缘的怀旧景观，承载着单向度的旧日追忆。然而，该影像文本打破了这种僵化的乡土滤镜，将地方记忆重塑为一种向外敞开且不断生成的绵延过程。

武术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身体实践，并且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伦理秩序，在挣脱原有社会中僵化的宗亲和差序传承之后，当这种地方性历史经验经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师徒频繁的身体交往及身体规训而传承下来时，“共在场”的身体实践使得沉睡的地方性历史记忆再度浮现于生活世界之中，并摆脱了其作为地方社区私有文化遗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特征，成为不同文化群体可以分享的生活情感体验；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性住宅亦由此升华为开放的、活生生的、动态发展的跨文化的居住环境。

四、基于“美美与共”的跨文化传播新秩序

数字媒介的全面介入，使传统聚落与实体地方的社会空间意义得到了彻底的重组与转译，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化空间不再是封闭的地理孤岛或者静止的历史遗存，而被转换成面向全球流动性完全开放的意义生产场。《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体育公益广告就超越了作为一个“文化表征之切片”的单一文本属性，成为一种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空间媒介化过程。

（一）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17]提出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致力于打破物理空间（第一空间）与想象空间（第二空间）、中心与边缘、本土与全球的刚性二元对立，强调空间具有高度的混杂性、多重叠加性与激进的开放性。在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视觉表征中，本土空间很容易陷入被降维的境地：或者将其本质化为等待西方凝视的、停滞在前现代农耕文明中的“他者”奇观；或者将本土空间强行纳入西方现代性和商业资本的空间消费逻辑之中，成为同质化的

异国气质的背景板。但此影像文本却避开了上述两种陷阱，以体育媒介作为空间实践的方式，构建一个反对文化霸权、强调平等对话的“第三空间”。

（二）体育媒介的伦理向度

国际主流媒体很容易陷入“其他化”（Othering）的话语陷阱中，其中充满了对异质性的强调、权力的争夺及文化冲突的表演性展示。这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建构过程，因为它将世界划分成不同层次，否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主体意识”（王先鹏，2025）[18]。这种以语言和冷战思维为中心的传播秩序，不仅无法弥合跨文化鸿沟，反而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一语境下，《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等聚焦微观互动的体育公益影像将中国武术这一蕴含东方智慧的“身体哲学”作为跨文化沟通的媒介，试图在视听表征中完成对“知识殖民”的祛魅，重构一种基于“尊重与共生”的替代性传播范式。

（三）理论视域下的地方营造实践

本文在此引入自我民族志与媒介生产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将研究者自身作为《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制片团队成员的亲历者身份纳入考察。在真实的制片现场，基于对“东方主义凝视”的警惕，创作者自觉进行了一场反常规的“空间编织”，主动拒绝了将中国武术“飞檐走壁化”与“神秘化”的商业视听捷径。镜头刻意“沉潜”至北京胡同的微观生态之中。拍摄者以摄像机这一基础设施作为“地方营造”的工具，在镜头中选取市井晨光、粗粝青砖以及庭院绿植进行框选，将抽象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转译为具体可见的日常肌理。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久久为功 美美与共》的深度剖析，揭示了体育影像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张力与平衡方案：锚定的地方（胡同）抵御了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焦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记忆坐标与信任秩序；而流动的武术与跨国的身体（外籍孩童与本土师傅的互动）则突破了地方的封闭性，赋予了传统空间以开放、对话与跨文化连接的能力。

在数字化与平台化全面重塑人类互动网络的今天，越是深耕于微观的“日常空间”，越是依赖于人类共通的“身体实践”，就越能在跨文化实践中跨越认同的鸿沟。以“地方感”和“日常空间”的重建为基础，是实现体育公益广告美学提升的有效途径，也是当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重建包容、平等、美美与共的世界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 段义孚，宋秀葵，陈金凤．地方感：对人意味着什么？[C]//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文艺美学研究 (2016 春季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济南：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 317−331.

[2]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J]. Marxism Today, 1991, 38: 24−29.

[3] 荆远．中华武术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C]// 国际班迪联合会 (FIB), 国际体能协会 (ISCA), 中国班迪协会 (CBF), 澳门体能协会 (MSCA). 第八届国际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中册）.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6: 1416−1421.

[4] 吴宣廷，吉灿忠，刘帅兵，等．共情传播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定位、堵点与路径 [J]. 体育文化导刊，2025(12): 74−81.

[5] 张斌．地方、记忆与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地方书写 [D]. 武汉：武汉大学，2021.

[6] 徐雅宁，刘思远．流动、无地方性、精神之困：新世纪以来藏地电影新浪潮中家园书写的现代性演变 [J]. 影视文化，2024(01): 140−149.

[7] 许婷芳．乔纳森·弗兰岑文学创作中的无地方性 [J]. 外国语文研究，2024, 10(05): 49−58.

[8] 刘云舟，庞子凯．以地方性与超地方性为视角——探析福建电影“三位一体”发展路径 [J]. 东南传播，2023(08): 58−62.

[9] 王子玥，骆秉全．社区嵌入式公共体育服务空间构建：理论逻辑、实践经验、推进路径 [J]. 体育文化导刊，2026(02): 46−52, 73.

[10]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Nicholson−Smith D, trans.Oxford: Blackwell,1991.

[11] 赵盛楠．取用与支配：体育参与者的社会空间生产及其媒介化 [C]//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四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学术成果汇编——论文专题报告（体育社会科学分会）. 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25: 393−395.

[12] 叶郁，潘思融．体育公园模式演变与空间系统发展脉络研究——基于竞技、风景和触媒的逻辑 [J]. 中国园林，2019, 35(09): 62−66.

[13]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02): 207−226.

[14] Hall T, Lin S. Teaching sports geography[J].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2024, 48(01): 1−10.

[15] 刘冠启，花家涛．再生活化：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实践 [C]//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四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学术成果汇编——论文专题报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25: 163−165.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 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下转 107 页）

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融合下的非遗文娱创新模式研究

梁 凯 韩 西

摘要：在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下，非遗保护传承进入技术赋能的新阶段，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的融合，为非遗文娱产业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全新路径。本文通过分析非遗文娱在传播、体验、传承及产业层面的核心困境，系统阐释两大技术的融合逻辑与应用价值，重点构建虚拟沉浸展演、互动式传承教育、数字文创开发、智慧非遗园区运营四大创新模式，结合技术应用挑战提出针对性对策，为非遗文娱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三维重建；数字孪生；非遗文娱；创新模式；技术融合

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下，非遗保护已进入“数字孪生”时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23年度报告显示，78.6%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已建立数字化档案，其中采用虚拟现实技术的项目传承效率提升58%，这种技术介入不仅改变了文化存续形态，更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生态系统。数字媒体艺术通过构建“数字基因库—智能传播链—虚拟生态圈”的三维架构，正在重塑非遗的传承范式，其应用价值已从技术工具层面向文化治理维度跃迁。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文娱转化是实现活态传承的关键路径，但传统模式面临诸多现实制约；三维重建的精准还原能力与数字孪生的动态交互优势形成互补，二者的深度融合可为非遗文娱注入创新动能，推动其在传播维度拓展边界、体验维度升级质感、传承维度弥合断层、产业维度延伸链条，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协同提升。

一、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介绍

三维重建技术以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为核心，通过激光扫描、摄影测量等手段采集物理对象的空间坐标、纹理特征等数据，经点云处理、网格重建、纹理映射等流程，构建与真实对象高度一致的三维数字模型。该技术具备毫米级数据采集精度，能够完整保留非遗项目的细节特征，小至传统手工艺的针法纹理，大至非遗建筑的空间结构，均可实现精准数字化复刻。其核心优势在于静态还原的真实性，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档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目前已在敦煌壁画数字化、古建筑保护等非遗领域形成成熟应用[1]。

数字孪生技术则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物理实体的虚拟映射体，通过实时数据传输实现虚拟模型与物理实体的动态同步，具备“感知—映射—预测—优化”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与三维重建的静态复刻不同，数字孪生技术强调动态交互与智能决策，能够模拟非遗项目的演化过程、技艺流程的动态逻辑，甚至预测不同场景下的呈现效果。数字孪生技术有望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难题。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在计算机上建立物理对象的真实映像并辅以物联网、大数据技术，进而实现在线状态实时监测、动态过程仿真模拟和优化预判。两大技术的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形成“静态还原 + 动态交互”的协同效应。

二、非遗文娱发展的核心困境

（一）覆盖面有限，传播形式单一固化

非遗文娱的传统传播高度依赖线下场景，无论是非遗展演、手工艺展销还是民俗节庆，均受地域、时间与场地限制，难以突破物理空间的边界。部分项目

（上接106页）Oxford: Blackwell, 1996.

[18] 王先鹏 .“知识殖民”祛魅与文化主体性重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智慧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 2025, 10(09): 89−102, 116.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验师、体育赛事传播系教师）

虽尝试线上传播，但多停留在图片展示、短视频播放等浅层形式，缺乏对非遗文化内涵与技艺流程的深度呈现。这种单一的传播模式导致非遗文娱的受众覆盖面狭窄，传播效率低下，难以触达更广泛的年轻群体，无法形成规模化的文化影响力。

（二）互动性不足，沉浸感与参与感薄弱

现有非遗文娱产品多以单向输出为主，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有效的互动渠道与参与路径。传统非遗展演中，观众只能远距离观看，无法深入了解技艺细节与文化背景；线上展示内容多为静态展示或预制视频，难以实现实时反馈与个性化互动。这种缺乏沉浸感与参与感的体验模式，无法满足当代消费者对互动性、体验感的核心需求，导致非遗文娱对受众的吸引力持续减弱。

（三）活态传承断层，年轻群体吸引力不足

非遗的活态传承高度依赖“口传心授”的传统模式，而现有传承人普遍面临老龄化问题，年轻传承人断层现象严重，年轻群体对非遗的认知多停留在“传统文化”的抽象概念，缺乏具象化、趣味化的接触渠道，导致非遗在年轻群体中的认同感与接受度偏低。同时，传统非遗技艺的学习门槛高、周期长，缺乏适配年轻群体学习习惯的传承载体，进一步加剧了活态传承的困境。

（四）产业链条短，商业化与文化性平衡失衡

非遗文娱的产业链条多集中于上游的创作与中游的展示，下游的衍生开发与价值延伸不足，导致产业附加值偏低。部分项目为追求商业利益，过度简化文化内涵，推出同质化的文创产品，陷入“重商业轻文化”的误区；另有部分项目坚守文化纯粹性，缺乏市场化运营思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融合下的非遗文娱创新模式构建

（一）虚拟沉浸展演模式

虚拟沉浸展演模式以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为核心，对非遗表演类项目进行数字化重构，打造沉浸式、可交互的虚拟展演场景。技术应用层面，通过三维激光扫描采集非遗表演的场地空间、演员动作、服饰道具等核心数据，构建高精度三维模型；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搭建虚拟舞台，建立演员动作与虚拟模型的实时映射关系，结合实时渲染、空间音效等技术，还原表演的现场感与氛围感。实现路径上，首先对非遗表演的核心元素进行数字化拆解，包括表演流程、动作细节、音乐唱腔、文化背景等，形成标准化数据档案；其次，构建多终端适配的虚拟展演平台，支持 VR 设备、手机、电脑等不同终端接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观看需求；最后，设计互动功能模块，观众可通过手势控制、语音指令等方式与虚拟场景互动，如切换观看视角、了解技艺细节、参与虚拟互动环节等[2]。该模式适用于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皮影戏、木偶戏等民间表演，以及少数民族舞蹈、曲艺等非遗项目。以昆曲为例，通过三维重建还原古戏台的建筑细节与昆曲演员的身段动作，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演员动作的实时映射与场景动态调整。观众佩戴 VR 设备即可“置身”古戏台，近距离观看表演细节，还可通过互动功能了解唱腔技巧、服饰文化等背景知识。这种模式打破了线下展演的时空限制，扩大了传播覆盖面，同时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与认同感，让非遗表演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二）互动式传承教育模式

互动式传承教育模式聚焦非遗技艺的数字化传承，通过技术融合构建“虚拟实操 + 个性化指导”的教育体系，降低学习门槛，提升传承效率。技术支撑方面，运用三维重建技术拆解非遗技艺的操作流程，如苏绣的针法、紫砂陶艺的制壶工艺等，构建分步式三维模型；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搭建虚拟实操场景，实时捕捉学习者的操作动作，与标准模型进行比对，提供实时反馈与指导。具体实施中，首先组建非遗专家与技术团队，共同梳理技艺的核心流程与关键节点，制定标准化的教学大纲；其次开发互动式教学平台，将三维重建的技艺模型与数字孪生的实时交互功能相结合，学习者可通过虚拟仿真设备进行实操练习，平台自动识别操作偏差，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建议；然后建立个性化学习档案，根据学习者的进度与特点，推送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实现“因材施教”[3]。该模式适用于传统手工艺、非遗技艺培训、校园非遗教育等场景。以紫砂制壶技艺为例，通过三维重建还原制壶的全流程，从泥料选择、拍打成型到壶嘴安装、刻绘装饰，每个步骤均构建精细化三维模型。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学习者操作动作的实时捕捉与分析，当学习者拍打泥料的力度不足时，平台会通过震动反馈与文字提示进行指导。这种模式解决了传统传承中“教学难、练习难、反馈难”的问题，降低了非遗技艺的学习门槛，同时通过标准化数据档案保留了技艺的核心精髓，为活态传承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三）数字文创开发模式

数字文创开发模式以非遗文化元素为核心，借助技术融合实现文化内涵的可视化呈现与创造性转化，打造高附加值的数字文创产品。技术应用上，通过三维重建提取非遗的核心文化元素，如青花瓷的纹样、剪纸的图案、榫卯结构的造型等，构建标准化数字素材库。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进行文创产品的虚拟设计与迭代优化，模拟产品的使用场景与呈现效果，提升设计效率与精准度。在开发流程中，先对非遗文化元素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提炼，筛选出具有代表性、辨识度高的核心元素，通过三维重建转化为可复用的数字资源。基于数字素材库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既可以开发虚拟文创产品，如数字藏品、虚拟服饰、线上互动道具等，也可以通过数字孪生模拟实体文创产品的设计效果，优化生产流程。构建“线上 + 线下”的销售渠道，

线上通过数字平台销售虚拟文创产品，线下结合 3D 打印技术实现实体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同时建立用户共创机制，鼓励用户参与文创产品的设计与迭代。

（四）智慧非遗园区运营模式

智慧非遗园区运营模式以技术融合为支撑，对非遗园区的物理空间与业态布局进行数字化升级，打造“虚实联动、智能高效”的智慧园区生态。技术架构上，通过三维重建还原园区的物理空间、非遗场馆、业态分布等核心信息，构建园区的三维数字底座；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建立园区的动态映射模型，整合人流数据、环境数据、运营数据等多维度信息，实现园区的智能管理与优化[4]。运营流程中，先构建园区的数字孪生平台，整合三维地理信息、非遗资源数据库、智能监控系统等，实现园区物理空间与虚拟模型的实时同步；此外，还应开发智慧服务模块，包括线上云游、智能导览、互动体验等功能，游客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获取园区导览路线、非遗项目介绍，还可通过虚拟场景互动了解非遗技艺；建立智能运营体系，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分析人流分布、消费数据等，优化园区业态布局、资源配置与服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与游客体验。该模式适用于非遗主题园区、非遗小镇、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场景。以某非遗小镇为例，通过三维重建还原小镇的古建筑风貌、非遗工坊、民俗街区等空间信息，构建高精度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智能监控、物联网设备等数据资源，实时监测小镇的人流密度、环境质量等情况，通过数字孪生模型进行预警与调度。游客通过线上平台即可“云游”小镇，虚拟参观非遗工坊，了解技艺制作过程，线下游览时可通过智能导览系统获取个性化路线推荐，参与虚拟互动体验。

四、融合技术应用于非遗文娱的挑战与对策

（一）主要挑战

技术层面面临高精准数据采集成本偏高的问题，非遗项目的多样性导致数据采集标准不统一，部分复杂非遗技艺的细节采集难度大，同时跨平台适配技术尚不成熟，不同终端的体验效果存在差异。内容层面，非遗文化内涵的数字化还原难度较大，部分抽象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核难以通过技术手段精准呈现，容易出现“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人才层面，既精通非遗文化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短缺，现有从业人员的技术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不足，难以满足技术融合的实际需求，在运营层面，技术应用的后期维护成本高，数据更新、系统升级需要持续投入，部分创新模式的盈利路径不清晰，难以实现可持续运营。

（二）应对策略

技术优化方面，推动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的迭代升级，研发低成本、高效率的数据采集设备，建立非遗数据采集的行业标准，规范数据格式与流程，加强跨平台适配技术研发，开发统一的技术接口与适配方案，提升不同终端的体验一致性，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针对性技术攻关，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内容赋能方面，建立非遗专家与技术团队的协同工作机制，非遗专家全程参与数据采集、模型构建与内容设计，确保文化内涵的精准还原，采用“技术+故事”的呈现方式，将非遗的历史背景、文化寓意融入数字化内容，通过场景化、故事化的表达增强文化感染力，加强对非遗数字内容的审核与把关，避免形式化、表面化的技术应用[5]。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开设非遗数字化相关专业，设置三维重建、数字孪生、文化产业管理等跨学科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企业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开展合作，组织技术培训与交流活动，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的技术应用能力。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吸引数字技术人才投身非遗文娱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人才队伍。

五、结语

总之，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的融合，为非遗文娱产业突破发展困境、实现创新升级提供了核心支撑。本文构建的虚拟沉浸展演、互动式传承教育、数字文创开发、智慧非遗园区运营四大创新模式，从传播、传承、产业等多个维度为非遗文娱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路径参考。尽管技术应用过程中面临技术、人才、运营等多方面挑战，但通过技术优化、内容赋能、人才培养、运营创新与制度保障的协同发力，能够有效破解这些难题。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的不断深化，非遗文娱将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深度融合。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技术赋能下将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吸引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参与，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王依彩 . 数字赋能非遗锦灰堆的创新设计 [J]. 辽宁丝绸 , 2025(04): 8, 22.

[2] 单泓斐 . 非遗视域下淮北花鼓戏的历史嬗变、艺术特征与文化价值及探究 [J]. 视听理论与实践 , 2025(05): 65−72.

[3] 张寒诺 . 非遗活态传承视域下安塞农民画元素在服饰品中的融合创新研究 [J]. 纺织报告 , 2025, 44(09): 137−139.

[4] 黄穗 .“非遗”传承视域下永春纸织画的文化衍生品设计研究 [J]. 美术文献 , 2025(09): 145−147.

[5] 刘璐 . 基于 AIGC 技术的陕西非遗民间舞蹈传承路径探索——以华阴素鼓为例 [J]. 新传奇 , 2025(29): 105−107.

（作者单位：甘孜州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职业教育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途径探究

张军师

摘要：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进步与产业创新为核心，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其培育离不开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链与产业链的重要桥梁，在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立足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形成机制，阐述职业教育应通过针对性地设置专业、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助力学生掌握前沿技能、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

一、职业教育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与意义

（一）职业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性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新时代，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和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伴随企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行业企业对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承担着为新发展、新变化培养新质生产力的重任。据统计，仅制造业相关的十个重点领域，截至 2025 年技能人才缺口将近 3000 万人[1]，而职业教育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加强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促进就业，还能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黄炎培先生把职业教育的目的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培养高技能人才、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更在于其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深远影响。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具有普及性、平等性等特点，能够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不仅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和谐，还能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积累宝贵的人才资源。

（二）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效率的提升，更强调知识、技术、创新等非物质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升。以德国为例，其“工业 4.0”战略的实施，正是基于对新质生产力的深刻认识与把握，通过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实现了制造业的智能化、网络化与个性化发展，有效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2]。

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它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还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意义，积极探索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

二、职业教育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首先，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近年来，我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职业教育正是培养这些技术工人的主要渠道。通过职业教育，学生可以获得与市场需求紧密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职业教育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和加强与产业的对接，有效提升了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率。现代职业教育注重实践教学和校企合作，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共同研发等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了解市场动态。这种教学模式的创新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精准的人才匹配服务。

此外，职业教育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

作用。高职院校通常与区域产业紧密联系，通过培养符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高职院校还可以与区域内相关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源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入理解和创新。这些非物质资源通过创新、研发、教育等手段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的明证。国际数据公司（IDC）统计，2025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 23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近 1/4。这一数字不仅凸显了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预示了职业教育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

根据波特钻石模型来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该模型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分别是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这些因素同样适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市场需求则驱动着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政府政策、教育体系以及产业环境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3]。

三、职业教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一）深化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对接

作为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关键纽带，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对接不仅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核心抓手，更是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当下，新质生产力加速演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迭代速度日益加快，这些都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数量大、规格高、适配性强”的鲜明特征，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打破传统办学壁垒，以行业企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产教协同体系。

学校作为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应主动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产业调研机制，通过定期深入产业一线，全面研判产业发展趋势、技术革新方向以及岗位能力要求的变化。学校基于精准的调研数据，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将产业前沿技术、行业标准规范、企业实操案例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摒弃“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职场的真实场景与核心技能[4]。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与人才使用的主体，应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提供真实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和实践岗位，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实践案例和师资资源，选派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管理人才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或企业导师，通过专题讲座、实操指导等方式，向学生传授行业经验、职业素养和岗位技能。

（二）创新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适应职场需求，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职业发展规划，创新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机制，构建多样化、灵活化、个性化的教学体系。

在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上，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加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利用虚拟现实（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融合型教学平台，提供优质课程资源、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等，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让学生能够按需开展自主学习，实现技能提升。

在教学方法创新上，应积极推动教学从“知识灌输”向“能力培养”转变，引导学生围绕具体问题开展探究式学习，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职场的认知和适应能力。此外，还应推动“岗课赛证”融合教学，将企业岗位要求、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技能竞赛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以赛促学、以证促能，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5]。

四、职业教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支持与保障

（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这一背景下，政策支持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持续增长，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中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还吸引了更多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从而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具备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此外，通过政策引导组建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共同体等，促进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进而深化产教融合，不仅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锻炼提高，也直接提升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更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教育是国家之根本，职业教育则是国家经济发展之基石。”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正是为了夯实这一基石，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从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提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从制定《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无不彰显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的殷切希望。但个别地方和单位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

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受到影响。因此，应加强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三）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不断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确保职业教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这一体系应涵盖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学生满意度等多个方面。通过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和量化指标，可以全面评估职业教育的质量，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改进和优化职业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在教学内容方面，评价体系应关注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前瞻性。可以引入行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确保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同时，通过定期调查和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和更新课程内容，确保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前瞻性。

在师资力量方面，评价体系应注重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学校可以通过建立教师评价体系，对教师的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同时，激励教师深入参与企业实践和行业研究，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

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企业实习、项目实训等实践教学方式的效果和质量进行定期评估，确保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学生满意度是评价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参考。通过定期调查和分析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满意度，可以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实践教学等方面的评价和反馈。同时，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五、职业教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展望

（一）职业教育与新技术、新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

随着新技术和新产业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与新技术、新产业的融合趋势愈发明显。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还能为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得以创新，如智能教学平台、在线课程等，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方式。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也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新产业的崛起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调整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等方式，积极适应新产业的发展需求，为石化领域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

（二）职业教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方向

职业教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方向将更加注重与新技术、新产业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上，更体现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中。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职业教育也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和手段。大力推广利用虚拟现实 VR 技术，让学生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也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变革。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可以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数据支持，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兴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这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

六、结语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为多元化、融合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只有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和优化教育模式和手段，才能培养出更多符合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 中国制造 2025 蓝皮书 [M].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16.

[2] 高书国 , 张智 . 技能强国 : 职业教育 4.0 时代的中国策略 [J]. 高校教育管理 , 2020, 14(04): 7−14.

[3] 王珏 .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培育路径 [J]. 团结 , 2024(01): 15−19.

[4] 刘菲菲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涵意蕴与推进路径 [J]. 职业教育研究 , 2024(10): 23−29.

[5] 刘平 .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J]. 河北职业教育 , 2025, 9(03): 95−9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一般课题“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JG24EB169）。

（作者单位：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浅析贵阳市青年群体婚育观的影响因素

王浩霖 欧 娅 何 苑

摘要：在我国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青年婚育观对人口结构与家庭建设影响深远。本文以贵阳市 10 个区县市 18~35 岁青年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维度系统剖析其婚育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个人层面上，经济水平直接关联婚姻状况与结婚意愿，学历越高对伴侣收入及家庭条件的包容性越低；在家庭层面上，兄弟姐妹数量影响婚育时间选择与外部评价敏感度，父辈传统婚育观与青年现代理念存在冲突；在社会层面上，同辈群体的价值传导与网络传媒的相关叙事，显著影响青年婚育态度，本研究为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婚育观、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青年群体；婚育观；影响因素；贵阳市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婚育观念和生育政策的政策。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其中强调要引导年轻一代树立健康、积极的婚姻和家庭观念。青年群体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目前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呈现多样化趋势，甚至有一些青年选择晚婚、不婚或不育，这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家庭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调查的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在贵阳市 10 个区县市中展开，包含云岩、南明、花溪、乌当、白云、观山湖 6 个区和修文、息烽、开阳 3 个县及清镇市，分别在每个区县市中随机抽取 18~35 岁青年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进行调查。问卷调查方面，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9 份，回收率 97.25%。深度访谈方面，共计访谈 12 人，其中男性 4 人，女性 8 人。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人层面

1. 经济水平

研究发现，贵阳市青年群体月收入水平的不同，对当前的婚姻状况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对结婚意愿也有直接影响[1]。第一，通过将贵阳市青年群体的月收入范围和他们目前的婚姻状况进行交叉分析，卡方检验结果为 60.716，月收入范围和目前的婚姻状况呈现出显著性（**p<0.01）（见表 1）。分析结果表明，月收入水平对青年群体的婚姻状况有直接影响。

第二，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验证了经济水平对青年群体结婚意愿的直接促进作用。如表 2 所示，月收入每提升 1 个单位，青年愿意结婚的发生比显著提高 21.9%（OR=1.219, 95% CI: 1.025~1.449, p=0.025）。奥本海默（Oppenheimer，1988）的婚姻时机理论指出，经济独立是婚姻的前提条件，青年需达到稳定的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后才敢进入婚姻，否则易因经济不确定性推迟结婚[2]。本研究也体现了这一观点。

表 1 婚姻状况与月收入范围的卡方检验交叉分析表

题目	题项	您的月收入范围？（税后）（%）				总计	χ^2	p
		3000 元以下	3000~5000 元	5000~8000 元	8000 元以上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未婚	127(44.10)	60(20.83)	47(16.32)	54(18.75)	288	60.716	0.000**
	已婚	5(6.49)	18(23.38)	27(35.06)	27(35.06)	77		
	离异	0(0.00)	5(45.45)	3(27.27)	3(27.27)	11		
	丧偶	2(15.38)	1(7.69)	2(15.38)	8(61.54)	13		
总计		134(34.45)	84(21.59)	79(20.31)	92(23.65)	389		

注：*p<0.05，**p<0.01。

表 2 月收入水平对青年结婚意愿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OR 值	95% CI	p	效应方向
月收入范围	1.219	(1.025~1.449)	0.025*	正向显著

注：*p<0.05，**p<0.01。

2. 文化程度

个人的学历程度直接影响对伴侣收入水平及其家庭条件的接受程度。第一，个人的学历程度直接影响对伴侣收入水平的接受度，学历越高的个体，对伴侣的收入水平和家庭条件“极端不接受”的比例显著上升[3]。表 3 展示了不同学历群体对“您接受伴侣收入水平比您低吗？”这一问题的态度分布。可以看出，高中 / 中专及以下、大专学历的正面态度比例更高，无“完全不接受”者，显示出较强包容性。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正面态度比例下降，“完全不接受”比例显著上升。基于卡方检验结果，本研究明确证实学历与对伴侣收入水平的接受度存在显著关联（**p<0.01）。

第二，学历显著影响个体对伴侣家庭条件的接受度，学历越高的个体，对伴侣家庭条件“完全不接受”的比例显著上升，呈现“包容性下降”趋势。如表 4 所示，高中 / 中专及以下学历包容性最高，“完全接受”占比 34.78%，显著高于其他组。硕士及以上学历这一群体“完全不接受”比例为 13.64%。基于卡方检验结果，不同学历群体对伴侣家庭条件的接受度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p<0.01）。

（二）家庭层面

1. 家庭结构

本研究中的家庭结构是指贵阳市青年群体家庭兄弟姐妹数量情况，如表 5 所示。

2. 代际观念

“代际观念”是指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思想观念、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通常与成长环境、社会背景、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4]。贵阳市青年婚育决策深受原生家庭代际观念影响：父辈秉持“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强调“适龄婚育”；而青年更追求自我价值与婚姻质量，优先考虑事业稳定、经济独立与心理成熟。第一，二者在婚育时间维度、价值取向上形成明显冲突。父母强调“适龄婚育”的生物时间表，而青年更注重事业稳定与心理成熟度的社会时间表。比如访谈对象 A 谈道：“我父母他们觉得30岁不结婚就是人生失败，但我房子首付都还没凑够，哪敢想结婚。”访谈对象 B 谈道：“我父母他们觉得女孩子过了 25 岁就老了，再拖就嫁不出去、生不动了。但我现在规培压力大，每天都很累，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结婚生娃了。我觉得至少要等我经济独立了、工作稳定了，心理上也真正准备好承担家庭责任了，才考虑这些。”

第二，在育儿理念方面有冲突。祖辈经验育儿模式与青年科学育儿理念的碰撞，导致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生育意愿被削弱。受访者 C 谈到：“我看我爸妈他们带我哥的娃娃，娃娃发烧了，我妈就非要捂汗，我哥他们坚持送医院就被说没必要，搞得我妈和我哥他们夫妻俩关系也不好，这种育儿理念方面的摩擦比经济压力更让我不想生娃娃。”访谈对象 D 说：“我爸妈就喜欢拿自己嚼过的饭菜喂我小侄女，讲‘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带大你们的’，怎么让他们改都不听，觉得我们是穷讲究。这种潜在的冲突，比单纯的经济压力更让人望而却步，真的会消耗掉想生娃的那点热情。”

表 3 不同学历群体对伴侣收入水平接受态度的交叉分析表

题目	题项	您接受伴侣收入水平比您低吗？（%）					总计	χ^2	p
		完全接受	接受	一般	不接受	完全不接受			
您的最高学历是？	高中 / 中专及以下	8(34.78)	3(13.04)	9(39.13)	3(13.04)	0(0.00)	23	27.878	0.006**
	大专	9(25.71)	10(28.57)	9(25.71)	7(20.00)	0(0.00)	35		
	本科	26(11.76)	67(30.32)	77(34.84)	39(17.65)	12(5.43)	221		
	硕士及以上	13(11.82)	33(30.00)	41(37.27)	10(9.09)	13(11.82)	110		
总计		56(14.40)	113(29.05)	136(34.96)	59(15.17)	25(6.43)	389		

注：*p<0.05，**p<0.01。

表 4 不同学历群体对伴侣家庭条件接受态度的交叉分析表

题目	题项	您能接受伴侣家庭条件比您差吗？（%）					总计	χ^2	p
		完全接受	接受	一般	不接受	完全不接受			
您的最高学历是？	高中 / 中专及以下	8(34.78)	4(17.39)	5(21.74)	5(21.74)	1(4.35)	23	28.209	0.005**
	大专	7(20.00)	10(28.57)	10(28.57)	6(17.14)	2(5.71)	35		
	本科	24(10.86)	59(26.70)	93(42.08)	33(14.93)	12(5.43)	221		
	硕士及以上	12(10.91)	38(34.55)	35(31.82)	10(9.09)	15(13.64)	110		
总计		51(13.11)	111(28.53)	143(36.76)	54(13.88)	30(7.71)	389		

注：*p<0.05，**p<0.01。

表 5 理想结婚年龄与兄弟姐妹数量的交叉分析表

题目	题项	您有几个兄弟姐妹？（%）				总计	χ^2	p
		0 个	1～3 个	4～6 个	7 个及以上			
您理想的结婚年龄是？	20 岁及以下	0(0.00)	3(100.00)	0(0.00)	0(0.00)	3	59.783	0.000**
	21~25 岁	3(5.88)	42(82.35)	4(7.84)	2(3.92)	51		
	26~30 岁	27(19.15)	98(69.50)	15(10.64)	1(0.71)	141		
	31~35 岁	5(22.73)	13(59.09)	3(13.64)	1(4.55)	22		
	36~40 岁	0(0.00)	3(75.00)	0(0.00)	1(25.00)	4		
	41 岁及以上	1(33.33)	0(0.00)	0(0.00)	2(66.67)	3		
总计		36(16.07)	159(70.98)	22(9.82)	7(3.13)	224		

注：*p<0.05，**p<0.01。

部分青年因经济压力、工作忙碌、个人规划等，难以认同父母的传统期待。可见，家庭内部的代际观念碰撞，深刻形塑着当地青年的婚育选择。

（三）社会层面

1. 同辈群体

社会学领域所指的“同辈群体”，最早由戴维·博普诺（David Popenoe）提出并定义。该概念特指年龄相仿、社会层级相似的个体，在平等自主基础上形成的非建制化群体[5]。同辈群体作为价值观传导的核心载体，其影响力源于成员间社会背景的高度同质性。贵阳市青年群体中，当群体成员普遍面临相似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生命历程时，通过高频次交流形成的共同认知会加速群体内部的价值内化。

2. 社会传媒

社会媒体植根于现实文化并能进行观念创新，具备塑造性别模式、界定性别角色的能力，这一影响显著体现在贵阳青年的婚育观念中。一方面，电视综艺中明星夫妻的婚姻状态直接影响青年的婚育态度：婚姻幸福的明星夫妻会让青年向往美满婚姻与生育，而关系破裂的案例则会强化其不婚不育倾向。不少青年会将明星的亲密互动当作理想婚姻范本，进而产生对美好家庭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各种网络平台上大量“恐婚恐育”内容的传播，使贵阳青年对婚姻生育愈发谨慎。高频出现的婆媳矛盾、育儿压力、经济负担、个人生活被挤占等负面叙事，让他们将结婚生育视为高风险选择，担心陷入不可控的生活困境。

综上，社会媒体既是现实文化的镜像，也是观念的放大器，其建构的性别角色与婚育叙事，深刻影响着贵阳市青年群体的婚育认知与选择。

三、思考与建议

（一）建构主流价值传播模式

社会层面应该创新舆论引导范式，积极应对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恐婚”“恐育”情绪及对婚育价值的质疑。例如，联合省市主流媒体与头部社交平台的算法推送机制，共同策划并实施一些主题传播工程，针对研究中发现的网络“恐婚恐育”信息对青年产生的负面影响，系统运用微纪录片、创意短视频、数据可视化新闻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解构“污名化”叙事，提供多元视角，破除将婚姻、生育单一等同于“压力”“束缚”“牺牲”的负面刻板印象。

（二）推广家庭成长课堂

针对青年群体在组建家庭、养育子女过程中，普遍面临与原生家庭（尤其是父母辈）在观念、习惯、责任分担等方面产生摩擦的现实困境，建议在社区层面广泛推广“家庭成长课堂”。此类课堂不应仅仅聚焦于育儿技巧，更应着重于提升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技巧、冲突解决能力和协作意识[6]。课程内容可以设计为模块化，如“有效沟通的艺术”“代际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共同育儿责任的划分与执行”“家庭会议的召开技巧”等。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互动形式，引导青年及其伴侣，甚至愿意参与的祖辈，共同学习如何更顺畅地表达需求与感受、如何建设性地处理分歧、如何在家庭决策中达成共识等。

（三）强化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需将婚育相关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构建专项支持体系。在常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增设“亲密关系建设”“婚育压力应对”等单元，系统传授情感沟通、冲突解决及压力管理技巧[7]。设立专门的婚恋心理咨询窗口，为学生提供婚前焦虑、伴侣选择、生育规划等敏感话题的保密辅导，针对性解决“择偶谨慎”“恐育”等现实困惑。此外，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通过校园剧场、主题辩论等活动，解构“不婚不育等同于个性独立”等片面认知，倡导理性、健康的婚育观念，缓解学生因同辈群体普遍不婚而产生的从众性焦虑，增强其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

参考文献

[1] 宋健 . 现代社会青年婚育观的特点及形成机制 [J]. 团结 , 2025(03): 40-44.

[2] Oppenheimer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03), 563-591.

[3] 茹希佳 . 以新型婚育文化引导“婚育三观”[N]. 中国妇女报 , 2024-04-08(01).

[4] 杨林霞 , 张永康 . 高校未婚在校学生婚育观现状调查 [J]. 校园心理 , 2023, 21(03): 207-212.

[5] 郑航 . 当代青年人群的婚育观差异 [J]. 人口与健康 , 2022(09): 15-17.

[6] 彭训文 . 塑造积极健康美好的婚育观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09-05(05).

[7] 何双宝 , 苗艳艳 . 青年群体婚育意愿图景勾勒及因应策略 [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6):83-9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贵阳市社科联 2024 年度联合课题“贵阳市青年群体婚育观现状及教育引导策略研究”（筑社科研〔2024〕L48 号）。

（作者系贵阳康养职业大学讲师）

基于 MBAT 理论的正念引导在书法练习中的应用探究

倪安琪 秦　竹 黄万琳*

摘要：本文聚焦正念艺术治疗（MBAT）理论，深入剖析书法练习与正念融合的心理治疗实践路径。基于 MBAT 的核心理念、理论原理与操作范式，探讨将书法练习与 MBAT 融合应用的可行性。从二者的哲学基础、心理机制、干预路径等维度对其契合性进行剖析。以书法练习中的“调息、正身、展纸、援笔、掭笔、书写、冥想”等环节为切入点，将正念艺术治疗的正念冥想技术与表达艺术治疗原理融入其中，有望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为个体提供一种兼具文化底蕴与心理治疗功能的干预方式。旨在为书法心理治疗提供更多理论支撑，也为正念技术的本土化发展开辟新路径。

关键词：正念艺术治疗；书法；心身调节

在现代社会高压力环境下，心理健康维护已成为重要公共卫生议题。基于正念的艺术治疗（Mindfulness-Based Art Therapy，MBAT）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方法，融合了正念训练与艺术治疗的优势，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书法作为兼具文化内涵与心身调节功能的艺术形式，与 MBAT 在核心理念、作用机制上存在天然契合点：二者均强调“专注当下”的非评判性觉察，注重通过身体动作与艺术创作实现心理调节，且在哲学根基上共享东方文化的整体性思维。将 MBAT 的理论框架引入书法正念研究，以书法作为正念练习的有效载体，应用正念原理，耦合书法练习中触觉、动觉、嗅觉、认知、视觉等多方面的感知觉系统，促成练习者达到书法所倡导的“凝神静虚、心正气和、心无杂念、专心致志、忘却烦恼”境界[1]。不仅能丰富书法心理治疗的科学内涵，也为正念技术的本土化提供了文化适配性路径。本文将系统阐述 MBAT 与书法正念的整合逻辑，构建融合二者优势的操作流程，并探讨其在心理治疗与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前景。

一、正念艺术治疗的概念与发展

“正念”一词起源于东方的佛教文化，包含意识、注意和记忆三层含义。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于 1979 年创立了正念减压课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标志着正念从传统宗教修行向现代心理干预技术的转变。此后，正念在心理治疗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与研究，衍生出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等多种基于正念的干预方法。2009 年，心理学家劳里·拉帕波特（Laury Rappaport）正式提出了正念艺术治疗（MBAT）。其核心是通过正念练习如身体扫描、呼吸冥想等培养对当下的觉察力，同时借助艺术创作如绘画、雕塑等实现非语言情感表达，促进自我接纳与压力调节。MBAT 的理论根基源于自我调节理论，强调通过艺术外化内在经验，整合主客观感受以提升心理韧性[2]。

MBAT 在国内外不同领域均有应用。Monti 等对 111 名癌症女性的研究表明，8 周 MBAT 干预能显著减少心理痛苦并提高社会功能与生活品质[3-4]。国内有关 MBAT 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赵姣等研究表明，绘画心理干预联合正念训练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心理韧性，减轻负性情绪及病耻感并提升生活质量[5]。郝婷研究发现，正念艺术疗法能够降低乳腺癌化疗患者的知觉压力水平，积极调控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有效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6]。

二、书法练习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应用

东汉书法家蔡邕在其《笔论》中记载：“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所谓“随意所适”即一种“无意”的意识状态，并将“凝神静思、意在笔先”，形成一种自在自然的精神状态。书法练习过程中，练习者聚精会神，注意力高度集中，引发“虚静态”的产生，能使精神紧张状态得到缓解，大脑皮质被激活，从而达到“虚静”的效果[7]。这样的状态能有效调节心率、呼吸、血压，降低焦虑水平。

关于书法练习的心理调节机制，学界主流解释源自香港大学高尚仁构建的汉字书写心理几何学理论。该理

论指出，汉字构字规律中的封闭性、对称性及层级化特征，结合毛笔书写形成的三维空间轨迹，构成了动态变化的运笔系统。《书法心理治疗》一书中认为书法练习有健心功能，主要与汉字的结构特点和毛笔的使用方法有关。高尚仁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书法练习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的机制和原理，实验发现，持续练习书法者表现为全身肌肉放松，血压、心率变缓，呼吸节奏感增强，说明书法练习可以有效使书写者的生理状态得到轻松，而放松状态又较有利于书写者认知活动展开及情绪调节[8]。罗正学等将毛笔书法练习和硬笔书法练习进行了对比研究，观察二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只有毛笔书法练习组别的SCL-90分数下降显著，与高尚仁的观点相符合[9]。近年来，国内较多研究证明，书法练习有促进情绪调节的作用。

三、正念与书法练习结合可行性分析

（一）哲学观上的深层契合

书法练习与MBAT理论在核心理念与实践逻辑上存在深度契合，为二者的整合提供了坚实基础。从哲学的核心思想来看，书法艺术秉持的“天人合一”理念与MBAT强调的“当下觉知”高度共鸣。书法练习时，练习者需凝神静气，将自我融入笔墨纸砚的交融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一脉相承，而这种对当下身体感觉与创作过程的专注，恰与MBAT中通过正念练习锚定当下、觉察身心体验的核心机制一致。

（二）实践原则上本同末离

书法讲究的“中庸之道”与MBAT倡导的“非评判态度”形成呼应。《书谱》云“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强调书法创作需依情感状态调整风格节奏，追求“心手相应”的自然表达，这与MBAT中鼓励个体不加评判地接纳自身情绪与体验的理念相契合。正如MBAT通过各类艺术形式促进情绪的自由流露，书法也通过笔墨的变化，让练习者在创作中实现对情绪的觉察与接纳。

（三）精神旨归同向同行

从境界追求而言，书法艺术的“空灵”意境与MBAT的“无我觉察”具有共通的精神指向。清代书家邓石如提出“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通过留白与虚实对比展现超越形式的深层意境，这种对“自我”的超越与MBAT中“无我觉察”强调的跳出自我中心、以超然视角观照身心现象的状态相呼应。二者均引导个体摆脱主观认知偏差与情绪执念，在书法创作的“心手合一”与正念觉察的“当下观照”中，探索更本质的身心整合联结。这一逻辑恰与MBAT的核心目标一致，即通过艺术创作的表达性与正念练习的觉察性，促进个体与自我、个体与环境的关系重构，最终实现身心和谐。

（四）共同心理学理论支撑

从具身认知理论视角出发，书法通过笔尖压力、墨色变化、纸张纹理反馈等多感官体验，突破传统正念“离身观察”的局限，以“动作—感知”循环激活认知资源，降低注意力耗散，消解疲劳和枯燥，这与MBAT多模态艺术形式的身心调节逻辑相通；在情感链接方面，二者均可借象征表达实现心理转化，书法依托汉字象形性和表意性，绕过语言防御，促进潜意识内容意识化，与MBAT通过艺术符号外化情绪的机制呼应。

（五）心理治疗作用共通性

正念与书法在心理治疗中存在共通性，二者均能通过专注实现情绪调节与压力缓解[10]。书法创作时专注于笔画流转、笔墨接触等过程，与正念强调的当下觉察一致，可转移对负面情绪的关注；正念则通过培养情绪觉察与接纳减少波动，二者均以专注与觉察实现情绪主动调节。同时，二者均注重提升专注力与认知功能，书法对笔锋、章法的全神贯注可增强注意力控制，正念通过呼吸等锚点训练注意力的稳定与灵活，且都借助觉察与表达促进个体内在整合。

四、正念融入书法练习的实施框架

将正念的理念思路与书法练习相结合，形成新的练习模式。充分挖掘书法练习中调息、正身、展纸、援笔、掭笔、书写、冥想等环节中的正念元素，耦合触觉、嗅觉、动觉、视觉，提高自我觉察和自我调节能力。通过书写象形文字，利用冥想激活个体的象思维，促成“心流”状态。参考MBAT的八周干预结构，结合书法练习特性，设计八阶段递进式干预流程，每阶段包含正念训练与主题书写任务.

第一周：建立身心基础联结，感受正念与书法融合。

①正念练习：调息——正念呼吸，闭眼深呼吸，感受气息在鼻腔、胸腔的流动；身体扫描，从头顶到足底，觉察身体各部位状态；

②艺术创作：介绍笔墨纸砚，了解书法文化。正身——身心合一，规范坐姿，静坐澄心息虑，调整至舒适专注状态。

第二周：培养对自身状态的接纳态度，降低情绪对抗。

①正念练习：触觉觉察练习，轻触纸张纹理，感受质地；专注于手部触摸纸张的触觉体验；

②艺术创作：介绍中国造纸文化。展纸——器道相合，缓慢展开纸张，轻柔抚平褶皱，体会接纳不完美的过程。

第三周：强化专注控制能力，提升注意力稳定性。

①正念练习：握笔压力觉察，感受笔杆触感，调整抓握力度至舒适且能稳定控笔；

②艺术创作：介绍毛笔及中国制笔文化。援笔——

握管凝神，书写简单笔画，觉察握笔力度变化对笔画的影响。

第四周：促进情绪外化表达，释放压力。

①正念练习：嗅觉—视觉整合，轻蘸墨汁，嗅墨香，专注蘸墨动作，体会墨汁吸附毛笔的过程；

②艺术创作：捺笔——墨香感知，在纸上轻试墨色浓淡，感受墨香与蘸墨动作带来的感受。

第五周：实现心手深度协同，转化心理体验。

①正念练习：动作—呼吸协调，书写时配合呼吸，笔锋移动与呼吸节奏契合；

②艺术创作：书写——象形文字意象书写（山、水、云等），书写象形文字，感受文字形态与意象。

第六周：深化对情绪与创作关联的认知，优化心理状态。

①正念练习：作品观察反思，静坐赏析作品，观察笔画、墨色变化；

②艺术创作：冥想——气敛神藏，联想创作时情绪，分析情绪对书写呈现的影响。

第七周：综合运用技巧，强化心理调节惯性。

①正念练习：多技术融合（呼吸、触觉、动作协调等），书写中全程保持正念觉察；

②艺术创作：主题创作 ——选定相关主题，运用之前技巧进行自由创作。

第八周：回顾总结成果，实现心理成长沉淀。

以“正念书写”阶段为例，可融入 MBAT“正念觉察与艺术表达整合”框架下的基于具身感知的意象联结路径：书写“水”字时，冥想唤起水的具身意象记忆，如水流清凉、水面波光或潺潺水声等，书写时引导参与者感受笔尖带着水的灵动与柔和，感受水流悠然，感受滋养万物的生命之力。完成从“意象觉知”到“动作表达”的转化。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书法通过线条符号传递意象的艺术特性，又融入了 MBAT 以“感官专注锚定当下、艺术表达承载觉察”的核心技术逻辑，而非依赖独立的意象引导技术模块。

MBAT 的小组干预模式为书法正念团体实践提供了参考范式。实践中可采用 8~12 人小组，每周一次，每次 90 分钟，持续 8 周。单次活动由四部分构成：15 分钟正念练习、30 分钟主题艺术书写、25 分钟团体分享、20 分钟整合冥想。特别引入 MBAT 中的“过程导向”原则，强调书写体验而非作品结果，例如在分享环节引导参与者描述“脑海中水流的样子”“运笔时对笔的掌控感”而非“字写得是否规范漂亮”。

五、结语

汉字书法蕴含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支撑和最易被中国人接受的艺术形式之一，可以说书法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的治疗，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治疗。从 MBAT 的理论视角看，书写过程可引领练习者进入专注而放松的状态，这与 MBAT 通过正念练习锚定当下，利用非语言表达促进自我接纳的核心机制高度契合。书法与 MBAT 的深度交融，为正念治疗开辟了全新的维度。对书法在临床心理干预、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进行探索，有助于构建更具文化温度的心理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

[1] 沈文中 . 生活与艺术 [M].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06: 4.

[2] Rappaport L. FOCUSING-oriented art therapy: Accessing the body's wisdom and creative intelligence[M].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2008.

[3] Monti D A, Kash K M, Kunkel E J, et al. Changes in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anxiety associated with an 8-week mindfulness programme i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J]. Stress and health: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Stress, 2012, 28(05): 397-407.

[4] Monti D A, Peterson C, Kunkel E J, et al. A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mindfulness-based art therapy (MBAT) for women with cancer[J]. Psycho-oncology, 2006, 15(05): 363-373.

[5] 赵姣 , 张艳丽 , 秦丽 . 绘画心理干预联合正念训练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韧性及精神症状的影响 [J]. 心理月刊 , 2024, 19(13): 121-123.

[6] 郝婷 . 正念艺术疗法对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知觉压力的干预研究 [D]. 太原 : 山西医科大学 , 2022.

[7] 高健 , 王欣 , 桥本公雄 , 等 . 书法绘画练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2010, 18(03): 291-294.

[8] 高尚仁 . 书法心理治疗 [M]. 香港 : 香港大学出版社 , 2000: 73, 211, 291.

[9] 罗正学 , 苗丹民 . 军校大学生书法训练的情绪效应初步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2000, 14(04): 256-257.

[10] 张川凡子 . 书法团体心理辅导对高年级小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研究 [D]. 南昌 : 南昌大学 , 202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项）“中医传统文化融入心理健康课程路径研究”（2024gxxl015）；2025 年度云南省社科联—云南中医药大学联合专项“基于‘形神共养’的中医文化浸润式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LHZX202510）。

（作者：倪安琪，云南中医药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中心主任、讲师；秦竹，云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通信作者黄万琳，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讲师）

以托管托育服务赋能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陕煤集团工会托管托育服务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陈芳君

摘要：在人口结构转型与育儿需求升级的双重驱动下，托管托育服务已成为维系职工队伍稳定、提升企业凝聚力的核心抓手。陕煤集团工会服务职工超 13 万人，其中 40 岁以下育龄职工占比达 62.77%，加之行业覆盖广、地域跨度大、异地职工集中等特点，职工子女“看护难、假期带娃难”问题尤为突出。自 2018 年起，陕煤集团工会依托陕西省总工会政策支持，创新构建“示范 + 覆盖”“专业 + 安全”“普惠 + 多元”三维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解决 8.6 万余名育龄职工的育儿困扰。本文结合该集团最新实践，系统解析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实施成效与优化方向，为企业完善职工福利保障、实现劳资共生共赢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托管托育服务；职工福利；工会服务体系

当前，育儿成本攀升与托育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职工托育需求满足度直接影响其在企业的归属感。陕煤集团工会秉持“小空间托稳职工心，办实事做好娘家人”的服务理念，将托管托育服务纳入“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创建幸福陕煤”十大措施，依托女职工“三六三”工作法，构建起全方位的托育服务体系。通过建设母婴关爱室、开办特色托管班、联合“名校 +”打造社区托育中心等举措，累计建成 13 个母婴关爱室（含 2 个全国示范点）、14 家托管托育机构（含 1 个全国示范点，省级示范点 6 个），提供托位 2648 个，形成全日制、暑期、临时托管等多样化服务形态，以 99.8% 的职工满意度获评全省首批需求型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单位，树立了工会服务职工的标杆品牌。

一、陕煤集团托管托育服务体系构建路径

陕煤集团工会立足企业自身的独特特点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以“示范引领、全面覆盖、专业保障、普惠多元”为核心发展理念，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托管托育服务体系，其关键构建路径如下：

（一）“示范 + 覆盖”：织密托管托育服务网络

以示范点建设为重要牵引，实现从“点上突破”到“面上覆盖”的全面拓展，是陕煤托育服务体系得以扎实推进的基础支撑。

1. 标杆引领打造示范阵地

陕煤集团工会始终坚持“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高水平管理”的核心原则，重点培育高品质的托管托育示范项目，力求形成“创建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良好示范效应。神南产业公司“勤小小”托管班凭借完善的管理体系、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以及优质高效的服务质量，成功荣获“全国托管托育示范单位”称号。陕化公司“太阳花”爱心托管班、曹家滩矿业“青青草堂”暑期托管班、小保当矿业“小宝当家”暑期托管班等 9 个项目也成功获评省级示范点。这些示范单位在场地规划、课程设计、安全管理、师资建设等多个方面积累的成熟经验，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在全集团范围内进行推广，有效提升了集团托育服务的整体水平 [1]。

2. 按需布局扩大服务覆盖面

针对企业地域跨度大、职工分布分散、工作地点多偏远的实际情况，陕煤集团工会坚持“需建尽建”的基本原则，灵活运用“社区托育中心 + 基层托管班 + 移动服务点”的多元化布局模式，在职工集中的矿区、生活区以及社区核心区域，建设标准化的社区托育中心。例如陕煤实业集团西交小雅托育中心以“办公楼、小区、社区”为半径，精心打造“15 分钟托育服务圈”，切实解决了周边职工子女的日常托育需求；在基层单位设立具有特色的托管班，如府谷能源新元公司在职工活动中心内专门开设爱心托管班，方便职工上下班接送子女；针对偏远矿区的职工，通过“妈妈阅读”两小时托管服务等移动服务形式，精准对接其托育需求。

3. 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集团工会针对不同职工群体的特殊性，量身定制提供个性化的托育服务，让每一位职工都能真切感受到工会的关怀与温暖。一是聚焦异地职工群体，针对陕煤“北移”战略带来的异地职工集中这一突出问题，专门开设暑期托管班，有效解决异地职工子女假期团

聚看护的难题。例如，小保当矿业“小宝当家”暑期托管班每年暑期都会为来矿团聚的职工子女提供全方位的托管服务，累计服务700余人次；曹家滩矿业“青青草堂”暑期托管班通过“托、管、教、养”一体化的优质模式，成为异地职工安心工作的“定心丸”。二是重点关注双职工家庭，府谷能源新元公司全日制托管班实行科学合理的分班教学，让双职工家长无需为子女的日常看护问题担忧。三是特别关爱偏远矿区职工，彬长矿业公司在矿区内开设了7个暑期托管班，充分利用职工书屋、文体中心等现有场地资源，为偏远矿区职工子女提供便捷高效的托育服务，让职工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

（二）“专业＋安全”：筑牢服务核心保障

将专业性与安全性作为托育服务的核心生命线，从师资队伍、硬件设施、管理制度三个关键方面构建闭环式保障体系，让职工能够“托得放心、送得安心”。

1. 组建专业师资队伍

陕煤集团工会采用“专业聘请＋内部挖掘＋合作共建”的多元化师资组建模式，着力打造一支兼具专业素养与强烈责任心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一是专业聘请持证幼教人员，承担核心的教学与照护任务，从根本上保障服务的专业性。二是广泛吸纳企业内部具有文艺、体育、教育等各类特长的职工、教师家属以及志愿者参与到托育服务当中。例如，彬长矿业“彬”纷夏日成“长”托管班专门邀请从事教育工作的家属、有文艺特长的职工担任授课老师，小保当“小宝当家”托管班有7名看护老师由企业内部的特长职工及职工家属担任。三是通过合作共建汇聚优质师资，与西交康桥教育集团等专业教育机构携手合作，充分整合专业教育资源，为集团旗下的托育机构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持与专业的培训指导[2]。

2. 完善硬件设施配置

陕煤集团工会在托育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功能适配、舒适温馨”的核心原则，全力为幼儿打造优质的成长环境。一是保障场地的安全与充足，托育机构均选址在安全隐患低、交通便利的核心区域，如府谷能源新元公司爱心托管班位于职工活动中心一层，室内面积达到43平方米；小保当“小宝当家”托管班充分共享矿区资源，其中游泳池约1050平方米、乒乓球馆约100平方米。二是科学完善功能区域划分，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与活动需求，合理设置学习区、娱乐区、休息区、运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实业集团合阳县西交幼儿园则配备了活动室、舞蹈室、阅览室、感统训练室等功能齐全的区域。三是全面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所有托育场所均配备实时监控、空调、消防设施等基础设备；室内装修全部采用环保材料，家具边角均进行圆角处理，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部分托管班创新设置爱心“接送卡”，实行严格规范的接送管理制度，确保每一位幼儿的安全。

3. 健全规范管理制度

集团工会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化的管理制度，构建起全流程、精细化的管理体系。一是制定专项管理方案，针对不同类型的托育服务，专门出台《暑期托管班方案》《健康防护方案》《托管班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文件，明确服务流程、安全规范、岗位职责等核心内容。二是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机制，与家长签订托管协议、安全承诺书、健康情况调查承诺书等相关文件，为每位幼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建立“体温监测、场所消毒、家长群沟通”全流程管控机制，每天认真做好幼儿健康监测与场所清洁消毒工作。三是创新精细化管理举措，部分托管班推出“家属七步法”“伙监会”“儿童安全健康卡”等独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将安全管理与服务质量管控切实落到每一个细节；每个托管班都建立专门的家长微信群，实现幼儿考勤、接送情况、学习表现等信息的实时共享，形成高效协同的“企业—家长”协同管理机制[3]。

（三）“普惠＋多元”：提升服务供给质量

坚持普惠性导向与多元化供给相结合的发展思路，既有效减轻职工的经济负担，又充分满足职工差异化的育儿需求，彰显企业福利的人文温度。

1. 经费保障减少职工压力

为切实降低职工的育儿成本，集团工会建立了“工会经费＋行政拨款＋社会资源”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大幅减少职工在托育服务方面的支出。托育服务的硬件设施购置、师资薪酬发放、教材教具采购等主要费用，均由工会经费与行政拨款承担，职工仅需支付少量的餐费即可免费享受相关服务。例如，府谷能源新元公司全日制托管班的职工每月仅需承担300元餐费，暑期特色兴趣班免费为职工子女提供课程与学习用品；彬长矿业工会投入16.5万元为托管班采购学习用具、桌椅等物资；小保当“小宝当家”托管班每年投入经费约40万元，主要来源于工会经费（占比80%）和行政经费；神南产业“勤小小”托管班为职工子女免费提供T恤衫、遮阳帽、教学和学习用品等。这种多元化的经费保障机制，让托育服务真正惠及广大职工，充分体现了企业对职工的深切关怀[4]。

2. 多元课程丰富服务内容

陕煤集团工会支持“托管服务＋兴趣培养＋品格塑造”的复合型课程模式，为幼儿提供全面发展的成长空间。一是夯实基础托管服务，涵盖作业辅导、生活照料、安全看护等核心内容，切实解决职工最基本的托育需求。二是丰富兴趣培养课程，开设美术、舞蹈、书法、口才、体育、英语、手工、烘焙、应急自救等特色项目，充分满足幼儿差异化的兴趣需求，如陕北矿业“星宝宝”托管班的多元课程体系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彬长矿业托管班开设羽毛球、篮球、手工等特色课程。三是融入品格塑造与文化浸润，将

红色教育、企业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陕化“太阳花”托管班每周开设红色传承、文化讲堂等社会实践活动，小保当“小宝当家”托管班组织幼儿参观智能化矿区、开展亲子游戏等活动，合阳县西交幼儿园秉承“六艺”和“爱慧美”教育理念，着力培养幼儿诚实正直的品格与综合素养。

3. 创新服务拓展内涵边界

集团工会突破传统托管服务的局限，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拓展服务内涵，积极构建“企业—家庭—儿童”三方良性互动的生态体系。一是创新服务时段，推出全日制、半日托、小时托、临时托、周末托、寒暑假探亲托等多样化的服务形态，精准适配不同职工的时间需求。二是丰富服务场景，精心组织开展户外课堂、夏令营、亲子活动等特色活动，曹家滩“青青草堂”托管班专门建设室外“亲子乐园”，定期开展亲子游戏。三是搭建互动平台，成立家长社团、伙监会等组织，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托育服务的管理与活动策划，如府谷能源新元公司托管班成立伙监会，切实保障幼儿的饮食安全；通过亲子游戏、家长开放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增进亲子感情，提升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5]。

二、陕煤集团托管托育服务实施成效

（一）显著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托育服务体系直接破解了职工最关切的育儿难题，使 8.6 万余名育龄职工得以解除后顾之忧。全日制托管有效解决了职工子女的日常看护困扰，暑期托管为异地职工子女团聚提供了有力保障，职工满意度高达 99.8%。职工的归属感与幸福指数得到显著提升，充分体现了“幸福陕煤”的发展理念。

（二）有效赋能企业人才稳定

优质的托育服务已成为陕煤集团吸引与留存人才的重要核心竞争力。通过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的核心诉求，企业成功营造了“以人为本”的良好用工环境，有效降低了人才流失率。稳定的职工队伍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实现了“职工小家幸福”与“企业大家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成功打造工会服务品牌

陕煤集团工会将托管托育服务打造成了服务职工的“民心工程”，府谷能源新元公司《将托管服务办到职工“心坎上”》一文荣登《中国妇女报》头版头条，多个托管托育班成功获评国家、省级示范点。其“示范 + 覆盖”“专业 + 安全”“普惠 + 多元”的独特服务模式，为点多面广、战线长的企业开展托管托育服务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树立了行业内的标杆。

三、陕煤集团托管托育服务优化方向

（一）深化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

针对部分托班课程专业性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通过与专业幼教机构深度合作，开展系统全面的培训，不断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水平；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加入托育服务队伍，同时积极搭建跨机构的师资交流平台，促进各托育机构之间的经验共享与服务均质化发展。

（二）完善服务衔接与资源整合

加强与地方教育系统的紧密衔接，积极开通适龄儿童入学“绿色直通车”，为职工子女的升学提供便利；进一步整合集团内部的各类资源，推动西交幼教集团扩大管理覆盖范围，实现托育服务的集团化、标准化运营；积极联动政府相关部门，争取更多的育儿补贴政策支持，不断提升服务的普惠性。

（三）拓展服务内涵与形式

针对职工多样化的托育需求，适时增设夜间托、应急托等特色服务项目；在课程体系中进一步融入红色教育、科学启蒙等丰富内容，更好地适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展需求；积极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育儿知识咨询、线上沟通等延伸服务，不断提升服务的便捷性与高效性。

托管托育服务绝非简单的职工福利补充，而是企业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战略举措。其“示范引领与全面覆盖并重、专业规范与安全保障同步、普惠利民与多元供给协同”的发展原则，为企业托育服务建设提供了核心遵循。未来，随着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陕煤集团将进一步实现职工幸福感与企业凝聚力的双向提升。

参考文献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 . 工会托育服务工作指南与实践案例 [M].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2023.

[2] 中华全国总工会 . 全国工会重点工作创新案例 (2024 年第 1−2 期)[M].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2024.

[3]“西部农村儿童养育项目”编写组 . 婴幼儿早期教育亲子游戏活动手册 [M].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 2025.

[4] 吴静 , 井军 , 颜薇 , 等 . 陕煤集团 : 工会暖心托管 护航多彩假期 [EB/OL]. (2025−08−29)[2026−01−27]. https://www.shccig.com/index/Article/index.html?id=1425832&cid=189.

[5] 段晓璇 .“国考”背景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心理学”教学的新思路 [J].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1, 37(03): 85−86.

（作者单位：陕西煤业化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新大纲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及“双能力”培育对策

陈兰兰

摘要：《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的修订是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以政治引领、服务导向、能力为本、阶梯式递进为核心导向，对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提出全新要求。本文从底层能力视角，系统辨析底层能力与专业核心能力的区别与关联，分析新大纲核心变化及其与国家标准、培养方案的内在差异，探究其对教学与人才培养的双重影响，聚焦核心挑战与具体问题，借鉴多元协同理念，融入新型教学手段，从教学改革、实践强化、师资建设、协同育人维度构建应对机制，为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人才培养；底层能力

一、引言

2025 年 12 月新修订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立足党的相关会议精神，全面优化考试内容与考核导向，突出政治引领、文化自信、实践导向和能力本位，在专业方法表述、实务模式设置等核心内容上做出针对性调整，深度贴合本土实务需求。新大纲对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非常关键，社会工作专业教学需与其精准对接，才能实现“教、学、考、用”有机统一。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明确要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具备“社会服务、社会治理、政策分析能力”[1]，这是专业人才立足行业的核心能力支撑。而专业核心能力的底层，还包含更为本质、基础的 能力，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可迁移的能力，笔者称之为专业的“底层能力”。其区别于具体岗位技能，能跨越行业边界、适配多元场景，是核心能力落地、转化、升级的重要基础，它与核心能力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

当前，专业国标、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与新大纲有明显差异，存在核心能力培养与新大纲适应不足、底层能力培育缺失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大了人才培养与新大纲衔接的难度。孙唐水（2024）在 OBE 理念下探讨社工人才培养侧重能力产出[2]，叶词润等（2023）关注应用型高校的课程重构[3]，共同为双能力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撑。AI 技术、虚拟仿真等新型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双能力协同培养提供了新支撑。因此，系统辨析底层能力与核心能力的关系，探究新大纲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构建科学有效的应对机制，对推动专业教育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新大纲的核心修订内容及多重差异对比

新大纲的修订及核心变化与国标及高校现行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以下简称“培养方案”）存在多重差异，对应阐释如下：

第一，强化政治引领，明确价值导向。新大纲首次将政治引领置于核心位置，明确六大服务基本原则，新增政治理论专章，将党的相关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等纳入考核，契合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中“坚持党的领导、服务社会发展”的核心要义[4]。而国标未明确政治理论的考核权重，培养方案多将其融入伦理课程，缺乏专项模块，与新大纲的精准要求存在差距。

第二，突出文化自信，夯实专业根基。新大纲新增专节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作用，引导从业者从传统文化基因中汲取养分，推动专业向本土化、中国化发展。国标虽提及要与本土实践结合，但未突出文化自信的核心地位；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中对传统文化与专业融合的内容覆盖不足，难以适配新大纲的导向。

第三，聚焦实践导向，细化能力考核。新大纲将“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名称修订为“个案（小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方法”，突出“服务”核心；删除西方社区实务模式，替换为邻里互助等本土模式；充实人民信访、新就业群体服务等基层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构建“理论—实践”一体化考核闭环，体现了“职业资格考试强化实务导向，倒逼高校提升实践教学质量”的改革逻辑[5]。国标要求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培养方案虽保障 800 小时实习，但实践内

容与新大纲本土实务场景的适配性不足，新兴领域覆盖滞后。

第四，完善阶梯体系，适配人才层级。新大纲依据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定位，设计了“夯实基础—深化能力—实践引领”的阶梯式考核体系，为分层分类培养提供依据。国标明确基础达标要求，不区分层级；培养方案虽细化能力指标，但“统一化”导向明显，缺乏适配不同职业层级的针对性课程模块。

三、底层能力与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的区别及关联

（一）两种能力的区别

核心能力是直接服务于专业实践的“显性能力”，本质上属于“岗位技能”——能独立开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调查与评估、项目设计与管理。它具有鲜明的专业性、场景特定性、可操作性，也可概括为社会问题分析与理解能力、社会工作实务能力、社会服务管理能力等，是学生快速胜任社会工作岗位的直接保障，也是新大纲重点考核的核心，但这类技能存在行业局限性，难以直接迁移到其他领域。

底层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可迁移根基”，是扎根于核心能力之下的“隐性能力”，具有可迁移性、适配性、成长性三大特征。其具体内涵可通过核心能力的本质拆解明晰，如个案评估中的信息整合、风险识别、结构分析能力，矛盾调解中的冲突拆解、情绪管理、博弈判断能力，社区项目中的资源配置、利益平衡、风险承担能力。这些能力贯穿专业实践全过程，能应对各类“复杂系统”，是从业者长远职业发展的核心资本。

（二）两种能力的关联

两种能力之间存在相互支撑的内在联系。底层能力是核心能力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专业能力的实际应用和提升，离不开沟通协调、资源整合、信息筛选、逻辑分析等底层能力的支撑。如果底层能力培育不足，核心能力的运用就容易流于机械化，难以应对新大纲对复杂实务问题解决提出的更高要求。反过来说，核心能力也为底层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底层能力需要通过专业核心能力的具体实践场景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持续的锻炼。

四、新大纲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及专业教学的启示

新大纲以政治引领、能力本位、本土实务为核心的修订导向，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专业教学指引了教考衔接的核心方向，其启示体现在三大维度。

第一，人才培养目标需锚定核心能力与底层能力二维共生。如新大纲社区章节中的四个本土化服务模式，这就要求学校教学中，既要求学生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培育其可迁移的底层能力，以契合职业资格考试阶梯化考核与行业长远发展的双重需求。

第二，教学内容需实现本土适配与考纲对标。新教材补充了适配本土社工实务的人民信访、新就业群体服务等考点内容，将政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这就要求高校在教学内容上要精准对接行业新发展及考纲新变化。

第三，教学模式需突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瓶颈。高校要改革重理论轻实操的教学方式，突出实践占比，推动案例教学、场景模拟教学的常态化，让学生在实操训练中实现“学、练、考”一体化衔接。

同时，新大纲初、中、高级阶梯式考核体系要求教学工作中针对学生不同的能力和水平，设置差异化的教学模块，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可拓展学习高阶内容，真正实现以考促教、以教助学。

五、对接新大纲的应对机制：双能力协同培育路径

（一）重构课程教学体系，实现双能力培养与考纲考点深度融合

课程体系重构是双能力培育的核心载体，以新大纲考核要求为标尺，促使教学内容与考试考点衔接。一方面，增设与考纲适配的课程模块，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融入“社会工作伦理”课程，将政治理论等内容融入“社会工作导论”课程，补充新就业群体服务、基层信访介入等内容作为专业选修课。另一方面，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底层能力培养要素，如在“社会工作行政”课程中强化资源配置、利益平衡能力锻炼，将底层能力培养拆解为具体教学目标。同时，针对初、中、高级考试的能力要求，设计阶梯式课程内容，初阶侧重考点基础与通用底层能力，中高阶侧重考点综合分析、运用与输出能力，让课程教学与考试培训形成合力。

（二）升级实践教学模式，依托本土实务场景夯实“双能力”应用能力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对实务操作的考核占比持续提升，高校需要持续优化实践教学模式。首先，筛选与新大纲相关考点匹配的社区、社工站、社会组织等作为融合实践基地，在实习环节明确双能力考核标准。其次，推行与考纲导向匹配的项目式教学模块，学生全程参与需求评估、方案设计、实施落地、效果评估，既锻炼了核心实务能力，又培养了问题分析、沟通协调等底层能力。最后，建立实习督导与考试辅导联动机制，校外实务导师侧重本土实务操作指导，校内教师同步对接考纲要求，分析实践内容对应的考试考点与能力要求，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考点、在训练中掌握能力，实现实践教学与考试培训的双向赋能。

（三）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建立“双能力＋考纲达标”的评价体系

评价内容上，核心能力考核引入考试真题、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测评；底层能力侧重可迁移能力的综合运用，以项目完成质量、实务场景问题解决效果为测评依据；考纲达标则以各层级考试的考点掌握程度

为核心评价指标。评价方式上，融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价贯穿课堂教学、实训实践全过程，记录学生双能力的提升过程；终结性评价以新大纲考试题型为蓝本，通过模拟考试、实务实操考核等方式，检验学生双能力培育与考纲考点的对接效果。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建立教学与培训调整机制，针对学生双能力培养的短板与考纲考点的薄弱环节，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实践安排与考试培训重点，形成“教学—实践—评价—改进”的教考闭环。

（四）加强师资建设，提升“双能力”协同培育能力

加强教师培训，开展覆盖新大纲解读、本土实务技能及底层能力培养的系统专题培训，建立教师一线实务锻炼机制，推动教师深入一线积累本土实践经验，同时开展AI技术、虚拟仿真等新型教学手段专项培训，提升教师技术赋能教学的能力；优化师资结构，引进实务型教师壮大实践教学队伍，制定校内教师转型激励政策，引导其成长为兼具理论教学能力、实务操作能力与“双能力”培育能力的复合型教师；搭建教学交流平台，组织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及行业机构开展常态化教学研讨，分享双能力培养经验、本土实务案例及教改成果，鼓励教师参与校外专业教学研讨会，将优质教学资源与先进理念融入课堂，助力教学水平与育人能力提升。

（五）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提供“双能力”培育保障

第一，构建学校、政府、行业、社会多方配合的协同育人体系。学校和行业机构、政府部门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计划的制定，让各方在育人理念上达成一致。行业机构为学校提供实际业务案例、实习岗位、兼职教师等资源，并参与学生双能力的评价工作；高校为行业输送合适人才、提供专业服务和科研支撑，依托虚拟教研室联合搭建双能力培育平台，逐步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成果共创”的协同育人格局[6]。

第二，从政策层面强化支撑。多方申请课程建设相关资金，加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和新型教学平台搭建。推动地方政府出台职业资格考试激励政策，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

第三，引导学生主动提升。强化学生职业规划指导，帮助学生明白“双能力”对职业发展的长期价值，建立“能力本位”的学习观念。结合自身职业定位，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和能力评估，制定个性化提升计划。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关注行业动态与新大纲的调整方向。

六、结论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新大纲的实施，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向“本土实务导向、双能力协同”的方向转变。核心能力与底层能力的协同培养，是应对新课程挑战、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面对新大纲的要求和现有培养的不足，高校需要立足于教考衔接，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校政行社+跨领域”协同育人机制，培养“政治强、专业精、实务优、能力活”的复合型人才，促进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发展的质量提升。

展望未来，双能力培养体系需要持续优化。高校应关注新大纲的动态和行业需求，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师需要提高“双能力”培养能力，学生应树立主动学习和能力评估意识；政府、行业机构等多方需要加强协同，为“双能力”培养提供支撑，共同推动社会工作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S].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18.

[2] 孙唐水 . 新文科背景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对策研究——基于 OBE 理念视角 [J]. 公关世界 , 2023(04): 55−57.

[3] 叶词润 , 成潇 , 王晓磊 , 等 . 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以新疆理工学院为例 [J]. 秦智 , 2023(04): 182−184.

[4] 杨宇航 . 马克思主义人才观视域下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J]. 西部素质教育 , 2019(06): 176−177.

[5] 陈亚东 . 社工教育与职业资格制度研究 [J]. 石油教育 , 2008(05): 42−45.

[6] 陈兰兰 . 虚拟教研室赋能社会治理路径探讨 [J]. 品位・经典 , 2025(19): 101−10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社区治理需求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20240401）；2024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社会治理生态下社会治理与社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NGJGH2024470）。

（作者系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高级社会工作师、教师）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伊金霍洛旗的双岗实践观察

钟宝玉

摘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笔者兼具廉政教育中心工作人员与包联社区副书记的双岗实践，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该旗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研究发现，伊金霍洛旗通过构建“一领双培三支撑”服务模式，形成了制度筑基、人才强基、创新驱动的多维路径，持证社工达 1447 人。然而，队伍建设仍面临“持证”与“胜任”的张力、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的边界模糊、复合能力培养不足、职业发展通道与专业认同困境等深层问题。本文提出从优化培训体系、厘清角色边界、培养复合能力、完善职业发展通道、构建多元支持生态五个方面深化队伍建设，为基层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提供实践参照。

关键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伊金霍洛旗；双岗实践；对策建议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已成为连接政府与群众、推动治理重心下移的关键力量。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其本质是利他主义的专业助人活动，但在中国语境下，它更被赋予了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性角色。如何让社会工作人才不仅“持证”，更能“胜任”；不仅“在岗”，更能“作为”，成为各地探索的核心命题。

伊金霍洛旗作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旗县，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走在了内蒙古自治区前列。笔者兼具廉政教育中心工作人员与包联社区副书记的双重身份，在日常工作中既参与廉政文化建设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探索，也深度观察社工人才队伍的成长与发展。本文基于这一双岗实践，以伊金霍洛旗为样本，系统梳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剖析深层问题，并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为基层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笔者兼具廉政教育工作者与社区副书记的双岗位实践，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仍面临多重深层问题。

（一）“持证”与“胜任”的张力

持证社工数量快速增长（1447 人），但“持证”不等于“胜任”。笔者在社区工作中发现，部分持证社工虽然通过了职业资格考试，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具体表现为：个案工作层面，服务停留在“谈话”层面，缺乏系统的需求评估、介入计划和效果评估，难以深入挖掘服务对象的深层需求；小组工作层面，活动流于形式，缺乏专业的过程设计和干预技巧，小组动力难以形成，组员参与度不高；社区工作层面，习惯于行政化动员，难以激发居民内生参与动力，社区营造往往停留在活动组织的层面。

这一问题的深层症结在于：职业资格考试侧重知识考核，对实务能力的评估有限；继续教育虽有开展，但多以知识更新为主，技能训练和督导跟进不足；实务训练机会有限，新持证社工缺乏足够的一线实践积累。

（二）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的边界模糊

在包联社区工作中，笔者深切感受到社区社工面临的“双重角色”困境。一方面，社工被期待提供专业化服务；另一方面，大量行政事务（台账填报、活动组织、材料撰写）占据了社工的时间和精力。当行政事务与专业服务发生冲突时，专业服务往往被挤占。

从伊金霍洛旗的实践看，持证社工 100% 下沉基层一线，但下沉后如何保障专业服务时间、如何与社

区行政工作有效衔接，仍是未解的难题。笔者观察到，部分持证社工在社区中更多扮演“行政助手”而非“专业社工”角色，专业价值难以充分发挥。

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包括：社区行政事务繁重，人手不足，社工被视为可调配的人力资源；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存在偏差，部分基层干部将社工等同于“能干活的”；缺乏明确的岗位职责界定和考核标准，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界限模糊。研究表明，社会工作是“嵌入”我国现有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结构中的，这种嵌入性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专业逻辑时刻面临着被主导性的行政逻辑所同化的风险[1]1。

（三）复合能力培养不足

伊金霍洛旗的社工人才培养，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已有系统安排，但在复合能力培养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从双岗视角看，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许多问题（如风险防控、居民信任重建、矛盾纠纷化解）都需要社工具备跨领域知识和综合应对能力。

笔者在廉政教育中心的工作经验表明，社工若具备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能够在社区服务中更好地识别和防范风险；若具备信访调解的基本技能，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社区矛盾。然而，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更多聚焦社工专业知识，对跨领域复合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

具体而言，社工在以下方面的能力有待提升：政策解读能力——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居民可理解的社区行动；资源整合能力——链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矛盾调解能力——运用专业方法化解社区矛盾纠纷；廉洁风险识别能力——发现和防范风险。《“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增强社区服务人才支撑”，特别强调要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社区工作者。当前培养模式与这一国家政策要求之间尚存在差距，未能系统地将基层治理现代化所需的政策理解、资源动员、风险防范等通用能力整合进社工专业能力框架中[2]85。

（四）职业发展通道与专业认同困境

尽管伊金霍洛旗建立了激励机制，但社工的职业发展通道仍不够清晰。笔者在与社工交流中发现，许多人对“能走多远”“能做什么”存在困惑。具体表现为：晋升通道不畅通。社工职称评定在事业单位虽有落实，但在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中的晋升路径仍需完善。目前主要依靠岗位晋升和职称评定，但两者衔接不畅，且高级岗位数量有限。薪酬待遇偏低。尽管有持证补贴，但社工整体薪酬水平仍然偏低，与工作强度和专业要求不匹配，影响人才留存。职业认同感不足。由于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有限，社工常常被误解为“做活动的”“搞服务的”，专业地位和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这种外部认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工的职业获得感和专业坚守。林超的双因素理论表明，社工人才留存既需改善薪酬、工作环境等保健因素，也需强化职业成就、专业认同等激励因素，基层社工队伍稳定需兼顾物质保障与精神激励[3]。职业发展的“天花板”效应和薪酬待遇的“洼地”现象，共同构成了影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五）人才结构失衡与流失问题

从人才结构看，伊金霍洛旗社工队伍存在三方面失衡：区域分布失衡——城区社工集中，乡镇社工相对短缺；领域分布失衡——社区服务领域集中，养老、儿童、残疾人等专业领域人才不足；层级分布失衡——初级人才较多，中级人才相对不足，高级人才极为稀缺。

人才流失问题也值得关注。由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薪酬待遇偏低、工作压力大等因素，部分持证社工选择离开社工岗位，或转向行政岗位，或离开行业。社会工作机构内部管理不规范、岗位设置模糊、培训体系碎片化，是导致社工实务能力不足、人才流失加剧的重要组织因素[4]，这种人才流失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队伍的稳定性。

三、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在回应“党建引领下的治理现代化”政策导向，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更深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结合伊金霍洛旗实际和双岗实践观察，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优化培训体系，提升实务胜任力

针对“持证”与“胜任”的张力，应从“知识培训”转向“能力建设”，构建“基础培训—专业进阶—高级研修”的梯次培养体系。这一转型需借鉴“实践取向的专业教育”理念，核心是将学习嵌入真实、复杂的工作情境，强调在反思性实践中增长专业才能[2]88。

一是强化实务技能训练。在继续教育中增加实务训练比重，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演练、实务工作坊等方式，提升社工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核心实务能力。可借鉴“师徒制”培养模式，由资深社工带领新社工开展实务训练。二是完善督导体系建设。在现有 15 人督导团队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督导覆盖面，建立“旗级督导 + 镇街督导 + 同辈督导”的多层督导网络。特别要加强对社区一线社工的常态化督导，将督导从“事后指导”前移至“事中陪伴”，提升社工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三是建立能力评估机制。探索建立社工实务能力评估标准，通过案例分析、实务展示、服务对象反馈等方式，对社工的实务能力进行动态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岗位安排、继续教育挂钩。

（二）厘清角色边界，保障专业服务时间

针对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的边界模糊问题，应从制度层面厘清社工的角色定位和职责边界。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方式明确专业自主性的实践空间，是克服“行政吸纳专业”困境的关键[5]8。

一是明确岗位职责。制定社区社工岗位职责清单，明确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的边界。原则上，社工应保

证不少于 70% 的工作时间用于专业服务，行政事务应有明确上限。二是优化工作流程。通过数字化手段减少行政事务负担，推广“数字社工”信息平台，实现服务记录、需求收集、效果评估等工作的数字化，减少手工填报和重复劳动。三是建立考核机制。将专业服务成效作为社工考核的主要依据，行政事务完成情况作为辅助参考。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引导社工将精力聚焦于专业服务。

（三）培养复合能力，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

针对复合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应拓展培训内容，培养“专业能力 + 跨域能力”的复合型社工人才。一是增设跨领域课程。在继续教育课程中增设以下模块：廉政文化与基层治理融合、信访调解与矛盾化解、公共危机应对、社会工作伦理与基层治理、政策解读与资源整合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将使社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价值。二是开展岗位轮训。组织社工到信访、司法、民政等部门进行短期轮训，了解相关领域工作流程和专业知识，提升综合应对能力。笔者在廉政教育中心的工作经验表明，廉政知识和方法的掌握，能够帮助社工在社区服务中更好识别和防范风险。三是鼓励跨领域实践。支持社工参与基层治理创新项目，如“三师联动”矛盾化解、社区议事协商、廉洁社区建设等，在实践中提升复合能力。这些项目既需要社工的专业方法，也需要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2]90。

（四）完善职业发展通道，增强职业认同感

针对职业发展通道与专业认同困境，应从制度建设入手，为社工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是畅通晋升通道。建立“社会工作职称—岗位晋升—薪酬待遇”联动机制，明确高级社工师的岗位设置和待遇标准。在事业单位招考中，对持证社工给予政策倾斜；在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中，探索建立职级晋升体系。二是提高薪酬待遇。在现有持证补贴基础上，建立与职业资格等级、工作年限、服务成效挂钩的薪酬体系。对在基层一线服务的社工，给予适当岗位补贴；对获得高级社工师资格的人员，给予更高层级的待遇。三是增强职业认同感。通过评优表彰、典型宣传、专业故事传播等方式，提升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伊金霍洛旗在“三师联动”矛盾化解中的探索表明，当社工的专业价值得到彰显时，其职业认同感会显著提升。因此，要为社工创造更多展现专业价值的机会和平台 [1]2。

（五）优化人才结构，构建多元支持生态

针对人才结构失衡与流失问题，应从宏观层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支持的人才发展生态。一是实施定向培养计划。乡村地区社会工作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单一、本土培养机制缺失，是制约城乡社工服务均衡发展的关键短板，需强化本土化人才培育与下沉服务 [6]。针对乡镇社工短缺问题，实施定向培养计划，鼓励本地户籍人员报考社工证，考取后回乡镇服务。针对专业领域人才不足问题，开展养老、儿童、残疾人等领域的专项培养。二是建立人才流动机制。畅通社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之间的流动渠道，避免人才固化。可建立社工人才库，根据个人意愿和岗位需求进行合理调配。三是构建多元支持网络。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元格局。党委组织部门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民政部门履行行业管理职能，社会工作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支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社工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推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从“政府主导”走向“多元共治”[5]10。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精神，强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伊金霍洛旗的实践表明，通过制度筑基、人才强基、创新驱动，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社会工作人才发展之路。然而，从“持证”到“胜任”，从“在岗”到“作为”，仍需要持续探索和深耕。

笔者兼具廉政教育工作者与社区副书记的双重身份，在双重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不仅是专业议题，更是治理议题；不仅是制度设计，更是价值追求。当社工在服务群众中实现专业价值，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工作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和认同。这是伊金霍洛旗的实践启示，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 . 社会工作在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2016(01): 43−47.

[2] 顾东辉 . 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体系的构建与培育路径 [J]. 江苏社会科学 , 2024(01): 82−91.

[3] 林超 . 双因素理论视阈下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发展策略——基于扬州市 W 街道的考察 [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05): 56−65.

[4] 王燕燕 . 社会工作机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 [D]. 漳州 : 闽南师范大学 , 2024.

[5] 徐永祥 , 陈劲松 .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前瞻 [J]. 社会工作与管理 , 2024, 24(01): 4−13.

[6] 赵素燕 , 孔筱满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以山西省 L 市为例 [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 2024, 40(02): 88−93.

（作者单位：伊金霍洛旗廉政教育中心）

三孩孕产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扎根分析

沈园园 水黎明

摘要：在少子化及三孩生育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探究三孩孕产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优化人口服务体系提供有益参考。研究选取 23 名三孩孕产妇开展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开展三级编码，结合计划行为理论（TPB）构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生育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共同驱动三孩生育意愿，其中生育态度中的子女价值判断与知觉行为控制中的家庭资源条件影响最为显著。生育态度包括子女价值判断、子女性别偏好；主观规范包括人脉关系支撑、生育示范效应；知觉行为控制由家庭资源条件、个人身心准备、外部环境与期望构成。基于上述发现，从态度引导、规范优化、资源保障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人口政策细化完善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三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扎根理论；计划行为理论

人口发展是“国之大者”。2021 年“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实施，但生育水平仍处于低位运行。2023 年全国出生人口 902 万人，总和生育率仅 1.0 左右，远低于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为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构建相当规模的三孩家庭成为关键 [1]。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宁波地区的生育形势更为严峻，2020 年总和生育率为 1.01，2021—2023 年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至 5.7‰，“不愿生、不敢生”的现实困境亟待破解。

现有研究多基于宏观数据分析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局限：一是部分研究未聚焦已生育三孩群体，对未育群体的研究缺乏即时指导意义；二是以定量研究为主，难以揭示生育决策的内在逻辑。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处于生育前沿的三孩孕产妇群体，了解她们为什么想生三孩，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三孩孕产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对策。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TPB）认为，个体行为受行为意向驱动，而意向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决定 [2]。该理论为生育行为分析提供经典框架，已被证实能有效提升行为解释力 [3-4]。

（二）研究方法

根据扎根理论，运用 Nvivo12 软件开展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重编码过程中 [5]。本次研究自下而上提炼相关概念、范畴，寻找范畴间的联系，从而构建理论模型。

（三）数据收集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2 月，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产科病房开展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即将分娩三孩或刚分娩三孩的孕产妇，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生育三孩的原因、生育三孩的支持情况以及对政策支持保障的思考等展开。访谈采取目的性抽样法，选择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的受访者。为提升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与全面性，受访者居住地覆盖宁波市 10 个区（县、市）。根据饱和原则和最佳样本量，最终获得 23 份深度访谈资料。被访谈者年龄为 27~45 岁，学历从小学到研究生不等，职业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私企老板、私企职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全职妈妈及务农人员等，婚姻状况包括初婚、再婚及离婚。

二、扎根理论分析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收集的文字资料进行逐句分析，找出其中的概念、属性和维度，并将其凝练为初始概念，再将性质与内容相近的要素重新组合产生概括性、抽象化范畴的过程。本研究对文本数据进行逐一编码，提炼原始语句 128 条。经过多次比较修正，去除频率 <3 次的概念，获得初始化概念 34 个，再合并、归纳提炼为范畴 15 个。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是在深入探究范畴间内在逻辑关联的进程中，将各个分散的范畴予以有效整合与衔接，进

而构建起主范畴体系的关键步骤。结合 TPB 框架，将 15 个范畴归纳为 7 个副范畴和生育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 3 个主范畴，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轴性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影响关系的范畴
生育态度	子女价值判断	精神需求
		家庭保障
		家族传承
	子女性别偏好	性别期望
主观规范	人脉关系支撑	家庭内部支持
		社交成员支持
	生育示范效应	社会生育氛围
知觉行为控制	家庭资源条件	经济能力
		居住条件
		照顾人力
	个人身心准备	身体状况
		心理准备
	外部环境与期望	政策支持
		公共服务保障
		健康风险管控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核心要点在于精准定位一个核心范畴，以此为枢纽，将其余经归纳所得的主范畴予以整合归并，进而编织出一条逻辑连贯、完整有序的故事脉络。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构建三孩孕产妇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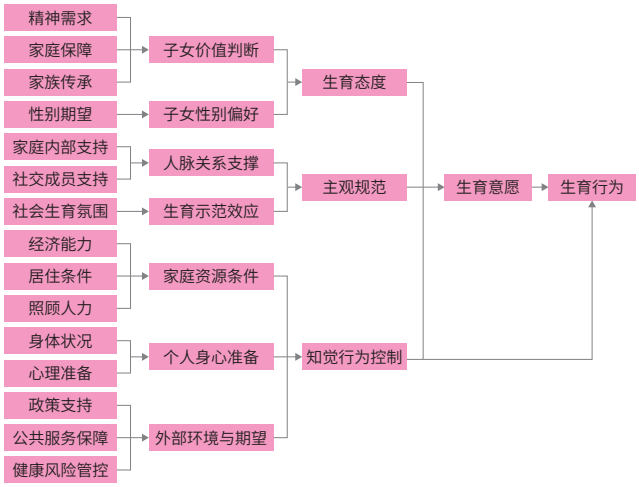


图 1 三孩孕产妇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按照理论饱和度原则，1/3 的样本资料需作为理论饱和度的验证[6]。在访谈进行到 16 人时，出现重复趋势，将后续 7 份访谈记录予以编码，未挖掘出新的概念与范畴，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与原有设定一致契合，据此判定，模型在理论上达到饱和。

三、模型阐释

（一）生育态度

生育态度，是指个体对生育三孩这一行为的主观评价，就是“我想不想”，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由子女价值判断与子女性别偏好共同主导其方向与强度。其中，子女价值判断受精神需求、家庭保障、家族传承影响。不少三孩孕产妇基于对孩子的喜爱以及孩子为家庭所增添的快乐，期望借此满足自身的情感诉求，进而选择生育三孩。有部分孕产妇认为三个孩子能相互照应，面对困难时，更容易形成合力；或为了将来稳定的家庭保障，或出于对未来养老保障的考量而做出生育三孩决定。再婚群体则出于弥补婚后无共同子女的遗憾，将生育视为稳固婚姻的基础。此外，性别偏好也在生育决策中占据显著地位。部分产妇表示，若前两胎已达性别预期，则不会选择生育三孩。反之，若未达预期，则会选择生育三孩。

（二）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生育三孩时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就是别人觉得你“要不要生育三孩”。人脉关系支撑与生育示范效应共同塑造生育意愿的压力与动力。人脉关系支撑体现在家庭内部支持，包括配偶、父母、公婆、现有子女等家庭重要成员的想法与态度，以及社交成员支持，包括朋友鼓励与同事关怀，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个体的生育决策方向。生育示范效应受社会生育氛围影响，周围家庭或原生家庭存在一定的三孩生育示范效应。访谈发现，有不少孕产妇及其配偶为非独生子女，当原生家庭展现出积极的家庭生活状态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生育三孩的潜在焦虑情绪，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正向的激励与引导效应。有研究发现，高收入群体的低生育行为对中低收入群体形成示范效应，导致婚育年龄推迟和生育率下降[7]。

（三）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三孩生育资源可控性的评估，就是“我做不做得到”，可直接影响生育行为，由家庭资源条件、个人身心准备、外部环境与期望三个维度构成。家庭资源条件受经济能力、居住条件、照顾人力影响。其中，经济压力的冲击最显著，不少三孩孕产妇表示，如果“经济负担无法承受”或者“没有父母经济资助、育儿照护”，即使意外怀孕也不会生育三孩。有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生育意愿不高，主要是受困于经济收入短缺和时间精力匮乏[8]；接受祖辈支持，对提升女性生育意愿有着积极的影响[9]。个人身心准备中，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与更高的生育意愿显著相关。外部环境与期望维度，三孩生育政策构成重要驱动因素，尤其对于部分意外怀孕的孕产妇而言，政策支持成为其最终决定生育三孩的关键考量因素，但对托幼机构的信任度不足，对食品安全、空气

污染等问题的担忧，会削弱生育意愿。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三孩孕产妇进行深度访谈，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三孩孕产妇生育行为影响机制。三孩孕产妇生育行为影响机制模型可解释为：（1）生育三孩行为受到生育意愿的驱动，生育意愿受到生育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符合计划行为理论原有的理论框架。（2）生育态度由子女价值判断与子女性别偏好构成，前者受精神需求、家庭保障、家族传承的影响，后者受性别期望影响。精神需求越强，生育意愿越强，家庭保障、家族传承观念越强，越倾向于生育三孩，子女性别偏好会对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3）人脉关系支撑与生育示范效应构成生育三孩时感知的社会压力，配偶、父母、公婆、现有子女等家庭重要成员的态度倾向为孕产妇生育三孩带来压力，社交成员支持对三孩生育意愿产生间接性的调节与修正作用。周围家庭示范对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正向的激励与引导效应。（4）知觉行为控制由家庭资源条件、个人身心准备、外部环境与期望构成，其中家庭资源条件受经济能力、居住条件、照顾人力的影响，个人身心准备受身体状况、心理准备的影响，外部环境与期望受政策支持、公共服务保障、健康风险管控的影响。

（二）对策建议

1. 改善生育态度

生育态度是三孩生育意愿的核心驱动，而情感联结是正向生育态度形成的关键。访谈中，多位孕产妇提及“喜欢孩子”“孩子给家庭带来快乐”，印证了情绪价值对生育决策的重要性。因此，需强化子女价值的具象化传播，比如聚焦“子女互助陪伴”“家庭温情传承”等真实场景，打造多子女家庭纪实短片、社区亲子互动情景剧等接地气的内容，引导家庭树立积极的生育观与家庭观。同时，针对部分孕产妇“传宗接代”“儿女双全”等功利化性别期待，从媒体内容创作、学校课程普及、家庭观念引导三方面强化性别平等理念，减少因性别期待不符放弃三孩的情况，逐步形成稳定的生育意愿，促进人口性别结构均衡。

2. 优化主观规范

当前，宁波市的三孩家庭仍属稀缺群体，需通过家庭与社会双向发力，破解“生育示范不足”困境。家庭层面，可依托社区举办“三孩家庭经验分享会”，帮助家庭成员厘清责任分担、资源保障等核心问题；医院开设“家庭生育咨询门诊”，提供孕前、早孕指导以及产后、育儿压力疏导等服务，促进内部形成支持合力。社会层面，可以借助社交媒体推送展现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温情与成长优势，破除“生得多压力大”等刻板印象，探索组建三孩家庭互助平台，营造生育友好氛围。政府层面，通过线上线下宣讲解读生育政策、普及本地生育补贴、托育支持等政策细节，让公众清晰感知到三孩生育的社会支持力度。

3. 增强知觉行为控制

访谈发现，即便个体存在生育意愿，也可能因为经济压力、照护缺口、身心顾虑等现实阻碍，放弃生育三孩。需进一步完善生育福利支持，从经济支持、照护保障、医疗健康、风险管控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实施三孩家庭专项税收与购房减免、按生育孩次阶梯式提高生育养育补贴；重点打造“15 分钟托育圈”，鼓励社区、事业单位、企业建立或合作托育机构，对达标企事业单位给予年度税收返还；针对三孩孕产妇生育年龄普遍偏大的特征，完善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保障政策，开设三孩孕产妇专项门诊，提供全程产检绿色通道、产后康复指导。生育风险管控上，聚焦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抽检，及时公开检测结果，构建安全可控的生育外部环境。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将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市妇幼保健院）作为开展场所，尽管访谈孕产妇的居住地覆盖全市 10 个区县市，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地域代表性，然而其局限性亦不可忽视。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多个点位，增强样本多样性和全面性，从而更为精准地反映不同地域、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服务对象的特征与需求。其次，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且在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步骤开展编码与模型构建，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研究可采用问卷调查法，借助其标准化、结构化的优势扩大调查样本量，对模型进一步检验和完善，为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提供更为坚实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吴帆，李建民．中国面临生育危机风险的三个信号：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49(01): 61-68.

[2]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1985.

[3] Bansal H, Taylor S F. Investigating interactive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a service-provider switching context[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02, 19(05): 407-425.

[4] 周国红，何雨璐，杨均中．“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基于 743 份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分析 [J]. 浙江社会科学，2021(05): 77-86.

[5] 张敬伟，马东俊．扎根理论研究法与管理学研究 [J]. 现代管理科学，2009(02): 115-117.

[6] Fassinger R E. Paradigms, praxis,（下转 131 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概念与框架

孟　瑶

摘要：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加速演进的新时代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肩负着培育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民族共同体精神纽带的重大教育使命。作为该课程的知识传播主体与意识形态引导者，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成为影响教学效能的核心要素。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教师知识迭代能力模型，基于师生双向动态互动机制构建，其中教师的能力素养与学生的认知情感需求形成协同作用关系。该模型建构不仅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理论框架，更能促进师生双向知识流动，创造师生学习成长的价值共同体，推动教育教学成果实践转化，从而形成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课程建设范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师知识迭代；能力模型；转化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既是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程[1]，又是建设“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2]。然而，当前存在着建设主体参与不足、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与开发不到位等问题[3]。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程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和课程两方面。一是从教材的重要地位和内在逻辑探究其特色和意义，有效地从理论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发展史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意义，提出“概论”教材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典范佳作[4-5]。有的立足教材内容，从历史的维度和多学科视角探究教材知识的内在逻辑架构，或聚焦教材中的某一关键概念进行解析[6-8]。二是基于课程建设的视角，分析“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和课程实践。通过构建模型框架和实践循证研究，优化课程建设环节，促进教学改革和创新[9]；有的针对“概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提出如优化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举措[10-11]。

现有研究着重分析了“概论”课程的重要性、知识结构以及教学改革措施，但未能针对“概论”课程教师本身专业发展等问题进行针对性讨论。“概论”课程教师是讲好课程的主力军，厘清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对于构建高质量“概论”课程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概论”课程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教师知识迭代能力的基本架构与构成要素并构建相应模型，以期为“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提供参考。

一、“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

（一）教师的知识

近年来，“教师的知识”一词被广泛使用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简单来说，教师的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它涵盖了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以及实践智慧等多个方面。它有两种理解

（上接 130 页）

problems and promise: Grounded theor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5, 52(02): 156-166.

[7] 袁富华，张平，楠玉．城市化中人口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的再平衡——补偿性增长假说 [J]. 经济学家，2020(02): 117-128.

[8] 黎淑秀．长三角城市群的育儿困境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J]. 青年探索，2021(03): 88-98.

[9] Roberta R, Mariona L. Do I want more if you help me? The impact of grandparental involvement on men's and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J]. Genus, 2022, 78(01): 1-20.

（作者：沈园园，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水黎明，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视角，一种是结构视角，另一种则是实践视角。关于教师知识结构，美国教育家舒尔曼认为教师的知识由多种成分构成，其中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区别于其他学科专家的一种独特知识成分[12]。格罗斯曼的“教师知识四要素”理论对舒尔曼的理论进行了拓展和深化，认为教师的知识由学科内容知识、学习者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和课程知识四要素构成[13]。从实践视角出发，杜威认为教师的知识还包括“经验性知识”，即教师对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经历进行反思和总结，形成的实践性知识[14]。此外，教师的知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新的学科知识、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涌现，教师知识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

（二）“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

“概论”课程是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关键课程，是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渠道。随着“概论”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构建一支专业化的课程教师队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概论”课程教师的专业知识是教学的根基，直接关系到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成效。“概论”课程教师的专业知识是在普通教师知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融合，本质上是对教师知识的学习、应用和创新。

具体来说，作为“概论”课程的教师，必须具备教师应有的条件性知识，这涵盖了学科内容知识、学习者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和课程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学生更轻松地接受和掌握教学内容，是对以教学专业知识为主的本体性知识的学习，从而能够深入构建“基础支撑”。此外，从应用视角来看，“概论”课程的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条件性知识外，还应在教育教学中积累“经验性知识”，以便准确理解和传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实践路径。例如，“概论”课程的教材编写坚持历史与理论相结合，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跨学科论证，系统而全面地展现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这就要求教师将跨学科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如在讲解不同知识点时，灵活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让学生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课程内容。这对教师的知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教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维度”。最终，在创新知识层面，“概论”课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核心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两个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15]。这要求教师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知识的同时，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实践成果，进一步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在教师的知识结构中实现“深化发展”。总体而言，“概论”课程教师知识的核心在于以教师条件性知识为基础，在知识广度方面持续拓展，在深度方面不断深化，从而迭代“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结构，实现课程目标。

二、“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

教师的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通常会经历学习、应用和创新三个阶段，它们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迭代是贯穿三个阶段的核心环节。

学习阶段标志着教师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起始和根基，是知识从获取到内化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存储形式经历了从分散到整合的转变，被整合进大脑的知识体系中。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新知识，实现知识的更新和迭代。在教育实践中，教师积极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创造性地学习，对知识的迭代更新具有重要影响[16]。“概论”课教师在学习阶段还应具有政策导向性，及时更新党的民族理论等相关知识，持续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学术动态。此外，教师现有的知识结构，以及学习平台的选择等，也都在影响着学习阶段知识的迭代过程。

应用阶段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的关键过渡期，这一过程凸显了迭代的重要性。教师必须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教学和研究的实际能力，并持续调整、优化知识的应用方法，以推动能力的迭代发展。首先，教师需要面对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等实际场景，而有效的反馈机制是促进能力迭代的关键因素。例如，学生、同行以及研究成果等多方面的反馈信息，有助于教师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优化知识应用策略。在智慧教育时代背景下，教师还需掌握新兴的教育技术，积极采用新的教学工具和方法，以促进应用方式的迭代更新。此外，在应用迭代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调整。当教学对象（学生）、研究项目等对知识和方法的需求发生变化时，教师需要对已应用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相应的迭代，以满足新的需求。

创新阶段是教师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高级体现，这不仅是推动学科发展和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动力，而且在创新教学方法和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方面，教师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这直接关系到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迭代与超越。在创新阶段，教师必须具备科研能力、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17]。“概论”课程教师在创新阶段基于前期的学习、应用，提升自身的理论原创力，提出契合新时代的学术观点。积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将学术创新与育人目标相结合，实现课程价值引领的目标。

以上研究表明，“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每个阶段存在不同的影响迭代的因素。学习阶段关键影响因素包括学习动机、政策导向、知识结构和学习平台；教学实践、技术适应、反馈优化影响着知识迭代能力构建的应用阶段；创新阶段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理论创新、方法革新和价值引

领。教师教育中的循证实践及证据迭代对提升专业性具有关键作用，需要关注实践中的多种因素[18]。针对“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的三个阶段需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来保障学习、应用和创新的真实性、可靠性、价值性，进而实现“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的可循证性。

三、“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的基本架构与构成要素

“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教师的主体性因素，其次要展现出知识、能力和学生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贯通。因此本文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

诺尔斯的成人学习理论揭示了成人学习的本质规律，教师作为典型的成人学习者群体，其专业发展过程深度契合该理论的特征。诺尔斯认为，首先教师在专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自我导向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学习目的明确、自主规划学习过程和较强的自律性[19]。这种内在驱动机制构成教师知识迭代能力的先决条件，为能力模型构建奠定认知基础。其次，教师具有的实践经验是丰富的学习资源，通过专家评议、教学反思、经验整合等促进教学反思能力提升。再次，学习也更多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20]，能为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提供实践驱动。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建构和动力机制设计。通过强调教师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性，为模型提供主体性框架。依托“经验整合—问题驱动”的耦合路径，揭示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内在机理，形成“理论认知—实践验证—能力升级”的螺旋上升通道。

TPACK 理论也广泛运用于教师能力培养，全称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该模型主要说明了教师的知识有三个核心要素：学科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 CK）、教学法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 PK）和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这三者深度融合，形成动态交织的复杂知识体系[21]。TPACK 框架的三大特点包括融合性、动态发展性和应用开放性[22]。TPACK 理论的核心在于具有融合性，在教师层面体现为教师应具备学科融合的知识，在教学层面体现为通过技术赋能，重构学科教学逻辑，实现教学情境中“技术—内容—方法”的有机统一。动态发展性要求教师更新知识，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开放性是指教师在能力培养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科、课程、学习者需求灵活运用技术。这与“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的实施路径相呼应，通过“融合—设计—应用”三维逻辑，为“概论”课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提供了技术整合路径、实践验证机制与动态优化范式。

本文以上述模型和相关理论作为参考，分析“概论”教师知识迭代能力模型的基本架构与构成要素，建立“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见图 1）。该模型包括先决条件、影响“概论”教师知识的因素、影响“概论”教师能力的因素、学生的需求和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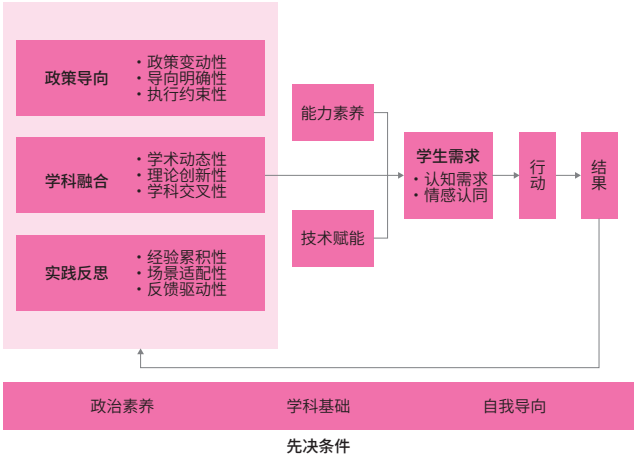


图 1 “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

（一）“概论”课程是教师知识迭代能力构建的先决条件

“概论”课程作为高校的思政课程，对培育大学生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概论”课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内涵与政策导向，确保知识迭代方向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高校教师教学具有专业性，“概论”课教师应具备相应的学科基础，比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等核心学科知识体系。教师是知识迭代的主体，不能忽视其自我导向性，这是促进自我学习、自我实践、自我反思的重要驱动力。以政治素养为先导、以学科基础为基石、以自我导向为动力，是“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构建的先决条件。

（二）“概论”课程教师知识的影响因素

影响“概论”课教师的知识主要由政策导向、学科融合和实践反思三个方面构成。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必须发挥“概论”课程主渠道作用，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因此，“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导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政治方向，受国家民族政策动态调整影响，需及时跟进教材修订与历史问题阐释，教学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框架，避免与宪法、法规相冲突，即坚持政策变动性、导向明确性和执行约束性。其次，对于“概论”课程教师而言，知识构成需要学科融合是重要影响因素，涉及学术动态性、理论创新性、学科交叉性。学术动态性要求及时追踪前沿动态，特别是关于党的民族理论的最新成果；理论创新强调高校“概论”课教师推进教学研究一体化，

提升教学的理论性和研究的实践性；学科交叉性要求关注多学科融合趋势，特别是相关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等，推动理论范式更新。最后，“概论”课程教师知识迭代需要实践场域，包括经验积累、场景适配和反馈驱动，即在促进知识迭代时需要考虑实践知识积累，根据教学场景调整教学方法，通过反馈优化知识结构和教学。

（三）“概论”课程教师能力的影响因素

在“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构成之外，教师的能力素养和技术赋能也影响着知识迭代能力的构建。能力素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话语与理论体系的整合转化能力。教师需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抽象概念转化为适应不同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内容，增强理论的可感知性。二是跨学科知识与意识形态的贯通融合能力。整合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形成系统化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渗透“五个认同”等价值观，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强化价值引领功能。

“概论”课程教师的技术赋能是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推动课程建设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23]。一是通过技术驱动促进教学资源开发，利用多模态教学工具，如数字资源库、虚拟仿真平台，突破传统教学空间的限制，通过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学情，动态调整教学策略；二是实践经验的标准化提炼与迭代优化，将上述差异化的教学策略、案例提炼为可复用的标准化教案，在实践中持续反思，形成“实践—改进”闭环，持续优化教学。

（四）学生需求的要素和发展过程

“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在不断建立、调整和优化，能力提升是在应对学生需求不断变化中提升的。学生的需求，即认知需求和情感认同，表现为青年学生是否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而坚定“五个认同”[24]。教师以学生认知与情感需求为标尺，验证教学的有效性，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行动会影响最终的教学结果。一方面将教学经验归纳为教学案例；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形成“政策导向驱动—跨学科知识融合—技术赋能实践—学生需求验证”的循环模型。

四、“概论”课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模型应用

（一）促进师生双向知识流动

“概论”课程是向学生完整准确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载体，课程知识体系以国家民族政策为核心导向，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目标，教学内容需严格遵循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工作领域的政策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思政课应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望来加强价值观教育，促进知识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传递。该模型以“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储备为基础，强调知识的互动与交流。一方面，有利于消除教师在不同阶段知识之间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模型能够揭示学生潜在的意图，确保知识流动的准确性和适宜性。师生之间也通过模型建立知识流动的渠道，这有助于加强“概论”课程教师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并为创造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效的互动体验打下坚实基础。

（二）建设师生的价值共同体

该模型的核心运行机制依赖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概论”课程的教师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结合信息技术，构建教学实践场景，促进教学内容向学生价值观的内化。另一方面，该模型展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使学生能够在互动中评估和反思教师的教学影响力，并据此调整自己的学习意图和行为。因此，该模型不仅关注教师的知识、技能和教学实践，还赋予了学生通过交互系统参与教学实践并提供反馈的权利，彰显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课程建设中教师与学生“双主体”的理念。学生在参与中的主体性进一步强化，更有利于“概论”课程的价值导向和情感内化。在师生的共同参与中，逐步建立起以成长为导向的价值共同体。

（三）提升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模型的终极目标是将教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教师的知识迭代能力。在“概论”课程中，教师的知识能力迭代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学习、应用和创新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系统必须是可靠的，教师的知识必须是全面的，教师的能力必须是足够的，教学过程必须是有序的，整个过程必须是可循证的。只有这样，学生在与教师的互动过程中，才能有效地获取课程知识，深入理解其中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的交流与互动。模型既包含了“概论”课程教师的知识基础、教师能力的转化和教学实践的呈现，又体现了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的主体作用，始终关注教师知识迭代能力，助力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教学过程中，该模型构建了双向反馈系统，根据学生的意图和行为，教师可以明确自己的教学定位与方向，利用模型不断审视和调整教学策略，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对于“概论”课程建设，“概论”课程教师知识迭代能力构建，有利于加强和提升“概论”课程教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让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主动建构知识，深化对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实现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王恩春 . 新疆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生成逻辑、价值向度与实践路径 [J]. 昌吉学院学报 , 2024(04): 1−6.

[2] 袁娅琴 . 关于地方师范院校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探析 [J]. 东北亚民族文化评论 , 2024(01): 150−157.

[3] 李永政 , 黄明元 . 圈层共建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的逻辑理蕴、框架模型和推进路径 [J]. 民族学刊 , 2024, 15(02): 28−35, 125.

[4] 王延中 . 科学阐释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开创性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读后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07): 10−17.

[5] 许若冰 .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典范佳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读后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08):30−32.

[6] 牛海桢 , 王弘卓 . 从历史进程中体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4): 5−9.

[7] 王典 , 陈涛 . 多学科聚力共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发展的构想——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11): 40−45.

[8] 方清云 . 从“天下观”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关键概念解析 [J/OL].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3[2026−03−23]. https://link.cnki.net/urlid/42.1704.c.20240718.0858.015.

[9] 裴圣愚 .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教学实践的循证研究 [J]. 大理大学学报 , 2022, 7(07): 63−68.

[10] 李安辉 , 杨国庆 . 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课程的案例教学探索——以 Z 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例 [J]. 民族论坛 , 2023(01): 13−20.

[11] 王艳 , 田甜 . 高校思政课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实践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为例 [J]. 满族研究 , 2022(01): 1−9.

[12] 崔宇路 , 杜幸珂 , 张海 . 教师学科教学知识演变 : 内涵、特征及趋势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4(04): 86−93.

[13] 徐鹏 , 王以宁 . 整合技术的卓越教师知识能力结构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 , 2020(02): 89−93, 101.

[14] 刘莹 , 王鉴 . 中国基础教育实践育人的内涵、特征与路径 [J]. 学术探索 , 2023(06): 133−139.

[15] 金鑫 , 代宏丽 , 李峥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生发逻辑——基于“两个结合”视域的分析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 2025(01): 60−68.

[16] 胡红珍 , 夏惠贤 . 第三空间视角下项目式学习的主要特征、学习序列与教师行动 [J]. 全球教育展望 , 2023, 52(12): 120−128.

[17] 史丽晨 , 王海涛 , 耿素花 , 等 .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 2024, 7(19): 4−7.

[18] 宋萑 , 徐淼 . 教师教育者循证实践与教师教育证据迭代 [J]. 教育科学 , 2022, 38(03): 8−14.

[19] 高玉旭 . 中小学教师专业知识素养的提升路径探析——基于诺尔斯成人学习理论的启示 [J]. 教学与管理 , 2018(36): 48−50.

[20] 田璐 . 成人学习理论下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再思考 [J]. 继续教育研究 , 2022(01): 46−50.

[21] 张宸溪 , 洪心 , 方海光 . 基于循证教学的教师 TPACK 能力培养研究 [J]. 开放学习研究 , 2024, 29(06): 20−29.

[22] 胡萍 , 冯小燕 , 张涛 , 等 . 基于 TPACK 的数字时代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研究 [J]. 电脑知识与技术 , 2024, 20(27): 131−135.

[23] 孙培佩 . 新时代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意义、内容与路径——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教学的思考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06): 64−71, 156.

[24] 贾海霞 . 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的多维思考 [J]. 民族学刊 , 2023, 14(06): 125−132, 15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四川民族学院 2023 年度校级教改项目“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与实施”（xm20230034）。

（作者系四川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艺术课程翻转课堂的过程性考核体系构建与实践

应佳辰

摘要：翻转课堂模式打破了传统艺术课程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逻辑，把知识传递前置，知识内化集中，对传统重结果轻过程的考核模式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过程性考核是符合翻转课堂教学理念的评价方式，可以准确捕捉学生在艺术学习过程中思维的发展、技能的提高和创新实践的成果，符合艺术学科审美性、实践性、创造性等特点。本文根据翻转课堂的教学流程和艺术课程的学科特点，分析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核心原则，确定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为提高艺术课程翻转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构建；核心素养

一、引言

随着我国美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艺术课程作为落实美育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与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的关键载体，其教学模式的创新与优化也成了提高美育质量的重要抓手。翻转课堂是打破传统教学逻辑的新型教学模式，以“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为特点，把艺术课程中知识讲解、理论认知等传递环节前置到课前线上完成，课堂时间集中于艺术实践、创意交流、作品打磨、思维碰撞，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符合艺术教育个性化、体验式、探究式需求，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艺术课程教学。但是翻转课堂的应用还存在着考核评价体系滞后的突出问题，传统的重结果、轻过程的终结性考核，忽略了学生在翻转课堂各个环节的学习过程和成长变化，不能全面反映学生艺术学习态度、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不能发挥考核导向、诊断、改进的作用，限制了翻转课堂育人价值的发挥，也不利于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培养。

因此，创建科学、系统、符合艺术课程翻转课堂特点的过程性考核体系，摆脱目前考核的困境，优化教学评价环节，促进两者深度融合，既有利于完善艺术课程教学评价体系、提高翻转课堂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学生艺术素养的持续发展，对推动艺术教育教学改革、落实美育育人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构建的核心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艺术课程翻转课堂的中心思想就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地参与学习、自主地进行创作。过程性考核体系的建立要充分体现主体性原则，打破教师单方面评价的传统方式，把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结合起来，使学生拥有参与考核的权利和机会。引导学生自主反思学习过程、评价自身学习成效、参与同伴作品的点评与交流，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审美评价能力，符合艺术学习个性化、自主性的特点。

（二）过程性原则

过程性考核的核心要义就是关注过程、兼顾发展，与翻转课堂的课前、课中、课后闭环教学流程不谋而合。艺术课程的学习是循序渐进、不断积累、逐步提高的过程，学生的艺术技能、审美素养、创新思维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每一个学习环节中逐步形成的[1]。过程性考核体系要贯穿翻转课堂的全过程，对学生课前预习的完成质量、课中实践的参与程度和技能运用、课后拓展的落实情况和创意延伸进行全方位的监测，摒弃“一考定终身”的终结性评价弊端，全方位地把握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长变化。

（三）综合性原则

艺术课程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它的考核评价要包含多元维度，不能只停留在单一的技能或者知识考核上。过程性考核体系的建立要遵循综合性原则，考核内容包含知识掌握、技能运用、审美感知、创意实践、学习态度、合作交流等各个方面，既重视学生对艺术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又重视学生对艺术技能的运用与提高，还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审美判断和人文素养的

培养。同时考核方式需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用具体的指标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用描述性评价反映学生个性化的成长以及艺术特质。

（四）导向性原则

过程性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价，也是对教学过程的诊断和引导，它的主要价值在于用考核来改进教学行为、促进学生的发展。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的建立要符合导向性原则，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要与翻转课堂的教学目标、艺术课程的育人要求相契合，引导教师优化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重视课前学习资源的优化、课中互动探究的深化、课后拓展的延伸，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主动参与学习过程，重视艺术技能的锤炼、审美素养的提升、创新思维的培养，实现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育人目标。

三、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的核心构建内容

（一）明确考核主体，构建多元评价共同体

打破传统艺术课程“教师单一评价”的局限，创建起“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三者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主体体系，使评价更加全面、客观、科学。教师是考核的主导者，要根据艺术课程的特点和翻转课堂教学目标科学地制定考核标准，全程监督考核过程、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效果，并且指导学生自评、同伴互评，避免评价的主观性偏差，保证考核的规范有序。学生是核心的考核主体，需要在翻转课堂各个学习环节结束之后，主动进行自评，总结自己在学习中取得的成绩、收获和不足，从而确定改进的方向，提高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的能力[2]。同伴作为学习共同体，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来开展互评，肯定同伴的亮点和进步，委婉地指出同伴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既有利于学生互助共进，也有利于学生审美评价、合作交流、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符合艺术课程美育育人的目标。

（二）细化考核内容，衔接翻转课堂教学流程

根据翻转课堂“课前自主学习、课中互动实践、课后拓展提升”的闭环流程，细化过程性考核内容，保证各个环节精准对接、贯穿学习全过程。课前自主学习环节主要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态度以及知识吸收的效果，核心指标包含线上学习资源观看完成度、学习笔记规范性、预习任务质量，评价其自主学习、时间管理能力以及知识储备。课中互动实践环节主要考查参与程度、技能运用、合作交流能力，对课堂互动积极性、技能现场运用效果、小组合作贡献度、同伴点评质量进行考核，从实践能力、合作意识、审美判断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课后拓展提升环节侧重创意实践与素养提升，考核创作任务质量、创意理念合理性、知识拓展情况及学习反思深度，评价创新思维、创意实践、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持续提高。

（三）优化考核方式，实现定性与定量结合

按照艺术课程特点以及翻转课堂线上线下融合特点，改进过程性考核方式，把定量与定性、线上与线下考核相结合，确保科学可操作。定量评价是对可量化的指标进行评价，用具体的分值来反映学习的效果，确定各个环节的量化评分标准，减少主观随意性，保证评分的公正有依据。定性评价主要关注学习态度、创新思维等不能量化的指标，用简洁的语言来体现学生个性化艺术特质和学习变化，结合多元评价结果全方位地展示学习过程。线上考核以课前自主学习为重点，依靠平台统计学习数据，高效便捷；线下考核以课中实践和课后拓展为主，通过现场观察、作品点评等方式了解学生的表现和成果，线上线下衔接互补，保证考核全面高效[3]。

（四）制定考核标准，明确评价尺度

考核标准是过程性考核体系的核心，决定考核的科学性、公正性，要根据艺术课程教学目标、翻转课堂特点和学生差异来制定科学、明确、可操作的考核标准，确定各个评价环节的尺度，避免主观性。考核标准要遵循分层分维度原则，基础性和发展性并重，基础标准包含艺术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学习态度等，保证学生达到基本的学习要求，提升标准，关注创新思维、创意实践等高阶能力，发掘学生艺术潜力，兼顾个性化差异。同时考核标准要提前公布，通过线上发布、课堂讲解等形式让学生知道学习和考核的要求，引导学生改进学习行为，提高艺术技能和综合素养，发挥以考促学、以考促练的作用。

四、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考核理念引导，统一教评认知

过程性考核体系的有效实践，首先要强化教师和学生对考核理念的理解，打破传统终结性考核的固有认识，树立起关注过程、重视发展、多元评价的考核理念。一方面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教师对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和过程性考核有更深刻的认识，掌握过程性考核体系的构建方法和实践技巧，改变教师的评价角色，由“评价者”变为“引导者、组织者、诊断者”，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测、指导和反馈，优化教学行为[4]。另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宣传和引导，向学生介绍过程性考核的意义、内容、标准和方式，让学生知道过程性考核对于自己学习发展的意义，主动参与到考核中来，树立自主学习、自我反思、主动提高的学习观念，积极配合考核工作的开展。

（二）完善考核实施流程，规范考核过程

根据翻转课堂“课前—课中—课后”闭环教学流程，完善过程性考核实施流程，细化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保证考核工作规范高效进行。课前自主学习阶段，教师将符合艺术课程特点的学习资源、预习任务通过线上平台发布给学生，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上传

笔记、作业等成果，由教师进行在线审核，针对共性问题集中反馈，个性问题单独指导，并记录预习考核成绩。课中互动实践环节，教师对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技能运用、合作能力进行现场观察，组织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根据学生现场表现和实践作品综合打分并记录[5]。课后拓展提升环节，学生完成创作与拓展学习并提交成果，教师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点评，综合评价作品质量、创意以及知识拓展情况后记录成绩。考核全过程中，教师对各个环节的数据实时整理，给每个学生建立个人考核档案，完整保留学习轨迹和成长变化，保证考核过程可追溯、结果客观公正。

（三）优化考核反馈机制，促进师生提升

反馈属于过程性考核的重要部分，它的主要价值就是发现学习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进教学行为，促进师生共同进步。根据艺术课程翻转课堂的特点，要创建“及时反馈、双向互动、持续改进”的考核反馈机制，保证反馈的有效性、针对性。教师层面应该坚持及时、有针对性的原则，对学生课前预习、课中实践、课后创作各个环节的学习成果和考核情况进行反馈，针对学生在知识掌握、技能运用、创意理念等各方面的不足，提出可以操作的改进建议，引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主动倾听学生对考核体系、考核标准、考核方式等各方面的意见，采纳合理的建议，不断改进考核体系。学生方面，要主动留意各种考核的回馈情况，归纳教师以及同伴给予的评价意见，剖析自身在艺术学习与创作过程中的欠缺之处，明晰改进的方向，制定个人化的学习创作计划，把反思变成行动，主动锤炼艺术技能，提升审美素养，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健全考核保障机制，强化支撑作用

过程性考核体系有效实施的前提就是有健全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根据翻转课堂线上线下融合的要求以及艺术课程的特点，完善线上学习资源，丰富微课、课件等资源的种类并提高质量，改进线下实践条件，合理规划实践场地，配备齐全的创作工具，满足不同艺术学科的教学和考核要求，为学生学习实践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搭建起功能完备的线上考核平台，对数据的记录、统计、分析功能加以完善，从而使得考核数据可以得到实时采集、准确统计，简化考核流程，提升考核效率和规范性，为考核体系有效实施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6]。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把过程性考核成绩和学生课程总成绩、评优评先、艺术实践推荐等挂钩，调动学生学习和参加考核的积极性；将考核实施情况与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挂钩，促使教师重视考核工作，主动改进考核方法，推动过程性考核体系落地完善。

五、结论

本研究把艺术课程审美性、实践性、创造性学科特点同翻转课堂“课前—课中—课后”教学逻辑结合起来，依照主体性、过程性、综合性、导向性原则，创建多元考核主体、细化考核内容、优化考核方式、制定明确考核标准，探寻强化理念引导、完善实施流程、优化反馈机制、健全保障机制的实践途径，探究艺术课程翻转课堂过程性考核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有效落地方法。实践表明，该考核体系的构建有利于解决传统终结性考核的弊端，发挥过程性考核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作用，促进学生艺术技能、审美素养、创新思维的提高，推动教师改进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为艺术课程翻转课堂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助力美育育人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李立红．“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大学艺术设计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J]. 美术教育研究，2021(19): 144−145.

[2] 范利阳．“翻转课堂”模式下的高职艺术类教学实践研究 [D].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2020.

[3] 宋书武，秦增梅，姜铁城．基于慕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设计 [J]. 黑龙江科学，2020, 11(13): 62−63.

[4] 陈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艺术设计课程教学策略研究 [J]. 科教导刊，2021(35): 135−137.

[5] 王晓彤，陈国栋．基于“超星学习通”的高校影视艺术类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J]. 文教资料，2019(10): 181−182.

[6] 郑燕琳．高校艺术类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析——以钢琴即兴伴奏教学为例 [J]. 明日风尚，2019(15): 95−96,104.

（作者单位：成都锦城学院）

体验式教学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袁涤繁

摘要：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面临实践导向性不足、师资专业化力量薄弱及教学模式固化等现实困境。体验式教学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高度契合高职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点，能激发学生学习主体性，培养学生心理调适和问题解决的能力。通过精细化设计“情境—体验—反思—应用”教学链，结构化重构课程目标、模块内容与评价体系，协同化完善师资队伍建设、资源配置与育人机制，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变，践行高职院校育人育心目标。

关键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职业分布、工作任务和就业技能构成[1]，许多生产服务一线的岗位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这一变革必然会深刻地影响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和身心健康状态。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心理育人的主阵地，经过多年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体验式教学作为一种强调情境互动与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逐渐成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运用体验式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质量，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必要的和可行的[2]。因此，本研究旨在结合现有理论框架与实证数据，分析体验式教学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价值与实施路径，以期为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一、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集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3]，目前已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成为“五位一体”心理育人新格局的有力支撑，但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课程的高质量发展。

（一）课程定位模糊，难以契合职业教育的实践特性

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要求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实践教学。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一些院校将课程简单等同于心理学知识普及，过度依赖理论教材，缺乏与高职学生校园生活、职业发展相衔接的教学设计，导致课程与学生实际需求脱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讲解，缺少有针对性的心理技能实操训练，使得学生陷入“知而不能行”的困境。同时，部分院校仅面向大一新生开设单学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未能形成贯穿学生三年学业周期的培养方案，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效果。

（二）师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教学实际需要

专业化师资队伍是保障“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高质量实施的核心，而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明显短板。首先，专职心理教师师生比普遍失衡，大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由辅导员或行政人员兼任。其次，专职心理教师要承担大量的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行政事务等工作，投入课程开发与教学研究的精力和时间有限。更为关键的是，师资队伍在专业发展方面缺乏系统性支持，接受的心理专业培训多为零散、表浅的学习，加之缺乏专业督导，教学实施效果欠佳，教学改革浮于表面，教师陷入专业发展的瓶颈。

（三）教学模式滞后，难以适配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

传统教学模式通常围着教师、教室和教材三个中心转[4]，因方法单一、内容固化、评价片面等问题，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与发展性需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学方法多停留在“教师讲”和“学生听”层面，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参与度低；其二，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材使用不规范，缺乏具有职教特色的本土化案例，教学针对性不足，学生获得感低；其三，教学评价方式陈旧，以考查知识为主，较少关

注学生在生活中的持续应用，导致学生仅仅完成课堂学习要求，课程内容没有迁移到日常生活，成为学完就丢的“季抛课”[5]。

二、体验式教学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价值

（一）契合高职学生学习特点，突出技能型人才培养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职业胜任力不仅包括专业技能，更包括情绪管理、团队协作等心理健康素养。体验式教学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团体活动等形式，将这些抽象的素质要求转化为可训练、可观察的行为目标。高职学生普遍对理论接受度有限，但动手能力强，传统“坐而论道”式的心理课堂易使其感到枯燥疏离，而体验式教学将理论置于可视、可感、可操作的活动之中，学生通过“做中学”“悟中学”，自然而然完成从心理知识到心理实践能力的过渡，实现心理健康素养与职业素养的双重提升。

（二）彰显学生主体地位，唤醒心理成长的内在动力

传统心理课堂上，学生常处于被动接收知识的状态，难以真正地自我探索并与内在联结。体验式教学通过重构师生关系，让学生成为课堂活动的中心。在心理剧、团体沙盘、角色扮演等活动中，学生深度参与体验，通过多方互动获得新的自我认知，比如在角色互换中理解他人，在团体反馈中审视自我。这种基于自主探索和积极体验的学习，将学习过程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学生为解决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会主动调用自身拥有的资源或寻找其他资源，而活动中的成功体验又会进一步激励学生继续探索，为学生的心理成长与全面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三）强化心理实践能力，提升课程的实效性与吸引力

体验式教学的优势在于将学习任务锚定于三步：实践、理解与迁移。相较于传统的讲授法，体验式教学更主张通过对情境的感知，将体验感受整合为情感、认知和行为的统一体。教师设计源于真实校园生活与未来职场生活的模拟情境，让学生在安全、信任、包容的课堂氛围中，练习情绪调节、人际沟通、压力应对等心理技能，并通过情景反馈与反思环节，梳理体验感受、总结实践经验，实现从“知道”到“做到”的转变。此外，丰富多彩的体验形式打破了传统心理课堂的“满堂灌”格局，既能够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吸引力，又能够让心理育人的效果落实到位。

三、体验式教学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体验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强调通过情境创设、参与引导、实践反思来培育学生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将体验式教学融入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需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从教学设计、实施路径、保障机制三方面发力，共同摆脱当前课程困境，提升育人实效。

（一）教学设计精细化：构建以体验为核心的教学闭环

1. 创设真实的心理情境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情境创设是体验式教学的起点与基础。情境设计需紧密贴合学生校园生活场景与未来职业场景，实现从抽象理论知识到具身感知经验的转化。一是还原校园生活中的典型心理冲突场景，如设计“寝室矛盾”情境；二是模拟针对授课专业的职业心理情境，如为轨道运营专业设计“轨道突发事件处理”情境。情境创设的复杂程度随课程的深入程度逐渐递进，从一开始提供结构化的脚本情境，逐步过渡到学生自己主导设计开放式情境，以适应不同心理基础、不同性格特征学生的参与需求。可以适度引入 VR、AR、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技术增强沉浸式体验感。

2. 引导学生参与和反思

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和反思是体验式教学中的关键部分。因为这关系到学生的情感共鸣是否被激发，从而促进知识的内化与迁移。教师在实施体验式教学时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结合破冰暖场活动，确保每位学生，特别是内向或参与意愿低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定位。反思环节利用好“情境重演”“感受等级表”“思维导图”等工具，引导学生梳理体验过程中的收获与问题，形成可视化、个性化的心理能力发展图谱。后续利用线上学习平台开展班级群内“分享打卡”，推动课堂体验向课外生活延伸，形成从体验到反思再到应用的完整教学链。

3. 教师及时反馈与总结

教师及时、专业的反馈与总结是实现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升华的保障，能帮助学生在师生、生生之间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思考，将零散的活动感受转化为系统性的认知。反馈通过描述行为、启发思考和积极赋能，聚焦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可观察行为与具体表现，避免空泛的评价。总结阶段则需进行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的提炼与整合，例如在情绪管理模块，师生可共同将活动收获凝练为“情绪词云”，手绘“情绪地图”，制作“情绪自助手册”等，提升学习成果的留存率。另外，反馈与总结都必须建立在心理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成长型思维话语体系，将短期的课堂体验转化为学生长期的行为改变。

（二）实施路径结构化：推动课程体系的整体转型

1. 融入课程标准与教学方案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改革的深化，需要立足顶层设计有序展开。在课程目标方面，将情绪管理能力、合作交流能力以及心理韧性等维度

作为体验式教学三维目标中的核心能力指标，明确各阶段的体验式教学要求。在教学方案方面，按照“先情境体验，后理论和行动”的顺序进行教学设计，循环式螺旋上升。每个教学主题设置相应的体验活动，营造温暖、互助的课堂氛围。邀请专业课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与心理教师共同开发具有专业特色的心理训练教学模块，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使心理健康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 构建模块化的进阶式教学内容体系

结合高职学生三年学业生活的阶段性特点，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进行重构，打造模块化、进阶式教学内容体系。三大模块分别为基础心理模块、进阶心理模块和实时心理模块。基础心理模块聚焦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技能与知识，涵盖自我意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内容，面向大一新生开设，奠定学生心理健康基础；进阶心理模块聚焦职业心理素质，结合不同专业群的职业特征，设计职业适应、团队协作、职业压力应对等内容，面向大二、大三学生开设，衔接学生顶岗实习与职业发展；实时心理模块聚焦学生实时心理状态，针对学业焦虑、就业迷茫等阶段性心理问题开展专题体验教学，课程内容动态调整。同时将课堂教学与社团活动、心理咨询、心理讲座等校园心理服务有机衔接，形成持续性的心理成长立体化支持网络。

3. 建立多元化发展性评价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习效果具有内隐性、滞后性和复杂性[6]。高职体验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需要突破传统的单一评价方式，建立以发展性评价为导向，全过程、多主体的教学评价体系。综合运用成长档案、情境测试、师生观察等评价工具，实现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因此在评价体系中要建立配套的动态反馈机制，借助数字化辅助分析手段，为学生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通过“以评促学、以评促长”，形成评价与教学的良性互动。

（三）保障机制协同化：夯实教学改革的基础

1. 加强师资队伍培训与支持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建设。体验式教学中，师生关系是“我—你”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精神的对话关系，是一种共同协作的关系[7]。因此，相应的师资培训也会区别于传统的理论研修模式，而是将工作坊、模拟演练和实践督导结合起来，重点提升教师的活动设计能力。同时，建立长效的同辈督导与专家督导机制，搭建交流平台，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讨论和解决在体验式教学中的实践难题，并建设教学资源库，开发智能工具包，根据不同教学主题匹配适合的体验活动方案，为教师教学实施提供专业支持。

2. 完善教学资源与场地配置

完善的教学资源与场地配置，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的物质基础。高职院校应结合体验式教学需求，加强专用场地与专业教具的建设。一方面，建设功能复合、灵活可变的活动专用场地，如团体辅导室、沙盘游戏室、心理剧活动室等，打造包容、安全、支持性的物理与心理空间；另一方面，配齐配全专业教具，如沙盘教具、心理剧道具、测评工具等，建立校内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3. 建立协同心理育人机制

为提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建立校内校外联动、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同心理育人机制，形成心理育人合力。在校内，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二级学院、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体系，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学生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在校外，建立校企协同与区域协同相结合的育人机制，一方面，引入企业资源，邀请企业导师参与课程设计，由企业提供真实的职业心理案例用于课堂情境模拟；另一方面，组建区域高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团队，弥补单个院校的资源不足，推动区域内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体验式教学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深度应用并非单一教学方法的迭代，而是一项涉及教学理念革新、课程体系重构、评价模式优化和保障机制完善的系统性改革工程。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体验式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赵洪山，郑永进．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学生就业技能提升研究 [J]. 教育与职业，2024(04): 92−96.

[2] 高飞．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体验式教学 [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91−95.

[3] 俞国良，黄潇潇．国家层面设置心理健康课程的实践与探索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06): 32−42.

[4] 李志义．“水课”与“金课”之我见 [J]. 中国大学教学，2018(12): 24−29.

[5] 乔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体验式教学改革研究——以山东科技大学为例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4(02): 113−117.

[6] 刘学兰，杨海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有效设计与实施 [J]. 中国德育，2023(11): 34−37.

[7] 辛继湘．教学价值的生命视野 [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7−17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重庆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研究与实践”（Z2241402）；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一般课题“五育并举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质量提升路径研究”（K23YG3230331）。

（作者单位：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高校立德树人理念的内涵与实施路径研究

秦二娟

摘要：本文聚焦高校立德树人理念及践行路径的研究，立德树人理念是新时期高校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其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当今教育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理念。文章对高校立德树人理念的历史渊源、主要内涵及其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高校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高校育人目标不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技能教育相分离、协同育人格局不合理、育人质量评估机制不合理等问题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并提出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理念的具体对策，即构建课程育人的双循环系统，搭建理实一体的实战育人平台，营造以文化人的育人氛围，构建“三全育人”协同机制，并赋能数字化育人、开展个性化德育培育。希望本文能够为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立德树人；高校教育改革；思政课程；教育评价

一、引言

在新的历史时期，立德树人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当今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培养具备良好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心的学生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主要方向。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关乎学生的自身成长，还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及和谐。怎样做到在教学中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培养，也是高校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教育教学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新时期的形势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并开展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是每一位教师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

二、立德树人理念的内涵

（一）立德树人理念的历史背景与发展

立德树人理念源自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观念，尤其是儒学思想中的“德”与“人”。儒家认为，人应该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的品德修养影响着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立德树人理念渐渐渗透进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中，在各个时代都有所体现和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各界对道德教育的关注提升，立德树人理念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发展要求，提出新时代大学应当重点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及社会责任意识，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立德树人理念的核心思想

立德树人的本质内涵是以德为先，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育有优秀品格、担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有为青年。道德是立德树人的基础，突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强化学生集体荣誉感及社会责任感。立德树人理念不仅对教师课堂教学传道解惑提出要求，更注重学生道德行为养成与健全人格培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积极的道德认知和自觉的伦理选择，塑造出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新人[1]。立德树人理念主张既要育人又要育才，倡导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如加强实践教学、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等，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使他们在将来的生活工作中能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与社会意义

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观在于其对于育人标准的整体性、前瞻性导向，它不仅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学习，更强调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这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恪守社会公序良俗，造就新一代德才兼备的新青年。从社会角度看，立德树人理念有利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具有良好德行的公民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社会法治文明建设作贡献。立德树人为学生

自身终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更加重视自身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意识以及团结协作精神。

三、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育人目标模糊，德育实效性不足

各高校开展立德树人工作时经常存在育人目标不清的情况。虽然大部分高校都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什么是立德树人、如何进行立德树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开展德育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路径。部分高校把“立德树人”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一句空话上，并没有制定详细的目标及相关的细则，使德育活动单一化、表面化，不能够触及学生的内心深处，这样就使德育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学生中也很难产生认同感以及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2]。此外，德育教育缺乏针对性与时代性，无法帮助学生解决在面对当今社会复杂多元的价值观时所产生的迷茫与矛盾，使德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并没有得到提高，降低了德育工作成效。

（二）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分离的现象，是当前普通高等院校立德树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很多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已经作为强制性课程开设的前提下，仍与专业课程相分隔，很难真正做到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上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仅限于独立的课堂讲授中，与专业教育缺乏必要的衔接。很多时候，思想政治教育都被认为是一种“附加课程”，其教学成效也就受课程安排与专业知识内容分离的影响。高校教学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忽略了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的专业化的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只能从专业课上获得技能知识，而缺少与其相适应的责任意识以及道德辨别能力。

（三）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

目前，高等院校开展立德树人工作的过程中缺少有效的协同育人体系，缺乏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密切协作，尽管高校在理论上十分重视协同育人的作用，在实践中，学校，家庭和社会处于割裂状态，不能有效协作起来。院校是德育工作开展的主要载体，家庭和社会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许多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成绩与就业前景，却不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尤其是经济状况比较落后的家庭，家长的思想观念淡薄，参与度不高，很少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正确的道德指导与行为约束。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志愿活动等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较少，很难实现全方位的德育培育[3]。这就造成了协同育人模式没能完全发挥功效，使得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习惯的培养缺少各方面全方位的支持与引导，降低了立德树人的成效。

（四）育人评价体系不够科学

现阶段高校在育人评价中存在不合理、不健全问题，传统的评价制度过分看重学习成绩，忽略了对学生德行教育、思想政治素养和责任感等层面的考核，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中往往根据考试分数和所学课程知识来进行评价，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成效不是单纯依靠考试能够评价出来的。由于缺少一套完整合理的多元化的道德教育指标体系，学校不能及时地了解学生在思想政治及责任感等方面的进步程度。许多高校欠缺对学生品行方面的量化考核标准，更缺乏针对个体的不同成长方向、不同发展需求的评价机制。目前所采用的这种较为片面单一的评价方式不能全面地体现出大学生的品行状况和综合能力水平，致使其品行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得不到真实体现。

四、高校立德树人理念的实施路径

（一）构建课程育人双轮驱动体系

双重驱动机制强调思政教育与学科知识教育相结合，在课程上，不仅要通过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更要扩展到各个学科，特别是专业课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行为准则等内容灌输到专业教学中，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价值观念及社会责任意识。双重驱动式的课程机制使学生们接受的不再是孤立的专业知识或者是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将二者融合起来，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使学生全面发展、德才兼备。同时课程育人的双重驱动机制也应当包含对教师的培养与引导，既要教会教师怎样传授专业知识，也要教会教师如何在课堂上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给学生[4]。大学需要探索更新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采用案例式、互动式、情景体验等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进一步加大课程思政力度，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健康的价值导向和社会责任感，进而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

（二）打造理实结合的实践育人平台

立德树人思想的落实除了理论的教育外还必须有理实一体化的平台以提升德育的效果。高校要通过实践育人平台让学生置身社会的真实环境中锻炼自己，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同时树立自己的社会责任观念及社会担当意识，实践平台建设的基础是课堂教学，以社会力量、校内外实验实训场所和志愿服务项目为依托，设计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创新实验等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自身集体主义意识和社会责任精神。同时高校应引导大学生开展学科交叉合作、社会实践服务等活动锻炼文化交流技巧及团队合作精神。此外，实践平台不仅有校外的实践活动更要注重校内的实践环节的设计，设计与专业知识内容相衔接的实验、实习、实训

等实践环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动手实践的机会。

（三）营造以文化人的育人环境

大学的育人氛围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贯彻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构建一种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和涵育道德品质的文化环境至关重要。大学应当通过完善校园文化、优化教书育人环境以及强化文化活动来进行大学生的浸润式思想道德教育。具体来说，学校可以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等各种资源，以文化节、报告会、展览等多种形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在校期间耳濡目染地受到文化的洗礼，提升自身文化自信心和社会使命感。同时高校还应该致力于构建相互尊重、宽容理解、和睦相处的人文环境，重视培育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意识，积极开展集体性、主题性的教育活动，增进学生间的沟通和联系，强化学生的归属感及社会责任感。校园不仅是传授知识、教授本领的地方，更是塑造思想、养成行为、引导价值追求的重要场所。

（四）建立“三全育人”协同机制

想要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全覆盖，构建“三全育人”协同机制势在必行。“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主要是指在学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学校与家庭以及学校与社会这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共同育人的方式方法。所谓全员育人就是要学校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起育人的职责，不论是专业课教师还是思政课教师都要在课堂上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给学生；全过程育人就是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在日常生活点滴之中乃至社会实践活动中都要将德育的因素渗透进去，使德育教育伴随学生整个大学生涯；全方位育人就需要将各方面资源进行综合运用，从课程教学、实践活动到校园文化，以及评价考核等各个方面共同推进，让育人工作系统化、整体化[5]。同时，学校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组织制度来推进各部门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使得学校的德育工作可以做到无缝对接、环环相扣。在此基础之上，学校还可以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各界及家长之间的联系协作，从而达到家校社三位一体共建共育的效果。

（五）赋能数字化育人，开展个性化德育培育

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背景下，高校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线上德育阵地，将思政课程、红色文化与典型育人案例有机整合，打造灵活适配的学习场景。平台通过多维度数据感知学生思想动态与行为表现，精准识别成长需求与现实困惑，让德育工作从传统统一供给转向精准适配，真正实现个性化、精细化的价值引领与人格培育。

高校在德育实施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差异、年级特点与个性特征，采用梯度递进、分类施策的培养思路，告别单一化的教育方式。根据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需求，分别聚焦适应教育、价值养成、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感，让德育内容与学生的成长节奏、发展诉求高度契合，真正做到精准引导、按需育人。

五、结语

通过打造双轮驱动课程体系、搭建实践育人大平台、创设文化育人生态圈、健全协同育人共同体、赋能数字化育人等方式，可推动立德树人的理念在大学教育中得到落实。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育人方向不清、思想政治教育同专业课相分离等情况。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建设、教育教学形式手段以及资源统筹利用上继续进行探索和尝试。相信在未来随着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立德树人的理念能够更好地渗透到大学教育当中，促进大学生的成长，同时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 周宇，张旭．立德树人理念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 [J]. 新丝路，2026(02): 138−140.

[2] 李轩轩．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传统体育课程思政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J]. 当代体育科技，2025, 15(07): 130−133, 137.

[3] 孙韵桐，兰天达．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的高校“双创”课堂实践教学路径研究 [J]. 品位·经典，2025(17): 146−148.

[4] 王颖．立德树人理念下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价值与践行路径 [J].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23, 42(05): 64−68.

[5] 罗茂，刘萍．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5, 33(10): 146−149, 16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对初中学生开展德育工作的创新路径研究

陶玉林

摘要：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快速发展、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全面加强德育不仅能够帮助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德育不仅关系学生个体的成长成才，更对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基于初中阶段德育的高质量实施，能够帮助学生学会明辨是非，使其在成长路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份贡献。目前，初中德育工作实施过程正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德育内容僵化、德育方式单一、协同育人机制缺失、教师德育能力不足等方面。全面开展对初中学生的德育工作应当打破传统模式限制，做到优化德育内容，创新德育方法，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教师德育能力，推动德育工作提质增效。

关键词：初中学生；德育；创新路径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德育在初中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在日益凸显，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初中教育教学工作中，应当准确把握德育的独特价值，通过德育理念的融合渗透，帮助学生塑造正确价值观念，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驾护航。目前，德育在初中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开展德育工作的呼声愈发高涨，教师应当明确初中生学习和成长的真实情况，对德育活动设计与实施提出更高要求，将丰富的德育元素融入初中生成长成才的方方面面[1]，为保障初中生认知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当前初中学生德育工作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在传统德育模式下，活动形式单一和资源整合不足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教师应当准确把握学生发展需求，积极改进指导策略，将高质量的德育活动落到实处，切实推动学生德育品质的全方位培育。本文就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了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有效创新策略，以供参考。

一、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初中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开展德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初中生正处于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通过积极开展德育，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道德规范，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达到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目的。在价值观塑造方面，基于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创新实施，教师能够通过德育方式的不断优化，为学生德育品质培养提供全面支持，帮助学生正确分辨是非善恶，增强学生的自我约束意识[2]。例如，在德育中，通过有效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帮助学生明确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树立远大理想抱负，积极应对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与困难。

（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从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各界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除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外，同样也对道德素养提出更高要求，通过初中阶段德育的高质量实施，能够帮助学生增强综合竞争力[3]，为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提供有力支撑。初中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道德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大力开展德育的情况下，学生能够以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回馈社会，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同时，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自身力量。

（三）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从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基于德育搭建的平台，教师能够将传统美德与德育有机结合，在此情况下，帮助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引领学生肩负起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4]。目前初中学生德育工作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大力推进德育模式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借助德育活动带来的影响，初中生能够深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激发

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为树立文化自信奠定基础。

二、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现实问题

（一）德育内容僵化

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部分教师在初中生德育工作中存在教育内容缺乏有效拓展的问题，教师过分注重基本的德育理论指导，忽略了生活元素的融合与应用，导致德育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这是影响学生德育体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对学生德育品质培育产生一定的阻碍和干扰。实际上，许多教师在德育活动设计与实施方面未能准确把握学生的现实需求，在德育内容的选择上过于片面，比如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仅仅停留在讲述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忽略了如何将德育理念与日常生活相结合。面对这样的情况，学生德育体验不够深刻，很难真正理解德育的深层次内涵与价值，最终导致初中生德育工作难以全方位落实[5]。

（二）德育方式单一

从德育方法选择的角度来看，目前部分教师对德育方法创新缺乏足够关注，在德育活动实施环节，以讲解说教为主要形式，对学生进行指导，忽略了学生在德育活动中的主动参与和深层次探究。在此情况下，德育实践应用效果和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学生在德育方面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实际上，传统的德育方式，过分注重教师的主导地位，忽视学生的主体价值，再加上德育形式相对单一[6]，导致学生在接触德育活动时积极性较为薄弱，很难做到主动积极融入德育。长此以往，初中学生德育工作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干扰，德育在初中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三）协同育人机制缺失

协同育人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更加注重学生在德育活动中的自主参与，目前部分教师对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未能有效推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导致协同育人作用缺失，这是影响学生德育体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对学生价值观塑造产生不良影响。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部分家长对德育缺乏应有的重视，未能充分配合教师开展德育工作，导致学生缺乏良好的德育成长环境，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如在社会资源方面，社会各界对德育的参与程度较低，再加上学校在社会资源开发方面针对性不强，导致德育工作的拓展不足，不利于学生德育体验的持续深化[7]。

（四）教师德育能力不足

教师是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组织者，也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其德育能力直接影响德育工作的实施效果。目前部分教师对德育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表现出的德育能力不足，是影响初中学生德育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德育理念的影响下，部分教师对德育的关注程度相对有限，未能充分认识到德育对初中生成长的重要作用，虽然能够积极开展德育活动，但是在德育经验积累和具体实践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此外，部分教师缺乏自我发展的意识，面对初中学生德育工作改革的实际需要，教师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没有做到积极学习德育先进理念，导致后续初中学生德育工作实施效果无法满足预期。

三、初中学生德育工作的创新路径研究

（一）优化德育内容

全面优化德育内容是丰富学生德育体验的重要途径。结合现阶段初中学生德育实施情况，应当积极推动德育内容的整合与优化，一方面尊重学生认知规律，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生活元素的应用，为强化初中学生德育工作提供支持，确保德育内容的与时俱进[8]。

德育内容开发应当与学生年龄特点及身心发展规律相匹配，坚持因材施教原则，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德育需求调整德育内容。具体而言，针对初一学生的德育内容，应当着重于行为习惯养成，在日常行为规范的学习与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文明礼仪习惯。针对初二学生的德育内容，应当关注其自我意识发展情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现象，通过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在初三年级学生的德育内容选择方面，需要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规划教育，关注学生发展需求，引领学生了解社会不同职业的特点，为明确职业方向奠定基础。

从德育生活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应当积极挖掘和利用生活化德育元素，将贴近学生日常生活和校园生活的德育元素呈现在学生面前，既要体现德育本身的特点，同时也要与学生发展规律相匹配，确保德育更加全面多元，为推动学生德育体验与认知持续深入提供支持。现阶段初中学生德育改革要求不断提高，教师应当对生活中的德育案例和现象进行分析梳理，将社会热点事件融入德育，通过这样的方式引领学生关注身边的社会现象，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二）创新德育方法

全面创新德育方式是增强学生德育体验的关键，因此需要将学生的真实需求与德育相结合，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德育内容，着重推进情境教学法的应用，基于真实情境引发学生的思考，同时也要注重小组合作学习的创新实施，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

运用情境教学法是帮助学生强化德育体验的关键举措。教师应当基于创设情境的方式，引导学生对德育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在课堂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学生展示德育相关的素材，借助图片和视频材料，调动学生视觉与听觉。在此情况下增强学生的德育体验，通过真实情境的还原，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从而丰富学生的德育情感体验。比如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可以通过德育的创新实施，引领学生感受浓厚的爱国情感，在亲身体验和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达到情境

创设的预期效果。

从小组合作学习的角度来看，教师应当积极推进小组合作探究活动的顺利实施，在小组合作中创造开放的学习平台和发展空间，一方面要联系学生学习需求，打破传统模式限制，另一方面也要创新指导策略，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引领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德育观念。教师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围绕德育主题进行互动讨论，在合作探究中促进学生德育体验的进一步深化，为增强学生德育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三）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是保障德育高质量实施的关键，同时也是营造良好德育氛围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从家校社合作的视角出发，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在帮助学生培养良好德育品质的过程中，真正做好各类资源的优化应用，确保学生能够始终处于良好的德育环境中。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是协同育人的重要举措，因此需要从德育实施需求出发，拉近家长和教师之间的距离，通过双方协同配合，有效推动德育活动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家庭德育环境。教师应当利用数字信息平台与家长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将学生的德育情况作为家校合作的沟通重点，一方面提升家长对德育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应组织不同类型的家庭德育活动，为家庭教育中的德育渗透提供支持，有效解决初中学生德育工作方面的现实问题。

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看，则需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比如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通过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博物馆，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全面深入推进社会资源整合，应当考虑到本地区独有的德育资源，在与社会机构的合作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搭建实践平台，确保初中生德育体验进一步深化，为协同育人的全方位落实提供支持。

（四）提升教师德育能力

全面提高教师德育能力是推动初中生德育工作高质量实施的基础保障，因此需要格外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价值，根据当前初中学生德育工作实施情况和重点对德育能力素质提出较高要求，在德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完善培训体系，形成系统的考核激励机制，确保教师德育水平不断提高。

学校应当积极组织开展德育专项培训活动，将先进德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作为教师培训的重点，帮助教师掌握学科知识与德育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情况下，保障德育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活动实施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在教师培训方式的选择上，需要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协同机制，搭建线上学习平台，创新线下培训策略，以保证教师德育能力的全面强化。

在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方面，需要建立起系统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针对教师德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并形成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开展德育工作的积极性，确保教师能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德育工作，为助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语

总而言之，全面加强初中学生德育工作是保障初中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前提。根据当前初中学生德育工作实施情况，应当积极打破传统模式限制，对德育内容进行全面整合，对德育方法作出创新，将丰富的德育元素与初中生学习发展相适应，让行之有效的德育实践成为初中生综合素质持续提升的强大推动力。同时，需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作用，提升教师德育能力，破解德育工作中的现实难题，推动初中德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邱侃，唐晓红．“仁爱”思想渗透下的初中学校德育实践探索 [J]. 初中生世界，2025(44): 39−40.

[2] 黄秀静．初中班级管理中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融合的有效路径探析 [J]. 文理导航（上旬），2025(11): 76−78.

[3] 刘海彬．打造初中特色德育品牌的探索与实践——以杭州市文晖中学为例 [J]. 教育文汇，2025(10): 27−29, 72.

[4] 吉红兰．立德树人背景下初中信息科技教学德育渗透策略研究——以苏科版七年级上册教材为例 [J]. 教育，2025(30): 7−9.

[5] 郭新军，张海燕．体验式随笔写作在初中德育中的转化作用——基于“追梦”主题班会的实践研究 [J]. 当代教育家，2025(20): 42−43.

[6] 黄真．德心共生：初中班主任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行动研究 [J]. 中小学班主任，2025(19): 82−84.

[7] 梁辰．心育赋能·德育铸魂——初中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体系建构与实践 [J]. 当代教育家，2025(19): 33−35.

[8] 孙克军．浸润式教学在初中体育德育渗透中的实践机制研究 [J]. 体育风尚，2025(18): 104−106.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海林市第二中学）

正念教养视角下小学生行为发展的促进机制研究

谢怡晴 黄栩琳 曹　贝 林晓彤 洪紫静 *

摘要：小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与社会适应的关键期，行为习惯、情绪调控及社会交往能力是其终身发展的根基，正念教养作为融合正念理念与亲子互动的新型模式，有别于传统教养，可为其行为发展提供支撑，目前研究多聚焦二者相关性，对内在促进机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本研究结合小学生人格塑造与社会适应关键期的身心特质，聚焦正念教养对其行为发展的深层影响，搭建二者整合性机制模型，剖析核心维度内在关联与作用路径并提出可落地策略，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家长教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小学生积极行为培育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正念教养；小学生；行为发展；促进机制

一、引言

小学为儿童行为发展的塑形阶段，该阶段学生行为逐渐由生理本能驱动转为心理意识驱动，从被动服从转变为主动探索，且逐步形成了稳定的行为习惯、情绪表达、社会交往模式，在终身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当前社会节奏加快、教育竞争加剧，不少家长的教养陷入焦虑功利状态，过度关注小学生学业成绩而忽视行为素养培育，部分家长采用批评指责、过度控制或放任等不当方式，导致小学生出现情绪易激动、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与终身发展。

正念教养的核心，是父母在教养小学生的过程中，觉察自身情绪与想法、留意孩子行为表现，以无评判的包容心接纳孩子身心特点，在共情理解的基础上平和开展亲子互动，最终实现亲子双向成长[2]。正念育儿为父母教育孩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提倡对当下的自己和孩子抱着不加批判、极其开放的态度。正念养育被广泛定义为在养育者与孩子互动的背景下培养日常的情感。正念教养可正向影响小学生的积极行为，改善其情绪调节、注意力集中及社会适应能力，但现有研究中，尚未对促进小学生行为发展的内在逻辑、核心路径、深层机制进行梳理，进而影响实际培育价值。

结合正念教养核心要义与小学生行为发展阶段特质，本研究深入剖析正念教养影响小学生行为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科学完整的整合机制模型并提炼可落地的实践方法，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家长、学校及社会开展小学生行为培育工作提供新方向，助力其养成积极健康的行为习惯。

二、正念教养视角下小学生行为发展的促进机制

（一）情绪传导机制

情绪是驱动小学生行为的核心心理因素，其行为表现与自身情绪状态高度关联，父母的情绪起伏及表达方式会通过日常亲子互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并形成情绪共鸣，正念教养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引导父母觉察并调控自身情绪，实现亲子积极情绪双向传递，助力小学生塑造正向情绪行为模式[3]。

正念教养实践中，父母通过主动自我觉察可及时捕捉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并借助深呼吸、当下专注等正念练习实现有效调控，避免情绪传导至孩子；小学生则会在日常亲子相处中，通过镜像神经元作用无意识模仿父母的情绪调控方式，逐步学会感知与觉察自身情绪状态。正念教养是小学生情绪引导的关键，父母在面对孩子情绪时避免评判指责、生硬说教，采用共情心态接纳、理解、尊重孩子，让孩子明确情绪来源，逐步学会正视、接纳、合理梳理自身情绪。

正念教养强调的“当下共处”，核心是父母陪伴小学生时放下杂念、全身心投入互动，摒弃功利化期待与控制执念，以温和沉稳的情绪开展亲子沟通，这种积极氛围能切实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有效减少其焦虑、恐惧等情绪的滋生与扩散。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参与正念互动的小学生，其负责恐惧与压力反应的杏仁核过度活跃可得到改善，主导情绪调控的前额叶皮层能充分发育，进而养成情绪觉察、接纳与调控能力，表现为情绪表达温和、尊重他人情绪，这与“正念练习可提升儿童情绪智力及人际正念”的实证结论高度呼应。

（二）认知引导机制

小学阶段儿童认知仍处于具象化、片面化层面，这种认知局限易引发认知偏差及各类消极行为；正念教养的核心在于通过科学认知引导，帮助父母完善教养认知，再循序渐进引导小学生改善认知模式、修正偏差，最终培育其积极正向的认知与行为习惯[3]。

从父母教养实践来看，正念教养可帮助家长优化教养认知，摒弃单纯以学业成绩评价孩子的模式，更注重小学生行为素养培育与内在心理需求满足，放下绝对化评价，以发展视角看待孩子行为、理解其成长规律与个体差异，其理性温和的教养心态会转化为正向教养行为，为小学生认知发展做好示范、筑牢基础。

从小学生自身发展视角来看，父母通过正念教养的认知引导，可助力其优化认知方式：遭遇困难挫折时引导其专注当下过程而非纠结结果，出现认知偏差时教会其多角度审视问题，发现自身不足时引导其接纳不完美并树立改进意识，进而培育其全面、理性、积极的认知能力。

正念教养中“当下专注”核心为父母在陪伴小学生的过程中，引导其全身心投入到当下场景中，避免分心，专注训练可提升小学生的注意力，促进认知能力发展。有关研究表明，小学生进行四周的正念练习，可显著提升注意力、人际正念水平，且部分积极成效具有长效性，长期练习可帮助其养成专注理性的认知习惯，增强学习专注度与主动探索意愿。

（三）关系建构机制

小学生行为发展受亲子关系影响较大，亲子互动融洽可给予小学生心理安全感、情感归属感，奠定积极行为的发展基础，正念教养通过亲子双向滋养、正向沟通构建平等包容、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促进小学生积极行为的长效发展[4]。

正念教养核心为共情、尊重，父母在教养过程中需立足小学生视角，解读其行为的真实心理诉求，尊重小学生的想法、选择，避免强迫控制式教养，使小学生感受到被重视，强化自我认同感与自信心。正念教养还可帮助父母完成自我觉察、成长，提升其情绪控制水平、教养能力，在陪伴小学生时采用积极的状态，以身作则为小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促进成长，形成亲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正念教养可提升亲子沟通的温度与效率，父母以平和心态倾听小学生的想法，鼓励其主动表达自身感受，杜绝随意打断与否定行为，这种安全包容的沟通氛围能推动小学生主动倾诉，有效减少亲子间的矛盾与冲突，助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良好的亲子沟通可使父母及时捕捉小学生的行为诉求与心理动态，适时提供科学引导与情感支撑，同时让小学生切实感知父母的关爱，逐步强化自身心理安全感与情感归属感，为其行为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正念教养的核心不在于亲子相处时长，而在于相处质量，其要求父母陪伴小学生时全身心投入当下，避免手机、工作等外界干扰，通过读书、玩游戏、做家务等日常互动，以专注陪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亲子联结，体现其培育亲子关系的科学价值。已有研究表明，正念教养可精准对接小学生自主、关爱与能力层面的核心心理需求，通过优化亲子互动、拉近亲子心理距离，为其身心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小学生逐步养成乐于交往、善于协作、自信豁达的积极行为特质[5]。

（四）行为强化机制

小学生行为发展可塑性较强，积极行为培育需持续正向引导，正念教养采用科学正向的激励模式，及时合理肯定并鼓励小学生的积极行为，强化其积极行为模式，助力其养成稳定且可持续的积极行为习惯。

与传统教养中批评惩罚模式相比，正念教养注重正向强化、科学引导，父母在陪伴小学生的过程中，及时肯定小学生的积极行为，给予口头表扬、肢体关怀、实际支持，使其明确自身积极行为的价值，进而强化行为践行的主动性、持续性。正念教养模式在面对消极行为时，避免了批评、指责、惩罚等方式，主要采用无评判的包容态度接纳其行为，引导小学生分析行为发生的原因，明确不足之处，进行改正，体现出教养的温度、专业性[6]。

正念教养强调教养行为的一致性，要求父母引导小学生时，自身行为与教养标准高度契合、杜绝双重标准，助力孩子明确行为边界、树立规则意识，进而自觉恪守规则、稳固积极行为模式。正念教养的正向强化并非无原则盲目夸赞或单纯物质奖励，而是结合小学生实际行为客观理性地给予肯定，不夸大不敷衍，规避过度表扬引发的不良心态，贴合其成长规律，可有效巩固积极行为、助力正向行为模式建立。

三、正念教养促进小学生行为发展的实践策略

（一）家长层面

家长作为正念教养的核心践行者，其教养理念的科学性与教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正念教养的落地成效，影响小学生行为发展方向，因此家长需主动践行正念教养，提升自身教育素养以适应孩子成长需求。践行正念教养需树立科学的教养观念，避免出现教养功利化、绝对化，以系统培育小学生行为素养、合理满足心理需求为核心，与小学生相处时采用无评判、共情、尊重的态度，并强化自身觉察、情绪调控，坚持进行正念练习，提升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避免出现不当的教养行为，积极促进小学生正向行为的发展；正念教养的核心环节为优化亲子沟通，家长避免权威姿态，采用温和平等的态度了解小学生想法，鼓励其坦诚表达自身想法、情绪，并及时回应心理诉求，减少亲子矛盾；精准捕捉其积极行为并给予合理肯定，引导其修正不足、巩固正向行为习惯，且自身需做好言行示范，以一致的教养言行为孩子树立可参

照的榜样。

家长可结合小学生年级特点设计针对性正念亲子练习，低年级适配“呼吸小超人”“感官探险家”等兼具趣味性与引导性的正念游戏，中高年级可推行正念冥想、情绪日记等贴合其认知水平的练习，将正念教养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切实提升教养实效性[7]。

（二）学校层面

学校作为小学生行为培育的核心阵地，在正念教养实施中占据关键地位，应充分发挥教育主导作用，搭建适配小学生身心成长特点的正念教育平台，主动联动家长，凝聚家校教养合力，扎实推动正念教养落地见效，助力小学生逐步养成正向行为习惯、实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小学生心理健康课程融入正念教育，需依据身心发展规律设计正念呼吸、专注倾听、情绪觉察等适配性内容，通过课堂讲授、小组互动、趣味实践帮助小学生掌握正念核心技巧，提升情绪控制能力、注意力、自我管理能力，帮助其身心健康发展；组织家长参与正念教养培训，并定期组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正念练习工作坊，邀请专家学者拆解正念教养的核心理念、实操技巧，帮助家长提升教养能力、主动践行正念教养；紧密贴合小学生教育实际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班级交流群等渠道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动，实时反馈小学生的日常行为，引导家长、学校形成教育共识、协同发力，共同培育小学生行为，强化家校共育基础。教师需提升正念素养，参与系统化培训，增强教师的情绪调控、正念教学能力，使其在日常教学及班级管理中以正念思维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养成积极正向的行为习惯。

（三）社会层面

社会环境深刻影响小学生行为发展，需营造适配正念教养的良好氛围，为家长践行正念教养提供多元支持，筑牢小学生积极行为培育的外部基础。加大正念教养宣传力度，依托媒体、网络、社区等多元途径，普及其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与实践价值，引导社会树立科学教养观念、摒弃不当教养模式，营造关爱儿童的良好社会环境；需完善正念教养社会支持体系，引导各类社会机构参与其中，开展正念教养相关咨询、培训与辅导服务，为家长提供贴合实际的专业教养指导以破解教养困惑；搭建专属交流平台，促进家长、教师与专家互通实践案例、探讨实操方法，推动正念教养落地普及；应注重各类社会资源的系统整合，联合社区服务中心、公益组织及科研机构等主体，有序开展正念教育公益宣讲与实操指导活动，为家庭和学校精准提供优质正念教育资源，助力小学生积极行为培育及身心良性发展。

社会层面需加大对正念教养领域的研究扶持力度，引导科研机构沉下心聚焦正念教养与小学生行为发展的核心内在关联展开深度钻研，积淀兼具实用性与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完善理论体系，为正念教养的落地应用筑牢科学坚实的理论根基，推动其模式持续优化并精准贴合实际教育需求。

四、结语

结合小学生行为发展的阶段特性与可塑造空间，本文从正念教养视角切入，深入探究其通过情绪传导、认知引导、关系建构与行为强化的协同作用，影响小学生行为正向发展的内在机理，构建相应促进机制模型并提炼可落地的实践方法，以此丰富正念教养相关理论，为解决小学生行为培育中的实际问题、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思，穆蔚琦，周明洁，等．父母正念养育、教养压力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 [J]. 四川精神卫生，2024, 37(03): 237−242.

[2] 高雯，阎琳琳，申奥文．正念教养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3 种父母情绪调节策略的不同作用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47(03): 91−98.

[3] 周晖，陈晓，范林林，等．正念教养干预在中国家长中的应用：可行性及有效性探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 26(03): 615−619, 574.

[4] 吕悦华，葛振斌，李洪玉．正念养育与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间的关系 [J]. 校园心理，2024, 22(06): 488−490.

[5] 余必如．父母正念教养与中学生社会情绪能力的关系：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J]. 课堂内外（初中版），2025(19): 178−181.

[6] 李丹，王玉正，罗非．正念教养与青少年创造力：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 31(04): 557−561.

[7] 刘冠辰，王玉正，王锦琰，等．正念教养与青少年身心健康：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 30(05): 730−736.

（作者：谢怡晴、黄栩琳、曹贝、林晓彤，广州华商学院本科生；通信作者洪紫静，广州华商学院讲师）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培养探讨

李新国

摘要：情绪弹性对于高职学生而言，是在面对多种压力与挑战时，维持心理稳定并积极应对的关键能力。高职学生通过提高自我意识以及情绪认知能力，培养积极的情绪解释风格，以及系统的情绪调节技能，可提升情绪管理以及应对能力。家庭、学校和社区构建的多层次支持网络，以及团体心理辅导与朋友互助，可为高职学生提供丰富的情感支持以及实际帮助。整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把情绪弹性培养融入课程体系，通过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育实效，为高职学生学业与生活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法，为高职学生在多变环境中实现自我超越与幸福生活提供强大动力。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高职学生；情绪弹性

在如今社会快速发展且多重压力同时存在的状况下，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面临着突出的心理适应方面的挑战以及情绪波动方面的问题，而情绪弹性作为个体心理韧性的关键要素，对学生应对学业压力、职业发展困境以及生活适应问题有着关键的调节作用。依据积极心理学理论框架，全面剖析情绪弹性的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影响因素，并且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培养机制来强化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社会支持系统，这样做既可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还可以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对情绪弹性影响因素及其培养路径展开深入研究，将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推动具有创新性和系统性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案的实施。

一、情绪弹性在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一）提升抗压能力

情绪弹性对高职学生抗压能力的提升有着关键作用。首先，它可使高职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维持心理平衡，当遭遇考试失利、作业量大、实习遇到问题等学习方面的困难时，具有较强情绪弹性的学生可快速调整心态，把挫折当作成长的机遇，还能主动探寻有效的应对办法。其次，在日常生活当中，情绪弹性较强的学生更擅长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以及不确定性[1]。他们可以冷静地剖析问题，理性地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案，维持情绪的稳定，防止陷入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之中，这种能力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恢复力。最后，情绪弹性的提升还可提高高职学生对负面情绪的耐受程度，使他们在高压环境下依旧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会被暂时的困难打倒，反而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逐步构建起更为健康且稳定的心理状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心理根基。

（二）增强自我认知

情绪弹性对于提升高职学生的自我认知有着关键的影响。一方面，拥有良好情绪弹性的高职学生，可精准地识别以及理解自身的情绪状态，他们擅长察觉内心的情感变化，知晓情绪波动的缘由，并且可以客观地评估自己在不同情境之下的情绪反应模式，这种深入的自我觉察能力，会让他们更易于接纳自身的情感体验，形成健康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情绪弹性较强的学生，一般对自身的能力边界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们可准确地评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变得盲目自大，也不会因为短暂的失败就对自我进行全盘否定，这种平衡的自我认知，可以使他们制定合理的目标以及发展规划。除此之外，良好的情绪弹性还可以帮助高职学生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让他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保持自信，坚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实现个人成长[2]。这种建设性的自我认知，为他们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三）改善人际关系

情绪弹性对于高职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善有着重要意义。一是拥有良好情绪弹性的高职学生在人际交往时会呈现出更强的共情能力，他们可以敏锐察觉并理解他人的情感状况，在和同学、教师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恰当的情感回应，切实推动交流朝着更深层次和更高质量发展[3]。二是这类学生面对人际冲突时大多时候能采取更成熟的处理方式，他们擅长控制自身的情

绪反应，不会因一时冲动而做出破坏关系的举动，而是借助理性沟通与积极协商来化解矛盾，维持关系的稳定。三是情绪弹性较强的高职学生更易于在团体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可精准把握团队氛围，适时调整自身的言谈举止，在团队中贡献个人力量，又能与他人融洽相处。这种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为他们构建广泛稳固的社交网络打下了基础。

（四）促进职业发展

情绪弹性对于高职学生职业发展过程而言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良好的情绪弹性可以帮助高职学生在就业准备阶段维持积极的心态，使其可以科学地评估就业形势，合理地规划职业路径，即使面对就业压力，也依旧可以保持信心与耐心，不会轻易放弃理想的工作机会。其次，当高职学生进入职场之后，有较强情绪弹性的毕业生会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他们能冷静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不管是繁重的工作任务还是复杂的人际关系，都可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并解决，这种适应能力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情绪弹性较强的职场新人大多时候会呈现出更强的职业成长潜力，他们善于从工作挫折当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保持持续学习的动力，并且在压力之下不断提升专业能力。这些优势让他们在职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长远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内在因素

个体内在特质在高职学生情绪弹性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情绪弹性是个体在应对压力情境时所呈现出的心理适应能力，其发展受到自我认知系统以及情绪调节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展开来说，自我意识构建起了情绪弹性的认知基础，这种心理特质让个体可以对自身的存在状态以及情绪变化始终保持觉察[4]。拥有良好自我意识的高职学生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可以及时识别负面情绪状态，还可以依据对自身情感体验的准确理解采取适应性应对策略。情绪认知作为自我意识的关键维度，其本质是个体对情绪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能力，高职学生若有较高的情绪认知水平，往往可以深入剖析情绪诱因，在情绪管理与调节方面呈现出优势。

（二）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塑造高职学生的情绪弹性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家庭教育环境会直接对高职学生的情绪发展产生影响，一个充满温暖且具有包容性的家庭氛围，可为学生提供情感方面的支持以及心理上的慰藉，父母所采用的情绪管理方式以及应对压力时所持的态度，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子女情绪弹性的培养造成影响。学校作为高职学生主要的学习与生活场所，其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以及心理健康服务，均会对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产生深刻作用，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以及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都可帮助学生构建起健康的情绪管理机制。同伴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同样会对高职学生的情绪弹性产生关键影响。积极向上的朋友互动、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支持，可为学生提供情感上的依托以及实际的帮助，提高他们应对压力与挑战的能力。

（三）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对高职院校学生情绪弹性的形成有着关键影响。其中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以及文化背景对情绪表达规范的塑造颇为关键，这两个核心要素和学生的自我认同、情绪调节能力紧密相连，还会借助复杂的心理机制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适应能力。展开来说，如果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系统性偏见，这种负面评价或许会致使学生出现自我贬低倾向，降低其应对外部压力的心理韧性。某些文化传统把情感外露当作不成熟的表现，这种社会期待会促使个体运用情感抑制策略来契合社会规范。这些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会通过内化过程，悄然塑造学生的日常行为模式与情绪应对策略，对其情绪弹性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培养策略

（一）深化认知水平，提升调节能力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培养高职学生情绪弹性，提升其认知水平以及提升调节能力是关键策略。在培养过程中可通过开展系统情绪认知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情绪识别技能。比如借助情绪日记记录法，引导学生每日记录自身情绪变化及其诱因，培养他们对情绪的敏感度与觉察能力；利用情绪地图绘制练习，协助学生直观理解不同情绪间的关联和转化规律。提升高职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也十分关键，可采用渐进式放松训练、呼吸调节等具体技巧，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调节负面情绪的方法。比如开展情绪调节训练营，通过角色扮演与情境模拟，让学生在压力情境中练习运用这些技巧。另外，还需帮助学生建立积极认知模式，可借助认知重构训练，帮助他们学会以更理性且具有建设性的方式解读生活中的各类事件。定期组织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分享成功情绪管理经验，让学生在交流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情绪认知与调节水平。

（二）优化性格特征，增强心理韧性

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出，优化性格特点以及提高心理韧性对于提升高职学生情绪弹性有着关键意义。可通过开展性格优势探索活动，帮助学生发掘并培育自身的积极品质。比如设计“性格优势卡片”游戏，让学生从中挑选最能代表自己的特质，并且分享运用这些优势战胜困难的经历，以此提高自信心与应对挑战的勇气。可凭借心理韧性培训项目来提高学生的抗压

能力，具体而言可以开展挫折耐受力训练营，通过设置适度的挑战性任务，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会能战胜困难的成就感，逐步提升心理承受能力。同时要重视培养学生乐观积极的心理品质，可通过开展感恩日记活动，引导学生每日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培育积极的生活态度，也可组织“成长故事分享会”，邀请优秀毕业生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激发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高面对困境时的心理韧性。

（三）完善家庭功能，强化亲子互动

完善家庭功能和强化亲子互动是培养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关键路径。其一，需构建健康的家庭沟通机制，学校可定期举办“亲情对话日”活动，邀请家长与学生一同参与，借助结构化的对话练习，帮助双方掌握积极的沟通技巧，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例如设置“情绪分享角”，鼓励家庭成员定期分享各自的情绪体验和困扰。其二，要提高家长的情绪教育能力，可组织“家长成长营”，依靠专业讲座、案例分析和互动工作坊等形式，协助家长了解青春期子女的心理特点，掌握情绪支持的方法，比如开展“家庭情绪管理示范课”，让家长学习怎样在日常生活中示范并引导积极的情绪表达方式。其三，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支持环境，可开展“亲子共成长”项目，设计一系列家庭互动活动，如周末亲子运动会、家庭读书会等，通过共同参与和体验，增进情感联结，营造温暖支持的家庭氛围，为高职学生的情绪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四）改善教育环境，落实支持机制

学校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支持机制的落实，对于培养高职学生情绪弹性而言意义重大。高校需要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把情绪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当中，例如在公共课程里设置“情绪管理与职业发展”模块，借助案例教学、情境模拟等方法，帮助学生掌握职场情绪管理技能，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团队协作项目，培养学生在专业实践中的情绪调控能力。还要完善心理支持服务机制，搭建多层次的心理辅导网络，可以设立心理成长工作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个别化的情绪辅导服务；组建朋辈心理互助团，培训学生心理委员，开展朋辈心理支持活动。另外，学校还应当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可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节”“情绪管理大赛”等主题活动，通过艺术表演、体育竞技、创意展示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积极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五）提升社会认同，融入文化背景

增强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关键社会支持策略之一是提升社会认同度以及融入文化背景。高校需借助多种渠道来提高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比如组织“高职技能展示周”，邀请企业代表与社会人士参观学生专业技能成果展示，举办校企合作论坛，以此呈现高职学生的专业价值与发展潜力，提高他们的职业自豪感。还应重视传统文化在情绪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可开展“中华文化与情绪智慧”主题活动，借助传统文化艺术体验、经典诵读分享会等形式，使学生感受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情绪智慧，学习传统文化中的情绪调适方法[5]。最后，高校要强化社区支持网络建设，可组织“社区服务实践月”活动，让学生通过参与社区服务来展示专业技能，获得社会认可，同时建立“职业导师制”，邀请行业优秀人才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通过经验分享及情感引导，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环境，提高职业自信。

四、结语

经过系统实施情绪弹性培养方案，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学术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可提升情绪调控效能和环境适应能力，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良好的情绪管理素养与社会竞争优势。家庭系统、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共同搭建的三维支持体系，结合前沿教育技术手段与创新教学模式，为情绪弹性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实施基础。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框架的干预举措，为高职学生应对复杂社会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引，并通过实践路径为其实现自我价值与幸福生活创造了双重保障。教育实践者和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应协同整合上述多维资源，促使学生实现持续性的心理资本积累，最终达成个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丽丽 .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联性 [J]. 三角洲 , 2025(19): 165−167.

[2] 杨子怡 .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培养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5, 24(12): 120−123.

[3] 孙逊 . 高职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纵向网络分析研究 [D]. 曲阜 : 曲阜师范大学 , 2025.

[4] 张艳红 . 新媒体视域下高职大学生心理困境及干预研究 [J]. 华章 , 2025(03): 75−77.

[5] 申泰若 .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团体辅导的实施效果分析 [J]. 社会与公益 , 2025(02): 105−108.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析

徐　露

摘要：人工智能背景下，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中国法律史”课程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环节。本文立足“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实际，剖析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目标、教学改革设计，进而提出教学改革实践建议，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拓展知识链接，将思政元素嵌入知识点中，做好课堂教学设计；提供课外考查机会，借助博物馆等场所科技、文物资源，立体化感染学生；凸显智能化教学手段；考核评价体系要融入思政考核内容。以期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为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法律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关键词：人工智能；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中国法律史”课程是法律专业本科阶段核心必修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日常教学往往重视法律史专业教学，忽视学生法律素养、职业道德以及价值观的塑造。通过深入挖掘该课程中包含的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法治信仰、爱国精神等元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法律知识，提升学生法律问题分析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

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中，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案例分析、专题讨论、情境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应用时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生动呈现所学知识，激发学生兴趣，最终使得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相关知识，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法律专业人才对于社会稳定、公正和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更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为学习赋能。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目标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目标是多维度的。第一，知识学习层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挖掘、融合中国法律史相关知识资源，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相关的思政教育元素。教师通过讲解中国不同朝代的法律历史变革和内容，以及各个历史朝代中蕴含的思政教育知识，强调法治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对法治的认同感和依法行事的信念。第二，教学方法创新层面。教师在教学中要应用案例分析、专题讨论、情境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积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生动呈现知识内容，创设虚拟沉浸式历史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感，进而提升学习效果。第三，人才培养目标层面。学生掌握中国法律史相关知识是基础，教师需要重点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引发学生对于公平正义、人权尊重等法治核心价值的思考，让学生树立对中国法治文化的自信，并深刻认识到法律专业人才对于社会稳定、公正和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最终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设计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设计要时刻围绕课程的重要知识点进行改革设计。第一，利用智能数据分析技术，建立课程资源库。利用人工智能数据收集分析技术，将当前“中国法律史”课程的基础知识、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基础知识涉及的思政元素进行整合、分类和收集，建立智能化资源数据库。第二，借助学习平台，打通线上与线下教学路径。利用各类智能学习平台，通过课前任务布置、课后作业发布、作业完成统计、学习跟踪等功能，使得教师和学生及时掌握教与学的情况，进而在后期进行针对性的教与学调整[2]。第三，利用 AI 视频技术，打造生动学习情境。利用 AI 视频技术，将所学知识以及思政

教育元素制作成知识学习情境小视频，将知识生动呈现，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学生思考。例如，利用 AI 视频技术制作历史情境，学生作为现代人穿越到历史之中，对不同时期法律制度的改革进行思考，融入当时著名的忠诚爱国、严谨治学等历史事件，进而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同时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的目的。第四，建立立体化的智能评价体系。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立体化智能评价体系，包含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表现、考试表现、思政表现、实践表现等内容，通过智能技术统计和记录，最终形成较为全面、客观、真实的评价结果。

（一）教学资源的收集、归类和优化

第一，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高校“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知识资源。中华法治文明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文化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3]。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与“中国法律史”课程相关的知识、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基础知识链接的课程思政元素和素材。例如，在讲解各个朝代法律制度颁布、改革时，人工智能技术能链接更多的当时社会背景资料、文物记载资料、历史事件资料，可更好帮助学生理解当时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此外，总结出该段法律历史时期发生的著名事件以及人物，发掘出思政教育素材。例如，学习夏朝法制时，在“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知识部分，可匹配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尚为国为民情怀；夏朝“不孝罪”知识部分，可以匹配中华传统“孝”文化。学习商朝法制时，匹配忠臣比干故事；学习“商鞅变法强秦”时，匹配商鞅徙木立信、为人诚信等事例，最终实现知识掌握与立德树人目标的统一，也体现出课程思政的教学价值和功效。

第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起集基础知识、研究成果、思政元素于一体的教学资源库。构建智能化的“中国法制史”课程资源库，教师与学生可以根据学习内容进行检索，不仅会出现基础知识，还会有知识拓展以及思政引领，方便教师和学生在备课、学习时使用，提高备课质量以及学习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

第一，构建智能辅助教学平台，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辅助教学平台，教师在平台上可以进行课前任务发布、课后作业布置，系统自动统计和跟踪学生作业、表现、出勤等情况，总结出学生的知识学习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学生不仅可以查看自己的学习报告，还可以获取知识不足之处的辅导数据资源，并且在数据辅导中嵌入面对困难勇于克服、持之以恒等优秀品质教育，积极帮助学生提高课后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坚持不懈的良好精神品质。

第二，利用 AI 制作视频技术，生动呈现知识。利用 AI 制作视频技术生动呈现历史情境，并且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及古代思政教育短视频，更好地让学生直观感受历史，感受历史人物以及事件中蕴含的爱国、无私奉献等高尚情操，提高学生体验感的同时激励学生塑造高尚品德。此外，可以广泛利用 VR 和 AR 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

（三）完善教学评价

第一，搭建立体化教学评价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集学习评价、思政评价、实践评价等于一体的立体化评价系统。学习评价重点考查“中国法律史”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思政评价主要涵盖课堂讨论、发言、学习态度、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和思想表现，如团结互助、良好沟通、积极情绪、批判思维、社会责任感、法律思维等；实践评价主要注重学生在日常法律史学习中利用古代优秀法律思想解决现代问题，以及应用现代法律思想解决古代问题的能力。

第二，搭建及时动态的教学评价系统。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收集分析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个性化的动态评价，及时在课后进行评价结果反馈，第一时间帮助学生了解自身学习知识的不足之处，引导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教师也可以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四）提升教师应用智能技术的教学能力

第一，提升教师应用智能技术的能力。积极组织各级、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培训和学习会议，让教师了解、认识和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在教学中不断尝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学的创新。

第二，提升教师思政教育能力。组织各级、各类课程思政教育培训和学习会议，让更多优秀的法律史课程思政教育经验得到分享，引导教师挖掘法律史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并在课程中与基础法律史知识进行融合。在日常教学中更要根据课程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思想和文化，切实提升法律史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4]。

第三，鼓励教师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研究。高校应积极鼓励教师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的有效教学方法和模式，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不断推动教学改革与创新。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

（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拓展知识链接，将思政元素嵌入知识点中，做好课堂教学设计

课堂授课是教学的主要环节，如何讲解是授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具体到“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来说，必须结合讲解的历史法律知识挖掘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恰当嵌入到专业知识中传授给学生，课程思政才能落地[5]。面对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中国法律历史，教师的个人知识储备是存在一定局限性

的，教师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相关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的检索和收集，进而与教授的法律历史知识进行链接，挖掘出课程思政素材和元素，最终，将知识输出给学生。例如，汉朝法制史中“出礼入刑、隆礼重法”，链接到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引导学生思辨德治与法治；夏朝“不孝罪”，链接到中华传统孝文化；西周“明德慎刑”，链接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现代法治建设的根基，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史，商鞅变法链接到徙木立信，为人诚信的品德等。

（二）提供课外考察机会，借助博物馆等场所科技、文物资源，立体化感染学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当今的博物馆不仅陈列着各类历史文物，还引入了更多科技元素，给参观者提供了较好的沉浸式体验感受。法律史课程学习时，可以广泛挖掘本地以及周边地区博物馆资源，以思政为主题，将课程知识、思政教育与博物馆文物、科技进行链接，提供给学生更多视觉、听觉方面的感受，加之教师、讲解员的专业知识讲解，让学生沉浸式地进行学习和体验，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学习印象，提高课程教学以及思政教育效果。此外，全国大多数成规模的博物馆，都有线上参观导览、智能语音讲解、文物 3D 特写等智能服务，教师在法律史课堂中，也要善于利用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博物馆中与课程知识相关的元素、文物等，在授课过程中指导学生利用手机参观博物馆中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物，提升课堂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凸显智能化教学手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教师需要在法律史教学中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和效果。首先，利用 AI 技术生成教学短视频。教师要善于利用 AI 技术，根据教学内容，输入需要生成的视频内容，生成 AI 短视频。其次，借助人工智能搭建辅助教学平台。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运算能力，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个人性格智能化提供个人学习计划，学生能在平台及时获得自己的学习数据以及知识学习的不足之处和解决方法。最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跟踪学生学习情况。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检测学生课余学习情况以及作业完成质量，生成个性化的学习报告，教师根据报告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弥补其不足。

（四）考核评价体系要融入思政考核内容

首先，法律史专业知识考核与思政考核内容要结合。法律史专业课程笔试考核时不仅仅要考核专业法律史知识，还要涉及课程思政内容。尤其注重考核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思想等内容。其次，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过程性考核。利用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收集学生日常学习数据和情况，对学生的学习时间、作业完成、问题讨论、活跃度等信息进行全方位收集，根据日常收集信息给出过程性评价成绩。最后，增加科研实践考核。中国法律史内容丰富有很大科学研究空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法律史相关研究，在提升学生科研能力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团队协作、不畏困难等良好品质。

四、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较大意义。积极将法律史专业知识、思政元素与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结合，不断提升专业知识教学和立德树人水平，为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和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奠定基础。未来，应该持续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到法律史课程思政教学中，为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 (2020-05-28)[2025-12-2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 姜兆玉，余君彤，郝冬梅 . 人工智能视域下生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J]. 高教学刊，2025, 11(10): 14-18.

[3] 陈玺 . 中华法治文明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 3.

[4] 律璞 .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路径探析 [J]. 西部素质教育，2025, 11(05): 182-185.

[5] 律璞 .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政法院校课程探索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4(44): 72-74.

（作者系大连财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全人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以南京医科大学“卫蓝”实践项目为例

刘 丽 王 超*

摘要：全人教育理念倡导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与价值的协同发展，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构建探索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针对当前高校劳动教育中“同质化严重、专业融合不足、价值引领弱化”等共性问题，本文将全人教育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内涵相结合，探索构建契合学科专业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并以南京医科大学“卫蓝”劳动教育实践项目为案例，解析“价值引领个性化、专业实践情境化、服务赋能精准化、评价反馈多元化”的实施路径，探索劳动教育成果向双创教育的转化机制。研究验证了全人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理论契合性，为高校劳动教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全人教育；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实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1]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需结合专业特点，增强学生职业劳动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将劳动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劳动教育是培育责任担当与奉献精神的实践载体，是实现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的重要环节，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关键举措。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存在过度强调技能训练而忽视劳动精神培育、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未结合学科专业特色与学生个性化需求、对劳动精神和职业伦理等深层劳动素养的评估缺失等问题。这凸显了新时代劳动教育从“形式化实践”向“系统性育人”转型的迫切性。

全人教育理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教育改革运动，其核心是通过教育促进人的智力、情感、社会性、身体、审美与精神潜能的全面发展[2]。这一理念与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目标高度契合，为摆脱劳动教育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理论框架。本文以全人教育为指导，结合南京医科大学“卫蓝”劳动教育实践项目，探索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路径，为高校劳动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一、全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契合

（一）全人教育的核心内涵

全人教育理念由隆·米勒（Ron Miller）正式提出，强调学科间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联结以及理性与直觉的结合。其核心原则为联结性、包容性、平衡感，反对传统教育的碎片化倾向。具体来说，它主张个体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有机联结；尊重多元差异，适配不同群体的需求；协同提升认知、情感、意志与价值。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的“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高度一致，共同构成“卫蓝”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理论基础。

（二）全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契合性探析

全人教育理念以培养“完整的人”为核心追求，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则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二者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共同推动劳动教育实现从工具性技能训练向育人本质的深层回归[3]。全人教育倡导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路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突出实践在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二者共同支持“实践体验—反思内化—创新实践”的逻辑闭环[4]。最终，二者均强调劳动的社会性与个体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劳动教育注入了人文关怀的温度与社会责任感的深度。

二、全人教育理念引领下的四维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确定以完整人格培育与劳动素养提升为核心任务的教学目标

南京医科大学“卫蓝”劳动教育实践项目教学目标以全人教育联结性、包容性、平衡感原则为框架，深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核心内涵：联结性原则强调个体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有机联结，对应劳动社会性，引导学生认识自身潜能、理解社会分工本质、强化绿色劳动责任；包容性原则尊重多元差异，对应劳动形式多样性，适配专业需求、设计分层项目、涵盖校园劳动等实践场景；平衡感原则要求“认知—情感—实践”协同，对应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认知与实践、情感与价值、个人与集体的平衡。

项目以此为基础构建“认知—情感—实践”三维协同体系：认知维度聚焦公共卫生专业技能（如水质抽样与检测、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技术）与劳动本质认知（社会分工、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引导学生理解专业劳动的社会价值；情感维度注重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与职业认同的内化，通过沉浸式水体治理实践培育主动服务社会的情怀；实践维度强调问题解决能力（如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方案设计）与社会贡献（如区域水质改善、衍生的水环保相关科普作品、社区科普宣讲实践活动）的统一，既通过沉浸式实践培育学生劳动技能与社会责任感，又以治理成果反哺校园及同类水体环境，并推动劳动成果向创新创业方向转化，最终为公共卫生领域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的实践创新型人才。

（二）设计注重劳动精神传承与专业融合的教学内容

在全人教育视域下，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内容设计需实现专业知识、劳动精神与生活实践的有机统一，避免碎片化学习。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在专业融合层面，应结合学科专业特色设计差异化劳动实践活动；在劳动精神传承层面，则可依托校史馆、劳模工作室等现有资源挖掘前辈典型事迹形成典型案例，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教学内容[5]；在生活实践层面，整合志愿服务、社会实践项目、社团活动等以强化社会服务意识。“卫蓝”项目的教学内容涵盖了劳模精神感悟与学习（价值引领）、校园水系的水质检测与实验室模拟治理操作、生态浮岛设计与投放、水体污染物毒理性评价及相关科普作品衍生（实践创新），深度体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设计既推动劳动形式从简单体力劳动向复杂专业劳动升级，又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覆盖劳动观念树立、职业素养提升等内容，最终构建“五育融合”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全面育人效果，促进学生身心、智力、责任感与审美意识的协同发展。

（三）打造以情境体验与反思内化的教学方法

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教学方法应以传导性学习（知识与技能的系统传递）、交换性学习（师生及生生间的经验共享）、转换性学习（学生个体认知与价值的深度重构）为核心，摒弃“填鸭式”单向灌输，遵循“情境体验—反思内化—实践创新”的循环逻辑。具体应用层面，一是情境体验：依托学校实际挖掘劳动育人场景，打造沉浸式劳动基地，综合采用项目教学法、PBL 教学法、全景式教学法与沉浸式教学法，构建沉浸式的高仿真劳动场景，让学生在安全环境中掌握规范操作与应变能力；二是反思内化：引导学生通过撰写劳动日志、阶段性反思报告、复盘实践操作等方式，将碎片化体验升华为系统认知；三是实践创新：组织学生深入基层开展社会参与项目，形成“理论—实践—反思”的闭环，并支持学生基于实践提出课题思路、开展创新项目。以“卫蓝”项目为例，在教学保障上打破传统课堂模式，组建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构成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整合理论科研、实验操作与学生管理经验，依托劳动教育基地、研学社团等平台构建全过程体验、全景式参与、全信息管理的实践体系，同时以“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包”形式提供自主选课服务，适配学生专业与兴趣需求。学生全程参与水质检测、生态治理等沉浸式实践，通过小组讨论、成果展示反思劳动价值，不仅实现劳动操作技能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显著提升，还在实践中获得成就感与劳动之美的感悟，促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内化，同时劳动成果反哺创新创业教育，达成“技能培养—价值塑造—创新赋能”的统一目标。

（四）构建多元动态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在全人教育理念下，劳动教育效果的考核应注重学生的自我价值实现，进而构建出“认知—情感—实践”三维协同的“以劳促全”评价体系，实现劳动教育评价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的深度融合[6]。劳动教育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可覆盖学生个人发展的关键维度，在认知层面聚焦劳动认识的系统性、劳动技能的专业化，在情感层面关注劳动态度的主动性、劳动精神的内化度及价值观内化程度的动态变化，在实践层面强调劳动成果的完成度、劳动安全的规范性及反思的深度。评价方式突出多元性与动态性，可采用过程性追踪和结果性验证的双轨机制。“卫蓝”项目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劳动教育成果清单（含劳动场景照片和视频记录、实践日志、时长台账、阶段性反思报告等内容）用以进行过程性评价，开展多主体参与的考核评价工作，包括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劳动感想与成长复盘完成自评、劳动小组成员依据协作表现与贡献度进行互评、授课教师根据专业技能掌握程度与劳动精神的培育成效实施点评；结果性评价则结合阶段性成果评分、个人成果清单评分及劳动成果展示，做到量化与质性评价互补。该体系旨在通过全面、多

元、动态的评价，推动学生认知能力、情感素养与实践创新的协同发展。

三、全人教育视域下劳动教育成果向双创教育的转化路径

“卫蓝”项目是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打造的沉浸式劳动教育实践项目，获2022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劳动教育优秀实践项目特等奖，在劳动教育实践课程的构建和实施过程中，该项目一直致力于推进劳动教育实践课程阶段性成果向创新创业教育的转化，构建“技能筑基—能力转化—精神赋能”的三阶成果转化路径，逐渐形成了从技能训练到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过渡[7]。

（一）专业融合与技能筑基

依托公共卫生学院相关学科特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以真实社会需求为导向，打造标准化的实践项目以提升学生专业操作技能与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以相对封闭的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切入点，在校园实体水系基础上打造出全景式全过程的沉浸式问题导向型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研究现场，同时依托学校各实验室操作平台，带领学生全程参与，从理论到实践，从湖边到实验室，沉浸式感受通过多种生物手段改善水质的全过程，锻炼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创新创业教育奠定核心能力基础。

（二）赛事载体与成果转化

在充分结合学生爱好特长的前提下，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根据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综合表现遴选出具备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意识与创新潜力的学生开展系统双创培训，内容涵盖双创思维启蒙、计划书撰写、路演技巧打磨、项目孵化实操等模块，邀请行业专家、创业校友及学科导师组成复合型指导团队，提供一对一精准辅导，鼓励学生将劳动教育实践成果转化为“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等赛事项目，以赛事平台为纽带推动劳动教育实践成果向双创项目转化，实现技能成果到双创能力的跃升。

（三）精神培育与价值赋能

通过专业知识、劳动实践和社会服务的有机融合，组织学生深入基层医疗单位、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健康义诊、老年健康关怀等志愿劳动，在服务中感受劳动的价值，厚植劳动自立意识与主动服务社会的价值情怀；在实验室操作培训与实践项目执行中，强调“精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要求，通过要求学生对实验数据进行反复核验、对关键数据和条目进行零差错整理等严谨的科研训练，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邀请一线公共卫生从业者分享职业经历，引导学生树立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学生通过全过程参与劳动，得以锤炼坚韧意志、涵养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秉持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最终养成工匠精神与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为创新创业教育注入精神内核与价值引领。这种可持续转化机制，为高校劳动教育成果的高质量转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四、结论

本文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核心指引，结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内涵，构建了“目标耦合—内容分层—方法适配—评价动态”的四维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体系，为解决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同质化严重、专业融合不足、价值引领弱化等困境提供了实践思考。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专业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完善劳动教育成果向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转化机制，强化评价体系对学生情感素养与社会责任感的动态追踪[8]，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劳动教育支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EB/OL]. (2020-03-26)[2025-12-06].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03/t20200326_435127.html.

[2] 谢安邦 . 全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M].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1:23-30, 67-72.

[3] 胡君进 , 檀传宝 .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教育观——经典文献的研析 [J]. 教育研究 , 2018, 39(05): 9-15, 26.

[4] 郝文武 . 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的本体论和时代性意义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3(03): 103-111.

[5] 党印 , 李珂 . 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领新时代劳动教育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21(Z3): 62-63.

[6] 于秋叶 , 于兴业 .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质量评价的四重维度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2(12): 39-42.

[7] 吕艳娇 , 姜君 .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 : 价值、困境与路径 [J]. 当代教育论坛 , 2021(04): 116-124.

[8] 刘向兵 , 曲霞 , 黄国萍 . 高校劳动教育体系化构建的学理与实践 [J]. 中国大学教学 , 2021(09): 30-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思想政治工作专项“全人教育理念下医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建设研究”（2024SJSZ0116）；2023年南京医科大学党的建设研究会立项课题一般课题“全人教育理念下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党支部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23NYDJ0208）；2023年南京医科大学教育研究课题“全人教育理念视域下基于天元湖及相关水系劳动教育基地的环境卫生学综合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2023LX029）。

（作者：刘丽，南京医科大学讲师；通信作者王超，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

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探析

李 娜 吴 莎 吴 琼

摘要：荆楚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特色资源库。本文以荆楚文化为切入点，在阐释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状，总结经验做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从内容、平台、师资、保障四大关键维度精准施策，系统化构建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荆楚文化；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善用社会大课堂，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1]。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思政课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政课建设要深化文化根基的内在规律，明确了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新的着力点。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3]荆楚文化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湖北省本土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特色资源库。如何有效挖掘和利用荆楚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成为当前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

一、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价值意蕴

（一）激活荆楚文化当代生命力

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具象化的活动设计，让荆楚文化从文献记载中“活”起来，将其具象化为学生可感知、可参与的教学内容，推动学生从被动的文化受众转变为主动的传承主体。同时，依托高职院校的专业技术优势，荆楚文化可以与现代产业需求、技术手段相结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创新产品的转化，在拓展荆楚文化传播载体与应用场景的同时，赋予荆楚文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涵，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良性循环。

（二）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育人实效

作为湖北省高职院校学生成长环境中的地域文化符号，荆楚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与学生具有天然的亲近性，能够快速拉近思政课与学生的距离，消除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的陌生感。同时，在实践教学中通过让学生在文化体验中感悟思政内涵，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认知与行为指引，摆脱传统理论说教式教学困境，推动思政课从知识传递深化为价值认同，进而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针对性与感染力。

（三）塑造高职院校办学特色与文化品牌

高职院校通过将荆楚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可以构建“荆楚文化+思政育人+专业特色”的独特育人模式，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形成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校园文化氛围，摆脱同质化发展的教学困境。同时，特色化的育人实践能够提升院校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师生对院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院校在地方的影响力，塑造鲜明的文化办学品牌。

（四）赋能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从文化发展看，高职院校通过思政课实践教学组织师生参与荆楚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承与推广，助力荆楚文化品牌建设与非遗项目活化；从经济发展看，师生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形成的文化创意、技术方案等成果可以转化为湖北文旅产业与文创产业的发展资源，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能。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入实践能够培养一批兼具专业技能与地域文化素养的人才，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实现育人成效向地方发展动力的转化，构建院校与地方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 。

二、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湖北省高职院校立足地域文化优势，积极探索荆楚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践举措，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经验做法

1. 立足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开展特色思政课实践教学

部分高职院校立足荆楚文化资源优势，系统梳理荆楚文化思政元素，形成特色鲜明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一方面，聚焦非遗文化精神密码，挖掘荆楚非遗项目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其转化为思政课实践教学主题。如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围绕苎麻文化，提炼“守正创新”“文化传承”等核心主题，设计“苎麻技艺中的思政密码”实践教学内容，让学生在了解 80 余道苎麻纺织工序的过程中感悟匠人坚守与创新精神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立足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整合荆楚文化资源，挖掘其中的思政内涵。如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依托炎帝神农故里资源，以“寻根铸魂·石榴同心”为主题，将炎帝文化中的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精神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引导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部分高职院校注重内容与专业特色相结合，如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组织茶艺与茶文化专业学生走进位于羊楼洞古镇的中国青砖茶博物馆，让学生在探寻青砖茶历史文化、产业现状与创新实践中解锁万里茶道的青春密码。

2. 注重实践教学平台搭建，拓展文化浸润空间

积极推动馆校共建、校地协同，构建实践教学平台，通过共建研学实践基地，打造思政课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如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与武汉二七纪念馆共建“大思政课”实践研学基地，带领学生全景式感悟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斗争史；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与襄阳传统漆器博物馆达成合作，将博物馆变为非遗技艺研习的实践阵地，让学生在馆藏文物解读与技艺体验中深化文化认知。

3. 培育教师荆楚文化素养，提升融入教学能力

通过专项培训、实践研修等方式，着力提升思政课教师的荆楚文化素养和实践教学能力。如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专门举办“大别山‘活文化’进校园”非遗传承专题培训活动，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担任“特聘讲师”，向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系统讲解大别山非遗技艺的历史传承、制作工序及文化内涵，重点解析技艺传承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坚守品质与创新理念等思政元素，为教师将非遗融入实践教学提供了鲜活素材与思路指引。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组织思政课教师走进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汉绣博物馆、汉剧博物馆等开展实地调研，近距离感悟荆楚文化魅力，积累思政课实践教学素材。

4. 优化保障相关安排，巩固融入实践基础支撑

从制度、经费等方面搭建基础保障框架，助力荆楚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序开展。一是完善制度保障，将荆楚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纳入学校育人体系，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明确教学目标、内容要求、实施路径及各部门职责。如湖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构建全面覆盖的课程思政体系，为文化融入实践教学提供了制度支撑。二是强化经费保障，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实践基地建设、师资研修、活动开展等工作。如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按照相关标准提取思政课建设经费，重点向荆楚文化融入实践教学项目倾斜。

（二）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湖北省高职院校在荆楚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荆楚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荆楚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同时，部分专业未能充分结合自身特色开展融合实践，覆盖范围有限。二是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不足，各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健全，平台建设呈现零散化的特点，优质荆楚文化资源的利用率不高；线上数字平台建设也相对滞后，缺乏荆楚文化线上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时空局限性突出。三是师资队伍融合教学能力存在短板，部分思政课教师对荆楚文化的了解不够系统，将荆楚文化元素与思政课实践教学有机结合的设计能力不足；跨学科团队协作的紧密性不够，协同育人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四是长效运行机制仍需完善，部分高职院校的保障经费投入不足，难以支撑大规模、深层次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考核评价机制不够细化，对学生实践过程的跟踪评价不够全面，影响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的提升。

三、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优化路径

为实现荆楚文化与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其育人价值，需要紧扣高职教育实践导向与荆楚文化特质，从内容、平台、师资、保障四大关键维度精准施策，构建系统化的优化路径。

（一）深挖适配，构建精准化育人内容体系

荆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核心在于内容的深度挖掘与精准适配，避免“文化符号堆砌”与“专业脱节”的表层化问题。首先，从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中系统梳理并提炼理想信念、职业精神、创新意识等核心思政元素，构建结构化的文化思政资源库，摆脱对表层文化符号的简单依赖。其次，针对高职院校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需求，实施差异化内容适配策略。如农学专业可依托荆楚农耕文化，

开展劳动教育与实践创新活动；工科专业可依托古楚科技，开展工匠精神实践；医护专业可借助李时珍文化，深化职业伦理教育；文旅专业可围绕荆楚文化IP，推动传承与创新实践。同时，编制规范化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指南，明确内容模块、教学目标、实施步骤与评价标准，确保荆楚文化元素与专业实践、职业素养培育深度融合，破解“两张皮”难题。

（二）融通聚力，搭建三维化实践场景矩阵

平台建设的零散化、各主体协同乏力，是荆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关键瓶颈，需要通过资源整合与场景创新拓展实践空间，构建“校内—校外—线上”三维联动的思政课实践场景矩阵。校内整合资源，建设集展示、体验、实践等于一体的综合化思政课实践育人阵地，实现荆楚文化元素的常态化渗透。校外与文化场馆、企业、地方政府等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集群，有效拓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空间。同时，依托数字技术开发线上虚拟实践场景与成果展示平台，打破时空限制，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灵活性与互动性[4]。通过建立校地、校企、线上线下的协同联动机制，实现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优势互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政课实践场景体系。

（三）赋能强基，打造复合型育人师资团队

师资队伍的同质化与能力欠缺直接影响融入教学效果，需要通过内部赋能与外部整合双管齐下，打造一支复合型的思政课实践育人师资团队[5]。一方面，建立分层分类的师资培训体系，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解读与转化能力，同时强化专业教师的思政育人意识与能力，通过“思政+专业”教师结对协作机制促进不同类型教师的知识互补与能力融合。另一方面，拓宽师资来源渠道，聘请荆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荆楚文化学者等外部专家担任兼职导师，深度参与思政课实践教学设计与实践指导。通过内部赋能与外部整合双管齐下，形成育人合力，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团队的复合性与专业性。

（四）协同整合，健全长效化支撑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的松散化与资源分散导致文化融入缺乏持续性，需要通过系统化支撑保障长效发展。建立“过程+成果+反馈”的多元评价体系，全面、客观衡量融入实效。完善激励机制，将荆楚文化融入工作纳入师生考核评价体系，设立专项奖励，充分调动师生积极性。同时，建立校地校企协同的资源整合机制，组建合作联盟，搭建统一的资源数据库，实现荆楚文化资源、实践基地、师资力量等的统筹规划与共享利用，为融入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稳定支撑，保障长效化发展。

四、结语

荆楚文化融入湖北省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破解思政课“理论与实践脱节、与学生情感疏离”难题的关键路径。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校地校企协同，推动荆楚文化与现代产业需求、技术手段深度融合，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为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北经验。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EB/OL]. (2022-08-18)[2025-12-1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18_653672.html.

[2] 谢丹，汤瑜心．新时代夯实思政课文化力量根基的逻辑进路 [J]. 新东方，2025(03): 82-88.

[3] 曾成．论荆楚文化符号的选取与利用 [J]. 长江文史论丛，2019(00): 179-188.

[4] 杨源．增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精准性的进路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08): 24-27.

[5] 曾纪瑞，胡晓青．本土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4, 40(03): 16-1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度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荆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路径研究”（2024GB200）；202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路径研究”（24Z092）；2025年度湖北省中华职教社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非遗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HBZJ2025256）。

（作者：李娜，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讲师；吴莎，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助教；吴琼，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

优化现场教学推进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郭子玉

摘要：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举措，现场教学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形式，对增强干部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意义重大。当前，党性教育广泛采用现场教学方式，其作为党性教育课堂教学的具象延伸，是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有效化解了单纯理论讲授的抽象性问题。本文界定现场教学定义，系统梳理现场教学常见模式，深入分析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的发展现状与优化方向，从精准定位目标、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师资与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新时代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提升干部培训实效提供参考。

关键词：现场教学；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举措，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党的建设新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1]。2023 年，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更是要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和能力支撑[2]。

为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迈进，培养政治素养过硬、契合新时代发展需求、拥有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3]，依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需以教学理念为引领，持续改进教学方法，进而提升干部培训的质量与成效。

现场教学只是一种培训方式或教学方法，也是目前干部教育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教学形式。干部教育工作中增强党性修养、提升干部履职能力，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两大目的[4]。本文主要围绕优化现场教学，推进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探讨研究。

一、现场教学的内涵与教员的角色定位

干部教育培训中“现场教学”是将理论知识与实地感悟深度融合的教育模式。在干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当下，现场教学脱颖而出，成为备受欢迎的重要教学形式。它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将理论知识与现实场景紧密相连，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

（一）现场教学的定义

现场教学（狭义）就是在历史发生地，利用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

目前党性教育普遍都在从事现场教学，现场教学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和延伸。相较于课堂教学，现场教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现场”。现场教学依托“现场”独有的优势，不仅能有效串联“教”与“学”等教学环节，还能充分激发学员的主体能动性，让学员在党性教育中实现情景体验、直观感知、情感共鸣与反思提升的深度融合，进而在特定时空场景下拓展并深化党性教育课堂，具备课堂教学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与作用。

（二）现场教员的角色定位

党性教育的现场教学是教学，也是思想教育，更是党性教育，教学需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有组织、有纪律、有要求。进行现场教学的是教师，不是讲解员，更不是导游，身份不同，职责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现场教学是讲课，不同于讲解，讲述内容角度不同，目的性不同，思想水平不同，语言、语气不同。充分发挥教师在现场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是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的枢纽和关键，明确现场教员的角色定位，充分利用“现场”，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现场教学课程水平及质量。

二、常见的现场教学模式

当前，现场教学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各类模式在具备独特优势的同时，亦存在相应局限性[5]。系统剖析不同模式的优劣特征，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推动干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现场参观式教学——以革命纪念馆教学为例

在革命纪念馆场景中，历史通过实物陈列、图文资料及场景复原等具象化方式呈现，能够为学员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其产生历史代入感，进而直观感知历史氛围、清晰认识党的奋斗历程。但该模式以“参观”为核心形式，难以实现对党性精神的深度领会，对历史的认知也可能停留在表层。

（二）体验式教学——以重走革命路教学为例

体验式教学通过组织学员实地行走革命先辈曾走过的路线、参与相关历史场景模拟活动，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在此过程中，学员能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在艰难环境中的抗争精神与奋斗意志，显著增强与历史的情感联结。该模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外部条件的高度依赖，教学组织的难度高，若路线规划缺乏合理性，衔接不畅，影响整体教学成效。

（三）访谈互动式教学——以榜样人物访谈教学为例

访谈式教学以与榜样人物面对面交流为核心形式，是极具感染力的党性教育方式。学员通过直接聆听榜样的先进事迹，感受其精神品质与价值追求，能够获得真实且深刻的认知体验，具有较强的现实引领意义。但该模式在实践中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榜样人物的时间协调难度较大；二是契合教学主题且愿意配合的访谈对象筛选难度较高。

（四）案例研讨式教学——以实践案例分析为例

案例式教学以真实发生的实践案例为教学载体，具有高度的实践性特征。在案例分析环节，通过引导干部从多维度审视案例，鼓励不同背景、不同经验的学员充分表达见解，能够激发思维碰撞，一方面培养干部的批判性思维，促使其反思既有工作理念与方法；另一方面为创新思维培育提供实践土壤，助力干部在应对复杂工作场景时形成创新性解决方案。该模式同样存在显著局限性：其一，案例质量管控难度较大；其二，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极高。

三、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的发展现状与优化方向

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对教育培训的系统性、精准性、实效性提出更高标准，现场教学在快速普及推广的同时，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精准适配的新任务。立足新时代干部培训的使命要求，系统梳理现场教学的发展基础、优化空间与提升重点，对推动教学模式迭代升级、持续增强培训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方法创新：多元融合赋能育人效能提升

现场教学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传承成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方法优化与形式丰富。当前以教师引导、现场体悟为核心的教学组织方式广泛运用，为理论落地与党性锤炼提供了坚实支撑。面向高质量发展要求，现场教学仍有进一步拓展提升的空间。一方面，可在现有教学基础上，更加注重互动式、研讨式、沉浸式教学的融合运用，强化教与学的双向衔接，更好地激发学员的参与热情与思考深度；另一方面，可结合学员层次、培训主题开展差异化教学设计，推动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落地见效。通过丰富经验交流、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教学形式，促进互动性、实践性与情感性有机统一，助力学员更好地实现理论认知与实践思考的深度结合，推动学习成果向履职能力有效转化。

（二）主体协同发力：师生联动提升教学参与质效

现场教学坚持以教学目标为引领、以学员成长为导向，持续优化教与学的协同关系。在教学实践中，教师统筹教学设计、现场引导与总结升华，学员立足岗位实际开展沉浸式学习、感悟式思考，形成了有序高效的教学运行格局。为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可更加突出学员主体作用，强化全流程参与意识，推动培训前充分预习准备、培训中主动思考交流、培训后及时总结反馈，促进教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常态化互动互鉴。通过转变学习理念、强化主动意识，引导学员将培训作为提升政治素养、增强履职本领的重要契机，持续激发学习内生动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研学的转变，全面提升现场教学的参与度与实效性。

（三）供需精准对接：靶向施策增强教学适配水平

现场教学紧扣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任务，围绕党性修养、能力提升两大核心目标，不断优化内容供给与教学设计，整体呈现规范化、特色化发展态势。随着培训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现场教学可进一步强化需求导向，提升精准匹配能力，立足干部岗位特点、能力短板与发展诉求，统筹设计教学内容与实施方案，避免同质化安排、模板化推进；加强训前需求调研、训中动态调整、训后效果评估，推动教学供给与培训需求同频共振。

（四）学用深度转化：知行合一强化实践应用导向

现场教学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着力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有机结合，在赋能干部学以致用、以学促干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新征程新任务，可进一步强化实践导向，破解学用转化的关键环节，更加注重把现场感悟、理论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优化培训效果评价标准，既关注理论掌握程度，更重视实践运用能力与工作改进成效。通过完善转化机制、强化实践导向，引导干部在学习中思考、在感悟中践行，实现学时有触动、课后有行动、工作有提升，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干部教育培训知行合一的核心价值。

四、新时代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锚定精准教学目标，实现多维价值融合

清晰合理的教学目标是现场教学的核心前提，需以知识与能力统一、针对性与实践性协同为导向，构

建兼具系统性与精准性的目标体系。教学目标需突破单一知识传输局限，聚焦干部综合能力培育。例如，开展区域经济发展现场教学时，并非仅讲解经济理论，而是通过组织干部深入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实地考察，参与企业调研与项目分析，引导其运用理论工具解读经济数据、制定可行发展策略，同步提升经济形势研判、政策执行等核心能力。同时需紧扣干部岗位特质与发展需求设定目标，针对基层干部，以提升群众沟通、基层矛盾化解、社区治理能力为重点，安排其赴优秀基层社区学习党建与服务创新经验；针对中高级领导干部，则侧重战略思维、决策能力培养，通过真实案例开展头脑风暴，模拟复杂场景下的战略规划与重大决策过程，确保教学目标与实践需求精准对接，推动干部将所学直接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创新多元教学模式，提升教学实效与吸引力

教学模式创新是增强现场教学吸引力、实现理论实践深度转化的关键，需从理论实践融合、互动机制构建、线上线下协同三个维度突破。其一，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衔接。课前教师需围绕教学主题讲解核心理论，为现场学习提供分析框架。如开展红旗渠精神现场教学时，先系统讲解红旗渠修建背景、过程与技术方法，奠定认知基础；在实地教学中，引导干部聚焦“盘阳会议”等关键事件，分析其必然性、转折性及决策逻辑，结合自身工作探索精神内涵的实践转化路径，形成理论铺垫、现场解构、实践应用的闭环。其二，全面推行互动式教学。通过小组研讨、即时问答等形式激活干部主体性，将干部分组围绕现场案例展开讨论，分享观点与解决方案，促进思想碰撞与经验互鉴，同步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其三，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模式。依托线上教学平台提供教学视频、案例库等资源，方便干部课前预习与课后复盘，同时通过在线讨论区搭建跨时空交流渠道，线下聚焦实地考察、实践操作等核心环节，形成线上预习铺垫、线下现场体验、线上复盘深化的全流程教学链条，既拓展教学资源与空间，又提升教学效率与学习深度。

（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夯实教学质量核心支撑

现场教学质量的提升需以优质师资供给为核心支撑，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效能牵引。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借助完善评价反馈机制，形成师资、教学、评价的闭环提升体系，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提质增效提供坚实保障。在引进高素质人才方面，聚焦实践经验、专业深度双维度，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重点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职能部门等领域，引进具备深厚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担任兼职师资。此类人才可将前沿行业动态、典型实践案例及实用工作方法融入教学，打破传统教学的理论局限，为现场教学注入创新活力，实现教学内容与实践需求的精准对接。定期组织教师参与专业培训、学术交流及行业研讨，及时掌握学科前沿成果与教学改革趋势，鼓励教师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挂职锻炼、实地调研，积累实践经验，推动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构建多元赋能反馈机制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实效的关键，需通过多元化评价、常态化反馈、数据化分析协同发力，实现评价从结果判定向过程优化的转型。其一，构建多维度、多主体的评价模式。突破传统单一评价局限，评价内容既涵盖干部知识掌握程度，也包括学习参与度、实践能力提升、团队协作表现等维度；评价主体实现教师评价、干部自评、同伴互评、教学基地评价的有机结合。教师聚焦教学目标达成度，干部通过自评实现自我反思，互评促进经验互鉴，教学基地则从实践教学组织、效果等层面提供反馈，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全面。其二，建立双向互动的反馈机制。评价结果需及时精准反馈至教师与学员。教师可通过反馈掌握教学内容重难点把握、教学方法适配性等问题，针对性调整教学计划；干部能明确自身学习优势与不足，制定个性化提升方案。

五、结语

提升现场教学质量是推动干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明确教学目标、创新教学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评价体系等策略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现场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未来的干部教育工作中，还需不断探索和实践，持续优化现场教学的各个环节，推动干部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熊云 . 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本遵循——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 2023, 17(06): 20−29.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 .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M]. 北京 : 党建读物出版社 , 2023: 10.

[3] 方赛妹 . 健全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机制助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2024(04): 7−10.

[4] 张品茹 . 我国党政干部培训中的互动式教学研究 [D].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 , 2015.

[5] 曾志勇 . 选择行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D]. 西安 : 西北工业大学 , 201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口述史视角下河南文化保护与利用研究”（2024CDJ014）。

（作者单位：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建设路径探析
——基于提高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视角

吴 丹 高 阳

摘要：高职教育以培养服务于一线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高职学生处于成年早期发展阶段，心理发展存在多方面的矛盾，积极品质与消极品质并存。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学业、就业等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理解其特点并开展适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对促进其全面成长至关重要。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能够按照教育部要求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本文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现状、存在问题、成因分析、建设路径四个方面，探究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建设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积极心理品质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学生成长的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加之他们正处于成年早期发展阶段，是向成人角色发展的过渡阶段，面临很多从未遇到的新难题，当前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特点。教育部于 2011 年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其中要求高校应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或必选课。心理健康课程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通过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树立自助、求助意识，学会理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增强心理健康素质。

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拉尔夫·泰勒提出了课程与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以及课程编制原则，即“泰勒原理”。泰勒指出开发和评估任何课程与教学计划时都必须确定四个问题：确定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以及评价结果。其中，目标是所有课程决策的导向。目标必须清晰、具体、可操作，并且有充分的依据。只有明确教学目标，才能更为专业、系统地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1]。

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中指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程目标是使学生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增强自我心理保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掌握并应用心理健康知识，培养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切实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中包括知识、技能和自我认知三个层面的目标。为达到这三个目标，《要求》中设置了三大教学内容板块，即了解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了解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根据三个教育目标和三大教学内容，选择用恰当的方式组织适合学生的教育经验，最后用合理的方式评价教育结果，才能达到课程目标。

一、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现状

（一）教师与学生

1. 高职学生的年龄特征与优势

高职学生大多处于成年早期阶段，个体的自我意识快速发展，自我同一性逐步确立，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自我。张日昇认为成年早期的发展课题包括十个方面，林崇德提出履行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和义务是成年早期阶段个体的重要课题。

另外高职生动手能力强，思维活跃。高职教育强调实践，学生普遍对理论灌输兴趣不高，但对动手操作、案例分析等参与度更高。他们社会意识发展较快，渴望独立，对未来的工作和经济独立有强烈的渴望。他们学习的目的性很强，重实用、重效果，倾向于学习“马上能用得上”的知识和技能。

2. 高职学生面临的主要心理挑战与需求

学业压力与自我效能感问题。部分高职学生可能经历过学业挫折，自信心不足，存在“习得性无助”感，对理论学习有畏难情绪。

自我认同与价值感的波动。在社会“重学历”的潜在压力下，可能对“高职生”身份产生自卑感，对

自我价值感到困惑。

情绪管理与压力应对能力不足。面临学业、经济、情感、就业等多重压力，情绪波动较大，且缺乏科学的情绪调节方法。

3. 高职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特点

采用 2009 年孟万金等学者结合中国国情编制的《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选取某高职学院大一学生作为被试，共计发放问卷 606 份，回收有效问卷 464 份，有效回收率 76.6%。

六大维度的平均值如图 1 所示。平均分从高到低分别为情感、人际、公正、认知、节制和超越。认知维度包含创造力等四个积极心理品质，共 12 道题，平均分为 3.65 分。人际维度包含真诚等三个积极心理品质，共 10 道题，平均分为 3.76 分。情感维度包含感受爱等三个积极心理品质，共 11 道题，平均分为 3.79 分。公正维度包含团队精神等三个积极心理品质，共 9 道题，平均分为 3.67 分。节制维度包含宽容等四个积极心理品质，共 10 道题，平均分为 3.63 分。超越维度包含希望与信念等四个积极心理品质，共 10 道题，平均分为 3.44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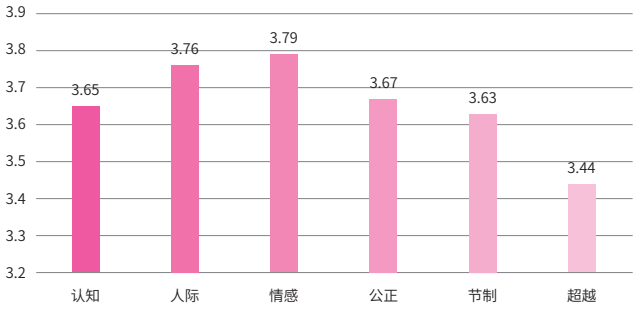


图 1 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六大维度均值统计图

由图 1 数据可知，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在六大维度的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偏上，均值都高于中数 3。情感维度的均值最高，人际维度平均分位列第二位，这符合高职教育注重实践、活动丰富的特点。学生通过实训、社团等活动，人际交往能力和情绪识别、管理能力得到较好发展。超越维度平均分偏低，可能反映了高职学生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较薄弱。同时超越维度均分偏低表明高职学生的意义感相对缺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仅关注技能习得，缺乏职业使命感。

4. 教师的基本构成与角色定位

目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的队伍通常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专职教师的背景多为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是课程教学、心理咨询的主干力量。兼职教师多来源于学生工作系统（如辅导员、学工干部等），或从校外聘请的心理咨询师。他们丰富了教学视角，但可能存在专业性、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心理健康教师在工作中扮演多重角色，这是心理健康课程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带来了巨大挑战。他们要承担课程教师的角色，面向全体学生教授心理健康课程；承担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为学生提供个体与团体心理咨询，处理心理危机；承担活动组织者的角色，策划并实施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 [2]。

（二）教学内容

根据教育部《要求》中对教学内容的规定，心理健康课程需要包含了解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了解自我等三大板块。根据这三大板块，提出了十二个子章节，包含了自我意识、生涯规划、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心理咨询等主要内容。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内容是依据教育部规定的十二个子章节确定的，在不同主题的章节中，主要介绍相关心理健康知识、高职学生相关发展特点、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调适等。

（三）教学组织

泰勒提出对于教育经验的组织要遵循连续性、顺序性、整合性三大标准。由于心理健康课程的特殊性，既包含知识性和技能性内容，也重视学生自身的体验，所以对如何组织教学内容有着更为复杂的要求。根据教学内容之间的连续性和顺序性，当前高职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排序相差不大，课堂教学包含教师讲授、小组讨论、案例分享等环节。

（四）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为了完善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对哪些教学内容进行测评，用哪些方式进行测评都会对教学过程产生影响。根据测评的结果，随时调整教学过程，才能不偏离教学目标。

当前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课程多数采用“过程考核 + 最终考核”的方式，过程考核的内容一般选取教学内容中的重要章节，目的是检验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及使用情况。最终考核的方式一般以笔试、口试或“笔试 + 口试”的方式进行，目的是检测一学期的课程学习是否达到相应的教育目标 [3]。

二、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

心理健康课程比其他课程更需要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如果教学方法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可能会导致互动不良，无法达到预期的课程目标。当前高职学校的教学形式以传统课堂授课为主，实践部分缺乏深度，学生课堂参与度有限，对知识的理解接受停留在表面，对需要学生体验和活动的内容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例如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了化解人际冲突的方法，却无法通过实际行动去实践，将方法转化为自己的程序性行为的可能性较低。

（二）教学评价方式不够多元

心理健康课程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所以成绩不能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以教师评价为主，

无法全面了解学生感受、认知和行为上的变化。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学生为了取得满意的课程成绩，完成了题目的要求，但未必能够体现自身心理素质的变化。

（三）问题成因分析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于心理健康工作的定位，重点是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主要关注学生因生活、学习等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对塑造积极心理品质，培育完善人格关注不够。

三、建设路径

（一）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性目标

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并在发展的基础上融入预防性目标，以此推动学生全面成长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整合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各类育人资源，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是实现心理育人的关键路径，也是落实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推动课程目标从过去侧重于对少数问题学生的干预，转向注重培养全体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科学思维方式的积极发展。

（二）制定全面的心理健康课程管理方案

心理健康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显著区别在于其教学目标并非仅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与应用，更在于引导学生进行体验。为确保课程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班级规模、教学场所与教学形式等方面应做出针对性调整，营造有利于师生互动、生生交流的课堂氛围，支持体验式教学的开展。在教学内容与活动设计上，应紧密结合当前时代特征与学生实际需求，融入最新研究成果与现实情境，确保课程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提升教学实效。在线下教学之外，还应积极构建数字化课程资源体系，通过微课等形式拓展学习空间，使学生能够便捷获取个性化学习内容，实现自主探索与深度体验相结合的学习过程[4]。

（三）建设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根本目标在于提升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因此，课程评价应贯彻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原则。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与行为反馈，结果性评价则关注课程目标的达成度与有效性。同时，评价主体也应多元化：通过教师评价、小组互评保障评价的客观性，通过学生自评凸显其主体性，从而构建科学、全面的课程评价体系。

（四）引入积极心理学视角建设心理健康课程

积极心理学突破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偏重“问题矫治”的导向，聚焦于发掘学生的内在优势与积极品质，致力于培养其积极心理品质与应对能力。这一理念将关注点从“修复创伤”转向“如何感知幸福、创造意义”，帮助学生实现更高层次的心理成长。

在积极心理学框架下，学生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获得稳定的主观幸福感，为其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与积极情绪奠定坚实基础，使其在面对学业、就业、人际、情感等挑战时，能够以乐观心态理性认知、积极应对，降低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在教学中融入积极心理学内容，有助于引导学生将心理学知识延伸至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学会剖析自我特质、挖掘潜在优势，深化对积极情绪的认知与体验，达成学以致用的教育目标[5]。

通过对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调研发现，高职学生人际、情感这两大维度的发展处于第一梯队，公正、认知、节制这三大维度的发展处于第二梯队，超越维度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前五大维度。针对“第一梯队”，要巩固优势，深化应用。不再停留在一般性的人际交往技巧，而是设计更复杂的情境，链接“公正”与“节制”，如模拟职场中“如何与难以合作的同事完成团队项目”，进而促进人际、公正、节制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展。针对“明显落后”的超越维度，精准切入，价值引领。这是课程建设的突破口和亮点。超越维度（如希望、信念、审美、感恩）关乎生命意义、理想信念和幸福体验，对抵御职业倦怠、提升生活幸福感至关重要。例如结合工匠精神，开展“感恩师傅/导师”活动，引导学生发现身边人的付出。

基于以上分析，可构建一个“一体两翼，三层递进”的心理健康课程模型。一体以“培养积极乐观、全面发展的准职业人”为根本目标。两翼以人际、情感为基础，重点培养学生卓越的职场软实力，以公正、认知、节制为支柱，夯实学生稳定发展的核心素养。三层递进分为基础层（普及教育）、强化层（专题训练）、整合层（实践应用）。基础层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必修课普及六大维度的基础知识，唤醒意识。强化层针对“第二梯队”和“超越维度”，开设工作坊、选修课进行专项技能训练。整合层在专业实训、顶岗实习、生涯规划中设计综合活动，促使学生将各项积极品质融会贯通，实现从“学生”到“职业人”的顺利过渡。通过这样的课程建设，不仅能有效回应调查所发现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更能真正赋能高职学生，让他们不仅“技能过硬”，更“内心丰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杨辉，于芙红．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探讨 [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08): 68−71.

[2] 向晓蜜，刘珍杰．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和路径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1(35): 133−136.

[3] 薛佳，马子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的实践探析——以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J]. 考试周刊，2017(16): 191−193.

[4] 杨晓珍，王文权．高职课程思政的属性、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2021, 42(17): 66−69.

[5] 陈磊，沈扬，黄波．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方向、现实困境及其实践超越 [J]. 学校党建与（下转 169 页）

文化自信视域下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研究

李　菊

摘要：伴随高校课程改革的持续深入，地方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高校教师研究的重点。对于高职思政课程教学而言，通过挖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展教学，不仅有利于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而且能让学生感知红色文化资源的魅力，将文化自信真正植根于学生内心。本研究以河南省驻马店市为例，在阐述驻马店红色文化资源在高职思政课程中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分析驻马店红色文化资源嵌入思政课程教学的现实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挖掘红色文化育人资源为重点、以打造红色文化实践基地为基础、以组建红色文化育人队伍为核心、以搭建红色文化数字平台为载体的思路，以期为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驻马店；红色文化；思政教育；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和传承地方红色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河南省驻马店市作为承载浓厚中原文化的重要城市之一，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便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一方面，驻马店红色文化历史悠久。在天中文化的千年滋养下，驻马店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驻马店是鄂豫皖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也由此形成了以杨靖宇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系列故事。另一方面，驻马店市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当地有以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辛亥革命烈士祠、杨靖宇将军故居纪念馆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特别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的所在地，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3]；竹沟革命纪念馆更是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活动和历史贡献。

总之，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通过对驻马店红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对于培养新时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文化自信视域下驻马店红色文化在高职思政课程中的价值意蕴

（一）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地方红色资源是历史的见证，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现实资源，这些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4]。在思政课教学中，驻马店的地方红色资源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高职思政课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素材和鲜活的教育案例。例如，在课堂上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适当介绍本地的革命遗址和英雄人物，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厚重，增强文化自信。

（上接 168 页）思想教育，2020(14): 51-5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年度项目"新发展理念下高职心理健康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与实践"（202418）。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二）传承红色基因，积聚红色力量

地方红色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将驻马店当地的红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大思政课”建设中，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精神力量。在课堂教学中，思政课教师通过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能够让学生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为国家和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促使他们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在社会实践中，地方红色资源是开展实践教学、积聚红色力量的重要源泉。通过引导学生参观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参与红色情景剧观演等方式，可以将当地红色文化融入“精神骨髓”深处，形成一股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

（三）激发学生热情，服务地方建设

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不仅有助于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认知，更有助于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通过将驻马店当地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竹沟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的日常教学中，组织学生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感悟革命先辈的民族精神和胸怀，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增强对当地建设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增进文化认同，坚定“四个自信”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奋斗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因此，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高职思政课程中融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革命历史，感受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从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5]。

总之，在高职思政课中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增强学生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自觉、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三、文化自信视域下驻马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思政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但协同机制尚不健全

部分地方高职院校已在顶层设计层面初步构建红色文化育人的组织框架，校地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也逐步推进。例如，驻马店市高校与竹沟革命纪念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等场馆建立合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实体场域。然而，当前合作仍多局限于“仪式性”或“节点性”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校馆之间在课程共编、师资互聘、成果共享等方面大多停留于形式，尚未形成深度融合、持续联动的运行体系。

（二）实践形式不断创新，但育人实效有待增强

为适应学生学习特点，驻马店部分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积极引入虚拟现实（VR）、线上资源库等数字化手段，并通过情景剧、微视频等实践形式增强学生参与感。这些尝试提升了课堂的视觉吸引力和互动性，但也存在“技术主导”和“活动化”倾向。部分 VR 体验仅注重感官沉浸，缺乏与价值引领、历史思考相衔接的教学设计；实践活动有时偏重形式热闹，未能紧扣思政目标展开深度反思与研讨，影响育人实效。

（三）地域特色得到彰显，但教学体系仍需优化

各院校普遍注重挖掘本土红色资源，如驻马店的竹沟革命史、杨靖宇将军事迹等，使思政课更具地方亲和力与认同感。然而，资源使用仍显碎片化，人物与事件多为孤立例证，尚未通过学术梳理与逻辑整合，形成结构清晰、理论自洽的课程模块或专题体系。红色叙事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学理联结不够自然，对红色文化当代价值的阐释也有待深化。

（四）教学效果显著提升，但价值引领不够深入

驻马店红色文化教学在形式覆盖与过程参与方面成效显著，通过环境浸润、主题活动、媒体传播等多维路径，有效提升了校园红色文化的可见度与学生参与度，进而提升了教学效果。然而，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教学与评价仍偏重外在表现与短期反馈，未能深入触及价值层面的引导与内化，缺乏对学生理想信念塑造、价值观念认同等深层次素养变化的科学评估与引领。

总之，驻马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学已初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覆盖，但在从形式融入到实质内化、从资源利用到体系建构的转型道路上，仍面临机制、体系、方法、内容等方面的系统性挑战。

四、文化自信视域下驻马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学的路径探析

（一）以挖掘红色文化育人资源为重点，实现资源转化与内容融合相统一

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挖掘和利用驻马店红色文化资源，实现资源转化与内容融合相统一，对于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深入挖掘驻马店红色文化资源，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课程体系。驻马店市在革命历史中有着丰富的红色故事和英雄人物，如杨靖宇将军的抗日事迹、竹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等，高职院校应组织专业团队对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形成系统的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库，开发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课程。其次，要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红色文化资源的持续开发和利用。高职院校要主动与地方政府、文化和旅游

部门、红色教育基地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社团等组织，举办红色文化讲座、研讨会、红色文化节等，鼓励教师和学生参与到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和传播中来，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最后，强化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课程内容的融合。教师通过开展红色文化专题教学或者在教学中融入当地红色文化故事，增强学生传承和发扬红色精神的实践动力。

（二）以打造红色文化实践基地为基础，实现理论育人与实践育人相统一

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红色文化的学习也同样需要在实践中践行。一方面，打造红色文化实践基地是实现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学的基础。驻马店市拥有众多红色文化遗址和纪念地，这是开展思政教育的生动课堂。通过建立红色文化实践基地，可以为学生提供直观、生动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参观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创新思政课堂教学形式，切实发挥好实践课堂的育人作用。高职院校应采用更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如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现场教学等，让学生感悟红色文化的魅力。同时积极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学生通过参与红色文化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红色文化调研、互动体验等，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实现红色文化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三）以组建红色文化育人队伍为核心，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红色文化的融入与传播，需要一支强有力的红色文化教师团队，才能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首先，组建由思政课教师、地方文化研究者、红色文化遗址讲解员等组成的红色文化育人队伍。思政课教师应深入研究驻马店红色文化，将其融入教学内容。地方文化研究者和红色文化遗址讲解员可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帮助教师更准确、更生动地传授红色文化知识。其次，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通过讲述驻马店市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开展专业的红色文化研究活动，不仅可以专业、高效地开展相关研究，而且有助于将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思政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后，明确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红色文化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思政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从而认识到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外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生力量。

（四）以搭建红色文化数字平台为载体，实现课程育人与网络育人相统一

在文化自信视域下，驻马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学，需要以红色文化数字平台为载体，实现课程育人与网络育人有机统一。驻马店市丰富的革命遗址、英雄人物、革命故事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借助数字化、AI、VR 等信息化手段，增强思政教学的互动性、趣味性和教育性，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在高职思政课程中，思政教师应结合驻马店红色文化资源，设计相关的教学活动和案例分析，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同时引导学生利用红色文化数字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要结合专业特色，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文化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结语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中，不仅能够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还能够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实际行动去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理论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各地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加强实践研究，进一步探索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路径，以期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3.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6.

[3] 王继光 . 地方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39): 23−25.

[4] 刘媛，林云峰 . 善用地方红色资源构筑“大思政课”课堂——以冀鲁豫边区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为例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16): 53−55.

[5] 张文倩 .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以驻马店地区为例 [J]. 科教导刊，2024(12): 38−4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研究资助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河南红色基因图谱可视化育人研究”（2025JYQS0141）；2025 年河南省驻马店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驻马店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研究”（250004599）。

（作者系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研室主任、讲师）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研究

李帅文

摘要：积极心理品质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支撑，培育此类品质是高校育人工作的关键环节。“三全育人”理念涵盖全员协同、全程融入、全方位覆盖核心要义，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目标高度契合，为模式创新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与实践框架。本文首先概述了“三全育人”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核心内容，接着论述了“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了“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的策略。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提升大学生自我认知、情绪调控、抗压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可行思路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三全育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

“三全育人”作为高校育人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以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全方位覆盖为核心要义，构建起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育人工作体系。这一理念所蕴含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思维，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所需的多元支撑、持续引导、全面渗透要求高度契合，为破解传统培育工作中存在的碎片化、单一化问题提供全新视域，更为培育模式创新奠定坚实基础。当前，高校在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心理健康课程、咨询服务、活动开展等形式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性提出更高要求。将“三全育人”理念深度融入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过程，推动培育主体从单一向多元拓展，培育过程从阶段向全程延伸，培育载体从传统向立体升级，成为高校提升育人质量的重要探索方向。本研究旨在为高校强化积极心理品质培育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助力大学生培育积极心理品质，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三全育人”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概述

（一）“三全育人”理念核心内容

“三全育人”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理念，围绕育人系统性与协同性，核心涵盖三个维度[1]。其一，全员育人。打破单一育人主体局限，整合教师、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以及学生骨干及家长等多方力量，明确各主体育人职责，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格局。其二，全程育人。贯穿大学生入学至毕业全阶段，衔接不同成长节点设计育人内容。其三，全方位育人。整合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以及网络空间等多元载体，实现育人场景全覆盖。

（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核心构成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指学生心理层面稳定且正向的特质，支撑其全面发展与长远成长。认知层面品质涵盖理性思维、创新意识与学习能力：理性思维助力学生客观分析问题、作出合理判断；创新意识驱动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探索未知领域；学习能力保障学生高效吸收知识、适应学习节奏，为学生学业精进奠定基础。情感层面品质涉及乐观心态、同理心与感恩意识：乐观心态帮助学生以积极视角看待境遇、缓解压力；同理心促使学生理解他人感受、友善开展人际交往；感恩意识让学生珍惜所得、回馈他人，构建和谐人际环境。社会层面品质囊括责任意识、协作能力与诚信素养：责任意识驱动学生承担学业、集体及社会义务；协作能力保障学生融入团队、高效完成任务；诚信素养支撑学生坚守道德底线、建立良好信誉，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二、“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支撑

立德树人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积极心理品质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内核。“三全育人”视域下推进模式创新，能够将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深度融入全员协同、全程贯通以及全方位覆盖育人框架，打破心理培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的壁垒[2]。通过课

堂教学渗透、实践活动锤炼、校园文化熏陶等多元创新路径，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锤炼乐观坚韧、责任担当等品质，夯实立德树人的心理根基，确保育人目标落地见效。

（二）适配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代大学生身处多元环境，面临学业提升、人际拓展以及职业规划等多重成长课题，对积极心理素养的需求更为迫切。模式创新可精准对接学生成长规律，教师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心理特点设计差异化培育方案。比如入学阶段通过沉浸式适应活动培育学生归属感，学业阶段依托专业实践项目锤炼学生抗压能力，毕业阶段借助职业模拟场景强化学生决策素养。这种精准化创新设计，能够切实回应学生成长诉求，助力其筑牢心理防线，更好应对成长挑战。

（三）提升高校育人工作效能的关键路径

“三全育人”视域下模式创新，能激活全员育人动能，让专业教师、辅导员、学生骨干等多元主体精准发力。可贯通全程育人链条，实现学生入学到毕业培育闭环。能拓展全方位育人场景，整合课堂、社团以及网络等各类载体。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全周期引导以及多场景渗透”创新模式，有效整合育人资源，破解传统培育中“碎片化”难题，显著提升心理培育系统性与实效性。

（四）助力大学生长远发展的坚实保障

积极心理品质是大学生终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其学业成就、职业发展与生活幸福。模式创新围绕品质培育长效性，通过“三全育人”框架让积极心理品质内化为学生稳定特质。在全员协同中，学生可从不同主体身上汲取正向能量。在全程引导中，学生能够逐步形成持续成长的心理韧性。在全方位渗透中，学生可在多样场景中锤炼人际协作、创新创造等能力。这些通过创新模式培育的品质，将成为学生应对未来职场竞争、社会挑战的重要支撑，助力其实现长远发展。

（五）顺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而积极心理品质是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标志[3]。模式创新紧扣“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方向，将心理培育与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深度融合。通过创新教学方法、丰富实践载体、营造积极氛围，推动心理培育从“被动干预”向“主动培育”转变，从“单点发力”向“系统推进”升级。这种创新不仅能够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更能增强高校育人特色，从而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三、“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创新策略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激活全员育人动能

梳理各类育人主体在心理培育中的具体职责，搭建“核心主导 + 全员联动”协同架构。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牵头制定整体培育方案，开展专业督导与技术支持，定期组织集体备课与方案优化。专业教师结合授课内容梳理积极心理元素，在课堂讲授、作业设计以及实践指导中自然融入品质培育，比如理工科课程融入创新思维引导，文科课程融入同理心培养。辅导员将心理培育纳入日常工作，通过班级例会、宿舍走访以及个体谈心掌握学生状态，及时提供情绪疏导与成长建议。学校选拔心理素质良好、沟通能力较强的学生骨干，经系统培训后组建朋辈互助团队，定期开展成长分享、主题沙龙以及学业帮扶等活动[4]。建立家校常态化沟通机制，每学期组织家长课堂与线上交流会，传递积极心理培育方法，引导家长配合学校开展教育。推行月度育人工作例会、季度专题培训以及年度成果展示等制度，保障多元主体信息互通、经验互鉴、行动协同。

（二）设计全周期递进培育路径，贯通全程育人链条

高校需结合大学生不同阶段的成长特征，搭建“阶段聚焦 + 逐步深化”全周期培育体系。新生入学阶段，开展集中心理测评，建立初始档案，组织“适应力提升”系列团体辅导，内容涵盖校园环境认知、学习方法调整以及人际交往技巧等。实施“学长领航”计划，安排高年级学生一对一对接新生，提供生活与学习指导。学业提升阶段，学校将积极心理培育与专业学习深度结合，组织学生参与专业竞赛、科研课题以及学术研讨等活动，使学生在任务推进中培养坚韧意志与创新能力。开展“挫折应对”专项训练，通过模拟项目攻关受阻、竞赛失利等场景，引导学生学习情绪调节与问题解决方法。毕业准备阶段，学校围绕职业心理培育开展系列活动，包括职业兴趣测评、行业前景分析以及职业规划课程等。组织模拟面试、简历优化指导以及职场礼仪培训，提升学生求职信心与应对能力。安排毕业生参与社区服务、乡村振兴调研等实践，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学校为每位学生建立动态更新的心理成长档案，记录各阶段培育参与情况与品质发展变化，确保培育内容前后衔接且层层递进。

（三）打造多载体融合培育矩阵，拓展全方位育人场景

整合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以及网络空间等各类资源，构建“多点发力 + 全面覆盖”培育矩阵。学校优化课堂教学环节，开设“积极心理学基础”“情绪管理”“人际沟通”等模块化选修课程，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以及情景演绎等互动教学形式，增强学生参与感[5]。打造“积极心理实践月”固定品牌活动，集中开展心理情景剧展演、公益服务市集、户外素质拓展以及心理知识竞赛等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积极品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通过校园广播开设《心理加油站》专栏，每周推送品质培育故事与方法。利

用宣传栏、教学楼走廊展示积极心理标语与学生优秀作品。开展“校园积极榜样”评选，宣传学生在坚韧成长、互助奉献等方面的典型事迹。在校园内建设心理放松区、成长分享角等主题空间，营造沉浸式培育环境。拓展网络培育渠道，开发系列心理科普微课，内容涵盖压力缓解、专注力提升等实用主题。搭建线上心理测评平台，提供个性化测评报告与提升建议。设计互动式心理小程序，包含情绪日记、正念练习以及朋辈交流等功能，从而实现培育服务随时可达。

（四）建立个性化培育服务体系，契合学生差异化需求

高校需立足学生个体特质与发展需求，构建“精准识别+定制服务”个性化培育体系。在新生入学后，通过问卷调查、班级座谈以及个体访谈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专业背景、性格特征、成长经历及心理品质基础，建立学生个性化需求档案。教师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专项培育内容，针对学业成绩优异但人际互动较少的学生，开设“人际沟通技巧”专项训练营，通过角色扮演、小组协作任务等提升学生交往能力。对参与科研创新意愿强烈的学生，组建跨专业创新小组，配备专业导师与心理指导教师，同步提供科研指导与心理支持。对热爱文艺创作的学生，扶持心理漫画社、心理文学社等社团发展，组织漫画创作比赛、读书分享会等特色活动。对参与体育训练的学生，结合运动场景开展抗压能力与团队协作培育。推行“一人一策”培育模式，根据学生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培育内容与形式，教师定期跟踪培育效果，从而确保服务精准匹配学生发展[6]。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培育专业支撑

高校围绕育人主体专业能力提升，构建“分层培训+平台支撑”师资建设体系。建立分层分类培训机制，针对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每年组织参加学术会议、专业技能研修班，学习前沿理论与干预技术[7]。针对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与心理培育融合”专题培训，指导挖掘课程中培育元素。针对辅导员，举办“心理沟通技巧”“危机预防与干预”等专项培训，提升日常引导能力。针对学生骨干与家长，开展基础心理知识与沟通方法培训。搭建师资交流平台，每月组织一次校内培育工作案例研讨会，分享实践经验与典型做法。每学期邀请校外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传递先进培育理念。与兄弟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跨校师资交流与联合教研。设立校级心理培育专项教研课题，鼓励教师围绕培育模式创新、课程融合方法等开展研究，形成一批可推广的研究成果。组建校级心理培育专家团队，由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资深辅导员以及专业教师组成，从而为一线育人工作提供方案设计指导、难题解答以及质量把关等支撑。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持续探索与深化。本研究构建的培育模式虽已形成清晰框架与实践路径，但时代发展不断赋予高校育人工作新内涵，大学生心理成长也呈现新特征。在未来研究中，教育工作者可进一步结合新兴技术发展，增强线上培育载体的互动性与实效性；深入挖掘不同学科心理培育元素，强化课程育人的渗透力；持续优化育人主体协同机制，提升培育工作精准度。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指引，不断推进培育模式创新与实践深化，必能助力大学生培育过硬积极心理品质，成长为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从而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强 .“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J].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2024(04): 137−140.

[2] 齐畅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析 [J]. 公关世界 , 2024(16): 39−41.

[3] 范婷 , 唐海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探赜 [J]. 领导科学论坛 , 2024(04): 127−130.

[4] 杨雯雯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12345”心理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J]. 河北职业教育 , 2023, 7(01): 33−36.

[5] 李俊茹 , 马立志 , 陈会然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高质量心理服务体系创新实践探索 [J]. 保定学院学报 , 2022, 35(06): 98−103, 132.

[6] 孟然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校院两级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 [J]. 西部素质教育 , 2022, 8(21): 96−99.

[7] 江婷 , 熊英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积极元素探析——以武汉商学院为例 [J]. 公关世界 , 2022(16): 36−3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X2025043）。

（作者系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研究

毕雪蒙 王建立

摘要：行动导向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实践参与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将其引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有助于缓解传统课堂中理论讲授偏多、实践联系不够、学生参与不足等问题，使学生在具体任务、情境体验和问题处理中更容易进入学习状态。本文围绕行动导向教学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展开分析，在概述行动导向教学理论内涵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高校思政课的课程要求和教学实际，进一步分析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并据此对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进行梳理和构建，以期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行动导向；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1]。高校思政课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任务。然而，传统思政课教学较多采用“教师讲授 + 学生倾听”的单向传递方式，课堂重知识讲解，轻情境进入和问题讨论，教学内容也更偏重理论表达与概念阐释，与学生所处的专业学习场景、日常生活经验及未来职业情境衔接不够紧密，结果是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参与有限，课后难以把所学内容转化为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实际能力，“上课不听、课后不用”的现象较为常见[2]。在这一背景下，探讨行动导向教学运用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具体途径，结合思政课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建构较为科学、可行的教学模式，已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需要回应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行动导向教学的理论内涵与特征

行动导向教学方法就是基于真实工作情景下的教育方法，其注重活动，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目的在于从各方面促进学生综合技能与能力的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瑞恩斯教授（Reginad Revans）首次提出该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实践。行动导向教学是依据完成一定职业工作活动所需的动作及动作生成与保持所需的环境条件和从业者内在的调节机制来设计、实施与评价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其核心在于把行动过程与学习过程相统一[3]。

行动导向教学遵循“完整行动模式”，一般包括六个步骤：明确任务 / 获取信息、制定计划、作出决策、实施计划、检查控制、评价反馈。这一模式强调学生从接受任务到完成任务的完整过程体验，通过“发现、讨论与解决在职业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经历与反思学习行动过程，最后掌握完成有关职业活动所需的各种知识、技能与能力”。在思政课上，该模式可转化成学生经过“实践体验—观察反思—理论提升—价值认同—行动转化”的全过程，行动导向教学与传统教学对比见表 1。

表 1 行动导向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

比较维度	传统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教学中心	教师为中心	学生为中心
学习方式	被动接受知识	主动建构知识
教学重点	理论知识的传授	实践能力的培养
评价方式	结果评价为主	过程与结果评价相结合
师生关系	单向灌输	双向互动

行动导向教学并非特定的教学方法，它是对教学全过程进行引导、组织的一种思路，它包括行动导向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考核标准、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等。将行动导向理论运用于思政课教学，需要对教学过程与评价体系进行整体重构，而不是对某种教学方法的单纯引入。

三、行动导向教学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应用价值

（一）增强思政课的实践性和互动性

传统思政课一般以理论灌输为主，缺乏实践环节和互动体验，容易导致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且参与度不

高[4]。行动导向教学以社会调研、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以及辩论赛为媒介，设计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任务，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大幅提升思政课的实践性、互动性。以安徽师范大学推行的“漫步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模式为例，该模式激励学生深入社区、企业和革命老区进行实地考察及提供志愿服务。通过“走、看、讲、思、做”这五个教学环节，学生可以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这种模式打破了课堂空间的局限，同时通过互动协作等形式强化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实效性。行动导向教学注重学生在行动任务实施过程中的实践体验和思考，实现思政教育从单向知识传递向双向互动建构转变，显著提升了课程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推动教学主体从教师向学生转变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处于课堂主导位置，学生更多的是接受现成内容，参与空间相对有限。行动导向教学更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投入，借助任务驱动、项目引导等方式，把学生逐步推到学习活动的中心位置。相应地，教师也不再只是单纯地传递知识，而是更多地承担学习组织、过程引导和现场协助的职责。通过调整，既能使学生更愿意进入课堂、参与讨论，也促使学生在查找资料、表达观点、处理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自主学习意识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该校在思想政治课程中设置了“我来说”“我来感”“我来画”“我来悟”等多个环节，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走上讲台，结合课程内容表达自己的理解，展示个人成果，并在一定范围内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组织。这样一来，课堂不再只是教师单向讲授的场域，学生也不再只是坐在台下听讲，而是在发言、讨论、协作和展示中不断进入学习过程。这种教学方式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索和团队协作中逐步建构知识、加深认识，并形成对课程内容的个人理解。借助项目式学习和问题探究，学生还能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制定计划、推进任务、完成展示，课堂中的角色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过去偏重“听讲”，逐步转向以“行动”和“参与”为主。

（三）促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

思政教育不应囿于书本与教室，要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引导他们关注社会、感悟生活、服务群众[5]。行动导向教学通过设计与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相关的实践任务，打破课堂的时空限制，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机融合。如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构建“政行校企家社馆”多元协同育人平台为抓手，组织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和社区服务、文化传承等实际项目活动，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加深对国情和社会的理解。广州市越秀区把红色研学作为载体，引领学生参观革命历史场馆，结合实地考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让思政课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种开放式教学模式拓展了思政教育的外延，同时增强教育内容的现实针对性和价值引领力。

四、基于行动导向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构建路径

（一）锚定“知行合一”目标，重构思政课教学目标体系

传统思政课的教学目标通常只注重知识传授与理论认知，而忽略实践转化与行为养成。建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战略性地重构教学目标体系，使之由传统“知识本位”锚定为“知行合一”，从而实现教学目标体系的价值提升。这就决定了教学目标一定要超越单纯的识记和理解理论知识而走向价值认同和实践运用的深度结合。新的目标体系应涵盖“认知、价值、行动”三个维度：在认知层面，重在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信”与“行”奠定理性基础。例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更需引导学生理解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中的实践逻辑，通过分析区域发展案例，深化对理论的认知层次；在价值层面，旨在通过情感体验与实践感悟，引导学生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形成稳定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情操；从行动层面上看，它强调把所学所信变成实际行动，提升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团队协作和道德实践的能力，使其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把“知行合一”这一宏大概念具体化，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操作和评估的课堂行为对象，如在教学“共同富裕”这一课题中，目标不应仅是“认识共同富裕的含义”，而应设置为“学生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针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或家乡的特定民生问题，如养老服务和留守儿童教育等，制定一个适用的微型公益行动计划，并详细说明该计划与共同富裕的理念之间的联系”。这类目标将理论知识和现实行动直接联系起来，为教学活动的设计指明了方向。

（二）创新“实践驱动”方法，打造课内外联动教学方法矩阵

教学方法是实现“知行合一”目标的桥与船。行动导向模式要求彻底摒弃单向灌输，转而采用一套以“实践驱动”为核心的、课内外联动的教学方法矩阵。在课内，教师要设计一系列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行动的教学情境，如采用项目式学习（PBL），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真实任务，让学生分组完成调研、策划与展示；开展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组织模拟联合国、道德法庭等活动，使学生在角色代入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和价值抉择；推行辩论赛与研讨式教学，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展开深度思辨，提升理论运用能力。

在课外，则要大力拓展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主题调研（如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公益行动等，使其在亲身参与和奉献中锤炼意志、践行价值。同时，可利用 VR 技术打造虚拟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创作正能量网络产品，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这套“课上启思、课下践行”的矩阵，共同构成一个“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螺旋上升学习闭环，持续驱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索和创造。

（三）整合多元协同资源，构建“立体化”思政教学资源库

行动导向教学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丰富、多元、开放的教学资源支撑。必须打破“一本教材、一个课件”的资源局限，构建一个融通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立体化”资源库。首先，要强力推动校内协同育人，打破思政课“孤岛”现象。主动与专业课教师合作，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如科学家精神、工程伦理等，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与学工部、团委、宣传部等部门协同，将思政实践教学与“三下乡”“挑战杯”、社团活动、主题党日团日等无缝对接，实现资源共享和活动互认。其次，要积极拓展社会资源，搭建稳定的实践平台。通过“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党政干部、劳动模范、“时代楷模”、优秀校友等走进课堂，用鲜活事迹讲好中国故事；通过“走出去”的方式，与博物馆、纪念馆、企业、社区、乡村等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将其转化为生动的“现场课堂”。最后，要大力开发数字资源，建设在线精品课、微课、案例库、视频库等，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学情分析，实现个性化资源推送，为行动导向教学提供全天候、智能化的资源支持。

（四）建立“过程 + 结果”评价，完善思政课教学评价机制

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是确保行动导向教学模式有效运行的“指挥棒”和“矫正器”。高校必须改革以往偏重期末书面考试、唯分数论的结果性评价，构建一个贯穿全程、多维考察的“过程 + 结果”综合性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应成为主体，重点关注学生在行动过程中的表现，其评价内容应包括：参与项目学习的积极性、团队协作中的贡献度、社会实践的深入程度、调研报告的质量、志愿服务的小时数与效果、课堂讨论与辩论的逻辑性与创新性等。这要求教师运用多元化的评价工具，如学习档案袋、观察记录表、小组互评、实践单位评价等。结果性评价则是对学生最终学习成果的考核，其形式应摒弃单一试卷，采用更富实践性的方式，如实践成果汇报、公益项目策划案答辩、调研报告评审、视频作品展示等，重点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真实问题的综合能力。另外，评价主体也要由以单一教师评价为主，向以多元主体评价为主转变，并引进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实践导师评价和服务对象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评价更加全面和客观。最后，评估的基本目的不应在于甄别、分级，而应在于促进成长，也就是要通过过程的及时反馈来帮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引导他们不断地反思和完善，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蜕变。

五、结语

行动导向教学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基于行动导向的思政课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行动为主线、以产品为导向，通过项目式、情境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将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有机结合，显著增强了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综上所述，行动导向思政课教学模式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对思政理论的认知与认可，增强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由理论认知向情感认同进而向行为实践转变。总之，行动导向型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广大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支持。只有在不断创新与实践探索中，思政课教学质量与育人效果才会不断提高，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才会得到较好的实现，从而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冯玉梓 . 行动导向：高质量职业教育思政课教学的有效之路 [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5(02): 81−84.

[2] 刘小毛 . 高职院校思政实践课“行动与任务”双导向教学模式研究 [J].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23(01): 88−90.

[3] 周敏 , 张璠 , 李雯 , 等 . 基于行动导向的高职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J]. 成才之路 , 2024(16): 17−20.

[4] 王伟 .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目标和任务分析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25, 43(03): 75−78.

[5] 杨玲 , 王涛 . 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课实效性提升 : 研究回顾与展望 [J]. 甘肃高师学报 , 2023, 28(01): 71−7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行动导向教学’设计思路下高校思政课主题创作实践模式研究”（2021GJJG565）。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分析

符敏霞

摘要：医院行政后勤党支部是医院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阵地与关键抓手，本文就行政后勤党支部如何在推进医疗事业高水平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管理的紧密联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赋能医疗质量提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增强员工凝聚力等进行论述，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期为医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医院管理；高质量发展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发展的强大动力，但目前一些医院仍存在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工作更多的是只注重理论宣传，没有形成支撑临床服务和运行保障的实际效能，行政后勤是医院“大后方”，担负着物资保障、设备维护、流程优化等重要职能，其工作水平将直接关系到医疗工作的效能和患者的感受[1-2]。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整个行政后勤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既可以增强后勤人员的责任感和服务观念，又可以在党建的指导下，促进管理机制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尤其是在强化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外在压力下，行政后勤党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打破常规，建立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价值生成机制[3]。本文聚焦行政后勤党支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其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运营管理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行剖析，探寻“思政教育 + 精益管理”的整合途径，以思想引导增强医院员工的责任意识，以组织凝聚方式解决跨部门协作难题，以文化建设构建节约型和创新型医院文化，最终为建立新型治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框架及其在医院的应用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进行教育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医院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明显的职业特点，主要表现为注重医德医风建设、注重以患者为中心、注重团队协作，同时还具备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样等特点，可以满足各层级职工的需要，有利于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发展[4-5]。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已由初创走向成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情况、新任务的出现，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思想政治工作在各个领域的运用，特别是在医疗卫生行业，它被认为是提高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水平和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有了较大的转变，越来越重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宣传、教育、服务、管理等工作。

（三）当前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分析

目前，大部分医院都认识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提高了医护人员的职业素质，使整个医院都形成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工作气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思想政治工作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强[6]。一些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流于表面，大多数都是在开会、读文件的层次上，没有深入医护人员的内心，也没有真正地帮助他们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的现实思想问题，其广度和有效性都远远不够，部分医护人员对思想政治工作仅有一种单向的理解，认为它和自己的专业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并没有很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另外，部分医院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忽略了不同科室、不同岗位医护人员的个体需要，致使工作缺少针对性，无法产生共振，影响了工作成效，已成为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深

化的重要因素，亟须进行变革和创新。

二、行政后勤党支部的角色与功能定位

（一）行政后勤党支部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

在医院党组织体系中，行政后勤党支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其组织结构清晰，既有党支部书记、支委会成员，还有许多普通党员，它肩负着监督和引导行政后勤部门每日运作的重要任务，努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医院的管理和后勤工作中贯彻落实。在运作机制上，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坚持定期召开例会，对各种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与此同时要注重建立完善主题党日、医学知识竞赛、技能比武大赛等活动，既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又可以将团队合作、敬业奉献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竞赛之中，使员工在主动参与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了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7]。

（二）行政后勤党支部在医院发展中的作用解析

在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党支部把强化党建作为中心工作，通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专题党课、进行党性教育实践活动等，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增强他们的理想信念，夯实他们的信仰根基。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业务培训与技能竞赛，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的业务能力，这样就能为医院的管理层不断培养一批政治过硬、专业过硬的人才，为医院的经营和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在管理上，行政后勤党支部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地到基层去调查，及时掌握工作中的难点与痛点，依靠党员的聪明才智，协助制定出可行的办法，使现实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同时大力推进改革和改进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引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手段，实现医院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同时，行政后勤党支部也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对职工的温暖关怀作用，对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为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慰问帮扶等活动，让职工的归属感、团体的凝聚力得到提升，从而把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为医院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全员政治素养

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医院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党委领导、支部落实、部门协同、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建立行政后勤与临床科室联动机制，定期开展思想动态调研与业务协同会商，破解“两张皮”问题，形成思政引领、管理增效、服务提质的良性循环。全面加强理论武装，将思想政治工作和医院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有计划、系统性、常态化地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此期间，要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各项政策、法律进行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我国健康战略的方向与内涵，让每位医护人员都清楚地了解到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在实际操作中，应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例如组织高水平的专题讲座，聘请专业人士做深入的阐释，通过举办富有成效的研讨会，促进不同科室和不同岗位的人员交流经验和思想。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医护人员的思想意识，增强对医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要持续提升职业道德水平，保持医者仁心的初心。在工作中，要让他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日常诊疗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在危急情况下的勇敢承担，还是在烦琐工作中的耐心细致，无不彰显着一种崇高的职业道德。同时，要大力提倡医护人员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走进社区、乡村义诊活动，把高质量的健康知识带到基层，参加健康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医疗条件。在工作过程中，医护人员可以将自己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变成实际行动，切实地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融入为患者服务的每一个细节当中，用更高的激情和高超的技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使医院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8-9]。

（二）优化管理流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在当前医疗行业迅猛发展的今天，管理流程优化是提高医院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行政后勤党支部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进医疗机构的深化改革，对现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精简，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与障碍，使信息传递、资源调配和工作协调更加有序高效。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收集患者的真实想法和意见，建立完善有效的申诉和反馈制度，保证患者的诉求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答复和处理，及时帮助解决患者遇到的各种困难，用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措施，获得患者的信赖和支持，为医院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与社会口碑。

（三）创新实践载体，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形式

打破传统说教模式，采用“理论学习 + 实景教育 + 实践锻炼”模式。利用本地红色资源、医院院史馆开展沉浸式教育；运用新媒体平台推送微党课、先进事迹短视频；开展“我为临床办实事”“后勤服务标兵”评选等活动，让思政工作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有温度。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网络教学，突破时空束缚，医护人员可随时进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行业道德规范学习。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该平台的交互沟通作用，通过设置主题讨论、在线答疑等形式，来提高医护人员的参与积极性，让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接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提高其吸引力和感染力。同

时，将医院特色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联系，使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开展医学知识竞赛、技能比武大赛等活动，既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又可以将团队合作、敬业奉献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竞赛之中，使员工在主动参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了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培育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打造“忠诚、担当、奉献、创新”的医院文化。将思政工作融入院训、院规、职工行为规范，开展廉洁文化、服务文化、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医患和谐、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行政后勤党支部是医院党建工作的重要力量，担负着对优秀人物进行发掘、传播、树立可学习的模范的作用。行政后勤党支部要深入基层一线，用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发掘在普通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做出卓越成绩的医护人员，他们既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术，又要在疑难病症诊治和医疗技术创新上有过人之处，才能为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秉承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清正廉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为患者服务，表现出崇高的医德风范。在大力弘扬先进典型的同时，充分运用医院内部宣传栏、微信公众号、座谈会等多种途径，对其进行全面的宣传，使医护人员深切体会到榜样的力量，通过这样一种直观的激励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医护人员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让他们产生一种积极的心态，从而营造出一种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促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业技能上追求卓越，在自己的思想政治方面有所提高。行政后勤党支部除了要关注先进典型，还要把目光放到普通员工身上，关注他们日常工作中的点滴进步，对在服务患者、团队合作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普通员工，适时给予相应鼓励和支持，比如发放小奖品、公开表扬等，让每位员工感到自己的付出被看到、被肯定，由此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促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力争上游，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

四、结语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它将党的先进理念和价值追求同医院的运营管理、医疗服务联系在一起，借由整合措施，可增强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与担当精神，进而改善医疗服务的环境，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只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探索，才能真正地激发出医院的内部生机和潜能。今后要不断加大两者的结合力度，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一个强大的“发动机”，帮助建设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的医疗服务系统，为维护广大人民的健康幸福作出贡献，谱写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全新篇章，促进和谐的医患关系发展。

参考文献

[1] 程健 .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研究 [J]. 智库时代 , 2024, 8(24): 279−282.

[2] 张卫东 .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研究 [J]. 办公室业务 , 2025, 34(12): 146−148.

[3] 饶芝丽 . 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保障作用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 , 2025, 18(04): 61−63.

[4] 焦静 , 管淳 , 董琳 , 等 .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加强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J]. 现代医院 , 2024, 24(07): 1031−1033.

[5] 叶璐 . 医院高质量发展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路径探析 [J]. 公关世界 , 2024, 32(03): 19−21.

[6] 汤传仕 . 浅谈用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 [J]. 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 2020, 3(13): 98.

[7] 缪冬映 , 钱梅军 .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策略 [J]. 国际援助 , 2025, 12(02): 51−53.

[8] 丁娜 . 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J]. 山西青年 , 2018, 43(19): 129.

[9] 吕思瑶 , 刘笑 .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加强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探析 [J]. 大武汉 , 2024, 19(22): 116−11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唐阳阳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给传统的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目前高校思想政治课堂仍然以传统的教学方法为主，还没有和人工智能技术充分融合，存在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不足、思政教育者技能缺失、人机关系冲突等问题，人工智能创新思想政治课育人理念，开创思想政治课智能教学新场域，为学生提供更具个性化、更精准的学习体验。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将不断提高，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政教育；思政课堂；教学研究

截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国知网中文总库中以“人工智能”为检索词共检索到高达 37.69 万条结果，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检索词则减少到了 6.2 万条结果。以“人工智能”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为检索词的检索结果仅有 1025 条。这些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广阔的应用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专家注重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但是对人工智能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课堂对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融合程度偏低。

一、人工智能的内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人工智能是一个多学科交融的领域，旨在通过计算机系统模拟人类智能，让机器具备像人甚至超越人类的感知、理解、学习、推理、决策和创造等能力，并以此完成原本需要人类亲自处理的复杂任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必修课共有四门，涵盖政治理论、历史纲要、道德修养、法律知识四大方面。综合来看，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较为丰富。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人工智能创新思想政治课育人理念

技术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如今，人工智能逐渐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才培养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以知识记忆为核心的培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当今社会更需要的是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分析、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人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情境适应能力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于肩负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政治课来说，这场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推动着教育理念的深入创新，高校思政课堂必须积极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主动融入人工智能技术[1]。

（二）人工智能开创思想政治课智能教学新场域

人工智能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教学辅助工具，而是深刻重塑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场域的核心力量，它突破了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和时间限制，打破了线下课堂与线上虚拟空间的界限。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模糊了正式课堂学习与非正式自主学习的界限，促使“教师—人工智能—学生”之间形成多维立体的互动网络，最终构建全景覆盖、身临其境、实时互动的智能教学新场域，充分体现“人工智能 + 思政教育”教学新场域特有的多样性、智能性、效率性、灵活性[2]。

（三）人工智能带来个性化精准的学习体验

借助人工智能，高校思政教育各方面不断优化，智能教学和个性化训练协同推进，使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中收获更多。对学生通过人工智能学习高校思政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数据分析，教师可以开展更加准确的教学活动。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时，教师将不再单纯地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学生在思政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数据进行更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学习资源推荐方面，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学生的学习习惯、兴趣爱好、知识掌

握等情况，并使用人工智能的智能推荐系统，推送最适合学生的学习方案。通过人工智能提供的个性化动态评价，学生也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阶段性的学习情况，包括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学习方法的有效性、学习进度是否合理等，根据这些评价结果，学生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与发展条件

（一）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空间广阔

目前，在高校思政课堂上，人工智能技术和课程的融合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深度协同的潜力尚待进一步释放。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和思政课堂的融合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许多高校开始利用智能平台推送学习资料，通过在线问卷收集学习反馈等，这些有益尝试为未来更深层次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政课堂思想引导和价值构建中的作用还有巨大的空间，从当前的“简单叠加”迈向“深度融合”，将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知识传授层面提升到精准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的新高度[3]。

此外，高校思政资源的系统化整合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提供了重要契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理论教学、课外实践、交流讨论等多个环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应用正在从单一特定场景向多场景联动拓展，对各类思想政治资源进行系统整合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针对大多数学校思政课连续几个学期开设多门课程、由不同思政老师授课的实际情况，建设统一的智能平台、打破不同教学软件之间的数据壁垒，将为全面追踪和分析学生的思想行为提供有力支撑，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真正实现从“被动反应”到“主动预测”的跨越。

（二）思政教育者数字素养提升的现实需求与成长方向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课主要采取的是大班授课的模式，每节思政课的学生都非常多，目前我国高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思想政治课上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有时候一节课上能容纳几百个学生。这种大班化的思政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将为大班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使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借助智能工具更好地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状况，实现教学管理的优化升级。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思政课教师开始主动拥抱数字化教学手段，从多媒体教学资源的运用到智能教学平台的探索，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正在稳步提升。未来，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积累，教师将能够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分析和反馈，充分把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学习态度等情况。这将有力地推动教学从“统一模式”向“因材施教”转变，使教学内容和方法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激发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并提升参与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4]。

（三）人机协同为教育本质回归创造新机遇

在高校开展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构建和谐的人机协同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回归提供了新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情感共鸣与价值共鸣的双向构建，引导学生思想，塑造学生人格，需要老师和学生面对面交流，用眼神互动、语调转换等情感沟通方式实现师生互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非要取代这种人文关怀，而是通过语音识别、表情分析等辅助手段，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情感状态和思想需求，从而让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需要人文温度的教育环节中。

人机协同模式也推动着教育主体角色的优化升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思想成长的引导者，教师的一言一行和人格魅力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人工智能将帮助教师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更加专注于与学生的深入对话和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及时回应学生的思想困惑。这种“教师主导、智能辅助”的模式将进一步巩固思想政治教育“人与人”的主体关系，彰显教育的人文属性，为高校思政教育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智能化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场域契合“Z 世代”学生追求个性表达、热衷创新体验、具有强烈求知欲的特征，将重构思政课堂的教育方法和内容，思政教育的接受方式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熟悉数字化教学模式和智能化教学设备的老师可以借助全息投影、虚拟现实（VR）、扩展现实（XR）等前沿技术，让思政课堂不再枯燥乏味，让思想政治课从“平面教学”转变为“立体呈现”，让书本上的枯燥知识转变成动态的视觉场景，让历史事件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重现，让原本局限于教科书的内容在三维虚拟空间中“活”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搭建“红军长征”的沉浸式场景，学生可以从“第一视角”来感受革命前辈的艰辛历程；利用增强现实技术，扫描教材中的历史图片，可以触发动态视频讲解，让历史和现实的交融更加协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思想政治智慧教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高校思政课堂逐渐从“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定制”升级。传统教学中不论学生学习情况如何，均提供完全相同的“大班式”的教学内容，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兴趣偏好等不同情况快速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无论是思政课堂上核心理论的文本解读、体现时代精神的短片，

还是模拟社会热点话题的互动脚本，人工智能都能匹配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精准化教学[5]。

（二）实现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化与科学化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师构建一个更丰富、更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学资源库，教师备课时需利用好人工智能。思政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全球时事新闻、学术研究成果、社会热点案例等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和智能筛选，思政课堂上将出现源源不断的新教学素材。思政教师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技术，根据不同的教学主题和学生需求自动生成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这将会大大减轻教师的备课负担，提高教学效率[6]。

教学模式也将不断创新，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教学系统将实现对整个教学过程的智能管理。在思政课堂教学中，智能助教可以实时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为教师提供实时的教学建议，帮助教师调整教学节奏、重点关注一些知识点等。课后智能辅导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情况，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辅导方案，让学生关注知识掌握薄弱的章节，帮助学生自查学习情况[7]。

（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强化人本理念

思想政治课教师不仅要积极提高自身的人工智能数字素养，掌握智能教学平台的操作方法和智能教学工具的应用技巧，还要在“思想政治大课”建设背景下充分挖掘数字化教学资源，将红色文化、时代精神等思想政治要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与智能技术的互动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素养。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对传统的师生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多样化，他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检索信息、分析问题的能力甚至可能超过了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教师的学术权威。未来师生关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知识给予者”和“知识接受者”，而是逐渐发展为“引导者”和“探索者”、“合作者”和“成长伙伴”这样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要重新定位角色分工，要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思想动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价值导向；同时，教师在与学生共同研究新问题的过程中，要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学术品格为学生树立榜样，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传递正能量，维护师生尊严，实现师生共同成长[8]。

五、结语

在培养新时代人才的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课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正确合理地利用人工智能，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堂中，借此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高校思政教师要积极学习人工智能应用工具，升级教学方法，思政课堂要尽快实现教具智能化，教学方法科学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思政老师要教导学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课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未来思政课堂必然会更加科学与高效。

参考文献

[1] 李清源，滕飞．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方式 [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5, 41(06): 2, 135.

[2] 刘昱．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 47(S2): 253−255.

[3] 余慧谍，吴鸿瑞．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策略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 24(20): 178−180.

[4] 张甲田．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究 [J]. 高科技与产业化，2025, 31(08): 53−56.

[5] 徐蔓鸿，王丹，刘光玲．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的意蕴与思考 [J]. 科教导刊，2025(24): 10−12.

[6] 曾雅轩，赵侃．困境与破局：人工智能赋能涉农高校思政教育路径探析 [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5, 42(08): 94−99.

[7] 栾云镪，谢于风．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向 [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44(04): 93−100.

[8] 王晓艳．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大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 37(12): 141−142, 14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高校数字化就业场景下的思政教育创新实践研究——以在绍高校为例”（Y202557574）。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研究

施慧娟

摘要：推动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对南京市 4 所职业学校 874 名师生开展的问卷调查，系统考察了中高职思政课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方面的衔接状况。研究表明，当前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如下：教学目标层次递进性不足、教材内容存在重复与断层、教学方法转型缓慢、评价机制衔接不畅，以及师资协同机制缺失等。本文从目标体系分层设计、内容结构优化、教学方法创新、评价机制贯通四个方面提出推进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增强职业教育思政育人实效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问卷调查；困境分析；突破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1]。《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全面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突出学段之间的衔接与整体效能。由此可见，强化思政课的政治引领与价值塑造功能，推进纵向一体化建设，已成为推动其内涵式发展、提升育人质量的必然要求。

在职业教育体系中，中职与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由于两学段学生在认知与心理发展上存在差异，思政课设计必须体现阶段性特征。本文以南京市 4 所职业学校的 874 名师生为调研对象，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系统分析，探索中高职思政课在教学目标、内容结构、教学方法与评价机制等方面的衔接现状，剖析当前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现状，进而提出推进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突破路径。

一、问卷调研数据分析

为系统考察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现状，本研究面向中职学生、中职教师、高职学生及高职教师四类群体展开问卷调查。问卷涵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四个维度。调查共发放问卷 874 份，回收有效问卷 823 份（中职学生 405 份、中职教师 37 份，高职学生 347 份、高职教师 34 份），样本覆盖南京市 4 所职业学校多个年级与专业，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教学目标衔接分析

调研显示，中高职思政课教学目标衔接存在显著脱节。从中职教师反馈来看，能够系统参考高职阶段课程标准进行教学目标设计的教师占比不足 5%，逾七成教师表示仅“部分参考”或“未参考”相关内容。同时，约 45% 的中职教师认为现行课程目标仅能“部分支撑”高职阶段教学，另有 35% 的中职教师认为“支撑明显不足”。

中职学生中，近半数中职学生指出当前教学目标与自身成长需求“部分符合”，约八成学生认同思政课程需为高职阶段学习奠定基础。相比之下，高职学生中仅约 40% 认为中职阶段课程对其当前学习“部分有助益”或“有较大助益”，能够感知到教学目标递进性的学生比例同样为 40% 左右。从高职教师角度来看，近 45% 认为当前课程目标在纵向衔接层面“体现不足”，且约 75% 明确表示缺乏有效的跨学段衔接机制。

（二）教学内容衔接分析

中高职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存在明显重复与断层，缺少衔接。在中职教师群体中，约 75% 的教师认为两学段教材内容“重复较多”。在教学实践方面，能够系统关联高职阶段内容进行授课的教师仅占一成。超过 70% 的学生反映当前课程内容与中职阶段存在“大量”或“部分”重复。对于教学内容是否体现循序渐进，近四成学生认为“不明显”或“完全无感”。在开放性问题反馈中，学生普遍希望增加职场法律案例、社会实践指导等内容，体现了其对职业导向性教学内容的现实需求。

对高职教师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教师认为当前教材内容重复现象较为突出，另有约 15% 的教师指出存在“脱节现象”。关于后续改进方向的多项选择中，“减少重复内容”与“强化与中职衔接”是最受关注

的两个选项。在“跨学段教学资源共享”方面，“实践基地共建”与“无稳定共享机制”选项占比较高，表明两学段间尚未建立起持续、有效的合作渠道。

（三）教学方法衔接分析

课堂形式单一，占主导的仍是以讲授法为主，大约 40% 的教师将这种方法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式，还有 35% 左右的教师采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但需要注意，有 70% 的教师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以视频资料、PPT 作为资源，教学方式仍有极大拓展空间。

在学生中 2/3 的中职生、高职生认为，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多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学生接受度高，而且效果好。开放性问题教学时学生希望可以举一些与生活相近的例子，以及具有互动性的活动，和自己所学的专业结合在一起。

通过对高职教师调查可以看出，40% 左右的教师试着把思政内容与专业实训结合在一起，但仍有 50% 左右的教师只是偶尔才这样做。跨学科教学方面，中职和高职教师多数会反映合作制度不完善，或是政策的持续力度弱等，这也是制约目前教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四）教学评价衔接分析

评价方式上的差异折射出中高职思政课在衔接机制层面的深层问题。中职阶段的评价仍以标准化考试、课堂展示等传统方式为主。超过八成的中职教师反映，所在学校尚未建立起贯通中高职一体化评价标准，评价活动的设计缺乏纵向衔接意识，制度层面的支撑也相对薄弱。高职教师同样指出，现行评价体系存在明显偏颇：知识考查被置于突出位置，能力评估则相对边缘化，评价形式较为单一。尽管个别学校尝试引入企业导师参与评价环节，但覆盖面有限，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考察。

从学生群体的反馈来看，近七成中高职学生均表达：现有的以闭卷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很难真正体现出学以致用的能力。他们比较认同“混合式考核”模式，相当部分学生提出期待更加注重实践表现与价值观内化程度的评价方式。数据统计中还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高职师生都普遍建议，可以通过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实施阶段性对比评价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学习发展过程的动态跟踪与系统反馈，使评价真正回归服务教学改进与个体成长的初衷。

二、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虽已受到一定关注，但整体仍处在探索阶段。结合问卷调研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教学目标的系统衔接分析

调研及教材对比分析显示，中高职思政课程在目标设定上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状态，难以形成有机统一的目标体系。中职阶段更注重政治认同和基础性知识的传授，而高职阶段则转向理论深度拓展与政策应用能力培养，但二者之间的递进逻辑不够清晰。总目标与各阶段分目标之间的契合度有待加强，各阶段的教学目标尚不能与其他阶段有机衔接 [2]。调查问卷结果进一步佐证这一现象：仅约 5% 的中职教师在目标设计时系统参考过高职课程标准，而有近一半的高职教师认为现有目标未能充分体现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性要求。

（二）教学内容的衔接情况分析

调查进一步证实：约 75% 的中职教师和 65% 的高职教师认为课程内容存在一定的重叠性，超过七成的高职学生也表示学习缺乏新鲜感。同时，一些教师指出，中职阶段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导致进入高职后既感受到部分内容的重叠，又在某些环节出现知识断档。由此可见，当前的课程设计在规避内容冗余与实现循序渐进的层次化梯度设计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尚未实现高职内容对中职知识的有效深化与衔接 [3]。

（三）教学方法的创新与衔接情况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职、高职教师在教学方法方面过于单一，且创新度不足。中职生都认为需要使用多媒体，只有 30% 的学生认为，在课堂中需要经常表达观点。高职生则希望可以融入社会实践，可以采用案例讨论法来提升参与度。结果却显示，课堂中的互动率低。同时教师反映跨学段教学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持，而且设计薄弱。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教学法有所优化，但却未能形成有效的衔接制度，与学生进步的学习需求不相符。

（四）评价标准的衔接与育人导向分析

当前多数中职、高职学校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思政课评价标准。中职阶段的评价只重视知识记忆方面，未能重视能力方面的培养。教师指出现有的评价过于重视知识，而不重视素养，而且没有跨学段的连接意识，再加上跟踪及反馈机制缺乏等，都说明了评价体系的系统化不完善，育人功能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

总的来说，上面的情况说明了纵向一体化价值导向得到了教师与学生的认可，但是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目标设计等关键节点，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三、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突破路径

基于问卷调查所揭示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突破路径。

（一）明确分层目标体系，凸显教学目标的层次性

教学目标是推进一体化建设的逻辑起点。在中职阶段，应聚焦政治认同塑造、社会规范内化与职业价值观启蒙等；高职阶段则应在此基础上，着力提升理论系统性与政策应用能力。在构建分层递进的目标体系过程中，需充分体现中高职两学段教学目标的梯度差异。从课程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来看，着力建立纵向贯通的衔接机制是首要任务。例如在设计中职阶段目标时，应明确高职阶段能力需深化的部分，并且高职阶段目标需在“承接中职、拓展提升”的框

架下进行细化。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动态修订机制，使目标体系能够根据学生学情变化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适时调整，以增强其连续性与适应性。

（二）优化内容供给，强化“思政＋专业”双向融合路径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能否取得实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材与课程这两个基础环节是否衔接顺畅。从教材编写来看，不同学段承担的功能本应有所区分：中职阶段可把重心放在基础概念的解析、制度常识的普及以及价值观的初步引导上；高职阶段，则需要在理论深度、政策理解与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方面有所突破。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在实现育人成效的同时也能彰显职业教育的特色。这就意味着，应立足专业特点、学生年龄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推动思政内容有机融入专业学习、日常生活与未来职场情境[4]。此外，需正视学段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易导致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可依托国家和省级平台，将优质案例、社会热点和政策文本加以整合，再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做差异化处理，将有助于形成前后贯通、层次分明的课程内容体系。总而言之，构建以整体性思维为导向的内容统筹机制尤为必要。此外，中高职院校可将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组合为跨学科共同体，探索建立“协同型”教师团队，共同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推进“思政＋专业”的双向融合，以期为思政课纵向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撑。

（三）创新教学方法，提升课堂的实践性与参与度

推动教学从“单一讲授”向“多元互动”转型。教师可尝试运用案例研讨、角色扮演、小组协作等形式，使学生在互动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另一个思路是强化实践导向，让思政教育与职业技能训练、社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中职阶段可组织社区服务、志愿劳动等体验式活动，高职阶段则可引导学生参与企业调研、社会调查或创新创业项目，从而实现思政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深度融合[5]。

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为课堂创新带来了更多可能。可通过有效设备促进教学发展，在提高课堂直观性以及参与度的同时，还能促进不同学段以及不同学校间的教学合作。

（四）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助力教学改进成效

目前思政课的考核是以知识记忆为主，无法有效关注学生的能力发展以及价值观的完善，评价结果未能反映现有的教学效果。可从如下几点进行优化。

一是在教师要素进行设计时，不能只看重其学业成绩，还要加入职业道德、实践创新等内容，构建起终结性与过程性评价的方式，这样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养，实现用评价服务于学生的目的。

二是要关注评价层面的纵向连接度，构建起学生的专门档案。对于中、高职阶段的学习表现，一直进行记录，并做好对比，让学生有着完整的发展轨迹。

三是重视多元化的评价，引入行业专家、企业导师等多方力量，对学生在职业环境中的思政素养开展综合评价，有效提升评价结果的针对性及客观真实性。

四是评价结果不能只停留在学业认定方面，教师要将其变成教学优化的根据。通过学生反馈以及成长数据，开展系统性分析，对目前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优化教学方法，实现针对性的教学。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EB/OL]. (2019−03−18)[2026−05−04].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3/18/content_5374831.htm.

[2] 张江伟，燕智文．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挑战与破解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06): 32−35.

[3] 刘咏宝．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J]. 江苏教育研究，2023(07): 60−63.

[4] 潘乃烨．“思政＋实践”：五年一贯制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研究 [J]. 教育视界，2025(02): 32−36.

[5] 袁阳，陈慧．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育人模式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5(14): 181−18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立项一般课题“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研究”（B/2024/7/018）。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政治逻辑

胡艳萍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深刻社会变革。从生成式 AI 的惊艳亮相到大数据分析的深度应用，智能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为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和广泛应用，更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重要论述的必然举措。对此深入研究，是牢牢把握思政课实践教学正确方向、进一步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需要。

关键词：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政治逻辑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深刻社会变革。从生成式 AI 的惊艳亮相到大数据分析的深度应用，智能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实践教学是思政课教学体系的重要环节，是连接理论认知与价值认同、知识传授与素养提升的桥梁，对于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思政课实践教学长期面临着多重现实矛盾，其育人效能有待进一步释放。如何精准回应这些挑战，将技术的“最大变量”转化为教育发展的“最大增量”，成为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 解决好“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求在思政课教学中必须做到党的创新理论尤其是最新成果及时进入教案、进入课堂、进入学生头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教学特别是思政课实践教学、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对思政课实践教学带动作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方向指引和政治性要求。

一、贯彻落实“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政治性要求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在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思政课教学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政治性要求，必须把握理论与实践所具有的崭新的时代内涵，理论必须是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践亦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践。

现代意义上的实践，无论是依领域划分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等，还是按部门分类的工业生产实践、农业生产实践、科学教育实践、医疗卫生实践、文化艺术创造实践等，已经没有哪个领域、哪个部门的实践与人工智能毫不相干，就是过去一直被认为科学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业生产，今天在不少地方人工智能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种粮大户已经用上人工智能育种，有些地方农业生产早已使用智能精准滴灌技术，有些农村已用上无人机喷洒农药和施肥，有些地方无人插秧机、无人收割机已在田野里高效播种和收割，有些地方早已使用人工智能烘干和仓储。现代化智能化工业生产更是比比皆是，很多工厂从原材料进厂到传送至车间，从生产到质量检测再到产品出库，全流程皆是智能化控制。因此，思政课实践教学，仅就组织学生到农村、工厂、国家大科学装置等实地参观研学而言，所见所闻的各种实践活动及实践教学内容都是渗透着人工智能的相关元素。思政课实践教学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学生到爱国主义基地等场馆进行现场教学，这些实践教学场馆多数已升级为人工智能赋能的场馆，很多展厅是人到灯自动亮，有些展馆还配有人工智能讲解员，一些重要展厅更是用声光电智能化控制再现当年革命斗争场景。仅就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看，都离不开 Al 赋能的实践教学。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

可见，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时代摆在高校每名思政课教师面前十分迫切的现实课题，更是社会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政课教学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等重要论述的举措。

二、贯彻落实“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的政治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3]。“社会大课堂”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指向和源头活水。而“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的“现实”，当然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时代脉搏”[4]的人工智能技术，思政课实践教学必须把握人工智能这一蓬勃发展的“时代脉搏”的最强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确保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正确方向和良好学风的政治性要求。

（一）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大大拓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大数据分析、虚拟仿真、智能交互等 AI 技术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够突破传统实践教学的时空限制，将社会大课堂中的鲜活案例、现实问题动态引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小课堂。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红色教育基地场景，或利用数据分析呈现社会热点问题的多维度视角，使抽象理论具象化。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够带来实践联动，AI 可整合社会资源（如乡村振兴、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等实践案例），帮助学生通过数字化手段“沉浸式”参与社会实践，使“社会现实”深度融合到实践教学之中。

（二）AI 赋能将极大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能够提高实践教学的精准性、针对性。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高校大学生在理论教学之后的思想状态和理论困惑，精准确定学生在思政课理论教学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用实践“解困”的问题，选择有针对性的社会“大课堂”组织教学，让社会实践这一最鲜活、最有说服力的“老师”帮助学生解疑释惑，体现思政课实践教学“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5]的政治性要求。二是能够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智能平台可实时连接社会大课堂中的基层实践（如乡村振兴调研、社区治理案例、法院庭审直播等），推动学生通过 AI 工具参与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形成“发现问题—探究思考—实践检验”的闭环。

（三）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能更好地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政治要求

一是能够有力推动全员协同搞好思政课实践教学。人工智能能够把高校、企业、乡村、社区等多元主体快速高效联结为一体，构建“社会大课堂”实践教学资源库（如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事迹数据库、各地区各领域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数据库、科技创新智能学习系统等），推动思政课教师与社会实践导师协同育人。二是促进思政课实践教学各课程贯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帮助高校思政课教学主体分析思政课每门课程最适合开展哪些实践教学，实现不同课程实践教学、实践育人的有效衔接，避免实践教学无意义的重复，而且能够准确记录学生实践教学轨迹、实时分析实践教学成效，在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全过程育人的基础上，确保教学和育人的实效。

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接地气、强实感、增实效”，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课堂结合”从思想指导转化为育人实践，是新时代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使命要求。

三、贯彻落实发挥人工智能“很强的‘头雁’效应”的政治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6]这一重要论述虽然直接揭示的是人工智能对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但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价值。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政治性任务。

（一）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将大大促进具有“头雁”效应的教学理念的转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教学理念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起着“头雁”的作用。教学理念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思政课教学“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这一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了思政课教学的理念要求。长期以来，在思政课的理论教学中，尽管尊重教学对象主体地位和教学实施过程中贯彻启发式教学理念被不断提及，但仍有一部分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主宰者而非主导者，一言堂全灌式教学理念根深蒂固。与此相反，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教师奉行的是“放鸭子”全不管式教学理念，开展实践教学时往往就是带着学生到某一实践教学基地或某一场馆“走一遭”，教师既不“主导”，学生也体现不出是“主体”。可想而知，在这种教学理念主导下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智能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推动这种“放鸭子”全闭环式实践教学理念的加速变革，教育的主客体都要加快树立积极作为的 AI 赋能实践教学理念。教育主客体都要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开展好实践教学。教学主体即教师在开展实践教学之前，需要学习和掌握 AI 赋能实践教学的基

本操作要领和步骤；在开展实践教学之初，教师在向学生讲授开展实践教学的目的和注意事项的同时，更需要向学生介绍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实践学习的要领。教学客体即学生，在实践教学之前，掌握好人工智能技术，才能运用各种信息平台进行预设学习；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自如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在教师的主导下自主地开展学习。可见，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主客体双方都要自觉树立起积极主动作为的实践教学理念，这就是由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实践教学理念的变革。

（二）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将在思政课的“雁群”中发挥“头雁”效应

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带来思政课实践教学理念这一“头雁”发生变化，这是仅就实践教学自身而言的，这种“头雁”作用发挥出来，必将促使思政课教学整体发生变革。实践决定认识。AI 赋能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凭借其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内容，使得整个思政课教学，必须高度自觉地贯彻新大纲要求，不能固守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教学模式，必须把社会实践教育教学的内容和学时等要求真正贯彻落实到位。即使是思政课理论教学，也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要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7]“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一原理启示我们，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思政课理论教学，不能只是从原理和原则出发，必须从各领域各方面都打上 AI 赋能烙印的实践出发。整个思政课教学，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搞好教学设计。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将更加灵活多样，教学手段将更加丰富多彩，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将越来越明显。可见，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不仅能推动教学技术手段的更新，更能为思政课教学带来全新的理念和方法，促进思政课传统教育模式的革新，提高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兴趣，这就是“头雁”效应所带来的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整体跃进。

（三）AI 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将带动其他学科专业教学改革的深化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对思政课实践教学产生深远影响，还能够带动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学改革。作为“头雁”，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经验，能够为其他学科专业实践教学提供有益借鉴，推动高校整个教育教学体系特别是实践教学体系的智能化转型。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引入 AI 技术，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能够为其他学科专业的教学模式创新提供宝贵经验。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建立更加智能化的学习管理平台，推动课堂外的自学与复习活动，通过数据分析实时反馈，优化学生的学习路径等。

四、结语

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未来，高校应进一步加强 AI 技术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强化教育治理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完善制度设计与技术支持体系，构建科学、智能、可持续的思政课实践教学生态体系，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2021-03-07(01).

[4]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2-06-24(02).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 习近平．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N]. 人民日报，2018-11-01(0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安徽省教育厅省级质量工程项目“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模式构建与评价体系研究”（2024sxzz086）；2024 年度安徽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思想政治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sztsjh-2024-12-24）；2025 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安徽新华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数字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究”（sz202501）；2025 年度安徽新华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大思政课’视域下民办应用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与效能提升研究”（IFQE202505）；2025 年度安徽新华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安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研究”（2025rwzdi21）。

（作者单位：安徽新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实践进路

徐嘉仪 曾 环

摘要：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将数字技术与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学要素深度融合，革新教学内容、方法与环境，提升一体化育人效能。在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中，也对育人深度与协同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需以育人本质引领技术应用，通过强化教师主体地位，界定虚实教学边界，建立跨区域资源共享平台，以开展分阶段数字素养培训等路径加强数字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更好地发挥数字思政课的先进作用，推动新时代思政课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思政课一体化；数字思政；数字技术

2025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持续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助力教育教学深层次变革”，为新时代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已进入攻坚期，更需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机遇，探究数字思政深度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实践途径，重构数字时代的思政教育生态。

一、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应用价值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本质是将数字技术与各学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思政课一体化核心要素深度融合，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数字化思政育人体系。数字思政以其先进的技术特性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注入了新动能，提供了新思维，开辟了新空间。

（一）革新教学内容，满足丰富精准的学习适配需求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核心价值在于促使教学内容提质增效，实现从单一供给到多元适配、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支撑的转变。一是拓展内容广度与深度，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将数字教学资源转化成各学段思政课教学内容的辅助工具，该数字技术链接海量网络资源，并根据不同情境和学段要求持续进行富有创造性、个性化的内容输出，帮助教师挖掘经典著作、权威报告等资源，夯实各学段教学内容的学理性与丰富性。二是精准匹配学段需求，大数据技术可捕捉各学段学生学习痕迹，用学生真正有困惑、感兴趣的教学重难点问题激发思想共鸣，并根据实时学情反馈调整内容深度与呈现形式，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二）创新教学方法，构建递进交互的跨学段方法体系

数字技术为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极大丰富了思政课教学形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通过解析学生认知发展曲线，精准识别各学段思维跃迁的关键节点，进而自动生成适配不同认知层级的教学策略组合，避免不同学段教学方法的割裂[1]。数字思政的运用，开创了“师—生—机”三元交互的教学模式，不仅实现每一学段“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互动教学，更依托数字化平台支撑起大中小学思政课开展跨学段主题互动，在不同学段学生的思想碰撞与经验分享中有效激发各学段学生的主动性。

（三）更新教学环境，打造虚实融合的一体化环境

数字思政突破传统课堂在时空、场景、受众适配等方面的局限，构建起更具包容性与互动性的新型教学环境。一是虚实共生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2] 数字思政能够将思政课各要素“活”起来，将思政故事以情境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各学段学生均能直观体悟思政课内涵，解决低学段听不懂、高学段不感兴趣的问题。二是跨时空环境，借助远程数字平台开展不同学段教师的教学研讨等活动，促进学段间教研协同与一体化教学，同时依托大数据平台、慕课、网络思政公开课等数字载体，思政课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教室等固定场所，有效拓展了教师的教学范围和学生的学习空间。

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优化空间

在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背景下，数字思政作为新时代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技术应用规范与协同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提升空间。

（一）技术应用有待优化，对一体化育人深度提出新要求

数字技术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应用必须遵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服务于思政课本身。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学实践对技术工具的依赖程度有所提升，揭示出数字技术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有待优化。

一是需要进一步强化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的主体作用。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快速输出标准化教案及典型教学案例，大幅降低思政教师重复性备课的时间成本。但若过度依赖现成素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教师对教学内容和价值引导的深度思考，因此应引导教师将数字技术作为辅助工具，持续提升原创性教学设计能力，巩固教师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避免人工智能的类人化特征与话语生成能力使知识传播话语权从教师向技术转移[3]。

二是需要在技术应用中持续关注师生情感互动的质量。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心”的工作，其温度、深度与效度依赖于师生间真实的情感共鸣与思想碰撞。人机交互的常态化丰富了教学互动形式，但也需要兼顾面对面交流的独特价值，通过优化互动设计，保障教师含有感情的表情、体态、语言语调等信号的有效传递，提升对学生情绪波动的捕捉与回应效率。从一体化建设视角看，各学段思政课需构建“具象体验—抽象反思—价值认同”的情感培育链条，AI 作为无人类情感的计算机编码集合无法替代教师对学生人格尊严、价值诉求的深度关切，需与教师的人文关怀相结合，进一步拉近师生心理距离，筑牢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情感根基。

三是需要进一步强化虚拟学习与现实实践的有效衔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4] 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都要把认识世界的理论认知切实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行为，数字技术虽能高效传递理论认知，却难以替代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身体力行的实践，思政课的育人成效仍需通过实践环节加以巩固，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深化理解，实现知行合一，坚守住一体化建设育人成效的“最后一公里”。

（二）数字资源配置与能力匹配存在差异，协同机制仍需完善

数字思政作为串联各学段思政课的纽带，其效能发挥离不开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师生能力的适配性，因此在区域资源统筹、数字素养培育等方面仍需持续发力，以提升跨学段协同的实效性。

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供给水平上存在客观差异，区域数字资源配置的均衡化水平有待提升。当前城乡、区域间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部分基层、农村及偏远地区学校的数字化硬件与资源供给正逐步完善，需进一步加快补齐短板，保障地区学校具备开展虚拟仿真等技术型教学活动的条件，扩大技术应用的覆盖面。同时需持续优化数据资源的充足性、全面性与实时性，畅通学段间信息互通渠道，提升一体化平台建设的整体效能。通过健全优质数字资源共享机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各学段思政教学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完整体系。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思政的深入推进，师生在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方面正处于不断适应和提升的过程中。对于思政课教师来说，一是需要持续提升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能力，针对不同学段、地区教师数字能力的差异，通过精准培育，帮助教师逐步掌握 AI 辅助教学、大数据学情分析等深度应用技能，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思政教学目标主线的融合度。二是需要强化数字技术应用的主动意识，通过典型示范、实践体验等方式，引导基层学校教师及年长教师逐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增强对新技术的接纳度与应用积极性。三是需要完善系统性数字素养培训体系，构建跨学段、针对性强的培训机制，提升教师分学段数字教学设计与跨学段协同教学的能力。对于思政课学生来说，需根据学段特点分级培育数字认知能力，使学生的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要求相适配，避免过于复杂的技术呈现形式分散对核心价值内容的关注，助力学生更好地通过数字载体理解思政课的价值内涵。

三、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数字思政的实践路径

结合上述优化方向，必须从育人本质出发引领技术应用，以机制创新促进协同共享，切实推动不同学段思政课在数字时代实现纵向衔接、横向联动的有机统一，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一）强化教师主体地位，彰显思政育人本色

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确立并强化教师在数字思政中的主导角色，杜绝技术反客为主。思政教育的核心在于“人”，在于师生之间真实而深刻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互动，技术只是辅助、是工具，绝不能替代教师的育人职责。因此，思政教师必须承担一体化教学设计的核心职责，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跨学段适配的教学内容设计与价值引导之中，严格控制技术使用的比例，避免课堂沦为技术的“展示秀”，确保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真实、深入的情感互动与思想交流。同时思政教师更要苦练“讲道理”的核心内功，无论是利用大数据精准捕捉各学段学生的共性困惑，还是依托人

工智能生成分层教学案例，最终都要落脚于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以教师的思想深度与理论素养加强一体化价值引领，确保思政教育始终充满人文关怀与思想温度，而非依赖技术影响学段间的价值传递。

（二）界定虚实教学边界，促进知行合一

数字思政的虚拟教学要坚持为现实服务的基本原则，严格控制不同学段虚拟技术的使用时长，确保充足的时间应用于线下理论讲授、实践体验以及师生面对面的深入互动。一要建立虚拟向现实的转化通道，虚拟体验结束后，必须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成长需求，配套开展真实情境讨论或社会实践活动，推动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实现从认知到认同再到实践的转化，切实克服知行脱节、学用脱节的问题。二要锚定一体化实践育人的本质目标，实践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要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起来，让不同学段的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深入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

（三）建立跨区域资源共享平台，推动数字思政均衡发展

针对区域间数字化资源配置的优化需求，必须建立跨区域资源共享平台，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推动优质资源的均衡流动。在纵向层面，系统梳理思政课程中关于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核心内容，将其科学拆解为适配不同学段的模块化资源，如小学阶段的具象化故事素材、中学阶段的案例分析库、大学阶段的理论思辨资料，最终形成螺旋式上升、层层递进的数字化资源链。在横向层面，大力整合优质课件、跨学段教研成果等宝贵资源，供不同学段教师按需取用，通过网络平台运作，推动优质资源跨区域流动，让偏远地区、薄弱学校也能共享一流资源，缩小数字鸿沟，使每一位学生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

（四）开展分阶段数字素养培训，降低数字思政应用门槛

针对师生数字素养的适配性需求，必须实施分阶段、分层次的数字素养培训计划，切实降低数字思政的应用门槛，提升一体化建设水平。在教师培训方面，实施分层次的精准培训。基础层培训应聚焦数字工具实操，重点覆盖年长教师与基层教师，破解“不会用”的难题；进阶层培训要强化教师对数字化工具的深度整合能力，助力教师精准识别并把握各学段的衔接节点，破解“用不好”的瓶颈；领航层培训则要着力培育教师的创新设计能力，打造一批数字思政名师团队，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破解“创新难”问题。同时组织高校与中小学教师开展线上磨课、案例共享，促进优质经验跨区域、跨学段流动。在学生培育方面，应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统筹规划，分级分类制定提升学生数字素养教学目标[5]，从而全面适配思政课一体化学习需求，培养数字时代的高素质人才。

四、结语

数字思政以其技术优势为新时代的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注入了新活力，为实现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一体化育人目标提供了现实路径。在推动思政课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数字思政在内容拓展、方法创新和环境构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客观把握技术应用与协同发展中尚存的优化空间；既要以价值理性指导技术运用，也要以协同共享破解发展梗阻，真正打通学段衔接的“断点”，疏通“堵点”。在守正创新中构建起适配教育强国建设要求的数字思政一体化新生态，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持久的数字育人力量。

参考文献

[1] 黄杏芝，唐少莲．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数字化转型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07): 74-77.

[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N]. 人民日报，2022-04-26(01).

[3] 刘思源，贺苗．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耦合机理、风险审视与路径探要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6(06): 77-84.

[4] 张烁．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2019-03-19(01).

[5] 姜国峰．数字技术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谫论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8): 69-7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立项项目“思政课一体化视域下数字思政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研究”（202510165017）。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

任瑞娟

摘要：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人工智能驱动下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的构建。分析人工智能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包括精准匹配学习需求以深度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互动形式增强课程吸引力与参与感、动态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实效性等。进而阐述构建要点，涵盖精准分析学生特征为因材施教奠定基础、智能设计教学内容满足多元学习需求、创新个性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活力，以及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学习成效。研究旨在借助人工智能推动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更好地达成思政课育人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

在当今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正在对教育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高职思政课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起着关键作用，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基于此，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顺势出现，它依靠精准匹配学习需求、创新互动形式以及动态优化策略等优势，为思政课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深入研究该教学模式的构建要点，对于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以及增强育人效果有着关键的现实意义。

一、人工智能驱动的高职思政课个性化教学优势

（一）精准匹配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的深度落地

高职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以及不同生源地，在知识储备、价值认知以及学习节奏方面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差异，人工智能凭借构建多维度学习画像，可精准捕捉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借助学习平台记录学生的课程观看时长、答题正确率以及讨论发言倾向等数据，分析其对于思政课不同模块的兴趣点与薄弱环节，比如针对机械专业学生强化“工匠精神”相关内容的推送，针对电商专业学生侧重“诚信经营”案例的讲解，凭借智能测评系统动态评估学生的认知水平，为基础薄弱的学生推送通俗易懂的理论解读视频与案例解析，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拓展性阅读材料，切实打破“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教学内容”的模式，使得每个学生都可在适合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提升思政素养，避免因教学内容与学生需求脱节而引发的学习积极性不足问题[1]。

（二）创新教学互动形式，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与参与感

传统的高职思政课往往教学形式单一，多为“教师讲、学生听”模式，导致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然而人工智能凭借丰富多样的互动载体，为思政教学增添了趣味性，让学生更有沉浸感，比如利用 AI 虚拟仿真技术创建“红色实践场景”，学生能在虚拟环境里“参与”长征行军以及改革开放关键决策讨论等历史场景，借助这种沉浸式体验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借助智能问答机器人，学生可以随时就课程中的难点，提出“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等问题，机器人依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即时给出个性化的解答，将高频问题反馈给教师，为课堂教学重点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2]。

此外，AI 驱动的小组协作平台能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能力优势智能分组，引导学生围绕“职业岗位中的道德选择”等主题开展线上线下协同讨论，既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又让思政课学习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显著提升课程吸引力。

（三）动态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

教学效果评估以及策略调整对于提升思政课质量而言至关重要，人工智能凭借实时数据反馈以及智能分析，为教学优化提供科学支持，AI 系统可突破传统“期末考核”这种单一评价模式，构建起过程性评价体系：借助分析学生的课堂互动频率、实践作业完成质量、思想动态反馈等数据，对学生思政素养的提升过程进行全面评估，避免因“一考定成绩”造成评价的片面性，依据海量教学数据，AI 可智能分析不同教

学方法在不同专业学生当中的应用效果，比如发现“企业案例教学”在工科专业效果更好、“志愿服务实践”更受文科专业学生青睐，为教师提供个性化教学建议，帮助教师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3]。人工智能可预判学生可能会出现的思想困惑，比如“就业压力下如何保持职业理想”这类问题，提前推送相关引导资源，实现有前瞻性的思政教育，促使教学策略始终与学生需求以及教学目标保持一致，切实增强思政课的育人实际效果。

（四）教学评价的科学化与过程化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高职思政课教学评价，正从单一、静态的结果考核向科学化与过程化深度转型。借助 AI 技术，评价体系得以突破传统卷面考试的局限，通过整合学生在知识掌握、能力表现（如分析、表达、协作）、情感态度、行为倾向等多维度的过程性数据，构建起一个更为全面、动态、精准的综合评价模型。这一模型不仅关注学习的最终成果，更重视学生在整个学习旅程中的成长轨迹与真实表现。在此基础上，AI 能够对海量学习数据进行追踪与分析，生成个性化的发展性评价报告，其价值不仅在于客观反映学生“过去怎么样”，更在于基于数据洞察，为其指出“未来如何改进”的个性化路径。同时，系统可智能识别学习困难、参与度异常或思想波动等潜在风险，实现早期预警，从而使教师能够及时进行精准的干预、辅导与人文关怀，将评价真正转化为促进学生持续发展与健康成长的赋能工具。

二、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要点

（一）精准分析学生特征，夯实因材施教基础

人工智能驱动的高职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首要任务是精准分析学生特征。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学习风格、知识基础、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传统思政课教学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学习分析等方法，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特征[4]。

大数据分析可收集学生在学习进程中的各类数据，如在线学习的时长、作业完成的状况以及参与讨论时的活跃度等，借助这些数据展开挖掘与分析，可揭示出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进度以及学习难点。举例来说，有些学生或许更倾向于借助视觉方式来学习，对图片、视频等资料的接受程度较高，而另外一些学生则更擅长依靠听觉方式学习，对音频讲解、讲座等比较感兴趣。学习分析技术可剖析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认知过程，了解学生在学习思政课时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识建构过程[5]。

借助对学生特征的精确剖析，教师可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规划，针对学习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提供更多基础知识及辅导资源，帮助其巩固基础，面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与拓展资料，激发其学习潜能，教师还可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把思政课内容和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相融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比如对于喜爱科技的学生，引入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科技与道德的关联，让思政课教学更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二）智能设计教学内容，满足多元学习需求

智能设计教学内容是人工智能驱动的高职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的核心环节。传统的思政课教材内容相对固定，难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及时调整和更新。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教学内容的设计提供强大的支持[6]。

人工智能在教学领域有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它可实现教学内容的个性化推荐，依据对学生特征所做的分析结果，系统可为学生推荐适配他们的学习资料，像文章、视频以及案例等，这些资料和思政课的教学目标关联紧密，同时契合学生的兴趣与学习水平。举例来说，针对那些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学生，系统可以推荐相关的时事评论以及分析文章，使他们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并且引导他们从思政课的角度展开思考与分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辅助教师开发个性化的教学资源，教师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如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来整合与优化现有的教学资源。例如，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把大量的文本资料进行分类和标注，便于教师迅速找到所需的教学内容，借助图像识别技术，可将图片、图表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让其更便于在在线教学平台上展示和使用。人工智能还可以协助教师生成个性化的教学课件与教案，依照不同学生的需求，对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教学活动的安排做出调整。

智能设计教学内容应当注重内容的时效性以及针对性，思政课属于一门紧跟时代步伐的课程，其需要及时呈现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人工智能可实时搜集并分析社会热点信息，把这些信息融入教学内容，让思政课教学有更强的现实意义。针对不同专业的高职学生，教学内容还应当结合他们的专业特点来设计，引导学生把思政课知识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比如对于护理专业的学生，可以引入医学伦理、医患关系等思政内容，培育他们的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

（三）创新个性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活力

创新个性化教学方法是人工智能驱动的高职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的关键。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参与和互动。而人工智能技术为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增强现实技术可为思政课教学

营造出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借助 VR 设备，学生可真切感受历史事件、革命场景等，提升对思政课内容的感性认知。比如，在学习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学生可借助 VR 技术“走进”革命根据地，亲身体会革命先辈们的艰苦斗争，以此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精神。AR 技术可把虚拟信息与现实场景相互结合，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学生可借助 AR 设备获取相关的历史资料以及讲解，加深对教育基地的认识与理解。人工智能同样可支持互动式教学方法的实施，在线教学平台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与学生展开实时互动，解答学生的疑问，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讨论。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学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获得帮助与指导。人工智能还可组织在线小组讨论以及协作学习活动，依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进行分组，让学生在小组中一同完成学习任务，培育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沟通能力。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是一种关键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学习目标与现状，人工智能可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明确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以及学习重点，学生可依照自己的节奏开展学习，碰到困难时可及时获得帮助与支持，这种学习方法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学习效果[7]。

（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学习成效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是人工智能驱动的高职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的重要保障。传统的思政课评价以考试成绩为主，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评价内容的全面化[8]。

多元评价体系需要把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过程性评价可关注学生在学习进程中的表现，像学习态度、参与度以及作业完成状况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数据，为过程性评价提供客观的依据。举例来说，学习分析系统可记录学生在在线学习平台上的登录次数、学习时长以及讨论发言次数等数据，以此反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参与度。终结性评价主要是考查学生对思政课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综合运用能力，可通过考试、论文等形式来开展。评价主体也应当多元化，除了教师评价之外，还包含学生自评和互评，学生自评可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反思，找出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调整学习策略，学生互评则可推动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学习，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人工智能可为学生自评和互评提供便利的平台，比如在线评价系统，使学生可便捷地进行评价和反馈，评价内容应当全面涉及知识、能力和素质这三个方面，知识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对思政课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的掌握程度，能力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创新的能力，素质评价主要考查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素质以及社会责任感。人工智能可依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对学生的作业、论文、讨论发言等进行智能分析，评估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水平。

三、结语

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是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精准分析学生特征、智能设计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以及构建多元评价体系等要点，能有效提升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未来，应持续探索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个性化教学模式，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李姜婷 . 人工智能赋能高中思政课教学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J]. 现代教学 , 2025(18): 55−59.

[2] 王萌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 [J]. 才智 , 2025(28): 45−48.

[3] 李忠伟 .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5, 41(10): 157−159.

[4] 韦毅 , 黄仁杰 . 基于 AI 思政智能体的外语类高校思政课教学育人传播路径探索 [J]. 传播与版权 , 2025(18): 98−101.

[5] 韩利 . 数智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鲜活性元素的系统构建与实践研究 [J]. 公关世界 , 2025(18): 189−192.

[6] 董静 , 王思琪 . 数智化赋能 :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的现实转向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 2025, 37(05): 106−113.

[7] 张萍 , 李紫悦 , 张晓明 . 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院校思政课教改的路径探析 [J]. 时珍国医国药 , 2025, 36(18): 3580−3583.

[8] 孟丕 . 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创新的优化策略探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5, 16(23): 158−162.

（作者系冀中职业学院副教授）

课程思政视域下“社区社会工作”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

梁　洁 牛凯宁

摘要：“社区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实务课程，肩负着培养具备“专业能力＋政治素养”的复合型基层治理人才的使命。针对课程思政建设中思政元素融合碎片化、实践浸润不足等问题，本文立足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以基层治理现代化战略需求为导向，从目标构建、内容重构、模式创新、评价完善四个维度，构建“三位一体目标—模块化内容—四位一体模式—多元立体评价”的课程思政体系，运用案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开展教学。结果表明，课程有效纠正学生对社区工作的认知偏差，增强其服务基层意愿，显著提升专业价值感与职业认同感。本研究为同类实务课程的思政育人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有助于培养适配新时代基层治理需求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关键词：社区社会工作；课程思政；校地协同；实践育人；评价体系

一、引言

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区作为治理末梢对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1]，凸显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社区社会工作”作为衔接专业教育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核心课程，不仅需要传授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更需注重培育学生“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与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素养。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核心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2]，实现“隐性育人”[3]。当前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但“社区社会工作”课程仍存在突出问题：思政与专业知识融合不深、实践教学思政浸润不足、评价机制难以量化育人成效、校地协同与本土化实践薄弱。加之部分学生对社区工作存在认知偏差或片面理解，专业与职业认同感不足，导致理论学习与职业发展脱节。

基于此，本文以“社区社会工作”课程为载体，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路径，旨在为培养新时代基层治理所需人才、破解思政课程“形式化”困境提供实践方案。

二、“社区社会工作”课程思政建设现状与问题

梳理中国知网（CNKI）中关于社区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文献，并结合当前高等教育课程思政改革实践，可以发现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从“课程思政”向“社区思政”延伸，强调将思政教育从课堂拓展至学生生活场域[4]，实现“全程育人”。二是从“单一课程”向“系统育人”升级[5]，强调跨部门协作、资源整合、机制构建，形成大思政格局。三是从借鉴“西方模式”向深化“本土化实践”转变[6]，强调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中国文化、政策及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尽管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社区社会工作”课程思政仍存在四方面突出问题：第一，思政元素融合缺乏系统性。现有课程思政元素多分散于各教学章节，如在“社区价值观”部分融入职业道德，在“社区治理”模块引入党建案例，但缺乏对思政元素的整体梳理与体系化设计，存在“碎片化”“表面化”现象，未能实现思政目标与课程目标的深度契合。第二，实践教学的思政浸润不足。课程虽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实践，但部分实践活动停留在“完成任务”层面，缺乏对实践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与引导，学生在社区服务后缺少系统的反思环节，导致实践与思政“两张皮”。第三，评价机制不够健全。课程考核仍以理论考试和实践报告为主，对学生思政素养的评价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和全过程跟踪。评价方式较为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认知—情感—行为”层面的价值塑造成效。第四，校地协同育人机制有待完善。与社区的合作多集中于实践场地提供和简单任务安排，社区工作者参与课程思政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不足，育人合力未能充分发挥。

三、“社区社会工作”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一）课程思政目标体系构建

以应用型学校定位为依托，锚定“专业能力＋政

治素养”双培养目标，结合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特点，制定分层递进的课程思政目标体系。

第一，价值塑造目标：本土案例与专业伦理的深度融合。植入“党建引领、社会公平、为民服务”理念，挖掘“晏阳初乡村建设”“党员社工抗疫”等本土教学资源，培育学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为民服务、奉献社会”的职业伦理，树立“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增强扎根基层的职业初心与家国情怀。

第二，知识传授目标：实务模式与制度自信的有机融合。将“共建共治共享”“制度自信”等思政元素融入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涵与路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工作认知体系，避免盲目照搬西方经验。

第三，能力培养目标：实践育人与思政浸润的协同推进。以“走进社区”实践模块为核心，通过“社区实践 + 方案设计”，提升学生社区调研、方案设计、资源整合、矛盾调解等实务能力，培养团队协作、沟通表达、反思创新等综合素养，使其具备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服务民生”的职业认同。

（二）课程思政内容体系重构

围绕课程教学需要，构建“十一模块、多点融入”的内容体系，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对接（见表 1）。

（三）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采用“课—践—研—赛”四位一体闭环教学模式，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实现思政元素的“隐性浸润”。

课堂教学：采用“理论讲授 + 案例研讨 + 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小组讨论法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重现“党员社工化解社区矛盾”场景，培养职业使命感；组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主题辩论，深化学生对制度优势的认识。以新时代“枫桥经验”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意见》强化职业认同。同时，搭建线上“课程思政资源库”（含政策、案例、视频等），配套课程任务，供学生自主学习。

实践教学：开展“行走的课堂”，带领学生走访基层治理成效显著的社区，实地感受社区治理成果；

表 1 “社区社会工作”课程思政内容体系设计

教学专题	思政切入点	课程思政实施方式
一、社区和社区工作	1. 社区工作的社会功能 2. 职业价值	结合学生生活社区案例开展讨论，树立“关注生活、热爱社区”的意识，形成职业认识，强化职业使命感、价值感。
二、社区工作发展的历程	1. 国内外社区工作的早期发展 2. 中国从单位制社区到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历史演进	梳理发展脉络，热爱祖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理解党的领导在社区发展和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制度认同与社会责任。
三、社区工作的价值观	职业道德与党性修养、为民服务初心	分析基层党员社工疫情防控案例，解读《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民发〔2012〕240 号）
四、社区工作实务模式	（一）地区发展模式 新时代“枫桥经验”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强调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引导学生树立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二）社会策划模式 我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案例	案例分析，重视我国党组织在规划制定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在资源整合、矛盾调解中的核心作用。
	（三）社会行动 中国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矛盾调解中的工作方法	案例研讨，引导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产生认同。
	（四）社区照顾 北京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与广州的“喘息服务”互助模式	通过观看视频和阅读政策文件，理解社会公平正义实践路径，理解“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五、社区工作者	职业素养、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2024 年 3 月 28 日） 2.“最美社区工作者”评选视频	1. 分析政策文件，增强职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2. 观看视频和案例研讨，强化学生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社工专业使命”的双重认知，树立“将小我融入大我”的职业追求。
六、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	党组织牵头的协商民主	模拟党组织牵头的居民议事会，理解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协调功能。
七、社区工作政策及政策分析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解读，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同感。
八、社区工作前瞻与发展趋势	中西方社区工作发展趋势对比	对比分析，树立“文化适配”意识，避免盲目照搬，树立制度自信。
九、乡村振兴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	1. 历史对比，强化“扎根中国大地”情怀。 2. 培养“接地气、解民忧”的职业伦理，树立服务基层的就业观。
十、知识拓展与头脑风暴	1. 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典型实践经验、探索与挑战 2. 国家重要会议中 3. 专业社区工作 + 党建引领 + 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创新研讨	文献研读、政策解读和头脑风暴小组研讨，明确专业发展方向，激发创新农村社会工作方法和模式的积极性，推动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热情。
十一、走进社区，社区工作实践	分组开展社区调研，制定针对性工作计划与方案，强化责任意识	实践调研，培养“扎根社区、服务民生”的专业伦理，强化责任意识与沟通协调能力，激发社会责任感。

组织学生参与社区集中充电装置改进、租房问题治理等项目的调研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中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实行“任课教师 + 社区社工”双指导，要求在实践报告中撰写思政心得，记录服务过程中的责任担当、思想感悟和价值提升。

科研训练：引导学生将社区实践与科学研究结合，将思政思考转化为研究成果。指导学生基于实践撰写社区工作相关论文或实践报告，培养其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

以赛促学：将专业内容与学科竞赛相结合，如在“知识拓展”专题中对接案例分析大赛要求，动员组织学生参加山东省高校社会工作案例大赛等，引导学生在竞赛中深刻理解“社会公平、为民服务”等思政内涵，将课程所学知识和实践内容转化为竞赛成果，提升专业认同和职业素养。

（四）完善科学化的课程思政评价机制

结合课程特性与学生认知偏差、专业价值感弱、职业认同不足等学情痛点，作业设计需紧扣“专业任务 + 价值引领”的德育思政导向，评价需实现“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贯通与可衡量。作业设计以专业任务为载体，将思政元素嵌入“任务要求、完成过程、成果呈现”的全过程，避免思政与专业“两张皮”，有针对性破解学生认知偏差。

作业设计要注重类型化与可操作性：第一，通过绘制职业画像、解读相关政策，纠正专业和职业认知偏差，夯实思政认知基础。第二，通过访谈一线社工、撰写社区实践反思报告，植入职业初心，激发“为民服务”的职业情怀，强化社会责任感，提升职业认同感和社工伦理认同度。第三，通过设计社区问题治理方案、撰写“乡村振兴中的社区社工角色”主题提案，将“共建共治共享”“为民服务”等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服务基层”的就业观念，培养家国情怀。

推行多样化过程性评价与多元化主体评价。过程性评价涵盖课堂表现、思政类作业、实践报告与反思等，重点考查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应用能力。建立“学生自评 + 小组互评 + 教师评价 + 社区评价”四方协同的评价主体体系，实现综合评价效果。课堂教学环节，由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共同确定课堂表现成绩。实践环节评价，由任课教师和社区工作者共同对学生进行评价，社区工作者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态度、服务成效和思政表现。任课教师则以教学专题为载体，通过学生的服务反思、案例分析等进行全过程评价，实践报告需经社区工作者审核其可行性。

四、总结与展望

“社区社会工作”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新时代基层治理人才的重要实践。本研究立足学情痛点，针对性设计思政内容与教学模式，有效破解了学生“职业认同不足”的难题，通过构建“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目标体系、“十一模块”的内容体系、“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和“多元主体”的评价机制，解决了思政育人成效难以量化的问题，实现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对社区社会工作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课程思政建设也需要持续深化。未来，教师需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不断优化课程思政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完善保障机制，着力培养更多“心怀民生、践行群众路线”的社区建设者。同时，需要通过挂职锻炼、专题培训、跨学科教研等方式，持续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进一步强化校社协同育人效果，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教育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7.

[2]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 (2020−06−05)[2025−12−0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3] 刘静 .“老年社会工作”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探索 [J]. 世纪桥 , 2024(11): 108−110.

[4] 王郦玉 , 高向东 , 李卓航 . 课程思政延伸至学生社区第二课堂的实践路径探析 [J]. 黑龙江教育 (理论与实践), 2022(06): 1−5.

[5] 谢小兰，陈珍珍 .“党建引领 + 任务驱动 + 服务体验”教学模式的《社区工作》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 [J]. 人生与伴侣 , 2025(07): 22−25.

[6] 姜丽蕊 . 课程思政融入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改革探究——以“社区工作”课程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4(04): 73−7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潍坊科技学院 2025 年课程思政研究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社区社会工作’”（2025KCSZKC15）。

（作者：梁洁，潍坊科技学院讲师、潍坊社会工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牛凯宁，潍坊科技学院助教）

思政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及实践策略探索

娄朝慧

摘要：在健康中国战略推进背景下，医院高质量发展成为医疗机构转型的重点方向，而思政工作是凝聚人心、加强思想引领的关键举措，在医院发展中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本文基于医院发展实际，分析思政工作的关键作用，结合当前医院思政工作在内容供给、载体创新、机制建设、队伍培育等方面的实践成效与优化方向，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出思政工作实践策略，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借鉴，推动提升医院思政工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关键词：思政工作；医院高质量发展；医疗队伍建设；实践策略

医院是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医疗专业性的机构，在承担救死扶伤医疗使命的同时，也肩负着弘扬医德医风、传递社会正能量的责任。在医疗体制深化改革过程中，医院在医疗资源优化、服务模式转型、行业竞争等方面面临挑战，需以高质量发展破解当前发展难题。思政工作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如何充分发挥思政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深入探讨思政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具有现实意义。

一、思政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一）筑牢医护人员思想基础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人的高质量发展，一支政治过硬、信念坚定的医疗队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思政工作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通过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医疗卫生行业职业精神培育等活动，引导医护人员树立与新时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契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针对医疗行业面临的工作压力等复杂环境，思政工作借助先进典型示范、职业伦理研讨等形式，有助于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抵御不良风气，推动个人职业发展与医院发展协同共进。以思政工作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思想引领体系，在医院内部凝聚发展共识，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二）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质量是医院发展的评价指标之一，思政工作通过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可以为提高服务质量提供精神动力。思政工作注重培育医护人员职业道德与人文素养，在医德医风专题培训、医患沟通、人文医学案例研讨等多元化形式的思政工作开展过程中，引导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既注重疾病的有效治疗，也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2]。同时，思政工作将社会责任教育融入日常工作，注重强化医院公益属性价值，鼓励医护人员积极参与基层义诊、健康科普、应急救援等公益活动，可以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思政工作推动医德建设与公益实践的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医疗纠纷发生率、提高患者就医满意度，更可帮助医院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三）优化医院组织治理效能

医院现代化治理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思政工作以党建为引领，为医院治理提供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一方面，思政工作深度融入医院管理环节，引导领导干部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在重大项目建设、资源配置、制度修订等决策中遵循医疗行业发展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的思政工作，通过廉政警示教育、廉洁文化建设等活动，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防范医疗廉政风险，营造风清气正的医院发展环境，推动医院管理向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方向转型。

（四）化解医院内外部发展矛盾

医院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人员结构优化、医患关系调整等多元化挑战，思政工作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思想方法，可以为医院发展营造和谐环境。例如，针对职工在职业发展、工作压力、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思政工作通过谈心谈话、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举措，最大限度地满足合理需求、解决实际难题，缓解职业倦怠心理，增强队伍的归属感与稳定性[3]。再如，思政工作者在处理医患纠纷问题中，以情绪疏导、沟通协调等方式主动参与纠纷调解，引导

医患双方理性表达诉求、依法解决问题，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总体而言，思政工作可以为医院构建医患和谐的发展环境，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二、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成效与发展基础

（一）思政导向明确，思想引领根基扎实

医院思政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结合党中央关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决策部署，围绕理想信念塑造、医德医风建设、廉洁从业教育等主题，通过政策宣讲、理论学习、行业规范解读等形式，为医护人员筑牢思想根基[4]。在日常工作中，医院将思政教育与行业发展要求相结合，及时传达卫生健康领域最新政策精神，引导医护人员将个人职业追求融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大局，思想引领工作的系统性与针对性不断增强，为医院发展凝聚强大思想共识。

（二）工作载体丰富，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

医院在坚守“三会一课”、专题讲座、主题党日、先进典型表彰等传统有效载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思政工作新形式、新路径[5]。部分医院通过建设党建文化墙、医德长廊等阵地，营造出浓厚的思政教育氛围。同时，主动尝试将互动式、体验式元素融入传统载体，例如开展医患沟通情景模拟、医疗应急演练等活动，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此外，医院逐步探索运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思政宣传，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格局，从而扩大思政教育的影响力。

（三）思政框架完善，协同推进格局初显

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牵头、各科室协同参与是多数医院的思政工作组织架构，将思政工作纳入医院整体发展规划，明确各部门在思政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为工作开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通过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开展联合主题活动等形式，可以加强职能部门与临床科室之间的沟通协作，逐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推动思政工作在各科室有效落地，为后续工作的深化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四）思政队伍完善，核心骨干作用凸显

政治素质过硬，熟悉医院运营规律的医院思政工作队伍在思政工作推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思政队伍中既要有专职思政工作人员，也要有临床科室业务骨干、优秀党员等力量，以形成专兼结合的人才合理布局。同时，医院定期组织思政工作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与专业技能，鼓励队伍深入临床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确保思政工作贴合医院发展实际，工作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持续增强，进一步凸显核心骨干的优势作用。

三、以思政工作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策略

（一）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思政内容供给

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对思政内容供给进行优化，促使思政教育真正走进医护人员内心。一是强化思政核心内容的深度转化。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康中国战略、医疗卫生行业政策法规等内容与医院发展战略、科室工作实际、医护人员职业成长相结合。思政工作中借助政策解读、案例研讨、实践分享的模式，避免思想理论的生硬灌输[6]。例如，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等政策，与医院管理层开展专题解读会，结合医院实际分析政策落地方法，让医护人员深刻理解政策内涵与要求，增强对医院发展方向的认同感。二是注重内容的个性化供给。借助问卷调查、座谈访谈、大数据分析等方式调研医护人员的思想动态与现实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定制特色内容。例如，面向年轻医护人员，增加职业规划指导、职场沟通技巧、心理压力疏导等内容；面向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强化医德医风案例解析、医疗纠纷处理、科研诚信建设等内容，以进一步提高职业素养与风险防控能力；面向行政后勤人员，则重点突出服务意识培育、高效执行能力提升等内容，使其在服务全过程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三是针对思政工作内容建立动态更新机制。要求思政工作队伍定期了解社会热点、行业动态与舆情变化，及时将医疗行业先进典型事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经验、正能量舆情案例等纳入思政内容。例如，在重大疫情防控后，开展“抗疫精神分享会”，邀请一线医护人员讲述战“疫”故事，促进抗疫精神向职业动力转化；对于医疗行业的负面舆情，则及时以专题研讨引导医护人员明辨是非、坚守职业底线，使思政教育内容更符合实际且具有更强的时效性。

（二）创新融合载体，增强思政工作活力

医院思政工作常态化开展的融合性不佳会降低思政工作活力，可以推动思政工作与医疗业务、新兴技术、文化建设深度融合，让思政工作“活起来”。一方面，赋能传统载体提质增效，将互动式、体验式元素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讲座等传统载体。例如，开展“医者初心”情景模拟活动，设置医患沟通冲突、应急救援等真实场景，让医护人员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深化对职业责任的认知。再如，医院组织“红色研学 + 行业实践”活动，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感悟革命精神，同时走访先进医院学习思政与业务融合经验，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思政工作正能量的引导价值。另一方面，将新兴技术融入思政工作创新传播渠道，在新媒体技术辅助下构建线上思政矩阵。例如，在医院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方面，整合短视频、直播、线上课程、互动社群等功能，制作“政策解读微课堂”“医德故事微视频”“健康科普正能量”等系列内容，满足医护人员碎片化学习需求[7]。同时，为了增强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以“青年思政学习社群”“党员先锋交流群”为线上渠道开展专题讨论，使思政工作更具感染力。此外，注重思政工作和临床诊疗、科研教学、

医院管理等业务工作的深入融合。例如，临床工作开展“党建＋优质服务”行动，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推动党员医护人员在疑难病症救治、急危重症抢救中发挥带头作用。在诊疗流程中将患者满意度、沟通技巧表现与思政评价相关联。科研教学环节将科研伦理、学术诚信纳入研究生培养与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要求教师在授课中融入职业精神、医德案例，培养德才兼备的医疗人才。

（三）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思政工作保障

医院思政工作机制创新对于强化执行力和保障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医院应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在党委书记的牵头下成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并明确党委办公室、宣传科、医务科、护理部、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职责。思政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月度会议、季度通报、年度总结等，研究解决思政工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促使思政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形成工作合力。其次，要注重考核评价机制优化，思政工作考核兼顾定量与定性评价。例如，思政活动参与率、学习时长等过程指标；医护人员思想动态改善、医德医风投诉率下降率；患者满意度等结果指标，医护人员对思政工作的认可度、参与积极性等满意度指标。针对考核结果强化运用，将思政工作考核成绩与科室评优评先、个人职称晋升、绩效分配、岗位聘任直接关联，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力的，进行指导整改，充分发挥思政工作考核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思政专业水平

加强思政队伍建设，提高思政专业能力水平是提升思政队伍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的关键。其一，要注重优化队伍结构配置，根据医院内部资源的实际情况，引导临床科室业务骨干、优秀党员、退休老干部、青年志愿者等加入兼职思政工作队伍，将其熟悉临床实际、亲和力强的优势充分展现出来，高效落实一线思想引导、矛盾调解、榜样宣讲等工作[8]。其二，针对专职思政工作者，组织开展思政理论、政策解读、舆情应对、新媒体应用等专题培训。针对兼职思政队伍，组织思政工作方法、沟通技巧、心理疏导等基础培训，提高其开展一线思政工作的能力。在思政工作常态化开展过程中，鼓励并引导思政工作者深入临床一线，了解医护人员工作实际与思想动态，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思政工作发挥着筑牢思想基础、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治理效能、促进和谐稳定的作用，是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医院思政工作的开展应通过优化内容供给、创新融合载体增强工作活力，健全协同机制强化保障能力，强化队伍建设提高专业水平，以思政工作新路径、新方法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程晓琳 . 以院史文化助推公立医院思政建设路径研究——以 H 医院为例 [J]. 办公室业务 , 2025(09): 181−183.

[2] 李玲 . 思政工作在国有企业医院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J]. 现代企业文化 , 2025(09): 79−81.

[3] 吕靓 .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公立医院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的发展路径 [J]. 四川劳动保障 , 2025(01): 130−131.

[4] 宋宇 . 新形势下深化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 [J]. 中国军转民 , 2025(01): 168−169.

[5] 王英华 , 汪蕾 . 新常态下加强医院青年医生思政工作促医院全面发展 [J]. 时代青年 , 2025(02): 26−28.

[6] 杨吉羚 , 李中兴 , 刘园园 , 等 . 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思政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 2024, 31(12): 97−103.

[7] 杨效斌 , 白璐 . 公立医院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有机融合的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市中心医院为例 [J]. 经营管理者 , 2024(09): 69−71.

[8] 孙丰婷 , 顾莉莉 . 探索思政工作创新对青年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以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为例 [J]. 中国卫生人才 , 2024(06): 28−32.

（作者系常德市鼎城区血吸虫病专科医院〈鼎城区眼科医院〉中级政工师）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周成良

摘要：全媒体这一新的传播形态的出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将思想政治内容与全媒体形式融合，选择合适的媒介平台，借助媒介平台信息传播创新性、时效性、生活化的特点，能为学生提供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思政内容，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及全方位育人。对此，文章针对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创新路径进行探究，提出要整合传统课堂与新媒体平台，构建覆盖全场景的传播体系，才能在不断壮大思政共同体的同时，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新模式，致力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全媒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创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全媒体视域下，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传输向多维互动、精准育人的方向转变，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新生态，突破传统课堂教育时空限制，以新媒体平台全天候实时推送教育资源，并将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以短视频、互动讨论、直播等形式具象化呈现。以大数据技术动态分析学生思想行为表现，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内容，在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的同时，强化思想引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发展，构建立德树人的大思政格局。

一、全媒体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创新中的应用优势

（一）构建覆盖全场景的传播体系

全媒体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创新中的应用，有助于构建覆盖全场景的传播体系，整合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资源，打造综合性的思政教育平台，由平台提供政策解读、时事热点、在线课程、互动讨论等多元化服务，能突破教育时空限制。在平台全天候提供内容的情况下，学生可随时随地登录思政教育平台，查阅并获取一手资源，并参与平台结合热点舆情与时事新闻所推出的话题讨论，以此来增强理论教育的吸引力，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信息传播需求，形成系统化的立体式传播体系[1]。在这一全场景传播体系构建的情形下，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不断扩展，能在教育资源中心系统化学习经典理论，获取时事案例、最新政策解读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平台媒介支持。

（二）优化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创新，能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行为表现等进行实时监测和反馈，以可视化工具自动生成学生画像。在此情形下，教师可结合数据分析评估教学效果，进而结合学生实际学习需要，不断优化教学资源的应用方案，能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提高评价的个性化和针对性。此外，全媒体技术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支持翻转课堂、情景体验式教学、合作探究式教学及混合式教学等模式，在优化教学模式的同时，打破传统课堂教学单一模式，并优化传播主体，师生均可作为信息传播者，鼓励教师利用新媒体创作案例教学内容，鼓励学生在媒体发表看法，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学习，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2]。

二、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创新面临的挑战

（一）海量信息的甄别与筛选存在挑战

传统教学实施过程，课堂教学内容多围绕教材知识展开教学，知识来源渠道依托教材和教师课外拓展内容，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学习效果。而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当代广大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网络信息的更新交替、纷繁复杂，海量信息涌入，虚假信息被广泛传播并深度发酵，会给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筛选带来极大挑战。高校学生还未形成足够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一些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理较重，信息甄别能力不足，导致难以精准获取有效资源，需要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对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进

行正确引领。

（二）传统教育模式适应性不足

传统教育模式多集中为线下课堂教学，主要依赖于教材知识讲授，资源整合能力较弱，且教学时间固定，对于需要延伸学习的学生支持不足，学生无法根据自身的实际学习需求灵活安排学习时间，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可以看出，这一教学模式对现代信息技术依赖程度较低，这导致传统教育模式在整合多平台资源、实现全天候内容供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3]。而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构建，需突破传统教育时空限制，而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全媒体时代对教育灵活性、时效性的要求，需要教师就传统教育模式不断创新，以此来应对信息传播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三、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创新路径

（一）以多平台融合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

全媒体视域下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创新构建，需更加重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教育资源，能更好地丰富教育资源，以网络、课堂、实践为场域，通过微课视频的应用，实现课前预习、课中互动以及课后延伸，能更好地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互动难题。将传统课堂与新媒体平台整合，能以多平台信息传递的方式，帮助学生获取思政教育内容，而这一多平台融合的方式，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中教与学的顺序，将学生的学习行为前置，驱动学生在先学环节自主产生学习行为，并依据学生先学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进一步推进以学定教的同时，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实现对翻转课堂的打造[4]。例如宪法实施和监督相关知识的教学，为了能有效增强学生法治思想观念，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制作微视频，并将其上传至学习平台，学生可在课前反复观看微课视频，除教材知识外，能在线查阅有关资料，对宪法实施的核心内容、宪法监督的体制与方式，以及监督机制与保障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平台还可根据学生行为特征智能推送相关社会真实案例，学生可以在浏览案例信息的同时，对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进行补充，能更好地丰富教材知识，在拓宽学生视野的同时，强化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这一环节，以短视频、动画等形式解释抽象概念，这一数字化、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显然更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能有效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质效，且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也能使得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另外，借以多平台融合形成“线上引导 + 线下体验”的闭环，在学生完成先学的情况下，线下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模拟法庭活动、宪法宣传语标语创作、宪法知识竞赛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可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宪法认知、分析能力和践行意识[5]。

（二）结合技术优势构建情境体验式教学模式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构建，还可以结合其技术优势，整合多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情景体验式课堂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持。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动画、视频等形式展示复杂思想政治理论概念，又或是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真实场景，学生沉浸式体验不同情景时，能对抽象理论形成深度理解。这一过程中，对于不同体验情景的创设，需结合这一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学习水平等，以实际生活为切入点，注意内容设计的实用性和趣味性，围绕生活案例或社会热点问题设计情景，结合动态交互式课件呈现多模态资源，更能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和合作探究兴趣。在此情形下，能促进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引领学生在情景体验中总结经验，不断优化认知结构，提高教学成效。例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知识的教学，可为学生创建沉浸式虚拟场景，应用虚拟现实增强技术模拟社会时事、历史事件等，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6]。此时，教师可以结合环境侵权案件，如污染纠纷、资源保护等案例，针对网络暴力、信息泄露等热点问题，设计模拟法庭体验活动，学生可在沉浸式体验不同情景的同时，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并在角色体验中理解抽象理论知识。以选取赡养老人、噪声扰民等典型案例构建情境体验式课堂为例，学生分别扮演核心当事人、第三方与裁判、专业支持人员（律师）等，模拟赡养纠纷调解，完整复刻调解程序与要点，充分应用相关理论知识并通过模拟法庭引导学生理解家庭责任、社会公德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法律边界。全媒体视域下的情景体验式教学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帮助学生逐渐内化知识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将思政理论知识的学习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为理实一体化教学提供技术支持。

（三）应用多元平台构建合作探究式教学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德育工作的主要渠道，提高学生思想觉悟、转变学生思想，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创新，以直播互动、社群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中，提升课堂教学互动有效性。这一过程，可优化传播主体与定位，教师可借助直播互动平台开展“云端”专题教学，为学生推送时事热点信息，而学生则能通过自媒体分享实践感悟，在直播间就热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是对评论区的不同观点进行反驳和质疑，促进师生实时互动，形成“双向互动”教育模式的同时，带给学生更为真实、趣味的互动体验感[7]。教师还可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创设热点话题讨论空间，话题讨论可围绕时事政治与政策解读、党史学习教育与革命传统、社会热点事件分析、青年价值观塑造等，均能引导学生发表观点并展开学理分析，能在学生各抒己见的同时促进有效互动。需

要注意的是，学生在多元平台的思想交互过程中，教师需对学生思想言论进行正确引领，从而帮助学生于无形中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正确价值观。例如，党史学习教育与革命传统相关知识的教学，教师可以以短视频、微直播形式讲述党史故事、革命事迹等。此时，革命故事可以以短视频形式呈现，动态画面、生动音频等，能直接将学生带入革命历史时期，有助于学生了解革命历史，在讲解革命故事的同时，鼓励学生结合当下热点事件分析革命精神，并在评论区表述自己的观点。这一环节，有学生在评论区提出当前面临的学业压力、就业竞争等现实困难，可结合长征精神积极回复；还有学生提出在信息爆炸时代，警惕多元文化冲击，可学习西柏坡精神，增强政治定力。这一环节，学生畅所欲言，就革命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具象化呈现进行探讨，赋予革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能进一步促进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从而更好地体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价值最大化。

（四）应用学习分析工具构建即时评价模式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构建，还需要重视即时评价的重要性，构建评价与反馈机制。应用学习分析工具实时跟踪学生课堂参与度、问题解决能力等指标，并根据学生反馈数据为其推送定制化学习计划，设计反思性活动，从而进一步强化教学评价与技术的融合。这一环节，在健全完善人才评价体系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以多维度评价指标，对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相较于传统的评价体系构建而言，在拓宽评价主体的同时丰富了评价内容和评价形式，学生依据综合评价结果，了解自身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能依据及时反馈和评估，对学习计划和工作实施计划进行不断的完善，有利于发挥评价的激励和导向功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进行评价[8]。例如由校内外联动开展的“三下乡”活动，系统可根据学生上传的活动报告、帮扶成果，对学生活动参与度、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及思想意识及价值观等进行评价。评价是否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关注活动在主流媒体的曝光度，以及活动是否具有创新性和持续性，在精准评估学生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的同时，明确学生思想政治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指导建议，达到即时评价的效果。相较于传统的教师单一评价，以即时评价反馈不同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化问题，并为其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能满足不同学生实际学习需求。此外，还可以为学生设计反思性活动，结合案例库、学习日志等，引导学生总结学习经验，这一过程中，学生能积极总结案例中的关键知识点和思政元素，强化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自我反思有效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创新构建，需要充分发挥全媒体技术优势，搭建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为学生线上线下结合学习提供专门场所，并以动态、直观、可视化的教育内容展示，将抽象思政理论具象化呈现，激发学生参与思政课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为学生提供精准学习支持的同时，助力高校学生良好思想道德与价值观的有效培育，大幅提升课堂实际育人效果。

参考文献

[1] 郭建 .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体系的构建 [J]. 就业与保障 , 2020(14): 146−147.

[2] 张争 , 程成 , 魏永 .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J]. 教书育人 (高教论坛), 2024(36): 38−41.

[3] 张争 , 程成 , 李俊瑶 .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J]. 船舶职业教育 , 2024, 12(05): 61−64.

[4] 吴洁 , 周宏 .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效性的提升路径探析 [J]. 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24, 42(03): 87−90.

[5] 赵聪 .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特色路径研究 [J]. 辽宁开放大学学报 , 2023(03): 78−81.

[6] 金超 , 钱小波 . 全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3, 36(13): 160−162, 165.

[7] 路叶 .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路径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3, 36(11): 160−161, 164.

[8] 张啭啭 . 全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J]. 陕西教育 (高教), 2023(04): 19−2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研究”（JG22DB253）。

（作者系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多维度视域下“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研究改革路径探析

米尔扎提·马尔夏

摘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作为高校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不仅承担着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与创新精神的任务，更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是开展价值观引领和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发挥该课程的育人功能，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本文紧扣课程特色，系统细化教学目标，强化思政育人的整体引领；深入挖掘课程内在思政元素，建设系统化、动态优化的教学资源库；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通过课堂互动、线上线下融合与实践教学深化思政融合；构建多元协同的评价体系，统筹师生活动与成效，持续提升育人实效等方面，系统探索“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路径。

关键词：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多元协同；三全育人；动态反馈机制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1]课程思政建设要求高校除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的所有专业课程，不仅传授知识与技能，更应通过积极主动的教学设计落实育德使命、回归教育初心。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进一步明确，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2]。《指导纲要》为高校如何有效贯彻这一根本任务提供了清晰的实施路径与明确的标准体系，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不同课程在属性、内容与教学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课程思政的实施不能一概而论。这要求教师以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为根本依据，进行科学、精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

“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课程内容涵盖职业规划理论、创业基础知识和职场核心素养等。除了专业知识技能传授外，还承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职业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任务，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铸魂育人”的关键作用。回顾以往的教学实践，教师往往更侧重于传授求职技巧、创业方法或相关信息，对价值层面的引导关注不足，这一偏差不利于培养既具备专业能力又拥有良好品德的实干型人才。本研究在梳理当前“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尝试从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法选择以及教学评价机制等多个层面，提出系统化的改革路径与思路，以期为培养兼具卓越专业能力与崇高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参考。

一、现实关注与提升方向

近年来，随着“三全育人”理念的深入推进，高校日益重视就业创业课程的育人功能，相关课程建设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仍有若干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完善。具体表现如下。

（一）教学目标：从宏观层级到知行衔接

从理论角度分析，目标设定通常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是“系统性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需要构建一个“内容 + 层级”的二维框架。第二是“层级的递进逻辑”：围绕“立德树人”这一育人目标，“知识—价值—能力—行为”构成四个依次上升的层级。其中知识处于最基础的位置，价值则超越了单纯的价值判断层面，最终需将能力转化为实际行动，达到“知行合一”[3]。第三是“认知与实践的衔接”：如何实现从认知层面向实践层面的有效延伸，使价值目标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仍是理论研究中持续探讨的课题。

（二）教学资源：从零散挖掘到系统建构

在“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通常更关注从课程自身内容中挖掘思政要点，而对外部教学资源的拓展性利用与衍生性开发仍有待加强。蕴含丰富育人价值的教学案例比比皆是，这类案例不仅贴近学生实际，还能够直观呈现强化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自主意识、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追求

与国家事业发展紧密结合、助力学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等思政要素。从普遍情况来看，当前教学过程中对思政要点的挖掘与运用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部分课程在系统性、连贯性与递进性方面存在提升可能。课程思政实施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有助于调动学生兴趣和引发共鸣，也有助于整门课程的思政教育形成更好的层次区分与系统整合。

（三）教学方法：从单一形式到多维互动

在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中，通过融入思政元素来优化教学形式，已成为重要实践方向。但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进一步探索多样化的教学路径。教学方法的选择应更加紧密地对接学生的实际需求、行业发展动态、个人发展方向、国家相关政策导向以及行业领军者的榜样力量等，以此提升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的融合深度，在培养学生正确就业理念方面取得更显著成效，从而更有效地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深度思考。

（四）考核评价：从知识结果到过程价值

在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中，与课程思政相关的考核评价体系仍有待完善。当前面临标准不清、办法单一等挑战，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持续优化。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应从学生视角、教学视角和课程视角三个维度展开，关注教师的教学实施以及课程内容与学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现有考核机制多侧重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关注不足。建立健全更为科学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增强师生双方对课程思政内容的关注，激励教师强化育人传递，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优化路径与实践策略

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课程思政体系构建，需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四个维度，系统融入思政元素，实现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和有机统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课程价值引领作用，以此作为关键支撑机制。

（一）结合课程特点设置教学目标，把握课程思政育人方向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示灯，是衡量教学成效的关键标准。在“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中，需紧密结合课程自身特性，系统规划教学目标，以保障课程思政顺利融入，实现育人目标。这类课程要参照自身独特育人使命，结合课程内容与学生实际需求，在讲授职业规划和创新创业知识、提升相关技能的过程中，明确具体可操作、可衡量的价值目标，并将其作为课程思政核心指引。以黄炎培职业教育救国思想为范例，价值目标可设定为：指引学生确立“服务勿忘爱国，爱国勿忘服务”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崇高目标[4]；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使命感，培养学生面对挑战时的顽强意志与主动应对心态。最终目标即培育既拥有专业技能又兼具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优秀青年。

（二）结合课程实际充实教学资源，助力课程思政育人工作

1. 深入发掘课程自身的思政元素，搭建思政元素资源库

充实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资源，首要工作是从多个维度全面深入地发掘课程中包含的思政元素，搭建内容充实、体系完善的思政要素资源库。

（1）历史底蕴与文化自信元素

我国职业教育思想拥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黄炎培先生所秉持的职业教育理念大力提倡“手脑并用”“做学合一”。这样的理念蕴藏着深厚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在“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中，引入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驱的思想、事迹，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历史使命感。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

课程内容处处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华。在讲解职业道德部分时，教师着重阐述诚信、敬业的重要意义，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敬业”高度契合。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深入领会并践行这些价值观。在分析创业案例时，可以突出团队协作、社会责任等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感。

（3）制度自信与社会责任元素

契合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学生对于制度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探索外部世界之际，融入“一带一路”、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建设的重点领域。就业政策讲解要以国家导向为立足点，鼓励学生参与基层项目，促使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大局[5]。邀请行业专家分享实践感悟，强化学生的职业奉献精神，提高其在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协调能力。

2. 依托思政元素打造优质课程思政配套资源

课程思政资源是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基础条件。对思政资源展开系统挖掘、整合，是切实达成课程育人目标的关键保障。在建立系统课程思政元素库的进程中，需要建立和其相匹配的优质教学资源，促使思政元素实现具象化的呈现、教学转化，创新选用资源载体形式，以此提高课堂的吸引力、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助力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价值引领达成深度融合[6]。

（1）动态优化与迭代

对于思政元素的发掘、思政资源的建立而言，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教师要根据学生反馈的意见、行业发展的动态情况、国家政策的调整状况，适时地调整并优化教学资源，以保证课程思政的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以国家创新创业政策的调整为例，要适时更新创业案例库的内容，把最新的政策解读、成功案例纳入其中，从而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2）引导学生参与资源建设

鼓励学生参与课程思政资源的建立工作，即组织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案例搜集、创新创业项目设计等相关活动，以此促使学生在实践进程当中，能够进一步加深对思政元素的理解、认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引导和塑造学生价值观的一条重要途径，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新能力。

（三）结合教学实际创新方式方法，筑牢课程思政育人根基

1. 深化课堂互动环节，构建思政渗透模式

课堂实为“春风化雨之地，价值浸润之源”。教师依据课程内容，采用案例教学、研讨式授课、探究式学习、情景模拟教学等形式，创设问题场景，引导学生思考职业选择、创新创业过程中的理论思维、方法论与价值判断。剖析成功企业家创业实例，开展面试模拟、创业路演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职业道德与工匠精神。通过师生互动问答、生生交流，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引发深度思考，加深对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的认知。

2. 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拓展思政育人维度

课程思政应覆盖课外学习与实践。教师通过“学习通”、MOOC 平台、腾讯会议等工具，建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扩大思政教育范围。线上推送优秀校友、就业榜样、创业先锋等资源，组织学生研讨和反思；通过“学习通”分享行业报告、政策解读、案例等资源，引导学生关注行业动态，提高专业素养；邀请企业导师和成功创业者举办线上讲座，分享经验，加深学生对国家战略和职业使命的认识。

3. 加强实践教学部分，实现思政知行统一

就业指导与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强实践属性，需突出“在做中学”理念，推动思政教育与实践训练深度融合。实践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培养职业素养、工匠精神及团队协作能力。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创新创业竞赛、职业生涯规划竞赛、模拟面试、基层调研等活动，以此让学生在真实或者仿真的职业场景中提高综合素质，增强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四）结合评价改革推动师生联动，构建协同育人全新格局

有效教学评价体系是检验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提升育人效果的关键。对教师讲课水平的评估，需兼顾基础与质量层面：基础层面核查思政方向是否纳入课程大纲、教案，就业课是否明确职业道德与工匠精神，创新创业课是否融入诚信运营与社会担当；质量层面聚焦思政课与专业内容的结合效果（案例代表性、方法吸引力、流程顺畅度），通过教学督导听课、同行互评落实。

评估学生学习效果，重点关注价值认同、职业素养、责任担当，可从四个维度开展：课堂表现看讨论参与度与观点深度；作业项目考查创业 / 职业规划中的思政融入；实习实践通过单位反馈了解职业素养；自我反思报告追踪学习成长与不足。

要建立能够实现教学评价动态反馈的模式，进而借助该模式的结果对教学策略予以调整，同时优化思政课程资源，最终达成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提高的融合，培育高素质人才，建立起“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结语

课程思政教学的革新不仅对学生职业技能的精进有着重要影响，还关乎学生正向价值观的培育、社会担当意识的养成。在未来，面对课程在目标、内容、方式、考评方面存在的困境，将持续沿着以目标精准化、资源系统化、方式创新化、考评协同化为核心的革新路径前行，推动思政模式的建立，促进思政与专业契合，以此提高课程的效果，培育出德技并修、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 , 2018-05-03(0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 (2020-06-05)[2025-11-1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3] 梁平 . 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四层级目标论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0(04): 151-156.

[4] 李梦卿 , 刘晶晶 .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轫径迹与价值衍增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2017(15): 44-56.

[5] 刘梅月 , 刘冰 , 周刚 . 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路径研究 [J]. 高教学刊 , 2023, 9(13): 175-178.

[6] 谢幼如 , 邱艺 , 黄瑜玲 , 等 . 智能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J]. 电化教育研究 , 2021, 42(04): 76-8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高职院校职业生涯教育课程思政融合研究”（A1-0252-25-15-QN08）。

（作者单位：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陈希胜 孙玲凤* 马 宇

摘要：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之中，集中体现了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红色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充分发挥东北抗联精神的内在价值，通过创新理论教学与实践模式、构建虚拟现实技术平台、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文化等途径，将其有机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东北抗联精神；精神谱系；东北抗日联军；思想政治教育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这一重要论述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研究方向。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四年的艰苦奋战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扬。在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深刻内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其中，不仅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更为高校实现育人目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东北抗联精神的内涵实质

（一）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

“欲事立，须是心立。”信仰信念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东北抗日联军在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时，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食不果腹的生活环境下，继续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抗击日本侵略者。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想尽各种办法联系党中央，但唯独没有想过放弃。当武装力量损失殆尽，东北抗日联军为保存火种撤退到苏联进行整顿期间，依旧初心不改，时刻为反击日本侵略者做准备。这些无不体现出东北抗日联军坚定的理想信念。“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组织派遣大批党员干部到东北地区动员群众积极抗战，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赵一曼被捕后受尽酷刑依旧坚守秘密，赵尚志被误开除党籍后，始终志向不改，信念不衰，令日本侵略者无奈感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广大的党员战士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支撑他们抗战到底的精神动力。

（二）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

爱国主义，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丰碑，更是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旗帜。它作为激昂的主旋律，穿越千年时空，薪火相传，铸就了民族生生不息的壮丽史诗。“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在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广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广大的爱国群众不分阶级，不分老幼，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浪潮中，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从伐木工“牙子”带领工友端起猎枪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到富户黄有将全部财产捐给游击队。从投笔从戎的张甲洲，到揭竿而起的部分东北军官兵。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指引下，广大的热血民众义无反顾，背井离乡，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用鲜血、生命和灵魂书写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展现出了伟大的爱国情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团结东北各民族力量，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谱写了一曲激荡人心的壮丽凯歌。

（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在十四年之

久的浴血奋战中，东北抗日联军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无数次的交锋，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艰苦性与其他革命精神相对比，具有典型意义。由于地理缘故，东北抗日联军常年辗转高寒林海雪原、冻土深山。因为敌人围山封锁，东北抗日联军只能忍受饥饿，杨靖宇将军牺牲时胃里只有草根和树皮，这不难看出与敌作战之不易。1938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全中国的攻势，对后方即东北地区进行了“大扫荡”，以保障战略资源的供应。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采取“三光”政策，通过“铁壁合围”“保甲连坐”“大并屯”等措施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围剿，东北抗日联军只能退居林海雪原，搭建“密营”以求生存。东北地区冬季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是常态，夏季潮湿闷热蚊虫多。东北抗日联军既要直面恶劣的自然条件，突破生理极限，同时还要以简陋落后的装备，对抗装备精良的敌军。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依旧满怀壮志豪情，战天斗地，用顽强的意志在白山黑水间谱写了英雄战歌。

二、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

（一）东北抗联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红色资源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开放性特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教育资源被挖掘和利用，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展了教育途径。东北抗联精神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联军将士在冰天雪地中坚持抗战十四年，杨靖宇创作的“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活”的豪迈歌词，张镇华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毫不动摇，这些生动素材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内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克服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局限性，而东北抗联精神中蕴含的大量鲜活案例，正好能够增强课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开设相关专题选修课，组织文化活动，既能深化学生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理解，又能培育他们的爱国情怀。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载体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独特形态，是东北抗日联军在武装斗争中和东北地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且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东北抗联精神一直是对外敌作战而形成的革命精神。当前，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英雄的事迹已被编入教材，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可以通过组织观看抗联题材影视作品、参观抗联遗址遗迹等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东北地区的革命文化和风土人情。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设立抗联英雄雕塑、悬挂名言警句等措施，营造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接受教育后，会将东北抗联精神通过言行传递给更多人，从而扩大这一精神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三、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2] 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将士集体意志的结晶，是激励新时代大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因此，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加强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优化校园文化环境，构建全方位的育人体系。

（一）坚持思政课程主导，系统融入抗联精神

“思政课具有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的显著特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渠道和主阵地。”[3] 大学生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理论认知和情感认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因此，将东北抗联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历史，激发情感共鸣，实现精神的升华和内化。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中讲授抗日战争相关章节时，可以重点讲述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以人物为主线，以时间节点为脉络，系统梳理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历程，从历史维度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可以借助东北抗联精神阐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性，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学生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理性认识。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以结合抗联英雄事迹，深入剖析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中，可以选取抗联英雄典型，阐释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巨大牺牲，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可以从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朝鲜进步抗日武装协同抗战的史实出发，阐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深化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

（二）加强实践教学互动，促进精神外化于行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是要将其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的爱国行动。单纯的理论教学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实践教学促进知行合一。高校应充分认识到东北抗联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浸润作用，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有效衔接，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东北抗联精神的理论内容，当代大学生只有多参与实践活动，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5]。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首先，促进课堂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在讲授东北抗联精神相关内容时，可以给学生布置课后资料收集任务，组织课堂讨论和分享，还可以开展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活动，打造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红色课堂。其次，推动专业教育与东北抗联精神融合。文学专业可以组织开展东北抗日联军家书及文风研究；教育学专业可以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试讲内容；艺术专业可以通过还原抗联将士形象等艺术创作形式开展实践。这样既能深化专业学习，又能培养爱国情怀。最后，组建大学生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团。通过选拔和培训，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述抗联故事，既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又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实现了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的统一。

（三）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沉浸式教育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东北抗联精神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开发数字化教育产品，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重要途径。高校应充分发挥科研优势，与东北抗联红色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等单位互联互通，相互合作，组建学生团队设计关于东北抗联精神的相关数字化产品、IP 产品，如杨靖宇等英雄人物数字邮票藏品，东北抗日联军战士遗物数字藏品、3D 数字人物、东北抗日联军纪录片视频数字藏品等，将这些数字产品利用区块链统一发行，统一管理，保证每一款数字产品具有唯一编号、永久存证、不可复制、不可篡改等特性。东北抗联精神的数字化既迎合当下青年人的收藏爱好需求，又能激发大学生对东北抗联精神数字化产品的兴趣，从而引导大学生更多地关注东北抗联精神，真正地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做到润物细无声。此外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利用 VR、AR 等技术，开发东北抗联精神 App，打造线上东北抗联精神体验馆，还原东北抗日联军战斗、生活场景，将真实发生过的场景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呈现在大学生面前。还可以打造东北抗联精神虚拟仿真线下体验馆，通过 VR 穿戴设备和 4D 观影等，让学生以“抗联战士”的身份参与革命历史全过程，增强教育的沉浸感和体验感。“东北抗联精神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依托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逼真、灵活安全的实践学习环境。”[6] 这种创新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优化校园文化环境，营造红色育人氛围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 人与环境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没有人能离开环境而生活，另一方面，人能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高校学生校园文化环境包括大学校园内影响学生思想形成发展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文化要素。”[8] 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的熏陶，而东北抗联精神中蕴含着无限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校园文化中，能为校园注入红色基因，形成红色文化氛围，提升大学生爱国意识。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是结合学校特色打造抗联主题景观。如建设密营式凉亭，以赵一曼、李兆麟等英雄命名的建筑或湖泊，修建东北抗联精神文化长廊，形成专门的红色文化传播空间。这些场所既美化校园环境，又发挥教育功能。二是在教学楼、宿舍楼等场所悬挂抗联将士肖像、宣传画和标语，在校园广场、绿地等区域设立英雄雕像并刻写事迹介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英雄观，让东北抗联精神随处可见、随时可学。三是加强图书馆红色文化建设。图书馆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应当增购东北抗联主题书籍，在阅览区展示英雄语录和诗句，营造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坚韧意志和奋斗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和育人功能。通过创新思政课程教学、加强实践育人、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文化氛围等途径，将东北抗联精神有机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能够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N]. 人民日报 , 2012−11−19(02).

[2] 习近平 . 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 2015−09−02(02).

[3] 蒋泽枫 , 吕增艳 . 践行“四史”教育：东北抗联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耦合研究 [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 2021(07): 6−12.

[4] 列宁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2: 381−382.

[5] 阿依古丽·阿布都热西提 , 项久雨 , 牛军政 .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时代价值和践行路径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2(16): 22−24.

[6] 孙强 , 张林影 , 陈君 . 东北抗联精神思政课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 2022(02): 39−4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2: 172−173.

[8] 陈娟 , 刘鸿畅 . 论高校学生校园文化环境的分层及互动融合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21(12): 151−15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2026 年度科研课题“新媒体与数智技术融合下高职院校辅导员德育工作的创新研究”（LZYY26090）。

（作者：陈希胜、马宇，盘锦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辅导员、助教；通信作者孙玲凤，盘锦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支部副书记、讲师）

“大思政”格局下地方高校红色基因传承“师生共育”模式研究
——以九江学院为例

郭　清

摘要：在“大思政”格局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已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核心议题。地方高校面临资源禀赋有限、传承路径单一等结构性困境，亟须探索适配自身特点的育人模式。以九江学院为研究载体，围绕“师生共育”这一核心理念，从理论逻辑、模式构建到实践保障三个维度展开系统研究，提出“3+2”全覆盖，“三三制”协同推进与“一校一库一平台”特色建设等路径，并构建多元动态评价体系，旨在为地方高校红色基因传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参考。

关键词：“大思政”格局；红色基因传承；师生共育；地方高校；九江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与赓续，多次就此发表重要论述。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兰州军区时提出“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将红色基因传承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局”，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然而现有研究和实践多聚焦于重点高校，对地方高校这一占据全国高校数量主体的群体关注不足；且传统思政教育重心偏向学生端，对教师持续教育的系统性设计明显缺位。九江学院地处红色资源丰厚的江西省，具备探索地方高校“师生共育”模式的典型价值。系统构建该模式对于摆脱地方高校思政教育困境，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走深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大思政”格局与红色基因传承的理论逻辑

（一）“大思政”格局的内涵演进与育人指向

“大思政”格局并非一个静态概念，而是在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持续深化中逐渐成形的。从历史脉络看思政教育经历了从“单一课程”到“课程思政”，再到“大思政课”的演进轨迹，其核心逻辑在于打破思政教育的学科边界与主体边界，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贯通与全课程协同的育人共同体[1]。地方高校作为这一育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其建设实践更需贴合区域发展需求，让大思政的育人效能落地基层与服务地方。

“大思政”格局的育人指向具有三重维度：其一主体扩展，将教育责任从思政课教师延伸至全体教师乃至社会各界；其二时空延展，突破课堂边界将校内外、线上线下与课内课外纳入统一的育人场域；其三价值深化，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坐标，推动育人由知识传递向价值认同转变。正是这一格局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为红色基因传承提供了制度依托与实践空间，也为“师生共育”模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前提[2]。

（二）红色基因传承的时代价值与地方高校的特殊使命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形成的精神密码，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与民族精神谱系，是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与培育时代新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在复杂国际形势与多元文化冲击并存的当下，红色基因传承具有增强文化认同、筑牢思想防线的现实价值。地方红色文化更是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传承能让本土青年更具家国情怀与乡土担当，助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

地方高校在红色基因传承中承担着特殊使命。一方面地方高校数量庞大且覆盖面广，是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主力军，其思政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区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地方高校与地方历史文化深度嵌合，往往拥有独特的红色资源禀赋，具备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与形成特色传承路径的天然优势[3]。九江学院地处江西，周边红色资源丰富，

这为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基因传承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红色资源的地域差异性也决定了传承模式不能“一刀切”，地方高校应立足本校实际将区域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与实践资源，形成“一校一特色”的差异化传承格局，避免内容同质化与形式化。

（三）“师生共育”理念的生成逻辑与理论依据

“师生共育”理念的生成，源于对传统思政教育单向传递模式局限性的深刻反思。现有研究表明，红色基因传承长期存在“重学生，轻教师”的结构性偏差，对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把握不足，持续教育缺位导致传承的深度与持久性受限。

从理论层面看，“师生共育”契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协同建构逻辑，知识与价值认同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在师生互动中共同生成的。同时它也呼应了“大思政”格局对主体协同性的内在要求[4]。从实践层面看，“师生共育”强调教师在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学习与践行中实现德育水平的提升，形成“共同学习，互促进步，同步成长”的良性循环。这一理念突破了单一主体教育的天花板，使红色基因传承的内生动力更为持久稳固。

二、九江学院“师生共育”模式的构建基础与基本形态

（一）九江学院红色资源禀赋与育人场域分析

九江学院地处赣北，毗邻庐山与井冈山等红色圣地，周边红色革命遗址众多，具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禀赋。与此同时，学校旅游管理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旅游管理学科为全省“十二五”重点学科，专业优势与红色资源的融合具备现实可行性。

然而九江学院亦面临地方高校普遍存在的资源制约：经费有限、专职思政师资不足与红色资源系统整合能力较弱。当前学校缺乏本校独有的特色红色基因库与传承平台，对专业课程中红色基因的挖掘仍处于“为了思政而思政”的浅层阶段，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尚未实现[5]。这一现状倒逼九江学院必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探索一条系统性与特色化的“师生共育”传承路径，而非简单复制重点高校的经验模式。

（二）“师生共育”模式的结构要素与运行机制

九江学院“师生共育”模式以“3+2”全覆盖为基本前提，即在“全员、全程、全课程”基础上叠加“全职业生涯、全生命周期”，确保红色基因传承贯穿师生成长全过程，而非局限于在校学习阶段。

模式的结构要素由“三三制”构成（见图1）：“三个结合”即“专业课程＋红色基因”“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三个体系”即教育教学管理体系、评价体系与保障体系。三个结合解决的是传承路径问题，三个体系解决的是制度支撑问题，二者协同构成模式运行的双轮驱动。“3+2”与“三三制”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形成层次递进关系：“3+2”界定传承的时间维度，“三三制”明确传承的内容维度与制度维度，二者共同锚定模式的边界与深度，为后续平台建设与评价体系的搭建提供框架依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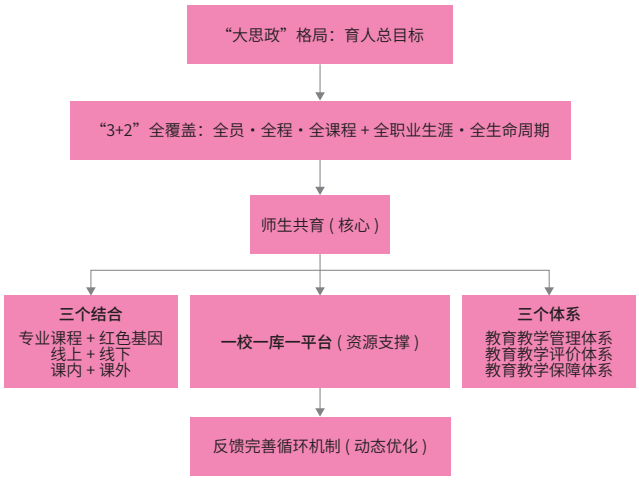


图1 “大思政”格局下九江学院“师生共育”模式结构示意图

在运行机制上，模式采用“前测—实践—后测”的循环验证路径：通过问卷调研分别对教师和学生展开前测，掌握师生对红色基因传承的认知现状；经过模式实施后再进行后测对比分析成效，依托“反馈完善循环机制”对模式持续调整优化，确保传承效果的可测量与可迭代。

（三）“师生共育”模式的实践形态与典型案例呈现

在实践层面，九江学院率先在旅游与地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启动试点，覆盖约20名教师与300名学生，形成了可观察、可比较的实践样本。

具体实践形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课程嵌入层面，在酒店管理专业各门课程中增设“红色基因传承”教学模块，将党史文化、地方红色故事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实现“专业课程＋红色基因”的深度耦合；在平台建设层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红色基因传承平台，线上涵盖学习资源、考核、师生互动与评价模块，线下设有培育平台、展示平台与竞赛平台为师生提供多元传承场域；在教师发展层面，将红色基因传承纳入教师职业发展考核体系，配套教师教学考核与学生学分转换制度，以制度激励推动教师从“旁观者”转变为“共育者”[6]，如表1所示。

三、“大思政”格局下“师生共育”模式的深化与保障

（一）以协同赋能、推动课程思政与红色实践深度融合

“师生共育”模式的深化，首先要打破课程思政

与红色实践之间的壁垒，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而非浅层叠加。在课程思政层面，需构建“专业课程 + 红色基因”的系统性设计，而非简单在课尾附加思政内容。以九江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可将红色服务精神、劳模工匠精神嵌入“服务礼仪与客房管理”等核心课程，使思政内容成为专业能力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红色实践层面，需充分发挥九江地区的红色资源优势，将周边革命遗址与纪念馆纳入实践教学场域，构建“校内课堂 + 校外基地”的协同育人格局。依托“一校一库一平台”整合线上数字资源与线下实体基地，实现资源的高效调用与共享，课程思政与红色实践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将价值塑造从“外部灌输”转化为“内部生长”，这也是“师生共育”模式能够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课程融合的质量取决于教师对红色资源的理解深度。因此“一校一库”中的资源建设不应仅服务于学生端，更应作为教师备课与自我学习的重要支撑，使教师真正具备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教学内容的能力，从而实现“师生共育”中教师主导职能的有效落实。

（二）激活双向动力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同频共振

“师生共育”模式能否持续运转，取决于能否同步激活教师与学生两端的内在动力，而非仅靠外部制度压力驱动。

表 1 九江学院“师生共育”模式实践层次与主要内容

实践层次	具体内容	涉及主体	主要载体
课程嵌入	各专业课程增设红色基因传承教学模块，融入党史文化与地方红色故事	全体专业教师与学生	课程教案，课件，课堂教学
平台建设	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传承平台，包含学习、考核、互动、评价、竞赛等模块	师生全员	数字平台，实物展示基地，竞赛活动
红色基因库	挖掘整理校史与本地红色资源，形成本校特色红色基因库（线上电子资源 + 线下实物）	教研团队主导，师生共同参与	数字资源库，实物陈列室
教师发展	将红色基因传承纳入教师职业发展考核，开展教师红色教育专项培训	全体教师（重点为青年教师）	教师考核制度，专项培训
评价反馈	实施“前测—后测”问卷调研，构建动态多元评价体系，形成循环优化机制	师生全员	调查问卷，评价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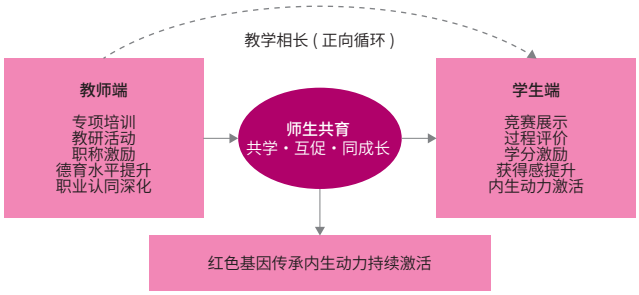


图 2 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双向动力激活机制示意图

在教师端，需打破“思政教育是思政课教师专责”的惯性思维，通过专项培训、教研活动与职称评定激励，推动全体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将红色基因传承内化为职业自觉。教师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自身对红色精神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化，形成“教学相长”的正向循环，在学生端需跳出重终结性考核、轻过程体验的评价陷阱，引入展示、竞赛与创作等多元激励机制，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传承者，如图 2 所示。

两端动力的同频共振，需要打通教师引导行为与学生参与行为之间的回路：教师的示范与引领激发学生的主体参与，学生的反馈与成长反过来强化教师的职业成就感，从而形成“共同学习，互促进步，同步成长”的动态平衡。这一双向激活机制是“师生共育”模式区别于传统单向传递模式的本质所在。

（三）完善评估体系，构建过程导向与成效反馈闭环机制

科学的评估体系是“师生共育”模式走向规范化与可持续化的制度保障。当前地方高校在思政教育评价中普遍存在“重终结轻过程，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亟须构建覆盖过程与结果、定性与定量、师生双主体的多元评价体系[7]。

在评价维度上，面向教师的评价应涵盖课程设计中红色元素的融入质量，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的深度以及教师自身的红色文化学习情况；面向学生的评价则应兼顾知识掌握、价值认同与实践参与三个层面，以学分转换制度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外红色实践。在反馈机制上采用“前测—实施—后测—再优化”的闭环设计，通过对比分析两次问卷数据，量化评估“师生共育”模式的实际成效，为模式的迭代优化提供数据支撑。这一闭环机制确保了模式不会僵化定型，而是在实践中持续生长完善，最终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地方高校红色基因传承范式。

四、结语

“大思政”格局的深入推进，为地方高校破解红色基因传承困境带来了重要机遇。九江学院“师生共育”模式的实践证明，地方高校即便资源有限，也能依靠理念创新、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走出一条系统性与特色化的传承道路。该模式打破思政教育单向传递逻辑，将教师纳入共育主体，实现育人责任全员覆盖；构建“3+2”全覆盖与“三三制”协同框架，为传承提供制度保障；依托“一校一库一平台”激活本土红色资源。目前该模式仍需扩大试点检验，评价体系与平台建设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期待未来在更多地方高校推广，进一步拓展高校思政育人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金琪 . 以党建引领完中“大思
（下转 214 页）

我国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研究现状与前沿演进
——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邓博文

摘要：本文以 CNKI 数据库收录的名师工作室研究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对名师工作室研究的文献年代分布、关键词共现、关键词共现时区和关键词突现等层面展开图谱的可视化研究，全方位展现我国名师工作室研究现状与前沿演进。研究得出，目前高校名师工作室研究成果较少，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成果分布尚不均衡等不足。面向新时代，未来名师工作室研究工作方向可循，但依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名师工作室；CiteSpace；知识图谱；研究趋势

近年来，为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各地纷纷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回应新时代对思政课的新要求、新标准，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更是重任在肩。名师工作室以明确的研究方向、清晰的发展目标、浓厚的研修氛围和强烈的团队荣誉感为鲜明特质，是富有特色与活力的专业教研团体。当前名师工作室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现结合其他名师工作室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一、数据来源

为充分准确把握学界关于名师工作室研究的基本态势，本文采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Citespace6.2.R5，以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核心期刊和 CSSCI 收录的权威性高质量文献为数据来源，以“名师工作室”“思政名师工作室”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设定为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剔除非直接相关论文、重复论文、报纸、会议论文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471 篇，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期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上接 213 页）

政课”建设的实践探索 [J]. 现代教学，2025(24): 28−33.

[2] 崔云霄，刘友田．“大思政”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维论析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5, 44(07): 27−31.

[3] 韩颖，李千乔．“大思政课”视域下地方红色档案资源融入学校育人工作路径探索 [J]. 成才之路，2025(31): 45−48.

[4] 王书汛．“大思政课”育人格局中思政课教师的角色表达 [N]. 安徽科技报，2025−12−19(13).

[5] 卫攀虹．红色文化融入民办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路径研究 [N]. 科学导报，2026−01−26(B02).

[6] 任博．红色校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D]. 石家庄：石家庄铁道大学，2024.

[7] 牛翠萍，王丽．“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传承红色基因的困境及实践策略 [J]. 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5, 38(01): 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江西省教育厅 2023 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省级课题一般项目“‘大思政’格局下地方高校红色基因传承的‘师生共育’模式研究”（JXJG−23−17−10）。

（作者系九江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讲师、江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二、研究现状

（一）发文量分析

本文对 2005—2023 年 CNKI 所刊载的 471 篇名师工作室研究的核心期刊进行年度发文量分析，图 1 反映了名师工作室研究年度（2007—2023 年）总发文量和时间分布情况。当前，名师工作室相关研究仍处于发展初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质量与关注度有待提升。在检索到的 1730 篇文献中，核心文献仅 542 篇，占比 31.3%。经筛选后保留的 471 篇核心文献，发表时间跨度为 2005—2023 年。在这 18 年间，2017 年发文量达到峰值，为 49 篇，整体水平与成熟度、高关注度的研究领域存在明显差距。二是文献发表数量增长缓慢。现阶段，相关研究的发文总量整体呈现不稳定的缓慢增长态势。2007—2012 年这一阶段，名师工作室研究发文量很少，增长缓慢，发文量均在 20 篇以下；2013—2017 年这一阶段，发文量增多，增速加快，从 2013 年的 25 篇到 2017 年最高值 49 篇；虽然总体呈增长态势，但 2023 年呈现下降趋势，发文量为 30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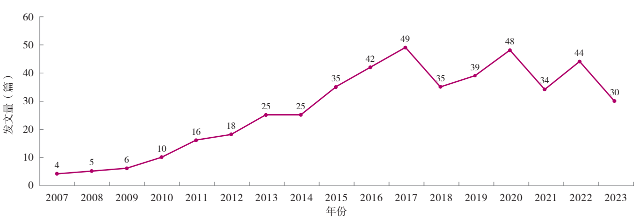


图 1　名师工作室研究年度（2007—2023 年）发布量分布

（二）研究热点分析

1.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该关键词与研究领域内的其他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频次较高，基于此可表明该领域内的研究热点。

选择节点类型（NodeTypes）为“Keyword”，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生成的总节点数为 443，连线数为 872，密度为 0.0089。图 2 所示的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分析的关键词，其出现频次越多，节点圆圈就越大，对应的字体就越大，其中心性则越强。关键词“名师工作室”“教师专业发展”“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共同体”“教师”“高职院校”“骨干教师”（按节点大小排序）出现的频次都超过了 5，说明这些领域是名师工作室研究的热点。其中，名师工作室（0.6）、教师专业发展（0.46）、职业教育（0.2）、教师培训（0.13）、共同体（0.1）、教师（0.17）、骨干教师（0.1）的中心性都超过了 0.1，说明其与其他关键词的连接紧密，可以作为关键节点，如表 1 所示。

2. 关键词时区和突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与突现词分布图可有效揭示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 2007—2023 年名师工作室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及突现词分布，如图 3 所示。将该领域高频关键词投射至以时间为横轴的图谱中，能够直观呈现名师工作室研究的演进脉络。2013 年及之前，该领域的关键词数量相对较少，主要以名师工作室、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为主。2013 年后，关键词逐渐增加，专业引领、规范制度、跨界学习、分层分类发展、双导师、“互联网 + 教育”等词汇逐渐增多。这说明国内对名师工作室的研究逐步深入。

关键词的突现是指关键词在某一时期内频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用计量软件 CiteSpace 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可以帮助判断我国名师工作室研究的发展趋势。将样本数据导入 CiteSpace 软件，选择 Burstness 进行参数的设置，然后运行软件，得到 2007—2023 年

图 2　名师工作室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1　高频关键词出现频次与中心性表

首年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2009	名师工作室	77	0.6
2009	教师专业发展	29	0.46
2013	职业教育	20	0.2
2007	教师培训	14	0.13
2011	共同体	11	0.1
2009	教师	10	0.17
2010	骨干教师	5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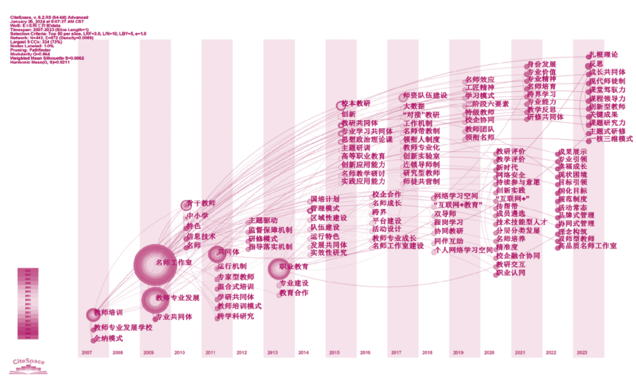


图 3　名师工作室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及突现词分布图

被引突现强度最高的前 25 个关键词

关键词	年份	突现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2007 – 2023
教师培训	2007	1.06	2007	2013	
全纳模式	2007	0.69	2007	2007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2007	0.69	2007	2007	
专业共同体	2009	0.69	2009	2009	
骨干教师	2010	1.66	2010	2012	
生命科学	2010	0.67	2010	2010	
成长	2010	0.67	2010	2010	
均衡发展	2010	0.67	2010	2010	
义务教育	2010	0.67	2010	2010	
特色	2010	0.67	2010	2010	
名师工作室	2009	1.11	2013	2014	
教学	2014	1.13	2014	2015	
教师	2009	0.96	2014	2014	
创新	2015	1.22	2015	2015	
校本教研	2015	1.06	2015	2015	
教师领导	2016	1.53	2016	2017	
教师政策	2016	1.02	2016	2017	
教师专业发展	2009	0.92	2016	2017	
师资队伍建设	2017	1.14	2017	2020	
中职	2018	1.07	2018	2019	
网络学习空间	2018	0.83	2018	2020	
职业教育	2013	1.03	2019	2019	
共同体	2011	1.53	2020	2020	
中职学校	2020	0.99	2020	2021	
高中政治	2021	0.83	2021	2023	

图 4 名师工作室关键词突现图谱

25 个突现词，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突变的起止时间构成了突变词的突变时期，图中用粗线条表示。可以看出，我国名师工作室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关键词突现强度并不高，最高的也仅为“骨干教师”（1.66）。

名师工作室从 2005 年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但只是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教师培训”从 2007 年开始突现，一直持续到 2013 年，突现强度为 1.06，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建立时间较早，从 2002 年首批名师工作室在上海成立之后，北京、杭州、重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工作室。这些工作室不仅数量上有所增长，而且涉及的学科领域也逐渐拓展，包括思政学科在内的多个学科都建立了相应的名师工作室。受互联网科技影响，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应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辐射和指导作用，以名师工作室等形式组织特级教师、教学名师与一定数量的教师结成网络学习共同体”。“网络学习空间”从 2018 年开始突现，持续到 2020 年结束。

（三）思政名师工作室研究现状

1. 名师工作室的功能研究

孙兆航、吴秀波认为，名师工作室的建设可以促进名师快速发展，更是充分发挥名师示范、辐射、指导和带动作用的新型阵地。孙洲云指出，名师工作室有三个基本功能定位，即教师成长、教研活动、教育整体。袁成等人认为，“名师工作室”的研修模式可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改善职业倦怠心态[1]。杨维风指出，名师工作室有利于发挥名师的带动作用，优化教师队伍建设。齐爽从“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建设目标出发，积极发挥名师在多方面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从而提高教师整体发展水平。刘晓宇等人以数字时代为背景，指出名师工作室要依靠信息化技术，整合优质资源，发挥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2]。张黎明认为，网络名师工作室打破时空限制，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优势，让教师共享资源，推动教研活动的开展。沈书生则认为，工作室建设需建立跨界思维，加强不同学科领域工作室之间的交流，逐步开展以网络名师工作室为基本单元的共同体建设。

2. 名师工作室的现存困境研究

近年来，名师工作室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王新国指出名师工作室存在形式化、官僚化、表演化的问题。李笋认为名师工作室大多处于“平原”状态，普遍存在重成立、轻管理问题，面临真正高质量发展不多的困境[3]。朱应开等人从工作室定位不明、建设成效不佳、制度保障不足等三方面说明高校网络名师工作室运行存在的问题[4]。周杰、洪河条以教师参与网络研修行为为切入点，指出当前教师专业发展缺乏持续性、教师参与网络研修积极性不足、教师参与网络研修效果甚微等问题。蹇世琼等人指出，当前名师工作室成员遴选机制具有潜在风险，成员普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难题，需建立系统的成员遴选制度，以此推动名师工作室发展[5]。张恩德、刘增花认为，城乡教育的不平等、不均衡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现实困境[6]。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为了更好地回望我国名师工作室的研究脉络，本文在名师工作室研究的文献年代分布、关键词共现、关键词共现时区和关键词突现等层面展开图谱的可视化研究，全方位展现我国名师工作室研究现状与前沿演进，为名师工作室领域的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综上所述，全国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已经建立并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名师传帮带作用，培养了一批优秀中青年教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梳理和研究文献发现，目前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成果分布尚不均衡等不足；相关

研究少，且研究不够深入、系统，难以支撑和指导思政名师工作室有序建设，没有全国性的现状调查，更缺乏国际比较视野。

（二）展望

为了进一步推动思政名师工作室的持续发展，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和拓展：首先，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提升工作室影响力。思政名师工作室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全面、多元的评价体系，以衡量工作室在思政教育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通过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可以激发工作室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可以提升工作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其次，加强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政名师工作室应当积极拓宽国际视野，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等方式，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的思政教育理念和方法，提升工作室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也可以将中国的思政教育经验传播到国际社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思政教育的了解和认同。最后，加强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思政教育不是一种理论传授，更是一种实践体验。思政名师工作室应当注重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思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综上所述，思政名师工作室的研究与发展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通过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加强国际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加强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等措施，可以进一步推动思政名师工作室在思政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更多具有高尚品德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作出积极贡献。通过这些努力，相信未来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将在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袁成，廖洪森．让名师工作室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J]. 思想政治课教学，2016(03): 89−92.

[2] 刘晓宇，乔勇，李高建．数字教育背景下名师工作室建设转型研究 [J]. 教学与管理，2024(04): 17−21.

[3] 李笋．名师工作室建设要注重质量 [J]. 教学与管理，2020(02): 4−5.

[4] 朱应开，陈晓风．新时代高校网络名师工作室建设的机理和路径 [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23, 41(01): 97−102.

[5] 蹇世琼，彭寿清，罗杰，等．“名师工作室”成员遴选：潜在风险与规避路径 [J]. 中国教育学刊，2020(05): 83−86.

[6] 张恩德，刘增花．名师工作室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使命、内容与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 42(29): 16−20.

（作者单位：兰州信息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
——以云南为例

杨继伟

摘要：基于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民办高职院校中的特殊性，云南省的区域特点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以及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现状，研究发现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教师流动性大、教学资源整合能力有待提升、结构失衡、教学质量不高等。经探究和分析，梳理出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完善福利待遇，健全保障机制，优化教师结构，强化教师培养，关注学生特点，提升教学质量，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探索创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等，从而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关键词：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需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政治素养和教学能力直接决定着高职教育的成效。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切实把立德树人的目标落到实处，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格，让思政教育有效地落到实处，才能保证育人效果，以高质量、高成效的局面开展下去。本文就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新时期民办高职院校的路径进行了研究。

一、新时代对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求

（一）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民办高职院校中的特殊性

民办高职院校的特殊性在于须结合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注重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同时面临师资流动性大、资源有限等挑战。

一是教师队伍结构的特殊性。一方面，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专职与兼职比例失衡，部分高职院校仍存在专职教师数量不足、流动性大、部分教师理论功底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学科背景多元化，一些教师多为跨专业入职；还有的民办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准入门槛较低，不少兼职教师和专业不对口的教师都可以从事思政课教学，导致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性不强，良莠不齐[1]。

二是培养机制的特殊性。一方面，民办高职院校体制机制不健全，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主要通过日常集体备课、教学竞赛等形式快速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职称晋升、师德标兵评选等方式强化教师职业认同。

三是发展环境的特殊性。与公办高等院校相比，民办高职院校存在学科建设基础薄弱、教师职业发展规划不明晰、教师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等问题，需要通过跨学科融合、校地联动模式及事业留人、专家培养机制等方式补齐短板。

四是政策落实的特殊性。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方面，民办高职院校仍存在落实不够到位问题，在能够迅速响应党和国家关于思政课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些具体要求的同时，应结合应用型办学定位，在学科建设与产教融合方面进行研究。

（二）云南省的区域特点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在区域特点方面，云南省地形呈西北高东南低的三阶梯状分布，以高原山地为主，云南民族多样性突出，拥有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明显的地域特色。

在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方面。近年来，云南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高等教育格局，包括重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等。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截至目前，云南省有高职院校 57 所，其中 44 所公办、13 所民办。

二、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现状及问题

（一）云南省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现状

从规模与结构来看，云南民办高职院校基本已按1∶350的配比要求配齐专兼职思政课教师，教师数量充足，且职称、学历、党员比例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高职院校通过共享课程资源、定期组织培训、举办思政比赛等形式不断提升教师能力。从政策支持方面看，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民办高校思政课建设联盟，通过公办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手拉手”集体备课等形式，为民办高职院校提供了较好的资源平台。从教师能力提升方面来看，民办高职院校通过“党建+思政”的模式，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体制机制，采用专题研讨、实践研修、集体备课等形式，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强化教师政治素养，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

（二）云南省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1. 教师流动性大，教学资源整合能力有待提升

一方面，教师流动性大。民办高校生源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收入。当前，由于办学历史较短、经费投入不足和综合实力不强等原因，民办高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较为薄弱，存在教师流失等问题[2]。根据中国民办学历教育行业发展现状调查（2025年）数据，民办高校师资流动性较高，教师年均流失率达18%，远高于公办院校。另一方面，资源分配不均。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学科背景单一，部分教师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背景，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养教育，导致教学内容碎片化；民办高职院校办学资金不足，导致教学资源、实习实训设备、实践场地等方面受到限制，信息化教学资源整合率低。

2. 思政课教师结构失衡

大部分教师均为2021年后招聘或转岗的教师，其中部分由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经济）转岗而来。一方面，部分教师未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导致对思政课所要求的核心理论体系理解不深、不透。另一方面，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还存在职称、学历、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高职称、高学历教师比例小，老、中、青比例失调，年轻教师占多数，经验丰富的教师较少。

3. 思政课教师教学质量不佳

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个人的发展比较关注，而对思政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效果有所忽视。教师在民办高职院校中的职业认同感较低，所以没有严格履行职责，还存在“完成任务式”的教学，偏重照本宣科或灌输式的教学。同时，部分教师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欠缺，尤其是育人观念薄弱，没有站在教师的角度授课，在专业发展上过分关注自身工作，对思政课的育人理念不够重视。如此，也会造成整体的思政教育效果并不明显。另外，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停留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忽视了学生的情感诉求、学习情况及思政课的价值引领作用，思政课堂教学质量不佳。

4. 思政课教师教学缺乏创新

当今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但一些高职院校在进行思政队伍建设时，在创新方面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不是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基础不够丰富，不能对当前思政问题提出更客观、更鲜明的观点的情况下，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并不高，部分思政课教师的思想与当前思想政治发展出现了偏差。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职院校的学生对互联网都比较熟悉，有些教师并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习惯及学生的专业需求，没有与云南的区域特点相结合，也没有彰显学生课堂主体地位，思政课教学缺乏针对性和亲和力，导致整体的思政教育成效并不显著。

三、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一）完善福利待遇，健全保障机制

一是要健全教师职业保障机制。落实思政教师岗位津贴，建立“事业编制+市场化薪酬”等形式的薪酬福利制度，同时设置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教师奖励制度等，将教学成果与教师成长挂钩，确保教师收入稳定。

二是要完善福利待遇。高职院校要完善教师的福利待遇，从多方面入手，确保思政课教师的个人利益。首先，高职院校要对教学环境及基础教学设施、教学材料等进行完善，减轻教师的授课负担，同时也要倡导教师实现自我提升，有效地强化自身的专业技能以及教学能力。其次，要建立健全教师的考评体系，重视教师教学效果的考核，构建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的考核体系。同时，要将考核结果与教师待遇挂钩，这样能够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强化教师的教学能力。民办高校的奖惩制度要公平，大部分民办高校教师工作量大、课时费低，应提高课时费，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废除不合理的惩罚制度。学校在制定奖惩政策时，要听取教师意见，才能更好地维护教师和学校的关系[3]。

（二）优化教师结构，强化教师培养

一是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优先选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口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教师，对转岗的教师和新教师实行“导师制”或“1+1”（1名专业教师+1名新教师）结对帮扶。聘请退休教师或设立“银龄教师岗”，吸引退休教师返聘，通过“传帮带”降低新教师流失率。鼓励教师通过申报课题、发表理论文章及学术论文等方式不断提升高职称教师比例。

二是要重视队伍构建，强化教师素养。要强化教

师自身素养和职业素养，融合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丰富思政知识，彰显新时代主要特征。同时也要强化教学实践环节，锻炼教师的教学技能。高职院校要对新入职的思政课教师做好岗前培训，助力新教师快速适应教学环境。要组织教师进行定期培训，夯实思政课教师的知识基础，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整体水平。“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既要夯实基础，又要更新信息储备，提升角色适应力。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涉猎其他相关理论知识，尽可能扩大知识面。”[4]

三是要构建强化教师能力培养的跨学科教学资源平台。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开发课程资源库，建设精品课程，支持教师不断整合教学内容。联合省内外其他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研修班，组织教师赴企业、社区开展调研，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充分发挥师生的积极性，搜集省内各地红色资源，分类整理案例、视频等素材，形成“案例集”，建立教学资源库，减轻教师备课压力。同时，推动民办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共建“马院联盟”“思政教育联盟”等，通过财政补贴、项目合作等方式，将优质资源向薄弱院校倾斜。

（三）关注学生特点，提升教学质量

一是要精准识别学生特点，构建需求导向的教学设计。一方面，通过课前问卷、课堂观察及个别访谈等形式，系统分析学生的理论基础、学习动机、知识背景等差异，建立学生动态档案，例如，可针对云南民族地区学生特点设计少数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的教学资源，针对就业焦虑的学生强化职业规划教育等；同时，可结合云南多民族特点，充分挖掘本土化教学案例及素材，增强课堂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结构。可结合云南实际开发“基础理论 + 实践教学”模式，结合云南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现实案例，促进理论向行为转化，如在讲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时，可组织学生到昆明市第六水质净化厂参观学习；推行“问题链教学法”“故事教学法”“音乐教学法”等，设计如“大理洱海如何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等本土化问题链，引导学生形成价值认同。

二是要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化素养与技能，熟悉并掌握自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的教学资源，了解和应用各种媒体语言和创作方式，以更好地开展思政课教学[5]。组织学生开展情境化教学实践，开展辩论赛、讲好中国故事等活动，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理论理解，利用数字化平台、AI 等工具推送短视频等，适应当前信息化教学模式，契合学生碎片化学习习惯，提升课堂参与度；结合云南特色，开展“红色云南”主题研学活动，如参观纪念馆等，通过沉浸式体验厚植爱国情怀。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应用信息技术教学设备，将思政教学内容以图片或视频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四）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探索创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

一是要分层分类培养教师专业能力。针对新教师、骨干教师等不同教师群体，开展数字化教学、案例开发等专项培训，组建跨学科团队，通过“思政教师 + 专业教师”的形式，共同开展集体备课、教学竞赛，提升教师整体水平，将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思政教育充分结合，引入企业资源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把职业素养的培养融入思政课堂。

二是要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让课堂充满活力和生机，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是新时代对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提出的新要求[6]。结合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产业需求，开发“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传统文化”等本土化教学模块，整合优质案例、红色资源、民族文化等素材，实现跨校共享。利用 VR、AI 等工具增强与学生的互动，通过虚拟仿真体验深化学生对“四史”的理解。

三是要完善评价与反馈机制。将学生满意度、教学创新成果等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定期开展教学反思与改进，鼓励教师将创新实践转化为学术论文或各级各类课题，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同时，加强与辅导员、党务干部的联动，通过联合备课、实践项目等形成育人合力，提升育人实效。

四、结语

以新时代为背景，在构建高水平、高质量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完善思政教师激励机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引导教师开展思政教育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思政教师也要基于学生当下的身心发育现状，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优化，并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的环节，应用信息技术设备辅助教学，进而不断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郑恩 . 民办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4(36): 53−56.

[2] 阙明坤 , 蒋晓蝶 . 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离职意愿的群体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5, 26(01): 10−18.

[3] 杨泽渊 . 新时代民办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J]. 大学 , 2023(18): 33−36.

[4] 龙晓燕 . 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 : 以云南省六所民办高校为例 [D]. 昆明 : 云南财经大学 , 2020.

[5] 成芳 .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思政（下转 221 页）

“预测”与“敏捷”双轨融合的项目管理课程思政体系重构与实践探索

马礼萍 方 放

摘要：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本研究突破传统预测型教学框架，将敏捷项目管理价值观与实践融入课程思政。通过构建“价值、知识、能力、素养”四维育人模型，挖掘预测与敏捷双轨知识体系中的思政映射点，并以目标重构、内容更新、方法创新、评价协同为路径，实现敏捷核心理念与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等思政维度的深度融合。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提升了课程的时代性，增强了学生适应复杂环境、恪守职业伦理及勇于创新的能力。

关键词：课程思政；敏捷项目管理；预测型生命周期；四维融合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关键在于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深度融合[1]。“项目管理”作为兼具理论性与极强实践性的管理学科核心课程，其教学内容与方法需持续回应时代变革与产业需求。以 VUCA（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为特征的新商业环境，使得强调灵活、适应与协作的敏捷型项目管理方法论迅速成为主流，与传统预测型项目管理方式并列为两大核心范式。现有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多集中于传统项目管理框架，对敏捷范式所蕴含的丰富思政教育资源挖掘不足[2]。如何将敏捷项目管理的核心思想系统性地融入课程思政体系，使之与传统思政元素相辅相成，共同培育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一个亟待探索的教学改革新课题。本文旨在分享“项目管理”课程思政建设在此领域的创新性构建与实践经验。

一、敏捷范式兴起与课程思政的时代诉求

全球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项目管理实践场景。传统预测型项目管理适用于需求明确、环境稳定的项目，思政映射点多与“规划先行”“严守范围”“遵循流程”所体现的规矩意识、契约精神相关联[3]。面对创新研发、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等高度不确定性领域的项目，敏捷项目管理应运而生，它强调通过快速迭代、持续交付、拥抱变化和激发团队潜能来创造价值。这一范式的转变为课程思政建设带来了新的内涵与挑战。

（一）思政内涵的扩展

敏捷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个体与互动高于流程与工具、可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这四大价值观及十二原则，蕴含着对“人”的尊重、对“价值”的聚焦、对“变化”的拥抱[4]，这与创新精神、协作文化、客户至上、持续学习等现代职业素养紧密相连，极大地丰富了课程思政的内容谱系。

（二）育人目标的重构

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不仅需要具备严谨规范的“硬”技能，更需要具备灵活应变、协同创新、勇于试错的“软”实力。课程思政需要同步演进，在坚持传统美德教育的同时，加强对学生适应力、创新力和团队自驱力的培养。

（三）教学方法的革新

敏捷实践如 Scrum、看板管理等，强调实践、互动与反思，为体验式、沉浸式思政教育提供了绝佳的教学活动载体。

因此，将敏捷项目管理系统纳入课程思政体系，是课程保持先进性、实现思政教育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上接 220 页）

课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3, 14(21): 206−208.

[6] 曹哲 , 洪淑均 . 新时代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素养提升探究 [J]. 北京教育（高教）, 2024(09): 39−43.

（作者系云南工程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二、构建“四维融合”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体系

为全面响应时代对复合型管理人才的需求，并深度整合预测型与敏捷型项目管理的双轨知识体系，本课程构建了以“价值塑造、知识贯通、能力锻造、素养内化”为核心的“四维融合”育人目标体系[5]，旨在引导学生掌握专业方法论的同时，完成从专业技能到职业伦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升华，成为兼具坚定政治信仰、扎实专业功底、卓越实践能力与深厚人文素养的新时代建设者。

（一）价值塑造

本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恪守不渝的职业伦理。通过深入剖析重大国家工程中体现的预测型管理智慧，以及航天软件、数字产品快速迭代中运用的敏捷实践，引导学生理解项目管理方法论不仅是工具，更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进步的重要支撑，从而树立“科技报国、产业兴邦”的远大志向。在职业伦理层面，课程不仅强调预测型范式所蕴含的恪守契约、遵纪守法、精益求精与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更有机融入敏捷范式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看板公开实践培育“诚信透明”的品格，通过拥抱需求变化培育“积极应变”的进取意识，通过聚焦用户故事培育“价值导向”的责任心，以及通过团队自组织培育“尊重个体与集体赋能”的协作精神。传统与敏捷的伦理要求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学生稳健而富有弹性的职业道德基础。

（二）知识贯通

课程力求学生对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全面而辩证地把握。要求学生系统掌握预测型项目管理的五大过程组与十大知识领域，形成对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结构化、规范化管理的知识框架。同时，深刻理解敏捷项目管理的四大价值观、十二项原则以及 Scrum、看板等主流框架的核心实践，领会其应对不确定性、持续交付的内在逻辑。旨在引导学生能够基于项目特征、组织环境与干系人需求，辩证分析并灵活选择或融合适用方法论，形成“因地制宜、动态适配”的科学方法论选择观，这是知识内化为智慧的关键标志。

（三）能力锻造

课程设计强调传统方法与敏捷工具共融。一方面，夯实预测型管理所需的“硬技能”，如 WBS（工作分解结构）的严密构建、进度网络图的精准编制、EVM（挣值管理）的成本绩效管控能力。另一方面，强化敏捷项目管理所需的“软技能”与“硬实践”，包括用户故事撰写以捕捉价值、迭代规划会以聚焦目标、每日站会以促进透明沟通、回顾会议以引导持续改进、看板设计以优化工作流程等。着力培养学生高阶的“融合能力”，即在复杂现实项目中，能够审时度势，创造性融合预测型的计划控制与敏捷型的适应演进思维，设计并执行混合式管理策略，以应对多变的挑战。

（四）素养内化

学生底层思维模式与持久品格性情的养成，首要的是培育系统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使学生深刻理解项目管理中计划性与灵活性、规范与效率、风险与机遇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掌握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的智慧。其次，推动团队协作与领导力素养的演进，使学生经历从传统层级结构中明确分工、高效执行，到敏捷自组织团队中主动担当、协同共创的模式转换，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以服务团队、激发潜能为核心的服务型领导意识。最终，通过敏捷短周期迭代的实践，锤炼快速验证的行动力以及从挫折中迅速恢复与学习的抗逆能力，使其具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持续成长的核心心理韧性。

三、双轨驱动，“项目管理”课程思政内容的深度探索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专业课程需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育人元素与价值逻辑。“项目管理”方法论体系包含预测型与敏捷型两大范式。这两种范式在管理理念、流程与工具上各有侧重，映射出不同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为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入提供丰富而系统的载体。本部分将围绕这两条主线进行挖掘与映射，构建“双轨驱动”的育人框架，其具体映射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双轨驱动育人框架体系

知识模块	预测型项目管理思政映射点	敏捷型项目管理思政映射点
核心理念	规矩意识与系统规划：范围基准强调“言而有信”；关键路径法体现“谋定后动”	适应变化与价值导向：拥抱变化体现创新勇气与务实精神；持续交付价值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过程管理	流程管控与闭环思维：严格的阶段评审与变更控制，培养严谨作风与责任闭环意识	迭代演进与持续改进：通过 Sprint 回顾会议，培养自我反思、集体复盘、持续优化的进取精神
团队与沟通	角色清晰与层级协作：明确的 RACI 矩阵，培养组织纪律性与角色责任感	自组织与透明协作：“每日站会”促进信息透明与相互问责；团队自组织激发主人翁意识与集体智慧
质量与风险	预防为主与标准先行：质量计划与审计，强化“第一次就做对”的工匠精神。风险登记册培养忧患意识	内建质量与快速反馈：通过持续集成与测试，将质量意识融入每一刻工作；通过短迭代快速暴露风险，培养直面问题、及时纠偏的担当
干系人与价值	合同管理与需求管理：强调守信履约的法治精神与对既定需求的尊重	客户合作与价值验证：强调与客户 / 用户深度合作，培养同理心与价值共创意识；通过演示会获取反馈，体现开放谦逊的学习态度

本课程通过系统梳理与对比预测型与敏捷型项目管理的思政映射点，构建了层次丰富、对比鲜明的“双轨驱动”思政内容体系。该体系既紧密贴合学科知识结构，也深刻揭示了专业实践的价值内涵，并辩证统一于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育人目标。通过双轨并行

的教学探索，引导学生理解在不同情境中灵活融合两种思维，在规范与变化、效率与价值、个体与团队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四、课程思政的融合实施途径

为确保“思维融合”的育人目标切实落地，课程教学团队规划并实施了“目标重构、内容更新、方法创新、评价协同”的融合实施路径，将思政元素深度、有机地融入教学全过程。

（一）目标重构与大纲修订

新版课程教学大纲中，将“践行敏捷项目管理的价值观与原则”提升至与掌握传统项目管理知识同等重要的课程目标地位。在每一教学单元的“学习目标”下，设置“知识能力”与“思政素养”目标。在“项目规划”单元，除要求学生掌握 WBS 的编制方法外，还同步设定“理解严谨规划所体现的契约精神与系统思维，并探讨在何种情况下需为响应变化而调整计划”的思政素养目标。

（二）内容更新与资源建设

开发聚焦中国实践、体现方法论对比的系列案例库。例如，“从‘北斗’全球组网的长期精密计划与分步实施，到‘鸿蒙’操作系统面对生态挑战的快速迭代与持续交付”，诠释了不同方法论如何服务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同时，将《敏捷宣言》作为核心材料引入课堂，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学习，分析十二条原则的管理学意义，引导他们思考“个体与互动高于流程与工具”“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等价值观背后所蕴含的以人为本、诚信合作、注重实效的现代职业伦理与哲学思想。

（三）方法创新与混合式实践

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实践创新。实施“双轨案例教学”，同一项目要求学生分别遵循预测型和 Scrum 框架两种思路，完成从章程制定到收尾的全过程推演或关键决策分析。讨论两种路径下团队如何做出“范围变更”“成本超支应对”等决策时的伦理考量、沟通方式差异以及最终创造的价值形态，从而在对比中深化对“规矩”与“适应”辩证关系的理解。开展“敏捷模拟实践”，学生分组建立 Scrum 团队，在 4~6 周内经历 2~3 个短周期 Sprint（迭代冲刺），完成一个微型产品的迭代开发。通过亲身担任产品负责人（定义价值）、Scrum Master（移除障碍）或开发团队成员（协同交付），深刻体验“每日站会”的透明文化、“冲刺回顾会”的集体反思精神以及对变化的快速响应，使“诚信透明”“协作担当”等价值观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为准则[6]。组织“深度工作坊与反思讨论”，围绕“变革时代的守正与创新”“计划精准与响应迅速”等主题开展结构化辩论或引导式工作坊，鼓励学生跳出具体工具，深入探讨不同项目管理范式所植根的时代背景与价值预设，提升其价值判断与哲学思辨能力。

（四）评价协同与价值观观测

项目报告既评估项目范围说明书、进度计划表等最终交付物的完整性与规范性，也考查产品待办列表的演进记录、迭代回顾会议纪要以及燃尽图等过程性文档所反映的团队协作质量、问题响应速度与持续改进轨迹。在形成性评价中，将“团队协作中的主动贡献度”“面对需求变更的积极心态”“回顾会议中进行建设性批评与反思的深度”等指标，设计成量表融入同伴互评与教师课堂观察记录。这种评价方式不仅考核“做了什么”，更关注“以何种方式和态度去做”，从而将价值观的塑造过程纳入可视化的评价反馈循环，引导学生自觉调整行为，实现素养的内化。

五、结语

将敏捷项目管理范式融入课程思政建设，是“项目管理”教学应对时代变革、提升育人质量的战略性创新。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可能存在的静态化、程式化倾向，注入了动态适应、以人为本、价值驱动的鲜活内涵。通过构建双轨驱动的思政内容体系与实施路径，不仅构建了学生预测与敏捷的完备知识体系，更在价值观层面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培养了兼具规划严谨与应变灵活、恪守契约精神与深谙价值共创的复合型素养。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中华传统“变易”思想与敏捷哲学的理论融合，开发更具专业特色的行业案例，构建更为科学的长效价值观评价追踪机制，以持续优化课程思政的育人效能。

参考文献

[1] 王欢 . 同心协力共建共享深入学习《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 2022, 34(06): 133.

[2] 莫俊峰 .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与实施策略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22(19): 35−37.

[3] 姚佳人 . 敏捷项目管理方法与传统项目管理方法的比较研究 [J]. 机械工业标准化与质量 , 2023(12): 10−17.

[4]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BOK® Guide: Seventh Edition and The Standard for Project Management[M]. Newtown Square, Pennsylvani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2021.

[5] Kanabar V. Integrating Agil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Business Analysis Foundational Knowledge into a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J]. Computer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omputer Science, 2022: 233−244.

[6] 王春瑾 , 黄淑君 , 鹿洵 . 敏捷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软件项目管理模型研究 [J]. 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 , 2024, 42(02): 82−88.

（作者：马礼萍，西安欧亚学院讲师；方放，西安欧亚学院经济师）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在思政育人中的角色定位与能力提升

郑　妍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育人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辅导员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力量，其角色正从事务性执行者转向战略性育人主体。本文围绕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与能力提升展开论述，首先从全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全场域服务成长的引路人、全链条人才培养的助推者三个维度阐释其多维角色；进而剖析思想洞察力、价值引领力等核心能力构成；随后指出现实中存在的角色冲突、技术适应困境、协同机制不健全等挑战；最后从制度构建、专业培养、技术赋能、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系统性实践路径，以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专家化发展，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建设提供支撑。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思政育人；角色定位；能力提升

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育人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这既是源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与教育强国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对“三全育人”理念的全面推进与“大思政”格局的构建的积极回应。而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政育人的关键主体，其角色的定位也随时代发生着重要改变。2025 年 5 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高校辅导员队伍是和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同等重要的“第四支队伍”[1]。这一定位意味着辅导员角色从事务性执行者向战略性育人主体的转变，也对其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有必要围绕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与能力提升两大主线，融合政策导向、现实需求与学术研究的多维视角，提出辅导员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在思政育人中的多维角色定位

（一）全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

新时代的高校辅导员，是思政教育的主力军，其思政育人的模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和全面。首先，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思政教育工作基本覆盖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具有十分明显的连续性与系统性；其次，新时代辅导员的工作内容融合性较强，很多高校辅导员都会结合主题班会、谈心谈话、党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最后，从思政教育的方法维度来看，新时代各高校辅导员更重视采用生活化、情境化与情感化的教育方式，以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二）全场域服务成长的引路人

当下高校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基本覆盖学生在校的所有重要场域。一是从空间维度上进行全域延伸，在课堂、宿舍、校园、网络等多重场域展开思政教育工作，实现全方位渗透；二是在角色维度上实现“导师”化转型，辅导员不再仅仅是学生的思政工作管理者、服务者，而更多的是承担着“人生导师”的角色，注重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与精神陪伴，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支持，比如情感关怀、学业指导、人生规划等，来回应学生多样化的成长需求。

（三）全链条人才培养的助推者

从人才培养过程来看，高校辅导员的思政教育模式是更具系统性的，衔接性也更强。他们会在招生、培养、就业等多个环节中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而在功能维度上，高校辅导员又是一个资源整合者，他们应协同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多支队伍，推动形成多个主体的育人合力，赋能学生实现个性化与全面化发展。

二、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政育人能力的核心构成

（一）思想洞察力：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精准识别

长期以来，大部分高校辅导员在思政育人方面都比较依赖主观经验，这一习惯难以应对新时代学生思想多元化、隐蔽化的新特征[2]。而且，新时代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辅导员的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数据赋能的新路径。辅导员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学生思想动态的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

达到一人一策、一类一策的效果，助力思政教育质量的综合提升。

（二）价值引领力：从理论灌输到情感共鸣的价值塑造

当前高校思政育人的价值传播方式正在经历转型，辅导员不再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育人方式，而是主张“靶向滴灌”，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引导。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叙事感染、情境体验、情感互动等方式，增强价值引领的感染力。特别是基于网络空间的价值引领，辅导员会主动了解算法推荐、短视频传播等新媒介环境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影响，并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三、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能力提升的现实挑战

（一）角色冲突与身份认同困境

虽然已有不少高校辅导员意识到了新时代自身角色转型与能力提升的重要性，但是，双重身份带来的职责泛化也让他们倍感压力。特别是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会挤占思政教育时间，让辅导员对自身的育人角色及职务产生模糊之感。部分高校的辅导员职称评审、晋升机制与他们的工作实际脱节，辅导员职业发展通道不够通畅，容易影响到整个队伍发展的稳定性。加之当下辅导员在部分高校中的地位仍待进一步彰显，他们在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方面仍旧存在落差。

（二）技术适应与伦理风险并存

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教育工作者的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部分高校的数字素养相对不足，难以有效利用 AI、大数据等工具提升工作效率，技术适应能力不佳；在技术应用过程中隐含的数据隐私与算法歧视等伦理挑战，使如何在数据收集与分析中有效保障学生权益成为新课题，也使不少辅导员对于人机协同中的主导权问题产生困惑，不知道如何在合理使用技术工具的同时又保持育人专业性和主体性[3]。

（三）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健全

在许多高校，都存在部门壁垒导致资源分散的问题。学校的学工、教务、科研等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协同机制，影响了育人合力的形成。在家校社联动上，很多高校也没有建立长效机制，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多停留在事务层面，很难真正形成深度育人共同体。而在评价体系的设计上，许多高校考核偏重辅导员的事务完成度，而非思政引领的实际成效，让辅导员在思政教育方面缺乏动力。

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角色强化与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一）制度层面：构建“第四支队伍”的系统化支撑体系

1. 建立独立、贯通、等效的职业发展序列

高校应该积极推进辅导员独立职称评审体系的实质化落地，为辅导员设计与管理岗位并行的职级晋升双梯制，从多个维度完善辅导员的管理职务晋升通道，并确保其晋升速度与机会不低于同校管理干部平均水平。类似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专业技术职称，则应该与辅导员的管理职级之间互通互认，允许辅导员根据自身特长和意愿选择发展路径或适时转换。

各高校可结合学校的发展战略定位，设置“第四支队伍”发展专项资源包，并在年度预算中设立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专项经费，用以支持辅导员的培训、科研、表彰、工作室建设等。在办公条件、津贴补贴、评优评先名额等方面要做好动态调整，确保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与教学、科研等工作是实质等效的关系，而非象征性的倾斜。

2. 完善以育人实效为核心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高校需要推行基于辅导员队伍的发展性评价与贡献度评价相结合的模式，改革学校的年度考核办法，降低辅导员事务性工作完成度的权重，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增设思政引领成效、学生满意度、典型育人案例、协同育人贡献等核心指标。并同步引入学生评价、同行评议等多主体评价，增强评价客观性。

高校还可建立辅导员育人成就奖等专属荣誉体系，并在国家及省校级层面，设立针对辅导员的专项荣誉，譬如年度最美辅导员、思政工作创新奖、学生成长杰出贡献奖等，增强辅导员的职业尊荣感和社会能见度。

（二）培养层面：探索复合型专家的专业化成长路径

1. 纵向深耕：构建辅导员专属的学科与知识体系

为夯实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论根基，高校需要把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创新理论等纳入辅导员培训的必修课之中，为辅导员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论学习方案，增强辅导员的理论功底和政策解读能力。

同时，高校要积极推动高校学生事务与管理的学科化建设，支持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级学科下设立高校学生事务与管理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并设立硕士、博士学位点，为辅导员队伍培养高层次、研究型后备人才，同时为在职辅导员提供学历提升通道。

另外，学校要积极引导辅导员深入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关联学科的知识，要求并资助辅导员系统学习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学习科学、青年社会学等专业知识，鼓励辅导员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等专业资格证书，为学生在特定领域的成长提供专业指导。

2. 横向整合：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跨界能力

首先，高校要打造一个赋能型的辅导员思政教育专业共同体。如某高校实体化运行的高校辅导员发展中心，便配备了专职人员、固定场地和预算，用来制定校本化辅导员能力标准，设计和实施分层分类培训项目，组织职业技能竞赛与认证，管理辅导员工作室

和科研项目，开展职业咨询与发展规划等，全面提升辅导员专业能力[4]。

其次，可以实施辅导员知识跨界整合计划。为辅导员设计模块化的课程包，要求各学院的辅导员在管理学、传播学、法学、数据科学等领域完成一定学分的研修，掌握组织行为、项目管理、新媒体运营、舆情分析、高等教育法、学生权益保障、基础数据分析、智能技术应用等多学科知识。还有一些高校会定期组织辅导员参与案例研讨、情景模拟、行动研究工作坊活动，引导辅导员将跨学科知识应用于解决学生网络成瘾、生涯迷茫、群体关系等现实问题。

（三）技术层面：推进智能思政与有温度的人机协同

1. 建设“一站式”智慧思政工作平台

高校需优化辅导员思政教育工作的数据中台，打破学工、教务、后勤、图书馆、网络中心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在严格保护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为辅导员提供学生的全息数据画像，动态涵盖学业成绩、消费习惯、网络行为、第二课堂参与、心理健康测评等维度，让辅导员可以实时查看学生的学习状态。

在平台上，技术人员可以专门开发辅导员的虚拟AI助手，智能处理常见事务咨询、政策解答、流程指引等。该助手能做到7×24小时响应，将辅导员从重复性问答中解放出来。同时，技术人员需动态强化平台的分析与决策支持功能，为辅导员提供基于数据的群体分析报告，帮助其把握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学生发展规律，并做好思政干预工作的科学精准决策[5]。

2. 建立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与审查机制

为了避免出现技术应用伦理问题，高校需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教育数据伦理使用准则，严格界定学生数据收集的最小必要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划定数据使用的负面清单，规定数据存储的安全期限和销毁方式。对于那些用于学生评价、预警、资源分配的算法模型，应向辅导员和学生解释其基本原理和主要变量，并设立申诉渠道，防止因算法黑箱导致的不公平问题出现。

辅导员要始终明白，AI工具只是其工作的辅助，与学生之间的情感沟通，涉及特殊事件的价值判断，以及重大事项的复杂决策、创造性工作等，必须由辅导员亲自来完成。

（四）协同层面：深化“三全育人”共同体的系统构建

1. 构建校内“育人—教学—科研—管理”四维协同机制

学校要积极推进制度化工学协同机制的运行，建立一个由校领导牵头，学工部、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全育人工作联席会”制度，用以定期研判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并结合需求协调思政教育的资源配置，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堵点。

高校可尝试推行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的结对计划，即由辅导员定期向专业课教师提供所带班级的学情分析报告，让专业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兴趣点、困惑点有基本的了解，并基于自身的授课情况，参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研讨，将思想引领元素有机融入专业教学[6]。而辅导员也可以承担大学生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等部分公共必修课的教学任务，加深对学生学习状态的了解。

2. 拓展“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网络

在家校沟通方面，辅导员需要改变以问题为导向的临时沟通方案，转而以发展导向为重点，与家长进行常态化的互动。比如，某些高校辅导员利用信息化平台，定期向家长推送学生在校成长报告、校园文化动态、家庭教育指南；建立家长咨询委员会，邀请家长参与学校有关学生管理的决策咨询，让家长不再独立于学生的在校生活。

高校辅导员还需整合社会化育人资源，主动对接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共建实践育人基地、志愿服务项目、职业体验营，或引入杰出校友、劳动模范、行业精英等担任学生的业界导师，为学生打造一个常态化的“社会大课堂”资源库。

五、结语

新时代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正逐步迈向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辅导员角色转变和能力提升，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未来，各高校还需将辅导员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力量，助力其综合能力的持续提升，让辅导员在技术变革中保持育人初心，在制度创新中增进职业认同。

参考文献

[1] 陈勇，朱平．“第四支队伍”：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的战略定位与建设思路 [J]. 思想理论教育，2025(11): 98−104.

[2] 姚昌，冯建，蔺立杰．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提升的应然指向与实践路径 [J]. 思想教育研究，2025(08): 123−129.

[3] 陈晨，戴威．思政引领力赋能高校辅导员提升的价值、挑战和进路 [J]. 江苏高教，2025(11): 110−117.

[4] 张雯怡，王鑫，沈漫．增强高校辅导员思政引领力的三重向度 [J]. 思想理论教育，2025(02): 99−105.

[5] 邹泽沛，徐刚．“最美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形象与群体特征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24): 79−82.

[6] 张阳，翁伟斌．“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职能的泛化与回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 44(09): 51−55.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马博威

摘要：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由单一主体主导向多方协同发力转变。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施者和学生成长发展的直接引导者，在协同育人格局中处于关键位置。本文立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结合协同育人理念，从现实工作出发，分析高校辅导员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定位，重点探讨其在价值引导、组织衔接和过程融通中的实际功能，并在梳理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实效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

近年来，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协同育人逐渐从理念倡导转向具体实践。如何在多主体参与、多环节联动的育人格局中明确不同育人力量的职责边界和功能定位，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中亟须回应的问题。辅导员直接面向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协同育人体系当中，辅导员既关系到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也直接对育人实效的发挥产生影响[1]。从现有研究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探讨较为丰富，但结合辅导员日常工作实际对其在协同育人中的具体定位和功能展开系统分析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空间。基于此，本文在对协同育人相关背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对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中的定位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校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供参考。

一、协同育人的时代背景与辅导员角色基础

（一）协同育人提出的现实背景

随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不断深化，大学生成长环境和信息来源日益多元，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特征、实施场所和运行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大学生价值观形成过程更加开放、多元，思想引导面临的信息来源更加分散；另一方面，学生发展需求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个体差异，单一、封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单一依托课堂教学或个别部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已难以有效回应学生在价值认同、职业选择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强调多主体参与、多环节联动、全过程融入的协同育人理念，逐渐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2]。

（二）高校辅导员参与协同育人的角色基础

协同育人强调系统整合与整体推进，而高校辅导员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具有独特且稳定的工作位置。从工作内容看，辅导员不仅承担思想引领职责，还深度参与学生日常管理、成长指导和发展服务，能够持续、动态地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学习压力和现实困惑。从工作方式看，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频繁对接教学部门、职能部门及相关育人主体，在学生与学校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沟通协调作用。这就使辅导员能够在不同育人主体之间进行有效衔接，也决定了其在协同育人体系中具备不可替代的实践优势。

（三）医学类高校的现实要求

在医学类高校中，学生培养周期是比较长的，实践教学占比较高，专业学习与职业发展紧密相连，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职业伦理和责任意识培养始终贯穿其中，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停留在理论灌输层面，而应更加注重与专业教育和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辅导员在学生日常管理中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学生在学业适应、临床实践、职业认知等方面出现的思想、价值观等问题，然后以协同的方式引入专业教师、实践平台和育人项目等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具体学习以及实践情境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从而为协同育人的有效推进提供更加坚实的现实支撑。

二、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中的价值

（一）协同育人的稳定支点

在协同育人格局中，辅导员首先承担着价值引导的重要职责。与课堂教学中相对集中的理论阐释相比，辅导员的价值引导更多体现在日常教育管理和具体事务处

理中，具有情境性强、持续性高的特点。通过日常思想教育、谈心谈话和主题活动，辅导员将价值引领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具体情境之中，引导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发展选择和现实困惑的时候，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在协同育人过程中，这种基于日常互动的价值引导为多主体共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稳定的思想支点，辅导员能够将协同育人的总体目标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具体内容，长期、连续的引导可以有效弥补部分育人环节中价值引领的不足，使协同育人不至于停留在阶段性活动层面。

（二）多元育人主体之间的连接点

协同育人能否取得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育人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教学部门、职能部门以及各类实践平台，若衔接不畅容易出现育人目标分散、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承担着连接学生与教学部门、职能部门的重要角色。通过参与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教学组织和校园文化活动安排，辅导员能够将分散的育人资源进行整合，引导不同主体在育人目标和实施路径上形成协同[3]。同时，辅导员在与学生的日常接触中，能够第一时间对学生的现实需求和思想状况作出反馈，为相关部门调整育人方式提供参考，从而推动协同育人在具体项目和活动中落地实施。

（三）贯穿学生成长发展全程的关键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贯穿学生成长发展的全过程。协同育人强调全过程育人理念，这对育人主体之间的持续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辅导员在新生入学教育、专业学习引导、实践实习管理和就业指导等环节，始终与学生保持密切联系，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学生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4]。在这一过程中，辅导员通过对学生成长轨迹的持续关注而将不同阶段的育人资源进行有机衔接，使思想政治教育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保持相对连贯。这种过程融通作用对于推动协同育人由阶段性安排逐步转向常态化运行是大有裨益的，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能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辅导员在协同育人中的现实困境

在协同育人理念不断被强调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的实践逐步展开，但其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协同育人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这些问题既源于制度层面的安排，也与具体工作运行方式密切相关。

（一）角色定位认知需进一步明确

从实践情况看，部分高校在推进协同育人过程中，对辅导员角色定位的认识主要在宏观层面，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功能界定在具体工作中需要补足。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认为辅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事务性工作，这就没有体现出其在思想引领、育人统筹方面的专业价值[5]。一些协同育人项目虽然在文件层面强调辅导员参与，但在具体实施中，其职责多集中于组织、通知和执行环节，难以深度介入育人内容设计与过程建构，导致辅导员难以在协同育人整体运行中形成稳定、持续的专业影响力。

（二）事务性工作挤占育人投入

辅导员日常工作内容覆盖学生管理、评奖评优、心理危机干预、就业服务等多个方面，事务性任务占比较高。在此情况下，辅导员用于系统思考和参与协同育人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如果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通过协同机制深入推进，那么就有可能会被压缩为阶段性活动或应付性安排，影响协同育人的连续性和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辅导员在协同育人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形成稳定高效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进而影响育人目标的整体实现和育人成效的长期积累。

（三）协同机制运行顺畅度需进一步提升

协同育人强调多主体协作，在具体实践中，部门之间协同程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方面，不同部门在育人目标理解和工作重点上存在差异，这就需要统一的运行机制和沟通平台；另一方面，协同育人过程中责任划分需要足够明确，这样才能避免工作交叉或责任模糊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辅导员虽处于连接多方的重要位置，但亟须制度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协调作用。

（四）评价导向需更多样化

当前，对辅导员工作的评价整体上以事务完成情况和量化指标为主，在考核体系当中，需要加大投入力度使协同育人相关成效完全体现出来，进而促进辅导员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使其更倾向于完成可量化、可考核的任务，促进其对协同育人中需要长期投入、成效显现较慢的工作予以关注。评价机制与协同育人目标之间更好的衔接会更好地促进辅导员深入参与协同育人。

四、辅导员参与协同育人的改进方向

前文对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系统分析，表明有必要从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能力建设等层面，系统地推进改进工作。改进方向应当具有可实践性，立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行情况，避免空泛表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协同育人由理念倡导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转变。

（一）明晰功能定位，夯实辅导员参与协同育人的制度基础

在协同育人体系中，功能定位是否清晰会直接对辅导员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高校在推进协同育人相关工作时，应从制度层面对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职责边界进行明确界定，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将其简单地与事务执行者划上等号。通过协同育人整体方

案和相关制度文件明确辅导员在价值引领、过程融通和协同衔接中的具体职责，为其更深入地参与到课程思政建设、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当中提供制度依据。同时，应注重在制度设计中体现辅导员工作的专业属性，引导其更多参与到育人内容的协商与设计过程中。

（二）完善协同机制，提升多主体联动的运行效能

协同育人能否取得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因此高校应进一步健全跨部门协同育人机制，推动教学部门、职能部门与辅导员之间形成稳定、高效的沟通渠道。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定期召开协同育人工作协调会等方式促进不同育人主体在目标理解和行动路径等方面达成一致。在协同机制运行过程中，辅导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充分发挥出来，使辅导员在协同育人中不再只是被动参与相关工作，而是主动协同。

（三）优化工作结构，保障辅导员协同育人的时间与精力投入

辅导员事务性工作负担较重，是对其参与协同育人产生制约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推进协同育人的同时，应同步推进辅导员工作结构的优化。高校可通过完善信息化管理手段、优化流程设计等方式，减少重复性、程序性事务，为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释放必要空间。此外，应在工作安排和任务分配中，合理平衡事务管理与育人工作的比重，避免因短期事务压力挤占协同育人的长期投入。只有在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辅导员才能在协同育人中持续发挥应有作用。

（四）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辅导员协同育人的专业水平

辅导员参与协同育人，不仅需要制度和机制保障，也离不开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高校应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通过系统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辅导员在理论素养、协同沟通和实践指导等方面的能力水平。在能力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引导辅导员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具体工作场景相结合，提升其在复杂育人环境中开展协同工作的能力[6]。同时，通过经验交流和案例总结等方式，推动辅导员在协同育人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使协同育人真正融入学生成长发展的全过程。

五、结语

总体来看，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协同育人已成为提升育人质量和实效的重要路径。辅导员因其工作贴近学生实际、贯穿育人全过程的特性，在协同育人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科学认识并准确把握辅导员在协同育人中的功能定位，是推动协同育人由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协同育人背景、辅导员功能定位以及现实困境与改进方向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辅导员作用的充分发挥，既依赖于个人专业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制度环境和协同机制的有效支撑。只有在明确职责边界、完善运行机制、保障育人投入的基础上，辅导员才能在协同育人中实现由“被动参与”向“主动融入”的转变。未来，高校应进一步结合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持续探索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不断推动协同育人向常态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从而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王熙，栗俊田．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 [J]. 才智，2026(03): 138−140.

[2] 李景怡．全球胜任力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6, 42(01): 13−17.

[3] 季程．“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工作实效提升路径研究 [J]. 华章，2026(03): 108−110.

[4] 王柯，文爱爱，吴桐．新时代地方本科院校专职辅导员晋升机制优化研究 [N]. 重庆科技报，2026−01−09(04).

[5] 徐业山，芮雪．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N]. 大河美术报，2026−01−09(14).

[6] 罗俊，卢旭．加速时代高校辅导员话语适应：意义、挑战及对策 [J]. 高校辅导员学刊，2026, 18(01): 7−12, 95.

（作者单位：天津医科大学）

基于“校—开—社”联动的开放教育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鲁颖嘉

摘要：在国家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开放教育作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载体，其思政育人模式面临协同机制不足、资源整合乏力与社会参与度低等现实困境。本文聚焦“校—开—社”（即“高校—开放平台—社区”）三维主体在开放教育思政育人中的联动缺失问题，提出以系统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构建三维协同育人模型。研究表明，该模式通过制度化协作框架与数字化共享平台的搭建，能够有效扩大思政教育的覆盖面，增强渗透力与实效性，解决传统模式下教育资源分散、育人链条断裂的痛点，将开放教育的灵活性、社区实践的在地性与高校思政的理论性深度融合，为构建“大思政”格局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开放教育；思政育人；三维协同；“校—开—社”联动；模式创新

一、三维协同：“校—开—社”联动的理论基础

（一）“校—开—社”联动的内涵与特征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开放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构建“校—开—社”联动的开放教育思政育人新框架，即把原来的以一个主体为主导转变为多方主体共同育人。传统的思政教育大多局限在校园里，开放教育则利用技术手段打破时空界限，将学校的教育资源、开放教育平台的优质课程以及社会上丰富的教育资源三者有机融合起来。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整合把原来分散的育人要素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教育生态链，是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该模式结构多样化、功能互补，学校起着价值引领的作用，开放教育平台起到搭建虚实结合学习环境的作用，社会机构提供实践场景和资源。校、开、社三者以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为有机整体，提高育人的效果。与传统校企合作不同的是，该模式更加重视主体间的深度互嵌和价值共创。

从深层次分析，该创新机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既符合思政教育规律又适应开放教育的技术特点，运用慕课、虚拟仿真等工具使思政教育从单向传授转向网络化渗透，使得意识形态教育突破课堂边界形成了持续的培养闭环。

（二）三维协同的思政育人逻辑

1. 目标协同：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目标协同是“校—开—社”联动的逻辑起点，其核心在于从孤立育人转向集体价值创造。传统思政教育的目标常被简化为知识传授，而三维协同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下，重新定义了“全面发展”的内涵，把目标协同作为“校—开—社”联动的逻辑起点，其核心目标是要将单独的育人转向为集体育人的创造价值，将社会参与能力、终身学习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共同纳入目标体系，构建了集知识、能力与价值于一体的育人目标结构。

2. 资源协同：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

资源协同是构建“校—开—社”三方联动机制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核心目标在于打破以往教育资源由单一机构封闭式供给的局限，推动实现跨领域、跨系统的生态化共建与共享。在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下，教育资源往往局限于校本课程体系之内，内容与形式相对固定；而开放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则促使教育资源从传统的课程形态向更加丰富、立体、沉浸式的场景化形态升级。实践表明，社区红色场馆等实践教学基地所蕴含的现场体验与价值浸润功能，能够与开放大学数字平台所具有的广泛覆盖、高效传播的技术优势有机结合、相互补充。二者协同发力，共同形成一个持续更新、动态优化、良性互动的教育资源矩阵，从而提升整体教育资源的生命力与实效性。

3. 机制协同：构建长效运行体系

机制协同是推动“校—开—社”联动从初步设想到扎实落地并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支撑。其根本目的在于破解由于体制归属差异和多元利益需求所导致的“联动反应滞后、协作层次较浅、合作难以持久”等实际问题。从实践角度出发，如果能建立一套权责分明、运转高效、激励有力的制度体系，就能够逐步构建起联系更加紧密、运行更加稳定的常态化育人协作体系。

二、“校—开—社”联动的实践路径

（一）学校主导的思政育人创新

学校在“校—开—社”三者之间起到的是价值引领和内容提供的重要作用。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给各类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2]。同时《纲要》又提出，课程思政的建设要“针对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专业、不同的课程类型”，不断深入地去抓典型、树标杆、推经验，形成规模、形成范式、形成体系。这就需要课程思政建设有校本特色。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学校并没有按照本校的定位和特点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建设路径与措施没能充分展现校本特色[3]。实践证明，高校要主动根据开放教育平台的技术特点以及社区教育的要求，对思政课的课程目标、课程形式和课程内容进行系统地重新规划，形成“线上理论输入—线下实践转化—价值内化输出”完整的教学闭环。

师资队伍构成是三维协同落地的关键要素。《纲要》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要推动广大教师进一步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4]。教师若要有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必须主动理顺课程思政育人的价值向度，廓清育人动机和逻辑，明晰育人维度与旨归，以激发对学生的价值引领热情[5]。因此，构建“高校—开放平台—社区”三方参与的师资协同培养机制是重中之重。

学生参与度是衡量三维协同成效的关键指标。面对开放教育学习者工学矛盾突出、学习动机多元的特点就需要构建多元兼容的激励机制，以将学习者的外在参与转化为内在成长。例如，可以建立“学分银行”与“实践积分”互通机制，将学习者通过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或完成开放平台项目学习等方式获得的实践积分按照相应比例转化为同时学分，在此基础上形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学习的有效衔接。

（二）开放教育平台的技术赋能

在数智技术赋能下，开放教育生态系统正在经历持久性、动态性的演变。然而，关于其最终将演变成何种形态，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与模糊性[6]。开放教育平台正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构建起一个融合“需求感知—资源匹配—效果评估”的智慧学习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因此，开放教育应利用教育平台的特点，发挥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其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不断提升网络思政育人质量[7]。例如，某国家级开放大学平台开发了“思政资源智能推荐系统”，能够向制造业一线员工主动推送工匠精神系列微课，也为社区工作者智能匹配“基层治理现代化”主题案例，从而完成了从“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的关键转变。

传统在线思政课程存在灌输感强、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对此，开放教育平台开始引入 VR、AR 等技术来创设具有身临其境效果的学习情境。例如在学习长征精神时，使用 VR 设备就能亲身感受飞夺泸定桥的惊险场面，这种“情境沉浸—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教学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学习的代入感与感染力。

此外，技术赋能还延伸至对育人全过程的动态监测与科学评价。开放教育平台可以通过建立“思政素养数字画像”系统持续收集分析学生在理论掌握、价值认同与实践行为等方面的多维学习表现，并由此形成综合性过程评价报告。这一报告不仅描摹出个体的成长轨迹，更为三维协同育人机制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参照和决策依据。

（三）社区实践基地的资源转化

社区实践基地的核心作用，在于将社会场域中那些潜在、零散的资源，有效转化为结构化的实践教学内容。以“社区思政资源地图”为例，要绘制此地图就需要各地系统梳理辖区内的红色遗址、模范人物、文化场馆、企事业单位及社会治理项目，并基于此开发出系列化的实践主题与教学路线。例如，在北京某街道与开放大学的合作实践中，“社区议事厅”“养老驿站”与“垃圾分类中心”被设为固定教学点，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孝老爱亲”与“绿色发展”等主题，构建起“观察—体验—参与—反思”四阶递进的实践教学方案。

社区实践若要避免流于形式，需与正式教育体系深度融合，所以社区、高校以及开放平台需要携手合作把优质实践项目变成课程，明确学习目标、内容模块、考核标准等，并将其纳入开放教育学分体系。这一机制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学习者对实践环节的重视程度与完成质量，也能激励社区提供更具教育内涵的实践岗位，从而形成“以实践促认知，以认证促优质”的良性循环。

此外，社区实践基地并非只是资源的消耗方，还是新知识、新问题的产出方，若建立起顺畅的反馈渠道，就能让学习者在社区实践中的真实困惑、创新思考以及改进建议被系统地反馈给高校和开放教育平台。基于此，高校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调整理论研究方向，丰富教学案例库；而开放平台则可将其转化为在线讨论或微型课程，反哺线上教学，从而达成教育和社会、理论和实践相互滋养的生动局面。

三、“校—开—社”联动的成效评估与优化

（一）三维协同模式的实践成效

依靠开放教育平台数字化传播和社区实践基地在地化的渗透来形成三层联动、动态平衡的教学网络，可以使思政教育的覆盖范围更大。线上理论学习和线下实践内化两种方式一起使用，使思政教育深深地嵌

入学习者的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中，使教育过程由原来的只存在于课程时段变为现在渗透到成长全过程。此外，三维协同在打破育人壁垒、形成全域联动的育人合力等方面起到明显的效果。依靠智能匹配技术的思政育人云平台可以明显提高思政育人资源的获取与使用效率。从机制上来讲，制度化的协同架构创建既可以实现流程的有效精简，又可以提高跨部门合作的响应速度与执行力。学分互认、绩效互评等关键激励措施会增强高校、平台和社区的合作意愿，从而形成各方从被动配合到主动共建的制度模式。

（二）三维协同模式的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三维协同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明显效果的同时，也面临不少现实挑战。当前，优质教育资源在向数字化平台迁移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标准不统一、呈现形式固化等问题。为此，有必要推动资源建设向更精细化的方向转变，开展“颗粒度革命”，将各类教学资源拆分为更细小、更独立的知识单元，以方便平台进行智能化重组和精准推送。同时，应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情境化适配”，使其能够根据不同学习场景和个体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与匹配。

在跨组织协作方面，制度性成本较高已成为制约因素之一，具体表现为议事规则不够清晰、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探索引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治理模式。通过将各参与方的权利与责任编码嵌入共享平台，实现任务自动触发、资源有序流转、绩效客观评价以及激励公平分配的全流程自动化管理，从而构建更加透明、高效的合作运行机制。

此外，当前学习者的行为数据在高校、在线平台与社会实践社区三者之间尚未实现充分联通，导致难以全面、动态地构建“思政素养数字画像”。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严格遵守数据隐私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推动建立统一的“思政素养数据中台”。通过制定跨机构的数据标准与安全交换协议，整合分散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与发展数据，从而实现对学习者思政素养成长历程的连续、精准描绘。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旨在有针对性解决开放教育思政育人难题，构建并验证“校—开—社”三维协同的育人模式。该模式通过目标协同引领方向、资源协同夯实基础、机制协同提供保障等方式成功地将三方优势融为一体，形成了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联动全域的育人新生态。其实践成效证明“校—开—社”三维协同育人模式在扩大思政教育覆盖面、增强渗透力与实效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展望未来，三维协同模式的深化发展有赖于两大核心驱动力。一是技术驱动的范式革命。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协同育人将迈向以“数字孪生”为特征的沉浸式体验、以“智能合约”为保障的自动化治理和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精准化评估。二是治理驱动的体系重构。需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建立覆盖“校—开—社”三方的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制度，从根本上破除体制壁垒，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大思政”体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校—开—社”三维协同模式不仅是开放教育思政育人的路径创新，更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一次深刻重塑。它昭示着，未来的教育将愈发成为一个边界消融、主体多元、资源共享的开放性生态系统，而思政教育作为铸魂育人的核心工程，必将在这一生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袁健燕 . 开放教育沉浸式美育路径研究 [J]. 科教导刊 , 2025(18): 49−51.

[2] 祝智庭 , 朱晓悦 , 胡姣 , 等 . 数智技术赋能开放教育再开放 [J]. 开放教育研究 , 2024, 30(01): 16−23, 32.

[3] 焦丽 . 开放教育学习场域研究 [J]. 继续教育研究 , 2024(10): 102−106.

[4] 李雪 , 国兆亮 , 宋文杰 . 开放教育质量提升路径探究 [J]. 广西开放大学学报 , 2024, 35(01): 82−86.

[5] 何艳冰 .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探析 [J]. 中州大学学报 , 2025, 42(01): 104−108.

[6] 于玮 , 吴国强 . 以“红绿蓝 +N”思政育人为特色的省级课程思政示范校建设模式研究——以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科学咨询 , 2024(23): 217−220.

[7] 吴国君 .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育人价值向度的自我统整 [J]. 南方职业教育学刊 , 2024, 14(05): 47−55, 6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辽宁省现代远程教育学会研究项目“校开社协同联动的开放教育思政育人创新研究”（2025XH−43）。

（作者单位：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产业升级背景下高校学生岗位适配能力的培养路径

韩宏达

摘要：当前，全球产业正在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也在进行深度调整，对人才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只有具有高度岗位适配能力的人才，才能符合企业需求。基于此，本文对产业升级的内涵特质及其对人才能力要求的改变进行具体阐释，对当前高校培养学生岗位适配能力的主要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产业升级背景下高校学生岗位适配能力的有效培养路径，旨在为高校教师提供具有实践操作价值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产业升级；高校学生；岗位适配能力

产业革命不仅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更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就业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其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尤其是岗位适配能力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其教育质量与毕业生的岗位适配能力息息相关。然而，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仍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基于一线教师视角，对现实困境进行深刻剖析并提出有效突破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紧迫性。

一、产业升级的内涵特质及其对人才能力要求的改变

（一）产业升级的内涵特质

产业升级绝非局部调整，而是深度变革，其核心特质包括三点：（1）技术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已从传统独立的技术单元向驱动各行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赋能要素演变，并实现与制造业、服务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协同促进生产模式向智能化、柔性化方向变革，推动产品与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形态持续演进和迭代，催生了智能工厂、平台经济等全新组织形态。（2）价值重塑。产业竞争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从以成本控制为主导转变为以创新驱动和生态竞争为核心，价值创造向产业链高端环节如研发设计、品牌运营、解决方案提供等迁移，个性化定制需求与日俱增，全生命周期服务成为主流方向。（3）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由“双碳”目标引领，绿色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衡量产业价值与企业竞争力时，生态效益和社会责任成为重要考量标尺[1]。

（二）产业升级对人才能力要求的改变

产业内核的根本性改变促使人才能力发生根本性转变。（1）人才知识结构要求从“深度专精”向“复合交叉”转变。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复杂系统性问题的解决，要求人才具备“T 型”或“π 型”知识结构，既要有扎实的知识专业“深度”，也要有跨界知识的“广度”。（2）能力重心从“静态知识持有”升级为“动态能力生成”。在知识加速折旧的时代，人才的核心资产不再是已有知识存量，而是对新知识进行自主获取、甄别、整合与应用的能力，以及在陌生情境下运用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3）技能演进要求从“程序化操作”向“数字智能与协同”转变。在简单重复性劳动不断被人工智能系统覆盖的背景下，人才需要全面掌握、熟练应用数字工具，具备数字化思维，能与智能系统深度协作形成共生伙伴关系，共同完成决策、优化与创新等高阶任务。（4）职业属性从“固定岗位”向“动态生涯”转变。“终身制工作”“铁饭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职业路径的多元化、工作形态的灵活性以及发展轨迹的非线性成为新的职业属性，对人才的环境适应性、挫折耐受力及终身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

二、当前高校培养学生岗位适配能力的主要困境

（一）教学理念滞后

大部分教师错误地将“适配”等同于“短期就业”，将教学重点置于对当前岗位所需技能的培训，未充分认识到核心素养与可迁移能力在产业快速迭代背景下的战略意义。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将大量精力用于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与工具使用技巧，而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则相对弱化。这种“重术轻道”理念导致教学工作陷入“速成而难以持续”的困境，培

养出来的学生虽然能快速适应岗位需求，但因缺乏基本职业素养和持久竞争力的支撑而难以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课程体系脱节

高校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更新机制推进缓慢，未及时跟上产业发展演变的步伐，导致人才培养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具体表现为：课程大纲和教材内容陈旧，对行业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及行业前沿成果的融合与渗透不足；学科专业壁垒森严，未开展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开发与课程选择，严重限制了学生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致使其思维结构固化、能力局限，缺乏解决综合性、系统性产业问题的整合思维与跨界协作能力；在课程结构方面，普遍存在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互割裂的现象，缺乏一体化、系统性设计，降低了教育对产业需求的动态响应能力。

（三）教学模式单一

课堂教学模式仍处于“教师主导—教材本位—课堂封闭”的传统窠臼中。多数课堂均由“填鸭式”教学模式主宰，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课堂参与度和积极性明显不足。尽管翻转课堂、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等以学生为中心的先进教学理念被大力倡导，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是偶发尝试并流于形式，未实现常态化、深入化融合。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功能仅仅停留于对课件的展示和对资料的分享等浅表层面，未能科学融入教学流程，构建起智慧化学习课堂。教学模式的单一性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潜能，而且限制了对学生分析、评价、创造等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四）教学实践虚化

“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未能与理论教学有机衔接、协同支撑，二者往往各自为政，致使实践教学沦为形式化的教学流程或零散化的教学单元。校企合作中，“校热企冷”问题十分明显，合作深度和广度不足，学生实习多从事观摩性、边缘性工作，鲜有深度参与企业真实项目与核心业务流程的机会。“双师型”教师不仅数量匮乏，而且专业实践能力参差不齐，许多教师长期脱离一线，缺乏持续更新实践经验的渠道，导致其对实践教学的指导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严重背离，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难以有力支撑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的培养。

（五）教学评价偏颇

当前的教学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过于依赖终结性评价和知识再现型考核，评价标准单一、失衡，期末笔试成绩在总分中所占比重过大，已经成为评价学生学习成效的主导性甚至唯一标尺。相反，对于某些关键维度如学习过程参与度、实践项目完成质量、创新思维成果、团队协作表现及职业素养水平等的评价考核，则要么有所欠缺，要么比重极小，要么评价方式主观随意。这种“重视分数、轻视能力，重视结果、轻视过程”的评价体系，很容易将学生引入机械记忆和应付考试的“歧途”，不仅对其素养提升和能力建构极为不利，而且也无法为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反馈参考。

三、产业升级背景下高校学生岗位适配能力的有效培养路径

（一）重塑教学理念

高校教师需要率先实现自己的理念变革，摆脱“短期适配”“技能速成”等功利化教学思维的束缚，转而确立以学生终身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性适配观”。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的最终目标并非锻造适应特定岗位的“工具人”，而是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变化、迎接困难挑战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完整的人”。因此，在教学中需树立和施行“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三位一体理念[3]。具体而言，在专业课程设计中，应将价值元素如工程伦理、商业伦理、工匠精神、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与可持续发展观等与知识体系和能力训练有机融合。例如，在工程技术课程设计中，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困境与社会影响的深刻剖析，从“知识、技能、价值”三个方面实现教学理念的落地：（1）知识传授，让学生掌握算法设计的核心原理；（2）能力培养，培养学生利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技术风险评估；（3）价值塑造，筑牢“科技向善”的职业价值观根基。

（二）重构课程体系

高校教师应积极推动课程改革并付诸实践。（1）建立“课程内容动态更新机制”。通过深入企业调研、定期参与行业培训、与技术专家开展对话等途径，吸收产业技术标准、前沿动态和真实案例，并将其转化为系统化的教学资源，对陈旧知识进行剔除和更换，保障课程内容和产业发展的同步性。（2）打破学科专业壁垒。积极进行跨院系师资协作，联合开发设计跨学科课程、微专业或课程模块。比如，机械、设计、计算机专业联合开设“智能产品系统设计”，数据科学和商科联手设计“商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旨在有效培养学生运用系统思维解决综合性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跨界整合能力。（3）促进“课、岗、赛、证、创”“五位一体”融通。即依托“需求侧输入驱动培养侧输出”教育理念，以岗位能力需求（岗）为驱动，以学科技能竞赛（赛）为指引，以行业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证）为纽带，以真实创新创业项目（创）为场域，对课程（课）目标、内容、考核方式等进行逆向设计。这构成了一个从产业需求出发，最终回归能力认证的育人闭环，使课程学习始终与真实挑战对标，兼具实用价值与前瞻眼光[4]。

（三）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是实现知识向能力转化的核心纽带。这就要求教师完成自身角色转型：从传统的“知识灌输者”，跃迁为学习过程的系统性“设计者”，以及学生

学习潜能的“激活者”与“赋能者”。为实现这一转型，教师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方法改革：（1）大力推行项目式教学法与问题式教学法。根据产业实际需求设计开放性、高难度项目或复杂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团队协作方式参与“界定问题、搜集信息、设计方案、验证模型、展示成果”的实践流程，在解决任务的过程中，全面提升知识运用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及创新创造能力。（2）深度融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利用 SPOC 等智能教学平台传授基础知识并进行线上自测，提高线下课堂时间利用率，在线下课堂开展小组合作、深度探究、个性化指导及高阶思维训练，实现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变。（3）创造性整合虚拟仿真与情境模拟教学。依托虚拟现实、仿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创设安全可控，高仿真的生产、实验及管理场景，支持学生在模拟情境中进行反复操练、故障诊断、决策制定等，有效提升其对复杂、高风险情境的临时应变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四）教学实践深化

实践教学应从传统认知实习向创新实践转化。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发挥战略引领和成长赋能的作用。（1）建立“引企入教”机制。打破校企表层合作的瓶颈，建立企业技术骨干深度介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制度，通过双导师共建课程体系、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协同授课、联合指导毕业设计、设计企业创新项目等措施，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即“校企双导师”制，提高教学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与匹配度。（2）坚守“真题真做”原则。通过与企业合作获取其技术痛点、对接科研项目攻关需求、梳理其社会服务现实问题，并将其转化为能够整合多学科知识、模拟真实产业情境的高阶实践项目。通过真题化课程设计、项目化毕业设计或实战化创新创业项目，使学生在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中不断锤炼技能。（3）构建“虚实融合”的实践平台。在建立和完善校内实体实验室和校外实习基地等传统物理场域的基础上，结合自主性开发与系统性引入，构建高保真虚拟仿真实验与智能化在线实践平台，有效打破时空壁垒，突破安全与成本限制，拓宽实践教学覆盖广度，加深实践教学沉浸深度。（4）提高教师“经验迁移”能力。鼓励教师以挂职锻炼、课题合作、技术咨询等方式深入企业内部，将企业最新的技术成果、实践案例等融入自身的知识库与技能库，并转化为鲜活的教学内容[5]。

（五）教学评价转型

评价是导向仪，其作用应从“成绩考核”向“发展促进”转变。教师应对多元化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并注意以下几点。（1）评价内容丰富化。显著降低期末笔试成绩所占比重，大幅提高能够反映学生综合能力的内容（如作品设计、实验报告、口头表达、项目成果等）比重。（2）评价方法多元化。秉持以过程性评价为主的原则，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如项目答辩、研究报告、模拟演练、学习档案袋等。（3）评价过程动态化与反馈及时性。将生成性评价与教学关键阶段有机融合，实现准确、即时反馈，促使学生发现自身不足并调整学习策略，实现“评价、反馈、优化”的循环。（4）评价主体多元化。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在其中纳入行业专家、企业导师、同学以及学生自身等，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并实现“学术、行业、社会”评价的有效对接。

四、结语

在产业升级的时代浪潮下，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适配能力不仅关乎其个人发展，更与国家竞争力紧密关联。因此，推进深层次、全方位的改革，以培养学生岗位适配能力便成为各大高校既艰巨又繁复的任务。高校教师作为改革执行者，唯有转变观念、提升能力，方能更好地履行育人使命，培养出更多既能立足当下创造价值，又能开创未来引领变革的卓越人才，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丁建华，侯婷婷．产教融合视角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探究 [J]. 四川劳动保障，2025(09): 98−99.

[2] 李曾辉．岗位能力导向的模块化教学实施路径 [J]. 知识窗（教师版），2025(04): 12−15.

[3] 刘琴芝，许金凤．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提升路径分析 [J]. 2023(11): 400−402.

[4] 李红．高职电商专业岗位实习的职业适应能力分析 [J]. 新潮电子，2025(04): 232−234.

[5] 马永霞，张雪，施翰．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双顾客”满意度评价研究 [J]. 教育与经济，2019, 35(03): 11−19.

（作者单位：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焦点解决技术在高校困难学生谈心谈话中的应用策略

董冠平 陈晓蕾

摘要：谈心谈话作为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对帮扶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辅导员在开展谈心谈话工作时面临时效性不足、专业技能欠缺等多重困境。焦点解决技术作为一种短程高效、强调个体赋能的心理助人方法，与高校谈心谈话工作的需求高度契合。本文通过剖析学业困难、经济困难、心理困难三类学生的心理特征，并结合焦点解决技术分类构建针对性的谈心谈话策略，为提升高校困难学生谈心谈话工作的有效性、针对性提供实践策略参考。

关键词：高校困难学生；谈心谈话；焦点解决技术；分类构建策略

一、焦点解决技术与谈心谈话的适配性

（一）谈心谈话的现实困境

谈心谈话是高校辅导员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职责的核心途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要求，辅导员应经常性开展谈心谈话，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1]。但实践中，这一工作面临四重突出困境。

1. 学生存在认知偏差

部分学生对谈心谈话存在误解，担心给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造成麻烦，会产生较强的防备心理，例如经济困难学生担忧隐私泄露。这会直接影响谈心谈话效果。

2. 时效性不足

新生适应期、家庭变故时、毕业季等关键节点都是开展针对性谈心谈话的好时机，效果会事半功倍，但部分辅导员没有提前部署的意识，或者因为工作繁忙将该项工作推迟开展。

3. 专业知识与经验欠缺

谈心谈话涉及心理学、教育学、沟通学等多学科知识。许多辅导员缺乏相关学科背景与系统培训，尤其是新任辅导员难以有效开展谈心谈话；部分辅导员在谈话中难以把握边界，影响沟通效果。

4. 辅导员精力分散

辅导员承担日常管理、思想教育、行政事务等多重职责，难以对每个困难学生保持持续关注。目前多数辅导员仍停留在事后救火模式，缺乏常态化谈话意识。

（二）焦点解决技术的应用价值

焦点解决技术作为一种目标导向、资源取向的短程心理干预方法，为摆脱上述困境提供了有效工具。其核心特征在于聚焦解决方案而非问题成因，通过挖掘个体已有优势与外部资源，促进其自我改变[2]。

该技术具有三大显著优势：一是短程高效，通常一至两次谈话即可产生效果，契合辅导员时间有限的工作现实；二是操作简便，例外问句、应对问句、量尺问句、奇迹问句、赞美技术等核心方法易于掌握，结构化流程降低了操作门槛；三是赋能导向，将学生视为解决自身问题的专家，通过发现并利用其内外资源，最终实现助人自助[3]。

以上三大优势说明焦点解决技术与谈心谈话工作具有高度适配性。

二、困难学生的心理特征与需求

高校困难学生主要面临学业、经济、心理三类困境，不同困境下其心理特征和需求各异，部分学生还可能面临多重困难叠加的复杂情况。

（一）学业困难学生

学业困难学生指无明显智力与身体障碍，但出现学业预警的学生群体。其心理特征表现为：认知上，自我效能感偏低，缺乏反思意识；情绪上，情绪波动较大，自控能力较弱；意志上，学习动机不足，缺少学习兴趣；行为上，表现为逃避学习、抵触思考。

该类学生的核心需求包括：增强学习信心、树立目标意识、改进学习方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二）经济困难学生

经济困难学生指家庭难以负担其在校期间基本开支的学生群体。其心理特征表现为：认知上，自我评价偏低，同时又很在意他人眼光，自尊与自卑并存；情绪上，易产生内疚、抑郁等负面情绪，或伴随长期焦虑；行为上，遇到问题倾向逃避或消极处理，主动

求助意愿较低。

该类学生的核心需求在于：建立自信、获取资源支持、提升问题解决能力。与其交流需特别注意去除贫困标签，维护其自尊。

（三）心理困难学生

心理困难学生指因适应不良、存在心理障碍等因素导致心理状态失衡的学生群体。其心理特征表现为：认知上，易陷入习得性无助，不信任他人，自我怀疑；情绪上，易沉溺于消极情绪，可能出现极端情绪；意志上，耐挫力较差，易失控；行为上，社会功能受损，学习或生活能力下降。

该类学生的核心需求在于：情感支持、情绪调节、心理韧性培养、社会功能恢复。与前两类学生相比，该类学生的谈话策略需将生命安全置于首位，建立信任关系优先于具体问题的解决。

三、谈心谈话策略

基于焦点解决技术，结合三类困难学生的心理特征与核心需求，构建三种谈心谈话策略。

（一）针对学业困难学生的目标—行动导向策略

1. 正向开场

针对学业困难学生自我效能感低、情绪调节能力差的特点，首要任务是缓解学习压力。

先运用共情技术传递理解，如“最近成绩下滑让你感到焦虑，这说明你对自己有较高期望”。再通过一般化技术降低其自卑感，如“大多数同学在升入大学后在学习中会遇到学业困难，大一初期的适应不良是普遍现象”。

2. 问题澄清

本阶段核心在于帮助学生明确学习困难的具体成因，明确目标。

引导学生深度思考以下问题：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如何影响学业的？哪些问题是可以改变的？要注意避免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努力程度，而是从学习方法、时间安排、兴趣爱好等多维度分析成因。运用奇迹问句构建愿景。如“假设所有困难都已解决，你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考试成绩会是什么样子？”根据学生描绘的理想状态推导具体可行的目标。

3. 资源挖掘

在明确问题本质后，重点在于挖掘学生潜在优势，扭转其消极自我评价的认知偏差[4]。

运用例外问句回忆成功经验。如“你曾在某门课程取得较好成绩，当时使用了什么方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有助于其树立能够成功的信念，使其愿意进行积极尝试。运用应对问句发掘内在动力，激发学生发现自身深层的动力来源。如“尽管面临学业压力，你依然坚持学习，支撑你做到这一点的力量是什么？”

4. 行动实践

将学习目标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单元，通过具体任务的完成逐步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强化学习动机，培养自控能力，促进其行为发生持续性改变。如将每天学习英语分解为每日背诵 20 个单词、每两天完成一篇阅读理解练习。任务难度需适中，避免因过难而产生压力。并引导学生记录每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让其直观看到行动对问题解决的作用。

5. 鼓励改变

对结果进行量化评估，巩固积极成效。

后续运用量尺问句评估改变程度，如“用 1~10 分衡量当前学习状态，你会打几分？第一次谈话时是几分？你做了什么让分数发生了改变？”引导学生认识到进步源于积极改变。对其积极的行为要进行鼓励，但要避免空泛表扬，如“本学期你坚持每日到校并学习一小时，真的很棒”。

（二）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源—赋能导向策略

1. 关系建立

经济困难学生较关注隐私问题，故保密是谈心谈话成功的前提。

明确告知保密原则，如“本次谈话内容严格保密，仅用于资助工作开展，不会公开”。这样的言语可以消除学生顾虑，打消抵触情绪。运用一般化技术改变其自卑认知：“每年都有很多同学因生活费、学费问题感到困扰，这在大学里是挺常见的现象。”

2. 目标探索

帮助学生摆脱困境思维，开始关注积极改变，设立切实可行的目标。

运用奇迹问句启发学生思考愿景，如“假设今晚发生奇迹，能让你摆脱当前经济困境，那明天会有何不同？”根据学生描述的愿景，助其探寻目标，激发其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将愿景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目标，例如将减少经济负担具体化为本学期通过校内外勤工俭学活动赚取至少 2000 元。鼓励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调整目标，避免“一刀切”。

3. 资源整合

经济困难学生往往忽视自身已有优势与可获取的外部资源，本阶段重点在于提升其资源整合能力。

运用例外问句寻找过往成功经验，如“家庭出现变故后，你是否有过成功应对经济困难的时期？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是如何做到的？”唤起学生解决问题的意识。

运用应对问句挖掘自身资源，如“遇到经济困难时，你采取过哪些办法？哪些办法产生了较好效果？”使学生认识到自己并非只能被动承受，而是有能力主动运用内外部资源解决问题。

同时引导学生积极了解并利用外部资源。“你对学校资助政策了解多少？是否有意向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减轻经济负担？”

4. 计划行动

将目标转化为阶梯式行动计划，通过阶段性成功积累提升学生自信心。

运用量尺问句评估信心水平，如“用 1~10 分衡量你完成申请勤工助学岗位这一目标的信心，你会打几分？是什么让你打出这个分数？如何将分数提高 1~2 分？”根据信心水平制定阶梯式计划。例如第一周收集学校奖助政策与岗位信息；第二周准备申请材料并提交；第三周学习兼职所需技能；第四周参与面试或上岗工作。让学生记录具体过程，用于复盘分析，让其直观看到自身进步。

5. 巩固成效

对学生积极的行为进行准确的正向反馈，巩固积极改变。

需使用具体的语言予以肯定，如“本周你主动了解勤工助学岗位信息并准备申请材料，这体现了你的积极态度与行动力。”若学生的实践未成功，需帮助其分析原因，调整目标或提升相关技能，避免因挫折导致放弃。

（三）针对心理困难学生的安全—支持导向策略

该类学生的谈话策略需遵循特殊原则：将生命安全置于首位，建立信任关系优先于问题解决。

1. 安全建立

营造安全舒适的对话环境是有效沟通的基础。辅导员要用温和的语气、专注的目光、开放的姿态传递理解与支持。

先运用共情技术拉近距离，如“面对人际冲突，你可能感到无助，不知如何处理，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应避免使用评价性语言如“你太敏感了”，对学生的感受给予无条件情感接纳，为其消极情绪提供释放空间。

明确告知保密原则。“本次谈话内容保密，除非涉及个人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才会突破保密原则。”对有自伤倾向的学生，在表示理解的同时，引导其认识生命价值与自身独特性，并及时转介至专业机构。

2. 情绪接纳

心理困难学生往往缺乏处理消极情绪的能力，需要提供安全的心理表达空间 [5]。

运用一般化技术缓解消极感受，如“刚进入大学时，许多同学都会遇到适应困难，产生孤独不安的情绪，这是常见现象”。引导学生消除孤独感。探寻过往成功应对情绪的经验，如“当愤怒、悲伤或失望出现时，这些情绪如何影响你的身体和行为？以前运用过哪些方法让自己好受一些呢？”同时教一些简单情绪调节技巧，如深呼吸、听音乐等，帮助学生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3. 目标构建

此阶段需帮助学生从消极情绪中抽离出来，构想未来的积极愿景。

运用奇迹问句引导愿景构建，如“如果一夜之间所有困扰都不存在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你会如何度过这一天？人际关系会有哪些积极变化？”引导学生回应清晰具体，避免模糊空泛。例如，学生表示“想主动跟同学打招呼”，则需进一步引导：“主动打招呼时你会有怎样的心情？对方可能会有什么反应？”促进深层的自我反思，看到改变的可能性。

随后运用量尺问句找到最小可改变的目标，避免因目标过高而产生挫折感。例如，“用 1~10 分评估你的社交能力，理想分数范围是多少？当前分数是多少？提升 1 分可以做什么？”

4. 能量激发

心理困难学生容易过度聚焦自身困境而忽视外部支持，本阶段重点在于调动其能力，让其认识到自身优势与外部支持。

运用例外问句缓解无助感，如“请回忆你曾经情绪平和且对未来感到乐观的时候，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如何做到的？”运用应对问句识别支持资源，如“感到心理压力时，你采取了哪些缓解措施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过程中是否有家人、朋友或老师给过你帮助？”引导学生察觉身边的支持力量，逐步建立对他人的信任。

5. 强化行动

通过持续的正向反馈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运用赞美技术肯定积极转变，如“你想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这说明你有改变的意愿和勇气”。提高目标行为出现频率，增强自我认同。建立多元外在支持系统至关重要，需联合家庭、学校心理中心、医院等校内外资源建立帮扶机制，使学生感受到外界关爱，逐渐信任更多人 [6]。后续对学生要持续关注，一旦发现危机征兆，立即启动针对性干预。

四、未来展望

焦点解决技术在高校困难学生谈心谈话中的应用仍有广阔探索空间，未来可在以下方面深化。

拓展困难类型。高校学生不仅面临学业、经济、心理三类困难，还包括就业困难、适应困难等多种困难，并有很多学生面临多重困难叠加的情况。需针对更多类型学生制定相应谈话策略。

建立长期跟踪机制。焦点解决技术擅长短期干预，但对困难学生的长期干预效果尚缺乏深入研究。未来可建立系统追踪体系，综合评估不同策略的持续效果与适用边界。

未来的研究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丰富焦点解决技术在困难学生谈心谈话中的具体策略，形成较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更好地发挥该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郝强燕 . 心理咨询——提升辅导员（下转 239 页）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的路径研究

潘柳虹

摘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下，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引领青年大学生思想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对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的重要价值，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大学生勇毅前行高举旗帜、指引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等。高校应充分发挥当前发扬斗争精神面临的战略引领、历史经验与文明建设三重机遇，从激发主体自觉、创新载体形式、汲取历史力量三个方面，不断引领大学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着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斗争精神；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成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新时代大学生是否能够发扬斗争精神进而不懈努力拼搏，不仅影响着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也因为大学生自身的特殊身份与使命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一、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的价值剖析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同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而是必须与各种风险挑战作斗争。这些风险挑战在短期内不会消失，而将以较强的持续状态贯穿在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解决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忧外患，需要我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斗争规律，发扬斗争精神迎难而上，以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应对激烈的国内外斗争，尤其需要作为接班人和未来建设者的青年一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二）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学生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中，最根本的一个经验在于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铸就与涵养斗争精神宝贵品质。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使命，新时代青年同样应具备面向未来发展的志向和追求，把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作为重要的精神支撑和方法论指导，为顺利融

（上接 238 页）

谈心谈话成效的新视野 [J]. 公关世界 , 2026(02): 26−28.

[2] 叶嘉瑶 . 焦点解决 : 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的实效性提升路径 [J]. 南腔北调 , 2025(21): 46−49.

[3] 王晓宁 , 李厚仪 . 焦点解决技术在辅导员谈心谈话中的应用 [J]. 吉林化工学院学报 , 2024, 41(12): 34−38.

[4] 侯亭妃 . 焦点解决技术下高校贫困生心理帮扶实践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3, 22(19): 249−250.

[5] 王禹 . 增强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谈心谈话的实效性研究 [D]. 成都 : 西华大学 , 2023.

[6] 刘东平 . 焦点解决技术应用于高校辅导员精准帮扶学业困难学生的探索实践 [J]. 教育现代化 , 2019, 6(65): 99−100, 11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政专项）“基于冰山模型的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胜任力提升研究”（L22BSZ032）。

（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心理发展与健康管理中心）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斗争实践树立鲜明的精神旗帜。一方面，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其根本要求在于从人民立场出发，不断思考解决在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这也是检验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是否获得提升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斗争精神是鼓舞广大青年大学生坚定斗争意志、保持斗争信心、鼓足斗争勇气，做好长期斗争的有力精神武器。

（三）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制胜之道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说明，人只有通过不断发挥体力和智力的潜能，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奉献社会，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青年大学生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尤其需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目前，我国正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新时代大学生需要凝聚责任意识、锤炼担当意志。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有助于新时代大学生保持昂扬斗志，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以奉献国家、服务社会的方式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二、发扬斗争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面临良好机遇

（一）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三个不同层面对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了重要论述，开篇即强调的“三个务必”中就包括“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明肯定了“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的重大意义。这是党中央统筹我国发展和安全现实需要得出的科学论断，回应了我们应该如何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历史进程的深刻总结。“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走向。”[2]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大学生更应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做到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不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二）中国青年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大学生发扬斗争精神提供实践范式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抗争史，中国青年的斗争活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义无反顾地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前列，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青年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在科技进步、农业发展和能源开发等各领域为巩固新政权作出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奋力拼搏，以科学技术为新动力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新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中国青年赓续斗争精神优良传统，在国家重大课题、创新创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等关键领域贡献青春力量。历代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展一次次英勇不屈的斗争活动，给新时代大学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扬斗争精神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范式。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大学生发扬斗争精神创设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新时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环节，从为实现美好生活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社会氛围维度激发和提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气神，为广大青年大学生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而不懈斗争，为进一步涵养大学生斗争精神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沃土。其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形成了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为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同频共振、同向同行的强大正效应。其三，高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坚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开展斗争精神教育，有利于青年大学生充分感受新时代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火热实践。

三、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的路径探析

（一）在实践过程中达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主体自觉

大学生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主体自觉，主要是指大学生群体能够发自内心认同、理解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必要性，主动积极地以斗争精神为支撑参与到各项实质性学习工作当中。首先，青年大学生要有斗争的勇气和胆魄。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各种矛盾，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斗争，只有坚决斗争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清除障碍。因此，青年大学生在态势严峻的时代斗争形势下以敢于斗争、英勇无畏的精神投身到斗争实践之中，以彻底的斗争实践促进矛盾的解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热情澎湃的青春力量。其次，青年大学生要提升斗争的智慧。在现阶段，面对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体、与特定条件下存在的敌我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斗争尤其具有深刻的复杂性，“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尚缺社会实践历练的青年大学生需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复杂多样的斗争形态中分清斗争的性质，优化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斗争效果最大化。再次，青年大学生要涵养斗争的毅力和信念。“新时代开展的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过程。”需要青年大学生深刻认识百年大变局中斗争的长期性，形成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韧劲，面对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不沮丧、面对失败不放弃，持续同各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力量和因素作斗争，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并最终夺取胜利。

（二）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由中国人民发扬伟大斗争精神谱写的壮丽史诗，是我们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根本缘由。要让青年大学生领略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迎难而上，与自然作斗争，开疆拓土、开垦良田、治理江河；与命运作斗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深刻质疑，以坚决的斗争精神反对权贵和皇权；与邪恶和黑暗作斗争，屈原以身投江报国，于谦“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与贪官污吏终生斗争。可以说，斗争精神融汇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成为鲜明的民族品质。要让青年大学生领略到，正是这种绝不言败的斗争品质，中国人民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奋起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实践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要让青年大学生领略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完成了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任务，迈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让青年大学生领略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状况，中国人民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际行动与贫困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4]。尤其要让青年大学生领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有一批又一批人接续斗争，不断加入脱贫攻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斗争实践中，因而中国人民能够在2020年底前摆脱绝对贫困，踏上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征程。

（三）依托丰富载体提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勇气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5]引领大学生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样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将斗争精神内涵更好地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方面。首先，要激发传统载体新活力。在具体实践中，用好理论课程、专题讲座和红色资源等传统教育载体，以思政理论课堂为基础，以专题讲座为导向，以红色资源为依托，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斗争理念，增强对新时代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一重大原则的根本认同，筑牢大学生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思想基础。其次，要发挥新媒体正能量。智能手机、移动网络和信息媒介的迅速发展，为大学生适应新时代发展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同时也为各类信息舆论集散提供了场所，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高校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勇于抢占新媒体信息舆论主阵地，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既要有在新媒体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又要认清新媒体网络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升大学生在新媒体领域斗争的智慧和本领。最后，要推动实践载体多形式。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发动青年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专项活动，使其自觉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主动投身暑期“三下乡”活动、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研究、公益劳动和环保活动、社会服务等，不断在学习斗争和生活斗争的实践中经受锻炼，推动大学生勇于在实践中锤炼意志，敢于在实践中砥砺品质，善于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砥柱。

四、结语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实践在新时代高校教育中尤为重要，教育青年大学生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是推进高质量高校教育的基本条件。斗争精神作为新征程上鼓舞大学生奋勇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正以丰富的鲜活样态促进大学生以蓬勃活力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中。高校应当促进大学生准确把握发扬斗争精神的精髓要义，把发扬斗争精神同个人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各项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青春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 2022-10-26(01).

[2] 时昱 . 从百年党史看中国青年的使命担当 [J]. 群众 , 2021(20): 34-35.

[3] 毛泽东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

[4] 骆郁廷 , 余焰琳 . 论新时代斗争精神的弘扬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3(09): 1-5.

[5] 习近平 . 之江新语 [M].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问题研究”（2025SHKX12）。

（作者单位：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力与幸福感研究

雷一祎 杨 韩*

摘要：本研究深入揭示了高校青年学生干部群体中“能力提升—幸福体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路径与预测机制，进一步验证了“胜任者更幸福”这一核心假设。其内在作用机制在于，高胜任力的学生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更容易获得成就感、掌控感以及来自同伴与教师的积极反馈，这些关键心理资源的不断积累，有效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满意度，从而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并形成持续强化的良性循环。该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学生干部心理发展机制的理解，也为高校在学生干部的选拔机制优化、差异化培养策略设计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完善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关键词：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力；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心理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衡量民生改善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将“让人们生活幸福”提升至“国之大者”的战略高度。这一政策导向既凸显了“幸福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青年群体心理健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学生作为“时代新人”的核心力量，其对幸福的认知、体验与创造能力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体身心健康发展，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整体幸福感的提升质量。其中，高校学生干部作为学校教育管理工作在学生群体中的“桥梁纽带”，既是正式学生组织中领导与管理工作的承担者，也是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组织者、协调者与执行者，其在学业发展、社会实践与价值引领中发挥着典范作用，使其幸福感水平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更对整个学生群体具有辐射带动效应。因此，聚焦高校学生干部群体的幸福感研究，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精准化的重要课题。

一、胜任力与幸福感的概念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幸福感研究的核心维度，被定义为“评价者依据自身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主观感受”，具有主观性、整体性与相对稳定性特征，具体涵盖总体生活满意感、领域生活满意感、正向情绪体验及低频率负面情绪体验四个层面[1]。当前国内外学界已围绕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开展大量研究，内容涉及社会支持、学业压力、人格特质等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多以“大学生群体”为整体分析单位，缺乏对“高校学生干部”这一特殊子集的聚焦。事实上，高校学生干部需同时承担学业任务与工作职责，在时间分配、角色认知与压力应对等方面与普通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生活事件特殊性，使其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可能呈现独特规律。已有研究证实，幸福感对个体工作绩效具有直接与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且高校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群体。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深入解答“为何学生干部幸福感更高”这一核心问题，尤其缺乏对学生干部自身能力特质与幸福感关系的系统性探讨，这一研究缺口为本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

胜任力（Competency）概念自 McClelland（1973）提出以来，已成为能力研究领域的核心框架，其核心内涵是“能够区分某一工作领域中卓越成就者与普通者的深层次个人特征”，具体包括动机、特质、价值观、领域知识、认知技能等可测量的绩效关联要素。与社会支持、工作自主性等外部工作资源不同，胜任力属于个体内在能力资源，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体完成工作任务时所展现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平。这一概念为解析学生干部“双重身份”下的能力特质提供了理论工具——学生干部在组织活动、协调关系、执行任务等工作中展现的胜任力，可能成为影响其幸福感的关键内在变量[2]。

二、现状分析和研究结果

从理论基础来看，现有研究已为“胜任力与幸福感”的关联提供了双重支撑：一方面，Warr（1990）

的职业幸福感模型指出，工作中的积极体验、工作热情与问题解决能力可以正向预测幸福感，而胜任力正是个体实现问题解决、获得积极体验的核心能力基础；另一方面，Deci & Ryan（2000）的基本心理需求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BPNT）将“胜任需要”（competence need）列为人类三大基本心理需求之一，明确“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是个体健康发展的前提”——当个体的胜任需求得到满足时，其心理状态将向积极方向发展，反之则可能出现消极情绪或功能障碍[3]。在实证研究层面，已有成果初步证实了两者的关联：Vansteenkiste 等发现个体胜任力可显著预测中国海外学生的幸福感、主观活力与抑郁症状；针对高校群体的研究显示，心理委员的胜任力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可通过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产生间接影响，高职院校心理委员也可通过提升胜任力与自我效能感增强幸福感；此外，Steven Sek-yum Ngai（2023）针对非就业青年的研究表明，职业能力提升可显著促进社会幸福感。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针对高校学生干部群体的研究匮乏，多数研究聚焦普通大学生或特定学生干部子集（如心理委员），缺乏对整体学生干部群体胜任力与幸福感关系的探讨；其二，现有研究多关注胜任力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如是否存在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探讨不足；其三，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干部的工作内容、角色定位与能力需求已发生显著变化（如数字化工作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提升），但现有研究尚未结合这些新特征开展分析[4]。基于此，本研究以新时代高校学生干部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胜任力与幸福感的关系及作用机制，为高校学生干部培养与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选取 30 个省（区、市）本专科高校的 2006 名学生干部为被试，其年龄在 17~28 岁，平均年龄 19.98 岁；其中本科生 1423 人、专科生 583 人，男性 739 人、女性 1267 人。

研究采用两类标准化量表开展调研：一是修订版《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特征调查问卷》，含 29 题 4 个维度（个性特征、人际管理、工作管理、自我管理），采用 1~5 点计分，量表重测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4、KMO=0.982，信效度良好；二是《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版）》，共 18 题 6 个因子，涵盖健康担心、精力、生活满足感等维度，量表重测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5、KMO=0.949，可有效衡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所有调研数据均通过 SPSS29.0 等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5]。

（二）学生干部胜任力的现状

从学生干部胜任力的描述性统计可知，研究对象在《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特征调查问卷》中的平均分为 112.63 分（标准差 19.70），该问卷满分 145 分、理论均值 87 分，本研究得分较均值高出 29.46%，说明多数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以性别、学历、年级、干部层级、学科门类为分组变量，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学生干部胜任力的人口统计学差异。结果显示：一是性别维度，男性在胜任力各维度及总分上均显著高于女性（$p<0.01$）；二是学历维度，专科干部各维度及总分胜任力显著优于本科（$p<0.01$）；三是年级维度，本科一年级干部整体胜任力最高，其在“个性特征”“工作管理”“自我管理”维度及总分上差异显著（$p<0.05$），但“人际管理”维度无显著差异，且年级对专科干部各维度胜任力影响不明显；四是干部层级维度，院级干部各维度及总分胜任力显著领先（$p<0.05$）；五是学科门类维度，工学类干部各维度及总分胜任力表现最优（$p<0.01$）。

（三）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显示：研究对象在《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版）》（GWB）中的平均分为 85.10 分，标准差为 13.65。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反之，主观幸福感得分越低，其主观幸福感越弱。

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一是性别维度，男性在主观幸福感各因子及总分上均显著高于女性（$p<0.01$），其中男性得分 88.87 分，女性 82.91 分；二是学历维度，专科干部各因子及总分幸福感均显著高于本科（$p<0.01$）；三是年级维度，本科一年级干部幸福感最高，其在除“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外的各因子及总分上差异显著（$p<0.01$），但年级对专科干部各因子幸福感无显著影响[6]；四是干部层级维度，院级干部在“精力”“生活满足与兴趣”等 4 个因子及总分上差异显著（$p<0.05$），幸福感最高，仅“健康担心”“焦虑”因子无显著差异；五是学科门类维度，农学类干部各因子及总分幸福感最强，文学、历史学类相对较低，且各维度差异均显著（$p<0.01$）。

（四）学生干部胜任力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之间的关系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检验学生干部胜任力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间的相关性，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胜任力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这表明，个体胜任力得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得分就越高。

（五）学生干部胜任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学生干部胜任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是，仅仅分析两两相关并不能够解释学生干部胜任力、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故本调查以学生干部胜任力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考察学生干部胜任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7]。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胜任力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 45.7% 的变异量（$\beta=0.68$，

p<0.01），表明学生干部胜任力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提升学生干部的胜任力能够增强其主观幸福感体验。

为进一步揭示胜任力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化预测效应，本研究以主观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将胜任力的个性特征、人际管理、工作管理、自我管理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管理维度（β=0.32，p<0.001）和自我管理维度（β=0.28，p<0.001）依次进入回归方程，共同解释主观幸福感总分 51.2% 的变异量（调整 R^2=0.508），其中工作管理维度的预测贡献最为突出。这一结果表明，学生干部在任务规划、资源协调、目标达成等工作管理能力上的精进，以及在时间分配、情绪调节、压力应对等自我管理能力上的提升，是驱动其主观幸福感增强的核心能力支撑。

三、结论

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区间，且存在显著的人口统计学分异特征。数据显示，该群体胜任力总分均值高于理论均值，整体能力水平良好，但内部呈现明显结构性差异：男性干部胜任力显著高于女性；专科层次干部优于本科层次；本科一年级干部胜任力位居首位，且随年级递增呈逐步下降态势；院级学生干部胜任力显著高于校级与班级干部；工学类干部在 13 个学科门类中胜任力表现最为突出。上述差异表明，学生干部胜任力的培育与发展受个体属性、组织环境层级及专业教育背景的综合作用，其背后映射出不同群体在角色认知、实践历练机会与能力塑造路径上的分野，同时印证了组织层级实践的复杂程度与学科专业的理性思维特质，对干部能力体系建构具有显著的增益效应。

高校青年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与人口统计学特征存在紧密的关联性。该群体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值达 85.10 分，显著高于全国大学生常模标准。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干部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女性；专科干部幸福感水平高于本科干部；本科一年级干部幸福感最强，四年级干部相对最弱；院级干部幸福感显著优于校级与班级干部；农学类干部在各学科门类中幸福感表现最优，文学、历史学类干部则处于相对偏低区间。这一结果揭示了学生干部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异质性，其差异成因与干部角色压力、成长阶段特征及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密切关联。

高校青年学生干部胜任力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强正相关关系，且胜任力对主观幸福感具备显著正向预测效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胜任力四大维度（个性特征、人际管理、工作管理、自我管理）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与兴趣等）均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学生干部胜任力总分可解释其主观幸福感 45.7% 的变异量，凸显胜任力是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正向预测变量。高胜任力的学生干部更易在履职过程中收获成就感与掌控感，能够将工作挑战转化为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资本，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绪体验，形成“能力提升→资源积累→幸福增益”的良性循环机制。

开放式调查结果显示，以“帮助他人”“团队协作”“技能提升”为核心特征的工作任务，以及以“他人认可”“任务成效”为核心导向的评价反馈，可显著增强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体验。该结论从实践维度补充了胜任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机制，同时提示工作内容设计与评价体系构建，是衔接干部能力特质与情感体验的关键中介变量。

参考文献

[1] Diener E D.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03): 542-575.

[2] Mcclelland D C.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intelligence”[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 28(01): 1-14.

[3] Warr P B. The measurement of well-be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mental health[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1990, 63: 193-210.

[4] 王敬群，王逸虹，王青华．胜任力对高校心理委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53(05): 121-126.

[5] 陈梦．高职院校心理委员胜任力、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探究——以广州市从化区高职院校为例 [J].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2): 48-51, 77.

[6] 国锐，叶星，梁社红．辅导员心理助人胜任力与工作要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5(06): 89-91.

[7] 申正付，韩布新，杨秀木，等．全科医生胜任力和主观幸福感：工作绩效的中介作用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9, 17(02): 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心理健康教育专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耦合研究”（2024ZJY619）。

（作者：雷一祎，广西财经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讲师；通信作者杨韩，广西财经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助教）

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石英鑫

摘要：残障学生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其和谐人格的塑造不仅是个人健康成长的关键，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一个拥有和谐人格、积极心态的残障学生，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并为社会发展注入多元力量。当前，残障学生的和谐人格塑造受经济条件、政策影响、文化素养、个人需要四个影响因素制约。因此，应采取系统性措施，一是加大残障学生的经济补助；二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残障学生的保障；三是构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互助，四是正确满足残障学生的多方面需求，最终实现残障学生和谐人格的发展。

关键词：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影响因素；对策研究

人格“是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性格等内在特征的总和，也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综合反映，是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1]。残障学生由于身体器官功能的障碍，使得他们在心理上或多或少会产生心理困扰障碍。这种障碍产生的困扰会使得残障学生在学习和社交方面产生消极态度和退缩行为，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不良的行为。因此，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是教育中不可忽视的目标，和谐人格的塑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描述了和谐社会下人格发展的前景。

一、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是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充分因素

家庭经济状况会直接影响残障学生的身心发展以及和谐人格的塑造。马克思提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这一论述表明了物质条件对人格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和地区发展差异，很多残障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十分贫困。一方面，残障学生不仅需要父母在生活照顾和学业辅导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种持续性的照护工作往往导致父母无法外出务工，造成家庭收入水平偏低。另一方面，家庭还要承担学生康复治疗、特殊教育的费用，经济压力巨大。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由于文化水平、职业技能、地理因素等原因，家庭的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外出务工也较为困难。除了在经济条件，残障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易受到偏见与排挤。残障学生不仅面临着社会的压力、经济负担，以及各方面非正式的歧视，承受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残障学生和家庭的压力和情绪很难得到有效宣泄，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康的发展，容易使残障学生形成自卑、固执、依赖等不良习性，进而影响和谐人格的培育发展。

（二）政策影响是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关键因素

政策支持为残障学生提供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切实保障了残障学生受教育的合法权利。国家和政府通过明确制度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保障法》等，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有资格接收残障学生的学校和机构拒绝接收残障学生，严禁因残疾而剥夺残障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逐步扭转了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教育歧视的偏见，而且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措施将教育平等落实到教育实践中。同时，国家财政的倾斜与相应的专项补助缓解了残障学生的经济压力，残障学生可以通过国家补助与自身努力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当获得与健全人同等的教育时，残障学生的人格发展中的自主性、自尊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构建和谐人生。在其他领域也为帮助残障学生融入社会贡献力量。融合教育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在与同学的交流对话、交往互动以及价值引领下形成团结友善的人格品质，在教育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医疗保障方面，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让残障学生平等享有医疗保障，保障残障学生的生命

健康权。在此基础上，残障学生能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获得战胜困难的好心态，将行动的力量内化为精神动力，为人的自我塑造、自身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新的条件。

（三）文化素养是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重要因素

文化知识为残障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奠定了根基。文化知识作为文化素养的重要内容，包括自然学科知识与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等。自然学科知识通过推理观察训练残障学生使用其他感官感知世界。人文社会学科知识通过对历史的具体认识，感受文化作品的情感内涵，让残障学生了解人类情感的普适性与多样性。自然学科知识与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两种知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有助于构建完整的认知体系，避免零碎知识认知带来的失衡。这种跨越学科对文化素养的培养，从知识的传授转向全方位的素养提升发展，有益于学生认识、情感、意志等方面全面发展。

思想道德修养作为文化素质最基本的内容，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世界观的形成要在教育中不断接受文化的熏陶、提升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引导其对人生进行深入思考。世界观是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根本观点，人生观是对做人的基本态度的根本看法，价值观则是做人应具有的价值判断标准。残障学生既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熏陶，又受到人工智能时代多种价值观的冲击，这使得他们在价值观的形成中不断面临多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价值选择更加多样化、自由化。因此，残障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应坚持循循善诱、辩证施教，既要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也要树立普遍的道德原则；帮助学生鉴别真伪、明辨是非，在不断思考、辨别中走向成熟，逐步吸纳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对世界观、价值观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三观的塑造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帮助残障学生成长为品德高尚的人。

（四）个人需要是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核心因素

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3]，人立足于现实社会，是完整、立体、现实的主体。人格的形成与完善本质上是人在社会交往中不断互动的产物。残障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的特殊存在，受制于生理机能的客观限制，又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网络之中。生理需求的满足是和谐人格塑造的物质基础。残障学生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当基本生存条件无法得到保障时，残障学生容易陷入对经济匮乏的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这种不安情绪会影响其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对未来的期望值。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给，使其摆脱生存危机的压迫，为更高层次的人格发展奠定基础；安全需求的实现是和谐人格塑造的重要保障。安全需求包含对物理环境与心理环境的双重需要。对于残障学生而言，物理环境的保障体现为无障碍设施的普及、医疗康复服务的可及性，心理环境则涉及社会排斥的消解与心理安全感的建构。当安全需求通过差别化措施弥补残障学生与健全人群之间的先天差异时，残障学生能够生活在有保障的环境中，其心理防御机制会逐渐弱化，会主动寻求与外界交流，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心态。

归属与爱的需求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核心维度，是和谐人格塑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化纽带。人际交往为残障学生搭建了接触多元世界的桥梁。通过与同伴、师长、社会人士的沟通交流，他们能够突破身体或环境带来的局限，接触到更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完善人格奠定扎实的认知基础；在集体环境中，通过他人的反馈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逐步建立客观的自我认知，克服可能存在的自卑、自我封闭等心理障碍，推动逐步构建起具有社会适应性的和谐人格。

自我实现需求作为需求层次的最高阶段，体现着残障学生人格发展的最终指向。这一阶段的达成需要个体突破生理局限的桎梏，在有限的生命可能性中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这种创造既可以是职业技能的掌握与创新，也可以是艺术才能的展现与精神境界的升华。通过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以及社会参与等多元路径，帮助残障学生发掘自身潜能，使其在社会贡献中获得成就感与意义感，是其实现人格和谐的必由之路。

二、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的对策研究

（一）加大残疾人救济资金和教育资金的投入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作用在特殊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首先，基层政府应该及时了解残疾人家庭的困难和需求，将新政策传达给农村残疾人家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帮助残疾人家庭减少必要开支。其次，在教育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残疾人教育的投入力度。不仅要加大对特殊教育学校经费、设施、环境等资源的投入，也要重点帮扶生活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残障学生家庭。采取多种间接投入减轻残障学生家庭的教育负担，让残障学生可以更好地接受教育。最后，除关注残疾人家庭的基本劳动收支外，应充分考虑残疾人家庭的特殊性。通过政策的适度倾斜，建立健全残疾人专项补助和普惠性补助相结合的机制，帮助残疾人家庭改善生活条

件，保证残障学生的基本需求，为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残障学生的保障机制

政府作为主导力量，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助力残障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塑造和谐人格。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教育、医疗领域有资质的特殊教育机构的扶持力度，提升特殊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帮助更多残障学生能够接受基础教育和康复教育。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社会宣传等多种手段转变社会对残障学生的固有印象和偏见，让社会能够更加关注残障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社区要充分发挥基层作用，积极开展各类助残扶残活动，带动残障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活动，与同伴交流互动，避免产生自卑、懦弱等不良情绪；在农村地区，应重点关心残障学生的家庭问题。在经济、教育、医疗方面为残障学生家庭提供必要帮助，关注残障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为残障学生创造更优越的成长环境，助力其塑造和谐人格。

（三）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协同互助，培养残障学生和谐人格

残障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离不开学校教育的引领。课程教学是培养残障学生和谐人格的主要途径。首先，教师要有意识、有计划地挖掘书本中蕴含的人格教育内容，将学科知识与先进思想、科学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注重对残障学生和谐人格的塑造和培养。其次，在价值观教育中，既要通过课堂讲解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论，也要将教育融入残联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强化价值观教育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引导，帮助残障学生逐渐摆脱片面看待问题的习惯，学会用更全面、积极的视角认识社会，从而真正理解和接受主流价值观，建立起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家庭教育是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最早期的教育形式，父母的人格和行为会影响子女后天的人格发展。因此，通过学校参观、家长咨询会等方式，促进家长与学校的有效沟通，全面了解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现状，提升家长的思想道德修养，引导家长配合学校在家庭中开展人格教育，共同为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朝着更和谐、更美好的方向前进。

（四）正确对待残障学生的多方面需求

恩格斯明确提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5] 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生产活动，不仅能培养生活和职业技能，还能在实践中促进其心理、情感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残障学生和正常学生一起参与劳动，在共同劳动中激发残障学生的交流积极性，让其在真实的劳动中体验合作、责任与自我价值，找寻对于职业的期待感和认同感，从而逐步建立积极的人格特质。劳动成果的创造和分享过程，会激发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减少对自身缺陷的持续关注。通过持续的劳动实践，残障学生不仅能掌握生活技能，更能在过程中培养独立意识、责任感和同理心，最终实现人格的全面完善与社会融入的可能。

学生应该学会对自身进行客观的评价和评估，正确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客观联系，促进自身的不断发展，实现自身价值。残障学生相较于普通学生失去了部分感知能力，但在其他方面具有超越普通学生的能力。例如，视障的学生在听觉、触觉方面更加敏锐，听障的学生在记忆力、观察力方面超过普通人，要发挥好自己的长处，与周围的同龄人互帮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在校园和社会中消除偏见与歧视，维护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校园中，教师作为学生的榜样，应该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密切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情绪变化，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在社会中应保障学生应有的各项权利，使其感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助力残障学生人格发展，最终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结语

残障学生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因此，残障学生和谐人格塑造是教育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目标，需要从多维度、多因素出发，帮助残障学生积极融入社会。当残障学生具备完备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时，不仅能在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还能为社会注入更多元的活力，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建平 . 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人格 [J]. 江海学刊 , 2005(06): 49−5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67−68.

[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0: 45−4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3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50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融合视域下大学生对残疾学生态度及干预研究"（2024C77）。

（作者系长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站式”学生社区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析

史亚萍

摘要：当前大学生因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网络媒介等多元因素影响，心理健康问题频发，对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而“一站式”学生社区承载着资源整合共享、增强师生互动、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生活服务与育人功能，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本文在分析“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内涵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功能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结合目前“一站式”学生社区和心理健康教育共识与队伍协同不足、活动与在地融合不深、需求与个体结合不精的建设现状，进一步丰富“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进路。

关键词：“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析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与意义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和价值

“一站式”学生社区，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功能的实践场所，也是日常教育管理的中心地带。新时代以来，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化、精细化、具体化，我国逐步探索科学、系统、综合性的学生服务实践模式。2019 年，教育部首次遴选 10 所高校率先试点，初步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思政要求、贴近学生生活的生活园区[1]。截至 2024 年，全国已实现“一站式”学生社区在适建高校中的全面覆盖，全国所有普通高校共同参与“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通过全部覆盖、示范引领、省级推进、培训督导等方式，大力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作为育人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载体，“一站式”学生社区关注学生的生活、服务学生的成长、培养学生成才，既能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又能增进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还能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支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和功能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也是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重要环节。当前，00 后大学生受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网络媒介等因素的影响，极易产生消极的不良情绪，导致出现学习动力缺失、对未来的期待值下降等情况，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更为复杂的教育过程[2]。观照社会现实，回望教育改革，心理健康教育一直作为高校德育和管理工作的内在组成部分，呈现出本土化、科学化和整合化趋势，工作价值由问题治疗向预防发展，工作模式从经验层次转向科学层次，工作体系从单一教育走向多元服务发展。高校通过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等多元举措，积极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功能，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直接影响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和价值观的正向塑造；另一方面，间接影响大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与专业技能的培养。

二、“一站式”学生社区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逻辑

（一）机制契合：“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对心理健康教育有保障作用

“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明确要求将心理健康纳入社区建设整体规划，推动管理、服务、思政力量等入驻社区，建立联合工作机制，组建多元协同团队，着力解决学生成长发展中的问题，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努力成才。这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规划、协同育人理念、实践导向原则、发展性目标高度契合。一方面，社区整合辅导员、专业教师、后勤服务人员及学生骨干等多方力量，形成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另一方面，通过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社区日常管理体系，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从临时性、分散化向系统性、制度化转变，增强教育工作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二）资源协同：“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对心理健康教育有预防作用

“一站式”学生社区是筑牢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心理健康预防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空间、数字、活动等多维资源的支持，当前学生群体共性突

出，呈现出价值观多元、需求多样、黏性较弱等特征，“一站式”学生社区对于物理空间的弱化使得社交有效“距离”缩短，为心育资源的融合与利用提供了现实路径。通过将积极心理元素融入社区文化环境、借助智能平台实现心理状态动态监测，能够使预防工作更自然地嵌入学生的生活现场。

（三）价值一致：“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对心理健康教育有浸润作用

“一站式”学生社区中“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建设原则与心理健康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一致。“一站式”学生社区通过营造包容、支持、温暖的社区文化与和谐、安全、稳定的环境氛围，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浸润式的实施场域与情感基础。心理健康教育则通过普及心理知识、倡导积极心态、提升情绪素养，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二者深度融合，在潜移默化中构建彼此关怀的社区共同体，塑造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三、“一站式”学生社区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心理健康教育共识和队伍协同有待强化

“一站式”学生社区能够真正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功能，前提是校内校外多元主体在学生心育工作识别、预防和发展等方面形成高度共识，并在社区场域内实现高效协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但在实践层面，一方面，“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队伍对心理健康工作认识不深，下沉机制不畅通，社区内的辅导员、宿管员、专业教师等育人主体，多将心理健康工作等同于心理问题或危机的解决，忽视了心育工作的发展性、预防性功能；另一方面，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动性不足，仍停留在发现问题就通知辅导员的层面上，与其他工作模块和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不强[3]。

（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在地融合有待提质

在“一站式”学生社区语境中，在地性具体体现为依托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社交的真实空间，结合社区特有的资源、文化、人际关系等元素，让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扎根于学生的实际生活场景，实现教育与生活的有机融合。但当前心理健康活动与社区的融合有待提高，一是在活动内容方面，与社区生活场景的关联性较弱，对不同生活空间的开发利用不足，未根据学生社区生活的阶段性特征调整心理健康活动的重点，从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关系协调、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活动实效。二是在活动形式方面，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不丰富，仍停留在理论宣讲或讲座等传统形式，未能激活空间的教育潜力，可以充分利用硬件设施和软件的完善，丰富学生生活，减少矛盾和心理问题。三是在文化氛围方面，与社区文化的契合度不高，心理健康宣传氛围不足，教育效果难以落地。

（三）学生心理健康需求和个体结合有待优化

据调查，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满足学生个性化心理健康需求是提升教育实效的关键，这需要精准把握不同学生的心理特质、成长背景和现实困扰，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与服务。但当前学生心理健康需求与个体结合的紧密性不足，没有考虑到不同群体学生的心理需求，导致学生的参与度和接纳度不高。一是在需求识别方面，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欠缺，多采用标准化、统一化的测试量表，难以区分压力源、情绪诱因等个性化因素。二是在服务供给方面，未充分利用社区在地优势，根据学生生活轨迹提供多样化支持，导致服务与个体需求错位，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和服务的实效性较低。三是在动态追踪方面，对服务效果缺乏动态跟踪评估，对个体的需求回应难以持续深化。

（四）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和技术应用有待深化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监测也由于技术问题、场地限制等种种原因，无法达到学生的理想要求。首先，在数据收集方面，数据整合度低。学生在心理、学业、消费等方面的数据和资料分散于独立系统，无法进行统一整合分析，导致心理画像和早期预警难以实现。其次，在技术应用方面，手段方法单一。表现在心理健康服务仍以线下预约为主，缺乏在线咨询、自助干预等线上功能的应用，导致服务便捷性不足，学生的主动求助和隐私性无法保证。最后，在预防干预方面，数据驱动干预决策呈现出滞后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心理危机事件处理和干预多依赖于事后报告和被动响应，而非数据驱动的主动预警，对于潜在风险群体的识别不够敏锐[4]。

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提升路径

（一）凝聚育人共识，构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新格局

在心理健康教育的传统模式下，心理服务主要由辅导员与心理中心的教师承担，形成单一的固化格局，而班主任、专业教师、后勤人员等社区关键主体因缺乏角色认同与能力支撑，导致在社区内的心理服务存在识别不准确、响应不及时等问题。随着“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深度建设，需构建“多元协同、分层负责”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新格局。一是组建跨主体协作团队，整合班主任、辅导员、专业教师、后勤服务人员等校内力量，同时吸纳学生骨干、校友志愿者及社会专业资源，形成“专业引领 + 全员参与”的队伍体系。二是建立分层能力培养机制，解决队伍能力不足的难题，基于角色的职责维度和能力基础维度，设计差异化、场景化的培训内容与形式，夯实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基础，真正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区日常场景。三

是完善激励与考核制度，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社区人员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对表现突出者给予绩效奖励与评优倾斜；同时引入学生评价机制，将学生评价结果与考核等级挂钩，激励队伍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质量。

（二）深耕社区场域，打造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新模式

教育活动的成效取决于是否与场域内个体的生活场景、需求特征相契合，而“一站式”学生社区内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社区活动中心的标准化空间，形式单一且脱离社区生活实际，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导致学生参与率不足。一是构建分层分类活动体系，面向新生，通过文体活动促进其环境适应与归属感建立。面向高年级学生，聚焦减压赋能与技能提升，缓解其学习就业压力。对于特殊群体，开展隐匿化、个性化活动，注重信心重建与能力提升。二是营造浸润式心理氛围，将心理健康教育元素深度融入社区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一方面，打造主题化心理文化空间，在公共客厅嵌入心理健康主题绘画等，使学生在日常起居中自然浸润于积极心理暗示。另一方面，培育朋辈互助的社区文化，通过设立“心理气象员”宿舍岗、组织跨楼层兴趣小组等方式，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与互助意识，形成“人人关注心理，彼此温暖支持”的社区软环境。

（三）精准识别需求，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新体系

精准识别需求是满足学生个体心理诉求的前提。“一站式”学生社区应充分利用场景、数字优势，构建全周期、多维度的需求识别体系，以实现服务供给与学生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一是强化关键节点的动态摸排，在开学季、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在全面了解、针对性摸排的基础上，精准掌握经济危机、学业危机、情感危机等有可能触发心理危机的学生情况，做到“一人一档”动态管理，“一生一策”精准帮扶，确保在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孤独无助的关键时刻，第一时间最大限度做好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二是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多源数据联动。整合学业管理、生活服务与活动参与等多维数据，建立数据安全机制，进行加密与权限管理。通过交叉分析形成学生心理需求画像，识别潜在问题与群体性需求，为精准干预提供依据。

（四）强化技术赋能，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智慧新生态

“一站式”学生社区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来突破时空和人数的限制，构建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才能增强工作的吸引力和创新性[5]。首先，建立重点关爱人群信息库，整合新生心理普测等级、日常行为轨迹、咨询记录及宿舍生活数据，建立多维度心理信息库，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潜在风险群体，实现早期预警与主动干预。其次，全面建设智能化心理服务平台，整合线上咨询、自助测评、危机预警、资源推送等功能，打造“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入口，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便捷性与专业性。最后，搭建师生共享信息平台和沟通反馈机制，在学生互动区域动态展示心理健康知识、传播心理健康理念。设立线上反馈窗口和社区信箱，建立快速响应与处理闭环，对反馈信息进行分类跟进，并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适时公开回应，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五、结语

“一站式”学生社区为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系统支持，实践证明其在拓展服务场域、深化资源整合及强化育人效能上成效显著。该模式通过机制协同、队伍多元化、技术赋能等举措，有效提升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整体性、精准性并扩大了覆盖面。未来，需进一步优化管理机制、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创新服务模式，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构建全周期、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培育积极向上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南菲，尹金荣．自我同一性发展理论视角下“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9): 85−88.

[2] 佘双好．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生成与发展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07): 27−31.

[3] 李支元．“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模式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路径探究 [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4, 41(02): 70−73.

[4] 刘宏达，韩续冰．“一站式”学生社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末端设计及其功能实现 [J]. 高校辅导员，2023(03): 7−13.

[5] 江珊，陈梅香，王亚群．“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精细化服务体系构建探索——以厦门大学为例 [J]. 高校后勤研究，2023(04): 15−1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专项课题“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影响机制和干预研究”（25FYHLX055）。

（作者系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的道德规范及其践行

李正一

摘要：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或平时沟通的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是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在现代高等教育中，辅导员不仅要做学生的“严师”，更要作为“知心朋友”，在学生三观建立之初正确引导学生的价值观，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具有良好三观的重要前提。此外，辅导员与学生应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以促进双方关系向更为良好的方向发展。本文重点阐述了辅导员师生关系的含义、重要性以及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

关键词：师生关系；大学教育；道德规范；职业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1]教书育人是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责，辅导员作为学生校园生活的管理者，长期与学生接触，直接影响学生的发展道路与学习效率。故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尤为重要。

一、现代教学中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性

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或平时沟通的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包括所处的地位、作用和态度，它是教学过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学生处理好师生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而且是学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

（一）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高效率进行思政教育活动的保证

思政教育活动是“教”与“学”的过程，是双边活动，学生的思政学习兴趣与任课老师及辅导员的引导方式密切相关。如有的学生反映，由于对上课的老师了解不够，所以对其教授的思政课没有兴趣。学生学习情绪的低迷，也会反馈到任课老师的课堂上，老师在教学时也会缺乏动力，形成恶性循环。反观笔者所带班级的思政课堂，由于对学生足够了解，师生关系良好，学生从最初对教师的好感，逐渐转化为对课堂内容的兴趣。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创造良好的教学气氛，是保证有效进行教学的主要条件，而这种良好的教学气氛的创设又是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或前提的。”辅导员只有真诚地关心学生，对学生积极热情、信任，并让学生感受到这种态度，在校园生活中和学生建立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感情纽带，贴近学生，利用自己的经验引导学生，利用现代软件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激励学生探索真知、追求真理的强烈兴趣，才能唤起学生尊重老师的劳动、虚心向老师学习的渴望，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二）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促进辅导员与学生的共同进步

古人云：“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在现代大学中，辅导员与学生是平等的，要想让学生做到“亲其师”，辅导员须以身作则，不仅要做到精于管理，更要善于引导。在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师生之间以“相互依靠”“相互理解”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强交流和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让彼此能在受到充分尊重和谅解的氛围中共同学习、进步。在工作过程之中，本人倾向于使用倾听的方式进行教育，不是单单通过批评的方式。在倾听过程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学生对自我、对学校、对社会的认知，在足够了解学生之后才能精准地、更加有效地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方向。

二、辅导员在与学生的关系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一）辅导员要有积极的价值观，正确引领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如自由、幸福、自尊、诚实、服从、平等等，这些在心中有轻重主次之分。这种对某一件事的轻重缓急态度，构建出一个人对某件事的期望和态度。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态度，便是价值观的不同的体现，便会有着不同的抉择。学生在大学求学阶段正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而学校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辅导员是学生思政教育

阵地的中坚力量，在学生的生活、成长过程中一直担当答疑、解惑的角色，所以辅导员的言行都会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2]。

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应始终符合社会规范，不仅不违反法律，还需不违背道德，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修养、技术水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应摒弃自私自利、贪图享乐、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风气，做到有责任心、自信心、上进心、爱心、公德心、感恩惜福心。在此基础上，辅导员需要以身作则，在平常与学生的交流之中积极向上，遇见问题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同时散发自身人格魅力，使学生向辅导员靠拢，在潜移默化之中端正自身的价值观。在现阶段，社交网络占据了师生生活的大量时间，辅导员也需利用社交网络，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引导，引导方式不应刻板化，通过灵活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正确价值观的理解。

（二）辅导员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辅导员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自身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自身为人处世、与人交流所持的态度。一个辅导员如果在是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等方面出现问题，怎么能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如果辅导员的公信力丧失，在日常管理中，学生也不再信服，影响了教育引导和日常管理的效果。故辅导员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

良好的师德应该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辅导员只有树立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才能真正热爱辅导员这个职业。只有有了坚定的信念，真正热爱教育事业，才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真正地教授学生知识，构建学生的价值观，才能让学生感受到被关心，引导学生成才。

良好的师德应该有崇高的奉献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辅导员的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处理的事务较杂，而物质待遇普遍不高。在这种情况下，辅导员必须有崇高的奉献精神，应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正确对待学生和工作。

（三）辅导员要有爱心和耐心

辅导员对学生的爱，是对每一个学生的热爱、尊重、期盼和理解。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并且热爱它，热爱自己的学生，面对一些琐事或非工作时间的打扰，真情实意地关心他们，仔仔细细地为他们答疑解惑，他们才会感受到温暖，感受到辅导员对他们的良苦用心，慢慢放下对老师的敌对情绪，才能促进他们仔细品味辅导员说的话，用心感受身边的每一件事，将爱注入他们的价值观，融入他们的生活，向社会传递更多的爱[3]。

辅导员不只是带一个或几个学生，面对的是家庭出身、脾气秉性、心理状态、兴趣特长、学习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不同的学生，每个学生的三观不尽相同，面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会相同，这就要求辅导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把他们区分开来。如果每个辅导员多给学生一点耐心，一定会增加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也会更好地促进辅导员的管理工作。

（四）辅导员与学生应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

辅导员要有尊重、理解、宽容学生的品质。很多时候，学生会因过往认知与辅导员发生冲突，辅导员需要深入学生内心去了解并安抚学生情绪，与学生平等对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味指责。

只有师生间的相互尊重才能有良好的教育。在传统的师生观念中，学生必须服从老师，被老师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造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初入大学的学生，还有部分叛逆心，如果还以这种方式对待学生，已经不适用，无法满足现代教育的需要。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尊重每一个学生个体，平等看待每一个学生，才会得到学生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促进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发展，同时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学生尊重他人。学生因过往经历不同，每一名同学都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辅导员应该知道每个人的不同，并尊重他们的不同，不能用一套标准衡量所有学生，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这种差异要求辅导员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水平，采取不同的教育及教学方式，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歧视学生的现象，让每一个学生充满信心，取得更大的进步[4]。

三、加强高校师生关系道德规范的途径

当前05后大学生已进入校园，家庭的高包容度使得其更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对部分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可能产生反感，甚至会在线上线下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师生之间出现一些矛盾，不良的师生关系不仅影响老师的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对管理规定不了解，或是了解不够深入，没有认真学习学校的学生手册，在遇见事情时缺乏自主判断能力，容易被网上的声音牵着走，从而制造更多的师生对立，给学校的日常管理带来挑战。这时辅导员可以深入到学生中，从平时的谈心谈话中了解危机事件的苗头，并帮助学生答疑解惑，给予学生合理的解决方案，明确纪律，让他们知道此类规定不只是限制他们，也在帮助他们增强自律能力，帮助其成长。

（一）加强自身师风师德建设

辅导员作为能够占领大学生思想教育主要阵地的先锋力量，自身更要加强业务知识和思政知识的学习，才能在面对现在大学生的问题时从容不迫。在辅导员

与学生相处过程中，应时刻牢记要关心和尊重学生。时刻提醒自己，现在面对的学生思维跳脱、性格各异，自己做的是直面人的工作，是塑造祖国未来一代灵魂的职业[5-6]。一定不能与学生对立，需要站在学生视角去考量和解决矛盾。

（二）重构师生关系定义

目前，辅导员在师生关系中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遵循规章制度，严格要求，对学生严加管教；二是对学生的要求无条件满足。目前学生追求自由，抵触规则约束，给辅导员提出了新的师生关系命题。这需要辅导员严慈相济，严管并厚爱学生；也需要辅导员冷暖相继，关心关爱学生；还需要教学相长，做到为人师表。总而言之，需要辅导员做到围绕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沉下心去多办实事。

（三）采取不同方法与学生沟通交流

1. 多场景学生谈心谈话

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将思想教育工作做在平时，将思想教育工作渗透进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全过程，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比如，有一些学生可能会惧怕在办公室、心理咨询室等场所谈心谈话，辅导员可走近学生，走进他们的宿舍、走进他们的体育场，在校园其他氛围感比较柔和的场所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辅导员还应该积极地接触新文化、网络文化，熟悉大学生爱用的网络词汇和用语，尽可能地缩小与大学生之间的代沟，更好地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有针对性地展开个性化教育。

2.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保持与大学生的紧密联系

05 后大学生离不开网络，因此辅导员要有效利用好网络文化新阵地，可以把抖音、B 站、小红书等大学生喜爱的媒介平台作为切入点，找准他们的兴趣点，更好地融入学生群体。除此之外，大数据的蓬勃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学校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行为特点，这能够帮助辅导员更有效地实施个性化的教育工作；同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建立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重点关注可能会出现心理危机的同学，通过后台监测他们学习生活数据的变化情况，比如出入宿舍的时间、课堂考勤、学业成绩等，及时预防校园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3. 积极探索紧密的家校合作模式

一些学生的家长对孩子的认知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得不到重视，会被认为“孩子理应知道”。而家长越是忽视，孩子的问题越是得不到解决，就越容易引发严重后果，因此，家校合作的重点是要帮助家长正确地认识孩子的特点或存在的问题，辅导员要保持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获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及时向家长提供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当学生出现问题时，积极寻求家长的帮助，形成紧密联系的家校合作模式，共同帮助学生解决成长中的问题。

4. 充分发挥朋辈感召力

可以由辅导员牵头，建立“舍长—班长—辅导员”三级联动的帮扶团队，实现教育网格化，更好地把控学生的日常行为，也能将危机的处理应对方法由点及面地带进宿舍。同时也应该发挥党员学生的力量，以党员学生为点，以学生宿舍为面，做好党员学生的模范带头作用，做好信息传递作用。

总之，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的道德规范是教育教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它能更好地促进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加强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保障教学工作高效进行，是每一位辅导员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 2014-09-10(03).

[2] 张竟 . 浅谈大学师生关系的道德规范 [J]. 课程教育研究 : 新教师教学 , 2013(35): 111.

[3] 陈喜玲 .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道德现状及对策研究 [J]. 教育与职业 , 2006(23): 60-61.

[4] 杜峰 . 论高校教师职业素质的培养 [J]. 教育与职业 , 2011(03): 54-55.

[5] 付永衡 . 浅析高校师生关系的道德规范——从辅导员的视角看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J]. 科教导刊 (下旬), 2019(36): 60-61.

[6] 郑帆 , 周文俊 . 高校师生关系的道德规范相关思考 [J]. 就业与保障 , 2021(12): 176-177.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的隐性冲突与心理适应机制研究

赵婕煜

摘要：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的隐性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源竞争、价值观差异、社交圈子不同等方面，这些隐性冲突会使学生产生焦虑情绪，增加人际关系敏感度，并使自我认知出现偏差。积极研究高职学生群体活动中的隐性冲突与心理适应机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教育质量。本文主要阐述了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隐性冲突的表现，分析了隐性冲突对高职学生心理的影响，并从提高个人素养、主动寻求帮助、注重自我调节、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高职学生群体活动中心理适应的实施路径，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心理适应；群体；隐性冲突；高职学生

高职学生在校园生活、学习中群体互动频繁，其中存在的隐性冲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深远影响，可以将高职学生的心理适应机制分为积极应对型、消极回避型、寻求外部支持型等类型。在促进高职学生良好心理适应的过程中，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将隐性冲突应对纳入教学内容；教师应及时发现潜在的隐性冲突，针对已出现的冲突采用客观的态度进行调解；同时高职学生还应增强自我意识，尊重他人观点和选择，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避免冲动行事。

一、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隐性冲突的表现

（一）竞争压力导致的隐性冲突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竞争压力导致的隐性冲突主要包括学习、实践技能培训等方面。高职学生会根据兴趣爱好、地域等因素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子，在参与社团组织时可能会出现隐性冲突。为了在社团中担任重要职责，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和资源，会努力展示自己的能力，与其他候选人产生矛盾；一些学生担心竞争对手在社交场合中获得更多支持和认可，会刻意保持与他人的距离，避免与竞争对手的朋友过多接触，导致团队内部或班级人际关系出现裂痕，影响整体的凝聚力。在学习方面，高职学生在获得奖学金、助学金等荣誉时，会存在隐性冲突。一些学生会故意隐瞒一些有效的学习信息，导致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在争取班干部职位或优秀毕业生评选时，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产生比较、妒忌情绪，这些隐性冲突影响群体的和谐氛围。高职实训是提高专业技能的重要环节，然而实训设备和资源有限，一些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岗位和项目，会展开激烈竞争，出现互相拆台的现象，导致隐性冲突的产生[1]。

（二）价值观差异引发的隐性冲突

高职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其价值观存在多样性。高职学生消费群体中存在明显的消费层次差异，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会追求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这种消费观差异在集体活动中很容易产生隐性冲突。在组织班级聚会时，一些学生提议去高档餐厅，而另一些学生认为太浪费，该过程中双方可能产生不愉快。一些高职学生注重技能培养，以尽快就业，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会积极参与各种实践课程和专业技能培训，而另一些学生更加注重社交活动或娱乐，这种差异导致前者对后者产生不满情绪，在小组作业或课堂互动中出现配合不默契的情况，在交流中可能会对彼此的选择产生不认同感，这些都会通过微妙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高职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期望和目标各不相同，一些学生希望毕业后进入大型企业，从事自身相关专业的核心技术工作，有明确的计划，而另一些学生只想拿到毕业证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这种职业目标的巨大差异，在日常交流和职业规划中出现分歧。

（三）社交圈子不同造成的隐性冲突

不同社交圈子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和关注点，如喜欢体育社团的学生与喜欢文艺社团的学生，两类学生讨论交流时，很容易出现一方讲的话题另一方不感兴趣，甚至听不懂的情况，这种沟通上的不畅会逐渐产生一种隐性的隔阂。不同地域社交圈子的方言、地方文化差异，也会造成沟通障碍，导致学生在

理解方言时比较困难，影响彼此之间的互动，形成隐性冲突；城市生源学生与农村生源学生，在生活习惯、观念上存在差异，共同完成小组作业或参与集体活动时，会产生一些冲突，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况。各个社交圈子对于课余时间的利用方式存在差异，一些学生热衷于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一些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学习上，追求卓越成绩，这种时间分配观念的不一致，导致高职学生在群体决策中出现矛盾，长期积累会成为一种隐性冲突。每个社交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不同圈子之间可能会因对彼此表达方式的不适应而产生隐性冲突；不同社交圈子的学生在参与集体活动时，往往会优先选择和自己圈子的成员一起行动，而其他圈子的学生如果想要加入，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这种排斥通过一些微妙的行为表现出来，使得其他圈子的学生很难融入，让其感受到被孤立，从而产生隐性冲突。

二、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隐性冲突对高职学生心理的影响

（一）产生焦虑情绪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的隐性冲突，是指群体成员间未被直接表达或公开化的矛盾。当学生感到隐性排斥时，会引发持续性警觉；一些冷嘲热讽、故意忽视、眼神回避等间接攻击行为，以及群体中不邀请其参与讨论、分组孤立，这些都会使学生产生孤立、焦虑情绪[2]。部分高职学生性格内向，在与他人交往时存在恐惧和自卑心理，害怕被拒绝或嘲笑，导致他们在群体中表现较为被动，难以主动开启话题和参与讨论。部分高职学生表面上维持和谐关系，内心却积累负面情绪。在隐性冲突环境中，不确定自己是否被他人接受，担心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受到威胁，出现表演性社交疲劳，长期压抑会进一步引发广泛性焦虑。一些学生在奖学金评定、实训机会获取等方面暗中较劲，表面和谐，但实际存在利益博弈，在隐性冲突中缺乏明确的解决途径，个体容易陷入过度解读他人意图的循环，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如别人，进而影响学习和生活积极性[3]。

（二）自我认知偏差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隐性冲突可能会导致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出现偏差。一些学生在技能竞赛或实习机会中处于劣势，可能通过贬低他人成就维持自尊，导致过度自卑或盲目自负；当个人职业规划与群体主流价值观产生冲突时，个体也会产生身份焦虑，如一些学生在技术型人才与学历弱势群体标签间摇摆，导致职业目标模糊。高职学生在群体活动中经常受到他人的否定或排斥，即使这种否定是隐性的，他们也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进而降低自信心；长期被群体边缘化的学生，将不合群归因于自身能力缺陷，形成“我不行”的自我实现预言。

（三）人际关系敏感度提升

高职学生经历过隐性冲突后，会倾向于将他人行为解释为恶意，即使证据不足也难以修正，形成防御性敏感。一些学生会过度解读他人的行为和言语，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将中性事件视为敌意信号，频繁遭遇隐性排斥的学生会陷入自我否定循环。为避免冲突，部分学生选择主动疏远，导致社会支持系统断裂。在新的人际交往中难以放松，进一步影响学生建立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4]。

三、促进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心理适应的实施路径

（一）注重自我调节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的心理适应，应注重学生的自我调节，教师和辅导员应帮助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学会欣赏他人长处，尊重个体差异，开展主题班会，让学生分享自己的优点和成长经历，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针对一些不合理信念，教导学生用理性的思维，代替非理性的思维；面对考试失利时，引导学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教师应教授高职学生识别不同情绪的方法，鼓励学生记录每天的情绪变化，通过身体反应、内心感受等来判断自身的情绪状态，分析引发情绪的事件，进而提高情绪察觉能力，并向学生传授深呼吸、正念训练等多种情绪调节方法，使学生在短时间内缓解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在自我调节中，可以鼓励学生改变看法，尝试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行为，积极协助高职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短期、长期目标，将其化解为具体的行动内容，避免盲目行事，并强调规律作息、合理饮食等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鼓励高职学生定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检查和评估，通过写日记、与他人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反思。

（二）主动寻求帮助

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出现隐性冲突，积极寻求支持和帮助，可以释放学生的负面情绪，给予情感支持，并拓宽视野路径，改善人际关系。学校应加大心理咨询室的建设投入，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工作，及时发现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并进行干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学校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空间，鼓励学生、师生之间平等对话，营造民主开放的交流氛围；在主动寻求帮助中向朋友、家人、老师倾诉。教师应摒弃传统的权威式教学模式，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及时给予表扬肯定，课后主动关心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深入研究教材教法，探索适合本校学生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及心理动态，察觉潜在的危险信号，采取有效措施，并创造轻松愉快的班级氛围。学生应认识到主动寻求帮助

是一种智慧表现，克服害羞胆怯心理障碍，尽可能地基于实际情况判断合适的求助人选；在向他人求助时，尽量做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描述问题的具体情况；在接受他人帮助中，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配合对方的工作。此外，学校还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形成家校共育合力，建立家长微信群或其他临时通讯群组，方便随时交流学生的情况，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满足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需求。

（三）提升个人素养

在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提高学生个人素养，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教师应鼓励高职学生深入进行自我探索，了解自身的信息优势、价值观，开展自我剖析主题班会，使学生分享自身的性格特点、经历等，使其更好地认识自己，在与他人互动中容易理解他人与自己的差异，增强心理适应能力。学校应通过开展心理工作坊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高职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情绪状态，提高自我认知水平，如举办“我的情绪我做主”心理工作坊，引导学生识别不同的情绪，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在人际交往中提高沟通能力。教师应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通过课堂教学、班级文化建设等途径，塑造学生良好的品德，建立真诚互助的人际关系，并树立身边的道德榜样，宣传优秀学生的事迹，评选校园之星，表彰那些在品德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引导整个高职学生群体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在提高学生个人素养方面，学校还应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测评工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明确自身在职业技能、个人发展方面的定位，减少因对未来迷茫而产生的焦虑；学校还应举办沟通技巧培训讲座，帮助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开展小组项目合作，充分运用沟通技巧，使学生在新的群体环境中迅速适应并融入。

（四）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促进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与心理适应，应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校层面应开展各类班级或年级的团体拓展活动，使学生分组协作完成户外素质拓展训练任务，在过程中加强沟通，打破陌生感，提高互动积极性；鼓励学生围绕人际交往技巧、情绪管理等话题开展讨论，引导学生共同寻找解决方法，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教师应积极关注学生的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在人际交往中有困难或性格内向的学生，给予其帮助和指导，以身作则，展现良好的人际交往风范，用积极的态度影响学生，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勇敢地融入集体。高职学生应培养积极的自我形象，树立自信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当其他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给予关心和安慰，并尊重个体差异，包容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主动参与感兴趣的社团组织，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抓住课堂活动机会，积极回答问题，增加互动频率，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网。学校应积极与家长保持联系，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的表现，了解学生在家中的状态，共同讨论如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通过亲子运动会、手工制作等活动，使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在学校的人际交往[5]。

四、结语

综上，高职学生群体互动中会出现价值观差异、资源竞争、沟通不畅等隐性冲突，而不同学生在面临隐性冲突时，心理适应机制各不相同，可以将心理适应机制分为自我调节、转移注意力、寻求支持等。在高职学生群体通过良好互动促进心理适应的过程中，学校应积极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倡导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校园文化，并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和工作坊，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人文关怀意识。此外，还应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开展多样化的心理教育活动，构建家校合作机制，优化校园文化建设，进而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丽君，麻小珍．新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现状与干预研究 [J].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25(01): 9−15.

[2] 高树平，杨琴．数字时代高职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偏颇及改进策略 [J].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25(01): 45−50.

[3] 邹心鋆，王化笛，顾雪英．高职学生生涯适应力的类型及影响因素：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J]. 职业技术教育，2025, 46(02): 47−53.

[4] 刘英，郭宏涛．学生身份认同视域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J]. 品位・经典，2024(14): 25−28.

[5] 铁芝荣．高职院校学生自我认同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思政课教学视角 [J]. 教师，2024(15): 12−14.

（作者单位：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与探索

王　肖

摘要：在职业院校，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引发其他问题的诱因。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和表达能力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有重要意义。职业院校由于专业不同自然形成的班级性别状况主要呈现为三种，即女生占绝对优势的女生班级，男生占绝对优势的男生班级，还有男女生均有相对比例的混合班级。本文基于男生班级来研究人际关系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重点介绍方案的设计要素和方案内容，并针对实施过程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关键词：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要素；实施过程

在职业教育领域，男生班级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更为困难一些，相比于女生班级或男女生班级，那些需要同学之间的肢体接触活动，部分男生感觉难为情或不愿意配合；团体心理辅导中某些“温馨、好玩”的活动，部分男生认为比较幼稚，没有辅导效果；人际交往能力是职业院校学生应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对于其人格完善和职业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健康的人际关系也是他们抵御自卑感，建立自尊的重要支撑。人际关系问题既是问题本身，也是产生其他很多问题的诱因。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他们构建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预防心理危机的出现，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团体心理辅导的必要性

团体心理辅导是指受过专门训练的团体领导者运用专业的心理学理论、技术和方法，协助团体成员获得有关信息，使来访者改变其认识、情感和态度，从而解决其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而促进来访者人格的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善[1]3。

相比个别心理辅导，团体心理辅导具有辅导效率高、效果持续性强、影响力大和辅导适应范围广的特点[1]6-7。职业院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咨询工作和团体心理辅导的教师较少，而近年来学生因心理健康问题引发心理危机的事例却在不断增长，个体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的效率低，受众少，而团体心理辅导可以缓解这一矛盾。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可以防患于未然，预防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

二、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际关系现状

在职业院校常规的心理测评工作中，因人际关系问题导致测评结果异常的比例较高。据某校心理健康中心 2024 年新生心理测评数据反馈，通过 SCL-90 测评，全校排在前三位的阳性因子分别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抑郁情绪，这与本校往年的普查结果走向相一致[2]。广大青少年也常常因为人际关系问题需要咨询。相关统计显示，北京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接到的咨询中 50% 以上涉及人际交往问题；《中学生科学报》每天都会收到学生的来信，学生最关心的还是人际交往问题，最多的时候一天 15 封学生来信中有 13 封是咨询这方面的难题和困惑的。在职业院校中，一些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偏低，相对于普通高中和非职业类高校，他们承受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偏见和自我否定，特别是对于男生班级来说，一些学生自我控制力更弱，容易沉溺于手机游戏和网络世界，不愿意积极探索人际关系，表现为被动等待甚至孤僻，课堂上沉默寡言、回避集体活动；另一个极端则表现于言语挑衅，搞小团体对立和面子争夺战，挑战教师或班干部引发关系紧张。在具体的同学关系中表现为社交意愿较强，但实践能力不足；较多依赖网络社交，线下社交较少；部分同学做事和待人接物以自我为中心，情绪管理的能力不足；缺乏冲突的解决策略；文化差异适应困难[3]。

三、团体心理辅导的原则和实施阶段

为了充分发挥团体心理辅导的作用，实现团体心理辅导的目标，达成预期的效果，团体心理辅导应遵循保密、发展、专业、民主、共同、综合和引导的原则。尊重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权利，保护好团队成员的隐私，是团体心理辅导最基本的原则[4]；团队的组织者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团队辅导过程中的问题；组

织者要有较高的心理学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团体辅导工作经验，促进团队成员的发展；团体心理辅导的规则应该由全体成员和组织者共同来制定，每位成员都承担着发展团队的责任；团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该有较高的能力和素养，了解团体心理辅导所依据的各种理论及所采用的方法，单靠一种理论和方法往往难以达到较好的辅导效果；团体心理辅导的根本目标是助人与自助，领导者要善于鼓励和引导学生，促使他们自己发现和解决问题。

团体心理辅导的实施过程一般包括五个阶段，分别是团体准备阶段、团体创始阶段、团体过渡阶段、团体工作阶段和团体结束阶段。其中团体准备阶段指的是在团体活动正式开始之前要做的工作，包括招募对象、设计团体辅导方案、了解团体成员的需要和设定团体辅导的目标；团体创始阶段需要成员之间彼此熟悉、建立信任感、明晰团体目标和个人目标、约定团体契约；在团体过渡阶段成员会产生抗拒的情绪或矛盾冲突，领导者需要以谨慎敏感的方式在恰当的时机介入，既要给予成员一定的支持，又要留给他们一定的挑战。团体工作阶段成员之间彼此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感，愿意表露自我，积极参加团队活动，要积极为他们提供支持，促进他们在团队中做出行为改变，完善自我。团队结束阶段需要成员分享感受、整理经验，提前处理离别情绪，提醒成员对彼此的秘密保密。

四、男生班级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的要素

（一）方案设计的活动以男生班级学生的需求和心理特点为出发点

前文提到，男生班级的学生不愿意做一些诸如需要“牵手”这样的肢体接触活动，所以在活动设计上就要避免此类活动；还有如“松鼠和大树”活动情节温馨、偏低龄化的设定，学生很难沉浸其中，效果不好，也要避免这类活动。学生更喜欢刺激、有挑战、有竞技感、热门的活动，比如“蒙眼互打”“抓乌龟”“棒打薄情郎”这样的活动。另外，由于职业院校的学生文化课成绩相对较弱，不喜欢参与需要大量“写字”的活动，应多安排具有“体验感”和“游戏感”的活动。大部分学生社交意愿较强，但实践能力不足，部分男生比较羞涩，他们对于人际交往既想又不敢，处于纠结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安排如“棒打薄情郎”这样的活动：不认识同学，叫不出名字，就要遭受当头一棒，以游戏“逼迫”学生相互认识。一位性格内向的学生在参加完活动后的作业里写道：“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思，我认识了一些同学，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很开心。”

（二）方案的设计以发展学生的人际关系能力为核心

人际关系问题既是问题本身，也是引发其他很多问题的诱因。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助于学生建立真实、稳定的人际关系，为他们提供坚定的情感支持，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概率，从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5]。活动的设计既要满足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又不能偏离目标，要紧紧围绕发展学生的人际关系能力这个核心。如“爱在指尖”的活动：同学们围成两圈，完成两两一组“动作—手势”的活动，或两人各伸出一个手指，各自把脸转向后边，并重重地跺一下脚；或两人各伸出两个手指，朝对方微笑并点头；或各伸出三个手指，热情地握手；或各伸出四个手指，热情地拥抱彼此。这个活动中，学生们都非常忐忑地期待着对方的反应，期待对方能够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喜欢自己。这个活动要教会同学们，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可以首先主动敞开心扉，接纳、认可、欣赏和喜欢他人，这样别人才会接纳、认可和喜欢我们[1]203-204。

（三）方案的设计以能够合理实施为现实标准

在具体的设计中，要考虑到方案的可操作性，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数普遍在45~50人，活动的设计需要学生普遍参与，一般一次团辅活动是90分钟，在活动的选择上要避免选择那些参与人数比较少，又花费时间较多的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学生总是在等待，体验感比较差；活动不宜选择那些较为复杂、需要多名指导教师的情况，因为师资有限，往往每次团辅活动只有一位指导老师和一位班委。如“不倒森林”活动，主要考验团队的配合度，活动较为简单，只需要6~8人手持一根棒子，围成一个圈圈，顺时针或逆时针转6~8圈，回到自己的起始位即可，杆子不倒即为挑战成功，或两两PK，看哪组用时最短。

五、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主

表1 职业院校男生班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6]

活动次数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1	相逢是首歌	1. 团队成员破冰，相互认识，初步建立熟悉感； 2. 增强团队凝聚力； 3. 引导成员感受接纳他人、肯定他人、支持他人、主动交往的魅力。	1. 热身活动：按摩操、无家可归 2. 棒打薄情郎 3. 爱在指尖 4. 总结：约定团体契约，分享活动感受
2	朋友	1. 引导成员了解倾听在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2. 引导成员学会“不妨听听别人的意见”，逐渐明确许多事情的答案不唯一，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 3. 初步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1. 热身活动：大风吹、抓乌龟 2. 最佳配图 3. 不倒森林 4. 分享活动感受
3	相亲相爱一家人	1. 引导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团队合作带来的成就感和快乐，培养学生学会沟通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2. 引导学生分享本次团辅活动的收获。	1. 热身活动：对跑比赛、猜歌名、脑筋急转弯 2. 珠行万里 3. 蒙眼互打、快速三子棋 4. 总结分享活动感受，相约下次活动

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分别是“相逢是首歌”“朋友”和“相亲相爱一家人”。“相逢是首歌”主题主要是引导同学们互相认识、建立联系，约定团体契约；“朋友”主题主要是引导同学们学会理解和倾听他人，初步培养成员的合作意识和能力；“相亲相爱一家人”主题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分享活动感受，相约下次活动。三个主题层层递进，从认识、熟悉到结束，培养学生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具体方案见表 1。

六、对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实施过程的反思

（一）突破班级限制，扩大招募对象，制定校级团辅活动方案

笔者设计的男生班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是以学校的行政班为单位，即参与的同学原本就是一个班级，这为团辅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如互相认识、有一定信任感且时间相对一致等，方便安排团辅活动。但这也限制了学生通过团辅活动认识其他同学的可能。团体心理辅导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微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大家彼此敞开心扉，彼此信任，坦诚交流，这样的氛围对于改善人际关系具有显著意义[7]。若参与对象是一个行政班，在实施中学生可能少了对“新认识的人”的期待，辅导的效果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自愿参加”的效果可能优于“强制”参加的行政班。

（二）加强学校心理辅导活动室的硬件建设和学校心理团体辅导的师资支持

目前，笔者所在的学校暂无能容纳 40~50 人的心理辅导活动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心理团辅活动的开展，团辅活动主要在操场举行，当遇到雨雪、大风或极端天气时，活动受限，影响活动的效果。

笔者在开展团体辅导的过程中，一般团体辅导的人数都是 40~50 人。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组织或者从班级里找一个班委助手来协助开展，这些班委大都没有经过培训，也不清楚活动应该如何组织以及活动的目标，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来辅助教师完成辅导，建议配备经过培训的其他老师或有经验的学长、学姐来配合共同完成，如刚进校不久还没有开始上课的新教师，或者学校心理社团有经验的学长学姐等，这样活动的效果会更好。

（三）构建丰富的一体化校园学生文化活动

单靠团辅活动的开展来改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比较困难。对学生来说，丰富的一体化校园学生文化活动将助力学生积极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塑造。如在艺术领域，可举办展览、歌手大赛等；在科技领域开展体验展、编程马拉松等；在体育方面组织趣味运动会、春游、户外骑行等，为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在专业技能领域，组织校级技能大赛；加大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利用社交媒体、校园公告、线下海报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各类文化活动。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群体的特点，制作富有吸引力的宣传内容，突出活动的趣味性、互动性和收获感[8]。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助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培育。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素质高能力强的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

团体心理辅导对领导者素质和能力要求极高，需要具备丰富的心理学知识，熟悉团体心理辅导的基本理论，又要有很强的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引导能力，能够高效处理突发状况，又需要洞察力强和丰富的团体辅导工作经验。目前职业院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老师不一定都是心理学专业出身，需要对他们进行心理团体辅导技术的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参考文献

[1] 张文霞 . 团体心理辅导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22: 3, 6−7, 203−204.

[2] 张玉婷 , 丁毓 . 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研究 [J]. 时代青年 , 2025(05): 100−101.

[3] 王培培 . 从“工具人”到“职业人”的能力跃迁——就业导向下中职生人际交往与合作能力培养路径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 2025(17): 60−63.

[4] 曹羽鹤 . 大学新生安全感干预研究 [D]. 南昌 : 南昌大学 , 2017.

[5] 张涛 . 新媒体视域下提升高校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多元路径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 2024, 15(23): 150−154.

[6] 李丹 . 违纪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团辅方案设计初探 [J]. 高教论坛 , 2018(10): 65−68.

[7] 赵楠 . 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和自尊的影响分析 [J]. 大众文艺 , 2025(02): 201−203.

[8] 张钥楮 . 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干预研究 [J]. 人生与伴侣 , 2025(26): 94−96.

（作者系天门职业学院讲师）

积极心理赋能全生命周期
——校社协同构建社区心理服务新生态的实践与探索

程佳宁 詹清清

摘要：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重要议题。高校作为智力资源富集地，其在社会服务与心理育人领域的实践探索具有独特价值。本文以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系统阐述了其依托全国首家社区心理科普体验馆，围绕“银龄、青年、儿童”三大群体，构建并实施“积极心理学赋能＋校社协同”的全生命周期社区心理服务模式。本文剖析了该项目的实践路径，并总结其在增强社区居民心理福祉、提升学生实践育人成效、形成良好社会示范方面的积极效果。进一步提出高校心理服务助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可持续路径与对策建议，以期为同类院校开展社区心理服务、深化实践育人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校社协同；全龄友好；积极心理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党和国家始终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1]，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目标是全体人民，尤其是要注重某些特殊群体，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老年群体和残疾人等在内的弱势群体、优抚对象和边缘人群[2]。“一老一幼”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2021 年 6 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3]。

在国家深入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关键主体，肩负着将丰富的智力、人力与技术资源下沉至基层社区，精准对接全年龄段居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精神生活需求的重要使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正成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发挥青年力量的重要途径和载体[4]。为此，台州科技职业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需求紧密结合。本项研究通过深入分析高校心理委员在社区的“三下乡”实践，旨在探索出一条有效的社会实践路径。这条路径不仅要充分发挥心理委员的角色优势，满足社区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是高校推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举措，从而全面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本项目源于对当前社区心理服务供需错配问题的深刻洞察。一方面，社区居民尤其是一老一幼及特定职业群体，存在未被充分满足的个性化、发展性心理需求，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仍面临资源分散、专业性不足、覆盖群体有限等现实挑战；另一方面，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存在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实践转化需求。项目旨在打通高校与社区之间的资源壁垒，实现优势互补与共赢。

（二）理论框架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在 1998 年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强调关注个体的优势潜能与积极特质，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从疾病治疗导向转向促进个体幸福感与良好心理状态的培养[5]，为从“赋能”而非“纠偏”的角度提升群体心理福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工具。

本项目借鉴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6]，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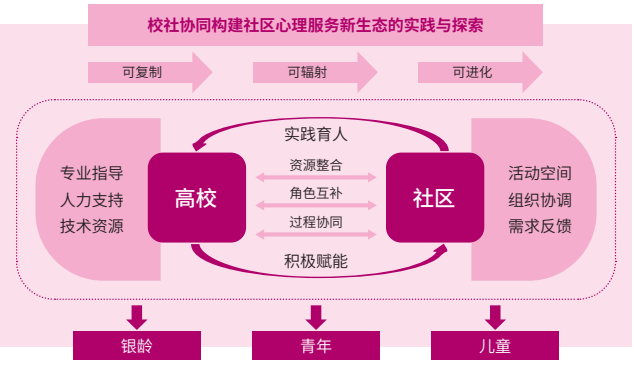


图 1 校社协同构建社区心理服务新生态模型图

了“高校—社区—个人”的社区心理服务新生态模型图（见图1）。在该模型中，高校提供专业指导、人力支持与技术资源；社区提供活动空间、组织协调与需求反馈；个人则是服务的主要受益者和心理支持的微观载体。通过校社资源整合、角色互补与过程协同，形成育人合力，实现教育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项目过程

（一）前期准备

项目团队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一般健康问卷（GHQ-12）》、简化版《知觉压力量表（PSS）》等标准化工具进行定量调查，并结合对社区工作者、老年居民、儿童居民代表的半结构化访谈进行质性分析，为方案设计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团队多次实地勘查社区场馆，对其心理测量室、多功能活动厅等功能空间进行评估与规划，确保活动空间、硬件设施实现最优匹配。调研结果显示，银龄老人渴望联结感，社交需求强烈；青年社工工作压力大，需要情绪调节；儿童多来自双职工家庭，需要社交与陪伴。聚焦这三类群体，团队构建了“三大主题营、八套团辅方案”的实践框架，确保各项活动目标明确、流程规范、内容专业且富有趣味性。

（二）活动实施

银龄趣玩营：怀旧与创造双轨驱动，重构老年群体生命价值。活动以生命意义感为核心，聚焦老年群体退休后易面临的社交断裂、自我价值感弱化等问题，构建“情感唤醒—创造实践—意义重构”的活动逻辑链。活动通过“年代金曲拍拍手”引发情感共鸣，旨在激活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体验和生命意义感；利用“草帽DIY”“干花相框制作”等手工创作激发老年人的创造力与成就感，并结合低强度体育活动促进身体激活与团队互动。活动注重过程导向与故事分享，使老年人重拾自我价值感。

青心赋能营：表达与协作协同发力，涵养青年社工心理资本。立足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针对青年社工长期面临的职业压力、心理资源耗竭等痛点，构建专业化的赋能体系。活动设计紧密结合其职业场景与心理需求，通过“遇见更好的自己”工作坊及“压力拼图”等表达性艺术疗愈，将压力具象化并进行解构与重构；“解压接力赛”通过团队竞技形式，在协作中释放压力，增强组织凝聚力与青年社工的归属感。

童心探索营：游戏与艺术双向赋能，培植儿童积极品格优势。针对儿童自主性发展、社交表达能力较弱等成长需求，构建“游戏化探索—艺术化表达—品格化培植”的活动框架。活动设计“优点藏宝图”和“品格能量徽章”等游戏化活动，旨在引导儿童发现并表达自身优势；“黏土冰箱贴DIY”“玻璃瓶绘画”等艺术创作为儿童提供非语言的表达渠道，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培植其自信心与成长动力。

三、项目成效

（一）社区福祉提升

通过访谈、观察及后续跟踪等科学化成效评估，项目实现了全年龄段社区居民心理福祉的精准提升。银龄老人在怀旧互动与手工创作中重建社交联结，“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有效缓解了退休后的孤独感与疏离感，激活生命价值感。青年社工职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团队协作意识与组织凝聚力明显增强，为社区治理注入更稳定的心理动力。儿童在游戏与艺术活动中，充分发掘自身品格优势，自信心与社交主动性显著提升。同时，项目以社区心理科普体验馆为载体，通过常态化、专业化的心理服务，让积极心理学深入社区，推动社区整体心理氛围向更融洽、更包容的方向发展，充分验证了积极心理“赋能”模式在提升社区综合福祉中的实践有效性。

（二）学生能力淬炼

项目构建了“实践服务+能力成长”的双向赋能机制，实现“育人”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学生参与了从需求调研、方案设计、活动组织到成效评估的完整流程，团体心理辅导带领、沟通协调等实操技能锻炼了，专业应用能力显著提升。在服务社区不同群体的过程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对心理服务行业的认同感持续增强，树立了“以专业服务社会”的价值导向。跟踪反馈显示，学生普遍掌握了至少两项实操技能，形成了“理论学习—实践应用—反思提升”的能力闭环，有效落实了高校实践育人的核心目标，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与社会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三）社会影响广泛

项目凭借创新的校社协同模式与显著的实践成效，成功引起社会各界对社区心理服务、全龄友好建设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议题的广泛关注，有效提升相关领域的社会认知度与重视程度。项目依托“精准需求调研—专业化方案设计—多维度活动实施—科学化成效评估”的完整实践路径，形成了标准化、可操作的社区心理服务流程，并充分整合高校专业资源与社区场地、需求资源，实现了“资源整合、角色互补、过程协同”的生态化运作，为同类院校开展社区心理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项目所打造的校社协同心理服务品牌，兼具可复制性、可辐射性与可进化性，能够根据不同社区的需求差异灵活调整，为全国高校深化校社合作、参与基层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成熟范式，助力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基层落地生根。

四、共同富裕视域下高校心理服务路径的构建策略

（一）建立常态化校社合作机制，拓展心理服务阵地

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背景下，高校应突破校园边界，与属地社区构建深度融合的常态化合作

机制。可通过签订联动协议、挂牌“校社协同心理服务共建单位”，明确双方在资源、分工、流程及评估上的细则，形成规范运转的合作框架，推动心理育人从“校园封闭型”转向“校社开放型”[7]，响应全龄居民心理服务需求。高校通过梳理学生志愿实践、公益项目执行等专业资源，社区对接社区服务站场地、社会组织动员等资源，以“资源清单双向对接”构建多元主体心理支持体系，破解社区服务专业性不足与高校资源落地难的问题。此外，校社围绕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设计项目，社区提供功能空间与硬件，高校负责课程设计、活动带领等技术支持，通过互补协作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服务效能最大化。

（二）引导大学生参与社区实践，构建育人长效机制

高校需将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融入社区实践，构建“实践育人+心理育人”长效机制，实现“服务社会”与“培养人才”统一。通过学分认定、时长考核等方式，引导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协助科普宣传。高校可配备专业教师，构建“事前研讨、事中督导、事后总结”闭环，帮助学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强化积极心理品质与专业认同感。通过在社区开展宣传展览、案例发布、文化节等营造社区心理氛围，提升居民认同感，形成“师生共建、居民参与”的心理支持生态。

（三）完善社区信息平台建设，实现服务精准对接与高效联通

社区需依托数字化技术，构建“需求感知—服务匹配—反馈优化”信息闭环，推动心理服务向精准化转型。搭建线上预约系统、信息推送平台、资源导航平台等，引入大数据分析居民服务数据，动态调整服务。建立校社信息联通机制，社区每周同步需求与反馈，高校每月通报服务与资源计划，通过定期沟通提升效率、扩大覆盖面，为校社协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落地。

五、结论与展望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深刻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全国首家社区心理科普体验馆——黄岩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幸福之家”，开展了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内核、以思政育人为价值引领、紧密契合共同富裕目标的特色实践活动。项目创新性地构建了面向“银龄、青年、儿童”三大核心群体的全年龄段心理服务体系，旨在通过校社协同，探索一条“积极赋能全生命周期”的社区心理服务新路径，生动诠释“全龄友好、精神共富”的深层内涵。

实践表明，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指引，以校社协同为组织模式，构建面向全年龄段的社区心理服务体系，是高校服务共同富裕战略、深化实践育人改革的有效路径。该模式不仅直接赋能社区居民，提升了其心理福祉，也反向赋能高校师生，淬炼了其专业能力与社会担当，实现了“育人”与“服务”的双向奔赴。未来，研究将进一步追踪项目的长期效应，深化对服务模式标准化、评估体系精细化的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与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贡献更多的高校智慧与实践方案。

参考文献

[1] 廖小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科学内涵与衡量指标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06): 33-40.

[2] 何军杰. 习近平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 2024.

[3] 辛本健, 刘书文.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N]. 人民日报, 2024-08-13(01).

[4] 陈莉萍, 林捷, 钟德强, 等. 高职院校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模式探索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0, 19(20): 260-261.

[5] 曹婧, 安增辉, 曹雯. 基于家校社联动体系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策略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5(27): 45-48.

[6] 何妍, 俞国良. 生态系统视角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1(13): 4-6.

[7] 康潇津.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家校社”联动课程体系构建 [J]. 上海教育, 2024(12): 56-5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度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辅导员研究专项课题“积极心理学视阈下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对心理健康与就业的作用”（24FZB07）。

（作者单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深化校社协同 深耕社区服务

“朋辈养心”
——基于朋辈支持的高校边缘社交群体心理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彭志凯 邹灵玥*

摘要：本文充分剖析当前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现实困境，结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际工作情况，聚焦朋辈心理辅导这一关键环节，探索贴合学校育人场景的朋辈心理辅导工作路径。当前朋辈心理辅导存在专业化程度不足、培训体系不完善、服务持续性薄弱等问题，亟待打破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为此，需构建基于朋辈支持的心理育人新模式，通过规范选拔标准、优化分层培训、搭建常态化服务平台、完善督导反馈机制，构建专业化、可持续的朋辈心理服务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全面提升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朋辈支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边缘社交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广受关注，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学生心理健康既关乎个人学业、人格与职业发展，也关联社会人才供给与行业可持续发展。因此，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加强全覆盖、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学生提升心理韧性与情绪调节能力，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障学生成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随着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与海量数字信息重塑大学生社交方式，部分学生沉浸虚拟社交，在现实中形成“社交孤岛”[1]。这类“互联网原住民”面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人际联结弱化的困境，针对线上活跃与线下失语的社交异化现象，高校还需构建有效干预机制[2]。

现行的“朋辈 + 辅导员 + 心理中心”三级人工流转机制存在缺陷，传统模式既难以满足即时干预需求，又无法构建全周期心理健康画像。纸质档案与口头汇报的形式容易导致信息遗漏，继而造成危险预警信号的传递逐级减弱。大多数高校缺乏统一的数字平台支撑，与智慧校园建设的发展相悖[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如何落实“三全育人”理念并将心理育人与实践、文化、网络等育人要素有机融合，培育学术水平高、技术能力强、心理素养好的高校人才，成为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

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研究现状与现实困境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趋势及困境

1. 国外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心理教育实践模式的构建[4]与社交少数群体自我效能量表开发两大领域，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成果体系，但前者在跨文化研究、数字化研究以及长效追踪方面存在不足；后者存在文化偏差、群体异质性、纵向数据缺乏等局限。

当前国外高校本科生心理健康朋辈帮扶机制相关研究以同伴支持理论为核心，融合社会学习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干预框架。研究方向包含应用网络信息技术帮扶对象的精准化干预、针对特殊文化背景群体的专项研究文化适应性、引入生理指标等客观评估手段的评估方法革新[5]等。

国外社交少数群体自我效能评价量表研究已形成较系统的伦理框架与测评工具，呈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量表开发以改编通用自我效能量表[6]和开发群体特异性量表[7]为主。应用场景已拓展至数字社交效能[8]、压力情景应对[9]等领域。

2. 国内

国内心理育人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效果评估与长效机制两大维度，已形成本土化研究体系，但仍有三大共性不足：一是技术赋能理论深度不足，智能技术与传统帮扶的融合机制不明确；二是缺失长效评估体系，多数研究无追踪设计；三是对特殊群体关注不够，针对边缘社交群体的专项研究匮乏。

（1）心理育人效果评估的相关研究

当前朋辈心理帮扶效果评估已形成系统化科学评估体系。评估工具方面，研究者构建了包含认知、情绪、行为、关系等多维度的标准化评估量表[10]；成效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表明帮扶者的共情能力和情绪稳定性、科学的干预频率及学校政策支持力度[11]是三大关键因素。这些成果为提升朋辈心理帮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2）育人模式长效机制的相关研究

当前国内关于朋辈心理帮扶长效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建设和协同机制两个维度。制度建设方面，王红[12]通过对12所高校的案例研究，提出“三纳入”制度保障模式（纳入学分体系、师资编制和财政预算）；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编制了《心理委员工作协同手册》，提出了四级联动机制。在协同机制方面，上海市教委开展的“医教结合”试点项目建立了“医院—高校—社区”三方协同的标准化流程；最新研究趋势表明，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如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中国特色朋辈支持认证体系的构建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些研究成果为完善我国高校朋辈心理帮扶的长效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范式。

二、构建基于朋辈支持的高校边缘社交群体心理育人模式的重要意义

（一）深化高校“三全育人”“五位一体”教育模式的探索

以学生干部及志愿者为载体，搭建以帮扶边缘社交群体为核心的心理育人新模式，实现理论与实践双重突破。理论层面通过实证与实践研究完善“三全育人”与“五位一体”协同理论体系，阐释学生主体参与机制、课外延伸路径及校内外多维协同运行机制，将心理育人与实践、文化、网络等育人要素有机整合。实践层面立足高校本科生群体，校内组织多层次的心理育人活动，校外与医院、社区等机构联合提供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

（二）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效能

该模式将系统科学全面构建高校心理育人新型方法体系。将传统朋辈互助模式与信息技术深度结合，重点开发三大核心模块：一是形成科学的朋辈心理志愿者选拔培育体系及互助干预策略；二是制定可量化的朋辈支持网络评估标准；三是构建含标准化流程、多方协同机制与动态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该模式既保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支持属性，又通过可量化评估与智能分析技术提升心理干预精准度，最终形成具备中国特色、契合当代大学生行为特征、适配智慧校园发展需求的心理健康教育新型方案。

（三）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丰富性

朋辈支持的心理育人模式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增添了全新活力，在传统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参与的单向灌输型教育模式之上，该模式创新性构建了以朋辈互助为核心的新型育人机制。通过培育专业化朋辈心理辅导队伍，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单向传递局限，形成师生协同、朋辈互助的立体化育人格局，有效扩大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范围，增强其亲和力与实效性。

（四）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普遍存在短期化与碎片化问题。多数活动仅局限于单次实施，缺乏长效机制，阻碍教育效果的持续深化。对此，该模式创新性提出以学生组织为载体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构建路径：凭借制度化运作保障活动延续性，基于品牌化建设提高参与度，通过体系化设计实现教育内容的递进深化。该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重形式轻实效的困境，推动实现从单纯活动开展到注重育人实效的实质性跃迁。

三、基于朋辈支持的高校边缘社交群体心理育人模式的探索与构建

高校边缘社交群体，指校园社交场景中常表现为不善主动互动、日常寡言少动、偏好独处或小型交往场景的部分学生群体，其心理健康教育是“三全育人”与“五位一体”教育模式下的重要实践方向。针对高校大学生的共性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问题，相关工作者需创新教育模式，构建以“三全育人”为引领、以朋辈支持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融合、全周期闭环管理、多维度协同优势的可持续发展的心理教育模式，为传统育人协同弱、周期短、维度窄的难题提供可行方案。

（一）创建多主体协同的朋辈心理志愿者队伍

1. 建设更为专业的朋辈队伍

学院各班级心理委员与心理服务中心志愿者作为朋辈心理服务的主体力量，要科学有效地建设该队伍。一是在选拔时应当制定较高的选拔标准，注重心理教育核心素养与边缘群体共情力，优先推选能够掌握基础心理评估方法、具备团体协作意识的学生志愿者。二是构建专项培训与实践情景考核体系，培训内容涵盖边缘群体沟通技巧、心理急救规范，考核合格者与边缘学生建立一对一结伴关系，定期开展线下陪伴，协助其应对学业与人际交往难题。

2. 学校主体联动机制

学院采取以各二级学院为核心，联动心理教育专业教师组建朋辈帮扶指导小组的工作模式，将边缘社交群体心理支持纳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思政目标，同时教师在课堂增设边缘群体关怀案例教学，课后进行学业帮扶与心理访谈，明确辅导员对社交边缘学生的动态化管理职责，定期组织朋辈与专业教师协同复盘会，记录边缘社交群体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并调整

支持策略。

3. 跨领域资源整合

学院相关负责人对接学校附属医院心理科、社区服务中心，建立“高校—医院—社区”协同网络，为边缘学生提供校内外社交锻炼机会（如校内院内组织的社区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医院心理健康服务观摩实践活动等），并由医院心理医师定期开展现场指导，同步引入专业心理干预资源，形成校园支持与社会实践支持双重实践路径。

（二）打造边缘群体心理教育全周期可持续实践模式

1. 线上线下双轨道干预

线下设立心理交互站，定期组织帮扶同学参与活动，如由朋辈志愿者协助完成校园活动项目筹备，引导其主动参与社交以提升社交与工作能力；搭建线上信息管理系统，方便朋辈志愿者、辅导员上传和保存其心理健康信息，助力信息及时反馈与上报；建立定期追踪机制，朋辈每周记录相关学生的社交参与次数、心理状态评分等客观数据，形成纵向数据链，支撑干预策略动态调整。

2. 多维度量化评估

学院相关部门制定三维评估体系：一是社交参与度，关注校内外各类社交场景的参与意愿与实际情况；二是心理症状改善情况，通过专业焦虑量表测评，以量表分数稳步下降为有效标准；三是校园实践协作能力，结合校园多情景项目模拟考核，以主动沟通次数较干预前增加为合格标准。每学期定期开展全面评估，结合朋辈记录、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形成报告，作为后续干预优化依据。

（三）多维度覆盖的边缘群体支持网络

1. 理论与实践融合支撑

朋辈指导小组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核心，结合高校育人特性构建干预框架：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中开设校园场景心理调适模块，教授学生运用积极心理暗示、压力管理等方法自我调节。将边缘群体心理教育与校园实践课程结合，在实训中设置小组协作强制环节，如多人一组共同完成校园实践项目模拟，并强制要求边缘学生担任小组负责人，同时朋辈志愿者可以担任辅助者，以实践其强化社交能力。

2. 全场景支持渗透

心理教育专业课程打破课堂单一授课传统模式，联动多方主体共同打造“宿舍—课堂—校园—社区”四维支持：一是宿舍内开展朋辈互助小课堂活动，共同协作完成学业任务；二是课堂上发挥边缘群体组长作用，强化其在课堂交流与协作中的主体地位；三是校园实践课中强化团体协作任务设计，强制其参与小组沟通；四是社区实践中安排边缘学生定期参与或组织义诊志愿服务，在与服务对象、同伴的互动协作中增强社交自信。

3. 初步尝试数字技术赋能

朋辈指导小组可以联动校外技术研发团队共同开发边缘群体社交支持软件小程序，其中可以设置三大功能模块：一是社交技能学习，提供校园场景沟通话术、团体活动参与技巧等线上学习视频，供学生随时学习；二是心理疏导音频，由专业心理教师录制，涵盖压力缓解、社交自信培养等内容，供学生自主使用；三是定期社交打卡，学生可记录每日社交行为，系统生成学习与心理疏导周报告，助力复盘成长。此外，运用社交网络分析技术，实时监测边缘学生的朋辈支持网络，如互动频次、协作深度等。

四、结语

高校边缘社交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被高度关注。目前，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朋辈帮扶心理育人体系，对提升这类人群的心理健康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创新性探索心理健康教育与德智体美劳教育相融合的育人机制，推动心理育人纳入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优化心理服务全流程，完善系统性整体性朋辈帮扶模式，形成具有高校特色、专业特征的心理育人品牌项目，以此全面提升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3-08-28)[2025-10-05].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2] 马宁 . 数字时代高校社交干预模式探索 . 高等教育研究 [J]. 2023, 44(03), 89-97.

[3] 陈正权 , 史成君 .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心理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J]. 陕西教育（高教）, 2024(09): 57-59.

[4] 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57.

[5] 尹霞云 , 符蝶 , 贺玲 , 等 . 应激下皮质醇反应在早期逆境与青少年执行功能间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科学 , 2025, 48(05): 1102-1112.

[6] Schwarzer R, Jerusalem M, Weinman J, et al. Generalized Self-Efficacy scal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5, 28(03): 352-360.

[7] 苏佳佳 , 叶浩生 . 神经多样性视域下的自闭症谱系障碍 [J]. 心理学探新 , 2025, 45(05): 404-410.

[8] 岳文静 , 李阿敏 , 胡凤英 , 等 . 脑卒中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及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J]. 中华保健医学杂志 , 2025, 27(06): 1007-1010.

[9] 范志光 , 付晓男 , 刘莎 . 自我污名对听力障碍大学生抑郁影响的追踪研究：自我效能感、（下转 266 页）

“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对高职学生心理韧性提升影响实证研究

谭文东 杨 黎 丁 丽 赵文斌

摘要：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以高职院校在读学生为研究对象，科学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结合标准化心理韧性量表前测和后测及多维度过程性评价体系，实证探究“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模式对高职学生心理韧性的干预效应。研究团队依托6个月的系统性班级建设实践开展追踪调查，结果表明，“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模式可显著提升高职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学生对该模式的参与度、认可度与心理韧性提升幅度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成果为高职院校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路径、深化班级管理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实践依据与理论参考，具备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高职学生；心理韧性；实证研究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培养兼具精湛技艺与健全人格的高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核心任务。高职学生处于从青少年向成年早期过渡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学业压力、人际关系、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竞争等多重挑战。这个过程中，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特别是应对逆境和压力的心理韧性，日益成为影响其成才与否的关键因素。然而，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多侧重于问题导向的咨询、干预，或者是脱离日常班集体建设的相对独立的心理健康活动，缺乏与学校日常整体育人体系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理念。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本研究立足于高职教育实际，探索构建“五育融合”模式下的班集体建设体系，并实证检验其对高职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效果。这不仅有助于拓宽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也为优化高职院校班级管理模式、落实“三全育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操作的实践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本研究的总目标是验证“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模式对提升高职学生心理韧性的有效性。具体目标和内容包括：构建并实施一套可操作的“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体系；探究高职学生心理韧性的内涵与影响因素；通过实验法实证检验该体系对学生心理韧性的实际影响程度；为高校提供理论依据和应用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五育融合”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探索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明确提出“更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标志着教育政策从强调“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的深化。武晓彬在其研究中提出，“五育融合”通过培育家国情怀、科学头脑、

（上接265页）

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021, 29(06): 1266−1270.

[10] 李静 . 心理委员人格特质与干预效果的关系研究 [J]. 心理学报 , 2022, 54(06): 689−701.

[11] 浙江大学团队 . 高校文化氛围对朋辈支持效果的影响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 2023(02): 81−88.

[12] 王红 . 高校朋辈心理服务的制度化路径探索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23(11): 45−48.

（作者：彭志凯，湖南中医药大学本科生；通信作者邹灵玥，湖南中医药大学讲师）

强健体魄、美学素养铸就学生健康心理[1]。这表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融合，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是全方位的。张小钢等在其研究中探讨了“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路径、强调了找准高校心育目标与五育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实现高校心育资源优化和校本特色体系构筑的重要性[2]。戴萍在其研究中分析了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的转变，并探讨了“五育”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理论可能[3]。陈思涵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融合”教学相结合的策略，并提出了增强教师“五育融合”意识的建议[4]。李娜在其研究中探讨了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融合”的教学实践，提出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关注体验式教学、基于德育活动提高实践能力等思路[5]。郭彦铎等通过研究发现，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压力水平较小、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状态较佳，但依旧有部分学生缺少明确的人生规划与就业规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心理韧性[6]。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五育融合”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聚焦以班集体为单位的“五育融合”研究或者聚焦“五育融合”与学生某方面心理素质提升相关性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班集体作为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基本单位，是落实“五育融合”理念、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天然场域。将“五育”系统地、创造性地融入班集体建设的全过程，不仅能够丰富班级管理的内涵，更能为提升学生心理韧性提供持续、多元的支持性环境。

（二）心理韧性的概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是个体在面对重大压力、逆境或创伤时，能够有效适应并恢复至良好心理状态，甚至获得成长的心理特质和能力。关于心理韧性的理论可以分为特质论和过程论。特质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Kobasa 的“坚韧性”理论，它的核心思想强调“坚韧人格”由三个“C”构成，分别是承诺、控制、挑战。过程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Masten 的“平凡魔法”理论，它强调心理韧性并非少数人才拥有的非凡特质，而是人类在正常发展中普遍具备的“平凡魔法”。心理韧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个体与环境中多种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一个静态的个人品质清单。

个人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乐观、情绪调节能力等；外在因素则涵盖家庭支持、学校环境、同伴关系和社会文化等。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环境，特别是与同学们朝夕相处的班集体，是其最主要的外部环境。一个组织有序、平等互助、充满发展机会的班集体，能够有效补充学生的内在保护因素，成为提升其心理韧性的关键外部资源。

（三）班集体建设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系

班集体不仅是教学管理的单元，更是学生社会交往、情感归属和人格塑造的重要场所。良好的班集体氛围被证实能显著降低学生的焦虑、抑郁水平，提升其归属感、自尊和应对困难的能力。传统的班集体建设可能偏重德育和智育，如纪律、学风等，而“五育融合”模式则通过系统性的设计，将体育、美育和劳育也纳入班级建设的核心框架，为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能力展示平台、成功体验机会和多元社会角色，这恰恰是培养学生的心理韧性切实有效的途径。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范围

本研究选取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024 级新生作为研究总体。通过随机抽样，确定专业性质、入学成绩、男女生比例相近的 4 个平行班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抛硬币法，随机确定 2 个班为实验组，选取 100 人作为实验组被试（N=100），另 2 个班为对照组，选取 100 人作为对照组被试（N=100）。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

（二）研究工具

采用 Connor-Davidson《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共 25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 从不，5= 总是），包含四个维度：控制（主要涉及情绪与生活控制，8 个条目）、承诺（主要涉及目标设定与坚持，6 个条目）、挑战（主要涉及风险承担与学习，5 个条目）、自信（主要涉及能力与人际自信，6 个条目）。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各维度 α 系数在 0.78~0.87 之间，信效度良好。

编制《五育融合班级建设认可度与参与度问卷》。自编问卷共有 22 题，用于实验组，调查学生对“五育”小组活动的兴趣、参与度、认可度评价，采用 5 级计分，另有 2 题开放式问题，询问学生的主观收获以及建议评价，作为质性资料进行搜集。

（三）研究程序与干预方案

前测阶段。在新生入学后一个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同时施测《心理韧性量表》（CD-RISC）。

干预实施阶段。针对实验组学生：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组织班级学生进行人格、职业兴趣测试，帮助学生自我认知与定位。在此基础上，按照“五育”内涵并在尊重学生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由学生自行成立德育小组群（团支书牵头）、智育小组群（学习委员牵头）、体育小组群（体育委员牵头）、美育小组群（文艺委员牵头）、劳育小组群（劳动委员牵头）。鼓励每位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特长至少加入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制定 6 个月的小组活动月计划，在学校范围内邀请专业相关的教师进行学习指导。

活动实施阶段。各小组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每月策划和实施主题活动，具体计划见表 1。

评价与反馈阶段。辅导员带领班级学生建立“五育积分”制度，对学生参与活动的表现、贡献进行记录和评价，形式包括自评、组内互评和全班共评等方式。

表 1 “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五育小组每月活动计划

月份	德育小组活动主题	智育小组活动主题	体育小组活动主题	美育小组活动主题	劳育小组活动主题
3 月	新学期·心动力	专业初探·兴趣启蒙	体能复苏·习惯养成	发现校园之美	美丽校园·从我做起
4 月	敬先烈·立宏志	技能入门·工具掌握	青春飞扬·团队竞技	笔尖上的韵律	创意生活·变废为宝
5 月	悦自我·善交往	学科竞赛·模拟体验	体测达标·科学健身	音符上的情感	创新思维初体验
6 月	守诚信·正考风	期末攻坚·互助学习	“减压式”运动	班级形象设计	专业技能服务日
7 月	识职业·塑品格	社会实践·知识应用	“云端”健身打卡	“家乡的风物”线上展	“家务达人”养成
8 月	感亲恩·践于行	技能提升·线上充电	户外探索·拥抱自然	“红色旋律”再创作	公益劳动 + 义卖活动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韧性的前测得分比较（M ± SD）

变量	实验组 (n=100)	对照组（n=100）	t 值	p 值
控制	24.85 ± 4.20	25.10 ± 4.45	−0.409	0.683
承诺	19.92 ± 3.35	20.18 ± 3.60	−0.529	0.589
挑战	16.45 ± 2.95	16.70 ± 3.15	−0.579	0.563
自信	21.20 ± 3.75	21.55 ± 3.95	−0.643	0.521
总分	82.42 ± 10.98	83.53 ± 11.86	−0.687	0.493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韧性后测得分比较（M ± SD）

变量	实验组（n=100）	对照组（n=100）	t 值	p 值
控制	28.65 ± 3.50	25.35 ± 4.30	5.952	0.000***
承诺	22.88 ± 2.85	20.45 ± 3.55	5.338	0.000***
挑战	19.15 ± 2.65	17.05 ± 3.10	5.149	0.000***
自信	24.75 ± 3.20	21.60 ± 3.85	6.292	0.000***
总分	95.43 ± 8.95	84.45 ± 11.25	7.638	0.000***

注：*p<0.05，**p<0.01，***p<0.001。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韧性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M ± SD）

组别	测量时间	控制	承诺	挑战	自信	总分
实验组 (n=100)	前测	24.85 ± 4.20	19.92 ± 3.35	16.45 ± 2.95	21.20 ± 3.75	82.42 ± 10.98
	后测	28.65 ± 3.50	22.88 ± 2.85	19.15 ± 2.65	24.75 ± 3.20	95.43 ± 8.95
	t 值	−9.125***	−10.234***	−8.765***	−9.876***	−14.567***
对照组 (n=100)	前测	25.10 ± 4.45	20.18 ± 3.60	16.70 ± 3.15	21.55 ± 3.95	83.53 ± 11.86
	后测	25.35 ± 4.30	20.45 ± 3.55	17.05 ± 3.10	21.60 ± 3.85	84.45 ± 11.25
	t 值	−0.587	−0.745	−1.124	−0.135	−0.892

注：*p<0.05，**p<0.01，***p<0.001。

每月评选班级“五育达人”，并推荐至院、校级参加“五育之星”评选。同时，通过班级微信群等渠道，向家长展示阶段性成果，获取家长的反馈与支持。

后测阶段。在第一学期结束时，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再次对两个组施测《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同时，对实验组发放《五育融合班级建设认可度与参与度问卷》。

数据收集与分析。采用 SPSS 26.0 对量化数据进行处理。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用于辅助解释量化结果。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同质性检验

对实验组（n=100）和对照组（n=100）的心理韧性前测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两组在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控制、承诺、挑战、自信）上的前测得分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在干预开始前，两组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处于同质状态，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二）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差异比较

经过一学期的干预后，对两组的后测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在心理韧性总分及控制、承诺、挑战、自信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极其显著地高于对照组（p<0.001）（见表 3）。这一结果初步表明，“五育融合”班建模式的干预措施对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

（三）实验组与对照组组内前后测得分比较

为更精确地评估干预效果，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后测得分在心理韧性总分及所有四个维度上均极其显著地高于其前测得分（p<0.001）（见表 4）。总分提升了约 13 分，增幅明显。对照组的后测得分与前测得分相比，在总分和各维度上虽有轻微上升（可能源于一学期的自然适应与成熟），但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5）。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实验组学生心理韧性的显著提升，主要归因于“五育融合”班建模式的干预，而非单纯的时间推移或自然成长因素。

（四）实验组“五育融合”班级建设认可度与心理韧性提升的相关分析

对实验组学生的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在《五育融合班级建设认可度与参与度问卷》中的活动参与频率得分（M=4.02，SD=0.65）和主观满意度得分（M=4.25，SD=0.58）与其心理韧性总分的增量（后测分 – 前测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参与频率与增量：r=0.531，p<0.001；主观满意度与增量：r=0.498，p<0.001）。这表明，学生越积极、越深入地参与“五育融合”班

级活动，对活动形式和内容越满意，其心理韧性的提升幅度就越大。

（五）质性资料分析

通过对参与“五育融合”小组活动的学生进行面对面访谈，课题组发现其在心理韧性五个维度上均有显著收获。研究表明，“五育融合”的实践场域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心理韧性锻炼机会，使其在应对不确定或者压力情境时展现出更强的适应与成长能力。学生在肯定“五育融合”模式的同时，也提出了宝贵建议：第一，希望活动形式更具交叉性，避免各小组各自为战，建议多设计需要“德智体美劳”小组共同完成的综合性项目。第二，建议评价体系更关注个体进步，而非单纯横向比较，让基础不同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就感。第三，活动时间安排需更灵活，避免与专业课复习高峰期冲突。第四，期待获得更多专业性指导，如建议学校邀请行业知名专家、校友参与创新创业指导，提升活动与未来职业的关联度。这些建议为“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后续优化提供了重要方向。

五、讨论

（一）“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对心理韧性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证实，“五育融合”班建模式通过四大心理机制有效提升学生心理韧性：赋予学生自主权，通过策划活动增强控制感与行动力；设置阶段性目标，借助积分与评选机制培养学生承诺感与坚持力；提供多元成功体验，鼓励学生接受挑战并将挑战视为成长机遇；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帮助学生在认可中提升自我效能感与自信心。

（二）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五育融合”这一宏观教育理念与微观的班集体建设实践相结合，并建立了其与学生成才的关键心理品质——心理韧性之间的实证联系，极大丰富了“五育融合”的理论内涵和应用范畴。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供了一套具体、可复制、可推广的“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操作方案。它证明了通过优化班级这一学校基本教育单元，可以切实有效地实现立德树人与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有机统一，为高职院校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可借鉴范式。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对象仅限于一所院校的一年级学生，样本的代表性和推广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其次，干预和观察时间仅为6个月，心理韧性的长期效果有待追踪研究；最后，本研究主要关注了整体效果，对于不同特质学生的影响差异有待深入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不同学校之间的样本范围和追踪时间，深入探讨“五育”中不同“育”对心理韧性的贡献度差异，并进一步优化干预策略，使其更具个性化。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准实验设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本研究构建的“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体系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学生认可度。“五育融合”班集体建设模式能够显著提升高职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该模式在控制、承诺、挑战、自信四个维度的提升效果均显著优于常规班级管理模式。学生对“五育融合”活动的参与度和认可度与其心理韧性的提升程度呈正相关。

（二）教育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在学校领导层面：应高度重视班集体在育人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倡导和推动“五育融合”的班级管理理念，为辅导员和班主任提供相关的培训与专业指导教师、校外行业专家等资源支持。在辅导员、班主任层面：应主动转变角色，从传统的管理者转变为班级育人生态的构建者和引导者，结合所带班级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实施“五育融合”建设，激发每一位学生的潜能与学习、提升的自主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层面：应主动与班级管理工作相结合，将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的目标融入日常的班级活动中，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全员化、全程化、全方位化”。

参考文献

[1] 武晓彬 .“五育”融合为心理健康教育赋能 [J]. 河北教育 (德育版), 2023, 61(Z1): 18−19.

[2] 俞国良 , 何妍 .“德智体美劳”五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 2023(01): 4−10.

[3] 赵倩 , 王鑫 .“五育”并举视阈下高校构建多元资助育人模式的实践研究 [J]. 才智 , 2024(06): 165−168.

[4] 马畅 .“五育”并举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策略分析 [J]. 才智 , 2024(06): 113−116.

[5] 阮灵惠 .“五育”并举视角下高中心理课堂教学实践 [J]. 教书育人 , 2024(05): 78−80.

[6] 郭彦铎 , 周杨 . 高职生心理韧性、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J]. 品位・经典 , 2024(17): 33−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项）“‘五育融合’班级建设对高职学生心理韧性提升影响实证研究”（2024gxxl006）。

（作者：谭文东、杨黎，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丁丽、赵文斌，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研究与实践

姚　梅

摘要：本文聚焦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展开研究与实践，探讨数字技术在精准采集数据、智能分析等方面的优势，为增值性评价提供有力支撑的可行性。界定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维度，明确增值性评价内容与方法，提出数字化采集设想。充分利用各类在线平台收集数据，构建“1+3+5+N”实践机制，以一个中枢、三层架构、五大闭环、N 个应用，实现了数据全周期的有效管理与利用。此外，拓展家校合作、校企协作评价维度，整合多方资源，形成评价合力。通过研究与实践，旨在为高职心理健康素养评价提供新路径，提升评价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赋能；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

心理健康素养是通过教育和学习获得的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要素，也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资源基础[1]。如何检验学生在学校心理健康素养方面的增值，即学生在通过系统化的学习之后心理知识、态度与行为提升的“净效应”，是衡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有效性的指标。本文基于增值性评价理论视角，充分融入数字赋能理念，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一套适用于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体系。该体系涵盖学生的心理认知、情感态度、行为表现等多个方面，建立动态追踪机制，利用数字化工具实时收集学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健康数据，实现对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发展的全程跟踪和精准分析。通过数字赋能，提升评价的精准性、及时性和全面性，以期为提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和实践效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推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数字化发展。

一、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的可行性

（一）政策导向为评价体系革新提供明确指引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教育评价定位为教育发展的核心引擎，强调其对校准教育方向的关键作用。方案提出的“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2]四位一体改革路径，为构建新型教育评价体系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同时强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这一政策导向不仅凸显了增值性评价在摆脱传统评价困境中的独特价值，更通过顶层设计为数字技术赋能评价体系创新开辟了政策通道。

（二）数字技术为评价数据采集提供精准支撑

在工业 4.0 与教育信息化 2.0 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赋能已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驱动力。如何以数字化赋能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用数字技术引领新时代学校心理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成为教育学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亟须思考的关键问题[3]。高职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评价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具有特殊紧迫性。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可实现对学生心理健康数据的全周期、多维度采集：既包括线上心理咨询记录、心理健康测评软件生成的量化数据，也涵盖社交媒体行为、学习平台互动等非结构化数据。这种立体化数据采集模式，有效突破了传统评价在时空覆盖、数据类型、分析深度等方面的局限，为构建动态化、精准化的增值性评价体系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增值评价契合高职学生发展特性需求

高职学生群体具有入学基础差异显著、职业迁移能力要求高、个性化发展需求强烈等特征。传统静态评价模式难以准确衡量教育过程对学生综合素养提升的实际贡献，而增值性评价通过建立“入学基准—过程发展—毕业成效”的纵向追踪机制，能够科学解析教育投入与学生能力增长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心理健康素养领域，增值评价可动态监测学生在压力应对、情绪管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能力提升轨迹，精准识别不同培养路径的干预效果，为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这种评价范式与高职教育质量

监测需求高度契合。

二、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的主要困境

（一）技术难度大

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高度依赖对学生相关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这一过程涉及诸多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构成了显著的技术难度困境。一是数字化工具普及难，心理评测软件、虚拟现实（VR）技术等数字化工具在心理健康素养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提供丰富、直观的数据支持。然而，部分院校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对这些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滞后。二是数字化资料存储难。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长，如何安全、稳定地存储这些数据成为关键。一些高职院校由于技术设施有限，数据存储系统可能存在漏洞，无法有效抵御各种安全威胁，导致数据泄露或损坏。三是数字化资料分析难。部分院校由于技术限制，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工具和算法，无法精准地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出与心理健康素养评价相关的有效数据。这不仅增加了数据处理的负担，还可能导致无关数据的干扰，进而增加学生隐私泄露的风险。

（二）评价指标界定不统一

目前，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核心评价指标缺乏统一标准，这给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带来了严重阻碍。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之间在心理健康素养评价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足，也导致评价的指标界定缺乏统一性。各院校和专业往往根据自身的理解和需求，独立开展评价工作，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这使得不同院校之间的评价结果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和分析，无法形成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评价结论，不利于高职心理健康素养评价体系的整体发展和完善。

（三）评价方法不完善

在评价方法方面，单一化现象突出。部分院校仅依赖问卷调查或在线测试等传统方法开展评价工作，忽视了实践场景中的动态评估。问卷调查和在线测试虽然能够获取学生的一些基本信息和主观感受，但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此外，现有评价方法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也存在不足。对于数字赋能所提供的大量多源数据，缺乏有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难以挖掘数据背后的潜在信息和规律。

三、数字赋能高职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实践

（一）指标界定，奠定数字赋能理论基础

江光荣等（2020）通过研究，将心理健康素养界定为：个体在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应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疾病方面所养成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习惯[4]。这一概念包含“心理疾病应对与心理健康促进”和“自我与他人”两个维度。本研究以这一概念界定为基础，创建以下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增值评价内容、方法与数字化框架，详见表1。

表1 数字赋能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框架

维度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数字化采集源
自助	知识	自我心理健康知识识别	课程知识测验；学习通理论学习情况	学习通后台数据统计
		自我心理疾病知识识别	课程检测；心理健康程度基线测评	心理测评系统数据；学习通后台动态数据
	态度	自我病耻感	问卷调查；文本情感分析	AI实践案例分析内容数据；网络问卷数据
		求助意愿	主动求助解决心理困扰的次数	课程AI咨询统计；咨询中心线上及线下咨询人数统计
	行为	情绪问题识别、监控与调节	问卷调查；师生座谈；心理委员月报表情况	教师生成数据化结果
		实际求助行为	预约心理辅导次数；咨询中心线上及线下咨询人数统计	QQ、微信公众号及学习通后台咨询数据
		健康生活方式	学校相应活动打卡数据；问卷调查	第二课堂后台数据；在线问卷结果
助人	知识	他人心理危机信号知识	课程知识测验	期末成绩数据；学习通平台AI实践数据
		心理危机干预步骤	培训效果检测数据；互动调查	教师生成数据化结果
	态度	对他人心理状况敏感度	课堂讨论调查；AI实践案例分析情况	学习通数据
		助人意愿	课堂调查	问卷调查数据化结果
	行为	同伴支持行为	学习通在线平台讨论，点赞/安慰性回复次数	学习通数据
		心理危机转介	心理委员月报表记录；平台“一键转介”记录	相应平台数据化结果
		心理知识宣传	心理微视频录制；心理科普知识点击阅读数	教师生成数据化结果，学校公共平台数据

（二）平台搭建，构建数字赋能实践机制

根据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核心指标内容的界定，结合学校现有数字化平台，构建“1+3+5+N”模型，推动数据赋能高职心理健康增值监测与育人精准干预。

“1个中枢”即心理健康数据中台，作为平台的“大脑”，该中台承担着原始数据标准化、实时化与价值化的重任。数据接入层广泛对接“学习通”、第二课堂等多个校内系统及终端，实现数据全面汇聚。数据治理层依据心理健康核心素养标准，统一学生账号，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形成学生画像。画像引擎实时输出多种可视化图表，为精准干预提供依据。

“3层架构”即教学层、管理层、服务层全方位对接，使评价融入全流程。教学层聚焦课堂，通过学习通插件、知识图谱和错题增值算法，计算课堂即时增值分，低于阈值自动推送AI微课补差，实现个性化

教学。管理层依托数据中台和第二课堂学分链，生成学期增值报告，将心理素养增值可视化。服务层利用心理委员、室长、专职心理教师上报数据的统计预警模型，当学生“自助——求助”行为转化率异常时，自动创建危机干预工单，实现协同干预。

“5 大闭环”即数据采集闭环、分析闭环、反馈闭环、改进闭环、评价闭环。采集闭环即后台采集学校现有 App 数据，实现“无感采集”，保证数据完整准确。分析闭环采用“增量 + 实时”双通道，实时生成增值报告、预警心理危机风险词。反馈闭环针对学生和教师端分别推送成长信息与风险预警，实现精准反馈。改进闭环内置系统根据画像自动匹配干预措施，并将完成率纳入增值计算。评价闭环引入“证据导向”评价，每条结论可溯源到原始数据片段，支持人工复核，确保结果可信、可解释、可审计。

“N 个应用”针对不同场景，让数据活起来。AI 心理机器人 24 小时提供文字和语音倾诉服务，自动提取“求助意愿强度指数”，纳入态度评价。智慧校园系统结合食堂消费与运动打卡数据，构建了生活方式健康度模型。第二课堂心理类活动的报名及完成情况数据，监测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及行为指标。心理微视频大赛通过校内公众号及课堂展播，将点赞量、完播率、课堂评分数据转化为“心理知识宣传影响力”，计入助人行为增值。班级心理委员使用 QQ、微信等多平台“一键转介”，转介记录实时上链，生成“助人”评价增值数据。

（三）多方协作，拓展数据赋能评价维度

在数字赋能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体系中，家校合作与校企合作是拓展评价维度、提升育人成效的关键环节。

家校合作方面，依托心理健康数据中台搭建家校沟通专属通道。家长通过专属账号登录平台，可实时查看孩子的心理健康画像、学期成长报告等关键信息。平台定期向家长推送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内容，提升家长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认知与应对能力。当学生出现心理危机预警时，系统自动向家长发送短信提醒，并同步推送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建议，如亲子沟通技巧、家庭氛围营造方法等。同时，家长可以在平台上反馈学生在家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形成家校双向信息流动，为精准干预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创新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改革的迫切要求[5]。校企协作聚焦于学生在实习企业的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知识应用的数据监测与增值性评价。学校与企业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企业通过专属接口将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心理测评数据、工作表现数据、团队协作数据等接入心理健康数据中台。利用数据分析闭环，实时生成学生在实习场景下的心理增值报告，评估其心理健康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效果。当学生在实习中出现心理波动或行为异常时，企业应及时上报，学校与企业协同制定干预方案，如调整实习岗位、提供职业心理辅导等。此外，通过对比学生在校与实习期间的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数据，总结校企合作育人经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学生在心理素养与职业能力上的双重提升，真正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体系。

四、结语

本文探讨数字技术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的赋能作用，提出并构建了“1+3+5+N”创新机制，进一步扩大学校、家庭与企业三方协同育人的覆盖面。借助数字赋能的“增值性评价”，教师能更有效地改进教育方法，推动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自助”与“助人”能力的精准量化与直观呈现，助力其成长轨迹的可视化。展望未来，数字赋能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虽前景光明，但仍面临多重挑战。教师、家长及企业间的配合程度可能参差不齐，影响协同育人效果；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数据复杂度的增加也对分析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携手应对挑战，以不断完善这一创新机制。

参考文献

[1] 纪橡梓 .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增值性评价体系构建 [J]. 教育观察 , 2025, 14(08): 7−10.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N]. 人民日报 , 2020−10−14(01).

[3] 俞国良 , 张哲 . 数字技术赋能学校心理健康服务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 2023, 44(01): 19−29.

[4] 江光荣 , 赵春晓 , 韦辉 , 等 . 心理健康素养 : 内涵、测量与新概念框架 [J]. 心理科学 , 2020(01): 232−238.

[5] 郝江英 .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提升路径分析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 2024(09): 44−4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内江思想政治建设研究中心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增值性评价体系建构研究”（NJSZC2524）。

（作者系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观塑造研究

夏　灿

摘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然而，随着网络与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清晰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观现状，本研究运用访谈调查法，对川渝两所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进行了结构性访谈，经过整理与研究，探讨他们在消费、人生与职业价值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学校教育的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第二课堂以及网络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选择；价值观

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电子设备、娱乐设施日渐增多，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观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教育部发布的《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 年全国高职院校共 1562 所，高职（专科）毕业生 540.43 万人[1]。近几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人数均超过 500 万人。大学阶段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且在信息化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高职院校大学生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技能技术人才，更要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选择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超支、超前消费较为常见

现阶段，超支和超前消费情况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奉行“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一方面，大学生的消费已超出基本生活范畴，除了必要的饮食消费外，娱乐、美妆、电子产品、人情往来、旅游等方面的支出占比呈上升趋势[2]，大学生还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产生跟风消费行为，这些往往会催生出超预算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对自身消费缺乏规划意识，没有记账、制定消费预算的习惯。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超支、超前消费是有消极影响的。大部分大学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产生超前消费，会过度依赖超前消费工具，容易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这会让大学生们背负沉重的债务，严重的还可能影响个人征信。

（二）勤俭节约美德受影响，浪费性消费增加

勤俭节约这一美德在部分大学生中被弱化，与之相对的浪费性消费逐渐攀升。一方面，在“及时行乐”“爱你老已”等流行语的引导下，跟风入手的服饰、美妆产品，因不符合自身需求而被闲置一旁，这种盲目消费行为会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社交场景中的面子消费同样也催生了大量浪费现象。在社交活动中，部分大学生为了面子，往往消费水平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此外，消费方式的便捷也间接助长了浪费行为。网购的普及让消费变得更加便捷，一键下单的操作容易让购物缺乏深思熟虑，仅凭一时兴起就下单，收到商品后不满意就退货，这一过程造成了物流资源的浪费，增加了商品的损耗率。浪费性消费的增加，不仅会加重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也与绿色、低碳的社会发展理念相悖。

（三）网络娱乐消费增多，追星现象较为普遍

直播、网络游戏、在线影音等线上娱乐产品精准契合了大学生的碎片化休闲需求。不少大学生表示网游能使自己暂时逃离现实，放松心情，但可能会让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导致网络娱乐消费的增多。不少大学生为提升游戏体验而投入不少资金，也会为短视频平台的打赏功能、在线视频平台的会员权益买单。这些消费行为看似单笔金额不高，但长期累积下来，也会成为大学生日常开支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另外，追星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愈发普遍。不少大学生表示，为了支持偶像，他们会购买偶像代言的商品，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即便票价高昂也会参与偶像演唱会、粉

丝见面会。这种消费的模式，让追星变成一种需要持续投入资金的行为。在网络娱乐消费和追星上投入过多金钱和精力，可能挤压学习时间、加重经济负担。

（四）部分大学生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明确的职业规划对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目前部分大学生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这一现象影响着学生个人的职业发展路径。高职教育的学制以三年为主，相较于本科院校时间更紧凑，部分学生将重心放在完成学业、获取毕业证和技能证书上，却忽略了制定分阶段的职业发展计划。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会让高职院校大学生在求职时陷入被动选择的困境，即便顺利就业，也可能因岗位与自身能力、期望不匹配而频繁变动，既浪费了院校的培养资源，也不利于个人职业技能提升。

二、影响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选择的因素

（一）客观因素

一是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对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大中小学校通过开设思政课，加上校园文化的熏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但当前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着形式单一、内容固化、方式传统落后、针对性不强的问题[3]。很多学生表示对思政课没有兴趣，甚至有部分学生觉得思政课就是在进行说教，对思政课有逆反心理，这样的思政教育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高职院校，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各大高校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转变思维，创新思政教育的方式，让知识进入学生头脑之中，引导其付诸实践。

二是家庭教育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4]在年少时期，父母、长辈的价值观，可以说能够直接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如果家风清正、父母长辈勤俭节约、甘于奉献，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也是如此。进入大学之后，家庭教育依旧会对大学生的价值选择起到影响。良好的家风建设，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与职业价值观。

三是社会舆论方面。互联网的普及，让网络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但是，网络上存在着许多错误的信息或思想，还有一些未被及时清理的谣言和过激言论，这些都会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例如，有些博主会采用给受众制造心理压力的方式来博取认同，近几年在网络上一直流行的“焦虑文”，向大学生传播就业压力大的信息，以此增加自己的流量。这类网络舆情可能会影响大学生对人生与职业价值的正确认知。加之受国外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可能会冲击大学生的现有价值观，削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导致思想混乱。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他们使用网络与手机的频率较其他群体来说更高，加之刚成年，信息甄别能力还不够，极易受到一些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这些思潮的影响，加强文化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二）主观因素

大学生自我教育意识不够，没有认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部分大学生在价值观自我教育方面缺乏主动性。一方面，部分大学生没有真正认识到价值观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不仅影响大学生自身发展，更影响着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运用正确价值观来指导实践的主动性还存在不足。大学生初入社会，很多事情需要自己独立做出选择，如果不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自己，在面对矛盾与困惑时，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学生容易受到电子产品的诱惑。大学处于一个成长、走向独立、逐渐探索自我的阶段，家长和老师不再会时时刻刻都关注到学生，这就让很多大学生觉得脱离了父母与老师的管教，能够自己安排时间，其中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就尤其明显。过度依赖电子产品或使用不当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分散注意力、影响学习效率，甚至影响身体健康。

三、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实践路径

（一）发挥思政课程主渠道作用

要从育人的角度充分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在思政课程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富裕等重要论述，为高职院校大学生消费观念塑造提供了指导。例如，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讲解，能够推动高职生树立低碳节约的消费意识；通过解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可让学生认识到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与生态息息相关，从而自觉践行按需购买、物尽其用的消费准则；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也能引导高职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明白消费需量力而行，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在课堂上讲解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含义，能够让学生学会客观分析自身经济条件与成长需求，区分刚需消费与欲望消费，可有效避免陷入入不敷出的消费困境，引导学生立足自身实际规划消费；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通过学习共产党人在艰苦条件下攻坚克难的历史事迹，能够让高职生深刻理解艰苦奋斗不是自讨苦吃，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从而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消费中坚守务实、节俭的底线。

思政课程中强调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与他人的贡献、服务人民，可以通过榜样的案例来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培养他们的人生与职业价值观。例如，让

学生了解张桂梅的生平、讲述黄文秀的事迹等，在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中帮助大学生塑造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观与爱岗敬业的职业价值观。

（二）挖掘课程思政中的价值观教育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5]，各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在专业课教学中塑造大学生价值观。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人生与职业价值观教育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教师应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专业精神和道德行为，为学生树立榜样，教师自身行为应该体现公正、诚信、尊重学生，体现职业操守，为学生树立榜样。在教学工作中，教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以及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针对不同的专业与课程，价值观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是不同的。护理专业，可以讲述诺尔曼·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到中国并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事迹；农学专业，可以讲述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教育类专业，在课堂上可以讲述张桂梅、刘玲琍等人的事迹，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职业观。还可以通过安排学生参与实习、实训、社会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践行。通过这些实践项目，在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

（三）结合第二课堂丰富价值观教育的形式

学校教育除了第一课堂之外，第二课堂形式丰富多样，也是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渠道。各大高职院校可以在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校园文化中进行价值观教育：开展与价值观教育相关的校园活动，如在每年的 5 月 14 日开展学习"焦裕禄精神"活动，引导学生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树立奉献精神；通过组织到敬老院、社区等地开展志愿服务的方式，开辟实践育人的新路径；也可以在校园中设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国工匠等有关的标语、人物图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消费观与人生职业价值观。

（四）利用网络教育拓展价值观教育平台

网络教育又称线上教育，扩大了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人数，是线下教育的补充形式。价值观教育要抓住网络教育这个关键，拓展教育空间。

建设专门的价值观网络教育平台。高职院校之间可以相互合作，也可以与社会合作，利用先进技术形成一个系统的教学体系。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价值观教育；同时通过网络，为学生推送正确的价值观信息。

充分利用校园媒介资源。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开设专门的价值观相关栏目，定期为大学生讲述优秀人物案例，在丰富校园广播内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许多高职院校都有自办电视台或校园频道，可以开辟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新闻专栏，挖掘本校大学生的优秀事迹与案例，引导其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研究不仅对大学生非常重要，对整个社会和国家都有重要意义。对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工作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形成上下协调、左右协同的格局，才能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5−06−11)[2026−01−09]. https://hudong.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

[2] 程生垚 . 当前大学生消费现状研究及建议 [J]. 中国经贸导刊 , 2024(12): 181−183.

[3] 谭培文 , 邝文聪 .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应用研究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2024, 40(02): 161−168.

[4] 习近平 .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 2016−12−16(02).

[5]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求是 , 2020(17): 4−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泸州市社科应用研究提质工程研究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项课题"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及价值观塑造研究"（LZZXA42）。

（作者系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助教）

经济理性视角下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许敬晗

摘要：随着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消费平台的普及，大学生群体的超前消费现象日益突出。本研究以经济理性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的现状特征，探讨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研究发现，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受消费主义文化、心理需求驱动和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个人层面、群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三维社会工作介入框架，为促进大学生理性消费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超前消费；经济理性；社会工作介入

超前消费即个体的消费行为超越了其当前的收入水平。超前消费常常通过透支未来的收入或借贷来满足自身当下的消费需求[1]。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大学生也逐渐成为其主要用户。近年来，超过六成的大学生使用过消费信用产品，超前消费中甚至不乏过度借贷和不理性的消费现象，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和心理状态，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并引发一定的潜在社会危机[2]。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一个“理性消费者”是限制其消费行为在预算约束条件之下获得最大效用，而超前消费常常背离这一原则。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全面描述大学生超前消费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从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深刻剖析。社会工作的立足点在于人，能够从多层次理解大学生超前消费的困境，因此也就能够给出相关的解困方案。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现象的调研，了解超前消费行为的客观现实特征，并通过对影响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的多种因素的具体分析，构建科学且可行的大学生消费行为介入方法体系。

一、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现状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在 5 所教育层次不同的大学学生群体中抽取了 1200 人作为研究样本，共收回有效问卷 1089 份，有效率为 90.75%。其中，调查问卷涉及调查对象、消费收入与能力、消费贷款情况、消费动机与态度等方面。男性占 47.3%，女性占 52.7%。大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比例较为均衡。

（二）超前消费行为的普遍性特征

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中有 68.4% 的人存在超前消费行为，其中有 23.7% 的人属于频繁消费。在超前消费的过程中，有 50% 左右的学生使用过诸如蚂蚁花呗、蚂蚁借呗、京东白条等网络消费贷款功能，18.6% 的学生选择同时使用多种消费贷款金融服务。从月均消费来看，41.3% 的学生每月消费 1500 元以上，月消费 2500 元以上的占 12.8%，消费金额远远超过同期大学生的正常消费水平。其消费结构主要集中于数码消费（64.7%）、服饰消费（58.3%）、社交消费（45.9%）和美发美容（37.2%）等方面。

（三）超前消费行为的群体差异

分性别来看，女生的美妆服饰类提前消费占比高于男生，电子科技类、游戏类的提前消费集中在男生；分年级看，提前消费最高的是大二和大三学生，各占 72.1% 和 74.6%，大一和大四消费比较集中；分家庭经济状况来看，中等收入家庭有 71.8% 的消费者选择提前消费，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比例略低；分专业看，管理类相关专业更容易接受消费贷款，但专业为理科类的学生在电子设备上提前消费意愿更强。

（四）超前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

调查发现，超前消费给大学生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高达 38.9% 的大学生面临着还债的压力，25.4% 的学生有寻求父母或朋友帮助解决的打算。从心理层面看，接近 50% 的大学生因借款产生了心理压力，部分学生出现睡眠质量下降、消极情绪等情况，甚至申请退学。从学术层面上看，近 40.0% 的学生承认超前消费对其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干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还债压力而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兼职，在学习上松懈。从社交层面来看，有 15.2% 的大学生表示因为借钱与自己的家人、朋友等出现过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的超前消费已经严重威胁到其

全面发展，一定要采取有效手段进行规范。

二、大学生超前消费行为的原因分析

（一）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与符号消费的驱动

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文化日渐流行，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已不再囿于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用来呈现自我身份符号并获得认可的一种标识[3]。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自我认同建构的时期，更易于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奢侈品与流行产品的标签通过社交网络的作用被提升为“成就”“时髦”“高品质生活的象征”，为了获得某种形象，让同伴羡慕和社会接受，许多大学生购买高价品牌产品，在消费中摒弃理性的思考，寻求象征性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

网络销售平台便捷的推广方式和明星代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消费心理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人为创造的需求”通过挖掘消费者的购买记录并给消费者推荐个性化产品的方式产生，如限时折扣、满额赠送等促销方式让消费者产生缺货、急切购买的心理。另外，一些社交圈里的“开箱”“晒单”也形成了“大家都在消费，不消费就会被淘汰”的社会氛围，使学生受从众的影响和裹挟进入提前消费的行列。

（二）心理需求补偿与情绪消费机制

从心理方面来看，过度超前消费往往会被大学生界定为满足内心深层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替代消费行为。一部分大学生出身于普通家庭，成长过程中物质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进入大学后倾向于用消费弥补过去的缺憾。这是“补偿心态”，尽管他们存在经济困难，但依然不惜代价去追求高消费以换取内心平静。一些学生用消费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当他们学习、同学关系出现问题时，就选择购买物品来平息不安的心情。通过对大学生购物场景进行调研发现，将近一半的大学生会在难过、担心或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出现冲动购物的现象。消费者在买东西的过程中，会释放多巴胺，让人产生幸福感，消费者此时将购物作为一种解燃眉之急的方式，但是这种快感是非常短暂的，之后留下的就是购物造成较大财务压力引发的“痛感”，由此会导致消费者出现一种“消费—快乐—痛苦—消费”的恶性循环。

（三）社会支持系统缺失与外部监管不够

从社会环境层面分析，大学生超前消费问题的加剧与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密切相关[4]。一方面，从家庭教育方面来看，许多家长未意识到对学生进行金融教育的重要性，仅仅提供孩子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费，却不去教孩子如何理性使用金钱和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另一方面，因为家长自身的透支消费行为，潜移默化地对孩子的消费观产生影响。大学教育环节通常缺少财经素质教学这一系统内容，学生主体主要依靠自身摸索或者与他人交流了解有关经济方面的知识，这一途径并不能有效保证人们的行为正确。

另外，社会的约束与保障机制不完善，也使过度消费有了可能性。网络贷款平台将大学生群体的征信标准放得比较低，部分贷款公司还会主动提供借贷的服务。网络贷款产品也缺少信息的公开，在利息的计算上比较复杂，难以满足学生准确估算所需费用的要求。校园贷款整治后，部分非正规网络贷款公司选择更加隐秘地运作。这些综合因素诱导大学生过度消费，但对大学生的支持与保护显得相对不足。

三、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一）个体层面：提升财务素养与自我管理能力

针对大学生个体，社会工作者可运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方法，提升其金融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其一是开展金融教育活动，让学生全面了解预算规划是什么，如何使用存款和贷款类产品，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一环节重在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合理的财富观及消费观。同时，为了提升教学的可操作性和参与度，可采用模拟理财活动或例证教学的方式。其二是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财经指导，社工通过倾听、共情等技巧充分了解学生的消费习惯、生活需要，并为之出谋划策，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活费用规划，并不断跟进了解实施情况。

对于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的大学生，社工应采用急诊式介入策略，采用个案工作的方法对其个人债务、精神状态及拥有的资源进行分析，在同其债主协商还款计划后，如有需要还可联系其所在的学院或其家人，提供必要的财务帮助。同时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学技巧，指导大学生识别和矫正不正确的消费观念，如“只要购买了新手机我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等，通过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提升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减少冲动型消费。建立同病相怜的支持小组，鼓励具有相似经历的学生相互倾诉和监督，在小组中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

（二）群体层面：营造理性消费的校园文化氛围

在群体层面，社工可以助力营造校园文化，为形成正确合理的消费氛围创造条件。第一，开展有针对性的系列活动，如“理性消费月”“财务健康周”，并采取多样化的形式传播正确的消费观，如演讲、展览、比赛等；还可以邀请专业的金融人士或成功校友向学生讲授科学理财方式和人生哲理，做学生的榜样；制作生动形象的趣味性宣传资料，如视频、图片、H5网页等，并广泛运用在校园媒体中，扩大影响，扩大受众面。第二，转变学校内互比型的消费风气，社会工作者配合学工部门开展“简易生活 PK 挑战赛”“旧货回收站”“物品交换”等活动，倡导绿色消费生活，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在消费生活中践行理性消费，在学生中产生舆论和行为的示范效应。在学校内部小型社群中，组织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研讨会，引导学生认识到消费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可只以消费的物质来

衡量自身的价值。第三，社工可以协助建立“校园理性消费大使”或“朋辈财务辅导员”制度，从各院系选拔具有良好消费习惯且乐于助人的学生，经过系统培训后，他们可以在宿舍、班级或社团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将理性消费理念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日常交往之中，形成健康的校园风尚。

（三）组织层面：完善学校的预防与支持机制

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场域，要构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超前消费预防及预警体系。高校社团社工要共同推动高校将金融知识纳入学历教育的大框架中，开设必修课程或者选修课程，以确保全体学生都能接受完整的财经教育，这些课程应当涵盖经济学常识、个人财务管理、消费心理等方面，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备课；还应当建立学生财务健康数据库，对新入学的大学生进行消费意识和投资能力测评，筛选出有可能步入高危行列的人群并进行针对性辅导。

成立由学工部、校心理咨询中心、社会工作站等多部门人员组成的跨部门服务组织，定期监督学生是否有过度消费的情况，对于出现过度消费的学生，第一时间为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帮助。成立学生金融咨询室，并配备专职的社工人员和财务专家，无偿为学生提供理财、借贷贷款知识等方面的咨询。此外，必须规范校园商业秩序，治理校园高利贷广告，对于学生借款签约协议等行为进行监管。学校还应建立“财务危机预警与应急响应系统”，由社会工作站牵头，联动辅导员、班主任和宿管人员，通过日常观察、消费异常报告及时识别高风险学生。一旦触发预警，社工应在 24 小时内启动“一对一谈心评估”，并与家长、金融机构进行沟通，制定债务重组和心理干预同步进行的综合性方案，从根本上构建起校园内部的财务安全网。

（四）社会层面：推动政策倡导与资源链接

在社会层面，社会工作者应发挥政策倡导和建议作用，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5]。呼吁政府出台对网络消费贷款公司更加严格的管理手段，要求网络借贷公司为学生服务的行为应开展严格的风险评估和信息告知，并明令禁止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引诱式销售和强制性还款等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将进一步加强将金融理财知识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中，从小培养青少年的金钱观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

社会工作者应积极主动挖掘相关社会资源，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针对大学生的低利率理财产品和理财素养课程，与慈善团体及志愿者联系为培育大学生财经素养提供师资力量和课堂资源，与企业合作制定实习计划并让受训学生通过劳动获取薪酬，体会到“用劳动换取财富”的重要价值，与媒体机构合作推出财经素养内容，将理智消费的理念广泛传播，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同时，社工在更宏观的层面应该倡导建立全国性的大学生金融投诉与援助热线，为遭遇非法网贷或暴力催收的学生提供及时的法律支持和心理救助，从而形成覆盖全面、响应迅速的社会支持网络。

四、结语

大学生过度消费是一种新兴的社会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由多重复杂的社会因素造成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提前消费违背理性消费原则，反映了大学生缺乏金融知识理解能力和情绪控制、社交支持问题。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助人服务，能够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针对不同层面的成因制定系统化的介入策略。“预防先行、辅助介入、基础支持”便是本文提出的对大学生过度消费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案，通过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各方协作，建立共同保障、多元共益的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 张丁哲，孙朋超．电子商务平台大学生消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研究 [J]. 电子商务评论，2025, 14(08): 458−464.

[2] 严云鹤，梁西雅．社会工作提升大学生金融能力的干预研究 [J].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24, 24(01): 1−7.

[3] 董若渔，沈佳仪，沈颖，等．金融社会工作视角下大学生金融素养提升方法研究——以某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为例 [J]. 数字化用户，2023, 29(11): 266−268.

[4] 罗丹．电子商务环境下大学生的过度消费行为以及学校社会工作介入 [J]. 电子商务评论，2024, 13(04): 3061−3066.

[5] 吴量．金融社会工作视角下大学生消费风险防范研究 [C]// 四川劳动保障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劳动保障研究会议论文集（十五）.[出版者不详], 2022: 46−48.

（作者系西南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

倡节俭之风 守消费本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双循环”培育机制研究

潘　毅 李向燕

摘要：在时代发展与文化传承的交汇点上，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面临新要求与新挑战。本文立足文化育人与积极心理学交叉视角，挖掘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内在契合点，构建“内循环＋外循环”的“双循环”培育机制，厘清“文化认同—心理内化—品质生成”的内循环逻辑，以及“环境浸润—行为外化—社会强化”的外循环逻辑，探究“双循环”培育机制的协同关系，并从资源挖掘、环境创设、场景拓展、评价构建四方面提出落地策略，为高校本土化、长效化心理育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双循环

大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与心理成熟的关键阶段，面对多元文化冲击与多重现实压力，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成为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修身智慧与精神内核，是涵养个体健康心理、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积极心理教育深度融合，契合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贴合青年群体心理发展的实际需求。立足文化传承与心理培育的双重目标，梳理二者的内在关联，搭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培育机制，能够切实强化大学生心理培育实效，助力青年群体形成稳定正向的心理特质，实现文化传承与心理育人的协同推进。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内在契合

（一）文化基因与心理特质的同构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核心文化基因，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核心维度有着天然的适配性，在价值取向与精神引领层面高度吻合。积极心理学所重视的乐观、坚韧、自律、自我实现等核心心理特质，紧密依存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慎独修身等精神观念。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与道德追求，并非浅层次的道德条文，而是深度沉淀于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要素，能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文化支撑。这种适配关系表明，传统文化不是零散堆砌的育人素材，而是契合大学生心理发展走向、可深度渗透的心理养分，能直接对接积极心理特质培育需求，避免心理培育与文化传承相互割裂。

（二）心性修养与心理建设的互通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心性修养为核心的修身体系，与现代积极心理建设在目标与路径层面高度趋同，均致力于个体内心秩序的搭建与心理韧性的强化。传统文化所推行的内省、正心、寡欲等修身途径，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心理调适与人格养成机制，和积极心理学重视的自我觉察、情绪管理、压力处理等关键心理建设要素高度匹配。当下，大学生面临学业、就业、人际等多重压力，情绪内耗与心理失衡现象频发[1]。传统文化的心性修养理念，能帮助大学生主动向内探寻、稳定情绪、提升心理稳固程度，弥补现代心理教育在心性修养方面的不足，实现从被动接受心理疏导到主动开展心性修炼的跨越，促使心理建设向更深层次的人格塑造迈进。

（三）关系伦理与社会支持的共鸣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伦理体系，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所依托的社会支持系统紧密契合，为个体积极心理的良性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的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和而不同、群己和谐等关系准则，构建了亲疏有序、互助协作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积极心理学中归属感、人际信任、社会联结等积极心理要素的培养需求高度相符。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离不开良好的人际环境与社会支持。传统文化的关系伦理能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交往意识，学会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理解他人，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2]。这种基于传统伦理构建的社会支持网络，可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孤独与疏离感，为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提供有力支撑。

二、“双循环”机制的运行逻辑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内在契合，构建“内循环＋外循环”双协同培育机制，两大循环既独立运行、各有侧重，又相互联动、耦合共生，

形成“内在心理建构—外部环境赋能—内外循环互促”的全链条闭环体系，突破单一培育模式的局限，实现培育效能的最大化与长效化。

（一）内循环：文化认同—心理内化—品质生成

内循环是立足大学生个体主观层面的核心培育链路，以文化认同为起始点，以心理内化为关键环节，以品质生成为最终目标，实现传统文化精神向个体积极心理特质的深度转化。文化认同作为内循环的根基，要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契合积极心理培育的核心内容。通过科学引导，让大学生破除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知，全面深刻领会其中的修身智慧与精神力量，在内心深处构建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摒弃被动、刻板的文化接纳模式。心理内化是内循环的关键转化节点，借助内省、慎独等传统修身途径，融合积极心理学中自我觉察、情绪调控等理论，帮助大学生将外在文化理念转化为内在心理准则，循序渐进地修正消极心理认知，稳固正向心理基础[3]。品质生成是内循环的落脚点，通过长期文化熏陶与自我砥砺，让乐观坚韧等积极心理品质固化为稳定心理特质，实现个体心理完善与人格提升，全程凸显个体主观能动性，形成闭环自我培育架构。

（二）外循环：环境浸润—行为外化—社会强化

外循环是依托外部场域与社会主体的支撑性培育链路，以环境浸润为实施载体、行为外化为关键实践、社会强化为保障支撑，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外部培育体系，为内循环平稳运转筑牢外部支撑。环境浸润作为外循环的基础，需充分整合校园、家庭、社会三大场域的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家庭教育指导以及社会文化传播活动，构建广泛覆盖的文化育人格局，让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持续受到传统文化熏陶，潜移默化获得积极心理引导。行为外化是核心实践要点，推动大学生把内心形成的积极心理品质转化为实际行动，以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诚信、担当等理念为指引，引导其在人际交往、学业发展、社会活动中践行积极行为，将心理素养转化为具体实践，检验心理培育成效。社会强化是长效保障手段，通过家庭认可、学校激励、社会舆论引导等途径，及时肯定和反馈大学生的正向行为，提升其行为自觉性与心理认同感，巩固积极心理培育成果，形成外部驱动行为、行为促进环境优化的良性循环。

（三）双循环的协同耦合与动态平衡

双循环的协同耦合是机制高效运转的核心，内循环与外循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依存、协同共进的有机整体，二者保持动态平衡，是大学生培育工作长期有效的关键前提。内循环为外循环筑牢根基、注入动力。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积极心理，会促使其主动融入外部文化环境、积极践行正向行为，使外循环的环境塑造与社会引导更具针对性，防止外部培育工作流于形式。外循环为内循环创设条件、提供平台，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与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能进一步深化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加快心理内化进程，解决个体自我提升时面临的认知局限、动力不足等问题，推动内循环持续发展。二者通过个体心理发展与外部环境影响的相互作用，实现内在动力与外部支持的精准匹配，依据大学生心理特点和外部环境变化灵活调整，平衡个体内化与外部引导，构建协同共进格局，保障培育机制稳定高效运行。

三、“双循环”机制的实现路径

（一）深挖文化资源，夯实认同根基

深挖适配大学生积极心理培育的传统文化资源，需避免对传统文化素材做表面化、碎片化处理，而应紧扣心性涵养、人格锻造、人际互动三大要点，深入且系统地梳理整合。针对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要仔细甄别，选取自强不息的奋进意志、克己守正的自律观念、达观超脱的处事方法、推己及人的交往准则等关键内容，剔除封建糟粕，提炼符合现代积极心理学思想的文化精髓，搭建结构完备的文化育人资源体系。结合大学生认知与心理状况，把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教育内容，推动文化传承与心理培育深度融合。

推进传统文化资源与积极心理教育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搭建专业的内容转化与传播体系，转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固有认知。可借助高校思政、心理健康、人文素养相关课程，成立跨学科教研组，把系统梳理后的文化资源融入日常教学[4]。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剖析、经典研读等方式，引导大学生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蕴含的心理滋养内涵。同时，紧扣时代需求，结合当代大学生心理发展特征，阐释传统文化修身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价值，帮助大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在文化自信与心理认同间建立紧密联系，为双循环机制顺畅运行筑牢内在根基。

（二）创设浸润环境，涵养积极情感体验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传统文化浸润环境，需整合校园、家庭、社会三大领域资源，形成协同共育机制。高校作为核心实施主体，应将传统文化要素有机融入校园空间营造与教育活动设计，建设传统文化主题展示区、修身养性文化空间及经典文本研读场所，开展礼仪规范训练、家风文化研讨、修身理念阐释等系列活动，使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大学生日常行为模式。在家庭维度，引导家长践行优良家风传统，依托传统家庭伦理准则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为大学生构筑稳固的心理支持系统[5]。

依托社会场域拓展浸润场景，将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培育有机整合，强化外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积极影响。可与地方文化机构、公益团体及社区部门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开发兼具文化传承与心理支持功能的教育项目。组织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社区服务及道德实践，使其在行动中深化文化理解，逐步形成

归属感与幸福感。同时，利用新媒体搭建线上学习平台，系统传播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念与积极心理知识，突破时空限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优化心理内化环境，促进情感认同向心理认同转化，保障传统文化与心理培育双循环机制的有效运行。

（三）拓展行为场景，促进品质外化迁移

紧扣传统文化伦理准则与积极心理行为要求，搭建贴合大学生生活实际的实践平台，以学业实践、人际交往、社会实践为关键切入点，系统规划实践任务体系，推动大学生把内修获得的乐观、坚韧、自律等心理特质，以及仁爱、诚信、担当等传统道德意识，切实落实到日常行为[6]。学业层面，鼓励大学生秉持自强不息的态度应对学业困境，锤炼坚韧意志；人际交往方面，引导其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营造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际信任与共情能力；社会实践领域，激励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弘扬传统美德，达成认知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建立行为实践的闭环引导机制，推动积极心理品质持续外化并灵活迁移至多元场景，实现心理内化与实践行动的高度融合。高校应构建完善的实践引导体系，明确行为实践的目标、流程及效果评估标准，确保实践活动不流于形式。同时，引导大学生开展深入的自我观察与行为反思，借助内省、慎独等传统修身手段，识别自身行为与文化理念、心理准则的偏差，及时纠正不当行为，提升积极行为的自主性。通过持续实践与自我精进，让积极心理品质成为日常行为习惯，优化外部环境，深化心理内化进程。

（四）构建评价体系，保障循环效能

打破单一化评价模式，立足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运行逻辑，设定分层分类的评价指标。在构建评价体系时，过程与结果需统筹考量。针对内循环，设置文化认同、心理内化程度、积极心理特质稳定性等指标，真实反映个体培育成效；针对外循环，设置环境浸润度、行为外化水平、社会支持力度等指标，切实评估外部场域的支撑作用。指标设定既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又要紧密结合大学生现实情况，将量化与质性评价紧密结合，规避评价出现片面、形式化倾向，保障评价的严谨性与可靠性。

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与反馈，推动评价体系与双循环机制深度交融、动态适配，提升培育效能。构建长效评价监测体系，定期进行全面评估，深入分析内循环中个体培育的短板、外循环环境支撑的不足，以及双循环协同推进中的薄弱环节。依据评价反馈情况，对文化资源布局、环境改善、实践场景创设等关键部分进行精准优化改进，适时调整培育方向与具体方法。同时，将评价结果纳入高校育人考核与大学生素养评价体系，清晰界定各方责任，激发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参与的动力，保障内外循环稳定且高效运行，推动传统文化切实融入积极心理培育工作。

四、结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构建“双循环”机制，是文化传承与心理教育协同共进的有益探索。通过文化认同、环境浸润、行为实践与科学评价等多维路径，能切实提升大学生心理素养与人格品质。未来，需持续深化研究与实践，不断优化机制运行，凝聚各方合力，让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积极心理培育中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其成长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健全心理品质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李雪 .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大学生积极心理 [N]. 青海日报 , 2025−10−24(07).

[2] 张霞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5, 24(07): 171−173.

[3] 华云松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培育策略 [J]. 新乡学院学报 , 2024, 41(04): 70−73.

[4] 成诚 .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作用 [J]. 三角洲 , 2024(33): 162−164.

[5] 高阳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心元素丰富心理健康课程应用理论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4(29): 29−32.

[6] 倪玲 , 赵传华 , 徐媛媛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 [J]. 国际公关 , 2022(24): 100−102.

（作者：潘毅，郑州工商学院；李向燕，河南师范大学）

大学生生育观现实情况调研和对策研究

徐子涵 向文歆 张国栋 徐益彩 *

摘要：本研究基于低生育率与人口结构转型的背景，对大学生生育观展开实证调研与对策分析。数据显示，50.83% 的大学生生育意愿不确定，95% 的大学生视经济压力为首要制约因素，同时 46.67% 的大学生将“爱情结晶”作为生育核心动机。研究显示，青春健康教育对 82.5% 的受访者的生育观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宠物经济替代、职业发展优先等现代性因素则加剧了生育决策矛盾。据此提出高校教育革新、政策精准支持与社会生态重塑的三维对策，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生育观；生育观引导

在我国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下，大学生作为未来生育主体，其生育观的演变直接关乎人口战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调研表明，当代大学生生育观呈现理性计算与情感需求交织、传统伦理消解与现代价值重构并存的复杂特征。深入剖析这一群体的生育认知图景，不仅能为国家生育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更能通过青春健康理念引导，助力其构建兼顾个体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生育价值观。

一、低生育率时代的青年生育认知范式转型

（一）现象叩问：从“人口红利消退”到“生育意愿洼地”的代际断层

在人口发展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跌破警戒线，大学生群体的生育意愿已成为观测社会转型的关键指标。调研数据显示，50.83% 的大学生对生育选择持不确定态度，这种摇摆性背后折射出代际价值体系的深刻裂变。与 80 后相比，Z 世代生育意愿下降约 57%，这种断崖式下滑绝非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经济压力、职业竞争与文化观念多重作用下的社会结果。在从人口红利到生育焦虑的转变中，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认知升级与社会结构变迁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接受现代公民教育的青年群体，正在用理性计算重构传统生育伦理的价值坐标 [1]。

上海某高校开设“宠物殡葬管理”选修课的现象，折射出当代大学生亟待寻找情感需求替代性满足机制的迫切性，其中 34% 的大学生将宠物视为“情感替代”，这种选择与 62.8 万元城镇家庭育儿成本的现实压力形成对照。当生育从“传宗接代”的宗族使命转变为需要精密经济核算的人生选项时，青年群体的生育决策已超越生物本能，演变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排序实验。这种代际断层不仅表现为数据差异，更体现为从“集体主义生育观”向“个体主义生命叙事”的认知范式转换。

（二）理论重构：青春健康视域下生育观研究的三维坐标系

生育观的现代性转型需要置于“生物—社会—文化”的三维框架中解析。从生物学维度看，88.33% 的大学生关注生育对女性身体的长短期影响，包括妊娠期并发症与产后恢复困难等具体问题，这种认知突破了传统“养儿防老”的功利视角，将生殖健康纳入生育决策的核心考量。社会学维度则揭示出，67.5% 的大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置于生育决策的核心，这种选择与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直接相关——知识经济时代的青年更倾向于将生育视为可能中断职业积累的“机会成本”。

文化维度的变革更为深刻。当以“传宗接代”为生育目的的人数占比从 2002 年的 35% 降至如今的 30.83% 时，这反映出性别平等观念对传统宗族伦理的解构效应。青春健康教育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82.5% 接受过相关教育的大学生认为其显著影响了生育观，74.17% 的受访者表示增强了科学认知，69.17% 的受访者认为其对生育观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提升。而随着文化维度变革，“传宗接代”生育目的占比下降，青春健康教育的干预相当关键。这种教育干预并非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通过构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的认知体系，帮助青年在生物本能与社会规范之间寻找平衡支点 [2]。

二、大学生生育观的多维现实图景

（一）认知光谱：矛盾心理与理性化抉择的共生状态

当代大学生的生育认知呈现出显著的二元分化特征。在生育意愿维度，50.83% 的大学生作为“不确定群体”构成了最具研究价值的社会样本，他们既非坚定的丁克主义者，也未做好生育准备，这种悬置状态本质上是对高生育成本的理性回应。在 35.83% 明确表示“不喜欢小孩且不愿生育”的大学生群体中，女性占比达 68%，这与 88.33% 的大学生关注生育对女性身心健康影响的数据形成因果链——妊娠期并发症、盆底肌松弛等生理风险的认知；产中因激素水平变化带来的焦虑和产后抑郁症所带来的孤独感等心理问题，以上生理与心理之间的紧密互动正在重塑性别视角下的生育决策。

生育动机的现代性转型更具启示意义。46.67% 的大学生将“爱情结晶”视为生育的核心动因，40.83% 的大学生则强调“增加生活乐趣”，这种个体情感导向的动机体系，彻底颠覆了“传宗接代”的传统叙事。值得注意的是，92.3% 的受访者对子女性别无明显偏好，这与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性别平等意识直接相关。当“生男生女都一样”从政策口号变为青年共识，这是文化观念的代际进步。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职业发展与生育计划的现实博弈——青年试图在人力资本积累峰值期与生理最佳生育期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当下多元价值观交织碰撞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认知光谱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育儿观念上。56.67% 的大学生将“健康快乐”作为对子女的首要期望，紧随其后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期待，这种选择既源于自身受教育经历的正向反馈，也隐含着对社会阶层固化的焦虑。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集体无意识，育儿已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演变为需要社会资源支撑的系统性工程，这种认知扩张进一步加剧了生育决策的复杂性，让年轻群体在生育抉择前愈发踌躇。

（二）制约因素：结构性压力与主体性选择的交叉影响

经济因素以 95% 的认知占比成为生育决策的首要制约因子，这一数据背后是 62.8 万元城镇家庭 18 年育儿成本的沉重现实。财政部数据显示，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开支的 35%，而高房价、医疗成本的叠加效应，使“生育”在青年认知中异化为“家庭资产负债表”上的巨额支出项目。这种经济理性主义的盛行，与 46.67% 的受访者将生育视为“爱情结晶”的浪漫想象形成有趣张力——当代大学生既渴望情感联结的生育价值，又被现实的经济计算所困，陷入“想生而不敢生”的认知悖论。

职业发展的挤压效应同样显著。67.5% 的大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置于生育决策的核心，这种选择反映出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特殊价值。在“996 工作制”普遍化、职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生育被视为中断职业晋升的风险事件。85.83% 的大学生关注生育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尤其对女性而言，“产后抑郁”等社会案例的传播与“职场性别歧视”的现实担忧形成叠加压力 [3]。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显性的经济成本，更包含隐性的职业发展机会成本，使生育决策成为关乎人生轨迹的重大投资选择。

健康焦虑构成了第三重制约维度。大学生对生育健康的认知已超越传统的生理层面，形成 88.33% 关注身体健康、85.83% 关注心理健康的双维框架。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产后抑郁案例、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潜在健康隐患知识的科普，使青年群体对生育风险的认知更加具象化。这种焦虑与学业压力、就业竞争相互交织，形成“压力倍增效应”，导致 85% 的大学生期待通过增加育儿补贴、降低教育成本等社会支持来缓解焦虑，这也反映了个体理性与社会支持之间的断裂状态。

（三）替代机制：宠物经济与生育观念的现代性置换

当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宠物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情感需求的空白。调研显示，大学生养宠率较五年前翻倍，34% 的受访者明确将宠物视为“孩子的情感替代”，这种现象在上海某高校“宠物殡葬管理”选修课中得到文化层面的印证。从社会学视角看，宠物扮演着“情感代偿”的角色——在无法承担生育成本的现实下，青年通过与宠物建立拟家庭关系，满足亲密关系需求与情感寄托渴望。这种替代机制的盛行，本质上是现代性语境下个体对亲密关系的重构尝试。

消费主义在这一置换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推手。宠物食品、医疗、殡葬等产业链的完善，使“养宠”成为可计算、可管理的消费行为，与生育所需的长期情感投入和经济负担形成对比。34% 的“情感替代”率背后，是消费文化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解构——当“陪伴”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生育所承载的情感功能便被部分剥离。这种置换并非简单的价值堕落，而是青年在结构性压力下的生存智慧，反映出个体在社会约束中的主体性建构 [4]。

其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在于宠物经济的兴起标志着“生命意义”的叙事转向。传统生育观将生命价值寄托于血脉延续，而当代青年通过宠物的“拟子女”角色，将生命意义重构为“当下的情感联结”[5]。这种转变与 67.5% 的职业发展优先的价值排序相互呼应——在强调个人成就的时代语境下，生育从“必须完成的使命”变为“可选的生活方式”，而宠物则成为无须长期责任承诺的情感载体。这种替代现象的社会影响仍需长期观察，但无疑已构成理解当代青年生育观的重要维度。

三、建构论：生育友好型社会视域下的协同引导体系

（一）高校教育的范式革新：从知识传递到价值建构的体系升级

高校作为青年价值塑造的主阵地，需要构建知识、价值、实践三位一体的生育观教育体系。在课程融合层面，应突破传统教育的生理知识传授模式，将生育责任、家庭伦理与职业发展等维度纳入跨学科课程设计。例如，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增设生育心理专题，系统分析85.83%关注的产后抑郁等心理风险，结合67.5%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优先的现实需求，探讨生育与职业的平衡策略。性教育课程则应超越避孕节育知识，深入讨论46.67%的大学生认同的“爱情结晶”生育观背后的情感伦理，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生育认知框架。

心理干预体系应聚焦于85%的生育焦虑群体。建立“生育心理辅导工作室”，针对不同性别、专业的学生的认知差异，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开发“生育决策心理评估工具”，帮助学生科学分析自身经济承受能力、职业规划与家庭期待，避免陷入决策迷茫。将青春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大学阶段就思考“生育—职业”的生命周期规划，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管理[6]。这种教育范式的革新，本质上是帮助青年在理性计算与情感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构建更具弹性的生育认知体系。

（二）政策支持的精准供给：成本对冲与权益保障的双轨设计

破解95%的家庭支出占比的经济压力，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成本对冲机制。在国家层面，应将62.8万元育儿成本的社会分担纳入政策设计，建立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周期的津贴体系。可参考2025年生育政策导向，将生育津贴与房价调控、教育资源分配挂钩，对多子女家庭实施购房贷款利率优惠、优质学校学位倾斜等组合政策。财政部数据显示，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35%，因此降低教育成本应成为政策重点，可通过拓展公立教育资源、规范课外培训市场、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等措施，切实减轻家庭负担。

职业发展保障体系需要突破性创新。针对67.5%的大学生将职业发展置于核心地位的青年群体，应强化男性父职责任与女性就业权益的双重保障。延长陪产假至90天并强制实施，通过政策杠杆推动家庭角色平等化，缓解85.83%的大学生群体关注的母职压力。建立“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对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禁止将生育作为职场歧视的理由。开发“职业恢复支持计划”，为产后女性提供技能再培训、岗位过渡期等支持，消除“生育即失业”的现实担忧。这种政策设计既尊重了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诉求，又为生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住房与教育资源的联动支持尤为重要。在高房价背景下，可探索“多子女家庭住房补贴”制度，根据子女数量给予购房首付比例优惠或租房补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行“学区房学位制”改革，避免因生育时间差异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将托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按社区人口密度配置普惠性托育机构，解决60%的大学生认为的25~29岁生育最佳群体的“无人带娃”后顾之忧。政策创新的核心在于，将生育从“家庭私事”转化为“社会公共事务”，通过制度设计降低个体的生育决策成本。

综上所述，大学生生育观的变迁轨迹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不确定群体比例、育儿成本数据、宠物情感替代现象，无一不彰显个体在现代化浪潮中对生命意义进行深刻重构与理性权衡，尽显社会进步之光。当50.83%的不确定群体成为研究样本，当62.8万元育儿成本成为决策坐标、当34%的宠物情感替代现象引发思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育意愿的高低变化，更是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定义生命意义的努力。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理性认知能力，使青年能够清醒地审视生育的生理成本与社会收益，这种审视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邢月秋，欧阳艳琼．大学生生育意愿和养育态度研究 [J/OL].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1−7[2026−03−19]. https://doi.org/10.14188/j.1671−8852.2025.0513.

[2] 徐俊，江砥，乔晓春．青年大学生生育意愿何以低迷？——基于全国29489份调查数据的分析 [J]. 宁夏社会科学，2025(02): 149−160.

[3] 樊晓菱，胡弈，唐子雯，等．新人口政策背景下当代青年女大学生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J]. 卫生职业教育，2024, 42(24): 132−136.

[4] 华瑞昭，江剑平．“三孩”政策下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J].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24, 21(09): 1−10.

[5] 刘思杏，朱宏锐．三孩新政下海南省在校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J].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24, 32(03): 639−643.

[6] 许世存，孙茜．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 65(02): 181−195, 239.

（作者：徐子涵、向文歆，桂林医科大学本科生；张国栋，桂林医科大学副教授；通信作者徐益彩，桂林医科大学讲师）

杜延平，1970年生于黑龙江鸡西，别署小磨堂，现居燕郊。一级美术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先后师从王友谊先生、韩天衡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兼新文艺群体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北京书法家协会篆书篆刻刻字委员会委员，东隅印社社长，河北美术学院等高校书法专业特聘教授。

曾担任第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全国第九届篆刻展评委、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北京地区初评评委、第三届『卫夫人奖』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委、上海市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大展终评评委等。

其作品数十次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主办的展览并获奖：第二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一等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佳作奖，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大会二等奖，西泠印社六、七届篆刻艺术评展优秀奖，百年西泠·中国印海选总决赛优秀作者，百年西泠·乐石吉金国际篆刻活动优秀奖等；其篆刻作品多次入选各类国展；有书法篆刻作品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泠印社、黑龙江省博物馆、上海韩天衡美术馆等专业机构收藏。

已出版《中国篆刻百家·杜延平卷》（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契文斋藏印·杜延平刻心经卷》（西泠印社出版社）等多种。

书印相谐 积健为雄

——知名书法篆刻家杜延平侧记

彭一超

杜延平是黑龙江籍知名书法篆刻家，更是一位脚踏实地、自强自立的北漂艺术家。从2013年北京琉璃厂职业篆刻家群体自发成立的癸巳“琉璃印汇”雅集展览相识开始，延平兄便是这个印人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从当年寓居北京琉璃厂鬻书印近20年的职业印人，到近年举家落户燕郊，成功转身为当代独立书法篆刻名家；从普通的篆刻国展入展获奖作者，到近年陆续担任各类全国性书法篆刻展评委，这种职业身份的转换，是当下诸多书印同仁终其一生很难达到的一种高度，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成功大致可归结于八个字：书印相谐，积健为雄。

每一个成功的印人，都有各自独到的看家本领。《世说新语》有俗语云：“一招鲜、吃遍天。”而延平兄绝不止于此，他的篆刻创作有三套理论支撑：第一套是深耕于现代海派大家王福庵、赵叔孺、陈巨来圆润清亮的细朱文，和典雅端庄的汉玉印风格，体现深厚的印学传统功力；章法布局精巧，线条流畅自然，整体布局整齐有序，疏密有致，细朱文印代表作有“闲坐但焚香、旧游春燕能说、登高临远”等；白文印有“风箫吟、好事近、岁岁平安”等，这是治印彰显共性的传统法则。第二套是最能体现个人独家印风和艺术成就的作品，他创造性地将简帛书与古玺印、秦印字法杂糅，间或融入封泥文字笔意的篆刻图式，完美地实现朱文印和白文印结字风格的和谐统一。直观地说，其白文印就是朱文印的反白效果，其朱文印是白文印的封泥再现。其代表作如朱文印：“白露横江、如南山之寿、多言数穷”等；白文印有：“长风破浪会有时、林泉消夏、到处云山是我师”等。第三套是一直令古今篆刻家视为畏途的铜印创作。2020年，他创作了不少铜印艺术精品，多为白文印如“逸兴雅怀、欢喜、乐道、思无邪”等。总之，他的创作继承了秦汉玺印和明清流派印的传统，自觉践行清人邓石如提出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文人篆刻审美的传统，

而又不失自家风范；他刀下所呈现的印风，既有婉约工稳、细腻停匀的铁线篆朱文印，浑厚华滋、遒劲饱满的多字白文印，又有粗犷朴茂、古朴灵动的古玺印一路写意印风。他在创作上主张：“印之上品者贵有古意，而古意是对传统精髓的汲取。亦要有时代气息，而时代气息又有别于传统程式，是新的审美取向与技法的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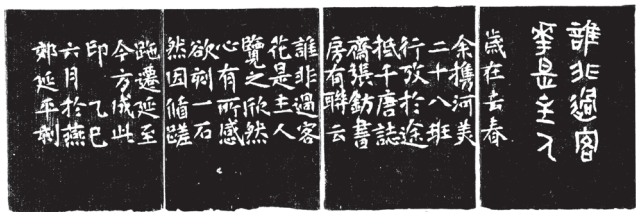
从篆刻本体上看，第一，强调印人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独到的篆书构形系统，观杜延平入印篆书文字，来源于他对先秦古玺文和秦汉简帛书的嫁接糅合，取精用宏，使得其印风彰显了自家语言的辨识度，难能可贵。第二，具有个人风格的刀法系统，刀法无非是冲刀、切刀和冲切结合三种，如何选择向线和背线运刀，力图表现个人入印篆书的书写性，这一点就充分反映了印人的综合修养和智慧。印人大凡有了自己成熟的篆书系统，加上娴熟自如的刀法应运，其章法自然就形成了个人风格。纵观杜延平的这类篆刻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在入印篆书文字方面的取舍和精湛刀法的完美结合。

诚然，边款是篆刻艺术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能检验篆刻家的人文修养和艺术才情，那是印人在完成印文创作后，再于印章侧面刻上关于篆刻创作的内容、时间、地点和创作心得等方面的综合文字记载。任何一位优秀的篆刻家毫无例外都是边款创作高手，杜延平亦不例外，他的边款毫不逊色于印面，其边款书体以古朴灵动的楷书为主体，篆书、隶书、简帛书等书体在边款中也得到了多元表现。他尤其擅长创作四联边款整纸拓，构成一幅完美的袖珍反白书法作品横幅，其边款刻制不仅章法饱满，刀法稳健，结字遒劲，而且拓制精良，浑然一体，充分展示了杜延平对长跋四联边款的驾驭能力和创作水平。

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的韩天衡在《杜延平篆刻作品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出版）序言中给予了积极评价：“学弟杜君延平，鬻印京华。印风多有涉猎，其古玺写意印，在继承古玺印基础的同时，参以爽利多变的刀法，且重笔意，具现代气息。而脱胎于魏晋一路的作品则得其率意之趣。……延平亦精于铜印创作，不畏艰辛，敢于碰硬。……‘世之所贵者必贵其难’，在这方面延平无论是铜质抑或是石材，破其难，求其新，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者是可宝贵的，延平是具有这种素质的，所作不俗，令人欣喜。”

杜延平始终坚持艺术创作与公益事业并行不悖的理念，他在不同时期积极响应各方号召，用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奉献爱心。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他向相关机构陆续捐赠了大量的作品，如 2013 年 3 月向黑龙江省博物馆捐赠书法《王维·渭城曲》一件；2014 年 5 月向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捐赠篆刻三方、书法三件；2017 年 8 月向恭王府博物馆捐赠书法作品一件；2022 年 11 月向西泠印社捐赠篆刻作品《种德若树》一件，同年 12 月向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捐赠书法一件；2023 年 9 月向上海韩天衡美术馆捐赠书法《围炉夜话三则》一件；2023 年 11 月向西泠印社捐赠篆刻作品《笃行致远》一件，同年 12 月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捐赠印蜕和书法题签二件；2024 年 8 月向鸡西市博物馆捐赠十八件篆刻作品，同年 11 月向西泠印社捐赠印屏和篆刻《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二件；同年 12 月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捐赠印蜕和书法题签一件；2025 年 5 月向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捐赠书法《吴可学诗》一件。近年多次随省市书协参与“万福迎春”下基层送春联公益活动；2024 年至 2025 年连续两年免费为燕郊康城街道书写小区门楣大春联；2024 年先后为黑龙江东隅印社举办篆刻公益讲座三期。如今他一直走在支持公益的路上。

（说明：杜延平篆刻作品选刊均非原大，详见印蜕尺寸。）



△杜延平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附边款）
4cm×4cm

△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
（附边款）10cm×7.2cm

△ 花雨禅心俱寂（附边款）
3.2cm×3.2cm

△ 乐琴书以消忧（附边款）
3.2cm×3.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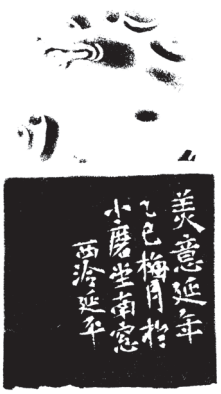
△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附边款）9.8cm×2cm

△ 醉花阴
5.5cm×2.5cm

△ 添得黄鹂四五声
5.6cm×3.7cm

△ 养怡之福（附边款）
10cm×10cm

△ 林泉消夏
3.6cm×3.3cm



△ 美意延年（附边款）
3.6cm×1.7cm

△ 临江仙
4.3cm×3.7cm

△ 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
10cm×7.2cm

朴拙有趣 执念求真

——沈世铎水墨人物画作品观后

葛玉君

有学者说过："观看先于语言，又未曾被语言完全解释清楚。"但观看事物的方式，无疑受到个人知识结构与信仰的影响。我们的视线总是在游弋，总是在作出选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恰恰处在纵向与横向的焦点上，艺术才可能透过语言生发出其独特的意义。与此同时，这种语言也反过来对我们的艺术观念进行着不断的修正。沈世铎先生的作品正是在一种不断的投入、思考、反观中逐步成熟的，他的创作过程即是他思绪的延伸之旅，而他的作品，在我个人看来，既不是汹涌的激流，也不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游乐，而是带着浓烈的一种精神气息，像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一杯绿茶，令人回味。

沈先生的中国画创作远师扬州画派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诸家，近承刘文西（1933—2019）、王明明、刘大为等名家；而其中更融入了现代中国画大家吴作人（1908—1997）的风格韵味。同时，他的作品中还融合了一种浓浓的民俗文化趣味，就如陈师曾（1876—1923）笔下的北京风俗画一样，所绘皆为当时北京街头巷尾常见的民俗风情，于雅致中不乏亲近之感。换言之，他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是一种极度的精神性与世俗性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笔墨语言层面则体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朴"，质朴，尚朴素，见素抱朴之意；其二则是"拙"，古拙，简言之"朴拙"之气，"拙"为表象，"朴"为心境。其用笔近乎大巧若拙，这种拙并非来自笔墨语言的迟钝，而是一种不自炫耀的内敛之气。在我个人看来，"拙""朴"无疑是沈世铎绘画创作的两个关键词，不仅仅是语言层面，更多与他的精神世界同步。我想，这是认识沈先生这一系列人物画创作的一个起点。

沈世铎，1959年出生于天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曾先后进修于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中国国家画院刘大为工作室，师从任惠中，现任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其作品多次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各类国展：其《若尔盖之晨》，获工在当代·2013第九届工笔画大展优秀作品奖（最高奖）；作品《寂静草原》获2014年第八届民族百花·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作品《学习》入选2014年全国第四届线描展；作品《炊烟又起》入选2014年全国精致立场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展；作品《家园》入选吉祥草原、丹青鹿城·2014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香巴拉之约》获多彩中国梦·2014中国百家金陵展中国画优秀作品奖。其作品分别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荣宝斋等全国百余家展馆展出。多年来，在全国性美术刊物及其他相关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系列丛书·沈世铎》等多种。

当然，这种内在情感与艺术形式语言的紧密契合，在某种意义上与他常年深入西藏高原采风，以笔墨描写西藏高原，从中感受那种对宗教对艺术的虔诚的心境有关。在其作品《春的企盼》中，那红色的喇嘛庙墙外休憩的藏民，浓烈的红色衬托出藏民的一张张笃定、虔诚、淳朴的面孔，平淡却历久弥香。观其长卷中骑马的男子，围坐的家族，欢歌的人群，还有嬉戏的儿童，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把西藏的纯净和美好，藏民的虔诚用其自己的语言描绘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不仅仅是对藏民形象的描绘，在我个人看来，更多是沈先生自我情感的一种寄予，一种理想，抑或一种内心的独白。

无疑，沈世铎的绘画是孤独、空寥和寂寞的，因为他深刻地体悟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但他的作品又是富有生机的，因为他满腔情怀的爱意，由于大地宽广的胸膛，万物才有这样的生机勃勃。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滋养了他的理想与情怀，这也许成为沈世铎的人物画创作注入笔端的精神动力。

沈世铎的人物画创作先后得到了画坛多位名家的肯定与好评。2008 年，他在参加黄土画派赴太行山写生的过程中，时任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的刘文西在看了他的西藏题材创作后，很肯定地说：“你就这样画，西藏这一题材足够你用一生去画。要不断地进藏采风，只要有足够的采风写生资料，就能探索出自己的绘画语言。一生画一个题材很难，不要半途而废。”2009 年，他进入国家画院刘大为工作室师从任惠中老师，在当年去广西写生回京的总结会上，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的任惠中对其写生创作给予高度评价：“无论从造型上，还是笔墨的应运上，都有一定的功力，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但还需不断努力。”2015 年，他进入苗再兴工作室，主攻大型人物画创作，苗这样评价他：“你的创作语言已经成熟了，而且格调也很高，不跟风，总是去寻找自己的笔墨语言，这就对了。”上述画坛名家不同时期对沈世铎的人物画创作所给出了中肯而朴实的评价，为他日后的创作指明了方向，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记得沈世铎曾说过的一句话：“一幅幅蓝天白云雪山交织成的画卷，会在脑海中浮现，对我来说，是自从意识到自己存在之日起就一直向往远方。”这不仅是他一系列创作的探索，更彰显了沈世铎的艺术人生历程，一种充满希望与延续的旅程。

其实，每一个书画名家几乎都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一串串公益足迹，沈世铎亦不例外。2008 年 6 月，他为安徽省黄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人物画作品一件，时任黄山市市长李宏鸣在其捐赠证书上题字“特殊教育，功德无量。”2011 年 6 月，为天津市大港区残疾人公益事业促进会捐赠中国画作品一件；2012 年 12 月，中国五老公益工程组委会授予沈世铎“时代领跑者”系列活动慈善大使荣誉称号；2017 年 6 月，为天津市慈善协会捐赠中国画作品二幅，为弱势群体奉献爱心；2019 年 10 月，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校园文化建设工程捐赠中国画作品三幅。他脚踏实地、默默耕耘，潜心于水墨人物画创作，在人生不同阶段，他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脚步一直在与时代同行。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

△ 沈世铎 《拉卜楞寺记忆》 137cm×69cm

沈世铎水墨人物画作品选刊

△ 沈世铎 《雪域同行》 137cm×69cm

△ 沈世铎 《藏族牧民》之一 47cmx69cm

△ 沈世铎 《藏族牧民》之二 47cmx69cm

◁ 沈世铎《藏地清风》98cm×90cm

◁ 沈世铎《雪域甘南》137cm×69cm

安全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知识之树撑起安全之伞

全国防灾减灾日

5.12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公益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60 09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2026 年 5 月 上 总第 197 期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